中国通史

修订本

22

白寿彝 总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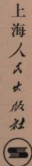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

近代后编（1919—1949）

下册

王桧林 郭大钧 鲁振祥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白寿彝 总主编

中国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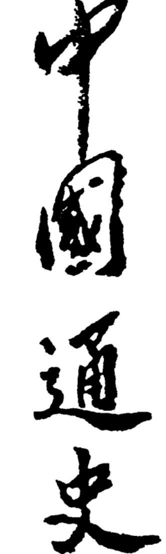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208-04997-0
9 787208 049970 >
全套总定价 106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中国通史

22

第十二卷 下册

修订本



李新

白寿彝 总主编

王桧林 郭大钧
鲁振祥 主编

第十二卷

近代后编

(1919—1949)

下册

22

上海人民出版社

扉页题字 李 新

撰 稿

白寿彝	陈绍畴	陈兴唐	程纯枢
蔡德金	蔡景峰	丁 蔚	段万倜
冯 蕙	耿向东	耿云志	公茂虹
郭大钧	郭晓合	韩荣璋	何绍庚
李汉松	李 捷	李茂盛	李起民
李 岫	李少兵	林文照	刘乃崇
鲁振祥	罗桂环	罗 敏	欧阳礼泉
钱振纲	孙立峰	孙茂生	孙向远
唐宝林	王 冰	王桧林	王纪一
王 元	王宗荣	巫绍泉	习五一
徐庆平	徐锡祺	颜江红	叶丽琢
岳 梅	张莫宙	张九辰	张 藜
郑大华	周 暹	周天度	朱汉国
朱志敏	左玉河		

（按汉语拼音序列）



目　录

丁编　传　记



丁编 传 记

第一章 毛 泽 东

毛泽东，字润之，1893 年 12 月 26 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为人精明，克勤克俭。母亲文氏，乐善好施，笃信佛教。兄弟三人。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均在毛泽东影响下投身中国革命，并在革命斗争中壮烈捐躯。

毛泽东的幼年是在湘乡外祖家度过的。6 岁起在田里帮助劳动，8 岁起先后在韶山南岸等处私塾读书。少年毛泽东深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1910 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受维新思想影响。1911 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不久退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西方民主主义者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开阔了眼界。1913 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预科。1914 年 2 月,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他专心研修哲学、史地、文学等课程,勤学不倦。他还通过假期游学、举办工人夜学,广泛接触社会,增强救国救民的意识。他酷爱登山、游泳、日光浴等体育锻炼,并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长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917 年 6 月,在湖南一师为考查学生德、智、体优秀情况举办的“人物互选”活动中,他得票最多,独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优秀。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最大。经杨昌济介绍,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1918 年 4 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又共同发起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于同年 8 月第一次到北京。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广泛接触各种进步思潮,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夕,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积极指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推动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使反帝爱国斗争迅速扩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年 7 月 14 日,创办《湘江评论》,该刊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同年 12 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他第二次来到北京。1920 年 1 月,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前后,他读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 5 月到上海,会见正在这里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陈独

秀。陈独秀关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谈话，对处在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冬之间，他同何叔衡等组织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

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中共三大的方针积极参加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工作，并受国民党本部委托，回湖南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在会上多次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根据国民党一大的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同年12月，因病回乡休养。在韶山，他广泛进行农村调查，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和国民党区党部。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创办《政治周报》，积极参加同“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12月

1 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1926 年 3 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随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推动南方农民运动。1926 年 5 月至 9 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延聘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员从事农村调查,进行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南方农民运动高潮培养大批骨干。同年 10 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发言中提出"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

1926 年 11 月,毛泽东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前往武汉,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湖南区委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会后,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 年 1 至 2 月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同年 3 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邓演达等提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获全会通过。同年 7 月 4 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在 8 月 7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

想。被会议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前委书记。起义发动并遭受挫折后不久，他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于同年10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途中，领导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中，又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做群众工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地区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中共军委书记。同年5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定，担任重新组成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1928年10至11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领导红军击退湘赣两省国

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

1929年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面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对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同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观点,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1930年1月,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完整的先占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在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指导土地革命。1929年4月,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

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地方党和军队联席会议，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在指导红军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于1930年5月和9月写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前者着重考察了城镇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情况；后者着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同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撰写《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

1930年6月，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年8月，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余人，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近万人。1931年4月，蒋介石又以20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隐蔽待机，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同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避敌锐气，绕道千里，在敌军背后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国

民党军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1年间，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等人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称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他顾全大局，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在1933年8月所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以及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933年10月，为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还深入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撰写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路上，毛泽东耐心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使他们从"左"倾错误中醒悟过来。同年12月，在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同红二军团、红

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多数同志赞同。1935 年 1 月 15 至 17 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根据毛泽东发言的主要精神，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转变。随即，毛泽东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乘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迷惑不解之时，又威逼贵阳，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甩在身后。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1935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泽东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斗争，并拒绝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川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同年 10 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年 11 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不久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毛泽东、朱德等的耐心说服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于 1936 年 6 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 10 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1936年2月,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军队的黄河封锁线,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初,由于晋、陕、甘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东征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在回师通电中,向南京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新方针。毛泽东亲自主持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指导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在此前后,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936年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全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7年5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当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提出共产党应当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同年7月和8月，先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揭露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同年8月，出席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实际称主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也在会上通过。会后，毛泽东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开。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基本规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同年9至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批评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全党

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战区和敌后。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并积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1939年10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论断。1940年1月写成《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两篇著作表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写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发展。1940年12月,写成《论政策》一文,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阐述了抗日根据地内党的各项具体政策。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毛泽东起草《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接着,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两个党内指示,全面分析蒋介石集团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政策,重申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并调动军队,密谋发动第三

次反共高潮。7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要求撤退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起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力倡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年9至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经验，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重要的党的历史文献集，对分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演，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同年12月开始的审查干部工作中，一度发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各次

“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一致认识,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1945年4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的方针。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他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和平民主的诚意昭示于全国。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导全党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作战原则上,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遵循这些原则,经过8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在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毛泽东抓住敌我力量消长的

关键时机，果断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并令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进入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强调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后，毛泽东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解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左"的偏向，先后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党内指示。1948年4月，在由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途中，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1948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粟裕等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暂不渡过长江作战，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毛泽东运筹帷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略决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及时捕捉战略决战的时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战略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实施战略追歼,同时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9月21至30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随后,毛泽东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揭开

中国历史的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毛泽东在指导全党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精心领导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地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抗美援朝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1951至1952年，他领导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严厉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1952年9月起，毛泽东逐步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确认和批准。在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实行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创造出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经验；他还创造出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毛泽东在指导上发生急躁冒进的失误，特别是1955年夏季错误地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改造存在过急、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前,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毛泽东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从1955年底起,毛泽东开始认真思考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中国建设发展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并且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违背了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矛盾的学说,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也由此改变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

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在他指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发生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很快便有所察觉,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他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大大发展商品生产,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但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党内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并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面对1959到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的严重困难,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立即直接组织和指导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196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国民经济调整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主持制定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还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顶住大国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62年8月和9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

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他也曾正确地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危险，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1963 年至 1965 年，他发动和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运动愈演愈烈，远远超出毛泽东的预想，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失误，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让邓小平等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还亲自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始终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这个时期，他仍然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亲自领导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方向发展。

由于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和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辛努力，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 83 岁。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赢得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著作编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论文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他的诗词作品收入《毛泽东诗词集》。



第二章 周 恩 来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12岁随伯父到辽东，1913年在沈阳师范附小毕业，同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并创办刊物《敬业》。1917年6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为探求真理，使中华民族“腾飞世界”，他于同年9月赴日本求学。临行，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篇，抒发他救国的抱负。周恩来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斗争，观察了日本社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5月，即全力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他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下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词，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周恩来与邓颖超、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更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并为《觉悟》创刊号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宣布

“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1919年9月，周恩来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求学。他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1月，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当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据理答辩，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同年7月获释。在狱期间，他带领被捕代表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开展读书活动，为被捕代表讲述马克思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成为他从爱国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转折阶段。

1920年11月，周恩来为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欧洲，12月到达法国。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改造社会思潮的比较，即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终生不变的信仰。就在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先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并参与旅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又与旅欧国民党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外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当时

正值国共合作，他相继担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广州的两年多时间，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之一，还在旅欧期间，他就明确地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①。到广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共产党员为党代表和正副队长，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组建叶挺独立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在黄埔军校内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对学员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累了经验。

1925 年 8 月初，邓颖超从天津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926 年 12 月，周恩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 年 2 月，周恩来又兼任上海区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同年 3 月，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有利时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击败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年 5 月上旬，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

①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2 页。

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月下旬到武汉后，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即将全面破裂，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指导党的机关迅速完成了转入地下的任务。

国共全面分裂后，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重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军攻占南昌后，周恩来等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周恩来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11月，周恩来从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被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主任，分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等部门的工作，担当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928年6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

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区党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正确主张，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和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中央与地方党的联系和中央的安全。他还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导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和在红军党内"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为开好古田会议和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0年春夏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指令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年8月，周恩来回国。9月，与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分工负责军事和苏区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

瑞金，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他依据实际情况，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同指挥了红军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并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于同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1937年9至11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地处

华北抗战前线的山西，统一领导中共党、政、军各项工作。他曾参与策划发动平型关战役，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忻口战役，从而实现了抗战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同年 12 月至抗战胜利结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在武汉、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曾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还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成功地贯彻和组织实施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共产党的工作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立足。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在广大的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力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抗议的态度。

1943 年 7 月周恩来回到延安。8 月 2 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

尔什维克的路线！”①

在参加党内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他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严于解剖自己。1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历程，从敌人、队伍、领导者三个方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地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行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于1945年8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维护1946年1月通过的政协决议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谈判斗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他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之后，他直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仍以很多精力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他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得到健康迅速的发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留在陕北坚持工作

①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和战斗。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总参谋长,协同毛泽东不仅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挫败了蒋介石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而且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有效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此间,他还协助毛泽东指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制定推行新区的城市政策,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进行。

1948 年 3 月,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4 月,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5 月,毛泽东亦到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同毛泽东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1948 年 9 月和 1949 年 3 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先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后,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

抵达北平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时,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正在进行,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过多种渠道,热情邀请和妥善安排在海内外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主持起草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就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作了说明。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此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十届中央副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周恩来一直在第一线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并领导组织实施工作。他主张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稳步地前进。1960年，他面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极大不平衡和困难，与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些主张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经济调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等富有建树的意见,为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拓了思路。

他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调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之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大量工作。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团结多数、广交朋友、坦诚相见、平等待人、民主协商、自我改造的原则,并且身体力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他极端关心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1956 年他首先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在实际工作中,他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热诚地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循循善诱,多方帮助,促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进步,引导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体育、卫生事业,而其中教育是基础,科

学技术是关键。在科技工作中，他主张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重视尖端科技的开发。他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和发射工作，为改变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在国际事务中，他参与制定了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亲自执行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在外事活动中，他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支持了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53 年底，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准则。1954 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努力。1955 年在亚非 29 国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坚持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并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爱国民主人士，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2 年发现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工作。1975 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申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善于团结群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口皆碑，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文集中。



第三章 刘 少 奇

刘少奇，原名绍选，字渭璜，曾化名子琪、之启、刘湘、胡服等，笔名有赵启、仲篪、刘祥、K·V·、陶尚行、莫文华、吕文等，刘少奇是1920年起用的名字。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寿生是个忠厚老实而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农民。其母刘鲁氏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刘少奇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913年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1916年夏考入长沙驻省宁乡中学。1917年3月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半年后，讲武堂被军阀解散，回家自修。1919年初插入长沙育才中学毕业班。五四运动后奔赴北京，积极参加爱国学生的请愿示威活动。9月进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半工半读，广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秋返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1921年夏初，刘少奇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先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调湖南领导粤汉铁

路工人运动。9月,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委派,去江西协同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刘少奇作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并与路矿当局谈判。经过一系列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罢工胜利后,刘少奇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刘少奇先后撰写《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和《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引导工人群众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1925年春,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前往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等决议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受全总的委派,去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负责指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其时适五卅惨案发生,刘少奇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与李立三等领导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帝运动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11月,刘少奇回长沙养病。12月,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地工会、团体多方营救,1926年2月获释出狱,被驱逐出湖南,经上海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刘少奇接替因病休养的林伟民,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与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刘少奇提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的思想,为促进广州、香港各工会的联合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组织工作。

1926年5月，刘少奇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阐明了职工运动的方针，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军阀运动中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应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联合。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后，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刘少奇随即抵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作准备，并担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直接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工人运动。同时，参加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以相当精力去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阐述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指出工会是工人"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必须坚持"民主集权制"，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实现工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1927年1月，刘少奇参与领导汉口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胜利。4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以正确的策略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3月，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名义到天津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并指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

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春,奉调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领导职工运动。6月,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被捕。他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坚不吐实,于9月中旬取保释放。他抓住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中东铁路工人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1930年3月调回上海,指导沪东工人运动。6月,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提出了许多指导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主张和策略思想。他在《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罢工策略的正确运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尽管当时曾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批评和压制,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工人运动。他阐述了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强调要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工会应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应参加与协助国有工厂的管理,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为苏维埃的胜利而努力生产。1934年7月,刘少奇任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继续领导职工运动。

1936年春,刘少奇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坚定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从思想理论上,为推动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作了不懈的努力。从4月起,他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和《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文章,在科学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和策略原则。他主张党在白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在策略指导上,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运动的退潮和来潮,以及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恰当地组织革命防御或进攻;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要正确把握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起来;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刘少奇用极大力量整顿和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教育共产党员和干部"学会领导群众的艺

术,学会策略的运用”。他在《火线》、《生活日报》、《长城》、《国防》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华北以至全国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11 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着重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战略任务与策略转变的关系、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与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的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争取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开创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1937 年 5 月,在出席苏区党代表会议之后,同张闻天主持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这次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革命新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成为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后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方面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作了评价,指出他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抵达山西太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人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华北党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部署。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号召城市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脱下长衫,到农村中去,拿起武器打游击。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求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集中一切力量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领导以薄

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推进阎锡山抗战的方针，利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公开合法组织，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新军）。9月，八路军总部一到太原，刘少奇即同总部主要领导人讨论确定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提出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0月，刘少奇撰写《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11月，又为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太原失守后，指导晋察冀边区着手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筹建工作。1938年3月中旬，刘少奇回到延安，继续负责指导华北工作。7月，在刘少奇的组织领导下，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发动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为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负责指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1月，抵达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确山竹沟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作出发展中原地区敌后抗战的工作部署。12月，率中原局机关进入华中敌后，抵达安徽定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多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

务和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决定执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并建议中共中央从华北派一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苏北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刘少奇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一起，指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主力，挫败了日伪军对皖东的“扫荡”，并在津浦路东半塔集地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韩德勤部的进攻，开辟和发展了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和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在苏北胜利会师后，于11月间组建了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临危受命，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重建新的军部，整编部队，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出新四军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敌伪军和反共军进行长期斗争，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他主持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着重检查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同年夏，刘少奇和陈毅等指挥新四军粉碎了日伪军对苏北、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回延安。在从苏北返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检查指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年底回到延安。从1943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参与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先后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和《论党》等许多重要论著,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他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做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他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与系统的论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他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是达到党内团结和统一的重要保证。他系统地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他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45年9月,他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锦州,对东北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刘少奇根据当时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提出当今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作长久打算。要求东北部队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

图,“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分散部署,以主要力量迅速在各战略要地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刘少奇坚持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对于扭转当时东北面临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6 年 5 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共产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还规定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各项指导原则。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泽东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等前往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7 月至 9 月,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为加强华北解放区的建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刘少奇于 1948 年 5 月主持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建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9 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讲话。1949 年 3 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决策及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强调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会后,随中共中

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赴天津视察，同工人、干部、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宣传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制定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建国前夕，他提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并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都应鼓励其发展。但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950年，他写了《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务；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首先要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

报告》。

刘少奇十分重视发展合作经济。1950年7月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指出当时主要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城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为引导合作社走上正轨提出了明确的方针。随后，又撰写《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论合作社问题(初稿)》等著作。

1951年2月，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基本口号，论述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而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提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以后，国营工厂内部已经不存在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那种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对的与非敌对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53年2月，刘少奇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同时，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新中国第一部根本大法作了完整系统的说明。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建设问题。

他在1951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强调要对共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必须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他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对党员的明确要求和教育内容。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在会上作《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间，刘少奇先后约请国务院所属30多个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对我国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刘少奇针对当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了许多的改革设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要利用价值规律，用价格指导生产；开放和利用自由

市场;要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允许个人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认为,在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按劳分配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分配工作搞得好,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分配,必须贯彻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他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是最敏感的,生产中的各种问题都会在流通中反映出来。因此,应当重视流通问题。强调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换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不但工农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需要等价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还提出改进工业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打破地区限制,按行业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公司,促使专业化协作发展,把国民经济组织起来,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以及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的观点。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刘少奇敢于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报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计划和措施,把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接着,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并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河南开封病逝。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肯定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刘少奇的主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中。



第四章　朱　德

朱德，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祖籍广东省韶州府(今韶关市)，明末清初迁入四川，定居仪陇马鞍场。

朱德幼年入私塾，取名“代珍”，塾师为他取字“玉阶”。因家境贫寒，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在塾师的影响和启蒙下，开始接受革新思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他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富国强兵”。1907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年末，毕业回到家乡，任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在这偏僻的地方，新式教育遭到当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这使他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1909年1月，朱德离开家乡，跋山涉水赴云南投考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字玉阶。在讲武堂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常秘密传阅和摘抄一些进步书刊。1911年8月毕业，加入云南新军，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10月，爆发了反对清皇朝的辛亥革命，云南新军积极响应，在农历九月九日举行起义。“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宣布独立。因作战有功，朱德升任排长，授少尉军衔。随后，朱德随援川军进入四川，四川的反动势力纷纷土崩瓦解。同年底升任连长。援川军返滇后，在庆功大会上，他被

晋升为少校。1913年夏天，任云南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秋天，调往云南边境驻守，在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扶持的武装土匪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作战，并从营长晋升为副团长、团长。1915年12月以后，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开始成为川滇军界人人皆知的名将。1917年，朱德任滇军旅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离开云南，来到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拜访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认为像他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要参加共产党，必须经"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拒绝了他的请求。朱德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同年11月，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在德国的3年时间里，朱德参加中共旅欧支部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1924年在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注册入学。同年底，为了从事革命活动，由哥廷根回到柏林。1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到苏联，下半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几个月后，参加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队长。这期间，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说："部队

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6年夏回国后，受中共中央军委的派遣到四川军阀杨森部进行兵运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在教育团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为党培训了一批军事干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不久，任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准备重新北伐。其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反动军队击败，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一部苦战三河坝三天三夜，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向粤赣湘边界转移。此刻，干部、战士思想异常混乱，一无粮草，二无援兵，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部队，离队的人数越来越多。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领导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他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指出：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能成功。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并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还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性。为了隐蔽活动，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化名“王楷”。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方向转变。同时发动农民斗争，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部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造成较大的革命声势。这时，国民党第十六军军

长范石生所部驻防湘南郴州、汝城一带，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学，交往很深，而范石生同蒋介石矛盾重重。朱德鉴于当时起义军物资和装备供应十分困难，决定同范石生合作，以保存革命火种，隐蔽待机。

1928 年 1 月，朱德率领部队在湘南的宜章县发动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旗帜，任师长。一个月内，暴动波及了十余个县。建立了湘南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和农军。4 月，率部前往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5 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井冈山斗争中，他和毛泽东把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形成了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1929 年初，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两地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 年 8 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司令。8 月 28 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9 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 1930 年 10 月至 1934 年 10 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五次军事“围剿”。朱德同毛泽东一起，率领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后同周恩来一起，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指挥部队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重要经验。朱德曾撰写《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对这次反

"围剿"战争进行了总结。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掌握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时,朱德虽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军队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由于李德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严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陷于被动,最后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

1934年1月,朱德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后,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共同北上抗日,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妄图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有理、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当张国焘攻击中央北上方针是"逃跑",并要朱德对此表态时,朱德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张国焘不顾朱德等人的反对,另立"中央",多次强迫朱德断绝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他团结广大干部战士,坚决维护中央的正确方针,为实现一、二、四方面军会师西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于9月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同周恩来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达成协议，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他亲自部署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取得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胜利。11月，太原失守，华北抗战进入了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同卫立煌多次长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十分钦佩，保持了友好关系。

1938年初，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性质、作用及战术原则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这是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名著。4月，和彭德怀指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使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朱德率领山西和河北广大军民予以坚决的反击，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稳定了华北局势。从此，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1940年5月，朱德由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朱德参加领导大生产运动，亲自到南泥湾勘察，提出“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

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发展生产。1943 年 5 月 1 日，朱德发表文章，号召建设“革命家务”。这一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1945 年 4 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规定了养兵、带兵、练兵、用兵以及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还规定了人民军队今后的任务，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的转变，以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6 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他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 年 3 月，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到达晋察冀后，介绍各个解放区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和打胜仗的经验，帮助晋察冀部队整编，克服缺点，提高战斗力，以适应战略进攻的需要。他亲临前线，指导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第一个攻克的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为打攻坚战开创了范例。这期间，他还对冀中地区的经济工作进行了考察，撰写了《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949 年 3 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随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4

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 年 10 月，他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亲自进行战前动员。在他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纪律检查工作，要以思想教育为主。1953 年 11 月，在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作《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同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因此我们仍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并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① 在以后的许多重要场合，他多次指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党的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发扬民主，反对压制民主的倾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他特别强调"党能否保持巩固的统一和团结，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

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5 页。

的中央军委,朱德任军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朱德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积极主张加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十分重视新的军种、兵种的建设。他把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搞好军事训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十分迫切的任务来抓。他反复强调,人民军队要坚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又不要受过去经验的束缚,要努力使军队的建设适合现代化、正规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他指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1]他还非常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和国防工业生产,非常重视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建设。当他在88岁高龄的时候,仍亲莅海军舰艇部队视察。他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又连任两届,直至去世。在长达17年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内,朱德主持了170多次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无数次听取、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他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经常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视察的足迹。

---

[1]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朱德参与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他指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要"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他积极主张把工业、商业、财政和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改变中央集权过多的状况，以利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建设速度，"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的丰富的资源。……在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1] 他曾多次提出：应把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的生产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主张军事工厂"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使它们现有的设备力量尽量利用起来"[2]。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朱德对发展手工业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朱德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经济。主张打破地区间的经济封锁，真正做到货畅其流。对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大办公共食堂，朱德是不

---

[1]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2] 同上书，第352页。

赞成的。他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过去我们说粮食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的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①] 他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发展生产力必须实实在在地实干,虚夸是有害无益的”;“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劲,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讲”。当时,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他的这些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错误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怀疑。1967 年 1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他还反对任意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后,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离,行动受到各种限制。康生等人将朱德等 29 人划入“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之列。造反派批判和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街头。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朱德始终坦然处之,并始终关心着生产建设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在危难之际,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要保他,才使朱德没有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1—372 页。

遭受到更残酷的人身迫害。1969 年 4 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 年 8 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毕生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处处顾全大局。对于个人受到的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他从不计较，继续勤恳工作。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朱德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来鞭策自己，勉励他人。1975 年初，在他 89 岁高龄时，亲笔写下了“革命到底”的条幅，表示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他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所有与朱德接触过的人，都为他那平凡、朴素的作风所深深感动。

朱德于 1976 年 7 月 6 日逝世，终年 90 岁。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



第五章　李　大　钊

李大钊，字守常，曾用名李钊、李龟年，笔名明明、常、孤松、猎夫等，在苏联期间化名琴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1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出生不久母亲亦去世，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祖父名叫李如珍，考取过秀才，得过“从九品”官衔，又曾在东北经营杂货铺，回乡后购得土地90余亩，房屋20余间，家境比较富裕。

李大钊3岁起学识字，7岁入私塾，15岁考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他11岁时，根据当地风俗，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在他读书期间独自操持家务，先后生育6个子女。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委人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课程及英、日语言。在校期间，他参加过罢课请求政府开设国会的运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该会刊物《言治》月刊编辑、编辑部长，并开始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加入陈翼龙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担任干事。

1913年5月，李大钊在法政学校学习6年期满毕业。7月到北京，通过办《言治》月刊时结识的孙洪伊介绍，接触了汤化龙。孙、汤都是政党要人、众议院议员。李得到汤的资助，于同年冬东

渡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著名报人章士钊的器重。章惊异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遂同李结为友好。李又通过章结识了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高一涵等。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学科。在该校一年四个月时间里,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以及经济、史学、法律等课程,并且接触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当时知名的社会学家安部矶雄,受到安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斗争组织——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主任,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政论文章。此外他还加入过从事反袁秘密活动的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及在留学生中成立的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并从事翻译出版外国学者著作事宜。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担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主编《晨钟报》,旋即辞职。接着又参加了《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创办、编辑工作。1918年1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图书馆主任。他在这里工作近5年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他曾组织图书馆讲习班,做过图书馆教育、管理、美国图书馆概况等方面的研究,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如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赈灾社、新知书社、太

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还代理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参加教职员停职索薪运动。此外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其中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发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此期间,他和年轻的毛泽东有较多接触,介绍毛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毛商议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以及当时活跃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

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立法、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讲演报告。1922年12月2日,李大钊正式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要成员之一。还在1916年9月,他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8年1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组织。在此前后,他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发

民主政治原理，抨击专制势力，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展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此时的李大钊在历史与文化问题上持现实的、进化的、调和的观点；在政治问题上，持非暴力、非强力的民主主义观。他曾写道："今日之政治，固与强力不相容也。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①

从 1918 年 7 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或讲演，提出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全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等观点。1918 年 12 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国内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运动，创办了批评时政、内容丰富，以短评精论为主要形式的《每周评论》。他在发表于该刊的《新纪元》一文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劳工、农村、妇女、青年问题。他的文章说："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

①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6、525 页。

题,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应该要求一种德谟克拉西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①。妇女参政运动也是本着"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起的,"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②。现在的文明,"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大多数都在农村",广大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安身立命",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③

191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依日本学者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在该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两期刊载,实际出版日期分别为1919年9月、11月)。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堺利彦的文章和译作为材料,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并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此外,他还撰写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阐述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价值的文章。④

---

① 《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2页。

② 《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5、640页。

③ 《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④ 有材料说李大钊还曾于191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5月8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①]。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点，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说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

---

① 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说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倾向发生分离的起点。

自1920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Мамаев)、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史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①]。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

① 有材料说,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17页。)

又有材料说,"1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共产主义小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页。)

据罗章龙回忆,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接触了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等。在他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维金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太雷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四大任命他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到1926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中共党员已经达到2069人。从1921年开始，中共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①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1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

---

① 李新《李大钊》一文说，李大钊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17页。

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6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同一期间，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建议以“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同意胡的主张，同胡一起联络蔡元培等共16人在该宣言上签名。由于“好政府”主张与其后不久中共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不相符合，李大钊又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部分会员联名向学会杭州大会提交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主张以“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为“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8月，李大钊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会晤孙中山，与孙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他和陈独秀等另外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10月，李大钊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和特派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北京国民党组织选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

间有人提出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言，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经孙中山允许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会最终否决了反对党员“跨党”的提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大钊受命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兼任该部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1924年4月20日成立，到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该部所辖北方10余省区的国民党员已达14万余人。1926年6月至11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为《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11月7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运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发表演讲，并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其后不久，在北京有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

进行了斗争。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和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冯玉祥因受排挤于1926年1月宣告下野,后到苏联考察。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绥远一带。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参与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1926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李大钊请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并数次电报催促,终于促使冯玉祥于当年9月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①

1926年3月发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通牒"。3月1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00余团体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了演说。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遭到府院卫队的残酷镇压②。第二天,执政府下令缉

---

① 有材料说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曾给阎锡山写信,策动阎支持并参加北伐。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0、281页。

② 有材料说,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见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33页。

又许毓峰《李大钊年谱》说,当请愿队伍向铁狮子胡同行进时,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府院卫队和军警镇压时,"大钊同志的脸和手虽负了伤,但他却从容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大钊同志最后从东口退出后,立即到中共地委会去,当晚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坚持斗争的问题。见该书第127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1985年印行。

捕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1927 年 4 月 6 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 300 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 60 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 月 28 日，李大钊等 20 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初期党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同时也是知名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温和、道德高尚、“好施济众”，曾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多次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多次出资帮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学生，而自己“身后异常萧条”。他被捕后，北京 20 多所大学联合发起过营救活动；逝世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1933 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平凡质朴的语言表述出一位伟人公忠坦荡的胸怀，令人敬佩。

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诗词、通讯杂文等共 500 多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战略与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篇长文分别于 1923 年 1 月和 1924 年 5 月作为《百科小丛书》第 15、51 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潮，发展了这种思想。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宝贵文献。李大钊自称“夙研史学”，发表了许多关于

史学的演讲和文章。《史学要论》是他关于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它被公认为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遗文被编成《守常文集》(未发行)。195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上、下册，共 39 万余字。198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110 万字，1989 年 10 月又出版《李大钊文集》(续集)一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六章　瞿　秋　白

瞿秋白，原名双、霜，族谱中排名懋淼，原号雄魄、铁柏、铁梅、涤梅等，后改名爽，改号秋白（亦说秋白为字）。五四前后发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有一百多个，如巨缘、维它、史维它、屈维它、史铁儿、易嘉、何凝等。1899 年 1 月 29 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酉同曾任江西候补知县。父亲瞿世玮长期无业，擅长山水画，通医道。母亲金璇，通晓史书，长于诗词。

秋白很小即开始学画和背诵唐诗名句，5 岁入塾馆，6 岁入小学堂，10 岁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2 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决然剪掉辫子，表示对推倒清皇朝的拥护。

秋白上学后，家境日趋衰败。1911 年因担负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从 1914 年起，开始靠借债和典当家产维持生活。1915 年夏，秋白终因学费拮据而辍学。母亲经受不住家庭破产、爱子失学的痛苦折磨，于 1916 年初服毒自杀。秋白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这年，秋白在无锡乡下杨氏私立国民小学任职半年，随后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并考入武昌外国语

专科学校学习。次年春又随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主修俄语，同时自学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和哲学。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已试着翻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秋白开始注意阅读有关方面的新书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运动爆发，秋白的思想仍是庞杂而混沌的，今文经学、佛学及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他都有影响。由于对现状极度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闷彷徨达到了极点，他自称这段时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秋白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带领俄文专修馆学生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作为俄专代表参加了北京学联，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3日，他在街头讲演时被捕，6月7日被放出。出狱不久，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此后就再也没有治好。1919年11月，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旬刊，进行改造社会的宣传。他是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1920年春，秋白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1920年10月，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未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以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为有机会实地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共产党和俄国文化而高兴，希望借此"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经过3个月的艰苦跋涉，秋白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此后在苏俄的两年间，秋白撰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中国人民报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写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有名的散文集，叙述他在苏俄的观感，介绍苏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1921年3月，他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十次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9月，除担任记者外，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该校俄国教官的翻译，由此他多次会见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他还忍着疾病的折磨，顽强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1922年1月，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后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离京赴沪，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参加中共另两个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的编辑工作。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中文译词，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边弹唱，一边翻译，苦心斟酌，始将《国际歌》成功地译了出来。同期《新青年》季刊还发表有秋白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随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

秋白在上述三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作，介绍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宣传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以及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他还在文章中批驳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逐步成为中共早期最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至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达100多万字。

1923年6月，秋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中共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三大后，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出席了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译)。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学任教，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11月，他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胡适的实用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1925年，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了五卅爱国运动。6月4日，中共中央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秋白担任主编。他在报上先后发表数十篇社论和短文，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指导革命运动的进行。其中《谁是敌谁是友?》一文，尖锐地提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问题，要人们抛弃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团结一致，坚持斗

争。《热血日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出完 24 期后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后，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五卅运动前后，秋白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的斗争。他所写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对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观点，给以狠狠一击。

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 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1927 年春北伐革命达到高潮，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 月，毛泽东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发。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 4 月 11 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中共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

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发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点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

中共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中共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共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彻底清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秋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八七会议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纠正右的机会主义，而没有注意

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倾向很快发展起来。

八七会议后，以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错误也在发展。1927年11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错误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理论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1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发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1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中共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6、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中共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发言。中共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发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小组。1929年10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1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1930年6月，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1930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中共三

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1930 年 10 月末，共产国际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共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12 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 1931 年 1 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

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发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1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发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

“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1933 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发动了新的攻击。9 月 22 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1934 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1934 年 1 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 2 月 5 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点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倡导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并亲自指导戏校所属的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工作。1934 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秋白把剧团一分为三，由他直接领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

创作和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装待命，准备随军出征。但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主力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项英、陈毅决定疏散负责干部，送秋白回上海养病。

1935 年 2 月 11 日，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化装成商人，离开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区转移。2 月 26 日，秋白等渡过汀江，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时，被地主武装包围。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秋白与张亮(项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体力不支，在敌人搜山时被俘获。①

3 月 9 日和 4 月 15 日，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脱身，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原来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帮红军做事。他还写信给鲁迅："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鲁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与杨之华等多方筹资，设法营救，但正在此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认，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这时他已被解到长汀。

秋白被敌人认出后，抱定必死的决心。5 月 13 日他在长汀狱中，写下一份"供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同时谴责国民党在苏区的暴

① 关于秋白被捕日期，有 2 月 24 日和 2 月 26 日两说，这里从后说。

行，驳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和诽谤。

在长汀狱中，秋白写了一篇总结一生历史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内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七个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点，歌颂革命，在《告别》部分中表示了准备就义的决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倾中央的无理打击，精神一直很痛苦，现在面临死亡，想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让敌人得知中共内部的斗争，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消极情绪。

敌人对秋白软硬兼施，用尽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在决定枪杀秋白的前几天，还专门派中统特务和中共叛徒前往长汀劝降，并以顾顺章为例加以诱惑，但秋白不为所动，庄严宣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表示"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劝降、诱降失败，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杀害瞿秋白。6月18日，秋白赴刑场，一路上神态坦然，用俄语吟诵《国际歌》，在"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声中，饮弹洒血，从容就义。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秋白著作极丰，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6卷、政治理论编8卷。

第七章 李 立 三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农志等，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乳名凤生。父亲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何氏略识文字，经常给李立三讲《水浒》、《三国演义》、《精忠传》和武侠故事。1905年，入蒙童馆读书。在这里，他从比他年长9岁的同学孙小山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1908至1914年，李立三先后在渌江小学和渌江中学读书。在渌江中学，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统治表示极大的不满。1915年，李立三来到长沙，先在长郡中学读书，后转入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璈阶(章龙)介绍，他结识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

1918年春夏间，李立三中学毕业，回乡当小学教员。不久，他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决心投笔从戎，到衡山加入程潜的护国军。临行前，留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1919年初，李立三听从程潜的劝告到北京求学。不久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同年12月抵达法国，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到三侠孟一家工厂做工。在这期间，

李立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法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以前，他曾相信工读主义，以为通过勤工俭学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进而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如今，他认定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知识阶级的猛省和劳动阶级的觉悟，而勤工俭学就是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从 1920 年底起，李立三同赵世炎等人开始酝酿筹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同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同年 8 月，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发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率先进驻由吴稚晖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学，后被法国警方扣押。10 月 14 日，李立三同其他 103 名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同年 1 2 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被派往湘赣边界的安源路矿开展工作。

在安源，李立三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一面教工人们识字，一面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间扎下了根。1922 年春，安源路矿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中共支部，李立三任中共支部书记。5 月 1 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当选为俱乐部主任。俱乐部的成立，在矿内产生很大影响，到这年 8、9 月间，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已有 700 多人。俱乐部的扩大，引起安源路矿当局的恐惧。8 月，李立三到长沙汇报工作。路矿当局乘机图谋封闭俱乐部，激起工人的愤慨。9 月，毛泽东来到安源，认为举行

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派刘少奇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对斗志昂扬的工人,斩钉截铁地表示"誓死不离安源"。9月12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同刘少奇商定,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作为罢工口号。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在同路矿当局的谈判中,李立三据理力争,迫使路矿当局在18日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结束。它成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起点。

1923年3月,李立三被调往在二七惨案中损失最严重的武汉,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并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闭幕后,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激烈的地方。当时,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也在上海,他们配合默契,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他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合法身份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办起职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扎下了根。

1925年5月15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中央还决定在6月1日成立

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负责。会后，李立三根据中央决定，在二马路秘密设立总指挥部，统一负责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30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外国巡捕悍然下令开枪，造成死16人、重伤10余人的惨案。消息传开，上海为之震惊，全国为之愤怒。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李立三出席了会议。接着，他又在宝山路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三罢斗争。6月2日，上海实现罢工、罢市、罢课。4日，李立三又以总工会名义召开各界团体联合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三罢斗争。6日，李立三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工商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并被推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由于李立三在五卅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10月，李立三受中共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会后，他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6年春，李立三到广州参加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随后，他应毛泽东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课程。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实际代行全国总工会职权。在武汉期间，李立三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万县惨案后，全国反英情绪高涨。1926年12月26日，汉口举行2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大会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7年1月3日，汉口再次召开10万人反英反奉示威大

会,李立三继续任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英租界时,英国水兵突然上岸镇压,造成一三惨案。1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挥下,汉口又召开30万人反英群众大会,并在游行中一举占领英租界,迫使英国当局承认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的反帝斗争再次推向高潮。

在1927年4、5月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随后,他写成《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出版,着重阐明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国工运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7月12日改组,将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李立三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前往九江了解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动向。在认真调查之后,李立三同邓中夏、瞿秋白等建议临时中央立即举行南昌起义。他还作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5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并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会后,回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使水平较低的向忠发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而使李立三逐渐起到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后,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根据

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领导同托派的理论斗争。斗争焦点集中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他撰写《中国革命与取消派》一书，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统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驳托派的取消主义主张。他还指导“左联”工作，领导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1929 年 9 月，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肯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还参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讨论。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中共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显著改善，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城市工人支部 1929 年发展到 229 个，工农红军发展到近 10 万人。

1930 年 6 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和自身力量，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他后来检讨说，这个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同年 7 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还调动红军攻打长沙、武汉。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亲自兼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结果全市 15 个支部全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 100 余人。同时，各地暴动也相继失利。苏区红军在一克长沙之后，又传来二攻长沙失利的消息。党内要求停止冒险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8 月间，共产国际发出停止武汉、南

京暴动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李立三也在会上承担了主要责任。会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同年12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从此开始旅居苏联15年的生涯。

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李立三、瞿秋白等开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中共八大上发言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尽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俄文，并努力为党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他积极参与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还参与主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刊物《救国时报》，负责起草过大量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并发表《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阐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联肃反期间，李立三于1938年2月被捕，蒙冤度过1年零9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党籍。他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依斯基的帮助下，回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当校对员，一直工作到1945年底。这期间，他翻译了俄国文学作品《考验》和

《俄罗斯人物》。

1945 年 4 至 6 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缺席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1946 年 1 月,李立三回到祖国。在哈尔滨,他通过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了解到延安整风情况和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七大的精神,认真反省自己的主观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的错误。同年 4 月,化名李敏然,参加东北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顾问和中共首席代表。6 月,他到延安汇报东北工作,会见毛泽东,认真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苏联的工作和学习情况。1946 年秋,他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长。1947 年春,改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在辽沈战役中起义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负责东北局俄文编译小组的工作,主持《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献的翻译,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起到重要作用。1948 年,李立三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会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1949 年 2 至 3 月,李立三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检讨"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会后,他随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49 年 9 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还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建国初期,李立三主要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

先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条例。他在领导工会工作中，注意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一面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等办法逐步解决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面提倡企业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1952 年 2 月，李立三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

这时，党内围绕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意见分歧。1951 年 12 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提出批评，在会议的结论和决议中错误地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领导岗位。1981 年 3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重新作出结论，决定撤销上述结论和决议，给李立三恢复名誉。

1955 年春，李立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工业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统一工资制度的工作，还参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工作。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前夕，他经过长时间认真思考，写了一份长篇发言稿，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总清算”。毛泽东阅后，特地在发言稿上批了一个“好”字。1958 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共中央工业部长。他先后到黑龙江的部分工厂调查，又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

工业的思想，报告中共中央。随后，又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60年，毛泽东把这一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广到全国。1960年后，中共中央工业部撤销，李立三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扩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难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主动请求免去部长级的物质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乡的房子过于破旧，他知道后立即写信制止了修缮工程。1964年，他主动申请到河北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受到冲击，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监禁。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说假话牵连他人。一些专案人员向他了解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详细回顾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直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对刘少奇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次点名批判李立三，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1967年6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各地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连续召开14次大型批斗会，使李立三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6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还没有写完，就被造反派拉去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同夫人李莎见了最后一面。1967年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辞世，终年68岁。

1980年，中共中央重新审查李立三的历史，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并于同年3月20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王震代表中

共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1957年3月致毛泽东的信中曾经表示:“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23年之后，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八章　张　闻　天

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刘梦云等，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30日诞生在江苏省南江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一个农民家庭。6岁开始读书，聪颖好学。1916年到南京，在水利局开设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18年为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同家庭发生冲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南京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题为《社会问题》的长文，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中国社会问题。全文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新诗《梦》。不久，张闻天加入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到上海在分会成员恽代英、杨贤江等主办的《少年世界》任校勘。还在华法教育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张闻天在《觉悟》、《学灯》、《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通信、散文、杂感、诗作，对劳工、农村、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1920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1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1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

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发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1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发生极大变化。1925年6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

1925年10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1931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点，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

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中共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1933年秋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

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毛泽东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毛泽东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毛泽东对他们说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 1 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毛泽东的发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6 月 25 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 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毛泽东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 月 12 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发言,赞成毛泽东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毛泽东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中共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1日，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1937年1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1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共产党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11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阐明中共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1938年9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

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反共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反共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1941 年 9 至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1942 年初到 1943 年 3 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

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1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1945年4至6月,在中共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1946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1947年土地改革高潮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1946年11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1948年6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1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1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1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毛泽东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建议。1956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1957年11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在1956年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以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毛泽东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1962年4至6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刘少奇，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刘少奇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说明61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张闻天萌发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点的念头。从同年10月1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1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点，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1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1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6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

1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



第九章　宋　庆　龄

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6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1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1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191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191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191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15 年 10 月 25 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 1916 年至 1919 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1921 年 5 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 6 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1922 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1924 年 11 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

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1925 年 11 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1926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说，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12 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

的行径无比愤恨。4 月 22 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 7 月 14 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 1927 年 8 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1929 年 5 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1927 年 12 月、1929 年 8 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 年 7 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 12 月 19 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 1 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 300 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

1932 年 12 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1934 年,她与何香凝等 1779 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

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11月，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1938年6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

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 6 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12 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 年 8 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 年 6 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 7 月 23 日，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1949 年 7 月 1 日，宋庆龄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同年 9 月，宋庆龄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 1959 年 4 月和 1965 年 1 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 年 1 月和 1978 年 2 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1 年 5 月 16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 年 11 月，她随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1950 年 10 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 7 个城市、11 个工厂、4 个村庄、1 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1952 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

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1955 年 1 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1979 年 10 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 30 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发行到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1950 年 11 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1 年 9 月，她获得 1950 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952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发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2 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 1953 年、1957 年和 1978 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1951年11月26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支持儿童事业。1951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发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共产党宣言》学习小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6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发表许多文章、演说，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第十章　陈　独　秀

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另有三爱、只眼、顽石、雪衣等三十几个笔名、化名。1879年（清光绪五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又称怀宁）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资聪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读，18岁考中秀才。转年到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这时，他已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崇信维新思潮，与安徽维新派人士交往。他对康梁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亦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陈独秀也被追捕，逃到东北嗣父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我东北烧、杀、淫、掠之暴行，犹如见到母亲遭凌辱，受此刺激，开始思考个人、国家与世界问题。1901年赴日留学，曾参加励志社及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与激进分子交往，阅读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书刊，迅速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一次，鉴于清政府委派的学监姚煜阻碍中国留学生的正当要求，陈约同张继、邹容等人闯入姚宅，张抱姚腰，邹捧头，陈挥剪，割发代首，使其威信扫地。陈等3人即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1903年，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新

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独秀即回安庆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号召人人“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5月17日，他们在藏书楼召开演说会，宣传群众。演说毕，决定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先谋南方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此活动震动当局，陈被通缉，连夜逃亡上海，与章士钊等合作创办《国民日日报》。年底，该报停刊，又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他在该报发表50多篇文章，以白话文议古论今，宣传爱国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主。

1904年秋，陈独秀应邀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试验炸药，研究暗杀。翌年，还参与吴樾谋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划。这时，他为急于组织革命行动，停办了《安徽俗话报》，只身遍访江淮义士，在芜湖发起成立了“岳王会”，任会长。后来在安庆、南京还设立了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安徽巡抚恩铭闻知陈的活动后大怒，欲穷治之。陈再次亡命扶桑。接着传来国内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战友牺牲的消息，他一度陷于深深的苦闷、彷徨和孤愤之中，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下这无限的惆怅。1911年，新的革命高潮终于到来。这年10月，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推动当地党人响应，并写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使官吏闻之悚然。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安徽的斗争，并在胜利后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秘书、顾问等职。

在任秘书长期间，陈独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铲除旧官

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图以猛药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败。二次革命起,他协助都督柏文蔚制订反袁大计,起草安徽独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败,他被通缉,再次亡命上海,其安庆的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也逃到沪上,投靠父亲。这时的陈独秀由于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生活也几近"静待饿死"的境地。

1914 年 7 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编辑反袁杂志《甲寅》。11 月,他在该刊第一次用"陈独秀"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中国,民无建设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因此,他认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国家的心情,阐述了建设近世国家关键在于提高国民"自觉心"的观点。但是,由于该文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误解。他们纷纷投书《甲寅》诘问,"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屑回答读者的责问,但是他却从中悟出几年来革命屡起屡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于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后,中国的出路,首先要进行一场文化思想革命。从何入手,应该从办一份鼓吹新思想的杂志入手。而这个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国家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十分自信地对人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

年起，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发刊词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传统儒家伦理宣战，以图从改变国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争取个人自由权利为中心，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由此陈独秀名声大作，1917年1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帮助他对这个封建文化堡垒进行改革和整顿。陈独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为阵地，先后联络有文学改良思想的胡适，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以"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称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以及鲁迅等人，组成一个以他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他们在批判儒家纲常学说、进行伦理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学革命和教育革命。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倡议的基础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加激进的反封建的文学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别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批判摧残青年身心健康、只顾个人升官发财而与社会脱离的旧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独立自主、顺性率真)

的教育方针。

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五四时,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帮助和影响而出现的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传统、谋社会改造的刊物达数百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

但是,陈独秀指导这个运动的哲学思想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和形而上学,认为中国衰落是自己不长进,与帝国主义无关,因此他们不提反帝口号。运动初起也不干涉现实政治,企图把运动局限在文化领域里。然而,政治却要来干涉它。首先是受到冲击的保守势力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勾结反动政府,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横加压迫。陈迎接挑战,坚决反击,并表示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时,围绕着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维护中国权利的斗争尖锐起来。于是,陈独秀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启蒙走向救亡。

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了直接干预政治的《每周评论》,并把收回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问题,作为报道和评论的重点。他写的发刊词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外求独立,内反军阀独裁的主张。大战结束时,他曾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到来了。但是,1919年4月,当闻知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操纵下决定把原德国在我国山东掠夺的权利交给日本、北京政府也准备接受时,陈独秀无比愤慨,怒质“公理何在”,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5月4日，一个以收回山东权利、惩办三个卖国贼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很快席卷全国。反动政府严厉镇压，爱国学生前仆后继。6月9日，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进的口号，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

11日，陈独秀带着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门闹市区散发，被暗探逮捕。这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团体和名流纷纷奔走营救。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撰文，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9月16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当时，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掀起，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主义的热情正在消退，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声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进。陈独秀过去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传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现在认识到没有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因此首先要求阶级的解放。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如今他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他还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明确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陈独秀已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出狱后，行动仍受监视。翌年，他化装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摆脱监视，移居上海。两人分手时，相约分别在南北筹备革命党。陈到沪后，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

况,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劳动界》和店员刊物《伙友》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由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等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注意,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一行人,于 1920 年 4 月奉派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联系座谈后,提出帮助中国建立革命政党问题。李介绍他们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络。他们到上海后,陈独秀即召集周围热心宣传社会主义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座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酝酿成立政党,并确定名称叫“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设临时中央局,推陈为书记,并约请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于是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东、巴黎、东京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成立。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通过论战,争取了许多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

当时在广州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坚聘陈独秀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扩大到广东,并推行他多年来教育改革的主张,1920 年 12 月前往应聘。他上任后,利用职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广东教育,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发展各种专业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并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与占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重建了广东共产党。所有这些,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陈独秀顿萌退志。正在此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也连连催促他迅速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一行早在1921年春来华，他们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下旬帮助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忙于教改，没有出席。但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和筹建党的工作中的作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他于9月回沪。

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满怀激情地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工作重点是发动工人运动。中央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设立分部，具体领导工运：创办工人刊物，在工人区开办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等。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工运。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他从1921年11月到翌年5月，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指明工运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解释工人阶级对各党派应取的不同态度及对招牌工会的斗争策略，克服工人群众中的帮派观念等，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熟起来，很快掀起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但是，由于当时陈独秀和党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也不把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在眼里，而广大农民又尚未发动，因此工人阶级在城市里实际上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1923年二七惨案开始，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工人后，工运很快转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锚后，面临着一个选择正确航道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等被压迫民族国家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希望两党合作，推进中国革命。中共接

受列宁的思想,在7月举行的“二大”上,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宣言”,明确了中国革命应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进行的认识;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和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方针。陈独秀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马林在考察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南方并与孙中山交谈后认为,共产党的力量还太小,只有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才能迅速走出狭窄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进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孙中山也不答应党外联合的方针,只希望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新鲜血液来挽救正在“死亡”的国民党。为此,马林向国际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作为决定派马林到中国执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各区委,起先几乎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两党的宗旨、性质、基础、政策“太不相容”,“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月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马林拿出共产国际训令后,陈独秀等表示服从,但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党办法,并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陈独秀首先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

然后,陈独秀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方针,撰写一系列文章,阐述国共合作的意义,并认真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长。翌年1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李大钊、林祖涵、谭平山、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参加,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国共合

作终于实现。

但从此陈独秀又走向另一极端——右倾并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马林抬高资产阶级国民党、贬低无产阶级共产党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视民主革命为资产阶级为主导为基础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有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现在既然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我们共产党就来当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帮助国民党把当前的国民革命搞好，但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准备下一个革命上。这种思想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在中共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现。瞿秋白和邓中夏等少数人曾发表文章，批判这种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也派维经斯基及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回国，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精神，并写进了 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决议。陈独秀也表示接受这个精神，并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但是，一是由于他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到他们在中国的代表，都对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活动采取退让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在大革命中始终没有解决好。

尽管如此，当时的形势是革命正走向高潮，特别是中共四大通过了工、农、青、妇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决议，为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序幕，从 2 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最高的指挥者是陈独秀，各个重要事项，如应否发动，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

运干部与他共同开会决定。同时,他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在日、英帝国主义先后制造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血案后,终于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从运动开始到9月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11篇文章指导运动: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亲自做总商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运动的意见,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还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反共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反共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因还要依靠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取代北洋军阀,不公开反苏反共,但也宣扬"共信不立",竭力打击和限制中共的力量。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向共产党发起严重挑衅,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原打算组织力量反击,但又从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观念出发,提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对老右派坚决反击,促使国民党将他们开除;但对新右派,则要利用他们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积极性",采取退让的政策,满足

他们的要求。于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陈独秀在他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被否定后，更加消极，自觉地以“在野党”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政策。

1926年7月，苏联急切盼望和大力支持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但是，陈独秀主持党中央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他从以往孙中山及西南军阀多次北伐的历史经验出发，断言这次北伐也是“军人政客争权夺利的军事投机”，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更主要的是陈独秀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农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把它与正规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因此他以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指示，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黄埔军校、北伐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机关。于是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都落到了蒋介石集团手中，使整个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北伐战争的发展大出陈独秀所料，一路凯旋，9月即饮马长江，攻克汉口，10月攻占武昌，随后挥师东南。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调主力应付，上海一时防务空虚，共产党在10月和翌年2月，两次发动武装暴动，结果因没有经验和资产阶级动摇等原因，没有成功。接着，陈独秀亲自出马，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于3月2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发动第三次暴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取得胜利。

从北伐军打下南昌开始，蒋介石即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为中心的大资产阶级勾结，准备叛变革命。他制造一系列惨案，摧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一路杀到上海。陈独秀估计到蒋介

石也要向上海的共产党特别是工人纠察队开刀,一面请示国际,一面准备武装反抗。但是,国际来电,不准军事反蒋,可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中山舰事件时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现在被共产国际弄回国抑制蒋介石的汪精卫,这时到达上海,右派和共产党都来争取他。当时,右派为了制造反共借口,散布了许多谣言,说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并指使工人冲击租界。陈独秀为了粉碎这种谣言,于4月5日与汪发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宣称共产党不想打倒国民党,而国民党也"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可以缓和上海的局势,即溯江而上,把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不料在12日,蒋就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也在政变后被派到上海工作时,被捕牺牲。

上海政变后,广州、四川等地国民党也先后转向反革命,武汉地区陷入反革命四面包围的困境。陈独秀一面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毛泽东等农运干部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国民党则要求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强大压力;一面又受了共产国际的严令,不准退出国民党,不准破裂联合战线,找不到出路,终日惶惶不安。这时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易,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以巩固武汉革命根据地。鲍罗廷则认为东南地区反革命势力太强,革命应向西北发展。陈独秀赞同鲍的意见,主张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后再说。在这种情况下,4月底召开的中共五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共产国际原想撤换陈独秀,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仍选他当总书记。到7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改组党中央,成立没有陈独秀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15日,汪精卫集团

实行“分共”，大革命终于失败。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企图挽救革命的失败，并在新派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召开了八七会议，不指名批判了违背国际路线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9月，陈独秀和党中央先后迁到上海，过起漫长的地下斗争生活。陈独秀几次写信给中央，认为革命在往下落，应该全面退却，不应有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遭到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的中央的批驳。有的中央委员还把陈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在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二儿子陈乔年的劝说下，陈独秀不再写信，而埋头于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的研究。不久，乔年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捕牺牲。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多次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参加中共六大，他拒绝，声言“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来领导”。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从1923年起就以苏共党内反对派领袖身份进行活动的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实权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攻击其在中国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应对失败负责；并认为当前中国没有革命形势，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共产党应在城市中开展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运动，以过渡到将来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和中共六大规定的当前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受到影响，也进行反斯大林活动。他们被遣送回国后，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翌年春天，陈独秀等一批下台的党内中上层干部，在阅读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批判斯大林的文件后，自认为茅塞顿开：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共产国际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于是，他们

也结合起来,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8月5日,陈独秀给中央一封长信,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中央路线。同时,他还反对中央在当时“中东路事件”中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建议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这个意见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把所有这些都视为“反党、反苏、反共产国际”的行为。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托陈派曾要求加入留学生托派组织,但对方怕失去正统地位而拒绝。于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12月开了一次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出机关报《无产者》。与此同时,又出现两个留学生托派组织,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调解和催促下,1931年5月初,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沿用托陈派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陈独秀被推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准备为国民会议而开展广泛斗争的时候,九一八事件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高潮。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以个人或托派组织名义,发表大量文章、宣言和决议,声讨日本侵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支持并指导学生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并在1932年2月10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义起草发表了《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与中共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的策略。结果遭到刚刚上台的王明左倾集团的拒绝。托派内部坚决反对“投降”中共,他们空谈“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使用“抗日救国”和“爱国运动”的口号。

10月15日，托派中央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等全体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陈独秀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批驳检察官强加给他的"借抗日反国民党"就是"叛国"的罪名。1933年6月，他被判八年徒刑。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8月23日，陈获释。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他一改托派的传统立场，接连发表演讲和文章，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拒绝东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汉，继又入川。这时，上海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时委员会执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指导的路线：继续贯彻阶级斗争的方针，反对国民党领导抗日，特别攻击共产党让步的国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阶级；主张利用战争造成的形势，发动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决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则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可能爆发革命，并且以当时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清除异己大量残杀无辜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为粉碎"慕尼黑阴谋"与德、日分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例，攻击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与纳粹一样的独裁制。为此，他宣布"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否定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自诩为"终身反对派"。双方通过书信、文章进行了一场论战。

陈独秀出狱后，仍受国民党政府的监视，他的反苏言论有碍当时政府的"联苏制日"政策，不准他发表。陈独秀出狱时，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曾积极响应，但双方正在联络之际，中共驻莫斯科的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国，诬陷陈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日寇汉奸"。从此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国民

党曾要提供资金拉拢陈独秀成立“新共党”,反对延安,但他予以拒绝。

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寂寞而逝。

第十一章　王　明

王明，原名陈绍熇，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有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克劳白夫等。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其父陈嘉渭早年自做酱醋出售，后与人合资开办行店，经营竹木。其母喻淑连曾任女子学校校长。

王明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天资聪敏，能文能诗。1920年秋，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曾发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被推为事务部主任，并担任安徽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曾参加武汉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后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由许凌青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很快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王明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3月，作为译员，随米夫率领的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活动，并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后经米夫推荐,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兼做党刊编辑。8月,随米夫再到苏联,在中山大学任联共党史课教员和翻译。不久,担任该校联共(布)支部局宣传干事。王明依靠米夫的支持,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务派"和反托派斗争进行宗派活动。他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制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等事件,打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之后,他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28年,王明根据米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安排,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编译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它强调城市暴动是武装起义的中心,提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一篇代表作。

1929年春,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先后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的《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被捕,出狱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在这期间,他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阐述。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中国革命在新高涨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他主张加紧"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首先在主要数省或一省夺取政权。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王明对李立三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压制,

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等一切工作。9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王明曾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但当他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共产国际 10 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的内容后，却一反前态，乘机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11 月 13 日，王明等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 月 17 日，王明等再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中共中央于 11 月 16 日收到共产国际的 10 月来信，并在党内公布了信的内容。王明便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这时，王明抛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经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12 月 10 日左右，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王明加紧进行宗派活动。12 月 25 日，王明被任命为中共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1931 年 1 月 7 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并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

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1931年11月,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2年8、9月间,共产国际召开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王明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在1933年11、1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王明参与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并对国内中共临时中央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在这次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于10月1日正式以中国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 月 7 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长篇发言,后整理成小册子,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巴黎和国内出版。它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强调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11 月,王明写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于 1936 年 1 月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出版。这个小册子阐述了"联蒋抗日"的思想,强调了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应该实行转变。1936 年 7 月以后,王明先后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又名《新中国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

《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部队,看成是日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了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这期间,王明还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等接触,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并于1936年1月23日致函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到苏区直接与中共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潘汉年、王炳南等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批评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

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是抗战的领导者，主张“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强调正规战，贬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主要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日求得速胜。由于王明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8日，王明抵武汉，参与同蒋介石的谈判。不久，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暂以王明为书记。王明还兼任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合作抗日、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内各界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发展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指导新四军及华中抗战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在《挽救时局的关键》、《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和演讲中，宣扬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王明等致电中共中央，指责这“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2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指望通过外援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进一步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又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表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继续坚持并发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不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致使共产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从1938年6月起,王明担任中共委派的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在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上,他与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案》,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从这时起到1944年,王明是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8年9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并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他仍坚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要与国民党"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会后,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从1939年起,王明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7月,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1940年春,先后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在妇女工作、促进宪政运动、文化统一战线等

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王明改变了以前一些错误观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特点，以及国共合作、反磨擦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但仍认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1941 年 9、10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等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拒不承认错误，对毛泽东等的批评逐条进行反驳和辩解。之后，王明借口有病，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1943 年 9 月上旬至 12 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左”的和右的错误。中共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王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同年 12 月，王明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讨自己的错误。1944 年 5 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始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把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并先后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同他谈话。1945 年 4 月 20 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当天，王明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随后他以生病为由不出席中共七大会议，也不向会议检查自己的问题。经毛泽东做工作，中共七大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

从 1946 年起，中共中央根据王明的要求，安排他从事法律

研究工作。6月，王明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兼任宪法组组长，参与起草全国宪法草案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1947年冬，在晋绥解放区临县后甘泉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2月，出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并发言。1948年春，王明随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移驻河北建屏(今平山)西柏坡。12月，该委员会改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协助中共中央研究与处理全国有关立法和司法问题的工作机关。1949年初，王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国民党司法人员之处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等指示，并负责组织编写训练司法干部的教学提纲。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王明表示“拥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会议决定，王明应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王明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3月下旬，王明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6月，任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并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会理事，参与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刑法大纲、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等法律的起草工作，还主持召开监狱法律问题座谈会，指出以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造自新作为“监狱工作的方向”。

1950 年 7 月，他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法律本质、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刑民法政策等问题作了阐述。

王明对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写一份检查自己错误的声明书的决定，拖延不执行。因此 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指出王明的这种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重申王明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他过去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但拖至 9 月上旬，王明提出要到苏联治病。10 月，他动身去苏联。1953 年 12 月，从苏联回到北京，继续治疗休息。1956 年 1 月，再次去苏联治病。8 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明以“身体病况仍不许可”为借口，拒绝参加大会。经中共中央反复做工作，中共八大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明在苏联期间，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发表文章，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诬蔑与攻击党和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并为他过去所犯的错误狡辩。1974 年 3 月 27 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

1975 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五十年》一书，这是王明在 1971 年至 1974 年间所写的几篇文章拼凑编成的。1979 年，苏联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

第十二章　蒋　介　石

蒋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887 年 10 月 31 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父蒋肇聪，母王采玉。蒋 8 岁父亡。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堂，1906 年赴日本留学，1908 年入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率敢死队参加光复浙江之役，1913 年夏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10 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22 年陈炯明叛变，蒋接讯自上海赴广州，登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深获信任与器重。但由于蒋资历尚浅，因此迄至国民革命初期，未能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下面，我们分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台湾五个阶段来介绍蒋介石。

1924 年 5 月 3 日，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仿苏俄模式，着手建立国民党党军。蒋把此视为培植嫡系势力的良机，因之竭尽全力，从军服军帽设计、校舍卫生管理到教官的任命、教学内容的制定，都亲自参与决定，并与学生保持密切的接触。在培养军官的同时，蒋还在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募兵练兵，这样，到 1924 年冬季，黄埔建军已具雏形。由于这支军队经

过严格的选拔与训练，受过思想政治教育，又有“革命军连坐法”，因此战斗力很强。

1924 年 10 月，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师生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叛乱，1925 年 2 月，率师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打垮其主力部队 30000 余人。6 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1925 年 7 月，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 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0 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翌年二月，统一了广东全境。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开始进入党的权力中枢。

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蒋借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1926 年 3 月 18 日，共产党员、代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接到假命令，率中山舰赴黄埔候用，被人诬陷为企图绑架蒋介石。蒋乘机扩大事态，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和各军党代表，监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的内幕现在仍不能彻底澄清，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的冒险获得成功，打击了共产党，排挤了汪精卫，扩大了自己的权力。

1926 年 5 月 15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蒋介石则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不久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

1926 年 7 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区。

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扩大势力,着意夺取中央大权。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蒋介石则坚持迁都南昌。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个人专权的决议,撤销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则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夺权行动,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在统治区域"清党",残酷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分子。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集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南京国民政府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成立是仓促的。它一开始就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外临列强的观望怀疑,内遭桂系及被其拉拢的一部分黄埔系军人如何应钦等的反对,武汉方面以蒋下台为宁汉合流的必要条件,军事上克复徐州之役又以失败告终。在反对力量压迫之下,蒋遂于8月下野。但他仍关注时局,并尽最大可能施加影响,寻找再上台的良机。9月,蒋介石访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持,11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赞成其反共但反对北伐。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①,与美国的联系亦因之密切起来。

1928年1月,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应付时局,迎蒋还政之声高涨,蒋乘机复职,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会根本改变了

① 《上海时报》,1927年12月2日。

国民党一大以来的政策。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后不久，又任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了四个集团军，合力进行"二次北伐"，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6月3日，张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被阎锡山占领。北伐至此完成。北洋军阀长达16年的统治被推翻。

北伐完成伊始，蒋介石就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①]。1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训政纲领》。同月，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在蒋介石的积极争取下，张学良排除日本的干扰，在东北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②]，蒋介石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真正实现中央集权，蒋想方设法在军事上削除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的军队，并夺取其地盘；在政治上瓦解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的有组织的对抗。

1929年1月，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由于各派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无结果而终。蒋介石见和平手段达不到目的，就准备武力解决，冯、阎、桂系也积极备战。这样，1929到1930年间，蒋先后与桂、冯、阎或其联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混战，严重削弱了国力，予日本武力侵华以可乘之机。

---

①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革命文献》第22辑，第294页。

② 《申报》，1928年12月30日。

1930 年 5 月，形成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事集团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政治集团的反蒋大联合。5 月 11 日，蒋介石向冯阎军下达了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双方百万大军，主要围绕陇海、津浦两个主战场展开厮杀。蒋有中央的名义，有雄厚的财力，又善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对手，终于在赢得张学良东北军"拥护中央"后，打破了相持的局面，于 10 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反蒋派之间的一次军事政治大决战。双方参战兵力达 140 万人，死伤 30 万。蒋介石通过这场决战打垮了冯玉祥，重创了阎锡山，冯阎与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联盟也被迫解体。国民党各派系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此后，其他派系势力虽仍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但已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与实力。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为了巩固和强化这一有利形势，蒋急切地在政治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确立自己集权统治的法律依据；在军事上则加紧了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1931 年 2 月，蒋软禁反对制定约法的立法院长胡汉民，5 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专权确立了法律依据。

蒋对中央红军于 1930 年 12 月、1931 年 4 月和 1931 年 7 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都被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夺占沈阳城。蒋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至 11 月日军已占领辽宁、

吉林、黑龙江三省。蒋的政策招致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内反蒋派压蒋释放了胡汉民，并坚持以蒋下野为党与政府统一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暗中掌握实权。接任的孙科政府无力左右政局，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亦无办法，不得不于翌年1月25日辞职。蒋介石、汪精卫在此前秘密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协议，此时则联合复出。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汪为行政院长，主持行政外交。国民党政权进入蒋汪联合执政时期。

蒋汪上台伊始，即着手解决日军于1月28日发动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问题，5月5日，中日双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6月，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其国策，倾其全力围剿红军和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而日本则不断利用该政策的对外软弱性制造事端，侵占中国的领土。

在对内围剿红军方面，1932年6月至翌年3月，蒋介石调集60余万兵力，首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另辟川陕根据地。蒋介石随即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次围剿又被红军打破。1933年9月，蒋调集100万军队，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碉堡战术①，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统帅红军的左倾领导人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的应对战略，经一年鏖战仍不能胜，遂被迫长征。1935年10月，红军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

在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方面，1933年7至9月，蒋介石

---

① 《剿匪战术纲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军事与政治手段并用，摧垮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1月，蒋介石出兵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的“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1936年5月，陈济棠、李宗仁两广实力派发动“两广事变”。陈、李通电反蒋，并出兵湖南。但由于外患日甚，全国各阶层人士一致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有所克制，广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说国民党1927年后已开始反共，日本不应该再害怕中国赤化。日本如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就只能抵抗，而共产党就会乘势而起，日本也会因中国的长期抵抗而耗尽国力，最后的结果是中日两国政权同归于尽，因此中日双方应合作而非为敌。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当政者的重视，此后中日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日本始终未因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停止侵略的步伐。

1932年5月，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7月，中国地方当局与日方签订了《何梅协定》。贪得无厌的日本继而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这既使国民政府对北方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使英美在华北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更遭致中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

“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①。蒋介石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在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②。会后，蒋即以此谈话精神为中日谈判的指导原则，不再对日本一味让步。9至11月，支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的反击日伪军侵略的绥远抗战。

随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调整，蒋介石对共产党一方面加紧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进行接触、谈判，但始终未改变武力解决中共武装的立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代表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张、杨谈判。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人士的调停努力下，蒋介石口头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③，遂于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政策。

在1928至1936年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强，这与他这10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措施有关。在组织上他强化了军政统治的各级机构，并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

---

① 《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

②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

③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特务组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共产党、民主人士和反蒋派系。在文化思想上经常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并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在经济上他力图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全中国抗战的开始。17 日，蒋在庐山对各界人士发表重要讲话，正式阐明：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不能受到侵害，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不合法的变更，中央任命的宋哲元等冀察官员不能任意撤换，二十九军在所驻地不受任何约束。中国不能再对日本妥协，从现在起"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最后声明中国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日军进攻下，北平与天津于 29、30 日相继陷落。

8 月 12 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有各地方派系和共产党将领参加的国防最高会议，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①]的作战指导原则。并将全国战场划分为 5 个战区：一战区辖冀省全部及鲁北，二战区辖晋察绥三

---

①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 年 8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省，三战区辖浙江及苏南皖南，四战区为闽粤两省，五战区为鲁中南及苏北皖北。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翌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政府调集大量军队与日军作战。日军在正面进攻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派援军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11 月 9 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 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历时 3 个月之久。

在淞沪会战期间，蒋曾接受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试图通过打谈结合的办法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但日本被一时的得逞冲昏了头脑，在和谈中不断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和谈没有结果。蒋深感敌强我弱，战胜强敌必须依靠外援，始终努力使英美等列强介入，逼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动。但英、美不愿与日本马上发生冲突，并想借机发战争财。蒋的"联英美制日"的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奏效，他虽非常失望，但一直持之不变。

在对内方面，蒋采取了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针，为此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实际上由中共领导，以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释放一批政治犯。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被确定为国民党总裁，并自任新成立的三青团团长。总裁的权力在党和国家之上。蒋的独裁地位大大加强。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①。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政

①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6 页。

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1],有利于团结抗战。

在军事上,抗战开始直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中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亲自指挥了此一阶段的一些重要战役。在这个战略阶段,中国损失了大量军队,消耗了大量武器装备,丢失了大片国土,但阻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了。

1938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固统治,坚持抵抗,苦撑待变,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英美苏与日本关系的变化,实现联英美苏制日的目标。

在这一历史阶段,在稳固统治方面,蒋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强化个人集权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二是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1939年1月21至30日,国民党中央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两个报告,指出国民党有很多缺陷,再不加以整顿,就会“趋于消灭”,因此要唤醒党员的三民主义意识,发扬“四维八德”,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对于共产党,蒋提出“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2]。根据蒋的指示,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939年3月,蒋开始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3]。同时下令实行“新县制”,控制地方权力,城乡街镇都实行“保甲制”。1941年1

① 毛泽东等:《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六大以来》(上),第965页。

②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纪录》(193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央日报》1939年3月12日。

月，下令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1943 年 3 月，发表反映其主要思想和政策的《中国之命运》。蒋在书中再次宣传自己的“力行哲学”，强调，“‘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对于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蒋则进行了抨击，说二者“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是“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提出要开展“革命建国”活动，进行 5 项建设：心理建设，即信服“力行哲学”，“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主要是恢复以忠孝为主的中国固有伦理，以培养民众救国的道德；社会建设，一是强化保甲制度，二是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政治建设，主要是继续实行“训政”，加强集权统治；经济建设，主要内容为实现“工业化”，保障国民生活。蒋的《中国之命运》受到中共及民主党派的批判。

1943 年 8 月，林森去世，蒋再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马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五院院长需由主席提请选任，并对主席负责。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军事上不断发起的进攻，对于汪精卫集团的主和及随后的投敌卖国，则进行了斗争。1938 年 11 月，他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阶段的抗战进行了总结和检讨，并重新划分了战区。会后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从 1940 至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蒋介石直接或间接指挥下，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又与日军打了几次较大的战役。

在苦撑待变，联英美制日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达到了目的。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所作的贡

献有目共睹,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英美等国放弃了过去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942 年 1 月,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统帅。1943 年 11 月,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会议签署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日本在中国窃取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对于 1945 年 2 月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领土与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蒋虽感到气愤,但为了战后与中共斗争的需要,他在取得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战胜日本 3 个月后从东北撤退全部军队等承诺后,还是接受了该协定。

1945 年 8 月 15 日,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无力支撑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 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底,蒋介石面对力量、地位日益增长且人心所向的共产党,处心积虑地想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事与愿违。这一时期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遭到重大失败,以至退居台湾。

在政治上,蒋一直在逆民主进步的时代潮流而动,顽固维持旧秩序。

抗战一结束,蒋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不惜容纳、利用汉奸等腐恶力量"维持秩序",并坐视政府接收官员贪污腐败,鱼肉沦陷区百姓,很快失去了老百姓的拥护。这种典型的体制性的腐败行为国民党是无法制止的。

1945 年 10 月 10 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经过直接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规定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

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①。但蒋并没有和平民主的诚意，13日即对国民党军队发出进占解放区的密电。其内战企图遭到了各阶层人士的反对。1946年1月10日，国共经过反复谈判，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双方争夺战略要地的斗争并未真正停息。1月10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过协商，通过了军事、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五项协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对这一结果，蒋介石在会后很快就反悔了。3月，他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否定了政协会议的协议。6月，蒋发动了全面内战。11月，不顾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制订"被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的"伪宪法"。对于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声明不承认"伪宪法"的民盟等民主党派，蒋还进行迫害。10月，授意国民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这样就在政治上把民主党派逼入绝境，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中间立场而日益赞成共产党，并与之联合奋斗。

1948年春，蒋不顾政治军事经济已陷入困境，一意孤行，举行"行宪国大"选举，任"伪总统"。

在军事上，蒋不顾多数国民党官兵厌恶内战、军无斗志的状况，自认为军队的数量、装备、作战技术及经验、财政支持乃至外援都强于共产党，悍然发动空前规模的大内战。

1946年6月，蒋对共产党发动全面军事进攻，虽然在8个

---

①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2日。

月里占领了105座城市，但折损了71万人。1947年3月被迫改为重点进攻，蒋的计划是集中兵力进攻山东、陕北。国民党军队虽然一度占领延安，但并未消灭西北解放军的主力，反而不断遭到袭击。在山东战场，更遭到了惨重损失。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转入全面防御，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戡乱总动员”。从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秋冬，蒋与中共进行了事关自己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结果均遭惨败。蒋不得不于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仍暗中操纵实权。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解放军相继发起了渡江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役，国民党在大陆的军队被消灭殆尽。

在经济上，蒋介石政权虽然一开始接受了敌伪6200亿元以上的资产[①]，但把其中的多数转化成了“国营”、“党营”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民族产业及普通民众并未从中受益。国民政府还在实际上提高法币兑换伪币的比率，来掠夺沦陷区的人民。加上滥发纸币、公债，和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抗战胜利后，蒋政权的资产已达200亿美元。内战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生产停滞，国统区经济很快走上全面崩溃的绝路。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重任“总统”，且仍为国民党总裁，此后他担任这两大要职一直到病逝，始终大权独揽。

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首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陆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因则

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1946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① 他要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另一方面，面对共产党的积极攻台准备和美国的有意抛弃，他也很现实地认识到自己"真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没有地方可以再退了"②，遂尽最后的努力做"死里求生"的应战准备。恰在此时，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发，美国认为"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③，遂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攻台，"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④。

蒋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调整方面。他在政治上打着"反攻大陆"、"反共复国"等旗号，利用特务系统，继续维持其极权统治，不断迫害民主进步人士。但他也吸取了一些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意识到要巩固统治，"惟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以重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⑤。到195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宣布党的改造完成，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各级党部得以重建并强化，领导层得以更新。对于蒋经国，蒋介石进行了不遗余

---

① 蒋介石：《复行视事文告》，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
② 蒋介石：《军人魂》，《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984页。
③ 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6月28日。
④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0月第2版，第249页。
⑤ 蒋介石：《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041页。

力的扶植，以其为内定的接班人。

据台期间，蒋虽然在外交、军事等方面紧紧依靠美国，得以偏安，但仍明确反对美国等国的“国际托管”或“两个中国”政策。对于“台独”，更是坚决反对并予以镇压，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初期，面对美国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授意“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已经国际公认属于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对其拥有主权。1955 年，解放军对毗邻大陆的金门、马祖两岛国民党军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美国一方面根据与蒋介石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派军舰协防，另一方面鼓动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散布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由中立国代管或“台湾独立”等舆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蒋介石接连发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两个中国”的主张是荒谬绝伦的。1958 年，又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两岛中立化进而割断台湾与大陆联系的企图。1967 年 9 月，蒋发表谈话，“绝对反对”在日本出现的“台湾独立”谬论。

在经济上，蒋首先支持陈诚实行土地改革，经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等阶段，于 1953 年实行了“耕者有其田”。有 166049 户的地主土地被赎买征收，分给 194823 户佃农①。蒋介石此举不仅使他巩固了政权，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并在农村建立起了新型的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改变了扶植官僚资本的做法，而是推行市场经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特别是出口产业的发展，使台湾经济由以农业为主的内向型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外向型，并持续

① 沈宗瀚：《农村发展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73 页。

高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台湾的国际地位很快下降。1971 年 10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的代表则遭到驱逐。蒋甚感恼怒，痛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①]。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使蒋反攻大陆的梦想最终破灭了。

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病死于台北，终年 88 岁。

---

① 蒋介石：《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3757 页。

第十三章　胡　汉　民

胡汉民，原名衍鸛，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年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属广州），祖籍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

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之后，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②]。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16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此时的胡在学识上大有长进，“能治经史诗章性理之学”[③]，更结交了史坚如等一批新朋友。通过他们，胡闻知了孙中山的名字和为人。他对当时由“公车上书”引起的知识界的变法呼声，认为“皆无要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2页。

②③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18页。

领，于余心未餍"[1]，而对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却盛赞为"空前奇举"[2]。1898年，20岁的胡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1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3]。这前后，胡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1902年，胡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4]，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他深刻地体悟到："专制淫威之下，无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进行救国最重要应从政治入手，"革命应破坏旧有政治之势力，而重新建设之"[5]。于是，1904年冬，胡再度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

1905年9月1日，胡汉民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同盟会。初任评议部评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被推为编辑，主编《民报》1至5期。1905至

---

[1][2] 《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页。
[3][4] 《胡汉民自传》，第5、9页。
[5] 《胡汉民自传》，第11页。

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近30篇,在宣传三民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在国民党中"三民主义理论中坚"地位的基础。在此期间,他还针对革命实际,积极参加与保皇派《新民丛报》的论战,先后写了《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之谬妄》等文章,解释民生主义,斥责梁启超。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61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从1908年8月至1909年5月,共撰写了20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①]。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专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②]。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播,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埠分会已有20余处,同志达3000余人。为了便于联络,190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1909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

①② 《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第402、487—488页。

新军起义失败。同年 11 月,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后,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①] 的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筹款工作。这次筹款历时 3 个多月,奔波于马来亚、越南、泰国之间,倍受辛劳。1911 年 2 月初,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工作,负责秘书科工作。4 月 27 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次日晨,胡和赵声等人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此间,胡情绪十分低落,并开始极力赞成从前曾坚决反对过的暗杀之举,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为寒敌之胆而张吾军。”[②]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贡后,胡汉民的低落情绪为之一振,立即率领一批要求从军的青年华侨急赴香港。11 月 9 日广东宣布独立,胡被推为都督。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就任秘书长期间,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办事作风果断明快,对腐败分子“不稍宽假”[③]。但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胡力主“让位”,且“力挽先生之意于内”[④],对孙中山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 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胡任广东支部长。1913 年 3 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袁世凯向国民党人进攻的信号。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表示反对,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胡“以时机未至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 113 页。
② 《胡汉民自传》,第 45 页。
③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 135 页。
④ 《胡汉民自传》,第 69 页。

拒之"[1]。6月14日,袁世凯免去胡广东都督兼民政总长职,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胡通电辞职。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声称从今以后将"与叶夏声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以受此无价值之毁誉也"[2]。"二次革命"失败后,胡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1913年9月,孙中山开始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对入党必须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等问题,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很大,胡则处于反对和赞成之间,持一种调和态度。他于1914年5月1日亲书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党内编号是450号。不久,《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胡任总编辑。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于是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了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3] 此外,胡还以"去非"为笔名发表《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文,揭发袁世凯窃取民国名位,实质欲建帝制的野心。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胡任政治部长,致力于反袁的宣传工作。1916年4月,胡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胡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谋划扩充北方党务会议和联络国会议员。1917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任交通总长,协调与桂系的关系。后因受西南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排斥,孙中山于

① 黄远庸:《远生遗著》第3卷,第121页。
②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62页。
③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77页。

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胡也随孙离开广东前往上海。1919年2月，胡代表孙中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在和会上，胡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坚持恢复旧国会和北京政府必须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五四运动爆发后，胡按孙中山的指示辞去代表职务。7月，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指出所谓“南北一致”不啻为“一致卖国”，所谓“南北分治”实等于“武力分赃”①。此后，胡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19年9月至1920年7月，胡在《建设》杂志上共发表了10篇文章，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译出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胡在该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论述。胡称赞唯物史观道：“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② 胡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时，还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胡不仅停留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层面上，而且用它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家庭婚姻进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护法军政府，次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12月，孙中山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督师北伐，胡任文官长及政务处长，协助孙中山策划北伐具体事宜。陈炯明叛变后，胡

---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7页。

② 《建设》第1卷第5号,第945—946页。

闻变由韶关赶赴江西赣州，与许崇智等开会决定率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北伐军与叛军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退往福州。此时，胡方得知孙中山已脱险到上海，自己亦由福州前往上海。1923 年 1 月，滇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胡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不久，孙中山到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改任胡为大本营总参议。

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后，开始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1922 年 9 月，胡等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11 月，该委员会推举汪精卫、胡汉民共同起草《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次年 10 月，孙中山又委派胡等 9 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改组工作。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胡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宣言审查委员会九人委员之一。在讨论党章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引起了较大争议。作为当天会议主席的胡汉民在最后总结时说："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① 胡的意见获得多数代表的赞成，使党章得以顺利通过。国民党改组后，右派仍不断造谣并借机作乱。对此，胡发表了《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以平息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论调。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论证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保持双重身份的合理性。胡指出：在同盟会时代，李石曾、吴稚晖、诸民谊几位同志曾在巴黎加入过无政府主义政党，无政府主义离民生主义比较共产主义更要远些，几位

① 《胡汉民先生年谱》，第 303 页。

同志和无政府主义发生关系，尚且不必怕，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不断关系，又有什么可怕呢？[①]由此可见，在国共合作初期，胡是基本拥护国共合作的。

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由胡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长，承担巩固后方重任。1924年秋，广州发生商团叛乱，当胡接手处理该事变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总理不听鲍罗廷的话，……听了他的话一定要坏事的”[②]。胡主张“委曲迁就”，发还了被扣留的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胡的妥协助长了商团的反动气焰。就在发还枪械的当天下午，商团制造了双十惨案，枪杀徒手群众数十人。孙中山在韶关获得可靠消息后，屡次电令胡“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③]。至此，胡才转为坚决镇压，以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名义下发总攻击令，迅速平定了叛乱。11月，孙中山北上，任命胡代行大元帅职权。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的滇桂军益加骄横，谋划颠覆革命政府。1925年6月5日，胡以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名义下令免去杨希闵、刘震寰各职，令各军讨伐逆军。不久逆军全部被平定，广州局势基本安定。7月1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后，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胡因与“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关系密切，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案发后，根据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一个

---

① 《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集,第156页。

②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9—310页。

③ 《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特别委员会，节制党、政、军大权，胡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离粤赴苏考察。在苏期间，他试图让中国国民党取代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为达此目的，胡在苏发表许多“过激”言论，撰文、演讲都对马克思主义极尽赞扬之能事。后由于斯大林的干涉，胡的提议被搁置。通过旅苏期间的耳闻目睹，胡发现苏联的政治体制与自己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从而坚定了他反共反苏的决心。1926年5月初，胡在广州中央报告考察苏俄经过时说：“不特俄之联我，只视我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即其中国CP一面寄生我党，一面不断地阴谋捣乱，也是无可转移的政策”。[①] 此后，胡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八字主张。至此，在思想上由容共转变到反共，并很快在行动上成了反共的急先锋。

1926年9月初，胡主动写信给蒋介石，祝贺攻克武汉，其中掺杂不少阿谀之词，露出欲与蒋勾结的端倪。1927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等来访，约胡去南京参加会议，并出示“查办共产党案”。早已有反共之心的胡见到该案后，一拍即合，并坚决地表示：“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反共清党不可”[②]。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时，胡代表“国民政府”接印。胡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不久，胡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清党原则六条”，提议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并署文明确宣称此次清党的意义：“是要进一步把共产的死灰都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③]

①②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386页。

③ 《清党之意义》，《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二集，第81页。

此间，胡还发表了《三民主义之认识》、《三民主义与世界革命》等文章，系统地阐扬三民主义，提出"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胡认为，"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以这一个大连环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满足世界革命的统一要求，以三个小环的实际性，去应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从而使"世界革命的统一性与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首尾相顾"，达到世界革命的彻底成功①。同时，胡把这种"连环性的三民主义"抬高到"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②的地位，来直接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

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胡汉民也随即辞职。次年初，蒋回南京复职，电邀胡入京。此后胡专心致力于"三民主义之阐扬"③，完成了《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将"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加以系统整理，使之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因此被称为"国民党新生的理论基础"④。1月底，胡和孙科等到土耳其和欧洲考察政治。6月初，胡正在法国访问，获悉国民党军到达北平后，即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在国民党内首倡实行"训政"的建国方针。9月初，胡从欧洲回到上海，后被推为中央常委，负责筹组五院制新政府，并任立法院院长。在任期间，胡共主持制订了民法、刑法、土地法等16部法律；撰写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方针》、《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等文，为国民党立法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

①② 《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③④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14页。

1929年到1930年间，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党内派系之争最激烈的时期。每次争斗一起，胡总是站在蒋介石一方，通电斥责、声讨对方。战争过程中，蒋介石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在后方配合，主持党务、政务，稳定局势。正如后来有人回忆说："当时如无胡在宁替蒋撑腰，蒋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蒋之独裁地位，胡是一个主要的帮凶。"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两度与蒋介石合作，其初衷是欲扶植蒋当中国的"凯末尔"，实现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可是随着国民党对全国统治的相对稳定，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胡、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1930年10月初，蒋介石在致国民党中央的"江电"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确定颁布宪法的日期，并制定在此之前的"训政时期约法"，以便集权于一身。胡虽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但反对制定约法，他指出："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② 1931年2月，蒋介石约胡去讨论约法问题，胡不理会张群等人的劝说，坚决地加以拒绝，并驳斥道："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③ 并忠告蒋说："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身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④蒋介石争取胡的最后努力失败后，

---

①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3页。

② 《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③④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页。

于 2 月 28 日下令扣留胡，次日将其软禁于汤山。

胡被软禁后，4 月底，亲胡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古应芬、林森等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接着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等分别通电响应，汪精卫、孙科也从香港到广州，参加联合反蒋运动。5 月 27 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突然出现的民族危机，迫使宁粤双方举行和谈。由于粤方代表在和谈中提出最低限度要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蒋介石也急欲摆脱因"扣胡"而造成的政治窘境，于 10 月 13 日释放了胡。胡被释后，一再拒绝蒋介石的拉拢。12 月初，在粤方四全大会致闭幕词时，胡强调要反对独裁，"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然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①]。粤方四全大会所推选的中央执监委员由胡领衔，发出促蒋下野并解除兵权的通电。12 月 15 日，蒋介石通电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胡为中执会常委、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并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党务、政务，由胡主持一切。1932 年 1 月，胡汉民、唐绍仪等 60 余人通电遵四届一中全会所订的决议，取消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代之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分会。这样，西南半独立状况得到了"合法"地位。

① 陈红民：《胡汉民年表（1931 年 9 月—1936 年 5 月）》，《民国档案》1986 年第 1 期，第 122 页。

1932年1月18日,汪、蒋在杭州烟霞洞会晤,汪改变原先反蒋立场,决定与蒋合作。胡得知汪的背信弃义后十分愤慨,公开表示与蒋、汪决裂,并说:"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成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① 从此以后,胡偏居香港,宣传自己的抗日倒蒋反共的政治主张,成为国民党内真正的"在野派"。

1933年1月15日,《三民主义月刊》在广州创刊,胡任主编。在发刊词中,胡指出办此刊的目的是要"重新提出这一个三民主义的名词,来洗刷一般因现实之败坏而加于它的误解;我们要揭露三民主义真实的面目,归还他固有的伟大永久的价值"②。此后,胡以《三民主义月刊》为理论基地,宣扬其"抗日反蒋反共"的主张。胡在文章中严厉地斥责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是一种错误","'攘外才能安内'是救国政策——对日抗战是我们唯一的生路"③。胡还著文严厉地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掩饰其侵略面目而制造的"大亚细亚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企图对于整个亚洲民族的统制主义","是日本对于亚洲的门罗主义"④。胡还以三民主义为武器,批判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指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

① 胡汉民:《斥"三月亡国论"》,《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645页。

② 胡汉民:《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1期,第8页。

③ 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1—19页。

④ 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2页。

与法西斯蒂反动运动并存。"[①]"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是时代转变的产儿，同时也必会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它的没落，不是理论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②]胡在致力于发动反蒋宣传攻势的同时，还采取实际行动，于1932年左右成立"新国民党"，1933年9月又在广州仲元学校创办"政治经济讲习班"，积极准备反蒋的力量。1933年11月底，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和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胡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政府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态度，认为"所谓'闽变'，就是中国共产匪徒与准共产匪徒的合作，共同向效颦的中国蓝衣流氓斗争的一幕把戏"[③]，"南京的军阀统治必须消灭，中国才有生路。福建的乱党统治也必须铲除，民族才能生存"[④]。由此可见，他"反蒋"的实质，并非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国民党统治。剿共、抗日、反蒋三者并举是胡晚年始终坚持的三项政治主张，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他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抗日、反蒋上了，"抗日剿共""权衡轻重，则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抗日实尤重于剿共"[⑤]。1934年4月，他在宋庆龄、何香凝等领衔发表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也签了名。

1935年6月，胡汉民到欧洲考察兼养病。12月初，国民党五

---

①② 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页。
③④ 胡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页。
⑤ 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13页。

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常委、党务会议主席。次年1月中旬,胡从欧洲返回香港,当天发表书面谈话,表明其政治主张:“余之党政主张,一如往昔……党应恢复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除国难建设之重任。”① 是月底,国民党中央派代表居正、叶楚伧南下敦请胡北上,胡以“不久即将入京”的含糊允诺打发他们。2月下旬,在对广州、香港记者发表谈话时,胡公开宣称将不北上,“余现在正想如何促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之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②。此后胡着力于宣传抗日主张,从3至5月连续发表《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等文,呼吁民族主义的复兴,指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实行,第一在抵抗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在消灭军阀官僚之钳制,谋民生之行使,并使人民生计,能进获昭苏进展的机会。”③

1936年5月9日,胡应邀去妻弟陈融公寓赴宴,晚上下棋时,忽患脑溢血,于12日下午7时40分停止呼吸,终年58岁。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541—542页。

② 《胡汉民谈对日外交》,《国闻周报》第13卷,第9期。

③ 胡汉民:《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5期,第15页。

第十四章　孔　祥　熙

孔祥熙，字庸之，1880 年 9 月 11 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父繁慈，前清贡生，先事商务，后任塾师。母庞氏，1886 年病逝。孔 6 岁随父就塾。他对《诗经》、《礼记》颇感兴趣，入塾三年，铺就了一定的国学根底。

1889 年，因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对教会产生好感。1890 年春，他不顾族人反对进入太谷基督教会所办的"华美公学"学习。在此，他先读科学浅说、圣经摘要，后学哲学、数学、格致，并开始参加礼拜，逐渐信奉基督教，成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1895 年，他在"华美公学"毕业，经教会人士介绍，进入直隶省通州潞河学院。潞河学院也为教会所创办，开设课程除了数理化外，还讲经传道。孔经常借助圣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王公大臣，昧于事理"①，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听说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便联系十几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孔在潞河学院经过 5 年的学习，正要毕业之际，赶上了义和

---

① 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 页。

团运动。学院教士为义和团所冲击，停课避乱，孔趁此返乡。当时，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到山西出任巡抚。毓贤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杀教民。当孔回到太谷，得知曾为他治病、授课的教士已被囚准备用刑时，他急忙收买看守，救出了麦纳等3位少妇，并与知府交涉，将被杀的15具尸体，分别男女，“移葬于西门外义地”[①]。孔的这一行为后被洋人誉为“壮举”。

1900年7月1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学院复学。孔返校后立即将山西教案实情禀报赞助议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教案所以发生纯属毓贤所为，与民无关，一般贫民所以被利用，是无知所致，建议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教育。李提摩太觉得孔的建议确属上策，于是一面劝阻联军进攻山西，一面将“殉难教士”的“抚恤金”改用兴办西伦大学(山西大学前身之一)。李鸿章深知联军放弃进攻山西与孔有关，赐予他“帮办洋务”的名义，要他参办教案。孔因曾发誓不与西太后朝廷合作，谢绝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国深造。李赞同孔的请求。为使旅途方便，李除发给孔出国护照外，还给予“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并致电驻美公使伍秩庸对孔多加关照。1901年秋，孔乘海轮经上海转赴美国，进入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欧柏林大学为教会学校，学科齐备。孔祥熙先是立志从事实业，后又想从改革社会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两年主修理化，后两年

① 张振福:《初期的教会与庚子被难》，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

兼学社会科学。1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后，考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蜚声国际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为开发中国地下宝藏，专习矿物。

孔祥熙进入耶鲁大学不久，曾亲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晤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聆听孙中山所阐扬的革命理论。在交谈中，孙中山告诫孔："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①] 孙的寥寥数语，使孔敬仰万分，当即发誓追随革命，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欣然应允。此后孔祥熙便响应孙的号召到西北一带兴办教育，以启民智。

1907年夏，耶鲁大学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的孔祥熙回国前到欧柏林母校辞行。在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有人提议乘孔回国之便，带一笔捐款，为"庚子殉难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立碑勒石以为永久纪念。孔认为建筑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纪念物，即"设立学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②]。孔的提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捐款，几天内孔就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

当年秋天，孔祥熙携款回到山西太谷，一心创办学校。他将教会在太谷西城蒙馆接受下来作为校址，创建"铭贤中学"[③]，自任校长。不久，孔将铭贤中学搬到太谷东关孟家花园。经过几年的校舍建设，特别是多方网罗人才，高薪聘请教师，大量购置仪

---

① 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中正书局1980年版，第30页。

② 孟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传纪文学丛刊印行，第80页。

③ 表示"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

器、书籍，使学校颇具规模。铭贤学校作为新式学堂，教师大部来自国外。该校校训是："学以事人。"① 培养目标是："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课程设置为：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

1911 年 10 月 29 日，山西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太原举事。孔乘机把太谷城内的商团、巡警队、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成立"营务处"，自任总办，维持治安。当袁世凯派清军进攻山西时，孔曾三次派学生军赴娘子关作战，抵抗清军对起义军的镇压。

1912 年，孔祥熙看准火油生意大有可为，设立"祥记公司"，交付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保证金 40 万元银元，取得山西省亚细亚火油总代理权。此一独占性经营，使孔每年获得巨大盈利。孔规定，盈利的 40%用于兴学和举办公益事业。②

1913 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电召孔祥熙赴沪商讨时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为保存革命元气，率领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随孙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后，适逢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辞职，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莫特请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为掩护，积极筹款接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1914 年 7 月 8 日，孙中山决定解散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孔是首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1914 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长女宋霭龄结婚。当时宋

① 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 1929 年 5 月版。
② 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第 42 页。

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婚后两人继续协助孙中山发展革命势力。1915 年，鉴于袁世凯阴谋称帝，孙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霭龄回国，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孔辞去了教会职务，宋霭龄的工作也由其妹宋庆龄接替，两人于当年秋天回到山西太谷。

1916 年元旦，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孔祥熙于太谷得悉后，当即写下一篇《上袁世凯书》，寄送报馆公开发表，予以声讨。

1919 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太谷时，孔祥熙立即把亢奋的全体师生召集在大礼堂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有胆有识的空前壮举”。他归纳五四爱国运动这一空前壮举的意义是：一、可以作为外交后盾；二、可以警惕愚顽，激励弱懦；三、可以使政治改善，国运好转，奠定国家强盛之初基。他建议大家共同致力于一件事，即：组队分赴各地，向老百姓宣讲五四运动意义，让多数同胞对此有所了解。并亲自于 5 月 7 日策划组织 300 余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1920 年山西大旱，灾民无以为生。孔祥熙出面向华洋义赈会请命，贷得巨款 100 万美金，并提出“以工代赈、修筑公路，将来以公路收入，偿还贷款”的意见。山西督军阎锡山得悉后极为高兴，马上派孔的同乡好友赵守钰为路工局局长，督修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和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之晋东公路。公路工程，自翌年春开工，冬完竣。两大交通要道的完成，对山西经济的发展，裨益匪浅。

1922 年 2 月 4 日，在华盛顿会议的影响下，在中、美、英三方压力下，日本被迫与中国达成协议，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为解决鲁案善后事宜，北京政府决定派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任督办。3

月，孔祥熙受王正廷之邀和孙中山电促，赴济南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孔到济南后，正值直奉大战爆发，鲁案善后公署迁到北京。不久，孔又奉孙中山电召赴粤汇报。因直系战胜奉系，大局已定，孙中山发表通电，主张和平统一。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探知孔与孙的"连襟"关系，亟欲借重孔祥熙商通南北意见，实现南北统一。孔祥熙往返南北之间，执行着沟通南北政府的秘密使命。直到6月间，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复任，国内情势顿变，孔才放弃此项工作，把精力放在鲁案善后上。

鲁案善后进行比较顺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确定办法，第二步是实地查点和估价。第一步工作主要在北京进行。9月20日鲁案善后公署迁往济南，进行第二步工作。9月28日，交涉在各分委会进行；孔祥熙兼任邮电分会主任委员。12月初，细目协定签字，孔携公署人员赴青岛，具体办理接收事宜。12月10日，鲁案善后结束。山东省长熊秉琦因接受伊始，千头万绪，力挽孔留青岛协助政务，孔为了安置部分办理鲁案人员，暂就胶澳商埠电话局长。

1923年3月，在苏联政府的催促下，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俄交涉事务公署，用于和苏联谈判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务公署总办，王邀孔祥熙担任中俄谈判公署坐办。当时奉系与直系矛盾尖锐。孙中山在广东建立大本营准备北伐，奉系有联孙意向。为了加强粤奉关系，孙中山正拟派孔祥熙到东北做"铺路"工作。于是孔借此辞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长职务，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就任坐办，以公署驻奉代表身份前往沈阳。中俄交涉虽为时半载即告停顿，但孔从此却与张氏父子建

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很想在北方找到同仁，于是电召孔祥熙到粤磋商。孔祥熙到广州后立即将冯玉祥介绍给孙中山，并经孙中山同意，密携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奔赴北京，在孙冯之间斡旋。冯逐步倾向革命，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为迎孙中山北上，孔祥熙亲抵上海。北上线路确定后，又先孙赴京准备。不幸孙中山抵天津时肝病大发，日益加重。在孙病重期间，孔全力照顾。孙逝世后，孔被推为治丧处主任，主办治丧事宜。为治丧，孔曾支付私款5万元。

同年3月，王正廷复任中俄会议督办。4月，临时执政段祺瑞又任命孔为中俄会议坐办。孔答应就任。孔利用坐办名义广泛联络北方将领，积极营救陈友仁等国民党人。

1926年春，中俄会议时停时开，孔祥熙乘机赴美宣传中山遗嘱。在美国，孔为铭贤学校募得75万元校园扩建资金，并被欧柏林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孔看到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是年冬返国，径赴广州。12月，孔担任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宋子文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代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实业部，任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实际上并未赴任。4月汪精卫返国抵沪，孔闻讯离粤赴沪，力促汪蒋合作。

宁汉对立时期，孔祥熙站在南京方面，秘密往返于宁、汉、豫、粤之间，为时数月，为蒋介石苦心奔走。

1927 年 11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工商部。次年 2 月，孔祥熙担任工商部长。在近三年的工商部长任内，孔祥熙首先延揽旧有的工商学者组成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订立了《工商部组织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中华民国权度标准》、《度量衡法》、《中国国货商标法》、《工厂法》、《公司法》、《工会法》、《工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特种工业奖励法》、《商业检验条例》、《消费合作社条例》、《会计师条例》等 100 多种法规。这些工商法规虽然体现的是工商所有者的利益，特别是大工商所有者的利益，但确有利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另外，孔在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提倡发展生产、发展国际间贸易等方面，也小有建树。

1930 年 12 月，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提出“实施林垦政策，开发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①。1931 年 1 月，国民政府公布实业部组织法，规定实业部总揽农工商矿林牧渔和水利等一切实业。孔祥熙吸收掌管工商部的经验，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其中依据职权范围呈国民政府公布的有：农会法实施法、倾销法、牧税法、工厂检查法、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条例等。

1931 年 12 月，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孔祥熙为表示与蒋共进退，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1932 年 1 月，蒋汪再次合作，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身份于 3 月 13 日赴欧美考察。主要执行蒋介石关于

① 《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 429 页。

同欧美各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设厂自制任务。在意大利访问墨索里尼时，墨索里尼向孔建议："贵国建国，应以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军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可见成效。"[①]孔祥熙将此建议报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优先发展空军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发展的重要战略。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考察回国。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拮据，宋子文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孔祥熙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同时宣布"废两改元"。9月，蒋介石制定了新的"剿共"计划，要求迅速增加军费开支，宋子文以国库窘迫无法应付为由，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蒋介石从南昌飞回南京，敦促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1月1日，孔由沪赴宁，就任财政部长。在当天招待记者时，他表示"开源节流为财政主要方策"。他说："开源应力保经济建设，培养税源。至增加税收，不外整顿原有各税及另辟新税，但增税宜不伤人民元气，不害经济发展。节流之法，不仅缩减支出，还应注重分配得宜，合乎经济原则。"[②] 其实，孔祥熙的"开源节流"并不能遏止军事开支这个大流，因为他继任财长本身，就是在宋子文无法阻止蒋介石扩充军费的前提下实现的。

孔祥熙执掌财政，长达11年之久，可分为"平时财政"和"战时财政"两个阶段。

---

① 《孔祥熙先生年谱》，第80页。

② 《国闻周报》第7卷第44期。

在“平时财政”初期,孔祥熙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实行赤字开支政策。当时财政赤字已近千万元,但是孔强调,平衡预算固然重要,而“剿共”作战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①。所以孔祥熙上台不久就以关税作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

1934年1月20日,孔祥熙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会上他提出“整理田赋,举行土地陈报,以除积弊而裕税源案”和“减轻田赋附加以救济农村解除民困案”,两案均获通过。同年5月18日,为落实以上提案,孔专门召集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

1934年6月,孔审核并呈报了“海关进口新税则”。并经第414次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实施,于月底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实行。新税则首先是对日军事妥协的产物,它对日货输入极为有利;其次,进口新税则对民族工业借鉴外国的技术极为不利,许多中国工业必需品的税率提高了。

1934年5月,孔意识到金融力量的分散,不利于稳定金融,为增加中央银行的实力,使之成为真正的“银行之银行”,决定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次年3月,他又呈请行政院通过“发行金融公债案”,以债券充作资本,将中国银行官股500万元增至2500万元;交通银行官股100万元增至1100万元。通过充实官股,增加了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控制力量。3月27日,“二十四年金融公债案”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28日公债条例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与此同时,对中、中、交行的领导机构分别进行改组,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

① 《申报》1933年11月2日第3版。

裁。中、中、交行的改组，标志着国民政府金融步调一体化的完成。

1934年6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白银法案，宣布白银国有和无限制购买白银政策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张，严重伤害着中国的经济建设。鉴此恶流，孔祥熙于10月13日下午召集财政部负责人紧急开会，决定"把白银的纽结割开"，即把汇率与国外银行的联系割断。他着手颁布了征收白银出口税并加课平衡税条文，使白银的合法出口暂被制止。

但由于银本位制仍然保留着，在优厚利润诱惑下，白银走私猖獗起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孔祥熙立即决定筹划币制改革。1935年3月，孔责令组成专门班子研究草拟币改方案。同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宣布"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之钞票为法币 。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1]。这次币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制止了白银外流现象，同时，统一了中国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发行，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孔祥熙被推为提案审查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主持审定了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提案。在他的影响下，会议在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现代经济以金融为事业之中心，现代政治亦以金融为财政之枢纽"，因此要"下最大决心，行金融之统制"。会议还提出财政的任务是"立计划，严审核，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以期扶植民

---

① 《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

力,充实国用,畅遂货物之流通,培养国家之元气"。①

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任命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整理内外债务。在整理内债方面,孔的办法是发行以关税为担保的5种统一公债(也称二十五年统一公债),共计14.6亿元,利息6厘,分别在12、15、18、21、24年内满期还清,每半年抽签一次,旧债券按到期远近换成5种新债券。由于延长了偿还期限,使债务支出每年减少约达8500万元;还大大简化了债务结构,5种新债券代替了32种不同日期、结构复杂的旧债券,简化了债务手续,方便了持债人。在整理外债方面,孔认为:"中国复兴在望,急需要欢迎外资投入,以促进经济繁荣,建设之推进。"所以他提出免去债息、延长期限、减少债额等三项原则,以与各国洽商。当时的债权国,一方面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生怕中国出现新的政府彻底放弃偿还债息的义务,另一方面看到财政当局不倦寻求合理解决,尚有偿债的决心,只得面对现实接受孔祥熙的整理建议。这样,经过整理,不仅减轻了国民政府公债本息的负担,而且维护了债信,为抗战爆发后几次借款创造了条件。

1936年7月,孔祥熙呈准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10月1日首先就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政府库券公债所得开征。自1937年1月1日起对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事业所得征课。所得税属直接税,它较间接税要公平合理些,有利于阻止税负转嫁。它的创办,为中国由间接税趋重于直接税迈出了第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一步。到抗战爆发后,直接税显得更为重要,收入由1936年的600多万元,增加到1943年的4亿元以上,增加了70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孔祥熙因身体不适抱疾上海私寓。当得到事变消息时,他一面紧急召集沪市银钱业商会要人,嘱咐维持安定;一面积极电张学良要求"保护介公",和平解决。当晚孔与宋美龄到南京后,首先提出了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对策,继又匆匆通电各省市及地方实力派稳定政局,后又召见各国使节安顿邦交。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① 由于孔祥熙、宋美龄等的努力,基本上遏制了南京政府内部讨伐势力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派孔祥熙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这次赴欧历时半年,除了庆贺英王加冕外,主要是向欧洲各国洽商借款及购买军火,准备抗日。孔经过欧美往返活动,与欧洲诸国签定了一系列借款合同,并订购了大批军火。另外,孔还利用外交手段,企图促成建立太平洋国家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企图以此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动。

1937年10月,孔由欧洲返国。此时正值淞沪会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1月19日孔迁往汉口办公。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实行改组,孔祥熙

①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转引自《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2页。

由行政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孔祥熙依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财政方针，努力将平时财政转为战时财政。具体措施为：在金融方面，决定实行“百分之五提现”，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制止战初银行、钱庄提兑拥挤；1938 年 3 月公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各银行用外汇，要经中央银行批准，限制外汇购买；1939 年 3 月，成立中英合作外汇平准基金 1000 万镑，由汇丰银行等在上海买卖中国法币，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比值，稳定汇率；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健全战时中央金融机构，监督全国银行业务；1938 年 6 月召开地方金融会议，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地方生产事业。在税收方面，为开辟税源，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设置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将贸易委员会隶属财政部，负责土特产的收购和外销，充实外汇收入；组织工合协会，促进战时工业发展。在筹借方面，1938 年 12 月，完成桐油借款 2500 万美元。这些努力在抗战初期都是有利于抗战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支出庞大，收入微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孔祥熙即酝酿增发通货。这次增钞于 1938 年底经国民政府批准，1939 年 1 月公布实施，共增发“十数万万元”。[①]

1938 年 5 月，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宇垣就任外相，复信张群，表示只要孔祥熙出面，愿意开始和谈。孔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指派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密谈，

① 1939 年 9 月 11 日，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财政报告。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 3 辑，第 45 册。

但因日方条件苛刻,谈判不了了之。

从1940年开始,国统区通货膨胀指数逐步超过财政支出指数。这时,孔祥熙认识到增发通货的不良后果,力求抑制。孔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采取了田赋征实、消费品专卖、管理私方信贷、强制推销公债、争取美援和对内出售黄金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有效的是田赋征实。田赋征实对于压缩军费开支、抑制增钞、挽救金融危机均有裨益。但由于战争的扩大,财源的枯竭,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日增。

1944年,通货膨胀带来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国民政府迫切需要外援,孔祥熙把希望寄托在美援上。此时正好有两个重要国际会议(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橡树园会议),孔祥熙乘此机会,以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全权代表身份赴美交涉。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对摊额分配争得非常激烈,除英、美、苏三国外,第四席位,法国、印度都想争得,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会议最后表决,同意中国的份额提高到5.5亿美元,从此确立了中国在这一世界性货币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另外,孔祥熙又从旁指导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此会主要讨论和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章程。经过孔祥熙的折冲及代表团的努力,为中国争得了一些应有的权力。

在美期间,孔祥熙还与美国政府清算了美军驻华开销费用,为重庆政府净得2.2亿美元还偿金;出席美国国会演讲,呼唤美国援华;商妥购买3亿美元黄金,用于回笼法币,维持财政。

1944年秋冬,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消耗,国统区整个经济呈现出败落景象。这时,孔祥熙虽身在美国,但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他执掌财柄11年,除1936—1937年财政年盈余7800万元外,其余各年均有赤字。赤字财政的发展趋向必然是通货膨

胀,而通货膨胀不能不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于是,孔祥熙的政位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11月初,他在国内反对声中由美电谕,提出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并获照准。

1945年5月,孔祥熙又辞去行政院院长职。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7月29日,由美返国,继辞四联总处副主席职。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此后孔仅留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侍宋霭龄看病为名赴美。1948年1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孔在美居住15年后,于1962年返台湾定居台北。1964年,国民党任孔祥熙为中央评议委员。1966年孔赴美疗病。1967年8月16日,病死美国,终年87岁。



第十五章　宋　子　文

宋子文，1894 年 12 月 4 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父亲宋嘉树是个牧师。宋子文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大学班学习。1912 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研修经济。1915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继往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 年回国，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旋调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不久辞职，转任联华银行总经理，并创办大洲实业公司。

1923 年 2 月，应孙中山的邀请南下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4 月起参与筹备中央银行，任中央银行筹备员、副行长。10 月兼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 年 8 月，在广州任中央银行行长。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病逝。宋子文为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之一，并参加治丧。

1925 年 7 月 1 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及实业投资委员会委员。

同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2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还保留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和商务厅长的职务。此后开始主持实施统一广东财政并整顿财政机构和组织的工作。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宋根据大会通过的《关于财政决议案》制定了广东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计划，签发了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通电，提出了核实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同时又采取了清理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设筹饷局、募集国内公债票和金库券等措施来整理国民政府财政。3月，去广东省商务厅长职。6月，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在主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工作期间，在理财方面获得显著成效。1924年广东岁入只798.6万余元，1925年达到2518.2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猛增至10013.6万余元。如扣除公债库券和其他税外收入，1925年税收净额为1629.8万余元，其中上半年仅为409.8万余元，下半年则增至1220万余元，差不多增加了2倍；1926年又增加到了6902.9万余元[①]。这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以后的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对此，广东国民政府曾在1925年底为宋子文颁发

①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嘉奖令："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锐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臻此。"①

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随国民政府北迁抵达武昌，立即着手规划整理湖北财政。虽采取了颁布条例、整理币制、发行金融公债与国库券、设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整顿税收、征收田赋等一系列措施，但没能收到预期效果。

1927年1月，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及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成员。会后奉派赴上海主持江浙两省财政统一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对立，宋子文蛰居上海，对革命处于彷徨、动摇之中。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宋子文参与促使蒋汪合流的活动。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为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宋子文于1928年6月邀集银行界、实业界的首要人物与经济专家60多人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提出裁兵减费，确立预算制，建立中央银行，废除厘金等主张。指出了此次会议须加以讨论的问题："（甲）金融。以我国枯竭纷乱之金融，如何整理，各省参差之币制，如何统一，滥币如何整理，以巩固金融之根本。（乙）公债。

① 《国民政府公报》第19号，1925年12月。

全国内外债,为数甚巨,应如何维持其信用,使此后建设经费,可仰给于公债。(丙)税务。国家收入,端恃税收,应如何整理改革,使有裨国库而不病商民。(丁)贸易。本归工商交通等部主管,但关系税源,应如何免除运输阻滞及劳资纠纷而提倡奖励。(戊)国用。应如何使各项用款,用于实际,并以消极的费用,而用之于积极进行之事业。"① 会议讨论了上述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提案。

为统一全国财政,宋子文于同年7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财政统一应包括规章、行政、用人、收支四个方面,推行统一的方法,主要是:"1. 凡关于国税范围内之财政规章及用人行政,概归财政部核定处理;其各省之中央税收,未遵本部规章办理者,应一律遵办;至各省任命中央征收人员有成绩者,均由部加委,以后归本部任免考核。2. 中央税收,一律迳解本部金库,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饬金库照发。"② 此次会议共审查修正通过138个提案,涉及关务、盐务、赋税、预算、币制、银行、公债诸方面。

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惟缔约各国对于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缔约各国不论以何借

① 《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

② 财政部:《统一财政案》(1928年7月),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81页。

口，在本国领土内，不得向彼国人民所运输进出口之货物勒收关税或内地税，或何项捐款，超过本国人民或其他国人民所完纳者，或有所区别。如于民国十八年即西历1929年1月1日前，经双方政府按照以下所规定业经批准以上之条款，则于是日发生效力，否则，随时按批准日起四月后发生效力。"[①]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首次同外国达成的关税新约。从1928年11月至1930年5月，宋子文又先后同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这些国家表面上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但却都保留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条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对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盐税建议。在整理国内税务上，首先对卷烟、面粉征收统税。1930年12月，发布裁撤厘金通电，宣布："对于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含有厘金性质者，又海关之五十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常关税(陆路边境所征国境进出口税除外)、子口税、复进口税，均应于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②]同时开征棉纱、火柴、水泥统税，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工业品，从而确立了关税、盐税、统税占主要地位的税收制度。

1928年10月，宋子文主持制订《中央银行条例》。11月1日，新的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设立，宋子文自任总裁。中央银行

---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28—629页。

② 《国闻周报》第7卷第50期。

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

自1928年1月起,宋子文还同时兼任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防会议、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委员。

1929年3月,宋子文在国民党三大上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1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着手币制改革,组建税警团。

1931年6月,宋子文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7月23日遇刺未中,8月兼任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委员长,9月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1月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并连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表示同蒋共进退,于20日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932年1月29日,宋子文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2月12日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值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宋子文多次同上海金融、实业界人士紧急磋商,为十九路军筹措急需的军费,并调税警团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同年8月,汪精卫辞职出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全面负责外交内政重大事项。对当时日本策划的伪满当局截夺东北关税和盐税收入的东北海关事件,他多次发表声明,揭露伪满傀儡政权的非法性质,指出:"所谓'满洲国',系一未得事实上存在之政体,无管理领土之主权,仅系一似云雾之政治团体,全部为全权日顾问所操纵。"[1] 主张把东北各海关移至关内各口办公。

---

① 《国闻周报》,第9卷第25期。

1933年2月，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视察北平、热河等地，表示“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也”①。“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②。至于饷款，“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③。视察期间，他还多次呼吁各地、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④

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银元7.15钱合1元，并于3月10日起在上海施行。从10日起上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也改标银元单位。这在客观上起了统一货币的作用。

1933年3月17日，宋子文因汪精卫回国，声明停止代理行政院长职务。4月5日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18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率团出访美、英、法、德、意、比和瑞士等国，出席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的华盛顿经济讨论会与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武装入侵中国的不安与不满。宋子文此次访美，还同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信贷合同，即所谓棉麦借款。在访欧过程中，宋子文向各国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相，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呼吁各国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阐述了中国希望同西方各国扩大经济关系的方针，宣称中国一面巩固政治与

①④ 《国闻周报》，第10卷第8期。
② 《大公报》，1933年2月14日。
③ 《大公报》，1933年2月18日。

经济独立,一面将为西方资本与工商业提供有利的发展范围。表示中国准备通过增进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达到提高生活、发展经济、开拓资源的目标,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并且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正式提出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此次访欧还争取到国际联盟对华的技术援助。出访途中两次经日本横滨、神户,宋子文均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记者,并拒绝邀请访日,这在客观上振奋了国内主张对日强硬的舆论。

1933 年 10 月 28 日,宋子文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只保留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虽离开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但仍从事有关金融方面的活动,介入了一些重大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还起着一定的作用。

1934 年 4、5 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根据考察结果制订了建设西北计划。5 月 31 日,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以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宣称公司纯属私人合资的股份公司,专以沟通中国和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①

从 1934 年 12 月至 1935 年 9 月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商务参赞乔治、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等进行会谈,希望英国能对华贷款 2000 万英镑,帮助中国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当英国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后,宋又同他就币制改革和英国

---

① 《申报》1934 年 4 月 15 日。

贷款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1935年4月，宋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1月3日深夜，宋子文直接参与谋划的“币制改革”出台。规定：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①。“币制改革”使货币从原来分散发行改为统一发行，发行权也集中到中央政府特定的银行手里。同时还规定，除工业艺术等原料用银，古币、稀币或有关文化之银质古物及银质器具装饰品外，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的银钱行号商店及一切团体个人，一律应于11月4日起三个月内换取法币。币制改革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金融业的控制。

1935年底，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和宋庆龄商议派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到陕北，同中共中央联系，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宋子文：“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②

---

① 《银行周报》第19卷第43期。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在西安。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对记者发表谈话:"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1] 20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决定迅速回南京汇报。22日再赴西安,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25日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离开西安回南京。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特殊身份,联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于7月27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后,又策划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以后这个机构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8月24日任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主持5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

① 《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1938年6月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但在1941年5月，宋子文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宣布退出同盟。

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使美国寻求援助。1940年10月22日签署了2500万美元的《中美钨砂借款合约》。1941年2月4日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中美金属借款合约》。同年4月1日，在华盛顿又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同英国签署了500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协定》。5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至此，宋子文又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洽商决定及接受租借法案项下军火装备事宜的中方全权代表。1941年获得租借物资2500多万美元。①

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但仍长驻美国。1942年1月1日，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的精神，3月21日从美国获得了5亿美元的借款。6月2日，宋子文又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又称《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双方在抗战期间互相供应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据此协定，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从美国获得8.4574822088亿美元物资，除2000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予②。除上述活动外，宋还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商谈中国战区的有关问题。

---

① [美]杨格：《中国和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147页。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351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9页。

1942 年 10 月，美、英两国政府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经过磋商声明放弃在华特权。宋子文就此主持了与美、英订立新约的谈判。1943 年 1 月 11 日，中美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及换文，中英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及换文。这两个条约除个别地方不同外，其内容基本相同。新约及换文至少在法理上取消了美英在华的租界及使馆区的特权、内地驻兵权、军舰自由驶入权、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外籍引入权和海关雇用官员权等。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因英国政府阻挠没有解决。此后，中国又先后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签订了类似的新约。

1943 年末至 1944 年 6 月，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因与蒋介石等人的矛盾而闭门谢客，不公开露面。直到 6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才重新出山。

1944 年 12 月，宋子文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1945 年 4 月 7 日，宋子文率领有顾维钧、魏道明、王宠惠、胡适、董必武、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离重庆赴美国旧金山，出席 25 日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并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宋子文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

在 1945 年 5 月 21 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在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院长。

1945 年 7、8 月间，宋子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两度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

定》的实施方案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被迫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

日本投降后，宋子文主持接收敌伪物资的工作。1945年10月下旬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为专门的接收机构。确定对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是：原属本国、盟国或友邦人民所有者，查明发还；原属华人与日伪合办者，收归政府所有，惟被强迫合办者，查明另行处理；原为日侨所有或日伪出资收购者，收归政府所有，并移转资源委员会、纺织业管理委员会、粮食部接办，不在上述三单位范围和规模较小者，以公平价格出售①。整个接收工作到1946年夏基本结束。此次接收的敌伪产业共值战前法币23.0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值11.46亿元②。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巨额的敌伪产业而高度膨胀起来。

1946年1月，宋子文获国民政府的"忠勤勋章"。3月，宋子文为挽救法币信誉，维持法币币值，实行开放外汇市场、低价供应外汇、鼓励自由进口、扩大信贷政策，造成抢购黄金外汇风潮，促使原来的通货膨胀更为激烈。

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宋子文为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想尽办法筹集军费。从1946年3至8月，在宋子文直接过问下，国民政府同美国进出口银行达成5笔、总金额为624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8月30日，宋子文同美国国外清理局局长麦克勒在上海签订剩余物资购买合同。据此，美国把战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剩余物资和设备全部售予中国，其中包括5亿美元

①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605页。

可移动的物资和 8400 万美元的固定设备。①

1947 年 3 月 1 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等职务。在 3 月 24 日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中执委常委改选中落选。

1947 年 4 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9 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9 月 18 日,宋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上书面报告献出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约合法币 5000 亿元。20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10 月 1 日,宋到广州就职。11 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广东军管区司令。1948 年 8 月,又兼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区经济管制督导员。

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力图把华南变成反共基地,采取了某些"整理保警"、"强化兵役"的措施,声称国民党除了彻底投降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要同共产党继续战斗下去"②。

1949 年 1 月 21 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同一天,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政府委员、省主席及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职。24 日偕妻子张乐怡蛰居于香港,但仍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3 月,宋又专赴广州,监督验收到货的美国军械(他任内所订购),并为反共武装的招募、训练和部署出谋划策。4 月,又受蒋介石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第 1421—1425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 年第 7 卷,第 550 页,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 518 页。

的委托视察台湾，以便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拟订出顽抗方案。5 月 16 日，宋子文离香港飞赴法国。同年 6 月，赴美国安居。

宋子文是中共中央宣布的战犯之一。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宋拒赴台湾，长期住在美国纽约，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1963 年 2 月曾到台湾探亲一次。1971 年 4 月 25 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进晚餐，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终年 77 岁。

第十六章　张　　群

张群，字岳军，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四川省华阳县。父张汉霞，字星亭，母姚氏。张群幼年曾在家乡念私塾，学的是一些儒家典籍。后其父升官，全家迁至成都，张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知识、新思想，阅读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

1906年，张群决意投笔从戎，他携带其父给的60块银元作为旅费，北上参加保定陆军学校的考试，并被录取。在校一年多，旋于1908年考取赴日留学生，进入日本军部办的一所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学校学习。此时，张群与同在该校学习的蒋介石相识。据张群后来回忆，“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①。在东京，张群与蒋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完成了振武学校预备课程后，张群与蒋介石到日本新潟高田的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在日本各见习营的中国士官生纷纷离开日本回国。张群与蒋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参加了陈

① 《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页。

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于11月4日组成了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长为蒋介石。1912年春，张群升任营长。这一时期，张群与蒋介石、黄郛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

1912年10月，张群在上海与马育英结婚。马与张群同岁，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两人生有二子二女，长女幼时夭折，存二子一女，长子名继正，次子名继忠，次女名亚兰。

辛亥革命后，张群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希望到国外去留学，继续读书深造。在北京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支持下，张群在婚后不久携夫人北上天津，准备由陆路前往英国。但是，此时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打压国民党，袁世凯派出杀手南下，准备刺杀国民党要人。在天津的黄郛得知这一情况，担心在上海的陈其美的安全，遂遣张群于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报告。之后，张群转往南京，准备搭乘津浦铁路返回天津时，听到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遇刺的消息。

宋教仁遇刺身亡，使国内舆论大哗。孙中山由日本返国，认为"非去袁不可"，力主兴师讨袁。"二次革命"于7月发动。张群在陈其美催促下，放弃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参加"二次革命"，任上海讨袁军副团长（总司令是陈其美，团长是蒋介石）。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大肆搜捕国民党人，张群携夫人和其他国民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恰巧日本政府宣布保留辛亥

年在日本联队的士官生的学籍，张群于1914年再度入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翌年毕业。因为国内袁世凯正阴谋复辟帝制，回国不大可能，加上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迫使袁世凯接受，使中国人在日本生活有不安全感，所以张群应友人之邀，到南洋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独立后改名为雅加达 Jakarta)的中华学校教书，暂避风头。

1915年12月，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袁，发动护国运动。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讨袁。张群此时响应护国运动，从爪哇回国，投身反袁，曾任国民党浙军参谋官。

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通过“西原借款”等善后大借款，大肆出卖主权，遭到国人谴责。张群积极参与反对段祺瑞借款的活动。他代表上海的两家报社《中华新报》和《民国日报》，参加上海新闻记者访日团到日本，进行反对借款的活动。张群凭借曾在日本军校读过书、与日本军方人士有过接触的条件，与当时的日本参谋部次官、中将田中义一进行了交谈。张群问田中，日本为什么要帮助段祺瑞？田中回答说，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总理，因为“中日亲善”，段现在没有钱，没有力量，而中国要参加欧战，必须增强实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给他。张群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不是看错人吗！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军阀的派系多，互相混战，如果这一派的势力增强了，使他有了凭借，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内战，使中国内战不休，更贫更弱，这哪里

算是帮助中国呢?[1]张群与田中的谈话不欢而散。西原借款最终签订。张群回国后在《中华新报》上发表文章《中日亲善的疑云》,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作为国民党员的张群到广州在大元帅府任参军。翌年4月,在政学会的策划下,桂滇军阀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大元帅首领制为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并愤而辞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张群则继续留在广州,于8月间被任命为军政府政务厅的副官长。1920年,受命前去四川,调解四川督军熊克武和省长杨庶堪的不和,后留下任四川警务处长兼成都警察厅长。1921年,西南军阀纠纷再起,张群调处失败,遂离川赴上海闲居一年有余。1924年初,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写信叫张群前去广东,他借故推托。这时期,张群的好友黄郛深得北洋政府徐世昌的信任,于是张群前往北京和黄郛在北洋政府中共事。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由于黄郛的关系,张群投身冯玉祥的国民军,来到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那里。不久,任河南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以及开封警察厅长。这段时间,张群和在广东的蒋介石经常保持联系。1925年,应蒋介石之约,张群离开河南到广东参加北伐,从此开始与蒋共事,成为蒋的一位重要谋臣。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张群成为南昌司令部的总参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群在上海积极协助蒋。他和新任上海市长黄郛密切合作,通过政治交易为蒋介石获取工商界的支持。8月13

① 《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2页。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到日本考察军事和外交,张群作为翻译官陪同前往。蒋在日本会见了田中义一等政界军界要人。田中在言谈中表露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意。1928年1月,蒋介石通电宣告复职。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继续进行北伐。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兼陆军部政务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和同济大学校长。

北伐军进军山东,触及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为避免出现直接的冲突,张群负命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5月4日,张群抵达东京时,才知道在前一天发生了济南惨案,日军肆意屠杀中国军民。5月5日,张群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稍后,日方决定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作为谈判代表前往济南。张群迅即回国,13日抵上海。蒋介石决定张群作为中方代表与松井交涉,所采取的方针是"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1]。张群与松井在济南南边的党家庄会谈,几番交涉,无有进展。日军仍驻留济南,国民党军妥协退让,绕道北上。

1928年6月,北伐结束。此后,张群再次衔命赴日。他在与田中义一会见时表示,蒋介石即将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表面上的统一。次年3月,张群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接替黄郛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至1931年。任内,在上海市区设施建设上有所建树。这期间,在国

---

[1]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3年版,第42页。

民党军阀大混战中，张群始终协助蒋介石对付各路反蒋势力，以巩固其地位。1930 年 5 月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联手反蒋，蒋地位危急。而张学良坐镇东北，静观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派张群和吴铁城前往东北，游说张学良。张决意倒向蒋，9 月 18 日，发出拥蒋通电，随即派兵入关。蒋介石最终在中原大战中取胜，进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领了东三省。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张群此时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是年冬，张群到武汉，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

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又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 年初，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承德，并向长城各口进犯，平津危急。国民党政府一心"剿共"，对日寇的进攻采取妥协的政策。5 月 3 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张群为协助黄郛，与之一同前往北平。22 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达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5 月 31 日，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派熊斌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从 1933 年中到 1935 年底，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期间

为稳定华中,他在湖北推行了以下几项工作:赈灾、调整税率、促进地方工业、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行政效率、选拔县长 、召集省参议会等。

1935 年 11 月 12 至 23 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此时国难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高涨。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讲,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表明国民党的对日外交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大会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 12 月 16 日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从此至 1937 年 12 月 25 日,张群任外交部长职一年两个月又十天。

张群此时担任外交部长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利用他与日本的渊源,"希望透过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①。就任的第三天,张群就外交方针发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利,即东亚和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安,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张群表示:"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速经由正当途径,

① 《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版,第 26 页。

开诚协议。"① 本着这一方针，张群一改前任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动与日方谈判，以求中日关系的全面调整。在任期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进行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竭力与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谈判首先涉及的一是华北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广田三原则"问题。1935 年 12 月 20 日，张群与有吉进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表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商谈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有吉提出要国民政府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当即拒绝。关于"广田三原则"，有吉表示，蒋介石已于上月 20 日表示无条件的赞同②，问张群意见如何。张群答道："蒋委员长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无从提出对案，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讨之意。"此后，张群又特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否认所谓蒋介石无条件赞成三原则的说法。

1936 年 2 月 7 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从 3 月 16 至 19 日，张群与有田在南京举行 4 次会谈。16 日第一次会谈历时三小时。张群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

---

① 《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版，第 75—76 页。

② 蒋介石在会见有吉时说：予对三原则全然同意，无何等对案，甚望及早商讨具体实施办法。又称：但广田三原则与华北关系密切，如华北发生事故，三原则中之一、二两项自皆无由商谈及实行。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周刊社出版，第 224 页。

非其时。张群又称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次会谈没有结果。17日的第二次会谈,有田提出“广田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并声明整个的立场和见解。18日的会谈,有田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见解。1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后发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张群与有田4次会谈虽无结果,但气氛改善了许多。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也较前有所缓和。据张群的外交报告称:“经此四次谈话之后,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而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①]有田在华任期不足一个月,3月24日广田内阁组成,有田任外相。随后,日本任命其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6月下旬川越来华。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间,日本加强在华北的驻军,日军在天津人数由2000多人骤增至8000多人。北平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之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张群与川越于9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至12月3日共会谈8次。第一次会谈开始,张群主张先谈蓉案(成都事件),不与调整问题混为一谈。但川越认为蓉案不难解决,若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许日本在

① 《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群委员外交报告》(1936年7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第663页。

长江驻兵；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交流。张群予以拒绝。然而，日本并不罢休，9月23日在第三次会谈中，川越又强硬地提出极苛刻的7项要求：(1)取缔排日问题；(2)华北问题；(3)共同防共问题；(4)减低入口税问题；(5)上海至福冈间通航问题；(6)聘用日籍顾问问题；(7)取缔朝鲜人问题。张群在与蒋介石商议后，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逐项予以批驳。此后，张群与川越竭力周旋，谈判几濒破裂。11月绥远战事发生，谈判停止。

张群与日方谈判坚持强硬态度，改变了以往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这在国民党政府对外交往中是罕见的。张群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应予肯定。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群被攻击为亲日派。1937年2月25日，张群向蒋介石提出辞呈。3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王宠惠继任外交部长，张群改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开始后，张群于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2月，日军进攻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张群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行政院于1938年1月进行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去世，国民政府准备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四川军阀反对未果。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张群任秘书长。1940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直至抗战胜利，为民国时期任四川省主席时间最长者。

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谈判。经

过40天会谈,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张群在协定上签了字。12月底,国民党接受中共就无条件停止内战举行商谈的提议,派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翌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张群又与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向各自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

根据停战协议,1月7日正式组成三人小组,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参加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10日,张群与周恩来又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张群为国民党8名代表之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均遭践踏。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内战开始。

此时,张群为医治耳后肿瘤赴美国诊治。在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接触。回国途中在日本停留三日。

1947年4月,国民党在召集"制宪国大"后改组政府,18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名单,张群任行政院长。在任期间,张群政治上积极贯彻蒋介石"戡乱建国"方针,网罗一些小党派推行所谓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整理税则和鼓励生产等措施。进入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展开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为挽救危机,欺骗世人,国民党于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行宪国大",中心议题是选举正副总统。会间,蒋介石表示无意竞选总统,实则嫌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张群明了蒋的用意,遂串联各方人士提

出一项“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并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通过。由此，蒋介石接受提名并当选总统。5月，张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政。

1948年8月21日至9月13日，张群携夫人赴日访问。其间在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了4次会晤，内容涉及战后日本政治走向、东亚局势和中国内战的形势等。张群还走访日本各主要城市，与日本各界首要人物见面，大致了解了战后日本的基本情况。回国后，他在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日本观感》的讲话，介绍了战后日本的情况。他表示：“日本大多数人民业已在战争经验中觉悟到好战精神的无效，日本人民业已在占领时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权力业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无从再度抬头。”“我们应该抛弃消极的无益的猜疑恐惧和批评指摘。我们应该对日本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积极的对日政策。”①

从日本回国后，张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在国共和谈之前，张群曾被提名为和谈代表，但因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包括张群在内，故未能成为和谈代表。1949年春，张群飞赴重庆，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策划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8日张群携蒋命飞赴昆明，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反共到底。当晚，卢汉将张群等人扣下，并于次日发表通电起义。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此时国民党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要求卢汉释放张群等人。11日，张群获释并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赴香

①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3年版，第119页。

港,中途遇雨转飞越南海防,而后抵达香港。21日乘船到台湾。

张群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以"总统府"资政。1950年初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同年又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翌年兼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张群还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部第一小组组长。

由于张群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继续充当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顾问,并多次访问日本。1952年8月,张群在台湾主持成立所谓"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之后赴日访问,洽商台湾与日本的合作问题。1954年5月,蒋介石任命张群为"总统府"秘书长,协助蒋处理台湾内外事务。9月,张群访日,与日本商谈开发基金计划,并与日本首相岸信介发表联合声明。1963年5月和1964年8月,张群又两次访日,鼓吹"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他与日本的极右势力联系紧密,极力拉拢日本政界人士,如岸信介、吉田茂等人,以改善和加强日台关系,阻挠日本与新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64年8月,他还访问了韩国与当时的总统朴正熙举行了会谈。汉城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5年12月,张群作为"特使"赴梵蒂冈,出席天主教教廷大公会议闭幕典礼。之后,又访问欧、亚14国,27个城市,为台湾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而积极活动。

1972年5月,张群向蒋介石提出依例自退,蒋仍命其为"总统府"资政。1974年7月6日,张群妻马育英因心脏病不治在台北去世,终年86岁。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张群表示"痛苦的心情,是不能以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在台北授予张群中山奖章,蒋经国宣读功绩词并亲自为张群佩戴中山奖章。

张群晚年精神矍铄，擅长养生之道，其所著《谈修养》一书，在台湾印行了9版。该书有养身、养心、养量、养气等章。

张群一生与日本有很深的瓜葛。晚年他著有《我与日本七十年》一书，全面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90年12月14日上午，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1岁。张群去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于15日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第十七章　何　应　钦

何应钦，字敬之。1890年4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生于贵州兴义县泥凼村（今贵州省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泥凼区泥凼乡风波湾）。祖籍江西临川，清咸丰初年移居兴义。祖上为兴义“八大富户之一”。其父何其敏，字明论，业商。母史氏，出身“邑之望族”。何应钦共有五弟兄六姊妹。同胞五弟兄依次为应祯、应禄、应钦、辑五（应瑞）、应炳（纵炎）。

何应钦7岁入乡塾，后入贵阳陆军小学。1909年春，被保送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秋，应陆军部考选留日学生，以第一名应选。1910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第11期。时蒋介石亦在该校学习，比何应钦高一期。同年加入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何应钦回国参加革命。1912年在陈英士沪军都督府任训练科一等科员，后在江苏陆军七师一旅三团任连长、营长。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参加讨袁。1913年，重赴日本继续学业。是年秋，正式进入日本士官学校27期步科学习，1916年毕业回国，任黔军第一师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次年4月，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文选）、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在贵阳结婚。7月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11月，就任黔军第五团团长。

1918年创办少年贵州会，任主任理事。

1920年1月，何应钦就任贵州步骑炮工兵学校校长，后任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警察旅旅长、贵阳警备司令兼靖国联军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沪被刺身亡，卢焘就任黔军总司令，何兼参谋长。12月，何应钦被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谷正伦及警卫团团长排挤，辞去本兼各职，离黔去滇。在昆明，何被刺受伤。1923年秋，恢复健康。

1924年2月，何应钦由沪赴穗。时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蒋引荐，何晋见孙中山，被派为大本营军事参议，协助蒋介石筹办建校事宜。5月，被任为军校总教官。10月，参与平定广州商团暴乱，被任命为军校教导团团长、代理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2月，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先后攻占东莞、平湖、淡水。3月13日，与陈炯明部林虎军万余人激战于棉湖，取得胜利，史称“棉湖之役”。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决：以军校教导团成立党军。何应钦兼任党军第一旅旅长。5至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6月，党军扩充，何应钦升任党军第一师师长。7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兼任主席，何应钦等为委员。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9月至年底，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东征军总指挥为蒋介石，何任第一纵队纵队长。10月14日，攻占陈炯明的老巢惠州。之后占海丰，克河婆，收复潮汕。

1926年1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就任第一军军长职。3月的中山舰事件，5月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何都参与预谋。中山舰事件后，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何奉命防守潮梅地区，任

潮梅警备司令。9 月 17 日，率军北进。10 月 10 日，攻克永定。16 日，蒋介石任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以进取闽、浙。11 月 8 日克漳州。12 月，占福州，闽局底定，何率部兼程入浙。

1927 年 1 月，国民革命军决定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方略，将作战部队划分为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三路并进。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1 月 28 日，离闽赴浙。3 月，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克南京。3 月 25 日，何应钦率第四纵队进驻南京。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将革命军的二、六军调到长江以北作战，只允许第六军留 3 个团在南京维持治安。4 月 9 日，何应钦为配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夜在南京解除了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率领留驻南京的 3 个团的武装，并下令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 日，蒋介石等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8 月 13 日，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宣布下野。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 3 人把持军政大权。25 日夜，孙传芳部突由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处，向乌龙山、栖霞山及龙潭一带的蒋桂军进攻。至 31 日，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配合下，何应钦赴前线，指挥所部歼灭孙军 6 万余人，史称“龙潭战役”。是月，宁汉沪三方合流，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何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并专任第一路军总指挥。10 月，军事委员会决定西征北伐，双管齐下。何部第一路军及白崇禧部第二路军担任北伐，沿津浦路北进。11 月，连克蚌埠、宿迁等地。12 月 7 日，何赴津浦前线，指挥各军，会攻徐州。16 日，攻克徐州。20 日，何在徐州与鹿钟麟、刘峙、顾祝同等一起电请蒋介石复职。

1928 年 1 月 4 日，蒋介石正式复职。2 月 9 日，蒋介石赴徐

州，改编第一路军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兼总司令。撤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职。22日，任命何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南京。4月，蒋介石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10月，何任国民政府委员。11月，任训练总监。1929年1月，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何应钦在会上作报告。2月3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国军编遣实施之意义》，何说“要挽救国家的危亡”，“要实现真正的统一”，“要根本消灭内战”，“要充实国防力量”都“不能不编遣军队”。这是“救国建国的先决问题”①。15日，就任中央编遣主任。何提出的充分体现蒋介石旨意的强调“统一”、“集中”的编遣方案，遭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反对。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4月，桂系失败。5月，何任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整顿两湖党务及改编桂系残部。10月，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由潼关出兵讨蒋。11月12日，何赴太原，收买阎反冯。并坐镇开封，指挥蒋军，击败冯军。是月，张发奎与驻广西的桂军联合反蒋，何任广州行营主任，赴粤主持指挥讨伐张桂联军。12月19日，张桂联军失败。20日，何返抵南京。是月，蒋唐战争爆发。蒋要何赴武汉，主持讨唐（生智）军事。1930年1月，何指挥所部，击溃唐生智主力。10日，就任全国童子军总司令。3月10日，任军政部长。4月初，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何兼武汉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粤各军，对阎、冯、桂军作战。10月，中原大战结束，阎、冯、桂军失败。蒋又派何为郑州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及西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12页。

北善后事宜。之后,何应钦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1931年2月至1933年2月参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五次"围剿"中的第二、三、四次"围剿"。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守,引咎辞职,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抵北平接替张学良。下旬,正值长城抗战紧张之际,何应钦一面调兵支援,一面接连会晤美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外交使节,谋求外交解决。4月底至5月初,何应钦与日军谈判停战事宜,与蒋介石、汪精卫等频繁交换意见,接受蒋、汪对日妥协的指示。5月17日,何通过助手熊斌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军进行谈判。31日,签订《塘沽协定》。9月下旬,何应钦派兵围攻扼杀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1月31日,何应钦指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启程赴大滩(今河北沽源县内)。2月2日,与日军代表谷寿夫在大滩会谈,口头答应日方无理条件,成立"大滩口约"。3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何应钦等为陆军一级上将。5月29日,何在北平居仁堂第一次接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大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开始何梅谈判。6月4日、9日又两次与酒井、高桥谈判,口头承诺了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7月6日,为答复日方6月9日提出的备忘录,给梅津美治郎一个打字油印书面便函,承认"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①。这一纸便函连同日方6月9日提交的备忘录所提的九项条件及三项附带条

① 转引自熊宗仁:《何应钦传》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件，史称《何梅协定》。11 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大，何应钦在大会上报告塘沽协定、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处理经过。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 月，何应钦继任军政部长。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发生。9 月，何应钦奉派为广州行营主任，负责处理两广善后事宜。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何应钦在家中召集国民党要人会商对策。当晚 11 时半，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两会作出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玉祥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并决定由国民政府发表对张学良的褫职严办令。16 日，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杨。17 日，何应钦就职，并任命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下令中央军向前推进，国民党空军轰炸渭南等地。18 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令何应钦暂时停战的手谕抵南京。何应钦命令国民党空军暂停轰炸，但仍不放弃“讨伐”主张。25 日，在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前提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9 日，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部撤销。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7、8 月间，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国民党军事机关长官汇报会议，研究对日抗战问题。8 月 6 日，何应钦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2 日，国防会议在南京举行，议决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分设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部，何应钦仍任军政部长。13 日，日军进攻上海。10 月 30 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1938 年 1 月 10 日，国防会议特任何应钦兼军事委员会参

谋总长，24 日，何应钦以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身份，判处在山东抗命不战而退的前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死刑，在汉口执行枪决。4 月下旬，主持江防会议，并参与指导徐州会战。6 月中旬，参与指导武汉会战。11 月 25 日，出席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是年冬，何应钦依据南岳军事会议决定，提出军队整顿方案，着重编成、装备、技术三项，要求加紧实施，增进军队战斗力。

1940 年 3 月 20 日，主持全国第三次兵役会议。10 月 19 日，与白崇禧联名发表皓电，限八路军在黄河以南部队于 11 月底撤至黄河以北；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12 月 8 日，何应钦发出齐电，次日又下达“展限命令”，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务于 12 月底前分别撤至黄河以北和长江以北。并在此前已部署顾祝同、上官云相在皖南伏击北移的新四军。1941 年 1 月 4 日，顾祝同、上官云相伏击新四军皖南部队及军部共约 9000 余人，制造了皖南事变。4 月 9 日，何应钦在西安召集高级将领，商讨包围陕甘宁边区事宜。5 月 1 日，滇缅公路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何督饬努力打开滇缅交通，准备接运美援物资。10 月，出席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12 月 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12 月 23 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中、美、英各国军事代表会议，何应钦出席会议，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

1942 年 1 月 3 日，盟军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任最高统帅；何应钦命令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协防。4 月 16 日，何在中央广播电台以《中国必胜》为题，向沦陷区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呼吁沦陷区同胞，在敌后组织游击队奋起抗敌。19 日，指导入缅远征军攻克缅甸仁安羌，击破日军，救出被围之英军 9000 余人。1943

年2月至3月初，何应钦由渝飞印度，视察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新德里发表演说检讨战局，并与驻印英军司令官举行谈判。4月5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应钦到会发表《建国与青年》的演讲。5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颁赠何应钦司令勋章及奖状，后由史迪威代为颁赠。10月18日，出席蒋介石邀集的英、美高级将领蒙巴顿、史迪威、索姆威尔等人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讨军事合作及对日作战计划。1944年1月20日，何应钦指导缅北会战，中国远征军攻入胡康河谷。4月至8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一号攻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败。9月上旬，何指导桂柳会战，并亲赴贵阳，指挥贵州保卫战。至10月，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11月20日，何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同时辞去军政部长兼职。12月2日，独山沦陷，何应钦指挥汤恩伯部，向日军反击。6日克三合，8日克独山，使贵阳转危为安。25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司令部在昆明成立。28日，行政院训令贵州省党政统归何应钦指导。

1945年1月20日，中国远征军克滇西重镇畹町。次日，何应钦抵畹町前线视察。30日，中印公路重开。2月28日，何应钦偕总司令部顾问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少将飞抵缅北战场，与印缅战区盟军司令索尔顿将军晤商中美作战联系诸事宜。3月15日，何应钦偕麦克鲁将军视察滇南各部队。4月9日，日军为减轻中美空军的威胁，发动湘西会战，企图破坏芷江机场。次日，何应钦与中、美将领10余人，赴湘西前线视察。下旬，何应钦指挥中国军队反攻桂、柳。5月27日克南宁，29日克柳州。7月上旬，制定反攻广州作战计划，并即完成部署。28日，收复桂林。桂、柳

反攻作战一结束，何就将指挥所移驻南宁，指挥部队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攻。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接受波茨坦宣言。蒋介石当天电令何应钦，指示对各战区日本投降应注意之事项。12日，何由南宁飞抵昆明。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并接受蒋介石关于受降的指示。14日，何应钦主持拟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现阶段之任务案，及接受日军投降计划与兵力调动等案。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20日，何应钦由重庆飞抵湖南芷江。21至23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谈判代表今井武夫抵芷江与何应钦等会谈日军投降各事宜。25日，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何应钦分电各受降指挥官，规定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等。排斥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参加受降。8月27日至9月4日，先后飞赴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重庆、昆明等地，指示各地国民党军受降事宜。29日，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本》，要求遵照《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9月5日，国民党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在芷江成立，何应钦兼主任委员，负责指导监督收复区的党政接收事宜。9日，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无条件投降签字典礼，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投降。10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任命其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10月1日，何应钦下令拘捕在南京的汉奸梅思平等52人，在沪、杭等地的汉奸温宗尧、项致庄、丁默邨等人，亦同时被捕。同日，经南宁飞抵越南视察。10日，何应钦获国民政府颁授的胜利勋章。14日，飞赴蚌

埠、徐州、郑州、开封视察。17日，何应钦令第七十军开赴台湾，展开接收日军受降工作。其后飞抵南昌、广州、海南岛、汕头、广西、江西、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视察受降工作。11月11日，在重庆主持复员整军会议，报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办理受降经过概要。

1946年2月15日，何主持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东南区军事复员会议。3月4日，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并报告受降经过。4月20日，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何应钦在大典上发表广播讲演。3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宣布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同日决议：裁撤军委会，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掌管军政、军令事项，并特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6月1日，解除何应钦参谋总长及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职务。7月1日，何应钦就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职。12日，由沪飞美。29日，拜会美国总统杜鲁门。31日赴纽约莅任。11月15日，结束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兼职。21日，访问墨西哥。

1947年1月3日，应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布克曼博士之邀，赴加拿大出席会议。2月3日，抵华盛顿访晤美国务卿马歇尔。其后多次主持军参团会议。3月28日，赴华盛顿，晤韩国临时主席李承晚。4月2日，接蒋介石电：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于4月1日成立，任何应钦为主任。未到任前，由龙云暂代。6月2至6日，赴底特律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并演讲。其后于10月3日、12月31日，分赴麦金诺岛和弗吉尼亚州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9月16日，出席联合国第二届大会开幕

典礼。

1948年3月21日，被召回国，4月1日抵南京，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2日，于右任、何应钦等85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5月31日，行政院长翁文灏提请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6月3日，正式就职。4日，通电国民党军将士，贯彻“戡乱建国”国策。8月3至7日，主持军事教育会议，讨论改进军事教育的问题。11月26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何应钦亦辞政务委员及国防部长兼职。

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面临绝境。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6日，在何应钦等人的庇护下，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战犯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3月上旬，何应钦被指定与孙科、张群、吴忠信、朱家骅、吴铁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钟天心等10人，研究并起草国共和谈方案。12日，代总统李宗仁提名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此前，蒋介石亲笔致函何应钦，敦劝出任。15日，何抵南京，积极筹备组阁。22日，新内阁组成。24日，举行第一次行政院会议，讨论和谈问题。29日，主持行政院临时院会，组成“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等。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举行。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由黄绍竑携带该方案返南京请示。20日，拒绝和平协定。拒和电文由李宗仁、何应钦署名。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20日子夜，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蒋军长江防线被摧毁。22日，奉蒋介石电召，飞抵杭州，讨论国是，改组国防部，何应钦兼任部长。国防部指挥全国陆、海、空军，参谋总长为国防部

长之幕僚长。23日上午离京飞沪转广州。下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政权宣告灭亡。5月21日，何应钦致函李宗仁代总统，申明辞去行政院院长之决心。6月3日，立法院同意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10日，阎锡山内阁组成。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1月6日，何应钦在台北寓所，接见《新闻观察》记者，自称“闭门思过”。记者询问其对目前军事、政治有何意见？何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 3月1日，蒋介石宣布在台湾行使总统职权。5月1日，何就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1951年1月，访问日本。16日，出席日本战友会副会长、前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的感谢宴会。冈村在致词中称何应钦为“对日本了解最深的友人，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②]。在日期间，多次发表以反共抗俄、台日联合反共为主旨的演讲。1952年4月28日，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中日双边和约”签字仪式。7月29日，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成立，何应钦为发起人，被推为常务理事。1954年元旦，以《反共抗俄必胜的道理》为题，发表元旦献词。3月22日，出席台湾“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10月27日，当选为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

1955年6月1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以《介绍民主自由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为题，说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宗旨与概况。22日，主持接待以美国“道德重整会”负责人为首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访问团。多次率团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040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047页。

会”。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据何应钦说,是美国卜克曼神学博士偶然受上帝的启示而创立的。何认定这一运动“基本精神是反共的”。这一运动所标榜的“绝对的忠诚,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无私,绝对的仁爱”这“四大标准”及“静思反省”、“从自己做起”的“实践方法”,“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产生共产主义的社会因素”。①

1961年9月,何应钦率《龙》剧(原名《答案》)团员及由36个国家和地区的“道德重整”代表组成的“国际部队”在瑞士鲁森市演出。10月,开始周游各国,先后赴联邦德国、英国、瑞典、挪威、丹麦等国演出。1962年,何应钦率《龙》剧团员赴美国巡回演出,鼓吹国际反共思想。

1963年5月6日,被选为台湾“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11月16日,何应钦发表声明,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发表的有利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讲话。1965年12月,日本天皇裕仁颁赠何应钦旭日大绶勋章。1966年11月17日,在第21届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前夕,何应钦发表声明,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也坚决反对“两个中国”。1971年7月30日,何发表《正视中共赤化日本之阴谋》一文,以反对中日关系正常化。9月21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何以台湾“联合国同志会”会长身份,致电本届联大主席马立克等,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

① 何应钦:《对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新认识》(1958年10月18日),《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345页。转引自熊宗仁著《何应钦传》(下册),第743页。

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27日，何应钦主持台湾"联合国同志会"临时理、监事会议，声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5月20日，蒋介石就任第五任台湾"总统"，何应钦发表《此时此地更需总统的领导》一文，称"今后如何扭转世局，冲破难关，挽回不利的情势，都期待总统明智的决策。故此时此地，更需要总统的领导"①。7月1日，战略顾问委员会被裁撤，何应钦改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8月10日，发表《忠告田中首相悬崖勒马》的演讲。9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4月28日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何应钦支持推选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7年12月1日，发表《河北事件中绝无〈何梅协定〉，请史学家及出版界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一文。1978年4月23日，夫人王文湘在台北病逝。

1979年3月，获蒋经国授予国光勋章。8月9日至9月1日，赴瑞士柯峰参加"世界道德重整大会"。

1981年3月29日至4月6日，出席台湾国民党十二大，连任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1月21日，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策划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1982年8月，发起成立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筹备会议。10月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401页。

22日,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何应钦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83年2月7日、1984年元旦,何应钦发表对大陆广播讲话,竭力鼓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1987年10月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终年98岁。



第十八章　李宗仁　白崇禧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人，1891年8月13日（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九）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6岁时，进入其父李培英的塾馆中读书；13岁进入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学习，两个学期后辍学。1908年冬，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同学中有黄绍竑、白崇禧等。

白崇禧，字健生①，广西临桂县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3月18日生。父亲白志书是个杂货店主。少年白崇禧性格刚烈，天资聪颖敏悟，5岁进私塾读书，14岁便以第六名的资格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不久，因患恶性疟疾而辍学，两年后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白崇禧参加广西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后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5年6月，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

李宗仁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就加入了同盟会外围组织"军事指针社"。1911年，暑假时他回家乡与李秀文完婚。北伐军离桂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校，李留校学习。1913年秋毕业，到

---

① 白崇禧原字剑生，外间多误为健生，而白氏也从不更正。

南宁将校讲习所，历任准尉见习官、少尉、中尉队附。次年春，因该校解散，李遂到桂林省立模范小学任军事教官兼体育教员。

1916年讨袁护国军兴，李宗仁应友人之邀，到滇军第四师当排长，不久转入护国军第六军(桂军)，仍任排长。6月随军参加讨龙(济光)战争，升任连长。1917年秋护法战争时，李随粤桂联军入湘作战，在绿田战斗中，他身中四弹，仍身先士卒，率部击溃迎面之敌。从此，李宗仁以其骁勇慓悍而闻名军中，绰号"李铁牛"。1918年升任营长。

1916年白崇禧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广西，在桂军第一师任见习官。次年夏，广西督办公署建立以马晓军为营长的模范营，白在该营任副连长，连长。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旧桂系土崩瓦解，马晓军通电拥护革命，被委任为"田南警备司令"，马将所部扩编为5个营，白崇禧任第一营营长。不久，部队为刘日福的广西自治军击溃，马晓军只身逃往南宁。白崇禧集合残部逃往黔桂边境一带，与刘部对峙。1921年底，刘部为粤军援兵击败，白率兵回师百色。其间白崇禧在一次夜间巡视中坠崖，跌断一腿，赴广州医治，因治疗不及时而致终生跛行。

李宗仁的运气比白崇禧好些。旧桂系崩溃之际，已升为统领的李宗仁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据险自保。不久，接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改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开往北流整训。1922年，粤军退出广西，八桂[1] 无主，各地自治军蜂起，各霸一方。混乱中，李宗仁乘机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玉林一带，树起"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的旗帜，后又派兵进驻贵县、容县。不久，黄绍

[1] 广西的代称。

竑率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加入李部，李宗仁实力增至三千人枪。

李宗仁占据玉林等七县地区后，采取整军经武、结纳豪强、和缓各方、安民自保的方针。他把部队编为三个支队，以李石愚、何武、黄绍竑分任支队司令。经过一年多的整顿，增至万余人马，“军容整肃”，“实力乃冠于各部”[①]，为日后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1922 年秋，陆荣廷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广西边防督办，东山再起。他力图改编李部，李宗仁虚以委蛇，只是改旗号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其他照旧。但李宗仁“安民自保”的做法，为黄绍竑所不满。黄决定以“假受编”的方式打入沈鸿英驻梧州部队，从中相机行事，夺取梧州。临行前，黄自作主张，带走了李部俞作柏、伍廷飏两营人马，李宗仁的亲信们纷纷要求派兵追击，但李还是容忍了黄的拆台之举，没有兵戎相见，因而获得了“器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②] 的好名声。

黄绍竑到梧州后，通过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与广东政府建立了联系，被孙中山委任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1923 年夏，黄部在粤军配合下，击败沈军，占领梧州，进而成立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崇禧为参谋长。同年秋，李宗仁也将独立旅改为“广西定桂军”。两军相互配合，击败了盘踞桂平、平南、横县、宾阳一带的自治军陆云高部。此后，李宗仁迁司令部于桂平。在此，他与桂平女子师范“校花”郭儒仙一见钟情，喜结鸳缘。婚后，李给儒仙改名为德洁。

①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1930 年上海版，第 345 页。
② 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7 辑，第 132 页。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分别占有广西最富庶地区梧州、玉林和浔州(桂平),与占领柳州、南宁的陆荣廷和占领桂东、桂东北的沈鸿英形成鼎足之势。1924 年 2 月,陆荣廷率数千人北巡,被沈鸿英围困在桂林三个月。李、黄、白决定将他们各个击破。1924 年 5 月 23 日,他们通电请陆下野,又兵分两路,出师讨陆,6 月 25 日占领南宁。进驻南宁后,黄绍竑手下悍将俞作柏怂恿黄以武力解决李宗仁所部,白崇禧闻讯,坚决反对。最终李、黄两部决定联合,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李宗仁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从此,李、白携手,时间长达 25 年之久。

联军成立后,决心统一广西。从 5 月至 8 月,消灭了陆荣廷所部 2 万余人 。9 月,陆荣廷通电下野,联军统一了广西大部,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12 月,广西"定桂讨贼军"撤销。胡汉民以孙中山的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绥靖会办兼广西陆军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为绥靖督办公署参谋长兼第二军参谋长。1925 年 2 月至 4 月,他们在粤军李济深师协助下,集全力讨伐沈鸿英,白崇禧率兵攻占桂林,沈鸿英从此一蹶不振。是年春,白崇禧在桂林与马佩璋结婚。5 月到 7 月,在粤军的帮助下,经昆仑关、沙埔两大战役,桂军将假道广西企图进攻广东的唐继尧部驱回云南。自此,李、黄、白统一了广西,开始了新桂系在广西长达 20 多年的统治。

在统一广西的各大战役中,白崇禧充分展示了他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小诸葛"的美誉。在统一广西期间,白、李、黄先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 年 1 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宗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

月，广东国民政府召开两广统一会议，决定将广西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命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

两广统一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6月下旬，李宗仁亲率第七军的4个旅约2万余人，会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进入湖南，援助时已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唐生智第八军，讨伐吴佩孚。7月初，广东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湖南前线的三路北伐大军对吴军发动正面进攻，11日克复长沙，22日占领岳州后，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上攻取武汉。在攻打武汉的战斗中，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指挥第四、七两军；先后参加汨罗河之战、贺胜桥之战及武昌攻城战。当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军相持不下，9月下旬，第七军被调往江西增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七军以寡敌众，三战三捷，连挫若溪、德安、王家铺之强敌，歼灭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等部，扭转了江西战局。当时蒋介石致电嘉勉李宗仁："兄弟孤军深入，屡摧强敌，赣局转危为安，实深利赖。"[1] 10月，李又指挥第七军和第四军，破敌于马回岭，肃清赣北残敌。江西底定后，1927年1月，李宗仁被蒋介石任命为中路江左军总指挥，东下攻取安徽，3月初进驻安庆，下旬占领南京。

在北伐战争中，白崇禧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协助蒋介石运筹帷幄，拟订作战方略，深得蒋介石的器重。北伐军占领南昌后，白出任追击部队总指挥，他率部星夜兼程，截断逃敌后路，俘获孙传芳部下郑俊彦部官兵3万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01页。

余人。1927年初,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2月攻占杭州;3月22日进占上海,兼任淞沪警备司令。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李宗仁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初,李宗仁抵达上海,参加蒋介石在龙华举行的"清党"秘密会议,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支持蒋介石的"清党"提案。4月12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派军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宁汉分裂期间,南京方面所辖部队继续"北伐"。李宗仁出任第三路总指挥,白崇禧出任第二路代总指挥,率领所部向北推进,与直鲁联军作战。先后攻下蚌埠、徐州等重镇,6月进入鲁南。但蒋介石为对付武汉方面东征之师,又令李宗仁将第七军撤到芜湖以西布防,致使徐州复失。8月初,蒋亲自指挥反攻徐州,又遭惨败。这时,李、白已拥有第七、第十三、第十九三个军,羽毛渐丰,他们不甘屈居蒋下,乘蒋在前线打了败仗,武汉方面又要求蒋下野,便联合何应钦"逼宫",责蒋"不宜因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①。

8月12日,蒋介石下野。李、白、何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8月下旬,孙传芳率部大举渡江南犯,占领龙潭、栖霞一带,南京危急。李、白、何指挥所部协力反击,全歼孙军渡江部队。这一胜利稳定了南京政局,提高了李、白的地位。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李宗仁、白崇禧出任特委会委员,以武力为后盾,操纵着特委

① 《晨报》1927年8月17、24日。

会。特委会遭到武汉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的反对。10月，南京当局决定西征讨唐，命令李宗仁、程潜率第三、第四两路军分江右、江左军直趋武汉。11月，唐生智兵败下野，残部退到湖南。1928年初，白崇禧前往汉口主持征湘计划，指挥西征军入湘作战，收编了唐部。两湖遂为李、白为首的桂系所控制。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为了稳定和利用实力派，他通过四中全会指定李、白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7日，蒋任命李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4月8日任命李、白为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蒋桂关系表面和缓。随后，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统率部分收编湘军，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6月，白部进入北平，9月歼灭直鲁联军残部，进驻唐山地区。10月，蒋改组南京政府，自任主席，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白崇禧则出任北平政治分会委员。

至此，李宗仁、白崇禧统率广西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镇南关打到了山海关”，势力急剧膨胀。白崇禧率十万军队，盘踞华北，企图操纵华北军政；李宗仁坐镇武汉，控制两湖，虎视长江下游；广西老巢由黄绍竑看守，联合广东的李济深，把持两广。李、白势力的膨胀，严重影响了蒋介石的统治。

1929年3月，为争夺湖南地盘，蒋桂矛盾激化，双方调兵遣将，战云密布。为了制服桂系，蒋介石设计把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拆散两广联盟。同时重新起用唐生智，令其策动在冀东的旧部叛离白崇禧，白只身逃回广西。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发。随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开除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在湖北前线，蒋介石收

买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桂军仓皇西撤,在鄂中、鄂西一带被包围、收编。

李宗仁不甘心失败,潜回广西决定攻粤反蒋。5月5日,他组织南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反蒋通电,所部由黄绍竑、白崇禧率领进兵广东,但在花县为粤军击败。6月7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区主任。李、黄、白见大势已去,遂通电下野,于6月底出走香港,蒋桂战争结束。

1929年9月,国民党改组派发起"护党救国"运动,策动张发奎、俞作柏、李明瑞等起兵反蒋。10月,俞、李反蒋失败,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乘机重返广西。出于反蒋的共同利益,他们与汪精卫、张发奎携手,决定共同出兵攻粤。11月,李宗仁在南宁就任汪以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会名义任命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黄为副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为前敌总指挥。张发奎部也归李节制。11月底,张、桂军分道袭取广州,与蒋、粤军激战于花县,失败后退回广西。

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李宗仁通电响应,被推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桂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李兼总司令。白崇禧任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长。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白、张等决定放弃广西,倾巢入湘,北上攻取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22日,李、白、张率军分三路入湘,至6月初,先后占领衡阳、长沙、岳州,前锋进入湖北。但后续部队因黄绍竑不愿放弃广西地盘,进兵迟缓,以至后路交通重地衡阳为粤军占领,张、桂军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李、白、张被迫回师,与黄会攻衡阳失利,只得于7月初全军退回广西。接着,湘军进驻全州,粤军占领梧州,滇军包围南宁,桂军四面楚歌。黄绍竑心灰意冷,反对继

续内战，脱离桂系。但李宗仁仍不肯屈服，他任命白为副手，退驻柳州，重整军队，择要固守，抱着半个残破的广西苦苦挣扎。

1931年5月，陈济棠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被蒋介石幽禁汤山为借口，在广州树起了反蒋旗帜。李宗仁率部通电响应，于是，桂、粤通款言和，粤军撤回广东。27日，不愿与南京合作的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李当选为"非常会议"和"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桂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李、白分任总、副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与粤、桂和好，广州国民政府自行解散，另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年底，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白分别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以后数年，西南处于半独立状态。1932年4月，李、白分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他们以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相标榜，锐意经营广西，准备应变。当时，李宗仁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的名义常驻广州，与陈济棠分掌西南政务委员会实权。广西的军政则由白崇禧主持。为了维持他们在广西的统治，李、白在桂系中建立了秘密组织。1930年，李、白和张发奎联合组织以他们三人为常务干事的"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青年军团"。1932年春，张发奎率部离桂，该组织改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1934年秋，又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均由李、白任正、副会长；会员都必须向他俩宣誓效忠。同时，他们还发起一场"广西建设运动"，在省内实行军政改革。改革中心环节是建立"新型"的民团制度。白崇禧亲任广西民团总司令，负责全省民团建

设事务。为了达到全省军事化的目的,白崇禧推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力图使广西每一名壮丁都成为训练有素的士兵。同时,民团组织还担负在基层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建设的任务。民团指挥官兼任乡、村长,学校校长。白崇禧在广西推行的新民团制度,既成功地树立起广西的新历史形象——强悍、好战、坚韧,充满军国主义气氛,使广西成为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也使广西赢得"模范省"的称号。李、白成为全国著名的干练的行政官员。[①] 新民团制度在客观上也起了为抗日战争做准备的作用。截止 1937 年,受训"团兵"达 130 万。抗战爆发后,广西在两年内,先后征调壮丁 40 万开赴前线御敌,成为我国最大的兵源基地之一。[②]

在抗日问题上,李、白是国民党内的坚决抗战派。九一八事变后,李宗仁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6 年 4 月 17 日,他在广州发表谈话,呼吁"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③],倡导"焦土抗战"。此后,李、白又发表了《焦土抗战与民族复兴》、《抗日救国》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他们的基本主张,即在政治上为了发动举国一致的对日战争,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不怕牺牲,纵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与日寇血战到底。在军事上,必须是总动员的全面战,而非局部战;是主动的进攻战,而非单纯的防御战;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长期消

① 南宁《民国日报》,1935 年 1 月 19 日。

② 卢豫东:《中国抗战军事发展史》,1941 年版,第 217 页。

③ 李宗仁:《我对于中日问题的观察和主张》,《南宁民国日报》1936 年 4 月 18 日。

耗战，而非速决战。用白的话说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①。

1936年夏，胡汉民病故，蒋介石企图分裂两广，然后各个消灭。6月1日，李、白与陈济棠联合，发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两广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总、副司令，出兵湘南。9月，蒋桂冲突和平解决，桂军被改编为第五路军，李、白分任正、副总指挥。在西安事变中，李、白主张政治解决事变，同时联名致电周恩来，赞成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4日白崇禧飞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和航空委员会委员。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不久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至此，李、白与国民党中央携手，一致对日作战。

李宗仁到达徐州后不久，南京失守，中日战争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在此，李出色地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自卫战——徐州会战。会战中，李宗仁抓住敌军骄狂的弱点，以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术与敌周旋。在津浦线南段，李指挥各部取“敌进我退，敌退我打”的作战方法与日军纠缠，将强敌阻于淮河南岸。在津浦线北段，李宗仁在白崇禧的协助策划下，打防御战中的进攻战，设法歼敌。先在临沂，以庞炳勋、张自忠部两败敌板垣师团，继而又利用敌矶谷师团轻敌孤军深入的错误，捕捉战机，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在台儿庄地区歼敌万余，取得中日开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空前胜利。

①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徐州失守后，武汉会战打响，李宗仁率五战区各部队驻防大别山地区，担负长江以北的作战任务。会战中，李宗仁患牙疾住院，白崇禧代理五战区司令职务。白以消耗战的作战方针，指挥各部"据险而守，乘时而攻"，尽量阻滞日军进攻武汉的步伐。在广济争夺战中，歼敌两千。

武汉失守后，李宗仁率五战区主力退守鄂西北桐柏山、大洪山两个战略据点。他先后参加指挥了三次随枣会战，豫南、鄂北诸战役。1943年9月，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指挥第一、第五、第十等三个战区。

白崇禧1938年11月兼任桂林行营主任，统一指挥长江以南的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1939年日军进犯广西时，白亲自指挥了桂南会战，取得毙敌中村正雄旅团长，歼敌5000的昆仑关大捷。但在昆仑关战役中，蒋介石的机械化主力部队第五军损失惨重，无力反攻，白未能按命令将日军赶出广西，被召回重庆。自此以后一直到战争结束，他担任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全国伊斯兰教救国同盟主席。

1940年10月和12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给朱德、叶挺先后发出皓电和齐电，限令新四军北撤，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1947年3月，台湾人民发动二二八武装起义后，白受命前往"宣慰"。他调集大批"国军"入台，镇压了起义。11月，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围攻已挺进到大别山的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

李宗仁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他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10月，调傅作义部攻占了张家口。

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经失望，有意以李宗仁为"换马"对象。9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答复美国国务院征询时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宗仁决定参加1948年3月"行宪国大"副总统的竞选。1948年3月22日，李由北平飞抵上海，向中外记者表示，如果当选副总统，将尽力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

3月29日，"国民大会"正式开场。蒋介石把李宗仁参加竞选视为插入他心口的"一把利刃"②，先是以国民党员参加竞选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劝"李退出，未遂，便发动CC系和黄埔系支持孙科竞选。李不甘示弱，组织庞大的竞选班子，到处演说，略谓："本人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动机，一为倡导民主风气，二是基于对国家之责任感，即愿作为人民与政府之桥梁"，表示要"清算豪门资本。"③ 甚至不惜血本请客拉选票，在南京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每日三餐，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此外，李宗仁、郭德洁夫妇还不停地到各代表寓所走访，递上名片，握手寒暄。

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99—300页。

② 梁开俊：《蒋李斗争内幕》，第6页。

③ 《广西日报》1948年4月12日。

两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票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无一人得票超过代表总额的半数,依选举法规定,必须继续进行选举。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亲自出马,想方设法扶孙抑李。李宗仁采纳黄绍竑提出的“以退为进”策略,25 日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由,宣布退出竞选,引起舆论大哗。蒋不得已,只好于 27 日召见白崇禧,请他劝说李重新参加竞选,并信誓旦旦说:“请各代表自由投票,不得假借主席名义,支持竞选者。”[①] 这时,李宗仁俨然成为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旗帜,凡二十年来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一边。29 日,李以微弱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李宗仁违背蒋介石意志,竞选副总统成功,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矛盾。6 月 1 日,蒋介石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调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要外放白。白乘机建议,认为守江必守淮,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设置一个单一的华中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而蒋介石则主张中原划分徐州“剿总”和武汉华中“剿总”两个战区,拒绝白的建议。白一气之下跑到上海,拒不就职。后来,黄绍竑奉蒋之命,前往上海劝白就职。黄开门见山地对白说:人家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不太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老蒋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后,把广西部队掌握起来,等老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届时德公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一听此话,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商谈后,6 月 16 日飞汉口就职。

---

① 《广西日报》,1948 年 4 月 28 日。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军主力丧失殆尽，蒋政权垮台已成定局。美国再次策动“和平”阴谋，企图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主持同共产党和谈。白崇禧于1948年12月向蒋发出通电，促蒋下野，并呼吁恢复同中共和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凄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就职后，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他积极进行“和谈”活动。可是，这仅是他的一厢情愿，蒋实际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溪口操纵一切。1月27日，李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此举遭到了国民党死硬派的反对。蒋介石策动行政院长孙科“迁府”广州，南京国民政府分裂。3月8日，孙科辞职，李宗仁与白崇禧磋商后，推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组阁。4月1日，南京李、何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黄绍竑等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谈判。经多日的反复协商，16日，黄绍竑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回南京请示。李、白等商议后，认为该案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拒绝接受。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23日胜利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李宗仁先退桂林，后去广州，继续组织国民党军队作垂死挣扎。在这期间，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在鄂、湘、赣三省被解放军击败，白率残部退回广西。10月4日，李宗仁在广州发表文告，叫嚷：“将始终不渝，彻底反共戡乱。”[1] 白则准备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建立最后立足点。10月至12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广

① 南宁《中央日报》，1949年10月4日。

西战役,全歼白崇禧残部于广西境内。至此,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全部消失。11 月,李宗仁逃往香港,12 月由香港飞美国。1950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李为形势所迫,定居美国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1954 年 3 月 10 日,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的副总统职。

白崇禧在所部被歼后逃往海南岛,后在蒋介石的劝诱下,又去了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6 年 12 月 2 日,73 岁的白崇禧因心脏病猝死于台北松山路寓所。

李宗仁晚年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从 1956 年 4 月到 1965 年 6 月的十年间,先后 5 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他回归祖国大陆作准备。1965 年 7 月 20 日,他与夫人郭德洁回到北京,并发表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 李宗仁回国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国后 8 个月,郭德洁病逝。不久,在旧友的关心下,李宗仁与胡友松结婚。1969 年 1 月 30 日,李宗仁因患肺气肿,在北京逝世,享年78 岁。

---

① 《人民日报》1965 年 7 月 21 日。

第十九章　曹　锟　吴佩孚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1862年12月12日（清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生。幼年入私塾读书，因家贫失学，以贩布为生。1882年参加淮军。1885年被保送进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分配到淮军提督宋庆的毅军中任哨官。1894年入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投奔袁世凯，任新军步军右翼第一营帮带，不久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1899年随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1902年升为北洋常备军右翼步兵第十一营管带，逐渐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1903年清廷组建京旗常备军，1904年成协，1905年扩充成镇。曹锟为该镇第一混成协第一任协统。1907年调署第三镇统制。从此跻身于北洋军高级将领的行列。同年出关驻守长春、昌图一带。因镇压人民"有功"，屡获清廷嘉奖，晋升为记名总兵。1911年4月授副都统。同年7月升任总兵，以提督候用。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74年4月22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日）生。幼年入私塾读书。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因闹事逃往北京，以卜卦算命为生。不久投淮军，先后进开平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受衔陆军中尉，派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1905年，因替日军刺探俄军情报获

日军“勋六等单光旭日章”,升上尉。1906年入北洋第三镇,先后任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管带。1908年任第三镇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曹锟奉命率第三镇入关,负责天津、北京、保定一线京畿外围防务。11月,吴佩孚因发现第三镇第三标标统准备哗变而受到曹锟提拔,继任第三标标统。1912年1月,曹锟因镇压施从云、王金铭等人领导的滦州起义,被誉为袁世凯身边的“赵子龙”。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宫成功,清帝退位。13日,孙中山辞职让位,请袁世凯南下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拒绝南下就职,于2月29日晚指使曹锟发动兵变,南京迎袁专使下榻之所亦受骚扰。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通电就职。袁达到了目的,曹锟因此受到嘉奖重用。是年秋,第三镇改为第三师,曹锟改任师长。9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12月28日,获袁世凯颁发的“白鹰勋章”。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发动反袁“二次革命”。曹锟积极参与镇压活动,为此1914年4月24日升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驻防岳州。

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9月,曹锟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请袁改变国体实行帝制。10月,曹锟被袁授以“虎威将军”称号。11月23日,曹锟再次通电,请总统早登帝位。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21日,袁下达“赐爵令”,曹被封为一等爵位。同年,吴佩孚被曹锟提升为第六旅少将旅长。

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反对。蔡锷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首先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战争。12月31日,袁世凯派

曹锟为行军总司令前去镇压。1916年1月5日，曹锟率军从湖南岳州出发，经洞庭湖，乘船而上进入四川。尽管曹锟所部在兵力、财力、武器装备上均优于护国军，但因纪律极坏，得不到当地人民支持，故屡战不胜。正当两军对峙之际，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声讨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24日任命曹锟会办四川军务。曹部进驻四川。

1916年7月，曹锟率军返回保定。9月16日任直隶督军。在段祺瑞支持下大募兵丁，将军队扩展为9个混成旅，6万余人，成为以后问鼎中央的资本。

1917年2、3月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因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争执。曹锟公开站在段祺瑞一边，参加"督军团"会议，宣布直隶独立。但暗地里他又同黎元洪保持联系。7月1日，张勋驱逐黎元洪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张，任命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沿京汉线北上。5日晨，曹锟第三师抵达芦沟桥和宛平县城，并占领涿州、良乡，同东路讨逆军形成合围态势。战事到12日结束，张勋本人逃到荷兰使馆避难。曹锟因"讨逆"有功，升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段祺瑞上台，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及西南各省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举起了"护法"大旗。段祺瑞主张对南方用兵，达到"武力统一"的目的。而直系主张对南"和平统一"，维持现状，以换取南方对中央的承认。1917年11月18日，曹锟同直系湖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联名通电，反对对南用兵，主张停战并愿从中进行调停。由于直系将领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受阻，段祺瑞本人也只好辞职。

此时北洋军中数曹锟实力最大，地盘离北京最近，一举一动对政局有很大影响，冯国璋、段祺瑞两人都想拉拢他。11 月 20 日，曹锟打电话给段祺瑞，说明 18 日的电报未经他本人同意签发，不负责任。段祺瑞抓住这一机会，以副总统一职为诱饵，要曹锟参加“主战”行列。为能当上副总统，曹锟在 21 日单独发表“马电”，提出以南方军队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条件。12 月 2 日，在天津督军团会议上表示愿率兵南下，战到最后一人亦所不顾。6 日，曹锟联合张怀芝等人通电请冯国璋颁发讨伐西南令。在皖系威逼下，15 日冯国璋令曹锟为攻湘第一路军总司令，由京汉线南下攻湘北。1918 年 1 月 30 日，曹锟又兼任两湖宣抚使。

1918 年 2 月 6 日，曹锟自天津南下在湖北孝感设南征大本营，在汉口刘园成立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署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率军入湘作战。3 月 27 日占领长沙。但北京政府却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而曹锟只获得一块“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得了一块“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以资鼓励。并有消息说段祺瑞拟以徐树铮代替曹锟为直隶督军。

湖南的胜利既没使曹锟当上副总统，也没让吴佩孚当湖南督军，反而要把已得的地盘、职位让出来。曹锟为此极其不满，4 月 4 日电辞两湖宣抚使，请假“养疴”。吴佩孚以饷械供应不及也按兵不动。5 月 29 日，曹锟离武汉回天津。为分化直系，6 月 3 日，段祺瑞授吴佩孚“孚威将军”称号，以拆曹锟的台。19 日，曹锟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曹锟因冯国璋、段祺瑞均表示不当副总统，认定自己原来的副总统梦不会落空，故一改主和为主战，决定对南方继续用兵。

此次曹锟虽然主战，但不愿亲自出马。北京政府在 6 月 20

日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7 月 31 日，皖系倪嗣冲在督军团会议上建议副总统位留给对南作战有功人员，实际上是把副总统位给张作霖。曹锟的副总统梦再次落空。

8 月 7 日，吴佩孚在曹锟支持下致电江苏督军李纯，痛斥“武力统一”，指责安福国会。21 日又致电冯国璋，要他颁发罢战令。与他相配合，曹锟则接连不断地向北京政府催索欠饷。28 日，段祺瑞召集主战派密议对付曹、吴办法，决定催派奉系、皖系的军队前进，维持张敬尧的湘督地位。

之后，吴佩孚连发停战通电，博得一片赞扬声。为壮大反段声势，9 月 26 日，发表由吴佩孚起草，有南北双方将领签名的通电，要冯国璋颁发停战命令。

10 月 10 日冯国璋代总统职期满，徐世昌当上了大总统。而曹锟因研究系、旧交通系议员的抵制仍没当上副总统。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此间吴佩孚接连发通电“支持”学生斗争，反对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表示愿负重任移师对外。从此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中的风云人物，还获得了所谓“爱国将军”的称号。

1919 年秋冬之际，在曹锟串联下，直系的河北、江苏、湖北、江西四督和奉系的东三省结成反皖同盟。12 月 28 日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首领。吴佩孚因打下的地盘被皖系张敬尧所夺，乃决定罢战主和，并与南军通款携手。是年 11 月 28 日，吴佩孚与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谭延闿等，在衡阳会议上组织所谓“救国同盟军”。

1920 年 1 月 17 日，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思归为

由,要求撤防北归。以后又多次发电,措词也越来越激烈。段祺瑞为阻止吴佩孚军北撤,强行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其妻弟吴光新。吴佩孚通电反对。他不管北京政府批准与否,在3月上旬派人将700余名直军家属送回北方,并电请张敬尧来接收直军防地。5月25日,吴佩孚率军全部北撤,31日到达汉口。6月7日,吴佩孚到达郑州,将部队主力布置在京汉路沿线。13日,吴佩孚又电反皖的八省督军,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奉军为策应直军,也将部队零星开进关内。

7月1日,曹锟在保定发表《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指责徐树铮和安福国会祸国殃民。同日又发布《直军全体将士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檄》,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声讨。段祺瑞决不允许直系用"清君侧"的手法来削弱他自己的力量,乃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9日,曹锟在保定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12日,曹锟、张作霖发表《声讨段祺瑞出动边防军进攻直军通电》,吴佩孚等人也发表《宣布段徐罪状通电》,对段祺瑞宣战。

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15日,两军在涿州、固安一线激战。19日,皖系的边防军全线崩溃,段祺瑞辞职下台,皖系政客纷纷逃离北京。23日,直奉军进入北苑、南苑,办理近畿军事善后。

在直奉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7月28日下令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此后皖系军队除浙江督军卢永祥所部外,全被直奉两系收编或溃散。

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之间矛盾开始尖锐起来。

7月29日,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及各省代表在天津举行会

议，决定国会自行解散，靳云鹏重新组阁，取消上海和平会议等。而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抛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具体意见书》。8 月 1 日，吴佩孚又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吴佩孚的主张没有得到曹锟支持，反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吴佩孚只好率领第三师回洛阳。

8 月 20 日，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21 日下令裁撤曹锟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9 月 2 日，徐世昌又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

1921 年 6 月，湖北发生兵变，湖南督军赵恒惕图谋打着援鄂旗号扩大地盘，旋派兵向湖北挺进。7 月 25 日，曹锟、吴佩孚决定援鄂。28 日，湘鄂战争爆发。8 月 9 日，徐世昌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当即吴率第三师进入湖北。28 日攻占湖南岳州。9 月 1 日吴佩孚与赵恒惕签订停战条约，赵恒惕让出岳州，湖北完全为吴佩孚所控制。14 日，吴又赶赴宜昌对川军作战。10 月下旬，吴与刘湘签订《川鄂停战分防条约》。至此，吴佩孚的“援鄂”战争告一段落。

1921 年 12 月，梁士诒内阁刚组建就同日本勾结，将胶济路改为中日合办，还赦免遭直系通缉的皖系政客。吴佩孚抓住这两件事，指责梁士诒对日妥协，并把矛头直对梁内阁的后台张作霖。

1922 年 4 月 24 日，张作霖令奉军入关。28 日对曹锟宣战。直军由吴佩孚任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涿州。5 月 5 日奉军西线作战失利，部队向天津方向退却。20 日奉军全部退出关。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胜利而告终。从此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直系手中。徐世昌因遭直系反对而辞职。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直奉战争使吴佩孚名声大振，众人称其为“大帅”，成为直系军阀的首要人物。1922 年 8 月，吴反对唐绍仪组阁，支持王宠惠组阁。吴佩孚操纵内阁，与曹锟产生了矛盾。11 月 23 日，曹锟利用王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的受贿行为，出面公布王宠惠内阁五条罪状。之后，各省直系军阀也纷起大骂罗文干，并警告吴佩孚如果包庇就以卖国罪进行制裁。在强大压力下，吴佩孚只得认错。25 日发表声明：服从曹锟，对“罗案”不再坚持己见。王宠惠内阁倒台。

1923 年 2 月 1 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吴佩孚对工人运动极力进行破坏。当天下午总工会会所被军警捣毁。工人为了争自由，反对军阀压迫，决定在 4 日举行京汉路总同盟罢工，吴下令镇压。7 日对罢工工人进行大屠杀，有 50 多名工人被杀，重伤者近百人，被开除流亡者 1000 多人。对工人的血腥屠杀，彻底撕下了吴佩孚“爱国军人”、“进步军人”的假面具。

3 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 10 省，以图巩固北方，统一全国。

1923 年 6 月上旬，曹锟随着权力和财富的增加，积极准备自己出任总统。利用流氓组织“公民团”在天安门集会，要黎元洪下台；唆使冯玉祥、王怀庆率中级军官 300 人到黎元洪住处索饷。6 月 13 日，黎元洪出走天津，14 日交出印信辞职。曹锟政变成功。但国会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曹锟又急于要当总统，于是采取了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会议的手段。在 9 月 10 日的预选会上，曹锟以 5000 至 10000 元不等票价收买议员

500多人。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召开。当天曹锟派出大批军警宪兵进行严密监视，以480票“当选”总统。10月10日就职。同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据报导，此次贿选费用高达1350万元。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承认，曹锟还进行了种种媚外活动。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4日，张作霖通电支持浙江督军卢永祥，并向曹锟、吴佩孚发起挑战。17日，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并催促吴到北京主持军务。18日，吴佩孚在北京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作军事部署，将前方兵分东、中、西三路，分别以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为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从9月17日开始。双方共出动了50万大军，海陆一起参战。两军正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10月23日冯玉祥由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曹锟。奉军趁机进逼。11月3日，吴佩孚率残部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结束。

11月15日，吴佩孚抵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商谈，欲拉拢直系势力组织军政府以“护宪”，但遭拒绝。吴只好避居河南，但又遭冯玉祥国民军与陕西憨玉琨师的追击。逃到湖北又受约束。吴佩孚正在被围捉之时，忽得湖南军阀赵恒惕电邀，乃于1925年3月2日率残部赴岳阳，托庇于赵，意图卷土重来。

1925年10月，冯玉祥、孙传芳联合抗奉，为吴佩孚“出山”提供了机会。19日，吴通电宣称应孙传芳等电邀，将赴汉口共商反奉事宜。20日，吴自岳阳乘舰赴汉口。21日于汉口通电就任

10省讨贼联军总司令。22日发表外交宣言,称尊重过去所订的各种条约。年底,为消灭人民革命势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乃与奉系军阀再次联合,商定关外地盘由张作霖主持,中央政府和陕、甘、豫地盘让吴佩孚主持。

1926年1月20日,吴佩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进攻河南。3月2日进占郑州。5日占洛阳。吴在豫北得手,接着兵分三路向直隶进军。

4月9日,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缓和与直系的矛盾,释放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但吴不为所动,坚持要国民军全部退出北京方可议和。20日段祺瑞下台,国民军退往西北。这样北方各省陷入奉直军阀控制的局面。

5月1日,曹锟发表辞职宣言。6月6日曹赴保定,9月30日奔郑州,翌年2月寓居天津英租界。

1926年6月28日,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会面商定:直奉联合攻下北京南口后,吴佩孚向南进攻广东;张作霖向北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双方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连连得胜。10月10日攻下武昌城。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后因蒋介石的追逼,1931年5月22日在刘湘"保护"下出四川,年底到北平。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特务机关选择吴佩孚为傀儡建立全国性伪政权,被吴佩孚拒绝。

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因他不愿为日本帝国

主义办事，重庆国民政府在6月14日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牙病而死。重庆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陆军一级上将。



第二十章　段　祺　瑞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合肥人。1865年3月6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生。父早死，1872年随祖父段佩在宿迁军营读书至1879年段佩死。

1881年投靠堂叔，到山东威海军营当一名小军官。1885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7年毕业分配到旅顺监修炮台。1888年被选送德国深造，并到克虏伯兵工厂实习。1890年回国任北洋军械局委员。次年赴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

1896年调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并任随营学堂监督兼代理总教习。从此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和北洋建军的骨干。1899年随袁世凯移驻山东济南。1901年，因袁世凯推荐，段以三品知府衔兼任武卫右军各学堂的总办，负责训练北洋常备军。1902年升为二品候补道，赏戴花翎。1903年任北京练兵处军令司正使，负责军事计划、测绘、军需事宜。1904年6月陆军第三镇成立，段祺瑞任该镇翼长。1905年2月调任第四镇统制，9月转任第六镇统制。1906年1月复任第三镇统制，兼北洋武备学堂监督和军官学堂总办。3月，任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督办。1908年10月任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1909年10月复任第六镇统制。1910年底调任江苏江北提督，负责当地治安。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段祺瑞被召回北京任第二军军统。袁世凯控制清廷后，于 11 月 18 日令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广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1912 年 1 月 26 日，由段祺瑞领衔，联合 40 多名北洋将领，根据袁世凯的旨意致电清朝廷，要清帝逊位，改国体为共和。2 月 5 日，段祺瑞又联合王占元、何丰林等 8 名将领再发通电，要求变更国体，否则就要率领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随即将司令部从湖北孝感迁到河北保定，作出进京逼宫的姿态。段祺瑞的电报配合了袁世凯紧逼清皇朝的策略，迫使清帝在 1912 年 2 月 12 日退位。

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被委任为陆军总长，积极参与袁世凯打击责任内阁与革命党人的活动。8 月 16 日，段以陆军总长身份副署，使袁世凯、黎元洪杀害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的阴谋得以实现。

1913 年 3 月 10 日，段祺瑞与德国捷成洋行签订 2.04878283亿两借款合同，用于购买军火镇压革命。5 至 7 月，代理国务总理，积极参与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12 月，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到武汉，逼迫黎元洪离开湖北赴京任副总统，使湖北地盘落入北洋派之手。

1914 年 2 至 3 月间，赴河南指挥镇压白朗农民起义。由于段祺瑞长期在内阁中任陆军总长，拥有训练、调遣军队和提拔军官的权力，使北洋军中许多年轻军官视段为恩主。袁世凯为削弱段的力量，将陆军部的权力收归已有，乃在 5 月 8 日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政府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将陆军总长降为办事处的一个办事员。段对此极为不满，经常借故缺席会议，公务也交次长徐树铮去处理。袁世凯为了安抚段祺瑞，6 月 30

日专门任命他为“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但段与袁的矛盾并不因封官而有所缓和。

1915年5月,内阁讨论日方关于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时,段祺瑞独持异议,主张动员军队,对日采取强硬态度。31日,段称病辞职,未准。当时袁世凯正准备恢复帝制,文武官员纷纷请愿、劝进,拥戴袁世凯当皇帝。对此,段表示反对,称病不出,进行消极抵制。8月29日,袁将其免职并软禁。

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取消帝制。为了加紧对南方用兵,他只好启用段祺瑞。4月22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5月8日,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段为国务总理。但袁对段并不放心,对段提出的国务院秘书长人选及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的建议,不但不采纳,反而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这更加深了段的怨恨,对当时军事政局的变化也不尽心去办。5月12日,段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付现金,促使人们对袁更加不满。袁在内外交困中于6月6日病死。

袁世凯一死,段祺瑞即以现任国务总理掌握国家实权。就在袁死后几小时,段发表他与徐世昌拟定的《袁大总统遗令》,宣告依据《中华民国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命令一公布,当即遭到南方各党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华民国约法》是袁世凯私造的约法,不应执行;黎元洪应照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大总统,根本不是“代行”的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新旧约法之争,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正当南北双方争执陷于僵持状态时,海军突然宣布独立,段祺瑞不能不

有所戒惧，于6月29日接受南方条件，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旧约法之争告一段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旧国会继续开会，段祺瑞重新被任命为国务总理。紧接着颁布一系列法令，改各省督理军务的将军为督军，督办民政的巡按使改称省长。并宣布惩办帝制祸首，释放政治犯等。

不久，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发生争执。最初主要表现在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限问题上。1916年8月下旬，总统府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规定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总统对国务院议决的事及任免官吏可以退回再议。段祺瑞不能容忍黎元洪插足国务院，乃以辞职相威胁，最后府院双方议定了几条折衷办法：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国务会议记录随时呈阅；总统对国务会议议决的案件，如有不同意见可让总理及有关领导说明情况，如说明后总统再不满意可交回复议一次。此后黎段矛盾有所缓和。双方的矛盾还表现在关于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

1917年2月，美国政府因德国派潜艇封锁公海影响到它的对外投资，宣布对德绝交。4日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步调一致，并表示愿借款给中国作参战军费，以摆脱日本的控制。当时段祺瑞也想对德宣战，企图利用参战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日本也表示支持中国对德宣战。后美国发现中国对德宣战将有助于日本扩张在华势力，乃又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黎元洪也怕段祺瑞在参战名义下壮大实力对己不利，于是接受美国要求，反对对德绝交宣战。黎元洪、段祺瑞各自的态度反映了美、日帝国主义的不同要求。3月3日，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操纵内阁通过对德绝交案。4日，段率内阁成

员到总统府,要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交国会通过,并电令驻协约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磋商对德绝交后的条件。黎元洪接受美国要求,拒绝签发。当晚,段祺瑞上书辞职,出走天津,以示反抗。后经冯国璋"调停",约定今后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反对。由于黎元洪让步,段祺瑞在3月6日复职。接着,段密电各省及驻外公使,说明黎元洪已同意内阁的对德外交方针。不久,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段祺瑞积极准备对德宣战,以乘机扩充武力。对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但段一意孤行,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开会,组织"督军团",说明参战的目的在于取得日本的借款与军械,以加强北洋派实力。段的外交方针获得督军们的支持。5月1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10日国会开会审议参战案。段祺瑞为迫使国会通过参战案,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用钱雇来北京城内的军人、警察、乞丐、扛夫和失业游民3000人,组成各种名目的"请愿团",在陆军部人员的指挥下,手执小旗,散发传单,包围国会达10小时之久,当场殴打议员,打伤20多人,胁迫议员立即通过宣战案。议员们十分气愤,宣布停止开会。段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决定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则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黎元洪利用人民反段的要求,在美国支持下,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段以总统令无总理副署为由不予承认,并赴天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同时派代表去江苏徐州与张勋联系"合作"驱黎。

5月29日,安徽、河南通电宣告独立。随后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研究系议员对黎元洪罢

免段祺瑞采抵制态度。31 日，汤化龙辞去国会众议院议长。在北洋各省督军和研究系政客的抵制下，黎元洪于 6 月 1 日召张勋入京“共商国是”。张勋则以解散国会为进京条件。12 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14 日张勋到北京。7 月 1 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2 日，黎元洪躲进日本使馆，同时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阴谋促使张勋解散国会、待推翻黎元洪的目的达到后，又摇身一变打起了反复辟的旗号。7 月 3 日，段在天津马厂举兵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4 日，段又联合曹锟通电宣布张勋八大罪状。5 日，段祺瑞就任总理。12 日，“讨逆军”分三路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失败。段借反复辟捞到了“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

7 月 14 日，段祺瑞入京，黎元洪通电去职。8 月 1 日，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4 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14 日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声明废除与德、奥两国所订的一切条约。对德宣战后，段为壮大自己实力，公开进行卖国活动。8 月 10 日，成立了以亲日派陆宗舆为总裁的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作为日本向中国投资的机关。自 1917 年 8 月至 1918 年 9 月，段先后以善后借款、银行借款、铁路借款、军械借款等名义，共借款 16 次，总额在 3 亿日元以上。其中 8 次借款，由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同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经手，合计 1.45 亿日元。这次借款史称“西原借款”。“西原借款”所附的山东密约，即山东问题换文规定：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分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日本通过各种借款加强了对中

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控制，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段祺瑞自恃有日本作靠山，在重新组阁后，把推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甚至公开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1918年3月1日成立了参战督办处，规定参战督办处隶属于大总统，综理国际参战事务。段的亲信靳云鹏任参战处参谋处长兼参谋长。不久又建立参战军，成为皖系军阀统治的一大支柱。

段祺瑞的卖国行径、不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恢复旧国会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领导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段为了消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力量，削平西南地区正在崛起的地方势力，发动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战争。

1917年11月14日，湖南前线的直系将领王汝贤因没有得到湖南督军的位子而擅自行动，通电全国要求停战。随之，直、鄂、赣、苏四督军联名通电响应。段祺瑞武力统一计划受阻，于11月16日通电提出辞呈。对段的辞职，冯国璋在22日予以批准。12月18日，冯任命段为参战督军。1918年1月18日，冯国璋发布讨伐令，派兵进攻湖南。3月10日，南北战事重起。19日，曹锟等27人联名致电冯国璋和段祺瑞，请段出山。23日，冯国璋发表段祺瑞组阁令。26日，段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大举向湖南用兵。此时段对外继续实行卖国政策。5月16、19日，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合法”地“迈出了使中国军队隶属化的第一步，并且为已在策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确保了在中

国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①

4月20日，段祺瑞离京南下汉口召集军事会议，目的是要消除主战派内部裂痕，制定对南方的作战方针。但段的“南巡”没有解决问题。8月间，吴佩孚接连发通电，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进行了猛烈抨击。

1918年，大总统任期将满应当改选，为了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选举，段祺瑞指挥手下政客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因会址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而得名)。安福俱乐部以金钱贿赂收买政客操纵选举，获得新国会384个议席，占国会两院全部议席的81.36%，史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

1918年8月12日，国会开幕。9月4日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与段祺瑞相约同时下野。10月9日段辞职，10日获准。段虽不当总理，但仍任参战督办，手中掌握着几个师的参战军。同时他还掌握着国会，内阁中又有他的亲信。实际上段对全国行政仍起控制作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北京政府鉴于国内外形势，派代表于1919年2月到上海与南方代表进行和谈。由于段祺瑞的作梗，南北和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但在会上中国不仅没有得到战胜国应有的权益，反要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给日本。中国在山东问题上交涉

---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7页。转引自黄征等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失败,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而段祺瑞却在5月14日徐世昌召开的特别会上鼓吹:中国应依赖日本,必须无隔阂地与日本保持协调一致的行动,中国应在和约上签字。24日,段又通电各省,主张放弃山东主权,无条件签署对德和约①。因全国人民反对,中国政府代表拒签和约。

1919年7月20日,徐世昌下令裁撤督办参战事务处,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由段祺瑞来督办边防事务。8月5日,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令段祺瑞将督理参战军训练事宜改称为督理边防军训练事宜。这时,段控制的边防军有3个师4个混成旅。徐世昌又命段的亲信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古善后一切事宜。皖系获得控制西北各省区的权利,其声势凌驾于其他派系之上,成为直奉联合反皖的原因。

1919年秋冬之间,直系的直、苏、鄂、赣四省和奉系东北三省组成七省反皖联盟,用"清君侧"的策略,反段身边的徐树铮。1920年初,吴佩孚提出撤防北归。为阻止吴部北上,段祺瑞采取安插亲信,步步设防的措施,结果得罪豫督赵倜,使赵参加反皖联盟。

1920年4月9日,曹锟在保定召开八省反皖联盟会议,商定军队撤回原防地,解散安福国会。5月22日,吴佩孚率第三师自衡阳撤防北返,奉军也借口进关。7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5日,段祺瑞以边防

①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0—1071页。

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8日，段又召集军政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9日，段在北京团河组织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4日，直皖战争爆发。战区分东西两路：西路是双方的主战场，在京汉路的涿州、琉璃河、高碑店一带；东路在京奉路杨村一带。战争历时5天，皖军全线溃败，徐树铮遁逃。19日，段引咎辞职。皖系势力从此衰落。段祺瑞全家移居天津。

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之间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1921年下半年，段祺瑞利用张作霖对曹锟、吴佩孚的不满，和张作霖联手，商讨合力倒直计划。同时又派密使南下，和孙中山接洽合作讨伐直系。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26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请段祺瑞出山。11月10日，冯玉祥到天津与段会晤，并推戴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执政总揽军务政务，统率海陆军，取消总统府、国务院，使临时执政兼有两者的权力。

段祺瑞上台后，为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12月7日对日本记者表示，过去的条约均遵守不变。18日又通过临时政府阁议，声明以前所订条约"概当履行"。[1]

段祺瑞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决定召开善后会议，于1924年12月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必须是有"大勋劳于国家者"；"讨伐贿选及制止内战各军最高

① 《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9日。

首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1]。这些人实际是一群官僚、政客、军阀、买办、遗老和御用学者,理应受到全国人民反对。但段祺瑞仍强行在1925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通过《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4月21日会议结束。

与此同时,段祺瑞为使海关二五加税与收回被比、意、西、法四国扣了两年多的1000多万元以解临时执政府各项军政费用之急需,竟通过“金佛郎案”。结果使中国凭空多付给法国庚子赔款约8000多万元,多付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7000多万元。1925年5月28日,段祺瑞写信给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附信寄去《秘密意见书》,乞求日本给予经济援助。10月16日,十三国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段祺瑞表示要谋求关税自主。会议通过了《议决中国关税自主的条文》。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关税问题上采取延宕态度,直至段祺瑞下台也未作出具体决定。

1926年1月12日,十二国法权会议在北京召开。段祺瑞意欲通过此会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后因帝国主义国家阻挠而没有达到目的。

1926年初,在日、英帝国主义策划下,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号召,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3月12日,奉系军舰4艘尾随日本驱逐舰冲进大沽口,与国民军发生冲突。日本联合《辛丑条约》缔约国,向段祺瑞提出最后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并限于3月18日解决,否则就要动武。北京学生得到消息,80

---

[1] 费保彦:《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版,第25—26页。

多所大中学校师生及60多个团体约5000人于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到达临时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卫队枪杀，47人死亡，132人受伤，40人失踪。段祺瑞一手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当直奉军阀势力逐渐逼近北京时，段祺瑞准备勾结张作霖驱赶国民军出北京。4月9日，段的阴谋败露，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先发制人，率兵包围了临时执政府，段逃到东交民巷。国民军退出北京，段复职。这时他派人与张作霖联系，张对他不屑一顾，吴佩孚又派兵对其进行监视。这样段祺瑞只好结束"执政"，4月20日宣布下野，回到天津过寓公生活。

段祺瑞到天津后，自称"正道居士"，每天吃斋、礼佛。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过争取重新上台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曾请段祺瑞出山成立傀儡政权，被他拒绝。1933年1月移居上海。1936年11月2日因病去世。



第二十一章 张 作 霖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其父张有财经营小商铺，常出入赌场，负债累累，家境败落。张作霖14岁丧父，在私塾读书仅数月便辍学，后浪迹江湖，曾学习兽医，粗通门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投入毅军，因“机警过人”，被提升为骑兵哨长(排长)①。战后，他解甲还乡，在大高坎镇开设兽医庄，娶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为妻。1901年，赵氏生长子张学良。

本世纪初，辽河流域战乱频繁，散兵游勇与失业流民，落草聚众，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马胡子”)。地方绅商也组织乡团，“抽饷养兵，名曰保险”②。这些地方武装大多亦兵亦匪，在管辖地域内维持治安，但往往越过辖区勒索抢劫。张作霖在岳父的协助下，自建“保险队”。其后，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相继率众归顺他，其声势日大。

1902年，张作霖率部数百人，委托八角台等地方绅商具保

---

① 《黑山县志》上卷、《人物志·张作霖》。

② 《黑山县志》上卷、《建置志》。

推荐，由新民知府增韫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被任命为巡防马步游击队管带（营长）。

1904 至 1905 年，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殖民权益，在我国东北发动大规模战争。张作霖利用战争扩展实力。起初，他暗助俄国，从中渔利，其后，又见风转舵，“为日本军效力”。[①]

日俄战争后，为维持社会治安，东北当局整编地方军队，张作霖经营有术，官运亨通。1906 年，张作霖所部扩编为马步五营，张任五营统带（团长）。张作霖被招抚后，奉命剿匪，屡屡建功，相继消灭田玉本，计擒杜立三，辽西地区土匪基本扫平。1907 年，张作霖被提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1908 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张作霖所部到郑家屯（今辽宁双辽县）、洮南一带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张作霖率军奔驰在漠北荒原，“炎沙寒雪、艰苦备尝”[②]，苦战数年，终将叛匪敉平。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溶与蓝天蔚等新军将领策动响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纳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的建议，急调驻防辽源巡防营旧军入卫。张作霖闻讯，密令所部从洮南日夜兼程，直奔奉天（今沈阳）。在张作霖的武力协助下，赵尔巽强制新旧军将领通过“保境安民”的方针，策动咨议局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公举”赵为会长、张兼任军政部副部长，以遏制革命形势的发展。随后，赵尔巽又指示张作霖剥夺蓝天蔚的军权，逼迫其离奉南下，并设计诱杀张溶，将其家产洗劫一空[③]。

① 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75 页。

②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宣统三年刊本，第 148—149 页。

③ 《关于张作霖的专题档案》案卷号二十一，辽宁省档案馆藏。

接着,全城展开大搜捕,许多革命志士遇难。张作霖因绞杀革命得力,被任命为巡防营务处总办。

1912 年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作霖由"勤王保皇"者,变为效忠袁世凯的干将。同年 9 月,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成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最重要的实力派军阀。

1913 年 3 月,袁世凯策划对南方革命党发动战争,为免除后顾之忧,特召见张作霖加以慰勉。随着张的羽毛日益丰满,袁唯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于 1914 年 8 月,企图以"护军使"之衔,将其调往内蒙古。张闻讯鼓动奉天绅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打消原意。

1915 年 8 月,袁世凯为箝制张作霖,委任亲信段芝贵为奉天督军并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只得佯示欢迎。此时,袁世凯正在图谋复辟帝制,张密电劝进,声言"关外敢有异议者,以身当之"①。袁"登极"时,论功行赏,段芝贵封公爵,张封子爵。张大失所望,即日递呈请假。1916 年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张作霖与冯德麟合谋,将段逐出奉天。陷于四面楚歌的袁世凯,被迫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冯为帮办。张终于实现执掌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6 月,袁忧愤毙命,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张作霖掌握奉天军政大权后,重用地方人材,任命留日军事专家杨宇霆为军署参谋长,迅速擢升政绩卓著的王永江为财政

① 《盛京时报》1916 年 4 月 8 日。

厅长兼代奉天省长。王永江精吏治、善理财，全省财政面貌一新。奉系悍将汤玉麟目无法纪，与王发生激烈冲突，张作霖坚决支持王整肃法纪，不惜与汤决裂。

1917年初，北京政府在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上发生“院府之争”。张作霖支持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派代表出席徐州督军团会议，通电要求解散国会，一度宣布奉天“独立”，向总统黎元洪示威。在“独立”期间，他乘机扩充军队，组建第二十九师，任命吴俊升为师长。同年6月，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张作霖起初骑墙观望，复辟失败后，张乘冯德麟因参与逆行被捕之机，吞并其二十八师。至此，奉天成为张作霖的一统天下。

同年夏，张作霖借黑龙江内部政争的机会，保荐其儿女亲家鲍贵卿为黑省督军，将势力扩展到黑龙江。随后，张又设法谋取吉林，因吉林督军孟恩远的抵制，未能得手。

复辟失利后，北京政府由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直、皖两系分掌大权。其时，国内政局除南北对峙（南方成立护法军政府）外，北洋军阀内部直系与皖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对南方的政策上，皖段推行“武力统一”，而直冯则主张羁縻制约。1918年2月，皖系干将徐树铮策动奉系在秦皇岛“截领”直系军械[①]，鼓动张作霖入关问鼎中原。3月，奉军奉命挺进，张作霖以支持对南方用兵之名，欲谋取更大的权力。9月，皖系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特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总揽了东北三省兵马大权。同年秋，一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与支持皖

① 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系的日本抗衡,策动南北和谈,日本被迫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年底,奉军撤出关外。

1919年7月,张作霖在日本侵华势力的协助下,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解除职务,由北京政府下令调鲍贵卿为吉林督军,任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至此,张作霖将东三省纳入其统治范围。从此,奉系军阀取得与直、皖两系鼎足而立的地位。

张作霖在东三省崛起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已攫取了重大的权益,长春以北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为实现“东北王”的统治野心,不惜卑躬屈膝,向日本表示亲善。张作霖成为奉天督军后,日本统治阶层将扶植和利用张定为其扩大侵华的方针之一。1916年6月,日本为支持张作霖整理全省财政,通过朝鲜银行奉天支行向奉天政府贷款300万。其后,张作霖向吉林和黑龙江扩张势力,都得到日本的支持与协助。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震动全国。张作霖在东北对爱国民众运动“严加取缔”[①],得到日本当局的赞许。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派驻奉总领事向张面谢。1920年10月,东北延边地区爆发民众举义抵抗日本扩张的“珲春事件”。奉天当局配合日本侵略势力将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张作霖不仅与日本军政界交往密切,而且同日本财团也有联系。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与张作霖为莫逆之交,双方合资成立“兴发公司”,联合开发内蒙古东部资源,推动了日本向东北投资的迅速发展。张作霖在东北地区奉行亲日政策,主要

①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62—863页。

目的是“互相利用，交换利益”。[①]

张作霖割据东三省后，野心日益膨胀，极力向关内扩张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此前，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日大，成为奉系向蒙疆扩张的障碍，改变对皖系的支持，暗中加入直系策划的反皖八省联盟。战争一爆发，张立即率军入关，助直倒皖。皖系大败，直系与奉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继续担任傀儡总统。同年9月，张作霖以出征外蒙古为名，迫使北京政府任命奉军将领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1921年5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被特派兼任蒙疆经略使。10月，奉军向热河推进，张作霖又胁迫北京政府批准奉系将领汲金纯为热河都统。绥远都统马福祥也“望尘景附”[②]。这样，张作霖不但君临东北三省，而且兼辖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俨然成为“满蒙”之王。

直皖战争后，张作霖与直系新首领曹锟商议决定，联合支持靳云鹏组阁。但其后，直奉双方在分割地盘、任用官吏上迭生矛盾。张作霖为对抗直系，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并利用交通系要员梁士诒、叶恭绰等扳倒靳阁。1921年12月，张作霖入京支持亲日官僚梁士诒组阁，引起直系第二号首领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代表对于山东问题展开激烈舌战。梁士诒电令中国代表，接受日方提出的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改为中日合办等条件。吴佩孚抓住这一题目，接连电责梁士诒亲日

---

① [日]园田一龟著、胡毓铮译:《怪杰张作霖》,1921年版,第220页。

② 《张大元帅哀挽录》行状部分,1928年刊本。

卖国，并攻击梁的后台张作霖。吴电声明："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人民之公敌。"① 于是，直奉关系日趋紧张。

1922年4月初，奉军大举入关。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在直隶境内爆发。前线奉军多为绿林兵将，素质较差，指挥接连失误，仅一星期，西路、东路相继溃败，直军乘胜追击，奉军损失惨重。第二梯队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奉系新军作战英勇，坚守榆关，直军被拒山海关之外。

奉军战败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但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根基稳固，非大总统的一纸公文所能动摇。6月上旬，东三省议会通电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

东北"自治"后，张作霖为向直系复仇，广招人材，整军练武。7月，奉军设立陆军整理处，实行精兵主义，汰弱留强，统一整编为"镇威军"，总计兵力约25万。全军强化军训，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改革军需制度。同时，建立海军，扩建空军，投巨资改建奉天兵工厂。仅两年左右，奉军由绿林式的乌合之众，跃为训练有素的劲旅。为广泛培养各种人材，1923年春，东北当局不顾日本的"抗议"②，建立东北大学，由王永江首任校长。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之际，直系军阀把持中枢，倒行逆施，怨声载道。曹锟贿买议员窃据总统之位，秽声四起；吴佩孚色骄志矜，滥用武力。因此，各地反直浪潮不断兴起。张作霖与广

---

① 《吴佩孚通电》(1922年2月10日)，《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吴相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传记文学》第44卷，第6期。

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皖系首脑段祺瑞及浙督卢永祥联系，结为反直三角联盟。同时，张作霖秘密拉拢直系将领冯玉祥，分化对手。

1924年9月，直皖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立即响应浙卢，通电讨直。13日，张亲率六路大军向关内挺进。吴佩孚率三军迎击。双方主力激战于山海关，奉军攻破石门寨，直军战局危急。10月23日，冯玉祥倒戈，率军急速返京，占领要地，囚禁曹锟，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派兵迎战直军主力。直军腹背受敌，全军一片混乱，奉军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吴佩孚仓皇出逃，直军迅速溃败，奉军大获全胜。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与冯玉祥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虽然张、段紧随冯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随着曹、吴倒台，奉、皖、粤三角联盟已经瓦解。此时，皖系实力所存无几，段祺瑞为平衡张与冯之间的关系，煞费苦心。1925年春，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占据西北地区及京汉线北段。同时，张作霖被任命为东北边防督办，奉军沿津浦线向南扩张。5月，奉军以援皖为名，举兵南下，仅三个月，便占据了山东、江苏、安徽，并将势力伸展到上海。

奉系向东南扩张，使浙督孙传芳深感威胁。10月15日，孙联合闽、赣、苏、皖等省的直系旧部，号称五省联军，通电反奉。奉军脚跟未稳，一败涂地。11月，孙军攻占徐州，奉军撤回山东。正当孙军乘胜推进之际，吴佩孚在武汉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兵锋指向河南的国民军。而冯玉祥则暗中与孙传芳建立联系，南北呼应威胁奉军。

浙奉战争之后，奉系内部郭松龄倒戈，爆发反奉战争。事前，

郭派人与冯玉祥密结反奉联盟。11月24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通电谴责张作霖穷兵黩武,并率军出关。郭军迅速攻占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危在旦夕的张作霖准备逃往大连。日本关东军趁机提出扩大满蒙侵略权益的要求,作为"援助"条件,张立即表示接受,以换取日本的武力干涉①。12月23日,巨流河决战,郭军失利。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从容就义。

1926年初,张作霖以讨伐郭军残部魏益三为名,再次向关内进兵,与进援郭军残部的国民军隔滦河对峙。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劝谏张:"抛弃历来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向关内染指",削减军费,发展实业,振兴教育等建议②,遭张拒绝,王愤然辞职,翌年病逝。王下野后,随着军费的恶性膨胀,奉省金融日趋混乱,奉票急剧贬值。

为进攻已占据直隶的国民军,张作霖与吴佩孚弃嫌修好,签订反冯盟约。3月,奉直联合发起进攻。敌视国民军的列强,也公然以武力威逼,国民军被迫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张、吴北京会晤,但同床异梦。

正当奉吴联合进攻国民军之际,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6月举兵北伐。国共合作,北伐军所向披靡,10月初攻克武昌,吴佩孚败退河南。奉鲁军乘人之危,以索饷为名,迫使以吴为背景的杜锡珪摄政内阁辞职。在奉系的默许下,由外交总长顾维钧兼摄内阁总理。同时,张作霖命奉鲁军沿京汉路南下,进占吴军控制的保定、大名。

---

①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6—30页。

②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54—55页。

11月初，继吴败北之后，孙传芳军在江西战场也遭北伐军重创。奉系遂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张作霖在天津召开"蔡园会议"，商议对策。孙传芳微服北上，亲自向奉系输诚求援，与张宗昌等联袂以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登上北洋军阀盟主的宝座。随后，张作霖率众入京。奉系继续支持顾维钧改组内阁，蝉联执政。

1927年2月，张作霖以援鄂为名，下令奉鲁军分兵两路，进军河南。3月中旬，张学良率奉系精锐三、四军团，与吴军决战，攻克郑州，吴佩孚残余势力败亡。4月6日，在"南北妥协联合反赤"的逆流中，张作霖密令北京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并残酷地绞杀了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同年春夏之交，北伐之师继续推进。5月底，冯玉祥率国民军出潼关与武汉唐生智军队会师，威逼奉军嫡系军团。6月初，南京北伐军攻克徐州，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溃退。此时，见风转舵的阎锡山立即宣布易职，加入北伐行列。奉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防御，三、四军团放弃郑州，退守黄河北岸。面对败局，奉系极力推行"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策略，企图分化北伐势力。

为取得与南方对等议和的政治势力，6月17日，北洋军阀各派势力联合推举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宣布就职，同时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该令规定大元帅统率陆海军，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①。在军政府之上不设任何民众参议机构。20日，张作霖任

① 《政府公报》第4008号，1927年6月19日。

命潘复为内阁总理，阁员几乎为清一色的奉系人物。此时，列强已将外交重心转向南方，对安国军政府的组建反映十分冷淡。25日，张作霖发布“和平息争令”，并通电声称：“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其所作所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只是要“问罪兴讨”“甘心赤化者”[1]。其目的仍在联合蒋、阎，抗拒冯、唐。

1927年夏秋之际，南方国民党各派系矛盾日趋激烈，北伐军事陷于停顿。张作霖见宁、汉、粤、桂等派势力争权夺势，越演越烈，便重整旗鼓，发动反攻。8月25日，孙传芳部曾一度夺取徐州，攻占浦口，渡过长江而进军龙潭。奉军嫡系于10月向京汉线和京绥线之间的阎锡山部发动进攻。当奉、晋两军相持不下时，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向张宗昌部展开猛攻。12月，冯部与南京北伐之师联合重新夺取徐州。1928年1月，蒋介石再度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国民党各派军队编为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发动北伐攻势。山东战场上，张宗昌部节节败退，4月底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残部溃逃。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进军，奉军四面受敌，濒于全线崩溃。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5月9日通电停战息争，决定撤军出关。不料横祸飞来，其祸根源于日本侵华政策的不断升级。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华政策采取强硬方针，扩大其在满蒙地区的侵略特权。会后，日本驻华使节对奉方展开外交攻势，“抗议”东北当局集资修建打通线等铁路。日方认为奉方自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交通干线，将严

① 《北洋政府档案》，一〇三九·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重影响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对其在东北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蛮横要求获取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①。日方的高压强索政策激起东北民众的爱国义愤，奉天、长春等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满蒙交涉”一度被迫中断。东北当局一面在外交上敷衍日方，一面日夜兼程抢修铁路。是年夏秋，打通线等路提前竣工，东北当局所辖各路相继实行联运，“工商业大为振兴”②。

为突破日奉谈判的僵局，日本首相派遣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为代表于10月抵达北京，与张作霖举行秘密谈判。日方以预付数百万元现金为诱饵，要求与奉方立即签订在满蒙地区承建五条铁路的契约。奉方屡屡更换谈判代表，交涉一再拖延，直到1928年5月济南事变之后，才匆匆草签敦化至图们江图、长春至大赉等四路契约。至于日方再三逼迫奉方履行镇压郭松龄反奉时所承诺的密约，张作霖见事过境迁，以推委拖延的策略，不肯实践前言。

5月17日，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递交日本政府照会，声称北伐战争即将扩展至京津地区，如果“战乱波及满洲”，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干涉维护其侵略利益③。芳泽一面警告张作霖必须迅速撤军出关，一面乘机逼索日奉密约所承诺侵略特权。张作霖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勃然大怒，严词拒绝。25日，北京政府照会日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P57.P·V·M23，第940页。

② 《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报告代表处说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235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东京1978年版，第116页。

方,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①

5月30日,张作霖召开紧急会议,采纳张学良、杨宇霆的建议,下达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乘专列出京。次日凌晨五时,专列行至奉天城西郊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指挥启动爆炸装置,一声巨响,张作霖所乘的铁甲车被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送回大帅府,数小时后身亡。事后,日方伪造现场,极力掩盖真相,并四处挑衅,企图乘机动用武力,扩张殖民统治。

面对危局,奉天当局处置镇静,直至张学良微服返奉后,才宣布发丧。张学良子承父业,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任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以文件被毁为由,拒绝履行张作霖生前草签的满蒙铁路条约,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

张作霖生前娶有六房妻妾。原配赵氏,早年跟随左右,1898年生女首芳,1901年生长子学良,1904年生子学铭,1912年病逝于新民县。继配卢寿萱,赵氏死后扶为正室,1907年生女怀英,1911年生女怀卿,1974年卒于天津。三太太戴氏(亦有陶氏、宪氏等称,说法不一),婚后郁郁寡欢,无子女,后入佛门。四太太许澍旸,家境贫寒,因貌美被强娶为妾,1909年生女怀瞳,1911年生子学曾,1913年生女怀曦,1916年生子学思,1976年病故于北京。五太太张寿懿,最受宠幸,1920年生子学森,1922年生

①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日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5月25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1928年5月27日出版。

子学浚，1924 年生子学英，1925 年生子学铨，1966 年病故于台湾。六太太马月清，原为五太太贴身侍女，1924 年生女怀敏。1975 年病逝于台湾。

第二十二章　孙　传　芳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1904年从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冬毕业。1909年3月回国。经清廷陆军部考试合格，赏步兵科举人，分配到北洋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任教官。

辛亥革命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随王占元第二师驻防湖北，历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第二师第六团团长。1916年又任第二师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17年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

1921年湘鄂战争爆发，湖北督军王占元辞职，湖北为吴佩孚控制。在吴佩孚的推荐下，8月9日孙传芳任长江上游总司令，28日又任陆军第二师师长，从此成为直系将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府。为选曹锟当总统，直系将领在保定会议提出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5月15日，孙传芳发通电，提出巩固民国，宜先统一法统，召开旧国会，请黎元洪复位。28日又致电广东护法军政府，要孙中山同徐世昌同时下野。孙传芳的通电是为直系起投石问路的作用。

1922年10月，福建发生驱逐闽督李厚基战争。孙传芳奉曹

锟、吴佩孚之命率军从湖北经江西入闽。1923 年 3 月 19 日任福建军务督理。

1924 年 3 月，孙传芳和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合作，以突然袭击手段将掌实权的福建帮办王永泉赶下台。5 月 13 日，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曹锟要他进攻广东，但孙传芳想向浙江发展。6 月 16 日，孙传芳致电曹锟、吴佩孚，一方面大谈进攻广东的战略，一方面伸手要军饷 300 万元、枪弹 500 万发。由于曹锟、吴佩孚一下子拿不出军饷、枪弹，进攻广东的计划只能作罢。

1924 年 9 月 3 日，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率军越过仙霞岭进攻浙军侧背。由于浙军第二师发生内讧，卢永祥被迫放弃浙江，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上海龙华。9 月 17 日，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由于浙军作战不力，孙传芳军得以长驱直入，9 月 25 日占领浙江嘉兴。10 月 12 日占领上海龙华。卢永祥宣布下野，江浙战争结束。这一仗孙传芳不仅获得了物产丰富的浙江地盘，还收编了 4 个师 1 个混成旅，成为一个有军事实力有地盘的大军阀。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告终。段祺瑞入京成立临时执政府。孙传芳当即致电表示拥护段政府。

1924 年 12 月 11 日，段祺瑞下令免去直系齐燮元江苏督军职，又密令陈乐山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于是引起孙传芳的疑虑，认为这不利于他在浙江的统治，乃于 1925 年 1 月 2 日率军攻占松江，逼近上海。1 月 5 日和 6 日，又接连发通电反对奉军南下，并与齐燮元组织江浙联军，孙传芳任联军第二路总司令。11 日两路军队夹击占领上海。13 日又占领苏州。

1925 年 1 月 14 日，孙传芳、齐燮元联名通电：愿意撤退上

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名目，反对以后再设此类军职。15日，段祺瑞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以上海为永不驻军及设置军事机关地区。16日，任命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

1925年1月17日，奉军占领镇江，不久克无锡、上海。28日，齐燮元通电下野逃往日本，其部队为孙传芳接收。2月3日，孙、奉双方签订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5日，孙军全部撤出上海，但奉军根本没有撤军诚意，故上海为奉军所掌握。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为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奉军源源不断开来。此时孙传芳也派第四师谢鸿勋部回驻松江。江浙形势再次紧张。

1925年10月8日，孙传芳在杭州召开有安徽、江西、江苏、福建、浙江五省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出兵讨奉任务。决定成立浙闽苏皖赣联军，建立五省联盟，孙传芳自任总司令。10月10日，孙传芳以国庆阅兵为名向江苏松江、长兴集中。

10月16日，浙奉战争爆发。孙传芳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发动猛攻，奉军杨宇霆部急忙撤退。孙传芳夺得松江、上海后，才与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通电，以奉系在上海驻兵为借口出兵讨奉。奉系没有料到孙军进攻神速，害怕分散被围，乃决定保全实力，放弃江苏、安徽两省，将奉军集结于徐州，伺机反扑。

10月17日，孙传芳抵达上海。鄂、皖、赣三省直系军阀和地方军阀纷纷通电响应孙传芳讨奉，并电请吴佩孚、孙传芳共同主持讨奉大计。

奉军退据徐州，分三路防守，孙传芳的联军亦分三路进攻。10月30日，孙传芳下令向徐州发起总攻。11月2日两军激战于

安徽蚌埠以北的固镇。孙军先败后胜，杀张宗昌的白俄兵300多人，奉军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亦被俘枪决。11月5日，孙传芳下令向徐州发动第二次总攻，奉军为保存实力退走山东。8日，孙传芳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1月25日，段祺瑞任命孙传芳为江苏督办，邓如琢为安徽督办。但孙传芳根本不承认段的任命，反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王普为安徽省长，陈陶遗为江苏省长。这是孙传芳军阀生涯最得意的时期。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吴佩孚在两湖战场连连败退，多次电请孙传芳派兵支援，但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败退河南，孙传芳才出兵迎战。

9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向赣州发起攻击，第二军亦自南雄攻入江西，开辟北伐第二战场。此时孙传芳约有16万兵力，分为6个方面军。6日，北伐军攻克赣州，孙传芳却要北伐军速撤。7日，孙传芳又致电蒋介石，限北伐军24小时内全部撤回广东。当时孙传芳的兵力主要集中在江西的南昌、九江、南浔路等重要地点，司令部设在九江江面的轮船上。11月2日，北伐军在南浔路发起总攻。4日占领九江。8日攻占南昌。孙传芳部溃不成军，孙本人于7日狼狈逃回南京。

南昌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装乘普通客车由南京抵天津拜见张作霖，向张乞援认错，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孙传芳还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大喜过望，表示不计前仇，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

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

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8日,孙传芳任安国军副司令。

孙传芳南返,指挥部队回浙江,摧垮了国民党人蔡元培等人搞的"浙江自治"。12月23日,下令取缔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联合会,缉拿蔡元培等70余人。

1927年1月25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长江下游作战方案,决定先取杭州、上海,消灭孙传芳主力,会师南京。2月18日北伐军入杭州,3月4日,孙传芳在安徽的驻军倒向北伐军。14日,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宣布归附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派三舰驶离九江会攻南京。18日,孙传芳从南京逃到扬州。东南五省割据局面宣告结束。

1927年5月22日,孙传芳受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路何应钦军的进击,弃扬州退到海州。6月11日,孙传芳和张宗昌联袂到北京,参加张作霖召集的军事会议,提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自己取消"五省联军"称号。7月15日,孙就任安国军第一军军团长。

8月13日,孙传芳乘国民党内部宁汉对峙,乃集中兵力大举反攻,占领淮阴、淮安、蚌埠、菏泽。17日,尾随南京国民党的败兵进到浦口江边,并炮击南京城。23日,孙传芳军开始进攻南京。26日,孙部三个师强渡长江,占领栖霞山、龙潭车站,断绝南京、上海间交通。29日,孙又调兵5万到龙潭,同南京国民党军激战。31日,孙军在龙潭惨败,被俘士兵3万余人、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数十人,伤亡无数,枪支损失4万余枝。孙本人则化装成士兵逃到扬州。

9 月 15 日，奉系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孙传芳负责津浦路防御，特许孙传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与该地区冯玉祥军对峙。

1928 年 2 月 12 日，张作霖任命孙传芳为山东督办。4 月，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发动北伐，孙军节节败退。4 月 30 日晚，孙传芳渡黄河北逃。6 月 3 日，孙通电辞职。此时他的部队仅剩两个师退守天津。15 日，孙传芳的部队不愿出关而向阎锡山投诚。孙传芳的武力至此荡然无存。

孙传芳逃到沈阳后，寄于张学良门下，任毫无实权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1929 年 1 月，隐居于大连。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居天津。1934 年 4 月，孙在天津组织佛教居士林，自任理事长。1935 年 11 月 13 日，在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开枪打死，终年 51 岁。

第二十三章　阎　锡　山

阎锡山，字伯川，乳名万喜子。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①。父阎书堂，营商为生。母曲月清，大家闺秀。阎锡山6岁丧母，寄居外祖父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9岁入本村私塾，读四书五经。17岁再入本村义学，读经史子书，并对程、朱、陆、王之学深加研读。青少年时代受儒学影响较深，特别是朱陆之说，对阎以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阎16岁随父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1900年阎书堂参与金融投机破产，阎随父躲债逃往太原，曾在太原柳巷裕盛店（客栈）当小伙计。流浪生活的痛苦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引起的国破家危，促使阎弃商从军，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1902年，阎考入山西武备学堂②，从此投身军界。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0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留日

---

① 河边村旧属五台县，今归定襄县。

② 《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在山西建立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

期间结识了孙中山、李烈钧、朱绶光等革命党人，受到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又成为“铁血丈夫团”成员之一，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初，阎从士官学校毕业后途经朝鲜。当时朝鲜已成日本的殖民地，阎看到朝鲜大臣卑躬畏缩的样子，深感亡国之苦，曾发出“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的感叹，并由此萌发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思想。3月，回到北京后，他为打开局面，又专程拜见了当时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之父姚锡光，得到姚的赏识。回省后，阎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不久在北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各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会试，名列上等，清廷赏给阎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接着，被任命为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升任标统。任职期间秘密参与同盟会的反清活动，积极进行军队改造，为太原辛亥起义的发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1911年10月28日，以阎锡山为主的太原同盟会核心成员集体作出在太原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翌晨，驻防太原城外的新军八十五标在管带姚以价的带领下宣布起义，接着，阎率领驻城内的八十六标参加。起义军英勇奋战，3个小时内光复太原城，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当天，起义军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被举为都督。山西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清朝在山西反动统治的垮台。

太原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派北洋军第六镇第十二协开往石家庄镇压山西革命。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早已秘密参加革命，所以吴到石家庄后，速邀阎在娘子关会晤，吴、阎商定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准备直捣北京，推翻清廷。不料袁世凯收买吴的部属

暗杀了吴,燕晋联军功败垂成。11月15日,袁世凯急任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统率北洋精锐第三镇曹锟部进攻山西。山西民军分南北撤退,阎率部向北,1912年1月12日进占包头。

南北议和时,由于孙中山的努力,袁世凯未敢公开免去阎锡山的都督职务。1912年3月15日,袁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重返太原。阎返太原后,也曾一度设想联合革命省份阻袁集权,但考虑到山西处于袁世凯势力包围之中,慑于北洋权势,他非但没有反袁行动,反而在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执行袁的命令,将山西全省的国民党组织一律解散,本人也声明脱离国民党。1914年6月,袁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任阎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二次革命时,阎没有出面支持,金永[①]祸晋,他不敢反对,但却派兵镇压了洪汉军。

为保全自己的权位,阎锡山还支持袁世凯称帝。1915年4月,他向袁密奏所谓"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给反动的筹安会拨款6万元作为其活动经费,并连续发电给袁,表示支持称帝。1915年12月21日,袁赏封他为一等侯。护国运动时,阎致电国务院,指责护国军"破坏大局,不顾国家"。

袁死后,阎为保全自己的势力,开始追随段祺瑞。1916年7月,各省将军改称督军,阎改称山西督军,次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1917年9月,护法战争爆发,阎在段的指使下,派兵入湖南参战,反对护法战争。

阎锡山在追随段祺瑞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集山西军政

---

① 金永,清末有名的酷吏,袁世凯派到山西任巡按使。

大权于一身，并着手经营山西，增强实力。首先，他利用人民要求和平环境的心理和山西优越的地理条件，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强调要服从中央命令，保卫地方治安。他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来的两个混成旅和警备队扩编成4个混成旅，总兵力约2万人，奠定了晋军的基础；其次，他提倡“用民政治”，建立行政网，编定村制，一村之中有村长；25户为闾，有闾长；5户为邻，有邻长，使他们代行警察职务，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最后，为达到“用民”的目的，极力推行“六政三事”①，成立“六政考核处”、“政治实察所”等机构来督导其政策的扩展和实施。阎锡山实行的一系列加强自己统治和与其他军阀抗衡的退保政策，客观上使山西能够得以摆脱南北之争，暂时出现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局面，加之某些社会“名流”、政客的吹捧，北洋政府曾授予山西“模范省”的称号。

五四运动时，阎锡山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山西学生的爱国行动。慑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1920年阎召开“进山会议”②，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炮制所谓的“公平制度”③，从“理论”上来反对共产主义。为了防止人民革命，1922年他提出实行“村本政治”的主张，强调以村为政治本位，选举地主豪绅分任村长、村副，设立村公所、息讼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

① 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

② 阎锡山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这些会议因会址开始设在太原督军署内一座名为“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故名之为“进山会议”。

③ 包括“资由公给、田由公授、耕者有田、工者有器”。

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训练。同时,他建立小型军火工业,对晋军进行第二次扩充,充实、增补十个步兵旅的编制,新添了师的编制,新建了一个步兵旅、一个手掷弹旅等,使军队比以前增加一倍之多。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左右逢源。1924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阎认为段祺瑞掌权对自己有利,于 10 月下旬公开联合冯玉祥,极力拥护段祺瑞重新上台。为阻止湖北、河南的直系援军北上,阎派兵占领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交通,解除北上增援的直系军队武装。但冯玉祥国民军势力的迅速发展,对阎锡山统治山西和向外扩张都造成严重的威胁。于是,阎又采取联合奉、直讨冯的方针,派兵配合奉、直在晋北进攻国民军。通过这次战争,阎不仅夺取了绥远特别区,扩大了地盘,而且收编了部分国民军,军事实力也大为增强。1926 年秋至 1927 年春,阎进行第三次扩军,将晋军改称"晋绥军",自任总司令,并将步兵扩编为 17 个师。至此,阎的兵力已增至 13 万余人。

1927 年北伐战争胜利在望,他于 1927 年 6 月 3 日通电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改挂青天白日旗,服从三民主义。随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公开表示反共,积极执行"清党"政策,成立自新院,专门管教所谓"政治犯",迫害进步人士,致使山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1928 年 2 月,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北上参加对奉系军阀的战争。6 月,阎军攻占京、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并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控制了晋、冀、察、绥 4 个省区及平津两

大城市。1928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内政部长。

国民党军队驱逐奉军出关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异己部队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激起各派新军阀特别是阎锡山的不满。1929 年，唐生智联阎反蒋，阎先是同意，后又改变主意拥蒋反唐。1930 年 1 月，他亲赴郑州自任讨唐总司令，蒋委任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又怕阎乘机扩大实力和地盘，遂授意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捉阎。阎得知后，仓皇逃回太原。

以后，阎继续扩军，兵力达 20 多万，并以讨论“国是”为名，表示反对蒋介石。一时，国民党内反蒋各派麇集太原，组成反蒋联合战线。1930 年 4 月 1 日，阎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联名通电反蒋。南京“国民政府”于 4 月 5 日下令免去阎本兼各职，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蒋介石调集大军讨伐“叛军”。这样，以阎为首的中原倒蒋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进行期间，8 月 7 日，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发表宣言，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 7 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主席。9 月 9 日，阎宣布就职。18 日，张学良突然通电拥蒋，出兵山海关，阎、冯军败退。阎遂宣布下野，随后逃居大连，托庇于日本，但仍通过其亲信，遥控山西的军政大权。

1931 年 8 月 5 日，阎潜回山西。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阎出于对蒋介石政府的忌恨，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并勒令解散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派兵逮捕党部负责人。1932 年 3 月，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的军政。蒋

为了争取阎,恢复了其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阎重新合流,阎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重新掌权后,继续集中力量发展本省的经济建设,积极扩充山西的实力。制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将各项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另外,他还修建同蒲铁路(窄轨),整顿山西银行,成立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为了发展官营资本,他拒绝给私营工业提供贷款;为了发展本地工业,又成立土货商场,抵制外货,成立"经济统制处"垄断全省经济。由于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使山西的工业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众运动,特别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阎提出"以组织对组织"的口号。他指使亲信建立了"建设救国会"、"文山读书会"、"民众监政会"、"植社"等社会团体,企图以这些组织来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力量。他从马列主义学说中窃取某些词句,杜撰成所谓的"物劳主张",出版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吹嘘其主张是超越马列、胜于孙中山的。1935年又成立"主张公道团",自任总团长。各县则设立"防共保卫团"。他亲自编写《防共应先知共》、《共产主义的错误》等反动书籍,强迫人民唱《防共歌》,以实现他"思想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的目的。1936年,又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进窥绥东,为维护其政治地位和官僚资产,他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又担忧中共力量久留山西,妨碍自己的手脚,1935年冬,拒绝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抗日前

线的要求。

1936年6月，又将所谓的社会团体合并为"自强救国同志会"，自任会长。当时在阎面前有三种力量：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山西；共产党要一致抗日；蒋介石要吃掉他。阎遂采取抗日和日、联共反共、拥蒋拒蒋的两面策略，周旋于三种力量之间。后迫于日寇进逼，在中共的积极争取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1936年9月18日，他支持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后邀共产党员薄一波回省参与"牺盟会"的领导。随后，他主持绥远抗战，在傅作义等将士的努力下，取得了红格尔图保卫战的胜利，收复了百灵庙，给日伪军以有力的回击。接着，他掀起了广泛的援绥运动，振奋了晋军的抗战意志。

七七事变后，阎与中共在一省之内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日，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国民政府任命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阎的同意下，"牺盟会"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一个工卫旅、三个政卫旅，另外还组建了暂一师，统称新军。

日军占领北平后，于1937年9月中旬侵入山西境内，阎赴代县太和岭口指挥作战。平型关战役后，为阻止日军南下，阎组织忻口会战。此战中国军队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后日军从娘子关入晋，阎军腹背受敌，放弃忻口，令傅作义退守太原。11月8日，太原沦陷。由于阎和中共实行了进一步的合作，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抗战，他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1937 年 11 月 24 日,阎锡山退守临汾,在丧师失地的情况下,他的抗日信心有所动摇。军队溃不成军,原有组织名存实亡。为了继续控制战区,1938 年 2 月 16 日他在襄陵县温泉村成立新的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在丧失抗战信心的同时,他又对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心怀疑惧。在日军的政治诱降下,阎逐步采取"避日、反共、拥蒋"的路线,1939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22 日,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①,把矛头集中指向八路军、牺盟会和决死队。接着,解散了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恢复国民党在山西的公开活动。1939 年 12 月初,阎破坏统一战线,充当反共的急先锋,宣布决死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挑起山西新军与旧军的冲突,并下令进攻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制造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这是阎锡山改变"拥蒋、联共、抗日"路线为"避日、反共、拥蒋"路线的转折点。1940 年 7 月,阎与中共代表谈判,答应不再进攻新军,双方确定在同蒲路以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晋西南为旧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区域。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控制着晋西南的十几个县。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在"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思想指导下,为保全自身,公然与日勾搭,于 1940 夏,在吉县克难坡与日本特务大矢晤商,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同年 11 月,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双方达成日军为阎军装备 30 个团的协议。1941 年 3 月,阎又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

① 也叫秋林会议。

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双方口头协议“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①]；离（石）军（渡）公路以北之“防御进剿”由日军负责，以南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

在加强对山西军事、政治控制的同时，他也加强了对各级干部的控制。1941 年，在吉县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炉训练”，对手下各级干部进行严格的集训，灌输反共思想，统一内部认识，以配合他的对日妥协活动。

1941 年 8 月 11 日，阎锡山指使赵承绶在汾阳城内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装备等。10 月，双方进一步达成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发现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有利，加之，与日勾搭本属互相利用关系，于是妥协活动有所收敛。但日军却急于要求阎履行《汾阳协定》。1942 年 5 月 6 日，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等人在吉县安平村谈判，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答应任何条件。后日本对阎施加各种压力，逼其就范，阎一直采取拖延对策。期间，阎锡山虽然口头上对外声称要防御日军的进攻，但实际上仍与日军保持了有间隙的联系。

1943 年，偏安晋西南的阎锡山为解决粮食和兵源问题，在其统治区内推行“兵农合一”政策。他将 17 岁到 45 岁的役龄壮

---

① 赵承绶：《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寇的活动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 54 辑，第 218 页。

丁,每3人编成一个互助兵农小组,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两人各领一份“份地”耕种。当时,阎统区完整县仅7个,但阎利用这一政策,2年时间内募集常备兵7万多人。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锡山打出“开展政权”的旗帜,又加紧与日本勾搭,开始向共产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暗中派遣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1945年他又对日伪县区行政官员按现职发给委任状,保证将来不以汉奸论处。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派赵承绶火速赶往太原与日军商谈“接收太原”问题。1945年8月17日,赵承绶与日达成协议:日军听候阎锡山接收;八路军如攻太原,日阎双方共同阻击。

8月30日,阎锡山回到太原。他委任一批汉奸为高级顾问,改编伪军4万人为省防军,实行所谓“残留运动”,改编留用日俘3千人,积极准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派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向上党解放区进犯,结果被歼3万余人,史泽波被生俘。1946年上半年,阎锡山又多方阻挠和破坏各地的军调小组的调处活动,反对和平,穷兵黩武,在太原、大同、临汾等地修筑钢筋水泥碉堡7千余个。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阎锡山遂向山西各解放区发动疯狂的进攻,但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阎锡山发动的全面进攻彻底失败,阎军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少数县市。此时,他继续推行其敲骨吸髓的“兵农合一”暴政,大肆抢粮抓兵,又在城市进行编组抽兵,同时加强特务统治。1946年4月,他成立特种警宪指挥处,10月22日,又成立太原绥靖公署谍报参谋训练队。阎锡山在太原和晋中各县组成严密的特务网,

任意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军队中由“政卫组”派遣特务，深入连队进行所谓的“肃伪”。

1947年至1948年，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三自传训”[1]，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个人中要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十个人中原有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三自传训”的结果导致杀人极多，从1947年9月至1948年7月晋中各县在一年期间，前后被害的人共达3万之多。阎锡山将解放军遣返释放回的俘虏组成“返干团”和“雪耻奋斗团”，让他们继续为其反动统治卖命。

1948年5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为困守太原，在太原城外组织“百里防线”，决心负隅顽抗，9月，下令成立“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并亲手制定和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组织“民卫军”，驱赶市民为他卖命。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阎坚决拒绝，还将密谋起义的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和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晋夫押送南京枪杀。当阎看到大势已去时，遂于1949年3月29日乘机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的38年反动统治结束。

阎锡山逃到南京时，南京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但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仍操诸蒋介石手中。在蒋、李的明争暗斗中，阎锡山表面上以“调处”身份出现，实际上站在蒋介石一边。

---

[1] “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

4月22日，阎锡山在南京解放前一天，乘飞机逃到上海，26日又从上海飞抵广州。为调和蒋、李矛盾，阎曾二次飞台谒蒋，又两度飞桂见李。5月20日，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李宗仁在推荐居正出任遭到立法院反对后，不得不提名阎锡山出任。6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阎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阎锡山组阁后，立即拟定了《扭转时局方案》、《反共救国案》，提出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指令各省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派人潜入解放区组织地下武装。此外还拟定了《加大地方职权案》、《收支适合的临时预算案》、《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略》、《改善部队及公务人员待遇案》、《保卫台湾海南岛案》等。

广州解放前，李宗仁下令国民党政府迁渝。11月11日，阎锡山再赴台湾谒蒋，15日返渝，18日在出席重庆各界举行的"庆祝政府迁渝"大会上，他提出"确定以寸土必争为目标"，"走民众路线"，"实行总动员"，"完成总体战"。

12月26日，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阎被迫率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到成都，在成都不及半月，又于12月8日迁至台湾。从此，结束了他在大陆的政治生涯。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拟定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面的战法"，以完成"收复大陆"。但他的妄想没来得及实施，蒋介石就"复职"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后，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免去了阎锡山行政院长职。此后，阎仅保留了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职务。

3月16日，阎由台北市繁华的中山北路移往丽水街8号，深居简出，从事人生哲学方面的研究，撰有《人应该怎样》一文。

1950年8月12日，阎由丽水街8号迁往阳明山之菁山居住。这里原是一片废耕的茶园，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阎着人略加开辟，即偕旧部上山，从此开始十年山居生活。他在此建有小组会，文武官员全部参加，由他讲解古代“圣贤”义理。他的讲话以后整理为《菁山草庐讲学录》一书。在菁山初期，他经常下山演讲，一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二是作反攻大陆的精神动员，三是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四是研究传统文化。中、后期主要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先后著有《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大同之路》、《中国政治文化与人生》、《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恢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大同国际宣言草案》、《与慈航法师论道书》、《孔子是个什么家》、《三百年的中国》等。

阎锡山到台湾后，先后患有多种疾病，1960年5月22日病死，终年78岁。



第二十四章　邓　演　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先世务农，父亲邓镜仁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任中学教员。邓演达青少年时期度过10年军校生活。他于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由于聪颖好学，志向远大，很快受到担任该校学长的革命党人邓铿(仲元)(1886—1922)的重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首义后，邓演达曾入伍随军北伐，1912年返回广东，被派送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13年毕业。1914年又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堂(即武昌南湖陆军中学堂)学习，1916年末毕业。接着入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毕业。10年军校生活，使邓演达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这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又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兼修德文，学识日益广博。

1920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所组织的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从此他便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在1920年驱逐旧桂系、1922年北伐、1923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达都出力甚大，屡立战功，因而相继升任为营长、团长。

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

1927年上半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几年，也是邓演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几年。

邓演达积极参加了建设黄埔军校的工作。军校筹备期间，他是孙中山指定的筹备委员之一。因筹备工作开始不久，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即离职而去，该职由廖仲恺代理，邓与廖等人一起积极完成了军校的筹备工作。待军校成立，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训练部掌管学校术科教育和学生管理，主任李济深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工作主要由邓负责。他为专心办理军校，辞去粤军团长职务，迁住黄埔，与学生一起生活和操练，深受学生的爱戴。1924年冬，因遭右派势力的排挤，并为考察外国革命经验，增长才识，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赴欧洲游历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国看到帝国主义者与广大民众对中国人民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苏联看到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心赞助，从而更增强了联合苏联及世界各国被压迫群众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1925年末，邓返抵广州，随即出席国民党"二大"，作《关于游欧的报告》。国民党"二大"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邓重返黄埔军校，出任教育长。1926年3月初，黄埔军校扩大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抨击了蒋介石的行径，引起蒋的不满。4月，蒋以何应钦代替邓演达职务，邓被调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除去主持军队政治工作以外，还直接参与北伐主力之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作战指挥。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邓演达亲临城下督战。时直军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邓的战马被打

死，衣服袖子被子弹打穿，他仍坚持指挥战斗。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同时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再次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他还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工作。邓演达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继日，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独裁深恶痛绝。1927年初，蒋介石为了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挑起了“迁都”之争。他擅自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对此，邓演达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邓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据当时报载，与会群众对邓“一句百合，备极热烈”。2月，邓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长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尖锐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独裁者们虽可“挣扎若干时”，但最终必将成为“群众的反叛者”而走向“坟墓”。① 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提高党权，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后，邓多次发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

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前后的几个月中，邓以很大精力从事发动农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

① 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而“农民要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他与共产党人毛泽东等共同组织了一系列负责农民问题的重要机构，如阳新惨案查办委员会、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4 月 18 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同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后，武汉政府举行二期北伐，进军河南。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 500 余人随军出征。他出入火线，参与第四军的作战指挥。当时舆论盛赞邓演达及所部人员“于军事、政治两方面之进展，卓著功绩”。

1927 年 5 月以后，武汉汪精卫等人日益右倾和反动，终于同蒋介石一样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这革命危急时刻，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不仅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而且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6 月中旬，邓从河南返回武汉。他曾深夜走访汪精卫，劝汪站在革命立场，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汪决心在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的路上走下去。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殚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行前他告诉共产党人“何键一定开刀无疑”，因此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6 月 30 日他写了告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员书，悲愤地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

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接着,邓在《辞职宣言》中,再次痛斥汪精卫等人"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径。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达莫斯科,11 月 1 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共同署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并宣告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12 月转赴德国柏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各国政治、中国经济、农民问题、财政问题、外交问题等多方面内容,以从中探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他还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谈,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德关系问题。1929 年 4 月到德国南部各地参观考察,10 月底赴法国巴黎,再渡海至英国伦敦,并在英国的一些城市考察。1930 年 1 月离英返国。他取道意大利,经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伊朗、印度,5 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邓演达回国后,曾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蒋,但未得到相应的回答。此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已在国内存在了两年。1930 年 8 月,邓演达召开干部会议,把第三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选举邓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邓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

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把三民主义原则与现时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邓演达认为，1924 至 1927 年的“人民革命运动”失败后，“整个的中国复由更反动更黑暗的势力统治着”，南京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下农工民众的痛苦更为加深，因此必须“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所要“继续复兴”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邓演达规定了平民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直接目标和最后目的，指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者，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间接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是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和管理人员等，他们也就是革命民众，即革命动力。革命的对象有三个：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和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三项：民族、民权、民生。直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平民政权。平民政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残余，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设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最后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否认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前途，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掌握着中国主要的经济机关，“压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许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与帝国主义竞争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而平民群众经过平民革命掌握政权后，绝不会再去“仿效欧美，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他并设想：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后，必能运用国家政权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产业建设，即发展“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向着

社会主义前进"。

邓演达坚持平民革命主张,但他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能成功,他也不赞成共产党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主张。他的社会主义观基本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挥,同共产党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

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邓演达不但大力进行反蒋宣传,而且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陈诚和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另方面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十八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六千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①] 1931 年 8 月,第三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前往江西指挥陈诚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在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发动已联系的部队一齐响应。但决定做出未过几日,邓就在上海被捕,起义计划不得不取消。

邓演达被捕前,蒋介石已探知他在上海进行秘密活动,便派人赴沪勾通租界当局悬赏抓捕。1931 年 8 月 17 日,邓出席在法

①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1987 年版,第 281 页。

租界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行的第三党干部训练班结业典礼，叛徒陈敬斋事先向蒋介石写信告密，结果邓被捕，21日解往南京。蒋介石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而邓始终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表示："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表现了凛然的气概和高尚的人格。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前，11月29日下令将邓秘密杀害。12月，宋庆龄到南京营救邓，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杀邓的事实。宋庆龄乃于12月20日发表声明，赞颂邓"坚(艰)苦卓绝，忠勇奋发"，痛斥独裁者杀害"忠实革命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专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初曾指出，以邓演达为领袖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反共"。后来，毛泽东又曾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①] 邓演达确实是一位"以身殉志"，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伟大人物。

遗著编有《邓演达文集》。

①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第二十五章　李　济　深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 年 11 月 6 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一个富农家庭。李济深的青少年时期，正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严重的时期。激于爱国思想，他立志学习军事。1903 年由梧州中西学堂保送入广东黄埔陆军中学学习。不久，该校并入陆军速成学堂。他入步兵科。1907 年毕业后，先在广东新军当见习官，后又入讲武堂学习。1909 年被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深造。1912 年到上海，在姚雨平部任作战参谋，1913 年重返学校学习。1914 年毕业留校任教官 5 年。1920 年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召，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参谋长。1923 年 3 月升任师长。被孙中山委为西江督办，挥师溯江而上占领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击败广西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1924 年 1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时，任副校长兼训练部主任。1925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 年 1 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他未到前方，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李亦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实行“清党”反共。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卷入了国民党派系争斗之中。

1929年1至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和国民党三全大会，采取排除异己、削减其他派系势力的方针，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蒋介石以调停湘事为由，电请李济深赴京。李先同蔡元培等在上海与李宗仁晤谈，后又回南京见蒋介石。事后李济深对记者称：湘事归政治解决，一切听中央办理。但是，3月16日，桂系两将领打电报给李济深，谓蒋已决定用武力讨伐。李即密电李宗仁，商讨对策。两电均被蒋介石的特务获悉。21日，李济深即被软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三全大会决定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获释。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宣布恢复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1月18日，李济深会同十九路军将领、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黄琪翔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起抗日联共反蒋旗帜，成立新政府。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开幕，发布《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①

① 《国闻周报》10卷47期，1933年11月27日出版。

当日晚，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新政府成立，以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组成了以陈铭枢为书记的生产人民党。李济深等宣布退出国民党。11月27日，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订立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福建事变发生后，蒋、汪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于11月23日宣布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蒋派遣十几万大军入闽讨伐，软硬兼施。由于一部分军队倒戈投蒋，1934年1月蒋军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李济深等逃亡香港和海外，继续从事抗日讨蒋活动。

1935年冬，李济深与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分析了日本侵华灭华的野心，揭露了南京政府卖国误国的事实，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最大的仇敌，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是中国最大的汉奸，我们必须铲除这两大仇敌，才能完成中华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与反蒋，其中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宣言提出了同盟的“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两大基本政治主张和八条目前行动纲领，即：(1)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2)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3)推翻南京汉奸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4)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5)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凡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及严守中立的国家视之为友，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抗日战争者视之为敌；(7)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8)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李济深等16人于12月16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一致抗日。1937年2月，李济深等发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痛陈危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亡会议，实现民主自由；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划分国防区，布置国防等五项呼吁。在呼吁中强调"抗战为统一之先决条件，统一则为抗战之必然结果。……任何党派若不欲自绝于国人，决不能违反抗日神圣命令，中共亦当以抗日为前提，履行其约言，改变苏维埃之组织与红军之旗帜，使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之直接组成部分"②。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李济深等于1937年8月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10月25日决定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0月30日公布《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宣言说：自芦沟桥和上海抗战发动后，我民族已呈现空前未有之统一，故解散同盟组织。号召盟员"此后各自淬厉，本历年抗战之决心，作民族忠贞之战士"。又说："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发之秋，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③

抗战时期，李济深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曾建议国民政府军委会注重山西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在武汉东湖又写长信给蒋介石，提出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主张。由于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有一定声望（曾有"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的说

① 《救国时报》第5期，1936年1月4日第2版。
② 《救国时报》第85期，1937年2月28日。
③ 上海《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法),蒋介石对之总存戒心,所以始终未委以军政实权。从1938年底至抗战结束,李主要担任过三个职务,即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0年6月,原白崇禧掌管的桂林行营撤销,新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由李济深任主任,9月,李离开重庆到桂林上任。该厅名义上管辖三、四、七、九4个战区,指导8个省,实际只是承转机关,无作战指挥之权。该机构于1944年春撤销,李济深改任为更无实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衡阳陷落时,何应钦、白崇禧均在桂林,力劝李济深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位。蒋经国也衔其父命来桂林促驾。但李还是决心不去重庆。

在桂林,李济深利用其职位和影响,展开了抗日与民主活动。他掩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并在香港沦陷后,在经济上接济了一批撤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1944年2月至5月,欧阳予倩、田汉、吕复等倡议、组织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李济深被邀担任大会名誉会长。他还捐款给大会作为活动费。6月,由李济深等发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展开抗战宣传活动。他还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号召八桂子弟组织和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6月18、19两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走在队伍前头。宣传周和献金大游行结束后,献金和募集的钱物一部分送交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线的部队。6月28日,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会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7月,组织了以田汉为总队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到湘桂路沿线的兴安、全州等地进行抗

日宣传活动。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该队被迫解散。

桂林沦陷前后,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疏散、转移重庆、贵阳及柳北地区。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等到桂东、贺县、昭平。李济深先到梧州,后又转到家乡廖纯村。这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反动和腐败,他一面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一面联络何香凝和在广东罗定抗日的蔡廷锴等,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并派朱蕴山同张澜、冯玉祥及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系。日本投降后,李济深加紧了这一活动。他派人草拟了组织章程,将章程与同时期何香凝拟的章程一起整理后交何香凝、蔡廷锴过目。1946 年 2 月下旬,李济深经广州去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他委托蔡廷锴、李章达负责筹备工作。3 月 12 日、4 月 14 日,蔡廷锴、李章达在广州集会两次,正式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推举(一说由李济深事前指定)15 人为中央理事会理事,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在李未到之前由蔡廷锴代理。会议通过了宣言,5 月 15 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告该会成立的动机和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宣言》提出了八条时局主张,主要是:政治上主张实行民主,国民党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各项基本自由,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合法地位,中央地方采均权制,各省省宪由各省人民代表制定,各省行政首长亦实行民选。经济上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外交上积极参加国际安全机构,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以平等地位切实合作,反对任何国家在我国土内驻兵及侵害我国家主

权之特权。军事上主张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5月21日,又以蔡廷锴等的名义在《华商报》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政治主张》,更详细地重申了《宣言》的八项主张。《宣言》和《政治主张》阐明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派的一般政治纲领。民主促进会成立后,还决定办一种日报,作为与民盟共有的机关报。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报没办成,蔡廷锴、李章达被警告"限日出境"。不久,总部由广州迁往香港。

李济深在重庆期间,表示坚决反对内战,同时广泛接触中共代表及民主人士。在会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领导人时,表示支持民联的活动。他还和冯玉祥、刘文辉、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聚兴诚银行聚会,分析国内形势,相约一旦内战爆发,"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展开反蒋斗争"[①]。同年5月底,离川赴南京。在南京,他同中共代表联系,着手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回忆说:当时,董必武给予我们七百万元。王葆真带了五百万元,余心清带了一百万元到北方去策反。我自己亦想来北方一行,……但那时,蒋介石已打了三封电报要我去庐山了。[②] 在庐山因同蒋面谈时间很少,便写了一封长信批评蒋的政策。而后,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年底抵沪。

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之名,离沪抵香港。在香港同蔡廷锴等商定了七条纲领,3月9日以《李济深对时局

①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54页。

意见》在《华商报》发表。李济深首先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对于这种危机……应平心静气，很客观的诊视病源，实事求是的找出挽救方法。"他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蒋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客观逻辑必然的结论"。最后他提出七条挽救时局的意见：(1)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正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4)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5)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抑制物价，以安定民生。(6)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7)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废除党内独裁，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李济深的离沪赴港和这个方案的公开发表，表明他又一次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同时表明他实际上迈出了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和同中共合作的第一步。因此，此文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称赞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响应。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于1947年5月召开紧急会议，以"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为由，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

从1947年5月开始，李济深加紧了建立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筹备工作。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除他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年7月1日宣布同上海马叙伦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合并，1948年3月20日又分开，改称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上海者简称民进)外，还有民联的地方组织。在李济深组织、推动下，先后组成了民联南方执行部、民

联粤港澳总分会和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写了致上海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的密信。信写在不大的一块白绸巾上,内容是:"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蕴兄即朱蕴山,原拟派他到上海,后未成行。另托人带口信给谭平山等人。10月初,柳亚子到港,看到信即收起来)柳亚子、谭平山等人陆续由沪抵港。此时,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适出席国际工联理事会后转经美国旧金山回到香港,带来了正在美"考察"的冯玉祥给李济深等人建议成立国民党革命组织的信,并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协商。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曾有"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中国国民党(左派)"或"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等。宋庆龄建议叫"革命委员会",何香凝坚持加"国民党"三个字,以便团结更多的国民党人,孤立蒋介石。最后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领导者,多数人推李济深担任。李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莅港出面领导。大约在10月底,由柳亚子执笔,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六人签名写成了《上孙夫人书》,书中说:"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被蒋介石及其爪牙党内顽固分子推翻后,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与和平便不能早日实现,且深陷于惨酷的内战灾祸中。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

张为主张；我们认定只有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由此两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机关，是本党的合法领导机关；只有此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纲政策，是本党党员真实的奋斗目标。我们拟于代表会议中指出蒋介石背叛总理，背叛遗教，出卖革命，迫害同志，残杀人民的罪行，否认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动中央，并召集继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党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正式中央指导机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先设立一临时中央指导机构，肩起当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如因扼于环境，行动不便，不能于会前赶来主持开会，亦请顺应海内外同志一致之请求，接受拥戴，来函指示进行方针，并于会后以领导人之地位，发表谈话，宣示本党重建之必要，与同意大会之决议。万一发表谈话亦有不方便之处，便只来函指示方针，对于新闻记者之询问，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项请求，甚望夫人斟酌环境及时局发展情形，决定选取其一。现在各地代表已陆续来到香港，开会各种准备工作，亦已大体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1] 11 月初，李济深委托朱学范将书信转交宋庆龄。朱学范通过中国劳动协会的俞志英面交，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章汉夫汇报此事，章汉夫告诉她：你不必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知道了此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

[1] 《革命文物》1980 年第 1 期。

表示全力支持。但她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于1948年1月1日在坚尼地道52号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告本党同志书,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言》分为六部分,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件,体现了李济深的思想和主张。

民革成立不久,中共发出了五一号召。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谓"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成熟,应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并派当时中共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同他们面议[1]。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同其他党派一起发出了致毛泽东电及对国内外通电。6月25日,民革单独发表声明,表示愿为新政协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时提出:"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对于"美帝国主义,必须坚决反对,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最后说:"今日之中国,只有

[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①1948年8月，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欢迎他们北上，同中共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李济深在香港，一面领导民革讨论新政协各项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派人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初北上之后，他们所联系的各种关系交中共南方局处理。同时，他还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发表了对国内局势、新政协的内外政策的看法。例如，1948年11月2日，有记者问：外间所传李将军将被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接受否？李答：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蒋政权既不能立足于东北华北华中，在华南西南，甚至于台湾，亦决不能维持其统治，因为全国人民都反对这一个反动政权的。问：新的联合政府对于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政策如何？答：只要美国变更目前政策，即刻停止援助蒋介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在两国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欢迎美国人来做生意。问：新政府也需要向美国借款吗？答：我们素来主张与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友好的，将来新中国需要美国经济与技术的援助，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12月8日，又有

① 《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

记者向他提出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他回答说：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中共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1]。这期间，他在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人物的接触中，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

1947年11月在美国人授意下，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派人向李济深游说，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给李以主任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妄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李济深断然拒绝。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电话约李面谈，希望与李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宋的一番话，对部分民革成员有吸引力，但李仍拒绝[2]。1949年初，李济深离港北上不久，黄绍竑又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到港，表面上是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是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由于黄到港扑了个空，目的未能达到。

不论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是从李济深的个人安全考虑，李宜尽快离港北上。在何香凝等人催促下，由中共安排，李于1948年12月26日晚登船离开香港，1949年1月7日抵大连，1月10日到达沈阳。此时，李济深对民革"接受共产党领导"问题，作了明确表态。据朱学范回忆，1月8日晨，李济深同他谈话

---

① 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162页。

②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5页。

时说：香港民革内部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很重要，有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我既下决心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1月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1月22日，李济深与54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1月27日，民革发表《对时局声明》，强调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必须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2]《声明》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而玩弄的"企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等政治阴谋，表示完全支持1月14日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和八项条件，将革命进行到底。2月25日，李济深由东北到达北平。1949年9月，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06页。

[2] 民革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编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64—265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12至16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把民联、民促、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由李宗仁派来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的张治中等人及一些起义将领)团结起来,组成了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

1954年9月,李在全国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9月17日,作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向中共"八大"致祝词,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运用与发展,是中国革命中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表示:"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监促,各尽所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①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5页。

第二十六章　冯　玉　祥

冯玉祥，字焕章，谱名基善，1882 年（清光绪八年）9 月 26 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济镇北街（现为沧县兴济镇），祖籍安徽省巢县西北乡的竹柯村。冯玉祥出生不久，全家又迁居保定城东的康格庄。由于家境贫寒，冯只读了两年多的私塾。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冯有茂为刚满 10 岁的冯玉祥在兵营中补了名额，以便领些银子糊口。1894 年，清政府对日宣战，冯玉祥与其父随保定练军开赴大沽口，亲眼目睹了日本军舰的罪恶行径。

1896 年，冯玉祥刚满 15 岁，正式入营当兵。他在父亲的指点和管教下，开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不久，冯有茂因病被裁。冯玉祥为了挣钱养家，愈发刻苦操练、学习，开始阅读《操法》、《阵法》等兵书。他看到淮军暮气沉沉，便于 1902 年 2 月 20 日离开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右哨六棚。1903 年 4 月，冯升为四棚正目。12 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1905 年武卫右军改为第六镇，冯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本连排长，深得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的器重。不久，冯玉祥成为陆建章的内侄女婿，得到了陆的提拔和帮助。1910 年 9 月升为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1 月

30日,同盟会员白亚雨赴滦州,联络冯玉祥、王金铭等,策动革命。第79标官兵起义后,于1912年1月3日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冯为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正式宣布独立。不久,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损失严重,王金铭、施从云遭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伏兵杀害。冯得陆建章搭救,幸免于死。

袁世凯编练备补军时,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升任第一团团长。1914年春,冯随陆建章入陕。途中冯改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后冯部扩编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冯为旅长。此时他开始注意培养军事干部,成立了以李鸣钟为首的模范连。

1915年夏,冯玉祥奉命入川,不久收到要求他列名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电文,冯反对帝制,没有签名。护国军进攻四川后,冯玉祥竭力避免自己的部队与护国军对抗,并力劝四川都督宣布讨袁,终于促使陈宧宣布四川独立。

袁世凯死后,冯部移住川北剑阁。不久,他致电陆军部要求"回京就医"。段祺瑞为使北洋势力进一步控制四川,不同意冯部离川。冯毅然率部离开剑阁,最后到达河北廊坊。此事招致段祺瑞忌恨,段下令免掉冯的职务。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讨伐张勋。他深感军事力量不足,迫不得已而起用冯玉祥。冯玉祥于7月6日,发表了讨伐张勋的通电。反复辟之役中,冯立了大功。

1917年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后,段祺瑞调冯率十六混成旅南下援助李厚基。冯同情并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又不敢公开反段。当部队开拔到浦口时,即滞留该地。1918年2

月 14 日，冯在武穴发表主和通电，18 日，又发通电，主张恢复国会。段祺瑞于 2 月 25 日再次将冯免职，交曹锟查办。这时曹企图拉拢冯部，遂请政府准许冯免职留任。从此，冯投向直系，但始终未成为直系的嫡系。

1918 年 3 月下旬，冯率部离开武穴，进驻湘西，平定了湘西曾尚武流寇。6 月 14 日，进驻常德。冯曾于 1913 年在北京时开始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常德期间，在军中设教堂，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并为 100 多名官兵施行洗礼。

1920 年 6 月，直皖战争爆发，驻守沅陵以西的皖系田应诏部及湘军赵恒惕部直逼属于直系的冯部，冯被迫北撤，移驻河南信阳。

直皖战争中直系打败了皖系，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直系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任陕督。阎于 1921 年 6 月初，令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与吴新田的第七师同时发动对陈树藩的进攻。此时，阎电请北洋政府将第十六混成旅改为陆军第十一师，冯升任师长。不久阎死，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

进驻陕西是冯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冯平生第一次取得了一块大地盘。他统一军政，收编了胡景翼等杂牌军，加紧整顿和训练军队；同时为地方选贤任能，筑路办厂，在省政上颇多建树。

1922 年 4 月 29 日，直奉战争正式爆发。4 月 19 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全部由陕出发，向洛阳集中。当直军在长辛店一带战事吃紧时，冯立即派二十一旅李鸣钟部增援。冯亲自督战，大败河南督军赵倜。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冯因战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他颁布《治豫大纲》，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

良社会风尚、重视教育、发展交通事业。这些政绩为中原百姓所称道。同时他又扩充部队,增强了自己的势力。

1922年10月31日,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并授予扬武上将军称号。陆军检阅使是个虚衔,但冯却利用这一时机大力练兵,在两年时间内,练就了3万名精兵,为冯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冯玉祥在治军中注重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曾把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史实编为《国耻歌》,他还提倡官兵同甘共苦。冯驻南苑期间,元配妻子去世,1924年2月19日,与李德全结婚。

1924年9月,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方面的国民党人士徐谦、钮永键、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时常与冯联系,劝冯联合奉、皖,推翻直系军阀。冯玉祥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并争取同盟者,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秘密联盟,决心倒戈。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冯在古北口与奉方代表达成协议:约定事成后,请孙中山北来,奉军不得入关。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10月19日,冯召集部下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倒戈计划,改部队名称为国民军。20日清晨,鹿钟麟指挥部队控制了北京全城。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旋即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此次事件被称为北京政变。10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讨论政府改组,决定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曹被迫于11月3日宣布退职。冯等于10月31日组织了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但是冯为北洋军阀各实力派所忌,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军阀,公开反对北京摄政内阁,于是冯决定联皖制直。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分别到天津会见段祺瑞,决定推段为中华

民国临时执政府总执政，同时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11月21日，段祺瑞通电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日益加重，李德全曾持冯玉祥亲笔信到孙下榻处看望。孙中山将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冯令全军悼亡举哀。此时他开始认识到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

此时1925年1月，冯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段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要他将部队整编为6个师，人数在15万左右，取消国民军番号，称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3月，冯赴张家口就职。

到西北之前，冯经徐谦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苏联军事顾问开始进入西北军。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冯玉祥联合西北军各将领致电段祺瑞，要执政府"严重对外，不必顾虑"，表示"为国赴难，愿效前驱"。他几次召开张家口各校学生、各界民众反帝示威大会，亲自带头高唱《国耻歌》。6月13日，冯令所部一律臂缠黑纱，为上海烈士致哀，并号召西北军官佐捐款援助五卅罢工工人，冯个人捐大洋1万元。他主张以武力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

1925年底，北方形成了直系、奉系、直鲁联军联合进攻西北军的形势。冯玉祥见形势不利，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3月20日，冯赴苏联考察，会见了苏联的许多重要领导人。5月10日，冯宣布参加国民党，要为国民革命而战，并要求共产国际派刘伯坚随他前往西北军。不久，冯启程回国。

此时，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节节胜利。1926年9月16日，冯到达五原后发表了五原誓师宣言。17日，国民军各部将领公

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被委任为广东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冯指挥国民军解了西安之围。此役吸引了刘镇华的10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返抵西安。此时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这时,宁汉对立已经形成,冯极为忧虑。武汉政府于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冯决定向东进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3月11日,冯发布讨奉檄文,对鄂、豫、察、绥等地三路出师,自兼中路军总司令。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汉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

正在此时,冯得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的消息,立刻全力营救。5月6日,冯赴潼关督师时,得知李大钊遇难的消息,立即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大会。

冯到潼关督师后,连续攻占陕南各地。6月1日,冯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史称"中原会师"。6月10日,冯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邓演达等人举行"郑州会议"。双方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冯不同意讨蒋,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会议决定将豫、陕、甘三省党政大权交给冯;成立开封政治分会,冯为主席;第二集团军改编为7个方面军,人数达四五十万。6月20日,冯又与蒋介石等在徐州花园饭店举行"徐州会议",双方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徐州会议后,冯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了"清党",将他军

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礼送”出境。为拉拢冯，蒋于 1928 年 2 月 18 日亲临开封，与冯“义结金兰”。

1928 年 4 月 10 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令，第二集团军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与孙传芳军作战，大获全胜。冯、阎、桂三位集团军首领都认为北进抢先占领京、津对自己发展实力极为有利，所以都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打算。结果冯军率先攻占京、津。但在蒋与阎锡山秘密达成政治交易后，却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让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同意，但内心颇不愉快。在蒋、冯、阎、李四派联合打败各派军阀的过程中，冯军战斗力最强，付出的代价最高，然而最后仅任北平特别市市长，辖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对地处贫瘠、人员庞大的西北军，只能算杯水车薪。因此，冯耿耿于怀。接收北平后，蒋介石准备召开善后会议，冯“托病”不参加，经蒋一再电促始抵北平。在前往西山祭告孙中山之后，蒋、冯、阎、李等在碧云寺旁举行汤山军事善后会议。蒋在会上先后抛出《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而冯却在“时局通电”中唱反调，冯、蒋矛盾步步加深。

1928 年 8 月 8 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开幕，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发表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要求冯、阎、李 3 人长期驻在南京。实际上是要这 3 人长期脱离他们的军队。1929 年 1 月 1 日，全国编遣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阎锡山的编遣提案得到多数赞同，这一方案是抑冯、拥蒋、利阎的方案。冯玉祥提案遭到否定，便离开南京。从此，蒋、冯之间由合作转向分裂。

1929年初进行的蒋桂战争以蒋胜桂败而告结束。5月7日，蒋发表《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策》，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蒋、冯战争势不可免。1929年5月22日，被蒋介石收买的韩复榘、石友三联合发出“甘棠通电”，拥蒋叛冯。5月23日，蒋操纵中央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5月25日，国民政府下令讨冯，5月27日，冯通电下野。

此时，阎锡山以蒋、冯之间调停人的面目出现。三番五次约冯到太原面谈，意在“挟冯以自重”。1929年6月25日，冯抵太原之后，被阎软禁起来。8月1日，编遣会议在南京重开，阎因对中央编遣会议不满，遂联冯反蒋。冯决定发动反蒋战争。10月10日，冯部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一面对冯用兵，一面拉拢阎锡山。26日，阎锡山突然声明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时局，劝冯令西北军各部停战，并将“国民军”的军事秘密向蒋报告。28日，蒋亲赴汉口督师，并任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2月1日，冯军反蒋战争失败。冯对阎的背约痛心疾首，密召鹿钟麟到建安村(冯被软禁之处)，命鹿到潼关主持军事并佯装与蒋方往来，造成欲与蒋联合之假象。

另外，蒋打败桂系和冯玉祥后，即腾出力量对付阎，先接收了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拒绝支付阎的平津卫戍司令部所辖军政费用。这时，阎一则深怕蒋、冯联合，二则受蒋钳制日重，因此坚定了反蒋的决心。1930年3月14日，阎亲自送冯返回潼关。冯抵潼关的当天，即号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发表请蒋下野的寒电。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就任副总司

令，蒋、冯、阎、桂大战随即爆发。

大战开始后，冯军在陇海路、平汉路连连取胜，8月初，冯组织了大规模的八月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兵分7路猛进，蒋军岌岌可危。此时，蒋军从晋军手中夺回济南，晋军退回山西。冯军发动的八月攻势因晋军未予有力配合而未能奏效。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退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陷入孤军作战局面。9月28日，张学良发出吁请罢兵的巧电，派兵进入平津及河北省。这时冯的部下庞炳勋、刘春荣、石友三等被蒋收买。10月初，蒋军直攻开封、郑州。11月4日，阎、冯在太原通电下野。西北军全部瓦解。冯从此失去了与蒋对抗的实力。但这也成为他转向民主派的起点。

战败后，隐居汾阳城郊峪道河的冯玉祥埋头读书，阅读了社会、政治、历史及文艺等方面的书籍。此时，冯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络。

1931年7月，冯策动石友三反张学良，被东北军打败。同年下半年冯策动甘肃旧部反蒋，被蒋军打败。

1931年9月20日，冯玉祥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于23日发表通电，指责蒋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要蒋介石“认罪”和“停职”。10月21日又发表著名的马电，提出了抗日救亡的13项主张，其中有“充实国防”、“恢复民众运动”、保障人民的自由、惩罚贪污等。冯玉祥又和广东方面南北呼应，促蒋下野。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冯离开峪道村去南京。冯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三个抗战救国的方案。1932年1月下旬，蒋、汪重新合作，联袂登台。冯决定支持蒋汪政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大力支持十九路军的英勇抗

敌。12个月之内,冯在南京、上海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但毫无结果,于是他于1932年3月23日离开南京去泰山居住。

1932年6月初,南京国民政府由顾维钧出面,致电冯玉祥,称国联李顿调查团要到泰山来看他,冯断然拒绝,认为会晤国联调查团是耻辱。

冯在泰山建立研究室,延请社会名流进山授课,课程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发展史等,并利用学习间隙,调查周围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于24日发表通电,就任总司令。同盟军的主力是冯玉祥的旧部和方振武在山西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以及察省地方抗日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东北各地撤退到察境的义勇军及从平津华北等地来的爱国青年,达10万之众。同盟军成立后,全国各地纷纷致函电支持。6月15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确定了否认一切卖国协定,以武力收复失地的方针。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1日,收复宝昌、沽源。7月12日,克复多伦,察哈尔全省光复。

正当同盟军抗战节节胜利之时,7月2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发电,向抗日同盟军提出4项通牒,同时让何应钦调16个师兵力"围剿"抗日同盟军。同盟军陷入困境。8月7日,冯被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于8月17日重返泰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建组成中华共和国人民

革命政府，冯派余心清参加，并被选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冯积极联络韩复榘、宋哲元，以期形成南北呼应的反蒋之势。1934年1月，福建政府失败，冯的反蒋活动再次失败。

1935年11月2日，冯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向大会提出救亡大计案，包括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奖励抗日精神，精诚团结等各款，获得大会通过。不久，冯当选为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18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6年6月2日，两广事变发生。冯玉祥深怕内战再起，一面与蒋介石商议调解，一面连日致电陈、李、白，力劝停止军事行动。冯为两广事变的平息尽了斡旋之劳。

1936年11月23日，宋庆龄致函冯玉祥，请其援救"七君子"。冯随即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不断向蒋介石和陈布雷发出函电，直至"七君子"出狱。

西安事变爆发后，冯玉祥竭力主张和平解决。12月13日，冯致电张学良，劝张以"同挽国难"为重，自己愿为人质，请张"释回介公"。同时力劝旧部宋哲元、韩复榘拥护中央，对新闻界表示"保护最高军政领袖之安全，实为全国军民最大之责任"。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尽了全力。1937年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冯玉祥同宋庆龄等提出了《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积极主张国共合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冯致电第29军将士："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7月10日，冯发表《对芦沟桥事变谈话》，指出全国军民应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8月15日，冯在苏州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国民政府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改任冯为该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蒋

又将冯调到平汉线。10月20日，冯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到南京后，即被免职。

1937年11月中旬，沪宁线战情恶化，蒋介石命冯玉祥到平汉线南段视察国防工事。未几，冯抵达武汉。在武汉的一年中，冯编写了《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士问答》等小册子，在民众中广为散发。冯还创办了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传品和列宁、毛泽东的著作。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冯玉祥以"丘八诗人"身份参加，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38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9月，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1939年5月，督导工作结束。

冯玉祥回到重庆后，投身于各项进步文化工作。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4周年，重庆文化界300余人举行纪念大会，冯玉祥任大会主席。他发表演说，号召学习鲁迅的"真"、"硬"、"韧"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

1942年12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主持成立了"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以后各地逐步成立分会。冯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献金运动，到1944年9月，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计算，捐献金额达黄金23000余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重庆，当天即去看冯。冯也回访毛泽东。冯还多次出席有国共双方领导人出席的集会、宴会。

1945年12月，冯玉祥发表了《建国问答二〇四问》，集中阐述了他的民主建国思想。他认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国"。他提出要实行以下各事："发展科学，民主政

治，经济建设，国防军事，解放妇女及儿童，健全国际关系，建立工业基础，改良农业及造林畜牧，扶助商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改良人种，发展交通，提倡渔业。”在政治上他认为人民应有自由，即“发表的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经济上他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经济”。

1946年初，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的要求，至4月7日，国民政府才同意他“赴美考察水利”。9月2日，冯玉祥启程赴美。在美国期间，冯日夜关注着国内形势。此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政府大肆镇压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冯于1947年5月26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即日停战议和，由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等主持和议大计”，“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

1947年10月10日，冯玉祥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上发表《国庆演词》，呼吁实现和平民主，抨击政府的暴行。冯为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于1947年11月5日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坦率地表明了与蒋介石的分歧，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

1947年12月26日，蒋介石勒令冯玉祥于12月底回国。冯于12月30日发表声明，予以严厉抵制。蒋吊销了冯的护照。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被选为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即积极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各图书馆及华侨社团，努力扩大民革的政治影响。

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冯为防不测，

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冯玉祥受到美、蒋反动势力的逼迫,在美国的生活难以为继。经周恩来、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安排,冯于1948年7月31日离美,登上前苏联"胜利"号轮船,准备经前苏联回中国解放区参加新政协。9月1日中午,"胜利号"在向前苏联敖德萨港行进时,船上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终年66岁。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盟友、著名的爱国将军,195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居住过的泰山西麓。



第二十七章 张 澜

张澜，字表方，四川省南充县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幼随其父（张文倬，塾师）读书，1894年中秀才，1897年补廪生，1902年到成都尊经书院学习，1903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1904年因发表要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言论被清驻日公使送回国内。由此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与政治生涯，历经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当过学校校长、国会议员、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务。张澜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1904年留日归国后先在四川办教育，担任过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顺庆府中学堂监督等职务，并在南充创办了民立两等小学堂、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端明女塾。他的政治活动，则从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开始。

保路运动，也称铁路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湘、鄂、粤、川四省人民掀起的反对清政府向列强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20世纪初，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被外国人夺去的铁路修筑权和

经营权,自办铁路。清政府也在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筑路。于是,各省纷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慑于外国人的压力,竟于1911年5月9日颁布了"干路均归国有"的谕旨,宣布1911年以前各省集股商办的干路一律收回由国家办理。5月20日,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卖给了外国人。清政府这种以"国有"之名行卖路之实的行为,激起了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破约(要求废除卖路合同)保路(保护路权)运动,而四川人民的反对最为激烈。张澜作为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保路运动。6月17日,他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了在成都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日,他在保路同志会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今吾爱国,必破约以保路"[1]。8月5日,在川汉路股东特别大会上,他被推为副会长(会长颜楷),在演说中再次强调必须"破约",驳斥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会上提出的"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的说法。8月间,他还几次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写呈文,请赵尔丰代奏川路仍归商办和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李稷勋时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9月7日,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8人诱至督署加以逮捕,欲以此镇压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张澜等被拘禁三个多月,至四川宣布独立始释出。他随即又参与四川独立

1 《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独立较晚，先后出现过重庆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成都四川军政府（先由蒲殿俊为都督，实为赵尔丰操纵，后革命党人尹昌衡杀掉赵尔丰，继任都督）两个主要政权。1912年2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张澜任军政府的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到北京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回到南充。在南充，与地方人士一起创办南充实业学校和果山蚕桑社。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响应蔡锷的讨袁活动，联合驻南充的川军混成旅旅长钟体道起而反袁。1916年3月28日宣布顺庆独立，成立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钟体道），张澜任政务长。8月，被任命为嘉陵道道尹。此时，入川的滇、黔军及四川各军混战不已，张澜多方调解无效，便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解决川局之乱。1917年10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为战乱所迫，张澜于1918年5月离川抵京，在京设四川省长行署，至1920年9月为奔母丧返回南充，年底卸省长任。

在北京期间，张澜曾任北京《晨报》董事，并主持《晨钟报》。他曾设法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他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赞成改良，不赞成社会革命。1919年4月28日，在《答梁乔山先生书》中说："为今之计，政府所执之政策，应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速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自由发展。而先知先觉诸人，则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发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盖

必先求避去无意识之社会革命,使社会秩序不至大破坏。而民众之智识足以赴其途,则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自可徐见于事实。"①

张澜最关注的是川事的解决。他曾为停止战乱、恢复和平秩序多方奔走、呼吁。回四川后,他提出"四川为独立自治省,废督裁兵,实行民治的主张"。他说:"四川为独立的自治省,则无论或南或北,或徐或段,两派再有若何之事,不致牵连受祸。废督军,则内争之目标失。裁兵,则民困可以渐苏。实行民治,则地方实业既可发展,尤不受全国政治革命影响而复起变乱。……且不急行民治,则主张社会主义之过激者,必将起而先之,地方将不免愈增扰乱。故与其拖泥带水,贻误川局,何如快刀斩乱麻,使所谓轇轕纠纷一齐立解也。"② 他不仅有主张,而且付诸行动。1921 年 4 月,与川北 24 县代表开"川北善后会议",被推为会长。1925 年又发表通电,提出解决川事办法,即不能专听命于执枪之军人及不熟悉川情的北京政府,应由督办召集有每县一人及职业团体所推代表和各军将领参加的会议,议定裁兵标准及办法、组织制定省宪之机关,以体现主权在民精神。当年 12 月 17 日,以个人名义出席了督办刘湘和省长赖心辉召集的四川善后会议。

1926 年 4 月 6 日,张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他主持成大,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允许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

① 《张澜文集》,第 35 页。

② 《张澜文集》,第 40—42 页。

行社、国家主义派的惕社同时在校内存在和讲学。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他发布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① 正当张澜苦心经营之时，1928年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借口省一中学生殴毙校长杨廷铨一案，逮捕并杀害了成大等校中的中共党员及进步师生多人（内有成大学生6人）。惨案发生后，张澜愤而辞职，发表郑重申明："我之决心辞职……不只是为成大及成大学生而言，实在见得此次惨案之关系极为重大。以前军人之横暴，尚不敢公然无故杀人。试问以最高学府之大学，尚且突然派兵围搜，以后更何有于其他学校不可以任意蹂躏；以大学之学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审讯，供证俱无，立予枪毙，至今不知其所犯为何罪，以后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菅而禽狝之。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② 经师生挽留和不忍成大中途停顿，他答应在新校长到任前，暂负责任，至1930年冬自动离职。1931年1月，复任南充中学校长。此后，他受刘湘委托，率考察团出川考察教育、实业和地方自治情况，并在1934年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副会长。他也不断和共产党人有所接触。1935年，促成了刘湘派人与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1937年，掩护和协助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

① 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

② 《张澜文集》，第83页。

震在川北恢复和发展地下组织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主张长期抗战，以对付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1937 年 7 月，列名发起"华北抗战四川民众后援会"，被推为会长。1938 年，国民参政会成立，被遴选为参政员。从此，他全身心地致力于抗战、民主、团结的事业。当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出"艳电"公开投敌时，他和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于 1939 年 1 月 3 日发表了"讨汪通电"。在第一届参政会上提出了《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既指出了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又提出了选任县长至中央大员的四条资格。1939 年冬，参与发起各小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接着又参与发起成立各小党派的统一政治组织。1941 年 3 月 19 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张澜的好友鲜英寓所)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作为无党派人士参与发起，并在 1941 年下半年接替黄炎培担任了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职务(他终生担任此职)。之所以推举张澜为主席，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公正刚直，主张正义，爱国爱民，在这一三党三派联合政治组织中众望所归；同时也因他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关系，有利于在当地开展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②

张澜任民盟主席后，首先于 1941 年 11 月 16 日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召开茶话会，以他和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四人名义公开了民盟的组织。接着在 11 月 25 日领衔与张君劢等 12 人

① 张乔啬：《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人民日报》1982 年 3 月 4 日。

② 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 110 周年诞辰文章)，《人民日报》1982 年 4 月 1 日。

联名提出(沈钧儒等 11 人副署)致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的提案《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共十条办法,主要是"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为节省抗战时期财政支出……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应发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尤以战时如然,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并严厉禁止青年学生参加党派斗争以饬学风而固国家元气";"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并禁止一切非法特殊处置";"实现经济民主化之原则……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藉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1]。这个提案,实质上是重申了民主政团同盟的主要政治主张。由于议长蒋介石不同意此案,故未交付大会讨论,蒋介石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劝张澜等收回提案,而另由主席团名义拟了一个四条内容的提案《促进民治与加强抗战力量案》,交大会讨论。张澜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

1943 年,张澜根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观察,认为国内人才不能集中,民意不能申张,党争不能消弭,关键在于未能实行民主。7 月 6 日,他致书蒋介石,反复申明实行民主的必要性。9 月,

---

① 《张澜文集》,第 136—137 页。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和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决议。针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张澜在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民主政治五个方面，对他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作了全面论述。他认为，真正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必要条件：主权在全体国民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一个党手里；众人的公事要由全体民众直接讨论处理或选举代表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决定；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决不可削弱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一个国家应有民主宪法，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国之元首，亦不得以自我意志变更法律。他认为，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竟至党权超过国权，会使民主变得名存实亡。在中国，舍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外，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永远无从谈起[①]。蒋介石看见这本小册子后，"当面威胁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同时下令禁止发行。但此书在秘密传播中不胫而走，影响很大"[②]。延安《解放日报》在1944年2月22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对它作了详细介绍。

1944年9月，张澜到重庆主持召开民盟全国代表会议，通

---

① 见《张澜文集》，第185—196页。

② 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诞辰110周年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

过了民盟纲领草案。同时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成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同。张澜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1944 年 10 月 10 日，民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1945 年 1 月 15 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文告中所说的不等战后就可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民盟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1] 3 月 10 日，民盟发言人对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提出“目前中国之迫切需要，不仅须切实做到‘还政于民’，更须切实做到‘还军于国’”[2]。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建设什么国家的斗争突出起来了。民盟也形成了国共以外的第三个大政党的地位。1945 年 7 月，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庆会谈。中共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由国共两党及民盟三方以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政治会议的建议。8 月 3 日，张澜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重申民盟的中心主张就是抗战、民主、团结三层，民主一层又是中心的中心。并提出了战后立国的“两个根本原则”：“一、对

---

① 《民主同盟文献》1945 年 12 月出版。

② 《中华论坛》第 9 期，1945 年 9 月 15 日出版。

社会各阶层都保障其应得权益，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而求社会的和平顺遂地发展。二、切实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准、文化水准，以打破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落后状态。”[1]8月15日，民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多次会见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坦诚交换对时局的意见。8月30日、9月2日、9月15日，毛泽东三莅被誉为“民主之家”的上清寺特园，同张澜面谈。张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当毛泽东向张澜介绍国共双方会谈情况时，张澜建议将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还说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9月18日，张澜在《新民报》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除要求商谈内容随时公诸国人外，着重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和军队国家化问题，批评了“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和“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两种观点。国共谈判临近结束时，10月1至12日，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8日民盟中央将它定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宣言、纲领和组织规程、组织发展方针。政治报告阐述了民盟的政治理论。大会选举了以张澜为主席的领导机构，为民盟投入战后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

[1] 《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裁的斗争作了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10月10日，根据签字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决定召开有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每方出9名代表。在中共的支持与帮助下，民盟顶住了国民党假手青年党拆散民盟的压力，组成了统一的以张澜为首席代表的9人代表团①，出席了1946年1月10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

会议前夕，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要求1946年元旦双方停止武力冲突。在会议过程中，张澜本着民盟"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来完成建国"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一贯主张，首先提出了《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并在协商过程中，坚持实行普选的议会制（两院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坚持各党派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成立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从事制宪和整军的原则。民盟的主张在政协五项协议中得到了体现。

在旧政协召开期间，民盟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达成了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在1946年维护政协协议与坚持政协路线的过程中，双方有成功的配合与合作。第一、在争取两项否决权问题上实行了合作：为了保证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不致在国民大会上轻易被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上合占1/4强；为了保证和平建国纲领在国府

① 旧政协由国民政府主席召集，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四方各9名代表，共36名。在国民党指使下，青年党提出单独参加政协并要求9名代表。经国共妥协：共产党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会议再增加2名，共给青年党5名。这样，政协参加者变成五个方面38名代表。民盟与社会贤达名额不变。

委员会上不致被轻易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府委员名额上合占 1/3 强。这两项要求，国民党政府始终未予答应。第二、在抵制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召开的非法国大问题上实行了合作。按照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停止内战、政府改组、完成宪法草案的修改、各党一致参加的条件下召开。但国民党已经发动了内战，并在 1946 年 10 月 11 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由蒋介石宣布当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大。中共当然坚决反对。民盟亦早在 9 月 30 日就致电蒋介石表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召开国大的立场。10 月 14 日，张澜在重庆发表谈话称："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民主达到统一。和平，不能打；民主，即是要打破一党独裁，实现联合政府"。"国共双方现在谁也打不倒谁……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必走政治协商的路。"[①] 11 月 12 日，民盟留京中委在蓝家庄民盟总部作出不参加国大的决议。当晚，张澜从重庆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叮嘱"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②]。11 月 14 日，张澜又同记者谈话，表示"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③]。非法国大召开和制定了所谓宪法后，民盟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拒绝承认。在 1947 年

① 《新华日报》1946 年 10 月 15 日。
② 《民主报》1946 年 11 月 18 日。
③ 《新华日报》1946 年 11 月 15 日。

1 月民盟在上海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张澜指责国民党凭藉“超法律”的权力，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地制定所谓“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接着，民盟又谴责了国民党的所谓“政府改组”。

国民党对民盟一向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随着内战的发动，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946 年 7 月，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8 月 18 日，在成都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时打伤了张澜。1947 年 10 月 7 日，在西安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重庆、成都大批逮捕盟员。7 月间，在桂林、南宁、八步等地又有百余人被捕。为此，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要求停止一切非法压迫在野合法党派行为，释放被捕盟员。10 月 23 日，南京民盟总部开始被特务包围监视。10 月 27 日，内政部发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上海的张澜即派黄炎培等赴南京同国民党交涉。结果，国民党政府仍令民盟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在宣布解散的前提下，“各地盟员之登记手续可予免除，并保障合法自由，但今后如有假借名义作非法活动者，各地治安机关仍当依法处理”。11 月 5 日，张澜等被迫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11 月 6 日公布了张澜署名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①]。公告发出后，张澜口述、叶笃义笔录了如下的书面谈话，并公之报端：“余迫不得已，忍痛于 11 月 6 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

① 上海《申报》1947 年 11 月 6 日。

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①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了,但民盟没有被压垮。从11月下旬起,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沪抵香港,于1948年1月5至19日和原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一起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领导机构,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号召和领导盟员更坚强地站在革命阵线一边,展开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斗争。张澜虽未去香港,但支持这一新的斗争,并在上海抱病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49年4月,他和罗隆基等被国民党软禁于虹桥疗养院。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党营救而脱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张澜与罗隆基、史良等发表声明,祝贺上海解放。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表示愿去北平共同筹划未来建设。6月1日,毛泽东等复电表示欢迎。6月24日,张澜等由沪抵北平。9月,张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1日政协开幕会上,他以年近八旬的高龄,身着布衣长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

① 上海《申报》1947年11月7日。

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和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我今天愿与在座的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指共同纲领)责任。"[1] 这个讲话，是他对数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深刻总结，表达了他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心声。10月1日，张澜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5年2月9日，张澜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

① 《张澜文集》，第364、365页。

第二十八章　黄　炎　培

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厅（今上海市川沙县）人，生于 1878 年 10 月 1 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卒于 1965 年 12 月 21 日，享年 87 岁。

黄炎培生在一个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塾师家庭。其父黄叔才，本地庠生，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到吴大澂（曾做广东、湖南巡抚，东河道总督）幕府当秘书，1894 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1891 年病故。黄炎培自幼随母认字，9 岁起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韵家丰富的藏书广读博览。1898 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后，为生活所迫，他作过百货店的临时售货员、塾师，一面劳作，一面读书和习作诗文。由于诗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镇王筱云赏识，王将女儿嫁给他为妻。1901 年秋，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首届），选学外交科。特班总教习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学生读书、作文，还教学生日文和练习演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给黄很大影响。1902 年秋，黄炎培到南京应乡试，中了举人。不久，学校发生风潮，学校总办将南洋公学解散。黄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回川沙办学，1903 年春他主办的川沙

小学堂开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还时常到别处讲演。1903 年 6 月 18 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说，由于地方痞棍诬告他们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知事于 6 月 23 日将黄等 4 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在 6 月 26 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被保释出狱，随即乘船离开上海，亡命日本。

1904 年亡命归来。1905 年秋在上海由当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的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因蔡赴德国留学，黄接任了蔡的职务。1907 年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谓黄炎培潜回上海运动杨斯盛办浦东中学，宣讲排满革命。端方饬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由于毛看重黄的才学，又有杨斯盛的担保，便下发公文，说不准“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1]。1909 年，黄任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0 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1911 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黄在苏州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2 年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 年张勋任都督，黄辞职离南京返上海，任《申报》记者，始号抱一。

川沙办学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开始。1904 年亡命归来后，先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任教，后应爱国实业家杨锦春（斯盛）之聘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1905 年与张謇等人组织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初名），任常务调查干事。1906 年得杨斯盛出资银 12 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和

[1]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8 页。

浦东小学。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①。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设立与建设的规定,还把江苏岁额 240 万元的教育经费从财政厅划出专门成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并由全省竹木、屠宰、牙行等几种地方税充当,使教育经费有了保障。

辞司长职以后,黄炎培定居上海,潜心研究国内外教育学说,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1914 年 2 月至 1917 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 25 个城市 52 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② 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考察。1916 年 1 月,他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一文中说:"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发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③ 考察结果,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

① 《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6、126 页。
② 《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 1914 年版,第 1 页。
③ 《教育杂志》第 8 卷第 1 号,1916 年 1 月。

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①。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活动中。1916 年 9 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经多方联络，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资助（从 1917 年起 5 年内，每年 1 000 元），于 1917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任办事部主任。在 7 月由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 48 人联名发表的《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② 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为实施职业教育，1917 年 10 月 25 日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 年 8 月 20 日，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

---

① 《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 37 页。

② 《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 81、84 页。

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黄炎培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1925年12月13日，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只从教育界、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必须实行“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①。1926年2月，又在职教社专家苏州会议上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做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②。“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说明黄炎培不但跳出了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圈子和只着眼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教育救国”的局限，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尔后职教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

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职业教育有了新的开展。1925年10月创刊的《生活周刊》，经邹韬奋接办后，逐渐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每期印数只有2000份的刊物变成了很受读者欢迎的发行数万份的刊物。职教社在城市办了职业补习学校，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与其他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

① 《教育与职业》第71期，1926年1月。

② 《教育与职业》第74期，1926年4月。

政府后，职教社遭受打击。5 月 19 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 年 6 月，辞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职。

黄炎培辞办事部主任职后，继续办职业教育，并到日本、朝鲜考察。1931 年 5 月 29 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访日时的见闻，谈日将对我侵略的预感。九一八事变后，9 月 27 日偕江恒源(接任办事部主任)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述对时局意见。12 月 23 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 年 1 月改名《国讯》)，刊头揭示了“干救国工作须有四种根本上之修养”：高尚纯洁的品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1932 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为会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十九路军和稳定金融与地方秩序。1937 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同江恒源等致电宋哲元，支持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黄炎培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他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事宜。1938 年初，在武汉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职教社同人确定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持元气，支持抗战”的 16 字工作方针。这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1941 年纪念职教社成立 24 周年时，他同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发表的《从困勉中得来》的长文中，认识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

的。……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①。本此认识，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坚持抗战、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和争取民主的实践中。

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投降言论，有参政员从新加坡打来一个11字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照规定，任何提案之成立须有12人联署。黄炎培立刻与之联署，很快联署者即超过20位。议长汪精卫只得向全会高声朗读。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河内发表“艳电”。黄炎培于1939年1月3日起草斥汪宣言，与张澜等联名在《新蜀报》发表。1939年9月，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掀起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运动，共提出了七个提案，与会者争论不休。黄炎培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竭力调和周旋，于9月15日通过了“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这些办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把“结束党治”的具体要求抽象化，变成了八面玲珑不着边际的东西。黄炎培认为此提案的通过是“建国之根基，民治之起点”②。黄被议长蒋介石指派为宪政期成会三个召集人之一。

从1939年10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

---

① 《国讯》第268期，1941年5月5日。

② 《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 月 13 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 月 23 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 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①。于是从 1940 年 12 月至 1941 年 3 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 1941 年 3 月 19 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 8 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 月 16 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 月 25 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等 23 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1944 年 9 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发展是尽了心力的。

从抗战后期起，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黄炎培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②。1943 年 9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

---

① 《中国民主同盟述略》，载《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道》一书，民宪月刊社 1945 年编印。

② 《黄炎培年谱》第 112 页。

民”,黄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发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1944年9月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发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作国共之间的调人则始于参加国民参政会。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①。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

① 《黄炎培年谱》第136页。

来电文。6 月 2 日，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署名托张治中发出。6 月 18 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6 月 26 日，七位参政员共议三条意见：(1) 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2) 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3) 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蒋介石表示同意。7 月 1 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王云五未成行)飞抵延安。7 月 5 日返回重庆。他们是为恢复国共和谈而去的。短短 4 日，了解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广泛会见了中共领导人。7 月 2 日下午、7 月 3 日晚上、7 月 4 日下午与毛泽东长谈。一致认为，国共双方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挡住了去路，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商谈结果，由中共整理成《延安会谈纪要》(一称《延安会谈记录》)交他们带回重庆。内容是："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1) 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2) 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3) 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

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1] 7月7日黄炎培见蒋介石,面告在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会谈纪要》交王世杰。

在延安,黄炎培同毛泽东畅谈了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说:"有一次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

---

[1] 金城:《六参政员的五日来去》,《人民政协报》1985年1月25日。

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①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活动与见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8 月 7 日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成了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黄炎培还以此书的出版，在重庆掀起了一个不再将原稿送交政府审查的“拒检”运动。迫于形势压力，国民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从 10 月 1 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的决议。

黄炎培回重庆不久，日本投降。国内和平希望与内战危险并存。黄炎培积极投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中。他推动民盟并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于 1945 年 11 月 19 日在西南实业大厦礼堂召开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他主持大会并激情地朗诵了他的长诗《一线希望在那里?》。从 1945 年 8 月 21 日起，黄炎培就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商讨组织工商界新的政治团体问题。9 月 29 日定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12 月 16 日正式宣告成立。黄炎培等 11 人当选为常务理事。从此，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包括一部分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政党。它以 1946 年 1 月 8 日宣布的《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和 1 月 12 日《平民》周刊的创刊为标志，登上了战后的政治舞台。

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31 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黄炎培作为民盟 9 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参加了施政纲领组的讨论。他主张将施政纲领称为和平建国纲领，并批驳了国民党

① 《八十年来》，第 148—149 页。

有人把政协会议说成“分赃会议”的谬论。他推动民主建国会倡议组织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到协进会组织的报告会上讲演。1月26日,黄炎培的住宅“菁园”被非法搜查。经中共、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议,国民政府不得不向黄道歉。政协闭幕会上,黄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并发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南京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1946年7月27日,陈立夫派杜月笙劝黄脱离民盟,黄当即拒绝,说:“(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①] 11月11日,黄炎培为民盟中央起草了《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12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员以此为决议拒绝参加国大。接着民盟及黄炎培又谴责了非法国大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的同时,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次日又明令“严加取缔”。在此困难条件下,黄炎培同叶笃义由沪到南京,代表民盟临时中常会同张群等交涉。最后,黄炎

① 《黄炎培年谱》,第190页。

培拟出民盟总部解散的“善后办法”，经张群认可后于11月4日返沪。11月5日张澜召集非正式常委会作出决定，11月6日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活动，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黄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月15日发表《我与民盟》一文，说：“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1]

民盟总部解散公告发表后，以沈钧儒等为首的一批中委到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展开了新的反蒋斗争。黄炎培在上海亦领导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斗争。到1948年，黄亦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年底，中共中央邀请他赴解放区共筹新政协会议。1949年2月15日，经中共地下党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黄乘船离沪，19日抵香港。3月14日又乘船离香港北上抵天津，转乘火车，于3月25日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去西郊机场欢迎从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共中央人员和毛泽东。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8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当选为常务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1959、1964年继续任此

① 《国讯》第439期。

职。1954年至1965年任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随着民建中央机构的演变,先后任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集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努力为人民服务。他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0年6月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国教育史要》、《八十年来》及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



第二十九章　沈　钧　儒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祖父沈濂，进士，曾任刑部江苏司主事、镇江府知府等职。祖父沈玮宝曾任江苏海防同知、苏州府知府等职。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3岁由母课读识字，5岁延师来家授学，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5岁考取秀才。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开始留心时务，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和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等书刊，并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主张变法图强。1900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03年赴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得中进士，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继之在当时留日高潮中，前往日本留学，于1905年10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

在留日期间，沈钧儒虽然与在日的浙江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等有交往，但其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的，并参加了杨度、熊范舆等君主立宪派的活动。1907年10月5日，沈钧儒和熊范舆、雷光宇、恒钧四人领衔写了一份《民选议院请愿书》，恳

求朝廷速颁诏旨,“发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日期,于一二年即行开设民选议院”[1]。这份请愿书成为日后国内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沈钧儒于此时回国,从事立宪运动,曾与杨度等一道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

清廷鉴于各省立宪派都活动起来,遂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开始筹备立宪,在各省开办咨议局。9月,沈钧儒被浙江巡抚增韫委派为浙江咨议局总参议。1909年夏,浙江咨议局举行选举,他当选为嘉兴府咨议员,10月被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廷一年之内召集国会。沈钧儒是浙江赴京请愿代表之一。朝廷以筹备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不齐为由,坚持依原定9年的期限,后被迫改为3年,声称这是最后的“确定年限”,“万不能再议更张”。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均遭失败,使立宪党人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 之名,行专制之实,深感失望。沈钧儒从实践中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便离京回浙江,开始转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光复会在杭州发动新军起义,11月5日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沈被任命为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

辛亥革命后,沈钧儒曾在浙江任教育司长。任内对全省教育进行了整顿和革新,淘汰了一些无能的校长,并对学生品行和成绩进行考核,颇具成效。同时,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沈钧儒在浙江被选为参议院候补议员(1918年递补为参议员)。1913年,孙中

---

① 《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1页。

山举行的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同年10月，沈钧儒和国民党中的一部分温和派张耀曾、谷钟秀等，联合进步党的丁世峄、李国珍等共同组织了民宪党。其宗旨是"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为了实行宪政，沈钧儒曾参与《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在袁世凯的高压下，民宪党无法进行活动，很快便解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沈钧儒在南方和张耀曾等一些欧事研究会的人士从事反袁活动。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张耀曾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沈钧儒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张耀曾等欧事研究会人士所组织的政学会的活动。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到了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会的《中华新报》主笔。沈钧儒在该报上写了30余篇社论，呼唤法治，反对人治，要求废督裁兵，主张联省自治救国。他还写了《家庭新论》一篇长文，在《中华新报》上连载。该文主张对旧时家庭习惯及现时一般社会家庭的恶俗进行"根本改革"，认为家庭应以儿童为主体，因为儿童代表未来；要提倡优生优育，对儿童实行学校家庭共育。文章还提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彻底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而要做到这点，只有实现妇女的经济独立。妇女应和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社会对于各种事业，必须不分男女，一律开放。《家庭新论》于1923年出版了单行本(1927年重印)，蔡元培、张季鸾、朱希祖等名家为之作序。

1922年夏，经过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沈钧儒

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推动自治运动。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反对盘踞浙江的军阀孙传芳,支持北伐战争。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沈钧儒和褚辅成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随后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成为一位著名的有正义感的律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沈钧儒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曾发起成立浙江省国难救济会,被选为理事,并是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的发起人之一。12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镇压为救国而请愿示威的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对此,沈钧儒痛切地指出:"民国五四以还,每遇一次国耻,必有一次学生惨案发生,国人久为痛心。……夫东北不战而丧地千里,未闻戮一误国人员,学生何辜,罹此重戾。""堂堂天日之下,觏此现象,真有人间何世之感。"要求"力加纠正"[1]。此后,他还运用法律手段,积极营救被捕的爱国青年和学生,并要求国民党废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之一,参加了各

[1] 《沈钧儒文集》,第208页。

团体救国联合会，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的工作。1933年初，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和法律委员，曾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

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沈钧儒和陈志皋等3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为了彻底维护人权，澄清吏治而免冤抑，他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政府束之高阁。1934年，全国律师协会在广州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沈钧儒被选为主席团成员。鉴于国民党司法当局对冤狱赔偿法案采取冷漠态度，大会议决组织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扩大有计划的宣传。随后推聘冤委41人，沈钧儒是委员之一。1935年5月5日，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在苏州召开第一次会议，沈钧儒任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冤狱《赔偿法草案》，并决定每年6月由律师公会择日举行冤狱赔偿运动。此后，沈钧儒为推动冤狱赔偿运动的开展，又做了不懈的努力。

沈钧儒倡导冤狱赔偿运动的目的是维护人权，澄清吏治。这既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推进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应当说它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冤狱赔偿运动对国民党司法制度的弊端和官吏因嗜货渎职、贪赃枉法而造成冤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挞，从道义和法律上保护了正直无辜，是中国法制史上有意义的一

章。但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平反冤狱，制定有关赔偿冤狱的法律条文。就在冤狱赔偿运动开展时，发生了震动一时的《新生》周刊事件，爱国民主主义者杜重远无辜被判入狱。杜重远无辜被判入狱后，沈钧儒写了一首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充分表达了对这场冤狱的愤懑和激越的爱国主义情怀，其中前两节云：

一

我欲入山兮虎豹多，
我欲入海兮波涛深。
呜呼噫兮！
我所爱之国兮，
你到那里去了？
我要去追寻。

二

国之为物兮，
听之无声，扪之无形，
不属于一人之身兮，
而系于万民之心。
呜呼噫兮！
我所爱之国兮，
求此心于何从兮，

我泪淋浪其难禁。[1]

他还积极进行营救杜重远的工作，曾亲自到南京与最高司法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

九一八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的严酷现实，使沈钧儒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是不现实的，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周新民、钱俊瑞等文化界人士在上海发表救国宣言，征集签名者280余人。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上旬，沈钧儒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1月28日，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沈钧儒被选为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和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

---

[1] 沈钧儒：《寥寥集》，第34页。

的正确,从而向中共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曾致信沈钧儒、章乃器等人,高度评价并表示赞同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申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①] 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有重要贡献。

救国会领袖们虽然一片爱国赤忱,其活动也完全是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这些爱国活动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压制和打击。1936 年 11 月 23 日凌晨,在日本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 7 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

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战友进行斗争。1937 年 4 月 3 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 7 人提起公诉。随后,国民党又由其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们进行劝降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5 页。

迫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进反省院反省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6月7日，沈钧儒等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针对江苏高等法院起诉书，发表长篇答辩状，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答辩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要求司法当局"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①]

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②] 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等7人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了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法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活动。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有力声援，加之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

---

① 《救国会》，第249、270页。

② 《沈钧儒文集》，第300、302页。

31日，在蒋介石的电令下，江苏高等法庭裁定对沈等停止羁押，交保释放。

沈钧儒出狱后，决心献身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他在《决念》一文中表示："抗战一定要到底，……凡游移馁怯妥协诸理论，我誓必反对之。""即使我不幸而为此抗战中的牺牲者，亦无所恤。"① 8月，他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员，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国防参议会。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任社长。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团，沈钧儒和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提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赞同。10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

抗战开始后，由于形势的改变，救国会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1939年，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十七人座谈会"，由各代表一个方面的"救国会朋友"参加，实际上是救国会的核心，沈钧儒仍是总负责人。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各抗日民主党派参政员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策，纷纷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实施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沈钧儒除予以积极支持外，还在大会上提出《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这次大会通过了实施宪政案。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11月下旬，沈钧儒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

① 《沈钧儒文集》，第332页。

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便在重庆、桂林等地开展了宪政运动,沈钧儒和救国会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和推动者。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实施宪政的文章和演讲,还往桂林推进宪政运动。但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打算真正实行宪政。1940 年 4 月 1 日,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召开,由宪政期成会多次研究,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对此重要议案,根本未经认真讨论,蒋介石即作出结论,送交政府参考,从此便无着落。9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原定本年 11 月 12 日召集国民大会,因故改期。这次宪政运动开展不及一年,即完全消沉。事实说明,蒋介石声称要行宪 ,不过是敷衍舆论的欺骗宣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 1941 年 3 月 19 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创议人之一,但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担心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参加。到 1942 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党同盟,救国会同时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及其所领导的救国会在争取民主宪政斗争中表现出鲜明坚定的立场,使国民党十分恼恨,因此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名单公布时,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全部被除名。1944 年 9 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发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人士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

“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10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同年冬，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鉴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救亡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为救国会)，并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程，沈钧儒被推选为中央主席。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一二一流血惨案发生后，他写诗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①]

1946年1月，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他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沈钧儒愤怒写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一二人而要天下再不会有三四人以至百千万人，那真是梦想。”[②] 11月，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制定伪宪法，沈发表谈话予以谴责。随后，他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

---

① 《寥寥集》，第138页。

② 《沈钧儒文集》，第524页。

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进行反革命内战，另方面对其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10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被迫宣布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虽曾提出异议，但终因大势所迫，无法改变。随后不久，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沈钧儒到香港后，与前不久抵港的民盟中常委章伯钧共同主持，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当日发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决定，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发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沈钧儒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要检讨过去的政纲政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重新估计，而后确定当前应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工作方针，来加强本身力量，完成政治任务”；并提出全会的使命，是“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①。三中全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1)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个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2)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必须“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新不平等条约”。(3)坚决拥护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4)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

① 《沈钧儒文集》，第553页。

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做的努力表示敬佩,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时由沈钧儒、章伯钧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历史转折点,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和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积极予以响应。随后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9月,沈钧儒和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大会,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5日,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

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任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14年来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作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发表宣言，宣告救国会结束。12月20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4、1958年，沈钧儒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63年元旦，全国政协招待70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说："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使沈钧儒非常激动，他即席讲话表示感谢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第三十章　谭　平　山

谭平山，原名鸣谦，别号聘三、诚齐、诚斋。1886 年 9 月 28 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生于广东省高明县（今高鹤）明城镇新元坊。出身贫苦，其父为裁缝。早年就读于高明县东洲书院和肇庆广肇罗中学。1908 年，谭考进两广优级师范，并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1909 年，加入同盟会，秘密开展反对清皇朝的宣传活动。

1910 年，谭平山师范毕业后，在雷州中学任教，同时积极进行反清宣传。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代议士，参加省临时议会的活动。1912 年，广东同盟会更名为国民党，谭以同盟会会员身份转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较早的党员之一。

1916 年，谭到阳江中学任教。翌年，考上北京大学。在北大，谭广泛接触新思想和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组织。1918 年与罗家伦、傅斯年等发起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为《新潮》撰写论文多篇，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中，谭参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曾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经过五四运动，谭的思想有所变化，开始从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20 年初，谭和陈公博、谭植棠创办《政衡》杂志，主

张政治根本革新,社会根本改造,各种问题根本解决。他翻译外国进步书籍,撰写专论和时评,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1920 年夏,谭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开始了他在广东的革命活动。10 月,又与谭植棠、陈公博创办《广东群报》,大量报道各国共产党及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活动,介绍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支持和指导广州工人的革命斗争。

1920 年 8 月,上海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发起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到广东,协助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由于广州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势力较大,因此,此时广东党组成的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年底,陈独秀来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谭任副委员长。谭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重新整顿和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正式称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1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谭平山任南方分部主任。谭领导的中共广东支部积极工作,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声明传单,号召海员工人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动员组织在广州的党团员,接待回广州的罢工海员,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领导广东工人运动的同时,谭加强了对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2 年 3 月,谭重新组建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书记。

1922 年 6 月,由于陈炯明叛变,广东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

动。谭平山被派到北京，以警监学校教导主任为职业，进行革命活动。7月，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二大。1923年2月，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谭从北京回到了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党的工作，谭专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党的工作。1923年6月，谭参加中共三大，拥护和支持关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主张，被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以后又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

中共三大后，谭平山坚决贯彻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0月，他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9个委员之一，并被选为该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谭出席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向大会做了报告。会上，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和廖仲恺、戴季陶3人主持中央秘书处日常工作。谭成了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民党一大后，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谭平山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工作。谭还通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出一批特派员、改组员、筹备员奔赴各县，协助建立和健全各县、区党部的基层组织，将国共合作发展到基层。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推动农运发展，在谭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谭经常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身份，在

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作报告。1924年10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反革命叛乱。谭积极组织工人、农民支援，配合军队镇压叛乱，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贡献。

1925年1月，谭平山到上海参加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加强对广东工作的领导，5月，中共中央决定谭为中共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成立了以谭为首的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谭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使国民党中央下定决心武力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为首的滇、桂军阀的叛乱。10月，谭动员组织各种力量，支援广东革命政府东征陈炯明，南讨军阀邓本殷，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加剧。5月，谭平山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号召人们"要明白的认清楚国民党中，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更要认清楚国民党员的意见中，那种是革命派的主张?那种是反革命派的主张?尤要认清楚国民党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那一派是真正的能够代表国民利益而奋斗?"① 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害牺牲，革命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廖案有关人犯，谭等5人任审判委员。11月，"西山会议派"出笼。谭团结国民党左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浪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谭出席大会，并向大会作《党务报告》。大会重申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大会决定开除邹鲁、谢持等

① 《革命》周刊第1期，1925年5月2日。

"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出国民党,加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谭再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长。1926年5月,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后,抛出整理党务案,不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担任部长职务。谭只好离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

1926年11、12月,谭平山代表中共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谭代表中共在大会上致词,并系统地汇报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重点谈了同国民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和农民问题。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

1927年2月,谭平山从苏联回到广州。3月,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谭缺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4月,谭到达武汉,他在武汉中央农讲所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任大会政治委员会和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多次在会上发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部部长,参加了由毛泽东、瞿秋白等9人组成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继续担任中共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这时,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汉。谭仍任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政部长、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谭主要负责有关农民运动的工作。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中地主、资产阶级和官僚们的恐惧。他们极力诬蔑、阻挠农民运动。谭平山领导的农政部,要在农村推动农民运动,必然引起地主豪绅及其国民党右派

的攻击和诬蔑；要维护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纠正农民运动中某些“幼稚行为”，又会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和共产国际的指责和批评。1927年6月，谭平山辞职不成，遂以因病请假就医为名，离开了农政部。6月29日，反动军官何键在汪精卫等人授意下，宣布与共产党分裂，拘捕共产党员。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人的反革命行为，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谭随即发表公开辞职书，指责国民党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由革命变为反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积极主张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爆发后，谭以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名义，主持召开了在江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为委员，并任该委员会7人主席团主席。不久，起义军撤离南昌，谭平山随军南下。9月下旬，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一带失败。中共中央指示谭放弃革命委员会领导职务。10月，谭和吴玉章等人到达香港。

南昌起义失败后，谭平山从潮汕经香港到达澳门。此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处分了大批党内干部。谭受的处分最重，被开除了党籍。关于谭被开除党籍一事，周恩来曾经说过：“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个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

当的。"[1] 1928年初,谭从澳门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党籍。他不服气,多次写报告要求复议,请求党组织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然而,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谭仍关心着党的工作,关心中国革命的进展。谭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着的中央的一些过"左"政策及其危害,提出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一些正确看法。[2] 谭的信不仅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相反却被当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谭十分痛苦、灰心,失去了重新回到党内,继续为党工作的希望。

谭平山被开除出党后,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去向。他首先联络国内一些既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又不满共产党现行路线的人,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后又组织中华革命党,出版《突击》、《灯塔》周刊,进行宣传活动。1929年3月,谭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发表《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和新的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同时也批评中国共产党"盲目暴动,不顾事实,一味孤行,更且强迫罢工,误施恐怖"等等。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后,和谭平山一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继续从事反蒋活动。8月,在上海召开十省、区代表参加的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该党的纲领《政治主张》,出版《革命行动》月刊,主张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由于和邓演达在党的纲领和名称以及反蒋的

---

①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② 《团结报》,1956年4月25日。

方法上有分歧，谭离开上海到香港。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谭在香港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谭退出了第三党。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各党各派联合抗日。谭平山积极响应，在各地奔走呼号，推动团结抗日。1938年春天，被蒋介石召见，征询施政意见，并参加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起草工作。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谭被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任国民党军事委员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谭到重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真面目的暴露，谭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破灭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谭在政治上逐渐站在共产党一边，并积极投入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2年底，谭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成立民主同志座谈会，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1943年8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等人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民联”正式成立。谭是“民联”中央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之一，是常务干事会的实际主席。

抗战胜利后，谭平山在重庆参加集会，发表演讲，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谭和冯玉祥、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特地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要求释放政治犯，撤销特务机关，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国民党的训政，组成举国

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1]

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到上海。他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派。1947年2月,谭主持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中央干事会,指出,"国民党建立的革命政府,变成反动政权",号召全体成员"为着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和平、实现民主而奋斗"[2]。1947年5月,国民党加强对民主党派的迫害,造谣说"民联"受中共控制,准备加害谭平山。1947年秋,谭被迫到香港。他以香港为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谭和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王昆仑等人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会和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分子,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年元旦,"民革"正式成立,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决心"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3]而斗争,号召各地同志率部武装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呼吁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对中国民主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右翼,在人民中散布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阻止人民革命战争。谭平山在香港团结各民主派分子,揭露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号召将革命战争

---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6、27日。

②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四次政治会议政治报告》,《民潮》第6、7期合刊,1947年4月5日出版。

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华商报》1949年1月4日。

进行到底。

1948 年 5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谭平山发表通电、文章和演讲，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认为“中共的五一节口号，就是适应人民要求的号召”[1]。9 月 15 日，谭与其他民主人士响应中共号召，离开香港。10 月，从丹东进入解放区，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谭负责领导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9 月 21 日，谭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在政协会议上谭平山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1 年底到 1952 年 10 月，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谭领导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全力投入了这一场运动。谭总结人民监察工作的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了人民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二是坚持了监察工作的群众路线；三是坚持了监察纠举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改造与纪律制裁相结合的方针[2]。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时，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谭因年老有病不再负担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1956 年 2、3 月，谭平山抱病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代表大会，鼓励“民革”的同志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谭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和

[1] 香港《华商报》1948 年 5 月 23 日。

[2] 《人民日报》1952 年 9 月 22 日。

民革中央副主席。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谭平山为中国革命奋斗的一生,指出谭平山"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①。谭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革命家。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谭平山文集》。

①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第三十一章　章　伯　钧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生于安徽桐城县。父章扬清，略有田产，28岁时因乘船遇大风，落水淹死。当时章伯钧只有7岁。父殁后，其母变卖田产供其兄弟三人上学。

章伯钧幼年念过几年私塾，继入桐城中学读书，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喜好"考据"、"词章"之学。辛亥革命后，复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0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此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启迪下，他积极主张革新进步，聘请了恽代英等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任教员，因不为当局所容，一年后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许世英对章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次年章由上海启程，与高语罕、朱德、孙炳文同轮前往柏林。

到德国后，章伯钧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学习3年，政治上颇为活跃，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5年与到达柏林的邓演达相识。

1926年春，章伯钧回国抵达当时处于革命高潮中的广州，

其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伯钧被任命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邓演达的得力助手。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失败，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并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伯钧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后又转至上海，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3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表示要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国内的章伯钧予以积极响应。1928年，章在上海与谭平山、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认为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成为新旧军阀官僚买办豪劣以及投机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势力的集合体"[1]，是人民的仇敌，革命的对象，要求推翻南京政府，并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同时，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聚集发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人们从此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

① 《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原件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邓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干部会议①，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邓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被推为总干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国民党对邓演达的反蒋活动深为忌恨，1931年8月17日将邓逮捕，11月予以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由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中央工作。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曾参与策划，章伯钧则在北方从事反日军事活动。1933年11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伯钧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于此时宣布解散，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年初，章伯钧在香港与黄琪翔、彭泽民等召开临时代表会议，宣布复党。随后，章伯钧去日本，除与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外，并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支部，与留日同志经常开会，交换意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的侵略、

① 该党以后即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将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此成为与国民党完全割断了联系的独立政治集团。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并发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要求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①]。《纲领》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②]要求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新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章伯钧成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7年7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③]。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报告国际形势和前方战事情况,征询与会者意见,由于歧视和压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伯钧及其他负责人

---

① 宣言原件存农工民主党中央。

②③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与会。

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①]。他并著文说："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曾经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②] 为了实现民主政治，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3月末，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章伯钧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逐渐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些权利，又被取消。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上，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纷纷提出有关宪政问题的提案。章伯钧和左舜生、张君劢等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要求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并进，永杜纠纷，共维国命。他们把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看成是当今"扶危救急之道"，说："国家应付此非常局面，首在收拾人心与集中人才。今日唯一收拾人心之道，即在明示国人'国家为公'。所谓国家为公者，即明

①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② 《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抗战行动》第6期。

示国人，国家者全国国民之国家，而非一党一派之国家，政府者全国国民之政府，而非一党一派之政府。”“今日中国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才始有集中之可能；亦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人为国，胜于为党，人人爱国，胜于爱党，而后国家各真才始能真为国用。”① 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讨论时，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反对，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参政会闭会后，成立宪政期成会，章伯钧是委员之一。

1939 年 11 月下旬，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定有信约十二条，要求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②。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倒退，在 1941 年 3 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均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发生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以求各自党派的生存和发展，并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团体。1941 年 3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

① 《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记录》，第 94 页。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2 页。

体参加了同盟。1944 年 9 月 10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继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为发展民盟组织，扩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 年 1 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伯钧任主编。他撰写的《发刊词》说："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侵略的长期苦战中，牺牲了无数量的生命和财产，正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彻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努力尽责。"随后又著文指出："中国根本问题之正常的解决，在于有民主的宪政，有全民负责的统一政府。""现时中国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实际的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决不能在任何假托之下，悭而不予。"他要求国民党对执行孙中山所手订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策，"切实检讨，加以反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与不顺于人心之政事，皆须及早变革，自动维新。所谓结束党治，归政人民，正是振奋人心，刷新党国之第一要义"。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对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章伯钧在文章中反驳说："政权是应当属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党，都可说是不正当的'赃'；如认为是'赃'，就得有分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主张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1] 为了促进国内团结进步，他随同参政

---

[1] 《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 1 卷第 3 期。

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月1日赴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解放区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席位得到恢复。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1945年9月15日，他发表对时局谈话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今后民主建国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他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他特别指出，解放军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①。还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②。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5月，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大”，并由这个“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说：“在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情形下，是绝对谈不到宪法的。自从袁世凯到今天，情形始终如此。军阀集团所需要的只有三种：一是戒严法，二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三是盗匪惩治条例。他们是不需要宪法

① 《中华论坛》第1卷第9期。

②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的，但是为了粉饰装点，又为了对付外国，有时又是需要宪法的，曹锟要宪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复如此。”他还着重指出：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民主就是各党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平是不打内战，不拉壮丁，没有外国驻军；统一就是不开分裂的“国大”。“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①

1947 年 1 月初，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加强组织，扩大民主运动，会后章伯钧在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月底，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该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终目的是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鉴于该党认为农工是社会的骨干、革命的基础、平民政权的重心，因此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 1930 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基本纲领。章伯钧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在发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反革命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1947 年 10 月 27 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决定予以取缔。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不赞成解散民盟，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活动。蒋介石曾派高级官员对他进行威胁利诱，遭到他的严厉斥责。

---

① 1946 年 12 月 15 日《文汇报》。

1948 年 1 月，章伯钧和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①。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章伯钧和沈钧儒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 5 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发起新政协运动。

9 月 1 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随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29 日到达哈尔滨。

11 月 16 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说:“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应该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②

---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395 页。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486 页。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章伯钧由哈尔滨抵达北平。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钧被推选为委员，并由他和沈钧儒负责主持中央盟务，同时宣告民盟香港总部结束。

6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备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届常委和第二届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第六届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副主席等职。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患胃癌在北京逝世。

第三十二章 罗 隆 基

罗隆基，号努生。1896 年 8 月 14 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其父是前清秀才，后以教私塾为业。受父亲的影响，罗隆基自幼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

1912 年夏，罗隆基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罗隆基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他擅长政论，立论独特，文笔犀利，很早就显露出政治家的锋芒。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罗隆基积极参加并成为该校领袖人物。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际，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是陈长桐……继起的是和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他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①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至在校完成学业的时间由八年延长至九年。罗隆基本人曾自嘲地归纳为："九年清华，三赶校长。"②

1921 年，罗隆基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的敬慕，罗隆基又前往英国，就读于拉斯基教授门下，后又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大量接触了西方资产阶

---

①② 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6、3 页。

级民主思想，并且信仰“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参加了由清华的留美学生组织发起的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他们提倡国家主义，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体制，拥护人权；主张由国家倡导工业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但是，“‘大江会’没有坚固的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等到大部分人回国后各自谋生去，团体也就解散了”。①

1928年，罗隆基回国后，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同年3月，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自第二卷第二期开始，《新月》的编辑方针有所改变，由纯文学刊物转为兼论时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罗隆基主编，更增加了政论文的分量。由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人权问题看法一致，他们以《新月》为阵地，高举“人权”、“法治”、“自由”的大旗，掀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讨论，因而被称之为“人权派”。罗隆基成为人权派的代表人物。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人权派的“保障人权”，“确定法治”，“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专家政治”，“要求财政管理权”等主张。1929年12月，罗隆基与胡适将有关文章编辑成《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罗的主要文章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这些言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较为集中地抨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政策，特别是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国民党政府“明令彻查胡适”②。教育部长对胡适签发了“警告令”，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

①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0—51页。
②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2页。

职务。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为由,将罗隆基拘捕。后来,为胡适和宋子文所保释。在国民党的压制下,罗隆基仍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他先后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什么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他始终坚持:"《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①

这时的罗隆基,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又反对共产党的主张。他主张用改良主义"代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1930年12月,罗隆基发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的长篇文章,"忠告"国民党当政者,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不能"压迫"而要采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并说"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人权派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他们自己标榜的政治态度是:"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地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把中国政治引上常轨。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9月21日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抨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页。

②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3卷10号。

击蒋介石国民党勇于私斗，怯于外战的虚弱本质，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当局要有“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诚心，“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作为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呼吁：“如今党国的人员，给我们四万万的国民，一个共赴国难的机会。”[1] 同时，他表示：“在国事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愿拿‘言论自由’作幌子，来与当局为难”，“内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张，可以暂时搁置，一切的政治意见，可以暂时牺牲。”[2] 但是，罗隆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政治主张从来没有放弃。1931 年底，新月书店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一书，收集了罗隆基从 1929 年人权运动以来陆续发表的政论文章。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这些文章虽已有三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感觉着我在政治上目前要说的话依然是我已经说过的那些”。

为了扩大宣传武力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罗隆基坚决辞去了《新月》杂志总编辑的职务，于 1932 年 1 月间离沪北上，就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论题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1932 年 1 月 12 日)，抨击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置国难于不顾，仍纷争不休。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天，他在《益世报》发表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1932 年 1 月 26 日)，主张武力抗战，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 年 4 月，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 月 20 日，出版再生社机关刊物《再生》月刊。该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们要说的话》，正式提出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即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

---

① 罗隆基：《沈阳事件》(1931 年 9 月 21 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② 罗隆基：《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第 3 卷 12 号。

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他在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政权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发生以后，罗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并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仇恨。1933年秋，国民党蓝衣社暗杀罗隆基未遂，接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益世报》给予“严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报》在罗聘约期满后暂不续约。罗隆基被迫离开了《益世报》。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国社党的决定。1934年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罗隆基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1934年秋，罗隆基应召南下四川，在峨嵋山与蒋介石会晤。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日为蒋介石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此外，他还为在峨嵋山受训的军官作了几次演讲。临行前，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他坦率地表示：“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①

罗隆基回到天津后不久，宋哲元代替黄郛掌握了平津政权，在取得宋哲元的谅解后，他又重返《益世报》。1936年3月，罗隆基针对国民党政府污蔑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②。1936年6月，罗隆基为《益世报》写了一篇题为《国人制裁内战》的社论，提出：“在今日，我们是

① 罗隆基：《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② 《自由评论》第14期，1936年3月6日出版。

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做题目与中央发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统一'两字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①] 由此引发了一场与胡适的笔战。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先后发表了《我们的逻辑》、《我们立场的解释》等文，对胡适的论点予以义正辞严的驳斥。这一期间，他还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长，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为团结御侮，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隆基南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邀请成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武汉失陷后，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②]。各党各派先后对此发表评论，国社党内部也因此发生意见分歧。作为国社党宣传部长的罗隆基表示，张君劢的这种意见不能代表国社党，要抗战就要同共产党搞好关系。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罗隆基在讨论宪政问题提案时，尖锐地指出："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民主宪政运动展开后，1939年10月，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一致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罗隆基于1940年连续发表《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论公开政权》等文章，提出了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即实行"多党制"与"公开政权"。

---

① 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9日社论。

② 《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径,同时,他们更迫切地感到联合的必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 年 3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正式成立,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0 月 25 日,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依据政团同盟纲领的精神,张澜和罗隆基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保证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严禁官吏垄断企业、投机倒把等。这一提案获得包括中共在内的 23 位参政员的联署,但招致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不满。

1940 年,罗隆基宣布脱离国社党。1942 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 年 5 月,他参与创建了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任宣传委员,这是政团同盟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该组织在昆明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在罗隆基等的主持领导下,先后吸收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同盟。罗又主持吸收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秘密入盟,扩大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声望和实力。此外,昆明支部向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将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使它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民主人士的联盟,中央常委会接受这一建议,1944 年 9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同年 11 月,民盟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出版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

主编。他积极响应中共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昆明发起组织5000人的双十节群众纪念大会和护国纪念会，会后，举行大游行，高呼“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扩大民主运动”，在西南地区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同时，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接连发表《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等文章，强调党派团结为实现民主的枢纽，并提出有关实现民主宪政的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离昆赴渝，全力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罗隆基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民盟对目前一切问题的主张》的政治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及《组织规程》。由罗隆基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设计了民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要依据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就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通过“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等途径得以实现①。在这次大会上，罗隆基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一起共同负责民盟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为贯彻

① 以上引文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75页、第77页、第67—68页。

推行民盟的政治思想和纲领主张而不懈努力。同年11月，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罗隆基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任何国家帮助中国打内战，我们都反对；中国任何党派打内战，我们都反对”①。同时，积极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12月24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等人以陪都反内战联合会的名义，分别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双方“万不宜诉诸武力”，希望“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②

1946年1月10日，国人企盼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终于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罗隆基作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他参加政治组和宪法草案组的工作。在改组政府的讨论中，罗隆基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密切配合，一致认为改组政府的关键是要“改变蒋介石个人专制独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③。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1) 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2) 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的办法，要使他真能执行；(3) 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在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罗隆基重申民盟主张，即不承认旧代表的主张。由于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与民盟代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

政协协议一经签订，国民党当局马上对它进行破坏，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罗隆基为谋求和平从中斡旋，并以民盟发言人身份

---

① 《记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大会》，见《周报》第13期，1945年12月1日。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07页。

③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多次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多次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压迫残害民主人士的暴行。1946 年 2 月，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罗隆基担任社长。7 月，梁漱溟和罗隆基代表民盟严重抗议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如期召开“国民大会”，指出这是非法行为。李、闻惨案发生以后，他在上海主持追悼大会，并代表民盟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卑劣行径。他说：“民盟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中国之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同时，他表达了一个民主战士对民主事业的坚定信念：“李、闻两先生虽然被杀死，但战士的血决不会白流呵，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

1946 年 10 月 11 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悍然宣布当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大”，并催促各党派提交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罗隆基等民盟主要负责人坚持政协路线和民盟纲领，拒绝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引诱和拉拢。11 月 15 日，民盟中央常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议起草一个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严正声明，以民盟代表罗隆基等五人名义发表。24 日，罗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民盟始终坚持两条原则：(1) 民盟维护政协决议；(2) 民盟反对内战。并且强调民盟今后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口号为：“恢复和谈，停止内战”八字。同时宣布民社党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决定开除民社党盟籍。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周恩来的赞许。1947 年 1 月，罗隆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二中全会通过了民盟不承认国民

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及其“宪法”,决不参加分裂的“国民政府”等项决议。1947年3月6日,中共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而发表紧急声明,罗隆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接受委托,并公开发表了紧急声明。在危难之际,显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国民党派特务“护送”罗隆基回上海,将他送进广慈医院(后转到虹桥疗养院)“治病”,遂失去行动自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被中共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方免遭于难。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隆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自5月初开始,罗隆基作为民盟副主席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罗隆基作了坦率的发言,并对近来的“鸣”、“放”情况表示了意见。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虽然大家对共产党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同时,这个“鸣”“放”又是根据共产党的整风指示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针对有人担心对党提批评意见,将来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心理,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参

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他强调“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另外，他提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他认为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发言还谈了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还批评了国家某些经济计划有主观主义的情况和各项工作中的全部冒进倾向。①

1957年6月8日以后展开了反右派斗争，罗隆基和章伯钧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联盟”。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责“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农工民主党。社论作出如下论断：“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受到猛烈的批判。罗隆基被迫多次做交代和检讨，但他本人也不知“章罗联盟”为何物。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5月23日。

1957年罗隆基被划为大右派。他在抑郁苦闷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1965年12月6日夜猝然病逝,终年69岁。

20年后,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90诞辰。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追述了罗隆基的一生,肯定罗隆基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纪念的。



第三十三章　张　君　劢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别号世界室主人，英文名 Carsun Chang。上海市宝山县人。1887 年(清光绪十三年)1 月 18 日出生于嘉定县城一商宦之家。在 12 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后与其胞弟张嘉璈共同活跃于中国政坛。张君劢一生出入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曾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在政治学、哲学、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

6 岁时入家塾，记诵儒家经典，学作八股文，接受传统教育。1897 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及数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此期间，由于受到思想进步教员袁希涛的影响，开始关心政治。后来，张君劢一度成为梁启超立宪政治的忠实追随者。

1902 年，张君劢应宝山县乡试经义策论，中秀才。次年，考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半年后改入南京高等学校。拒俄运动发生后，因报名参加拒俄义勇军，被斥退学。1904 年，到长沙明德中学教英语，不久转澧州、常德等中学任教。1906 年被宝山县公派日本留学，抵日后背弃入师范学习理化的承诺，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后入大学部学习政治，精读英人洛克、约翰·弥尔等人的政治学著作，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思想。因背弃承诺，官费仅半年而止，不得已卖文谋生。1906 年 11 月在梁启

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处女作《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从此结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到1929年梁启超逝世,梁、张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人对德国文化的崇拜,使得张君劢萌生了到德国留学的念头。

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后,张君劢积极参与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并在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国会与政党》等文,鼓吹立宪政治以及西方政党政治学说。政闻社解散后,1909年6月,与他人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所",创办《宪政新志》杂志,继续鼓吹议会政治。

1910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参加清政府的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赴京任农商部秘书,针对当时争论异常激烈的省制问题,张君劢著《省制草案》,提出自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问题上的主张。同年1月与汤化龙、孙洪伊等宪友会成员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隐奉梁启超为领袖,夏秋之间为动员各方面欢迎梁启超归国而四处奔波。10月上旬,受民主党委托到日本迎接梁回国,下旬,记录梁启超在各欢迎会上的讲演,12月,将各讲演结集出版,名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

1913年,张君劢取道俄国赴德国留学,3月入柏林大学,学习法政、财政等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15、1916年,在《大中华杂志》、《浙江兵事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向国内介绍了有关大战的情况。

护国战争爆发后,应梁启超电召归国。1916年春,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长,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国会重开后,围绕省

制是否入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916 年 9 月张君劢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联邦十不可论》，并重印《省制草案》，重申“大共和国之理想”的主张。

“府院之争”之际，张君劢极力主张对德宣战。1917 年 2 月，秉梁启超之意，前往徐州向张勋汇报对德外交情况；4 月请梁启超起草对德宣战布告。6 月建议段祺瑞组织参战军；8 月段政府公布对德、奥宣战书。

“安福国会”成立后，张君劢追随梁启超暂时退出政坛。1918 年 1 月，酝酿发起松社，以纪念在护国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蔡锷（字松坡）将军；12 月，与梁启超等作欧洲旅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梁启超等回国后，张君劢仍留居德国耶纳，师从著名的哲学家倭伊铿（Rudolf Eucken）学习生命哲学，直到 1922 年春回国。

旅欧期间，张君劢除研究哲学外，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了苏俄宪法，向国内详细介绍了德国革命的情况，鼓吹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社会主义，反对以俄为师，从此，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大量政论性文章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杂志上。1922 年把介绍德国革命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

1922 年，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国宪大纲，并著《国宪议》加以说明。同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Driesch）应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张君劢口译，并整理出版《杜里舒讲演录》，同时向国人翻译、介绍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

1923 年 2 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

提出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遭到丁文江(字在君)、胡适等人的反对,哲学界因此展开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又称"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张君劢在很多讲演中提及此事,因作为论战的一造主角而自豪。

"猪仔议员"制订的"曹锟宪法"公布后,张君劢鉴于该宪法采纳了"国是会议"宪草的很多内容,主张由国民投票公决,遭到邵力子、瞿秋白等人的痛斥。

1923年,在上海创办自治学院,自任院长,次年奉令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英国政治、唯物辩证法批判等课,后来,政治大学的一批学生成为其忠实的政治追随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政治大学被关闭。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张君劢、梁启超等拒绝段政府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

1927年,梁启超拟组织一松散的组织,作为组党的准备,张君劢主张梁宣明政纲,直接组党。1928年,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杂志发行十期即被停刊。1929年,青年党在上海英租界开办知行学院,张君劢为学员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端午节前,在回家途中遭绑架,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附近达20天之久。9月9日,参加完梁启超的葬礼不久,到德国耶纳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并与倭伊铿合著《人生观问题》。

1930年,译著《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 by H. J. Laski)出版,因迫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不得已以"张士林"的名义出版,"士林"二字各取"嘉森"二字的上下部分。拉斯基的多元政治论思想对张君劢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8月，离开耶纳返国，中途在苏联停留一月，考查苏联的经济建设情况，九一八事变前夕，回到北平，后到燕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并与张颐就黑格尔哲学展开讨论。

1932年，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发表《我们所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纲领性文章，提出国家民族本位、民族建国、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政治主张。1934年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出路在于"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同年12月，国民党当局将3000余册《再生》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一同焚毁。

1935年，再生社出版《中国往那里去》，汇集了国家社会党的一些纲领性文件。《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汇集了张君劢在学术、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文章及讲演。是年到北平、广州、太原等地讲演，积极宣传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6年，国社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连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职。译德国鲁登道夫著《全民族战争论》(Der total Krieg，by Ludendorf)，呼吁全民抗战。

全面战争爆发后，应邀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家社会党得到政府的承认，愿意共赴国难。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希望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取消军队和边区。同年，出版《立国之道》，详细阐述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9年，各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地位，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君劢等36名参政员

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宪法，结束党治。同时，又与左舜生等其他55人联名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提出以宪政代替党治，立即成立举国一致的战时行政院。随即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宪政座谈会，并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及国共之间矛盾的尖锐，1940年，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会，商讨民主党派的联合问题，后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与胞弟张嘉璈视察滇缅公路，并撰《尼赫鲁传》，希望国民像尼氏那样，勇敢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以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明书院的宗旨。该书院与勉仁书院、复性书院齐名，成为抗战时期的三大书院之一。发表《胡适思想路线评论》一文，认为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胡适提倡打倒孔家店是因为他对孔子没有正确的认识。

皖南事变后，为调和国共之间的冲突，抵制蒋介石利用国民参政会为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辩护，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要有中共领导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涉嫌策动反对宋霭龄用飞机运狗事件的学潮，被困于重庆汪山，民族文化书院被迫停办。

1944年，继续积极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四次常务会通过张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当天，提出将来的政治必须实现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1944 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年底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1945 年春，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次年，经英国回国，途中考察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并访问《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

1946 年 1 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反对一党专制，极力主张议会政治。政协协议确立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适逢六十大寿，各民主党派领袖及社会贤达前往祝贺，周恩来送给张君劢的寿文是"民主之寿"。政治协商会议后，参加宪法草案审议会，并根据政协达成的协议拟一份宪法草案供审议会参考。后来，国民党方面对该草案作了修改，并由"制宪国大"通过，成为中华民国宪法。7 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讲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讲稿于 1947 年 5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8 月，美国方面宣布调停失败，蒋介石不顾政协协议及各方面的反对，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同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张被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宣布调停失败后，张君劢、黄炎培等以第三方面的姿态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10 月，张在上海代表民社党招待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呼吁和平、民主、统一。

1946 年 11 月 15 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开幕，中共及民盟中的进步人士极力反对。11 月 20 日，张君劢在蒋介石的劝诱下，不顾民盟及民社党中进步人士的劝阻，与蒋介石交换了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的换文。民盟随即将民社党开除出

盟。1947年4月,张与蒋介石、曾琦在“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上签字,并向国民党当局提交国社党参加政府的名单。此事遭到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严厉抨击。

1947年7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被选为主席,并亲拟党歌歌词,重申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镇压,张与李璜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表示抗议。12月底,应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邀请赴美讲演新宪法。1948年4月初,讲学归来,积极支持民社党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6月,在上海为民社党党员作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的长篇讲演。

南京解放后,民社党总部随国民党政府撤至广州,1949年7月7日,张与国民党、青年党领袖联名发表《反共救国宣言》。7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取缔民社党、青年党的指示,宣布民社党、青年党为非法组织。10月,张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社党中常会,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民社党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11月,赴印度讲学,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1952年定居美国。

张君劢的晚年主要从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和传播,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定居美国前,主要是在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讲学。定居美国后,杜鲁门总统特嘱国会图书馆为张译著提供方便。1955年应聘于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并应孔教会之邀,在旧金山讲演义理学,集为《义理学十讲纲要》。1956年为旧金山《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后结集为《张君劢新大陆言论集》。1957、1962年,先后出版英文学术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58

年，由他发起，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以中英文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它被视为新儒家的宣言，表达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特征、现代意义及发展方向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同年，出版《辩证唯物主义驳论》。并先后在联邦德国、英国、印度、越南、日本、韩国等地作环球讲学。1961年，出版《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哲学家》，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深入研究。1965年，在旧金山创立自由中国协会，并创办《自由钟》月刊，对中国专制政治作了认真反思，有关论述专制政治的文章，后来稍作调整、修改后，以《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为书名出版。同年6月，赴汉城出席"亚细亚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指出："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1967年，应新加坡华侨之邀作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演讲，讲稿后由他人整理，以《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为书名出版。1969年，张君劢逝世于美国旧金山，所著《孟子与柏拉图》因病中辍。

1987年张君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台湾《传记文学》社出专集以示纪念。专集后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

第三十四章 陈 嘉 庚

陈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集美镇）。其父杞柏在新加坡经营米店和地产业。陈嘉庚9岁入读集美社的南轩私塾。17岁前往新加坡，在父亲开办的顺安米店帮助管理银钱货帐，兼当文书。两年后做了米店的经理。

1904年，顺安米店停业，陈嘉庚集资7000多元叻币（新加坡货币），创办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将与人合资的日新罐头厂收回自办。获利后，又办起福山菠萝园和日春菠萝罐头厂，并扩大米业经营，增设"谦益"米店和"恒美"熟米厂。由于抓住了菠萝罐头销售的有利时机，加之经营得当，陈嘉庚屡获成功，这给他增添了扩大业务的勇气。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这位年轻的实业家以其远大的眼光和惊人的勇气，投资1800元购进橡胶种子18万粒，植于福山菠萝园中，开始从事橡胶种植业。随后又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开辟新的种植园。1911年，陈嘉庚到泰国曼谷采购大米，在北柳港发现那里的菠萝堆积如山，而无人设厂加工制作罐头，于是他便投资办厂，就地收购菠萝，制造罐头外销。至此，陈嘉庚已成为拥有几处橡胶园、数家菠萝罐头厂和米店的殷实侨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看到菠萝罐头和大米受战争影响，外运困难，就决定全力经营航运业和橡胶业。他先后租购六艘轮船从事航运，来往于越南、新加坡等地，远者到达波斯湾，从中获利近百万元。之后他将几个菠萝罐头厂和米厂改为橡胶厂，又陆续购进几千亩橡胶园。由于战争的机遇和他个人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数年间，陈嘉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0多万元巨资的华侨大资本家了。到1922年，他手中控制了10个经过改建和扩充的工厂，后来又购买了几处大橡胶园，并在马来亚和印尼等地设立了十几个分店。他还同时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计有：橡胶园15000英亩，各类工厂30余家，分店150多家，雇用两万余人，全部资产为1200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南洋商界的巨子。

然而，就在陈嘉庚登上“橡胶大王”宝座之时，英、美、日等国橡胶商人也纷至沓来，投资经营，造成胶价猛跌。从1926年起，亏损日甚。1928年，亲日奸商焚毁了他的胶品制造厂，损失近百万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经济危机，胶价暴跌，陈嘉庚被迫卖出胶园11000多英亩。到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新加坡银行提出的条件，将自己的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由陈嘉庚担任总经理，但实际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商进一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向他施加压力，企图垄断公司生产的全部胶鞋的销售权。陈嘉庚认为，如果答应，就等于受辱于洋人，公司将永无翻身之日，因而严词拒绝，并于1934年2月21日，宣布他的全部营业收盘。

陈嘉庚经营实业30年，为侨居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他最早引进橡胶,进而大面积种植,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橡胶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首先开始橡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并有计划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还为当地培养出数量众多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而且是国内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1906 年 2 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不久这里成立了同盟会分会。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革命党人创办的《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的争论,使反对清皇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得到迅速传播,也使陈嘉庚深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他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集会,1910 年春,同弟弟敬贤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并剪掉发辫,以示反清革命的决心。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建光复,陈嘉庚与同盟会员在新加坡天福宫召开闽侨大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被选为主席,在短短两个月内筹款 20 多万元支援福建革命,另筹 5 万元支持孙中山。

陈嘉庚一生爱国爱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竭尽所能。在这方面,突出表现在他不吝巨资,积极兴办学校上。陈嘉庚经常说,他的钱财"取之社会",也要"用之社会"。1894 年他首次回家乡时,便捐献私蓄 2000 元,办了一所"惕斋"学塾,这是他在国内最早兴办的学校。陈嘉庚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即所以兴国",辛亥革命后,他决心回乡兴教以报国。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

办小学校。"1913 年，集美小学正式开办。这个学校以乡里祠堂为校舍，由陈嘉庚出钱修缮。随后又陆续创办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正规中学，以及水产、商业、农林、国学专科等学校，共 10 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经过陈嘉庚十余年的努力，一个荒辟的渔村终于变成了各类学校俱全的综合性的教育中心。1923 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确定。

在创办集美学校期间，陈嘉庚几次回国，亲自筹划，凡选择校址、聘请校长、选用教员，以及招生及优待回国子弟等重要事项，他都亲自过问。考虑到当时一般人家经济困难，无法全力供子弟上学，陈嘉庚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师范生免收各种费用，并供给学生蚊帐被褥。此外，又设立"集美储金"，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国内升学或出国深造提供资助。为了创办集美学校，发展家乡教育事业，陈嘉庚耗费了巨资。据统计，1918 年至 1933 年，集美学校各种费用共支出 481 万元。陈嘉庚还认为，集美学校必须设立基金，以保证长久的经费来源。1919 年，他在新加坡聘请律师签立字据，捐出橡胶园土地 290 公顷，房地产 9.2 万多平方米，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陈嘉庚办教育并不着眼于自己的家乡，他曾先后拨出专款在福建的 28 个县市办学。到 1932 年，除集美学校外，由陈嘉庚创办和提供补助的中、小学校共有 73 所。

在兴办中、小学的基础上，陈嘉庚又进一步筹办大学。1919 年 7 月，陈嘉庚印发《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说明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因此"不揣冒昧"，

倡办大学。[1] 本月13日,他在厦门浮山与陈氏宗祠召开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并发表长篇演讲,讲述他筹办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我国不识字者占人口总数的90%,这同欧美日本“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2] 陈嘉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会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当年一次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付完。这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私人独资创办的大学,从1921年4月6日开学后,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受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陈嘉庚的境遇十分困难,但他的态度仍很坚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到1937年,陈嘉庚确因经费枯竭,无法负担,不得不忍痛将厦大交给政府当局,改为国立大学。对此,他十分沉痛:“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穷!”[3]

陈嘉庚还以同样的热情发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其中有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幸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南洋第一

① 《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20年。

② 《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厦大12周年纪念专号。

③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页。

所华侨中学。

陈嘉庚不但兴办许多学校，而且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他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主张“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振兴实业；要求普及教育，订下同安“十年教育普及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陈嘉庚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鞠躬尽瘁，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真正做到了“诚毅”二字。

陈嘉庚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23 年他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1928 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他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陆续筹款 130 万余元。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华侨大会，通过致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电，要求履行国际条约：制止日本发动罪恶的战争。1932 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抗战，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支援。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8 月 15 日，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慷慨陈词，指出当前祖国面临亡国亡族的威胁，海外侨胞作为国民一分子，应该见危拯救，出钱出力，表明自己的真正爱国心。大会一致通过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翌年 10 月 10 日，南洋各地华侨代表汇集于新加坡，召开筹赈祖国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从此，南洋华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统一组织，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爱国团结的新阶段。南洋各埠

的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者达80多个，各埠的筹赈会又设分会千百个。参加筹赈会的有各帮、各行业、各团体，其领袖人物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代表。有了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加上德高望重的陈嘉庚的领导，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为了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首先在侨胞中开展广泛的爱国宣传。他竭力支持各地组织讲演团、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等向广大侨胞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动员广大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极力促成国内一些文艺团体来南洋参加爱国宣传。如由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唱了三个多月，入场券收入达3万余元。其次是组织募捐活动，通过南侨总会下面的分会和基层团体，层层发动、人人关心，掀起了大规模的捐款爱国热潮。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底，南洋华侨汇款到国内的总数是30亿元(新加坡币)，其中抗日义捐部分就有4亿元。陈嘉庚本人1938年春一次认购国债10万元，另外，他还每月捐法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此外，陈嘉庚还组织大批技工回国服务。广州沦陷后，中国海上运输断绝，滇缅公路成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当时运输物资任务繁重，迫切需要大批汽车司机和修车工人。侨胞在陈嘉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组织了一支3200人的机工回国服务队，分批来到昆明。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运输工作，对于支援抗战前线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陈嘉庚还领导爱国侨胞进行抵制日货、惩办亲日汉奸，发动捐赠衣物、药品、救护车等工作。不少华侨青年在他的感召下，相继回国参加抗战队伍。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极感气愤，立即发出电报质问，揭露其和平是假，投降是真的卖国面目。时值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此案略作文字变动，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大多数赞成获得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表现了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斗争、敢除恶务尽的民族气节。

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侨总会所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团先后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15个省份进行慰劳考察。这次考察是陈嘉庚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抗战义捐款项全部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实，明辨是非，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醒悟过来了，分清了是非，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的延安之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参观女子大学和军校；与傅连暲以及财政、公安、司法等福建籍负责人交谈；广泛接触集美和厦大校友；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和欢送会等。他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7月，他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发表演说，以亲自在延安看到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诬蔑和造谣，指出：“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

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①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印尼的爪哇。在3年的匿居生活中,他几次险遭不测,但都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1945年8月抗战胜利,10月6日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去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发表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反共的方针,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陈嘉庚代表海外爱国侨胞,坚决站到人民革命和反蒋拥共的立场上。1946年9月,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代表南洋1000万华侨,致电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蒋打内战。如果一意孤行,不听忠告,"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这个通电受到侨胞的热烈拥护。在内战期间,陈嘉庚多次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发动罪恶战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并指出独裁必败,民主必胜。他还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募捐支援国统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9年6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30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

① 陈嘉庚:《在西北的观感》。

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 年 2 月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同时把未了的合营企业结束，款项悉数汇回国内，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回国定居于家乡集美，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回国后，除参加政府工作外，还把扩建、充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0 年至 1961 年，国家补助集美学校的经费约 900 万元，陈嘉庚个人支出经费 500 万元。在这期间，修建了大会堂、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游泳池等新的建筑，在专业设置上增设了水产、商船、航海、财经、轻工以及华侨补习学校。1960 年，在校学生达 1.1 万多人，成为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集美学村以它较为齐全的设备、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海外和内地的莘莘学子。

解放后的厦门大学，在陈嘉庚的关心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建成了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医院、教工及学生宿舍等，还修建了可容纳 2 万观众的上弦运动场。厦门大学位于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大担岛、二担岛只有 3000 多米，扩建前有人担心在这样的地方修建高楼大厦是否合适，陈嘉庚的回答十分干脆："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来！"他以老迈之躯，手持拐杖，不辞辛苦经常巡视建筑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陈嘉庚一生兴办教育事业的全部支出约合人民币 1.5 亿元（1981 年折算）。这在近代的侨办教育事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而

他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会二楼的房间,既小且暗。陈旧的床、写字台和沙发,打着补丁的衣服和袜子,每天五角钱的伙食,却怡然自乐。他常说:“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对福建的建设十分关心,提了许多建议,为人民政府所采纳。他认为解放后福建最迫切的建设是修一条铁路,“全省十二万余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万人,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迅速改变”。他不仅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提出修建铁路的意见,并且亲自设计铁路方案。后经中央批准,开始修筑鹰厦铁路,到1956年修成通车。他还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得到陈云、陈毅、叶飞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海堤于1956年11月完工。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访问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16个省市。他看到祖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迅猛前进,面貌日新月异,非常兴奋。途中不断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56年元旦发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结论说:“我的总观感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侨务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在1956年全国侨联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强调:“应该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他还倡议在厦门建立“华侨博物院”,倡议在北京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

1958年，陈嘉庚患皮肤癌，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癌症搏斗了3年。1961年8月12日终因脑血管病变，全身机能衰竭，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热爱至死不渝，对祖国实现统一充满信心，并将在国内的存款300多万元全部捐给国家。



第三十五章 汪兆铭(精卫)

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季恂。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父入粤籍,是为广东番禺人。1904年9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2期,1906年4月毕业,旋入法政大学。

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成立,任评议部评议长,并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要撰稿人。汪以"精卫"之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孙中山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揭露和批判清皇朝的专制主义,批驳立宪党人的改良主义主张。

1907年3月,汪随孙中山赴南洋,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华侨捐款,协助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失败后,汪决心以谋杀清朝重臣的行动,振奋天下人心,于1910年1月潜往北京,准备进行暗杀活动。4月16日,汪因在银锭桥埋设炸弹事败,被警察逮捕。在接受审讯时,汪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被判处永远监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于11月6日将汪释放。

汪出狱后,努力于促成南北停战议和的活动,并作为南方

军政府议和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谈判，促成清廷退位，南北统一。随后汪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命，随专使蔡元培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后，汪随孙中山由上海往香港，随即转赴南洋，与陈璧君结婚。8月，汪偕陈璧君前往法国，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开展留法勤工俭学活动。

1913和1915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时，汪精卫都应召回国。1916年12月，汪离法国，经英国和北欧往彼得格勒，对欧洲各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线乘车回国。随即往广州，支持孙中山召开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护法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意、日等27个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汪以个人资格于3月8日离上海，经东京、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于4月28日抵法国巴黎，出席和会。

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交涉，由于英、美各国袒护日本而失败，因而激起旅法华侨和国人的强烈不满，由此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汪目睹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义愤填膺，曾致函美国国会，指责美国袒护日本。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之后，汪随孙中山转赴上海，筹谋反对陈炯明的种种事宜。孙中山重返广州出任大元帅前后，汪不时往杭州、奉天、天津等地，奔走南北，代表孙中山与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奉系将领张作霖及皖系代表等，共商建立孙、张、段(祺瑞)各派联合反对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军事合作计划，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23年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成立改组委员会，汪被指定为改组委员。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被指派为主席团主席，并作为孙中山的发言人。在一大会上和会后，汪相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并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时，汪作为随行中文秘书，为孙中山草拟《北上宣言》，并先行北上，安排各项事宜。孙中山卧病北京时，汪作为孙中山的代言人，不时发表谈话，处理各项事宜，代拟了著名的《总理遗嘱》。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时，被推为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中央党部常务秘书处常务委员、代理中政会主席等职。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接受总理遗嘱的决议，继承发扬了国民党一大纲领和政策，维护了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人，并借机排斥汪精卫。汪被迫出国，其所任各项职务全被他人取代。1927年3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重新恢复了其领袖地位。4月10日，汪由欧洲经上海到汉口，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

4月1日，当汪精卫抵上海时，曾与蒋介石、吴稚晖、蔡元

培、张人杰等密商共同反共事宜，作出了于15日在南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定，并规定临时办法四条：由汪通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停止共产党活动；暂时否认武汉政府暨党部命令；各党部团体及军队由负责人自行纠正；工人纠察队及其他武装应服从总司令指挥。但此前汪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国共合作。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离沪赴汉口。临行致书张人杰，主张4月15日在南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汪抵达汉口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下令通缉共产党人，与武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相对抗。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但是，6月10日，汪已在郑州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作分共准备，7月15日，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实行"分共"。国共合作由此彻底破裂。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在冯玉祥的调解下，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汪往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委员谈话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成立政府。但此举将在事实上取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成立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否定汪的领袖地位，因而遭到汪及其一派的反对。13日，汪声明引退，随即往武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召开四中全会相号召，开展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斗争。10月25日，汪往广州，纠合粤系中央执监委员及李济深等人，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宣布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处照常办公，提出在广州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在蒋介石调解下，汪于12月3至10日，出席了在上海举行

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但在此前的 11 月 17 日,汪派的张发奎指挥黄琪翔、薛岳等部发动了反对桂系的广州事变,因此,汪在预备会上受到桂系及西山会议派等的猛烈攻击。此时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人更被攻击为与起义有牵连,被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当晚,汪偕曾仲鸣赴欧,17 日,汪发表通电,宣布引退。

1928 年 1 月,蒋介石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由此会议,蒋介石不仅成为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且是中央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 10 月,蒋实现与胡汉民合作后,进而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时在法国的汪精卫,未出席二届四中全会,虽然仍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监委员会委员,并在 8 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推为政治会议委员,但已被排出常务委员会;汪派的主要人物顾孟余、陈公博也都遭到排斥。

汪精卫基于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于 1928 年初,提出了反对"新军阀"和"腐化分子"的口号。在汪的号召下,在上海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发起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运动;11 月 28 日成立了以汪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总部及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于上海,并在各省市设立相应组织。

1929 年 3 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系由蒋指定与圈定产生。会前,汪精卫与顾孟余、陈公博等二届中央执监委员 13 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三全大会类似段祺瑞善后会

议，将暂不承认。因此，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受到三全大会的书面警告或开除党籍处分。

国民党三全大会结束后，汪及改组派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间的矛盾，以“护党救国”的名义，发起反蒋运动。10月上旬，汪由欧洲返抵香港主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蒋战争。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讨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汪派与西山会议派都参加了。此时，汪与西山会议派等一起，在北平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7月23日，汪由香港绕道日本长崎，经天津抵北平，主持扩大会议。9月1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18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发表拥蒋的通电，进军关内，扩大会议迁往太原。10月30日，汪在太原发表由其起草的《约法草案》后，扩大会议即行收场。11月1日，汪离开太原，去香港。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与胡汉民政见不合，以宴请为名，将胡扣押，软禁于汤山，由此激化了与胡汉民等派的矛盾。3月14日，汪在香港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声明与反蒋各派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5月24日，汪由香港抵广州，在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等实力派支持下，联合唐绍仪、古应芬、林森、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等，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以反对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相标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

正当宁、粤双方陈兵湖南南部之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暂时息争御侮。9月28日，汪代表广州非常会议前往香港，与宁方代表蔡元培等就宁、粤统一进行预备交涉，达成初步协议。10月18日，汪由

香港起程,前往上海,出席宁、粤和平统一会议。22日,在与胡汉民、蒋介石作首次晤谈后,代表粤方提出集权于党,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四全大会等7项政治主张。11月7日,宁、粤双方达成妥协。但是,由于广州非常会议在有关蒋介石何时下野的问题,意见对立,发生分裂,12月3日,汪在上海大世界召集退出广州四全大会的汪派人员举行会议,依比例选出中央委员。22日,宁、粤、沪三方所选中央委员,于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汪与蒋、胡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并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此宣告了国民党的统一。

12月15日,基于粤方胡汉民等派的强烈要求,蒋在军政两方面作好复出的安排后,宣布下野。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在蒋下野问题以及对日政策上与胡汉民意见对立,遂由联胡改为联蒋。在蒋宣布下野,拒不出席一中全会之时,汪亦称病入医院,不出席会议。由于汪、胡、蒋三人均不在南京,加之孙科既无军权又无财权,外交上也一筹莫展,因而不得不请辞院长职务。如此,便为蒋的复出,汪、蒋的再度合作提供了时机。1932年1月16日,汪应蒋之约至杭州,在烟霞洞会商后,决定合作。21日,汪、蒋分别抵南京。28日,中央政治会议改组行政院,以汪为行政院院长。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为委员。3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主持"剿共",汪主政、主持对日交涉的汪、蒋再度合作的格局。

就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当天,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

变,淞沪抗战爆发。2月5日,汪在徐州发表对日问题之谈话,申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此时,汪接受英、美、法、意等国的调解,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汪、蒋的对日妥协,目的是为对内"剿共",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结果使日本得寸进尺。日本在侵占东北后,于3月9日扶植废帝溥仪炮制了伪满洲国。1933年1月,日军攻占榆关进攻长城各口,由此爆发了长城抗战。时汪精卫正以请假养病为名,住在德国。长城抗战开始后,汪于3月20日返抵南京,但直至与蒋介石等人会谈,29日由中央政治会议推为新设的国防重要委员会委员长,获得对日外交全权之后,始于30日表示销假视事。4月下旬,日军进至长城以南,迫近北平、天津时,汪、蒋决定对日妥协,授权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及新设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黄郛与日方交涉。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7月28日,汪蒋联名发表内外方针之通电,提出《治标莫急于剿除匪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旋即调集100万军队,对中共领导的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全力"剿共"的同时,汪精卫则大力推行对日亲善外交。8月,汪兼外交部长。在汪主持下,国民政府一再下令严禁抗日反日的言论与行动,相继恢复了华北与伪满间的通车通邮,通过何应钦"致酒井备忘录"和《秦土协定》等,将国民党势力撤离华北,造成了华北的危急。由此而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汪还响应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张,力谋参加日、德两国正在柏林策划的国际防共协定。

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身负

重伤，遂于12月1日向五届一中全会请辞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职。7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推汪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36年2月19日，汪为实现参加日、德、意反共联盟之目的，以养病为名，离上海赴欧洲，准备与德国当局交涉。由于日本的入侵日急，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加以蒋介石阻止，其图谋未能如愿。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急电汪回国。汪认为这是他东山再起、重掌大权的天赐良机。汪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候乘船回国期间，召驻欧洲各国大使顾维钧、程天放、郭泰祺等共商对内对外政策。汪顽固坚持"不可停止剿共军事"，并提出重组领导核心的人员名单，准备取蒋而代之。但是，出于汪的意料，在其离开热那亚的第三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

1937年1月14日，汪抵达上海，旋即前往南京。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已基本停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即将形成。汪不顾国内政局的变化，继续鼓吹"剿共"军事不可中止，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竭力阻止国共合作，但未能如愿。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予以坚决抵抗，全国抗战爆发。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为此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汪精卫虽然未能阻止全国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实现，但始终坚持反共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则是主和不主战，在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期间，力主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等一系列灭亡中国的条件。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随之，两国各自撤回大使，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如此形势下，汪在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的密谋下，开始了暗中通敌的活动。先后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涉，并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军部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前后，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至极，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国民政府再无处可退，遂派高宗武、梅思平于11月20日，在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的“重光堂秘密协定”，决定出逃重庆，另立以他为首的反蒋反共的“新中央政府”。

12月8日，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等人从重庆飞往昆明，翌日，会同先期抵此的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及参政会议员陶希圣飞往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招降声明，宣布了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伪府，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反共”，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条件。29日，汪发表《艳电》声明，接受日本的条件。

按照汪、日“重光堂秘密协定”的预定计划，汪本拟在日本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地区，及日本已占领的广东、广西地区，另立政府。由于龙云等人未予响应，预定计划破产，汪遂于1939年2月初，与高宗武一起另拟了与各已成立之汉奸政权合作，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并派高宗武再次赴日，与日本当局交涉。3月21日，重庆当局在汪拒绝了劝其赴欧的要求后，下令在河内监视其行动的军统人员，采取暗杀行动。结果误杀副手，汪侥幸逃脱。4月26日，汪在日本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

内,5 月 8 日抵达上海,旋于 31 日偕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飞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商谈有关成立"新中央政府"事项。

汪在获得日本政府支持其成立伪国民政府的保证后,于 6 月 18 日,离开日本经天津、北平返抵上海。7 月 9 日,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之广播讲话,声明与重庆断绝关系,并紧锣密鼓地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以及日本仍在策动出山的吴佩孚等人进行合流谈判和促吴"出山"的活动,并前往广州,配合日军对第四战区将领张发奎等进行策降。8 月 28 日,汪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和平反共建国"纲领,"授权"汪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

依据日本内阁于 6 月 6 日作出的《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规定,汪精卫等人必须在其政府成立之前,允诺日本所要求的条件。为此,11 月 1 日,汪精卫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林柏生、陈公博等,与日本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进行秘密谈判,于 12 月 30 日,签订了名为《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即所谓《内约》的卖国条约。1940 年 1 月下旬,汪在日本的导演下,于青岛召开有南北两伪政权参加的三方会谈,决定了伪府的成立。

3 月 20 日,汪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外,还有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以及所谓无党派人士。会议相继通过伪府成立大纲、伪府名称及成立日期、组织机构及人选,并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及授权汪精卫决定

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等一系列决议。汪不仅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而且出任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一系列首要职务，成为汉奸首脑。30日，汪精卫偕伪府各部、会汉奸首要宣誓就职，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汪在发表《艳电》后，国民党中央即于1939年1月1日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月8日，下令通缉。在汪袍笏登场的3月30日，重庆国民政府重申前令。11月30日，更悬赏法币10万元，捉拿汪精卫。

汪精卫伪政权虽经成立，但日方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直至11月下旬，由于对重庆诱降无望，始于30日，与汪签订所谓《基本关系条约》，并由汪与日本及伪满三方发表《共同宣言》。汪在承认伪满洲国的同时，其伪府也获得日本的承认。在此前的29日，根据日方的指令，由汪任伪府主席，取消代理名义。

日本在承认汪伪政权后，即以扶植汪伪政权，使其成为破坏抗战、维持和巩固占领区、支持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工具。由于《汪日基本条约》的签订，汪寄希望于日本放松对其政权的控制，发挥其独立自主的权能，建设"和平模范"区域，并由局部"和平"扩展至全面"和平"。为此，汪一再向日本提出请求，宣称：在目前形势下，只能建设国民政府治下的中日合作模范区，以事实让国民承认和平的可能性，以此促进重庆政府的崩溃。日本政府为表示对汪的支持，于1941年6月召汪到东京。6月23日，汪与近卫文麿发表《共同宣言》，声称两人相誓为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标作进一步的努力，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

济上、文化上提出中日提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日本政府亦对之作进一步的援助。

所谓务必提供中日协力之具体事实,即要求汪精卫动员其一切人力与物力,协助日军即将在华中地区开始发动的“清乡”运动。为此,汪成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清乡委员会,并自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从1941年9月至1943年间,汪曾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清乡区”视察。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当天,汪精卫发表声明:依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国民政府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并向日本提出参加对英美作战的要求。汪为表示与日本及伪满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于1942年5月,前往长春,对伪满洲国进行访问。

日本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局,于1942年12月,由御前会议作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同意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的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放松对汪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控制,并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等所谓对华新政策。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汪发表声明,要与日本同生共死,死中求生。为此,汪精卫在思想上极力推行培养所谓“新国民”的奴化运动;在军事上扩充伪军,代替日军进行守备;在经济上和物资上加强掠夺与搜刮,并通过强行收买棉纱棉布和开展献铁献金运动,来满足日军所需要的军事物资。

汪精卫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可谓不遗余力。由于东奔西走,日夜不得休息,致使其背部遇刺留下的枪弹引发炎症,损及骨

髓。11月初,汪带病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由于病体难支,遂向日本首相东条请求派名医往南京诊治。12月19日,由南京日军第一医院施行手术,将留弹取出。术后病情一度好转,但旋即恶化。1944年3月3日,不得不将汪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治疗。但因病入膏肓,医治无术,于11月10日下午毙命,时年61岁。11月12日,日本将其灵柩送回南京。23日,汪伪国民政府将汪葬于南京梅花山。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当局将汪墓炸毁,汪的尸体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汪精卫最终落得个既可耻又可悲的下场。



第三十六章　虞　洽　卿

虞洽卿，1867年(清同治6年)6月19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龙山村。原名和德，字洽卿。父亲虞万丰，做裁缝，后改行经商。12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虞辍学在家，做些零活，拣些蛤蜊，以补充家用，与母亲相依为命。1881年，虞洽卿15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因脑子灵，会盘算，做事勤快，心细，有眼光，很受老板的赏识。第二年，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二百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为了更好地跟外国人打交道，联系业务，他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补习夜校学习英语。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能应付一般会话。他注意阅览《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一次，德国洋行急于脱手一大批颜料，一些商行怕颜料质量有问题，而且都是些红、黑、紫三色大路货，怕受骗、难销。虞洽卿通过看报知道德国人急于将货出手是因为欧洲正在打仗，德国人要马上回国。于是虞洽卿将颜料全部买下。后来情况果真如虞洽卿所预料的，瑞康行因而发了大财。

虞洽卿周旋于外国商人与洋行买办之间，凭着能与外国人会话，兼以办事干练，声誉日高。1894年，虞洽卿27岁，进德国鲁麟洋行当买办，开始踏进“上流社会”。

1898年,上海法租界当局企图以修筑马路为由,侵占旅沪宁波人安放旅榇的殡舍四明公所义冢地。虞洽卿联络上海商界及旅沪宁波人开展罢工、罢市,与法国人斗争,终于迫使法租界当局不敢再提拆馆改道之事①。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奔上走下,多方活动,显露头角,在宁波同乡中有了会办事的名声,也得到上层人士的看重。1905年正月,一个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带着十几个婢女从四川回广东原籍,路过上海时被英租界巡捕房扣押。巡捕房指控黎黄氏贩卖人口,便将她移送"会审公廨"。此案承审官是副会审官华人金巩伯,陪审官是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两人因审理此案发生争执,德为门和外国巡捕不服从承审官华人金巩伯的处理,竟大打出手。上海租界市民平时受尽捕头欺压,听到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举行罢市,到处围打巡捕,有人还放火烧了巡捕房。租界当局出动武装警车四处兜捕打巡捕的市民。出事第二天,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认为"中国对付之策,仍须和平",决定用和平办法进行抵制。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上至各业领袖,下至行帮会门,积极奔走,造舆论,张声势,与租界当局交涉,迫使英方释放黎黄氏,规定"今后一律由中方巡捕到会审公堂维持秩序"②。这次"大闹公堂案"与"四明公所事件"使虞洽卿成了一个知名人物。

1905年,虞洽卿等人发起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万国商团"是外国驻沪领事为"保护侨民利益"而组成的武装团体,行动听命于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万国商团"起初没有"中华队"。为

① 参见汪北平、郑大慈编:《虞洽卿先生》,上海宁波文物社1946年版。
② 《大闹公堂案》,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卷。

了维护中国商人利益，虞洽卿等人领导上海总商会积极筹办“中华队”。1906年“中华队”正式成立，并加入“万国商团”。每当政局动荡不安，“中华队”与“万国商团”一样，出防维持秩序。

1903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改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1906年，他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印象深刻。1907年，虞洽卿担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1908年，虞洽卿等旅沪宁波人发起开办“上海四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兼办储蓄、发行钞票。先后在宁波、温州、汉口、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及上海、香港等处设分支行或办事处。股本总额由150万两到1921年增为“国币”225万元，后增为“国币”400万元。发行的钞票，据1924年统计是1831万元。虞洽卿为四明银行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09年，虞洽卿上书清政府，要求筹办“南洋劝业会”，以使“我国新兴工商业有所观摩，而图改进，且借此聚全国工商业先进于一堂，互相联络”。上书获清廷准奏。度支部拨银70万两以作经费，不足之数36万两由虞洽卿垫付。会长为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虞洽卿任会办，会址定在南京鼓楼。1910年1月25日，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规模盛大的全国性博览会，分设教官馆、工艺馆、农业馆、美术馆及卫生、武备、机械、通运、水族等馆。各省区分别建馆的还有北京、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暨南(包括南洋华侨)等十六个馆，另外还有江南制造局出品陈列馆，广东教育出品陈列馆和两个陈列外国产品、供人观摩的参考馆。这些馆除陈列各地特产外，也展出一些名胜古迹的模型、文物以及从海外引进的新奇产品。整个展览会上的展品共达100多万件。另外，劝业会还附设马戏场、动

物园、植物园、娱乐商场等。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观摩交流者达20多万人。在当时的中国，能举办这次盛会，确非易事。

虞洽卿一生不愿做官，用他的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还来不及，还做啥戏！”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开始与同盟会接触。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饷征募队，积极资助革命党人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上海继武昌起义后发动起义，虞洽卿被陈其美派去苏州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成功。在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中，虞洽卿代江浙联军向外国人购买枪械，还亲自押运子弹到南京天堡城下支援浙军。

1918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交易所于1920年开张，虞洽卿为理事长。虞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他收纳、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1920年4月，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确定了敦促和协助政府实施改良税则、保护专利、奖励发明、改善交通和金融等措施为该会的活动方针，他还亲自到北京、南京为修改税则而奔走。[①]

1924年8月，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同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电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1925年2月，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4月27日，虞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0

① 《时报》1920年3月29日、4月2日。

日升为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义愤填膺，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上海总商会迫于形势，宣布罢市。身为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于6月10日召开总商会大会，成立上海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为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17条。虞洽卿主持的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提出删去17条中有关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武装，永远撤退英、日驻军，取消领事裁判权，高级巡捕中华人应占半数及工人罢工集会自由等4条，改为13条，以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名义提出，遭到工商学联合会登报反对。6月26日，上海总商会宣布罢市结束。

在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积极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经收的募捐款总计洋236万元，银43.3万两。这笔巨款，是罢工工人生活费的基本来源。向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的工作是由总商会成员发起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济安会负责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曾说，在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①。这是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卅运动的巨大支援。

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起初不赞成罢市，还亲自跑到几家商店劝说复业，激起了店员和群众的愤慨。后来他虽不反对罢市，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时，删去条件中的4条，斗争态度不坚决。但又不敢与兴起的群众反帝运动潮流相背。这表明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既不愿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也不

① 转引自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愿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企图站在所谓“中间”的调停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虞洽卿逐渐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靠拢。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虞洽卿以商界代表出席，被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虞洽卿连夜到龙华见蒋，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第二天，虞召开上海商业联合会会议，表示商界全力支持蒋介石。3月31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成立，虞洽卿是该委员会头三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援助。虞洽卿还将自己的10万元作为“慰劳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6日虞洽卿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①] 虞洽卿帮助蒋介石“有功”，于11月1日，和另外11名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就任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②]。一年后，他又被委派为中央银行监事。

虞洽卿与蒋介石搭上关系后，上海租界当局对他也益加看重，关系也更加密切。1926年4月；西人纳税会年会通过了工部局所提添设华董3人的议案。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任执委会主席。1928年4月16

---

①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联合会档案》卷六。

② 《新闻报》1928年11月1日。

日,纳税华人会宴请工部局中外董事及委员,虞洽卿以纳税华人会主席身份在宴会上致词说:“获聚此中外社会代表于一堂,杯酒联欢,吾人似见中外合作之花有欣欣向荣之意,而大上海发展进步乃无穷尽。……前此双方虽以误会,略有芥蒂,顷已渐归消灭,拨云翳而见青天,而目前中外人士合组之工部局,实负此切实合作之使命。”[①] 1928 年 2 月,上海荷兰银行举行庆祝虞洽卿任“华经理”二十五周年典礼和宴会,称颂他“任职多年,甚著贤劳”,特别送以荷兰国王宫自鸣钟等礼品,荷兰政府赠他勋章一枚。1936 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10 月 1 日,举行了隆重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礼。这一段时间,虞洽卿在政治上春风得意。

航运业是虞洽卿经营的重要部分。1909 年,他发起成立“宁绍轮船公司”,任总经理。因宁绍公司是股份公司,他的股本不多,总经理上有董事会,很难让他独揽大权和施展抱负。1913 年,他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在家乡浙江龙山修筑海堤,建造码头,购置三艘百吨小轮,取名“慈北”、“姚北”、“镇北”,行驶于宁波、余姚、镇海、舟山等地。到 1916 年,三北公司买进了“宁兴轮”,参加沪甬航线。公司的资金从 20 万增到 100 万。以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到 1919 年,三北公司资本增到 200 万,后来又增到 250 万。以后盘进肇成机器厂,改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专门修理三北、鸿安、宁兴公司的船

①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71 页。

只，也能制造一些小型船只和拖轮铁驳及长江各埠的浮码头趸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商轮船回国，一时船少货多，三北公司获利很大。虞再为三北公司添资百万，购置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欧战结束后，外商轮船纷纷重来，三北公司没有能力与之竞争，亏损很大，虞洽卿只好靠借债度日。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不久，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三北公司在战争中受到了巨大损失。有3万吨船被政府征用炸沉，用来封锁江阴要塞。另有2万吨行驶长江的船，因吃水较深，不能进入川江，想回上海，因江阴堵塞，不能通行。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一时也无法活动。不久，经意大利驻沪领事的同意，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队，挂上意大利国旗航行。虞洽卿借自己是上海难民救济会理事长之便，借战时上海租界粮食紧张之机，募集大笔款项，用三北公司轮船到西贡、仰光运大米到上海，获利颇丰。同时，他向香港汇丰银行借款，在香港向挪威华伦洋行购进3艘远洋轮船，以"华伦银行"代理的名义，让这3艘远洋轮船挂上挪威和巴拿马国旗搞运输。这样，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船队重又活跃起来。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上海的租界成了"孤岛"。一些头面人物迁往内地，有人劝虞洽卿也离开上海，但因虞的根基在上海，所经营的航运业红火，因而仍留在上海。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37年12月成立了"大道市政府"。1939年4月南京出现"维新政府"后，上海大道市政府即直属南京管辖，改组为"上海特别市政府"。日本人为控制上海，企图拉拢虞洽卿为日本人办事，而虞洽卿又接到蒋介石令宁波专员公署转来的两份电报，一电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建设，一电问他何日启程。为了躲避日军及汉

奸的威逼利诱，虞洽卿通过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地下人员于1941年春离开上海去重庆。

1941年夏，虞洽卿经陆路到达重庆。一路上，他看到陆上运输在大后方的重要地位。到重庆后，即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运输公司"，经营水陆运输，水路有原三北公司在川江行驶的几只轮船，陆路是汽车运输。以后，他到昆明与龙云接洽，和西南财阀缪云台合资开办了"三北运输公司"，购到美国道奇牌卡车3百辆，从缅甸仰光贩运国内很需要的汽车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虞洽卿还弄到一张蒋介石的"手谕"，写明此即"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这样，虞洽卿进四川不久，又发了大财。

1945年4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医治无效，于26日在重庆逝世，终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嘱赠黄金千两给国家，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



第三十七章　荣宗敬　荣德生

荣宗敬、荣德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他们主要经营面粉厂、纺织厂，被人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巨子”。

荣宗敬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荣德生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他们是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他们的先世多从事商业。祖父荣锡畴是往来于沪、锡两地的贩运商。父亲荣熙泰先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帐房，后经人推荐到广东当了清政府的厘卡税吏。母亲石氏。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并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荣宗敬14岁进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帐房业务。翌年，到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习艺。3年苦学满师后，到上海南市鸿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钱庄)当收解(跑街)①，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1895年，钱庄倒闭后，他回无锡闲居。荣德生比荣宗敬小两岁。15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帐务。1895年，他在厘金局3年任期届满，便和父亲相偕离职回乡。

1895年，荣氏父子三人都赋闲在家，开始筹划今后的前途。

---

① 参见桑逢康著《荣氏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当时江浙一带开钱庄的风气盛行,不少人因开钱庄发了财,加上荣氏兄弟俩都是钱庄学徒出身,于是荣熙泰便说服儿子开设钱庄。1896 年 2 月,荣氏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帐。头两年,钱庄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便将股金抽走。从 1898 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为发展业务,钱庄在无锡设了分庄,荣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广生业务日益兴旺,盈利节节增加。1908 年,由于荣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祥商号搞投机生意失败,亏银六七十万两,广生钱庄受到牵连,元气大伤,不得不歇业关闭。

荣氏兄弟开钱庄的同时,还经营收茧业务。他们利用钱庄汇兑的有利条件,可以无息地使用顾主的汇款来大批收购蚕茧,利用与无锡丝厂经理的私交,使蚕茧销售畅通无阻,因而收购蚕茧的业务年年盈利。收茧季节大量资金的调拨,对广生钱庄的汇兑业务也有所促进。茧行的稳固收益,是荣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来源。尽管后来他们的财富越滚越多,但对茧行一业仍不愿放弃,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停业。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发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尤其以上海、无锡等地的面粉为最多。因为面粉北运免税,经营面粉业的实业家均获厚利。荣氏兄弟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创办面粉厂。1902 年,他们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

保兴面粉厂初建时规模不大,只有 30 余名工人,法国造的

石磨四套，每昼夜出粉300包。开业之初，一时难于打开市场，销路不佳。朱仲甫见面粉厂获利不多，便于第二年退出。为打开销路，荣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进行推销，实行先试用后付款的办法，并采取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消费者。另方面，他聘请王尧臣、王禹卿推销产品。王氏兄弟对北方的客帮极为稔熟，与营口、烟台、天津各帮坐庄也有交谊。经过王氏兄弟的努力，保兴面粉在北方打开了销路。这时，保兴厂更名为茂新厂。荣德生仍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为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向英国购买钢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茂新厂的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00包。同时，他们注意提高面粉质量，不收潮麦、坏麦，凡购进的小麦都要经过人工挑拣，所有砂石杂物一概剔出。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1912年初，面粉市场曾一度疲软，但"兵船"面粉销路仍畅。

棉纺织业也是荣氏兄弟经营的重要事业。1905年，荣氏兄弟同荣瑞馨等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起初，纱厂因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09年，该厂人事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经过一番整顿，振新厂才度过难关。到1915年，荣氏兄弟以股东之间矛盾为由，退出了振新纱厂。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所采取的奖励兴办实业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进一步振兴实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191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会上，荣德生主张扩充纺织业，增设机器制造厂，以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制造等为主，由国家

发起然后招商筹办，并要求政府派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①]。与会的一些政界名人，也发表了鼓励办实业的演说，荣德生很受感动。加上茂新面粉厂获利甚丰，荣氏兄弟办实业的热情更加高涨。1912 年，他们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公正董事。1913 年冬和 1914 年夏，他们在上海创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1914 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粮食生产锐减，不但无力向外输出，相反却要向国外采购。于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 1915 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 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发展，1918 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在扩充。1916 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 1916 年至 1917 年间，无锡 5 家面粉厂中，有 4 家归荣德生经办。到 1919 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 8 个厂。面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与“一战”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他们的经营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以此来不断扩充生产设备。二是依靠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办法，抢先买下大量的新麦，以维持长期不断的生产，这样便使自己的企业在同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9 页。

提高，如他们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洁白，除选用优质麦为原料外，还由于在生产中使用了漂白剂。此外，为适应顾客的心理，他们还采用上等白布制作比其他厂家更大的面粉袋，并且适应一般人的侥幸心理，在面粉袋里放铜元，作为“彩头”以扩大销路。

在面粉业发展的过程中，荣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纺织业。1916 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确定资本为 30 万元，分作 3000 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 60%，荣宗敬任总经理。公司的经营大权、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佣和调动等权力都由总经理掌握。申新纺织无限公司成立后，发展很快。到 1918 年，其盈利额达到 22 万多元，为 1916 年该厂盈利额的 11 倍。1917 年，荣宗敬又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1919 年 3 月，改称申新二厂。

1919 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上海棉纺织业积极响应，举行罢市，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市罢业期间，荣宗敬曾发表讲话，认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些“不良分子不顾民心”，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致学界罢课，商业罢市，农工辍工，风潮飘荡，全国风靡，人心一致，众志成城，实敝国数千年来第一之奇特。……虽然，此会之事，由敝国不良分子措置不良，而实果乃由日本国人违反世界公理，有以造成之也。”[①] 荣氏兄弟积极参加了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准备趁此机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派熟悉

①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 64 页。

国外情况的人至欧美考察,购买新式机器,及时更换旧的生产设备。同时他们联合同业组织了面粉和纱布交易所。在交易所中,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厂不仅做多头,大量购进棉纱来哄抬市价,而且还大量抛出棉花来压低花价,谋取更大的利润。

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二十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从190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竞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场,供学生实习用。学生除学习一般中学的共同课程外,还注重工商业基础知识的学习。该校的毕业生在以后荣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同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速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更加动荡和不安的时期。荣氏企业也和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至1924年两

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 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25 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全国再次掀起反帝斗争的高潮。荣宗敬立即发表宣言说："自五月卅日南京路发生惨剧以后，凡我同胞，莫不切齿痛恨，致酿成罢课、罢市、罢工之举行。……现在家常日用与夫个人生活所必需，实以舶来品占居多数，每年流出之金钱，何以胜计，漏卮不塞，困穷立待。兹由鄙人发起，自 6 月 1 日起，凡在本公司范围以内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①] 荣德生也表示了对罢工工人的支持。《锡报》1925 年 6 月 26 日报道说，"自沪案（五卅惨案）发生后，本邑各界捐款助沪工者颇为踊跃，昨本市西门外申新第三纺织厂主人荣德生君，因鉴于沪上罢工工人失业日久，亟应量力救济，愿将厂中端节筵资一百万如数捐助。"荣家企业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高潮中开始转亏为盈。于是，荣氏兄弟趁机再次扩大实业。1925 年先后收买上海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

北伐高潮期间，荣氏兄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②]。

1927 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

① 《锡报》1925 年 6 月 11 日。
② 《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 192 页。

工商业的搜括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的"二五库券"而遭到通缉。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荣宗敬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为了拉拢荣宗敬,国民政府让他担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宗敬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与官僚资本加强了联系,他以做押款的方式,取得银行的支持,举债将申新厂又增添了3个。这样,到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发展到9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拥有纱锭46万枚。至此,申新纺织系统已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荣家兄弟继获"面粉大王"称号之后,又获得"棉纱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时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于国内捐税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负债累累。到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00万元,负债却超过6300万元,致使大部分厂子被抵押了出去。荣宗敬被迫向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救济。然而,国民政府实业部却趁人之危,企图用300万元的低廉价格将荣氏企业据为己有。荣宗敬为此致函蒋介石,指责实业部不仁不义[①]。在无锡的荣德生联合申新三厂的股东和同业声援荣宗敬。慑于社会舆论,实业部不得不放弃吞噬申新的企图。1936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企图利用债权吞食申新企业。荣氏兄弟再次借助实业界同仁以及社会舆论的帮助,挣脱了宋子文设下的圈套。荣氏企业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债台高筑的局面却没能改变。在抗战爆发前,荣氏各厂仅勉强维持生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

①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28页。

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纺织厂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两厂因开设于租界之内，在白天能勉强开工外，其余各厂均遭破坏。面粉厂方面，上海福新各厂均损失严重。无锡茂新一厂、济南茂新四厂也未能幸免。当时，荣宗敬因企业损失严重，曾一度参加了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但由于爱国者及时对他指明了该组织的反动性质，他未深陷泥坑。荣宗敬为了逃脱日本侵略军的胁迫，1938 年 1 月避居到香港。1938 年 2 月 10 日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享年 65 岁。荣宗敬的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上海各报都以显著地位登载消息，竞相发表悼念文章。2 月 17 日，国民政府也发表悼念令，褒扬荣宗敬"兴办实业"的精神。

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由汉口返回上海。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纠缠，他拒绝出任申新总公司经理，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这时荣氏企业多由他的子侄们从事经营，其中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中相继迁入西南和西北，为支援抗战起过一定作用。留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新厂所生产的产品，除在上海和内地销售外，还畅销于南洋华侨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 1946 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1947 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在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下，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 年，由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荣德生在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政府有过一定的幻想，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

想通过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荣家企业。1945年,他向国民政府婉转进言,要求稳定货币,建立威信。1946年,荣德生遭到绑架。荣家为了救他,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60多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无锡解放时,他留了下来。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于1948年下半年制止自己的部属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的企图。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人民政府十分尊重荣德生,并给予他相当的荣誉和地位。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他因病逝世于江苏无锡,享年77岁。



第三十八章　范　旭　东

范旭东，原名源瀼，字明俊。1883 年(清光绪九年)10 月 24 日出生于湖南湘阴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为直隶大兴县知县。父亲名琛，字彦瑜，以教书为业。范旭东 6 岁时其父去世，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1892 年，其长兄源濂任私塾教师，他得以继续求学。范旭东自幼从姑母学诗书，后入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他对八股文章很反感，曾说："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发挥，要我伪装圣贤来说假话是不可能的。"①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范旭东常到宣传新学的求贤书院阅读报纸，谈论时事。1898 年维新运动中，范旭东追随其兄范源濂(梁启超的弟子)，致力于维新运动，受到很大影响，为其以后致力于实业救国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 年，范旭东与其兄参加汉口唐才常举义失败，即随兄赴日留学，改名范锐，字旭东。初入东京第六高中，后考取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曾参与编辑《游学译编》月刊的地理一栏；

---

① 李祉川、陈歆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见《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

同时接近康梁派,曾向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投稿。1910年毕业后留校任专科助教。次年回国。

初时,范旭东在天津制币厂任总稽核,本想为整顿中国币制做一番事业,无奈造币厂积弊太深,黑暗重重,最终只得辞职。之后,他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小规模石墨坩锅制造厂。1912年7月,范旭东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1913年,范旭东被北京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盐务。在欧洲近一年间,他参观了欧洲大陆各国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次年,回国后向当局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①。时值袁世凯正热衷于皇帝宝座,对范旭东的建议置之不理,范只好求助于盐务署顾问、《盐政杂志》主编景学钤,共同集资5万元,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5年6月在塘沽设厂,8月正式投产,产品商标定为"海王",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1916年,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揭开了中国盐业史上新的一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亚交通梗阻,纯碱奇缺,独霸我国碱业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致使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一些食品业和用碱工业由于买不到纯碱而被迫停产倒闭。1917年,吴次伯等人试验制碱成功,经人介绍与范旭东商谈办厂事宜。然而卜内门公司百般刁难,吴次伯中途背信弃义,英国汇丰银行又要挟财政部将用盐制碱特权给予英商,面对严峻的形势,范旭东毅然亲自北上招股,决心担负起办厂重任。

范旭东的努力终于没有落空。1917年10月,北洋政府批准

① 张高峰:《苦海盐边创业纪实》,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6页。

永利原盐免税并通令在永利厂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工厂。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招募银元40万。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然而永利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外国资本家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股东纷纷退出，使永利陷入了困境。

“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①]，这是范旭东的名言。范旭东一向待人至诚，求贤心切，为了摆脱困境，1921年他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经过多年的技术钻研，终于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使得永利于1924年8月开工生产。回忆当时的情景，范旭东无限感慨地说：“侯先生奋不顾身，寝馈于工厂，从事死拼，先后四五年……，煞费苦心，这工作不比重新发明有什么不同。”[②] 但6年的设计安装耗资160万元，出的碱竟是红、黑相间像锅锈一般，碱厂被迫停工。范旭东临危不惧，做出了派人出国学习、借用久大资金、裁减人员三项决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卜内门公司见永利公司受挫，千方百计企图吞并，都被范旭东采取措施击破。1925年8月又发生了范旭东被绑票事件，反动政客郝鹏为了筹集军费策划绑架，讹诈久大13万元之多。范旭东被救出后竟失声痛哭，感叹在中国办工业之艰难。

侯德榜在美国几经周折，终于查明新制碱失败的原因是干

① 陈竞生：《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引进技术的范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引进技术发展的成就》，《光明日报》1981年3月3日。

② 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燥锅品质太差，并买得新的干燥锅回国。1926年6月，永利厂重新开工，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30吨以上，1926年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质奖。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所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但永利也以更大幅度的降价出售，迫使卜内门公司请求谈判，卜内门公司妄图扼杀永利的阴谋破产了。

“红三角”牌纯碱获奖后，永利碱厂的产品销路大开，产量不断增加。1926年纯碱产量为4504吨，1931年为23442吨，1936年为55410吨。

范旭东热情提倡科学救国，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1922年8月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由于当时资金困难，范旭东拿出办久大和永利的酬劳金来创办黄海，他坚决地说：“我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① 范旭东形象地把近代工业比作长城，把科学研究比作长城的地基，以说明科研对近代工业的重要性。黄海初期的目标是协助永利和久大解决技术问题，后来又选择了最切合国计民生的项目。

1928年9月，范旭东在塘沽又创办了《海王》旬刊。为何要办《海王》，范说：“他是团体最重要的分子，是团结这个团体的胶着力，我们有了错处，受他的潜移默化，自然改悔，误入了迷途，他像暗夜的灯塔般指点方向。”②《海王》是久大、永利和黄海的共同喉舌。该刊以（1）“绝对相信科学”；（2）“积极发展实业”；（3）“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4）“以服务社

---

① 《创设海洋研究室缘起》，《海王》旬刊第十六年第31期。

② 《海王》旬刊第十九年第2期。

会为最大光荣”① 等为信条，时常登载科学消息与新知识，深受科技界重视。

追求是不懈的，永利办起来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创办制酸工业。1929 年 1 月，范旭东给实业部打报告，提出了以 2000 万元发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的计划。1933 年 11 月，克服了重重阻力，范旭东正式呈文政府备案承办硫酸铔厂。1934 年 4 月，范派侯德榜等人赴美考察，引进硫酸铔厂技术设备。经过两年筹建，1936 年被批准为特许公司。1937 年 2 月，南京硫酸铔厂竣工，首次试车成功，日产硫酸铔 250 吨，硝酸 40 吨。范旭东兴奋地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支翅膀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②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3 年 5 月，范旭东严辞拒绝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黄海化学研究社新建的图书大楼内签字。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方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与范旭东合作，但范坚决表示：“宁举丧，不受奠仪。”③ 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塘沽沦陷，永利碱厂等被日军占领。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在淞沪会战中，范旭东组织南京硫酸铔厂全体职员赶制军需炸药，支援抗战。日军曾三次轰炸南京硫酸铔厂。范旭东与侯德榜有组织地把部分人员、主要机械设备迁往内地，有的笨重设备不便转移，则拆下投入长江，不为敌用。范旭东决心为中国再创立一个化工中心，碱厂厂址选定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

① 《海王》旬刊第七年第 1 期，1934 年 9 月 20 日。

② 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第 46 页。

③ 熊尚厚：《范旭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 15 辑，第 62 页。

桥的老龙坝,为纪念“永久黄”团体在塘沽的事业,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1]

五通桥的盐源比不上塘沽,塘沽的制碱方法必须改进。为了提高食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1938年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临行前范旭东鼓励说:“难道黄头发、绿眼珠的人能够做出来,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2]侯德榜不负厚望,经过五百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为了购买技术设备与器材,1940年10月,范旭东踏上赴美的路程。他克服了旅途的坎坷、身体的不适,终于使满载着机器设备的200辆运货卡车胜利而归。不料日军进攻香港,范被困香港,至1942年3月才得以脱险回到重庆。他在庆祝会上说:“我马上开始工作,希望同仁各守各的岗位,少谈方法,多做实事,向前努力,把我们的事业做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3]

范旭东自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来,连任了四届。其间国民政府以援助为名,用贷款为诱饵,企图控制永利,都被范旭东拒绝。永利虽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却深受官僚资本的重压,由此,战时范旭东的企业始终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惨淡经

---

① 郭炳瑜:《我在永利碱厂五十年的见闻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90页。

② 张能远:《范旭东和中国近代化学工业》,《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第1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第89页。

③ 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42页。

营。范旭东在抗战后期已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曾对永利公司的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要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①] 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结识了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经周恩来批准，1945 年 6 月，两人在重庆创办建业银行，从此，范旭东与中国共产党有了联系。

1944 年 11 月，范旭东赴美出席在东美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对于战后事业的发展，范旭东早已拟定了《十厂计划》。1945 年初，范旭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约借款，美方因钦佩范旭东与侯德榜的人格与事业的成就，破例以优惠的条件借款 1600 万美元，只要中国政府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范旭东兴奋之余，提笔写道："真是千载良机，值得重视……。"[②] 不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互相推诿，迟迟不给答复。同年，范旭东以参政员的身份向政府建议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这封建议书反映了他严谨的经济思想和管理才能，无奈国民党正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借款一事最终以"未予批准"告吹。范旭东的一腔爱国热血付之东流。

1945 年 9 月，毛泽东在重庆桂园招待产业界人士，高度赞扬了范旭东等人为化学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欢迎他到解放区开办工厂。1945 年 10 月 1 日，范旭东突然病倒。10 月 4 日下午 3 时病逝于重庆沙坪坝南园寓所，享年 62 岁。

---

① 熊尚厚：《范旭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 15 辑，第 64 页。

② 胡迅雷：《中国工业巨子范旭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第 1 版，第 291 页。

第三十九章　蔡　元　培

蔡元培，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庼，后改号孑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锷青、会稽山人等。1868年（清同治七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父亲宝煜，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在蔡元培11岁时病逝。

蔡元培6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书。1877年起，因家境困难，改到别处附读。13至16岁，在叔父蔡铭恩和秀才王懋修指导下，阅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学作八股文。17岁考中秀才，开始自由阅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18至19岁，在家乡做私塾教师。20至22岁，为同乡举人、藏书家徐树兰校订图书，得以博览群书，学问有很大长进。23岁，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人。翌年，去北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的蔡元培，已是一个才华出众，“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① 的士大夫了。

正当蔡元培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马关

---

①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0页。

条约》。蔡元培极为悲愤，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涉猎翻译西方书籍，思想眼界渐开，开始走出传统思想的牢笼，感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他认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虽然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但毕竟迈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 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指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仅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以图扭转腐败局面，这是不可能的。他看透了清廷的昏暗腐朽"无可希望"，于是在这年 9 月，毅然弃官南下，在家乡兴办教育。这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起点。

同年冬，蔡元培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分三斋，大体上分别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笃信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经常予以批评。旧派对新派异常忌恨，怂恿堂董妄加干预。蔡元培对此不能接受，愤而辞职。

1901 年夏，蔡元培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的教学很有特色，规定学生自己读书。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写札记，每月作文一次，都由他亲自批改。他还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便用演说去唤醒民众。他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特班学生黄炎培后来在追思蔡元培的教诲时认为，他"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1]。

---

① 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54 页。

1902 年 4 月,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被推举为会长。同年 11 月,南洋公学因学校当局欲惩戒无辜学生,引发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并支持学生,亦辞职离去。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百多名退学学生组成爱国学社,公推蔡元培为总理。爱国学社以教育为手段,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教育。蔡元培"公言革命无所忌",认为革命乃治病之良方,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

1903 年 4 月,抗俄拒法运动高涨,蔡元培主张成立团体,声援广西人民的拒法运动。并针对俄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出版《俄事警闻》(后改称《警钟》),号召抗俄救国。1904 年 2 月,蔡元培在该报发表白话小说《新年梦》,描写自称"中国一民"的人,在梦游中的见闻,表达了他想改变社会经济制度,"造个新中国"的愿望。

1904 年 7 月,蔡元培接任爱国女校总理。当时,他认为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注重军事训练,播下了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则播下了暗杀的种子。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会长。1905 年 8 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经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指派他为上海分部负责人。他又发展黄炎培等人入会,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07 年 6 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兼作家庭中文教师,翌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德四年半,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等书。《伦理学原理》出版后,被国内一些学校作为伦理学教科书,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对思想界产生过一定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时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①]。

1911 年 12 月，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1912 年 1 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他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把清廷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删掉忠君、尊孔的内容，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他指出，这五方面教育皆为当代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他对清廷旧学制进行了重要改革，提出务必顺应时势，推行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为此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 1912 年 1 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等。他还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借以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

---

①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1 页。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主张精兵简政，节约经费。政府各部人员，多者百余人，但他主张：为事择人，不必多设冗员，因而教育部连缮写员在内也只有30多人。蔡元培为人廉正，生活俭朴，平等待人，极少衙门作风。同盟会员持孙中山介绍信来，他不予安排；素不相识的青年王云五，因对高等教育提了中肯的意见，被破格录用。教育部上起总长下到部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30元，全部开支，每月不过千元。由于"诸事简陋，惟务实际"，勤杂人员用得很少，以至堂堂教育总长亲到大总统府去领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乘人力车往返的。这些带有公仆特色的作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美谈。

1912年9月，蔡元培携眷再度赴德国留学。翌年3月，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6月，蔡应孙中山之召回国。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痛斥袁世凯是毁弃民元约法的罪魁，是凭借武力的野心家，主张用武力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讨袁军事行动失败后，蔡元培于当年10月到达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3月，蔡元培等与法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蔡任中方会长，欧乐任法方会长。华法教育会是中法文化交流的总部，它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大批华工，并为他们开办华工学校；二是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后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赴法勤工俭学者达千人。其中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和优秀干部。

1917年1月，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敦请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原来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思想浓厚、官僚积习很

深、校政腐败的学府，许多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问题并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因此，学校被人称为"官僚养成所"。蔡元培上任后，首先对北京大学的校风进行整顿。他到校第一天，校役们列队在门口恭候并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立即脱下礼帽，向校役们鞠躬还礼。历任北大校长都是由总统任命的特任官，他们出入校门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平等待人精神，在北大师生和校役中引起强烈反响。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师生之间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因此深受青年学生的景仰。他注重改变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旧观念，教育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学问的有无好坏，不是地位的高低和家庭的贫富。

蔡元培深知办好一所大学，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必须拥有一支积学而热心的教师队伍。为此，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杨昌济、马寅初、马叙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学者到校后，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力量。

为了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蔡元培的组织和支持下，各种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如新闻、音乐、画法、书法、体育等研究会，以及新潮、国民、平民讲演团，消费公社等社团。蔡元培目睹许多学生无意于学术研究，却醉心于运动官吏议员，从中感到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为此，他发起组织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不饮酒等为戒规，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该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道德堕落的不满，

对北大部分师生中道德风尚的扭转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后来他总结他在教育界的经验时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①] 从这种办学方针出发,蔡元培聘请教员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即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不求全责备,不以个人政治倾向作为取舍的标准。“圆通广大,兼容并包”,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鼓励向封建主义作斗争。因为旧思想旧文化在北京大学仍占统治地位,充斥各个学科,新思想新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因此,提倡“兼容并包”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旧思想旧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他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扩充文理两科。鉴于文理分科的流弊,力主文理沟通,主张废去年级制,采用选科制。选科制的实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在行政领导体制上,设立了校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才能付诸执行。

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整顿革新,面貌为之改观,不仅为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楷模,而且促进了知识界思想的转变。在青年学生中掀起追求民主和真理的热潮,北京大学因而也

---

① 《宇宙风》第56期,1938年1月1日。

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倡导者。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蔡元培是这两大口号的积极宣传者。他反对尊孔迷信，认为守旧派“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背离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因而是十分荒谬的。他抨击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他”，给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他说：“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① 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希望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加入“世界学术之林”。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1918 年 11 月，蔡元培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他声情并茂地说：“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② 这里，他所说的劳工，是泛指各种劳动者，不单指工人，即“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③ 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劳工神圣”在当时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蔡元培主张教育平等，极力提倡平民教育。他支持学生成立

---

① 何炳松：《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105 页。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 11 月 27 日。

③ 《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 11 月 27 日。

平民教育讲演团，赞助他们走出校门去为劳苦大众服务。1920年，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2年，北京大学开始规定五一劳动节放假，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本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经校务讨论会议决，放假一日。"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公开纪念劳动节，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也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可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要蔡元培负责召回结队游行的学生，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不大赞成，但也不多加干涉，因而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学生被捕后，他同情学生，并立即对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当警察总监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条件时，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他还和师生们在校门口列队欢迎被捕同学归来。

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下令北京各校整饬学风。在巨大的压力下，蔡元培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北京大学师生发起了"挽留蔡校长"的斗争，北京各校和社会各团体也积极响应。北京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电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由于校内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向北大和全国青年学生表示：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①。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不完全理解群众运动的作用；他忧国忧民，富有爱国精神，却看不到解放中国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7月23日。

的道路。因而他认为救国运动已经完成，学生应该"尽瘁学术"。这时的蔡元培依然局限在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之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蔡元培认为，应以"学术自由"的原则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必即信仰马克思。"①1921 年 11 月 17 日，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支持研究会的成立，并应约在会上讲话。当时北京政府到处防范"过激主义"，北京大学居然允许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存在，这说明了蔡元培的胆识。

1920 年冬，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1921 年 9 月回国。1922 年初，北京争取教育独立运动呈现高潮，蔡元培积极支持这一运动。3 月，他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②。

1923 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欧。此后一段时间，他虽然仍保留北大校长名义，但已不主持北大实际工作。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蔡元培在欧洲致电北京大学，对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完全支持。并撰写《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一文，在欧洲各国报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发表，揭露惨案真相。

---

① 李季：《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3 年 4 月版。

② 《新教育》第 4 卷第 3 期。

1926年2月,蔡元培由欧洲回国,坚辞北大校长职务。虽因各方挽留,辞职未果,但仍滞留上海,没有北上。1927年3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参与了蒋介石等策划的反共"清党"活动。4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通过了吴稚晖等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并要求国民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加以逮捕。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蔡元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当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时,害怕群众的觉悟和剧烈的反抗行动;同时,他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并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革命高涨和政治大变动的时刻,他一度陷入迷途。但不久,即同国民党反动政权拉开了距离。

从1927年4月起,蔡元培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1928年8月,他辞去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该院于1928年6月正式成立,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至1930年,中央研究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汇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灏等众多知名学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请杨杏佛任总干事,就是以杨之长补己之短。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1] 他挑选造诣深

[1]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48页。

厚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和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他们都有充分的权力，展其所长。因此，中央研究院的经费虽不甚多，却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科研成果。蔡元培为发展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国民党"清党"以后，蔡元培曾希望依托蒋介石政权来谋取国家独立，实现民主政治，但这个政权越来越专制独裁，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又推行不抵抗主义，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起来抗争。

1930 年 8 月，邓演达成立第三党，揭起反蒋旗帜，蔡元培表示支持，并打算同邓合作，酝酿反蒋各派的大联合。1932 年 12 月，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任务是营救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前后，他和宋庆龄等曾联名营救杨开慧、邓演达、史良、罗隆基、胡也频、陈独秀、牛兰夫妇、许德珩、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侯外庐、丁玲、潘梓年等人。同盟的争取民主自由和营救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恐惧与仇恨，他指使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杨杏佛，并迫使同盟停止活动。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是蔡元培后期政治生活的光荣一页。

1933 年 3 月 14 日，蔡元培等百余人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他说："迩年来我国以反对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寖且言者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①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蔡元培等敢于带头发起纪念马克思，

① 《申报》，1933 年 3 月 13 日。

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自执绋,并致悼词。他说:“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①]这一果敢行动,既表现了蔡元培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又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愤怒抗议。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1933年5月,他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耻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日本侵华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它灭亡朝鲜的老办法来灭亡中国。现在它在东北制造伪国,就是这一套老把戏。1934年,他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②]。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于同年11月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港期间,年老多病的蔡元培依然忧念国事,不忘收复河山。“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③] 1938年4月,会晤吴玉章时,蔡元培“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④]。1939年12月,蔡元培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身份,为该分会撰写了一首会歌,歌词爱国热情洋溢,充满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

---

① 《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②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③ 《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98页。

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①]1940 年 2 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1940 年 3 月 5 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哀悼蔡元培的逝世。毛泽东在唁电中称颂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在延安各界追悼大会上赠送的挽联中写道：“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全国人民对一代宗师蔡元培崇高、公正的历史评价。

---

① 《中央日报》(重庆)，1940 年 3 月 24 日。

第四十章　胡　　适

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有希强、自胜生、铁儿、冬心、适、藏晖室主人等。安徽绩溪人，1891 年（清光绪十七年）12 月 17 日出生于上海。他家是一个亦官亦商的地主家庭。其父胡传曾随吴大澂先后在东北边疆和广东海南供职，颇有志于研究边疆地理。母亲冯顺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是胡传的第三房妻子。1893 年，胡适随母亲到父亲在台湾的任所。1895 年回到家乡绩溪，入塾读书。胡适 6 岁丧父，由年轻的寡母抚育长大。1904 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期间，他受到严复、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影响。中国公学是由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划"而归国创办的，所以校内革命空气甚浓。这时的胡适经常为颇带革命倾向的《竞业旬报》写稿。从 24 期（1908 年 8 月）起，他接任主编。从此，他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文章更多，有时，一期杂志差不多全是他一个人的手笔。他常用的笔名有自胜生、希强、适之、铁儿、适庵、冬心、骍、蝶等等。胡适在他所写的"社说"、"时评"、"时闻"、"杂俎"等文章里，经常激烈攻击旧礼俗和批评政府官吏。此外他也时常发表一些杂记、小品、诗词等文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连载自己创作的小说

《真如岛》。

1910年夏，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留美。8月离上海，9月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多以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胡适特别注意观风问俗，有意识地参与当地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使他对美国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经常被当地各种社会团体请去作讲演，通过这些讲演，既训练了他自己的英语能力，增加了阅历，同时也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这种经历，对他日后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重大课题极有帮助。

胡适从他的导师杜威那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在学术方面，他把实验主义的精义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考证学相结合，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这套方法，不但支配了他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也对一代中国青年学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也对胡适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也是为他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则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每谈起文学革命的历史，胡适都要提到当时在留美学生监督处工作的钟文鳌。此人每月给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分寄官费时，都顺便附上宣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传单。胡适很不赞成他这种轻率无据的态度，但却因此引起他对中国文字语言问题的关切。胡适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分离的痛苦。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古文

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见解。从此,他和几个最接近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字与文学问题。在讨论中,梅光迪最守旧,他绝对不承认“古文是半死的文字”。为了反驳梅氏,胡适乃广泛搜集资料,披阅中外文献著述,来检验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由此,双方辩论日多,梅氏愈辩愈保守,胡适则愈辩愈坚决,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来,并试验用白话作诗、作文。

1916 年秋冬,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请,胡适把他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用很谦虚的口气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1917 年 1 月,刚刚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亦迁到北京编辑,并发表了胡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文中特别强调文学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断言,白话当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应当用白话写诗、作文,作一切文学的利器。

文章发表后,反响特别强烈,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 年 7 月,胡适回国,9 月即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与《新青年》一班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等结合在一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中心阵地,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开展了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有相当深度的,赢得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热烈响应的,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胡适成

了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他在许多方面发挥了有力的影响。

主要的有：

1. 继续推动文学革命运动。

围绕着胡适提出的八项主张，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集中的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反对白话文的主张亦时有发表。他们视为最有力的理由是说，以白话代替文言只是文学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应革其内容，而不在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作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1] 胡适认为，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文学内容变革的必备条件。胡适更注意到，要真正解决白话代替文言的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堂堂正正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提出创造新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篇极有分量的大文章，被郑振铎诩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适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写实主义，提倡写短篇小说，提倡戏剧改革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独辟蹊径，创作白话新诗。在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中，最受守旧派攻击的就是白话诗。胡适于1919年10月，发表《谈新诗》一篇长文，其中回答了争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新诗的音韵问题。从而为新诗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朱自清说，《谈新诗》一文"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

① 《尝试集》自序。

1920 年 3 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展评价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

2. 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能激励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胡适于 1918 年 6 月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发展个人的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特别强调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须争得社会自由。胡适主张,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1920 年 8 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中严厉抨击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专制;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自然是与虎谋皮,但终究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有力举动。

1919 年 11 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号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宣言。从此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重新确立各种规范。胡适就家

庭、伦理、女子解放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唤起广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对五四以后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 教育改革。

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学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国外教育的发展，加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拥有最多的发言权。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亲自创办了哲学研究所，给优秀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他首倡在各系成立教授会来管理教学，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提议实行选科制，有力地鼓励了青年向学的主动性。他还参与创办许多其他的研究所，倡办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比如指导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杂志等。这些，对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皆有重要意义。

此外，胡适鼓励和支持平民教育，特别是倡导发展女子教育，在当时都产生巨大的作用。胡适还特别致力于学制改革。由他主稿的 1922 年的新学制方案，被政府采用，推行全国，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对使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与世界教育发展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中小学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适同样做了许多工作。

4. 传播实验主义。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在中国传播实验主义最主要的哲学家。1919 年春，他发表《实验主义》一篇长文，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尤对杜威哲学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文章的

风格相当中国化而又通俗流畅，很得知识界的好感。不久，杜威来华讲学，胡适陪他到各地演讲，充当翻译，更扩大了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基础，总结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诀，虽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当时学界还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自己向上进取和奋斗的需要出发，来领受实验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即它的怀疑的勇气和力行实验的精神。

实验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总的说来对思想解放运动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点，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给予相当的肯定。

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许多老教师对他也刮目相看。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为此书写序指出，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底。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功底，又懂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他还指出此书的四大特点：(1)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统的研究。近年学术界已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中国几部著

名的古典小说的研究。

1920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篇长文。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1921年11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这对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积极影响。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成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一时都成了畅销书。又因为这些小说都是以较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写成的，因而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小说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②]。

---

①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集卷四，第162页。

② 《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

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学者需做考证的工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①。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时大盛。

胡适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他曾断断续续地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发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发现。1926年,他为中英庚款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发现禅宗大和尚神会的语录两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不过600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陆续整理他的发现,于1930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附了一篇2.6万多字的《神会传》。此书的出版,很受日本学界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味,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亲自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先进的中国人皆视为当

①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复古派或国粹派则另有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刚刚欧游回国的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其中有"科学破产"的话。于是颇有一些人也跟着怀疑科学，怀疑民主，怀疑个性解放的道理，以为重振中国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义思潮遂亦大为抬头。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发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及西方文化怀疑和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发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发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适又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承认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发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设施，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提高。从十八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不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产物不过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

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三十年代再度爆发。1935年1月，

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意即中国文化已被毁弃了,必须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评论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大。人们大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心,这个本位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应该让现代的新文化和我们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触,借它的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新旧结合所产生的结晶品当然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毫无可疑的。

胡适在 1929 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里,不慎用了一个可被理解为“全盘西化”的英文单词:Wholesale Westernization,遂长期被认为他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用这个单词只是用以反对各种折衷的、主观预设各种限制的中西文化观,强调不同文化自由接触、互相沟通、互相琢磨,从中产生出新的文化。这是他有关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见解,但有时为一些盲目夸大的国粹主义言论所激,他也讲过一些颇为偏激的话,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类,颇引起人们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发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一些人的围攻。

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领袖一样,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不能忘情于政治。1917 年刚回国的时候,他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

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但五四运动把政治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也不得不谈政治了。1919 年 7 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他的实验主义出发，主张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1921 年 6 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 5 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发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1923 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 10 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

① 《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1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1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专制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1929年接连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发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1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发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1932年5月,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独立评论》。他本人发表120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时局与外交的。他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共产党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曾在《独立评论》上倡导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在对日问题

上,则坚持通过国际交涉予以解决。

抗战爆发后,胡适转而拥护抗战,并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1938年10月,进而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纽约租屋暂住,重回到他的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1946年夏,胡适自美归国。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烽烟四起,教师学生都极不安定。他一面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不堪,一度要求辞职而不果。只有继续考证《水经注》案,聊为寄托。这期间,蒋介石两度敦促胡适从政,均被婉拒。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乘蒋介石所派专机,匆匆飞离北平,不久去了美国。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抵旧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即宣告结束。这一个大变局对胡适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他精神陷入极度苦闷,无心做学问,亦无颜见客,重新住进他原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过了将近10年的寓公生活。其间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学者,

如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认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窃了赵一清治《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公案。胡适最初治此案只是为其同乡前辈(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休宁与绩溪皆属徽州)洗冤白谤。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学者们弄得相当复杂。胡适以近20年的心力对此公案作考证，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成绩。这主要是：(1)发掘大量史料，证明戴震不曾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证据可以视为"铁证"。从而多少廓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偏见。(2)胡适第一个揭示出，攻击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这一公案，反映着清后期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3)胡适以其地位和声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因而得见其他人不曾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加以认真比勘、考证，弄清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因而对版本和目录学是一大贡献。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由他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1960年始被迫停刊。其间，胡适一度担任该刊的发行人。该刊的实际负责人是雷震。雷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胡适本人也屡次受到蒋家父子御用势力的攻击。但权衡政治得失，蒋介石还是决定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1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1960年，雷震因酝酿组织反对党而被当局投入监狱。此后，胡适再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且屡次复发心脏病。196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终年71岁。

胡适一生著述甚丰，约略估计在2000万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则只有他生前自编的《胡适文存》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一辑。他死后，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胡适作品集》37卷 。此外，有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手稿》30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

第四十一章　梁　漱　溟

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1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但自1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的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焕鼐，下有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1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他不仅支持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首次招生，梁济又立即将梁漱

溟送到那儿学习。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学制的混乱，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 ”学习，中间还有两年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1906 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呆的时间较长，直到 1911 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①

在梁漱溟进顺天中学堂学习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虽支持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然而，当历史进入 1911 年后，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梁漱溟放弃了原来君主立宪的立场，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队伍一边，成为京津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任外勤记者。《民国报》是革命党人的一份报纸，原创办于天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不久，迁往北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

① 《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16 页。

报》又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

由于职业的关系,梁漱溟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① 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引起的痛苦,1913 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1916 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此文分为"究元"和"决疑"两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②。就内容来看,《究元决疑论》实际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精神空虚而感到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说"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尽管在理论上,《究元决疑论》并没有什么重大创见,但它那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1916 年底,蔡元培应当时教育总长范

①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37 页。

② 《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3 页。

源廉之邀，从欧洲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途经上海时看到了《东方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读后颇感兴趣。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廉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尽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但直到1917年10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课。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长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问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铎旨等课程，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唯识述义》(1920年由北大出版)两书。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梁漱溟于1918年10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有志于研究东方学的人。但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因而"应者寥寥"。梁漱溟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意思"略微讲了一个梗概"。"孔子哲学研究会"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年11月底，因父亲梁济自杀的影响，便搁置下来。但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1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

济南作了40天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是年秋，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①。

此书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

①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1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很长的时间，1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

1927年5、6月间，梁漱溟应他的老朋友李济深的一再邀请去了广东，其目的是实验他的“乡治”计划。所谓“乡治”，按梁本人的解释，“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1]。据梁说，这是他经过几年的烦闷思索而得来的“最后觉悟”。开始，梁漱溟打算在广州招收一批学生，仿“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济深为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之便，拟了一份《请示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报请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审批。由于国民党中央各机构相互推诿，开办乡治讲习所之事不了了之。

1929年2月，梁漱溟离粤北上，一路参观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办的乡村改革实验区，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后来他把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和感想，写成《北游所见纪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来梁这次北上参观考察的目的是为回到广东办“乡治”积

---

① 《梁漱溟问答录》，第50页。

累经验,但他离开了广州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3月,因蒋桂矛盾激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因此,梁没有再回广东。时值他的老朋友王鸿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1929年1月,王鸿一得到阎锡山的资助,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1930年1月,王鸿一、彭禹廷等在冯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1930年10月,韩复榘由河南调往山东,河南村治学院停办。

河南村治学院关闭后,韩复榘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到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运动。1931年1月,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据梁解释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①。

1931年6月,梁漱溟等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从事乡建运动的机关。院长是梁耀祖,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不久,梁耀祖离去,由梁漱溟继任院长。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服务指导处、社会调查部等机构和实验县。该院从创办到1937年山东沦陷而关闭,6年间,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研究部共办了两期,培养学生58人;训练部共办了3期,培养学生1040人;其他短期训练班4期,培养学生1300人;共计2400人。实验县开始只邹平一处,1933年又辟菏泽为实验县,最后实验工作扩展至许多县。在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实行教育机关与政权机关合一,以此改造乡村组织。此外,

① 梁漱溟:《回忆乡村建设》,见《忆往谈旧录》,第121页。

在培养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举办各类合作社等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 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理论》(1937 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和《答乡村建设批判》(1941 年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等著作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发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运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在复兴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这时他却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阐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

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末,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1935 年 4 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此论文集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就是对这些批判意见的总答复。

1937 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发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他本人则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成立时,梁又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1938 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谈。1939 年初,又赴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视察抗战情况。

1939 年 10 月,为了形成界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更有力地调停国共两党争端,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发起成

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11 月 29 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机及该会的性质。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仅大肆反共，而且对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为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力争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1940 年 12 月下旬，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以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并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 年 3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及同盟简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梁漱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后受同盟委托，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同年 9 月 18 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 月 16 日，《光明报》发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论，宣布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开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注意，中共对之热情支持。《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该同盟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奋斗，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并祝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

1941 年 12 月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梁漱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撤回到国内。自 1942 年起，他在广西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面从事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活动。1944 年 9 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

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10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会议的9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他与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一道,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1946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书长,积极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为国内和平奔走尽力。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谈话,愤怒地指出:"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8月6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自重庆飞抵昆明,调查李、闻被刺真相,26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当局对李、闻惨案调查的百般阻挠。

是年11月,因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民盟失去了调停者的作用,梁漱溟于是辞去民盟秘书长一职,到重庆北涪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1949年6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完稿,同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

《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共23万字,分为14章。就其主要内容及最后结论来看,正如梁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它与此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书"在思想上"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

根本见地大致未变"，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比较，《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重在对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及其意义的探讨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则重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其特点是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2月，梁携眷离开北涪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思想批判。1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达27年之久。十年动乱中，梁漱溟和许多民主爱国人士、老一辈学者一样遭到迫害，他被抄家、游斗，夫人被殴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漱溟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和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先后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文章和著作大都未能在当时发表或出版），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两书。

梁漱溟立意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已久。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两年，梁就开始认识到该书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要改正这一错误，关键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1926年5月、1927年2月和1934年前后，他曾以《人心与人生》为题作过

三次讲演,1926 年 5 月还写有一篇《人心与人生自序》。时隔 20 多年,到 1960 年,梁正式动笔写作,至 1966 年夏,写出了前七章。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和参考用书在动乱中尽失,写作只好停止。从 1970 年起,又重理旧绪,写作不辍,1975 年 7 月终于完成了全部写作。又越 9 年,即 1984 年,此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问世。这部书共分 21 章,约 18.3 万字,主要讲的是"以理性为体,本能理智为用"的文化心理学。梁漱溟的这种文化心理学,在三十年代已见雏形,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但系统阐发,则是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中。

《东方学术概观》是由《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和《东方学术概观》三篇文章组成的一本论文集(1986 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儒佛异同论》写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没有一本参考书情况下写成的。顾名思义,该文谈的主要是儒、佛两家的异同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于 1974 年。当时正在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否定孔子,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梁漱溟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著文表示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其功过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总的来看,是功大于过,就是过,有的也是后儒之失,而孔子不任其咎。《东方学术概观》初稿写于五六十年代,1975 年写完《人心与人生》的全书后,对初稿作了"重新写作"。梁认为,东方学术包括儒、释、道三家。三家均重在修证,重在人生实践,并非仅是一种哲学;哲学只是其实践中所得之副产物。儒家肯定人生,佛家否定人生,道家肯定人生,却又主张出家修炼,三家人生态度各不相同,但出发点均为"人",具有以下共

同特征:心力之用向内不向外;学者自愿真切,有不容已;为学要在亲证离言。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左"的影响的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复了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1980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的一些著作如《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梁漱溟教育文录》、《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朝话》等文集也先后出版或再版。八十年代中,他不顾自己90余岁的高龄,又重返大学讲坛,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多次给学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当然,由于年事太高,除了整理、修改一些旧著外,这一时期梁漱溟没有什么新的论著问世。

1988年6月23日,这位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走完了他漫长曲折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梁漱溟逝世后,他的遗文被编为《梁漱溟全集》(共8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十二章 郭 沫 若

郭沫若，1892 年 11 月 16 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乐山观峨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学名开贞。“沫若”是他 1919 年 9 月 11 日首次在《学灯》上发表新诗时所用的笔名，取他故乡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两河合龙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宁化，于 1781 年定居沙湾。至其父郭潮沛时，他家发展为一个兼营商业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视子女的教育，对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开文（1877—1936），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较早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对郭沫若有较深的影响。

1897 到 1905 年，郭沫若在私塾读书。1905 年考入嘉定高等小学堂，1907 年升入嘉定中学堂，一直到 1909 年。这期间，他开始向文学方面发展。课余时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意大利建国三杰》，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外国作品。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发展及思想倾向都有重大影响。

郭沫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反抗的个性。1909 年 10 月嘉定中学有学生和营防军发生冲突，学生被打成重伤，郭沫若以学生代表身份要求学校出面交涉，被校方开除。次年 2 月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就读，又因为代表班级参加全市罢课斗争，

于 1911 年 1 月被学校开除，由于他大哥郭开文是该校教员，才得以继续在该校就读。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诞生，唤醒了郭沫若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但他不能忍受辛亥革命后的黑暗现实，渴望到外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促成他离乡远行的，还有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成婚的不幸婚姻。1913 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

1914 至 1923 年，郭沫若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 10 年是郭沫若学生时代最勤勉的一段。除学习日、德、英几门外语外，医学功课非常繁重，但他很刻苦，获得了医学士学位。后来他之所以放弃行医，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因为得过伤寒，留有后遗症，两耳重听的缘故。

留学日本对郭沫若一生的发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于 1915 年 5 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为此，郭沫若与几个同学回国抗争，虽未成功，却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1919 年 5 月中旬，郭沫若与夏禹鼎、徐诵明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夏社"，翻译日本人仇华消息，或自己动手写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报馆投寄。接着，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一起于 1921 年 6 月下旬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不仅推动了创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前期创造社先后办了 3 个刊物，即《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季刊虽然由上述三人轮流编辑，但郭负责最多。《创造周报》则主要是郭负责。

1919 年下半年至 1920 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自认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1921 年 8 月出版的

《女神》,除《序诗》外,共 56 首。这些诗歌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军阀统治的要求。1923 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诗集,共收诗 34 首。《星空》的格调比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闷。他自认为《星空》是五四退潮后的一些"微波",在这里"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①]。诗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诗作 23 首,大部分写于 1923 年。这时我国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在这里诗人不再只是迷恋自然、颂扬自然,而是敢于正视人生,正视人世间的苦乐,有些诗甚至就是工农革命的战歌。此外,他的诗集还有《瓶》、《恢复》等。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诗剧,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和自传体小说,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卓文君》、《王昭君》两剧,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歌颂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别是从五四到 1923 年这几年,可以说是郭文学活动的全盛时期。他的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 1924 到 1926 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渐减少了文学活动,主要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使他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郭沫若对社会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

① 《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 13 卷,1961 年版,第 121 页。

这部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过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途径。尽管它在论点上有个别错误，但总体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使他在理性上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①

1924年，郭沫若携妻儿由日本回国。对郭沫若的思想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工人顾正红往工部局示威请愿，惨遭外国巡捕屠杀的情景。工人阶级浴血奋战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洪流。他参与组织"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并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实践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历史剧《聂嫈》就是在五卅高潮中写成并上演的。

五卅运动后，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郭沫若的这个转变，也是前期创造社能够转向中期创造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成仿吾南下，郁达夫北上，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为中期创造社的实际指导

① 《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者。他以《洪水》为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积极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共、反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1926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聘请郭沫若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在进步师生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整顿了文科学院，将腐败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还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学生毕业典礼上，他发表讲话，勉励毕业生“在社会里头，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①]。5月间，他应毛泽东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此时，他应邀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的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

1926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笔从戎，与阳翰生、李一氓一起从广州出发随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这期间，他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升为中将。11月上旬北伐军占领九江、南昌后，他接到邓演达电令，立即组织精干人员赶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1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北伐军占领，孙传芳的势力迅速崩溃。这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赣州惨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庆惨案。当时，郭沫若先在南昌后又到安庆主持政治工作，蒋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00元大洋津贴，但是，郭沫若目睹一系

---

① 李江:《鲁迅与毕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217页。

列惨案的发生，洞察了蒋介石叛变的部分内幕，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严重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密电武汉中央，揭发蒋介石的叛变行径，并秘密离开蒋介石到达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即3月31日，他便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他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月14日，他到达上海，向周恩来报告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的经过。随后，郭离开上海去武汉，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不久，又赴河南参加北伐战争。

7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进行"分共"活动，郭即去九江。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他虽没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由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后的第二天，随军撤离南昌。部队转战到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在汕头失败，郭沫若等4人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于1927年10月经香港到上海。后于1928年2月24日离开上海去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到达日本后，几经搬迁，最后定居在市川市须和田。在这里，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业。

这段时期，郭沫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他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1]。于是他着手翻译马克

[1] 《海涛集·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1958年版,第311页。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28年7月，他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3月汇集出版。这部著作用大量史实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发展的过程，论证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说明中国社会发展史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普遍规律相一致。这部著作被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国内朋友的帮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资料缺乏和经济窘迫的困难，写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创见的史学论著：《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殷契粹编》等。这些论著的发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史学界的同志，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1]

在日本10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自传体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等。他的历史小说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原则，着力刻画各种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并通过他们来批评或赞扬今人，不仅起到了为现实服务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左翼文坛的力量。这期间他还有大量翻译作品问世，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

[1] 白寿彝：《深切怀念开辟新历史的伟大旗手》，《光明日报》1978年6月29日。

《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生命之科学》等等。

应该说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后，由于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他的每月100元生活费资助就断绝了。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断，他的妻子安娜俭约持家，同时，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别的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以便挣一些稿费维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记祖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应该说，他研究古代历史正是为了改变祖国的现实。他时刻以"我是中国人"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的"。[①] 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配着他在逆境中长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献中，在难识费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50多位发起人之一。为了支持"左联"，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著的版税，作为"左联"的基金。他还支持"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几个刊物，经常为它们撰稿。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和安排，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1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随后在南京召见他，这使他在上海的活动减少了一些

① 《海涛集·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页。

麻烦。

在上海期间,郭沫若主要从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的声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并以救亡协会为中心,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组织了 3 个战地服务队和 12 个救亡演剧队,从事抗战的宣传和服务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驰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慰劳士兵、访问将帅,把人民的敌忾带到前线,把前线的勇敢传到后方。郭沫若还是《救亡日报》社的社长。这个报纸在初期上海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8 年 1 月,郭沫若与于立群正式结婚。2 月,他在武汉接受了曾被他拒绝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由于郭出面邀请,三厅集结了当时优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进步文化人,被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经过紧张的筹备,4 月 1 日第三厅正式办公。尽管受到国民党种种禁令的限制,三厅还是开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众性活动和工作,如举行震动武汉三镇的大规模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会。它采用了歌咏、戏剧、漫画等多种手段宣传抗日,推动了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群众纷纷为抗战出力、献金。又如组编了 9 个抗敌演剧队,4 个抗战宣传队和 1 个孩子剧团,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1939 年以后,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下,迁至重庆的三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国民党对三厅施加种种限制,由改组、缩编,至 1940 年 9 月终于下达了撤销令。11 月,国民党在政治部之下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国民党对文委会的管制

甚多，但在郭沫若领导下，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仍开展了不少抗日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有一次，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演讲，说文委会是“租界”，成员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国民党员，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国民党。对此，郭沫若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他自己也曾做过国民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问题。并且打了一个比方，说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于“租界”云云，那就请部长“收回”吧。文委会冲破限制，竭力开展一些进步文化活动，如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大型音乐会、美术展览和木刻展览等，出版了多种报纸副刊。

郭沫若从来没有停止文学创作，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1941 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实际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和研究，尤其是历史剧创作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来。在历史剧方面，从 1941 年 12 月到 1943 年 4 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内，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剧作。史学理论方面，这时期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5 年 1 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国统区的文化界 2 月 22 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 372 人联合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提出建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对签名

者进行分化、威胁和组织反签名运动,而且还于 3 月 20 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努力宣传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站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斗争的前列,为争取民主和解放而斗争。

1946 年 1 月 10 日,郭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毁会场,殴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伤。事后,他充满愤慨地讥刺王世杰、陈立夫说: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种心怀内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

1946 年 5 月 8 日,郭沫若到上海。当时上海报刊仅《文汇报》一家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当《文汇报》实行改革时,郭帮助他们设计出 7 个周刊,并亲自参加其中《新思潮》与《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受欢迎的报刊。1947 年 2 月,百货职工召开抵制美货、用国货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职工。当天下午,郭和沈钧儒代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到警察局抗议,将被捕的受伤者保出就医。1947 年 7 月 11 和 15 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发表文章以示哀悼,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10 月 4 日,上海各界人士为李、闻召开追悼会,郭发表讲话,并在《祭李闻》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逆暴戾的种种罪行。由于在民主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进步文化人经常汇集的地方。一些重

要的集会，如进步文化人为朱德60寿辰举行庆祝会、揭露美蒋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招待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947年下半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领导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政论和杂文，向国内和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共的主张，鼓励他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1948年11月，他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区。1949年6月，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7月，由他发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0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

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支持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1951 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发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1952 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4 年,他发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 5 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1963 年 10 月 4 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1954 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 14 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 1300 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

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发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 1977 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 900 多首，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9 年和 1960 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1963 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 300 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1971 年 10 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1976 年 1 月 8 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

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病参加了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还抱病出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1978年6月1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6岁。

第四十三章　邹　韬　奋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沙塘村。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①

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

---

① 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原载1949年《世界知识》第20卷第6期，见《韬奋的道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3页。

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

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①]。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

---

① 邹韬奋:《工程师的梦想》(1936年11月1日),见《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2]。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0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3],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

---

① 《我们的立场》(1930年12月13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256页。

② 邹嘉骊:《韬奋的新闻道路》,见《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③ 《〈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1928年11月18日),《韬奋全集》第5卷,第446页。

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①。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

---

① 《〈不爱江山爱美人〉编者按》(1931年11月14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648页。

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此外，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①。这样，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正当邹韬奋远在异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忧思竭虑，寻求出

---

① 邹韬奋：《萍踪寄语》弁言，生活书店1936年6月版。见《韬奋全集》第6卷，第8—11页。

路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逐步深入华北腹地。1935 年 5 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 年 8 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国已是满目疮痍,不禁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尽献绵薄之力。从此,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 11 月 16 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①]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②]《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 20 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2 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

① 《我们的灯塔》(《〈大众生活〉创刊词》)(1935 年 11 月 16 日),《韬奋全集》第 6 卷,第 495 页。

② 《学生救亡运动》(1935 年 12 月 21 日),《韬奋全集》第 6 卷,第 510—511 页。

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又使出种种计谋，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诬陷、诽谤邹韬奋；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邹韬奋义正辞严，予以了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①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邹韬奋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等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②。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生活日报》发行后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

① 邹韬奋遗著：《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韬奋出版社1946年5月版，见《韬奋全集》第10卷，第837页。

② 《〈生活日报〉创刊词》（1936年6月7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672页。

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1936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①。"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

---

①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31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708、713页。

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 年 7 月 31 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 7 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① 8 月 19 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 7 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 30 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 1939 年 4 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 1941 年 2 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 50 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41 年 2 月 23 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

---

① 邹韬奋著：《经历》五一《前途》，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8 年版，见《韬奋全集》第 7 卷，第 259 页。

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①。

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②，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③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④。邹

① 《抗战以来》七五《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韬奋全集》第10卷，第372页。

② 《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1941年5月31日)，《韬奋全集》第10卷，第385页。

③ 《〈大众生活〉复刊词》(1941年5月17日)，《韬奋全集》第10卷，第47、48页。

④ 《抗战以来》序，《韬奋全集》第10卷，第171页。

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①。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② 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③ 邹韬奋一生

① 范长江：《韬奋的思想的发展》（1955年8月1日），《韬奋全集》第14卷，第663—664页。

② 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③ 《对国事的呼吁》（1944年10月8日），《韬奋全集》第10卷，第816—817页。

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① 表达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诚挚愿望。1944 年 7 月 24 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 50 岁。

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隆重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10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 9 月 28 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伟大事业，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评价。电文写道："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② 中共领导人也亲题挽词，表示深切哀悼。毛泽东的

① 《邹韬奋遗嘱》(1944 年 9 月 2 日)，见《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② 《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先生家属》，1944 年 9 月 28 日，见《韬奋全集》第 1 卷卷首。

题词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联中热切地称他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①。

邹韬奋,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已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②。

① 毛泽东、朱德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② 宋庆龄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第四十四章　陶　行　知

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后又改名行知，还曾用不除庭草斋夫等笔名。1891 年 10 月 18 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郊十里地的黄潭源村，祖籍浙江绍兴会稽县陶家湾。父任潮，曾经营酱园，有田四亩，酱园停闭后以务农为生，入不敷出，则由母亲给人缝洗辅以度日。

陶行知 5 岁时，常随父识字，本村塾师方秀才见他资质优异，免费收为蒙童。15 岁那年，母亲在省城歙州耶稣教堂帮佣，他经常挑菜进城，顺便探母，或者助母干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学堂校长英人唐俊贤，喜爱他聪敏勤快，于 1906 年让他免费进学堂就读，1908 年因学习优异提前一年毕业。毕业后，他满怀“医药救人”的心愿，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方知非教徒须自费见习，他愤然退学，离杭去苏州。1910 年秋，还是受唐俊贤的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学习。在这里，他边学习边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影响下，他利用《金陵光》宣传革命思想，拥护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常用笔名陶知行发表文章（1917 年正式以陶知行为名）。1913 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他宣

读论文《共和之精义》,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 ,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① 这些话表明了他对教育立国的坚定信念。

1914 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学师友多方面的资助,学校保送他去美国留学。他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和孙科同学,1915 年夏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为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和胡适同学,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1917 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证书后回国,同年 9 月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等职,除主讲各门教育学科外,经常去市郊作教育调查。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启示,他才逐渐离开大学,从事平民教育。

1917 年冬,陶行知回国执教的时候,国内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旧制度、旧文化,传播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1918 年夏,他发表了《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应发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②;造就生利人物,则“国无游民,民无废才”③。这种将职业、教育和生活、国家利益相联系的设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现,也是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与此同时,他一面继续进行校内的教育改革,将教学分离的“教授法”改为“教学合

①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 1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 页。

② 《陶行知全集》第 1 卷,第 80 页。

③ 《陶行知全集》第 1 卷,第 86 页。

一"的"教学法"①;一面又陪同应邀来华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讲学(以后又陪着孟禄做调查研究),借以宣传新教育。

1921年,教育界的三个团体(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编。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等16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好政府"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②

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宣言中说,共和国的国基是否稳固,全看国民是否受过相当教育,"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之外,决无第二个好的办法"③。一次,他给友人信中说到:"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得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④

陶行知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安庆、南昌等地组织平民读书处,为收容五四运动中被迫离校的学生成立"安徽公学",提倡公学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⑤。他指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中国以农立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② 《陶行知年谱稿》,第9页。
③ 《陶行知年谱稿》,第11页。
④ 《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1页。
⑤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国,100 个人中有 85 个住在乡村,平民教育必须普遍的办。他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贫富贵贱“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另一方面要打通行业地区的“纵阶级”,“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①。在以后的数年里,陶行知从这种救国救民的平民教育发展中,充实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内容。但是,他以办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社会”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

1926 年秋在考察南京燕子矶北固乡小学和江宁县师范等学校时,他发现这些乡村学校不仅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劳动、做饭,由此得到启示,他提出,乡村学校的教员、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办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为此,他发表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和《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指出江宁师范“可以为中国师范教育开一个新纪元”②。1926 年冬,他会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拟订了乡村教育计划,发表了宣言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926 年 12 月,陶行知和赵叔愚公布了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的乡村师范第一院简章,暂定学制 1 年,招收初、高中或大学第三年肄业学生有农业经验者,修学期满,成绩合格,服务半年后,可以任初小、高小或师范学校教师;有特殊才能者可任各级学校校长和乡村教育辅导员。入学考试科目除作文、常识、智力测验外,必须在“农场操作一日”。1927 年 3 月 15 日,晓庄师范学校

① 《陶行知全集》第 5 卷、第 55 页。

② 《中国教育改造》、第 51 页。

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16人。

晓庄师范是一所集资的私立学校，上设乡村师范董事会，蔡元培和王云五分别任正副董事长，陶行知任秘书长兼校长，赵叔愚任小学师范院院长兼研究部长。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进驻南京，晓庄师生列队欢迎，慰劳和协助部队救护伤员，参加农民协会。同年3月底，他去上海和北方筹措经费，奔走了一个多月。4月初，他在上海给晓庄师生写信说："本校既已参加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信中他还说到"上海杀机四伏"，倘若他被炸死，"这封信就算作我的遗嘱"①。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5月15日他又写信鼓励晓庄师生，"我和诸位同是在乡村里摸路的人"，"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②。晓庄师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艰苦创业的。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渐次形成的。其代表作有:《从野人生活出发》、《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如何教农民出头》、《平等与自由》、《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等重要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两方面各翻了半个筋斗:一是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倒翻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半个筋斗使他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有用即真理"一致起来。这半个筋斗还促使他把陶知行的名字改为陶行知(1934年正式改名)。另半个筋斗

①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东亚图书馆1933年版，第197—198页。

② 《知行书信》，第199—200页。

是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的理论，倒翻过来成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说，8 年来我推行杜威的思想后，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教学做合一"是碰壁后才找到的新路。他说：实际上"是生活便是教育"，"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坏生活便是坏教育"。所以我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按"教学做合一"的原理实施教育学。[①]

陶行知推崇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提出农民要在农业上"安根"，必须依靠教师教农民实行把民权操在手中，"在立脚点上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②]。他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

自晓庄师范开办后，各省市在它的影响下，风起云涌，竞相创设乡村师范，浙江湘湖师范的建立和发展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长，晴天霹雳，1930 年 4 月 12 日，国民党政府派兵占领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晓庄师范被封闭时，师生 30 余人被捕，14 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牺牲。这一惨痛教训使陶行知意识到："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③]

1931 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四川北路，秘密为

① 《陶行知全集》第 2 卷、第 187 页。

② 《中国教育改造》，第 99 页。

③ 《陶行知年谱稿》，第 184—185 页。

《申报》工作。他曾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说起,日本工业发展和科学发达有关①。史量才表示愿意捐助10万元,供他作普及科学研究基金。于是陶行知开始筹办"自然科学园"和"科学下嫁运动"的普及教育工作。当时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无法公开活动,只得召集原晓庄师生中的董纯才、戴白韬和方与严等人出面创办"自然科学园",用陈鹤琴的名义主编"儿童科学丛书"108册,由儿童书局出版。他亲自编写《儿童科学指导》11册,提倡"玩科学把戏"和手脑并用的科学普及教育。当时他发表的《手脑相长歌》,不胫而走,十分流行。歌词是:"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②

这一时期内,陶行知还在《申报》的《自由谈》专栏上以"不除庭草斋夫"等名连续发表政论性文章,抨击"不抵抗主义",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提出"不贪钱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手脑并用的散思先生(指科学)"是救国的"三个牛皮匠"③。他还认为:"我们应当从屠夫的手里把科学夺过来","拿科学来抑强扶弱"。他说:"科学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④

1933年,陶行知在上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招收工读生,先后组成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和他亲自组建的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家庭亭子间工学团和读书班等。到1934年1月,仅山海工学团就已发展到17处,共316人参加,

① 《陶行知年谱稿》,第45—46页。
② 《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73页。
③ 《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页。
④ 《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这些活动推动抗日反蒋运动，发展革命势力。如晨更工学团就是教联、沪西团区委、剧联、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

不久，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原则，推行读书识字。这是他创造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法。这一方法经过宣传介绍，后来推行到全国 23 个省市的一些地方。陶行知出国访问时，还把小先生制传入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

1935 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高潮。12 月 12 日，陶行知和沈钧儒、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等 280 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要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等 8 项救国的主张。随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 年 1 月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 5 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1936 年 3 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1934 年创刊）第 3 卷，第 1、2 期上先后发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1)当

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国难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为单一的教育。(2)国难教育在于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不是救国的教育。(3)国难教育要求一切活动以国难为中心,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了伟大的学校。(4)领导和群众要上下沟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把将亡之国救回来,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①。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总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国难教育合为一体,表明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国难教育的任务的一致。

1936 年 7 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 28 国和地区。他在国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发动募捐救国,历时 4 年多。1938 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气愤的是在他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给他发出国护照。1936 年 4 月他离沪去华南宣传国难教育,5 月从广东

① 《陶行知全集》第 3 卷,第 19—21 页。

去香港设法解决，6月到达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时间里，他参与撰写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一篇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内争，建立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签名发表了这个文件。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写了致章、陶、沈、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指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①

1936年7月10日，陶行知离香港出访。11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陶行知正在美国，也遭通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在全国上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压力下，"七君子"被释放，陶也免遭通缉。当时他在国外发表的演说中，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同年10月在给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败的三点理由：(1)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国对日的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他说："我将尽最大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②

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1日，香港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他和邓颖超的聚餐会。此后他在香港四处宣传、募捐、动员港人和在港华侨抗日达3个多月。离港前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三大心愿：(1)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2)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② 《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1页。

办难童学校,收容和培养流散于各地的难童;(3)办香港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各界港胞与在港华侨抗日。10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参加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他在国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1)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①]。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发展。同年1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0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发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

①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1)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发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①]。7 月 25 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1939 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发动反共磨擦。1940 年 4 月 2 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发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②]。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

① 《陶行知全集》第 3 卷，第 378—379 页。

② 《陶行知全集》第 3 卷，第 421 页。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发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发展的。到 1944 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 300 人。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5 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0 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1945 年 11 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 12 月,陶行知发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发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发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1]

1946 年 1 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 28 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

---

① 《陶行知全集》第 3 卷,第 571 页。

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①。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190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1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②

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发表演讲100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发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1所，分校7处。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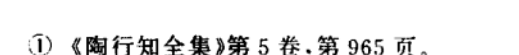
①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6页。

② 《陶行知年谱稿》，第134页。

陶行知于7月15日得到上述消息，16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①]谁知道，这封循循善诱的信件，竟成了他为教育事业，为和平民主奋斗终生的遗书。

1946年7月25日，由于长期劳累和一连串事件的烦扰，陶行知在上海爱棠新村的朋友家里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噩耗传开，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超赶往陶的住处作最后的告别。延安《解放日报》在极醒目的版面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一生的著作编为《陶行知全集》，1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① 《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页。

第四十五章　冯　友　兰

冯友兰，字芝生，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是新理学的创立者。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校读书。1915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主修中国哲学。1920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等人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州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离京赴云南，任西南联大教授、文学院院长。1946年8月赴美讲学，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3月回国，并坚持留在国内直至北平解放。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建国初期，其思想就开始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其本人则被批斗、抄家。“文革”后期曾撰写过批判孔子的文章、著作。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198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4年任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1985年任中华孔子研究所名誉所长。1990年11月因病去世。

冯友兰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一是他在四十年代创立的新理学。该哲学体系“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利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对于中国哲学的近

代化是有益的"①。其代表作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二是他二三十年代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三是建国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重新论述,及对一些零散的哲学思想的阐释,代表作是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从学术价值上看,前两部分显然要大于后一部分,下面就作分别介绍。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建立在"理"、"气"、"道体"、"大全"这四个中心观念之上的,冯友兰自己说这四个基本概念是自己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新理学的真正任务是指出和解释上述四个概念及其代表的共相、殊相世界的关系。

所谓"理",即某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成为某物的原理。它和事物的关系,是"共相"和"殊相",也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无某"理"就没有某"事",但无某"事"不一定无某"理"。"理"可以不依存"事"而存在,而且"在时间上说,理先于具体事物而有;就重要性说,理比具体事物更根本"②。二者的关系,是"理在事上"、"理在事先"。冯友兰在晚年受了唯物论的影响,一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宣称有"事"就有"理",无"事"则无"理",二者的关系是"理在事中"。

在新理学中,"理"还指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和道德原则,具有伦理学的含义,这是对程朱之"理"的承继与发展。

新旧理学对"理"的阐释也有不同之处。程朱理学认为,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2月初版,第176页。

②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0页。

"理"是宇宙中具有造物能力的创造力量,它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也有变化、生灭。而新理学认为"理"是纯粹的逻辑概念,无造物能力,也不在时空中。它不生不灭,永恒不变。

"气"不仅是一切"理"所借以实现的总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具体世界的总的物质基础"①。"气"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相异。程朱理学认为,"气"有"清、浊之分",也可以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新理学认为前者可以离开后者而独立存在,这与程朱理学并无不同。

"道体"是指从"气"到"理"实现的过程。按照冯友兰的原话就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某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所有底流行,谓之道体"②。

"大全"就是宇宙,就是"理世界"和"器世界"的总和③,也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总名"。"大全"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因为思议中的"大全",已不包括思议本身;言说中的"大全",也不包括言说在内,两者都缩小了"大全"的外延。因此,"对于大全底思议,必是错误底思议。所以对于大全,一涉思议,即成错误"④。当然,"大全"的这种不可思议性,正是人思议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没有结果的结果。

冯友兰认为,不仅"大全","理"、"气"、"道体"都是形而上的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8页。

② 《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③ "理世界"就是"理"的总和,又名"真际"、"太极"。"器世界"就是具体事物的总和,又名"实际"。

④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634页。

东西，也都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这些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①]，但它们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处的天，即宇宙和大全)。这种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的作用，是一种大用。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本是空虚之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②]，“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③]。哲学的作用不是使人增加实际知识，增加驾驭实际的能力，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理”、“气”、“道体”、“大全”既然是形而上的东西，那么新理学确实是一种“‘不著实际’底形上学”[④]。它所讲的，实质上是“圣人之道”，而儒学认为圣人最适宜于做王，因此，新理学所讲的，是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底要素”[⑤]。从这一点上来看，冯友兰确实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作为一种较为完善的哲学体系，新理学还有其独特的道德观、历史观、人生境界说、唯物唯心说等等。

新理学的道德观。它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又有各种行为。人的某些行为可以维持社会的存在，这些行为就是道德的，反之则是不道德的。人的另外一些行为与社会的存在与否无关，那就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而且，社会不同，是因为其存在之“理”不同；“理”不同，“理”所规定的基本规律就不同，社会制度

---

① 《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159页。
② 《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165页。
③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6页。
④⑤ 《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147、160页。

也因之而相异。人的行为是否道德，不能以某一特定的规律，特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为标准，而应明确"合乎其所属于之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者，其行为是道德底，反乎此者是不道德底"①。这就等于说，与某一社会同时存在并维持该社会存在的道德就是合理的道德，尽管这个社会也许并非完善、健康进步。冯友兰就这样把道德、道德的是非固定化了，"一种社会中底人的行为，只可以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批评之。如其行为，照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道德底，则即永远是道德底"②。冯友兰因此而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封建性道德也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这就很难让人苟同了。但这种道德观不以一种标准来裁定是非，不以今断古，以偏盖全，以情代理，此则为其长处。

到了晚年，冯友兰的思想有了较大转变，主张道德分为"可变的道德"和"不变的道德"两种。前者随某种具体的社会而有，社会存则存、社会亡则亡；后者具有超社会性，不随某种具体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就根本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③。这种道德观就较为全面合理了。

新理学的历史观。冯友兰认为，历史是不可改变的，"已如此即永如此"；历史是有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物的现在与将来；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且是变化的，是在变化中的继续。他还认为，社会的变化，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历史、时势使然。

人生境界说，也是新理学的重要内容。那么，什么是人的境

①②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118、276页。

③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99页。

界?人的境界有哪几种呢?"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①。而人的境界,按照由低到高的秩序,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中的人,顺乎个人的习惯及自然界的法则行事,但对自身行为的意义并没有清楚的了解,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功利境界中的人,以"为我"、"求利"为目的。他们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认为社会是压迫个人的,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才生活在社会中的,因此,人的行为应以"求利"为目的。"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②。

道德境界的特征是,此境界中的人的行为,其目的是"行义"的,即为社会谋利益的。"尽伦尽职"是这些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求"成就一个是",却"并不计其行为所及底对象,是不是值得他如此"③。

天地境界中的人,对宇宙有很深的"觉解"④,强调自己的行为要"与天地参",要对社会、人生、宇宙有所贡献。这种境界中的人,是圣人,能够"物物而不物于物",还能消除"我"与"非我"、内与外的分别,在精神上自同于"大全",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天、地、人合一的境界。

自然、功利、道德、天地这四种境界的层次,是由低到高的。

---

①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49页。

②③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83、616页。

④ "觉解"指人对事物所具有的一种自觉的了解。"觉"指人做某事时,自觉其是在做某事;"解"指人做某事时,了解某事是怎么一回事。

前两种境界，人可以不必努力，自然达到。而后两种境界，则必须不断努力才能达到。

另外，此种境界中的人，也可能行彼种境界中的人所常做的事，但不会持久，动机也很复杂。比如功利境界中的人，也可能行道德之事，但动机往往是以此为求名求利的工具。道德境界中的人，也可能做争权夺利之事，但往往是为了高尚的目的。即使是天地境界中的人，也还是“日用不离常行内”的，也还是“虽不以利害为利害，而却亦为一般人兴利除害”的。[①]

最后，是境界、学问、功业的关系。冯友兰认为一个人境界的高低，与其学问、事功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新理学是冯友兰以追寻东西方文明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思想与心灵的共通性，弘扬超越特殊个体的共性，探求不受时空地域局限的普遍真理为指导思想，借鉴中外哲学优秀成果，承继宋儒，兼收庄子之学，及魏晋道学禅说，采用西方哲学思辨方法创造出来的中西融合的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其创立，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这一哲学体系自身具有很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冯友兰正是藉此成为一代大哲学家。

在新理学中，各组成部分是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的。四个基本概念是其基础；“共相”与“殊相”、“真际”与“实际”的辩证关系为其重要内容；对四个概念及其相关内容的论断是新理学的基本原理。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冯友兰推演出了新理学的道德观、历史观、人生境界说等，后者也从更广的角度扩展、深化了这

①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641页。

些原理。新理学的道德观以“理”为道德的终极标准;历史观强调历史在本质上是“道体”的一种表现,“道体”没有间断,历史也就不能停顿,总是在发展变化;人生境界说认为人通过自身修养,是可以在精神上与“大全”融为一体,从而消除“真际”与“实际”的界限。

新理学这几部分内容的紧密联系,最终使新理学成为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

二十年代,冯友兰开始以西学方法从事哲学研究工作。1930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篇,三年后该书下篇出版。这两册《中国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其在‘史’之方面,则似有一点可值提及”①。

冯友兰在书中,对比了标准的西洋哲学与中国学说的异同点,认为前者的内涵和外延都不足以包容后者。他由此认定“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②。

他之所以采用西洋标准,在于近代学问,起于西洋。使用西洋定义,便于同各种近代学问的沟通。

冯友兰在书中还谈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在冯友兰看来,哲学与历史是相互影响的。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而当时的哲学即为时代精神的结晶。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不明了各个时期的哲学成果,是达不到研究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史在中国通史中占

---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序言部分,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8页。

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冯友兰认为自孔子至淮南王刘安这一段，是中国哲学的"子学时代"。因为这一时期诸子学说竞起争鸣，具有"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特点。

在该册书中，冯友兰以孔学为"子学时代"的开端。因为他觉着"就其门人所纪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则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盖在孔子以前，无有系统的思想，可以称为哲学也"①。

他以淮南王刘安所在的西汉初年，为"子学时代"的终结期。并举出两个理由：一是刘安的宾客写了《淮南鸿烈》一书，冯友兰认为该书虽杂取各家之言，不定中心思想，但其中的宇宙论部分较为完整翔实，这是中国哲学有完整的宇宙论之始。二则这以后不久，汉武帝依董仲舒之言，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学说由此而衰，有些甚至湮没无闻。中国哲学自此转入"经学时代"，直至康有为才终结。

但在《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冯友兰却对上册中的一些说法作了改动。他转而认为"经学时代"至廖平终结了。冯友兰对这一问题认识的转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以至于有人仍引用冯原来的观点，以"经学时代"至康有为终结。

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冯友兰详细地讲了自己转变看法的原因：一则，廖平讲今文经学较康有为早，康有为曾受其影响。二则，在清代今文经学三个代表人物中（康有为、谭嗣同、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9页。

廖平)，廖平最后死。“廖平之学，实为经学最后之壁垒，就时间言，就其学之内容言，皆可以结经学时代之局者也。”[①] 冯友兰还对廖平之学作了阐述，认为该学的主要内容为经学六变。第一变为“今古”。主张今古文经学同出于孔子，只不过古文经学宗孔子初年之说，今文经学宗孔子晚年之说。今古二派，“如水火阴阳”，相妨而又相济。第二变为“尊今抑古”，认为今天人们所说的古文经学已非先秦之古文经学，乃是刘歆及后人所伪造。此说与康有为同。第三变讲“小大”之学，宣称今古经学之分，亦小大之分，即孔子治中国之制与治世界之制之分。孔子的经学，是全球的制度法律，在全世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乃得为全球之神圣，六艺乃得为宇宙之公言”[②]。第四变讲“天人”，认为将来世界进化，归于众生皆佛，而佛出于道，道出于孔。孔经所包，极为广博。经学第五变，把六经分为人学三经，天学三经。前者为《礼》、《春秋》、《尚书》；后者为《乐》、《诗》、《易》。其经学第六变，“未见刊本”，无法确知其详。

冯友兰认为廖平之说“若以历史或哲学视之，则可谓无价值之可言。但廖平之学，实为中国哲学史中经学时代之结束。自此方面观之，则廖平在哲学史中之地位，亦有相当重要”[③]。

“经学时代”之后，为中国哲学史中之新时代。此新时代，在冯友兰看来，已在“经学时代”未完全结束前开始。只因为新的哲学体系尚在创造之中，还未真正形成，这样“写的中国哲学史，亦只可暂以经学时代之结束终焉”[④]。

---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 1041 页。

② 廖平:《经学四变记》第 5 页。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 1037 页。

③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 1040、1041 页。

《中国哲学史》在“辨伪”的基础上，大量占有古籍材料，采用西方体例，并用发展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流派的来龙去脉、思想主张、学说体系，方法简明也较为科学。而且，冯“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①]，这样就较好地保持了古人思想的原貌。这部书出版不久就获得行家较高的评价，被誉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②]。

在写作《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冯友兰充分熟悉了中国哲学史料，对各家学说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于道学和宋明儒学体会尤深，在写作该书下册时，他已经尝试着用自己的新实在论哲学观点来论述解释宋明儒学了。这些，都为他四十年代创造出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学术生涯中取得的第二大成就。该书自 1937 年被 Derk Bodde 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发行后，立即风行海外，并被译成法、德、意大利、日、阿拉伯等多种文字，至今仍在被多国大学引用，并一版再版，仍被各国视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权威、经典之作。

建国以后，冯友兰在心态上把爱民族、爱国同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等同起来，较为主动地进行自我批判。他写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新理学原形》、《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答谢关锋同志》等文章，对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思想不断进行否定。“文革”初期，他还是惨遭批斗。“批林批孔”运动掀起后，冯友兰

① 金岳霖：《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部分。
②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部分。

为了避祸,就主动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后来又写了《论孔丘》一书,大批儒学。总之在哲学上再无新的建树。

他也较为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之为准则提出了一些对他自己而言较新的观点: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为它的基础服务。它也是为阶级社会中的一定阶级服务,是一定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的工具"①。

哲学史"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它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也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它也是为巩固它的经济基础而服务"②。哲学的发展是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除了提出上述哲学新观点外,冯友兰此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是修订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进展甚慢。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顾说:"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③ 没有决定的原因在于他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哲学家,即使在那段非常时期他仍保留了一些哲学上的独特创见,"抽象继承法"就是其中

①②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2—3 页。

③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 365 页。

之一。该理论主张对哲学遗产进行“抽象继承”，即不仅注意一个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还要注意它的抽象意义，“只有这样作，才可以看出哲学中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如果过重于在具体意义方面看，那么可继承的东西就很少了。必须两方面都加以适当的注意，适当的照顾。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古代哲学思想有全面的了解”[①]。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以后则遭到了陈伯达、关锋的批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再次提到“抽象继承法”时说：“其实严格地说，一个哲学命题不能有具体意义，它应该排斥具体意义。我原来所说的具体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或是人们对于它的不同了解，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所要排斥的。我原来的提法的这些不妥之处，也是引起当时辩论的一个原因。”[②] 另一方面，建国后冯友兰急于转变成一个新人，这使他匆匆忙忙地改变了很多过去的观点，说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话，其中有些他自己就没有完全信服。这样就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困难重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开始从政治向学术回归，修订、出版了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在其中对自己的一些哲学观点进行了再修正。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它的方法是理论思维。它的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③]。

哲学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而哲学的发展总要围绕一些真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92—93页。
②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87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这个定义就否定了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史之论。写哲学史，则“要抓时代思潮，要抓思潮的主题，要说明这个主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也有了新变化，共分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贯穿在各个时代之中。这是它们的共性，各时代都有它们的特殊的精神面貌，这是它们的特殊性。”这四个时期按其主要精神面貌的不同又可分为七段。按此七段，冯友兰把他的《中国哲学史》分为七册来写，按七个主题讲述中国哲学。①

以上，是我们对冯友兰哲学生涯的大致介绍。

寻找中西文化间人类思想的共通性，追寻不受时间、空间、国别民族限制的普遍真理，为中国这个“旧邦”谋“新命”，是冯友兰给自己确定的哲学使命。这一使命的具体内容是：一方面谋求解释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使传统文化能在日趋现代化的中国获得新的生命，人文精神得以重建。冯友兰经常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来明志，说明自己的志向在于使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重获新生。

他的哲学活动，都在围绕“旧邦新命”的主题而进行。他早年好学深思，孜孜求知，是西方新实在主义“共相”理论的崇信者。旋即在中国宋明理学中发现了相似的“共相”学说，认识到人类

① 这七个主题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

的思维具有一种共同性，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中年他完成了从西方哲学向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变回归，创造了一种由宋儒理学而来又不同于前者的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晚年他忏悔彷徨，终成悲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执著于“旧邦新命”的使命，努力向真正的哲学回归，表现出顽强而可贵的一代哲学宗师的品格。

第四十六章　张　东　荪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据张东荪手订《增订张氏近世考》记载，张氏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1843年升泰州知州，1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龢（1839—1916年），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张东荪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在父亲及长兄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

190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辨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① 又说：“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曾信仰过佛教。”②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发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

---

①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下同。

② 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

心妄想"[1]。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1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2]因此，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佛教所谓解脱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

1906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

---

①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② 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

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①]。但因他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②]。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到30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

①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②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 年 11 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1918 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①]，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1918 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②]。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暂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③]。

自 1917 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

---

①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9 页。

③ 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 2 卷 14 号，1920 年 7 月 15 日。

《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奥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发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超、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1920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920年12月

25 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 月 15 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1921 年 9 月 16 日，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在《宣言》中，公开宣言：“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全面提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传目的；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越来越小。1922 年 6 月和 9 月，《社会主义研究》和《改造》杂志相继停刊。

1920 年，张东荪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他自任大学部主任，聘请国内名师做教授，后因经费困难而辞职。对于他在中国公学的情况，他的好友俞颂华回忆说：“他也办过中国公学，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①

① 俞颂华：《论张东荪》，上海《人物杂志》第 2 卷 6 期，1947 年 6 月 20 日。

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痾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①]所以，张东荪输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学。1921年12月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1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1923年发表《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伦理主义》、《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伯洛德的感相论》，1924年发表《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1925年译介英国哲学家卡阿著《科学与哲学》，1928年发表《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之解决惟赖玄学。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反驳张君劢的观点，展开了关于人生观问题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论战”)。张东荪6月9日发表《劳而无功》一文，站在玄学派一边，反对科学的人生

---

① 张东荪：《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1号，1926年1月10日。

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① 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即拿科学本身来批评，即从科学所由成的知识而逆探宇宙的根本。"②

1924年春，张东荪辞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又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0年北上就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暑假曾一度到广州任过学海书院院长）。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

1927年后，他有见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乃彻底脱离报界而转入哲学领域③。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菊农）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为中国学者进行哲学研究提供研究和争鸣园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从1928年起，他先后为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ABC丛书"写了《人生观ABC》（1929年1月初版）、《哲学ABC》（1929年初出版）、《精神分析ABC》（1929年5月出版）和《西洋哲学ABC》。1931年12月，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

①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1925年1月25日。

②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2页。

③ 《思想与社会》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 年在《大陆杂志》第 1 卷第 3、4、5 期上发表《认识论的多元论》,提出了新的认识论体系——“认识的多元主义”。1934 年 9 月,他出版《认识论》一书,进一步发挥前二文中的观点,正式形成了“多元认识论”体系。“我承认外界有其条理,内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内界的立法又分为两种,一为直观上的先验方式,一为思维上的先验方式(这一点与康德相似);至于感觉则不是真正的‘存在者’,所以我此说有几个方面,因名之曰多元论。”[1]1936 年 10 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多元认识论重述》,开始修改和充实“多元认识论”,不久,他对该文加以进一步修改后,于 1937 年 1 月收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

通过研读西方现代哲学,张东荪了解到:“现代哲学研究的趋向大体是集中于价值论的研究,尤其是以价值论来吸收伦理学。”[2] 所以他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将介绍西方哲学的重心集中于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上。他“根据原著提取需要”,“藉问题之迭变以明思想之进化”,“根据阅读数十种西洋伦理学名著的结果”,撰成《道德哲学》一书,1930 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该著出版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曾多次出版。在三十年代,张东荪主编了世界书局出版的《哲学丛书》,丛书分上、下两卷共 16 种。他撰著的《认识论》、《现代哲学》、《现代伦理学》等列入其中。1935 年 10 月,他与瞿菊农又创办了《文哲月刊》。他撰写了《发刊词》,并发表了《彭基相译笛卡儿方法论序》、《关于宋明理

① 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版,第 46 页。
② 张东荪:《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版。

学之性质》、《思想自由问题》等文。

三十年代，张东荪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有人说“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常推张东荪先生”①。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②这一点连他的论敌也是承认的。叶青曾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③

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 年 9 月 18 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物质”及“物质之变化”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1932 年他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的进程。1933 年 1 月又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1934 年 6 月又在《新中华》上发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1934 年 6 月 25 日，他又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之总

①② 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45 期，1935 年 1 月。

③ 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序。上海辛垦书店 1931 年版。

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同年1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书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在"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对于中国政局,张东荪时时留意。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我之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发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①] 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1932年,他与张君劢组织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对于创立国社党的原因,他后来解释说:"至于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②]

张东荪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称"科学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

---

①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②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1]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

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重要的有：《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国民无罪——评国民党的宪政论》、《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他虽不赞同中共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他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陶尚行"笔名致函张东荪，阐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赞同张东荪关于中共政策"转向"的观点。张东荪随即发表《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坚持自己的观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

---

[1]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

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0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1]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

---

① 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

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①] 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超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②] 1946年1月16日，他与

---

①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1页。

② 张东荪：《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

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①。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1946年10月,民盟发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张东荪发表《为美国利害着想美军应及早撤退》。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首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

①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①。

1947 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为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 月 3 日，张东荪发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1948 年 7 月，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主要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是民主主义的后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为二者对立，且有冲突，乃是错误的。同时要说明经过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者早已将若干不切实际的地方自行删去了。”② 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在社会思想界引起较

---

① 俞颂华：《论张东荪》。

② 张东荪：《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 4 卷第 2 期，1948 年 3 月 6 日。

大反响。不到半年时间便四次再版,发行达 9000 册。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出版后,张东荪又发表了《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

此后,张东荪多方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1948 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 月 24 日,他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到蓟县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 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会晤。1949 年 9 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燕京大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52 年因故辞去政府职务。1968 年 1 月被捕。1973 年 6 月 2 日病逝于北京,终年 88 岁。

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①]。毕生勤奋研读,不停地著述。先后发表了数百篇各类文章,著译、编各种著作 20 余部。其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

---

①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 2 页。

第四十七章　李　四　光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①。祖父库里，蒙古族人。父亲卓侯，改为李姓，是一位乡村私塾的教师。李仲揆5岁入塾学习。1902年到武昌考入新办的第二高等小学堂，改名四光。在校学习成绩优异，1904年获官费保送赴日本留学。

抵日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结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1905年8月，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活动，成立中国同盟会时为创建会员，李四光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孙中山见他年轻，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和期望。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机械。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教于武昌县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并参与了一些革命社团之间的联络活动。1911年夏秋之交，清廷举行辛亥第六次游学生廷试，李四光到北京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被列入"工科进士"榜。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全国响应，湖北成立鄂军都督府。李四光立即赶回武昌，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随后被选为实业部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① 下张家湾村现为回龙一库水库库区，村已不存。

后，湖北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李四光仍任司长，为调整恢复工商业支援革命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次年3月，袁世凯任大总统，倒行逆施。鄂军都督黎元洪归附袁世凯。李四光愤于辛亥革命失败，辞去了一切职务。按临时政府稽勋局规定，李四光被列为对革命有功人员，再度公费保送出国留学。1913年7月，李四光远涉重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了两年采冶，再转入地质系，专攻地质学。入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上涨，生活艰苦，李四光曾多次利用假期到矿山工作，赚点钱以弥补其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之不足；并对英国矿业情况有所了解。经过五年的学习，1918年5月，李四光提交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论文。6月，经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李四光决定去欧洲大陆作一次地质旅行并对战后各国情况作些了解。

1920年2月，李四光应友人的邀请，到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讲演时，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讲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1] 这些语言，表达了他在学术上要求独立思考，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意志。他这篇以煤炭为主并涉及到各种新能源的讲演，也勾画出他后来为中国现代化解决能源长期思索和实践的精神。

离开巴黎后，他到了瑞士，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考察了琳琅

---

① 李四光：《现代繁华与炭》，原载《太平洋》第2卷第七号，1920年。现载《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和构造；并到德国柏林等处，察看战后景况，然后由柏林到莫斯科，坐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北京。应蔡元培的聘约，1921年1月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正式开课，开始他的教授生活。

中国近代科学，在二十世纪初，还处于草创的初始阶段。辛亥革命后，经章鸿钊的倡议，丁文江的经营奔走，1913年培训了一批地质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1916年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开始了中国有组织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李四光原准备回国后，主要从事实地的调查工作。由于丁文江感到中国地质工作后继需人，极力主张他到学校任教，李四光经过考虑，认为培训自己的地质学家是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于是决定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李四光在系里开讲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每年还多次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他在教学的同时，就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

李四光在北京大学，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校务活动。他担任过北大第二院庶务主任，北大的预科、仪器、聘任、财务以及图书等委员会的委员、主任等职务，1922年11月和1924年10月，曾两度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参与了北京大学有关治校的一些决策性的讨论。

李四光开课期间，结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的机会，做了许多重要的地质考察工作，发表了不少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可以说，他一生在地质学上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①。例

① 许杰：《回忆我的老师李四光同志和他的科学活动》；杨钟健：《李四光老师回忆录》等文章，载《李四光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1981年版。

如,1921年发现太行山东麓及大同盆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从此,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展开了新的篇章,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揭开了序幕,也为国内外地学界带来了长期讨论的重要课题;在古生物学研究方面,他创立了鉴定䗴科化石的新方法,提出䗴科分类的十项标准,并于192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方之䗴科》,并获伯明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的荣誉;在构造地质学方面,1926年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①,是他以后创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萌芽。此外,在岩石学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的贡献。

1922年1月,在丁文江主持下,李四光参加了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备工作,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以后他经常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和会志上发表自己重要的学术论文。1925年8、9月间,李四光代表北京大学,到苏联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他会见了苏联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卡尔宾斯基(А. П. Карпинский)、巴甫诺夫(А. Г. Павлов)、费尔斯曼(Е. Ферсман)等人,广泛地交换了学术上的意见,并代表中方邀请了苏联科学院永久书记欧登堡(С. Д. Олденбург)第二年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

1927年7月,李四光应蔡元培邀请,到上海参加了筹备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从1928年1月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一直担任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职务。虽然他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上,但从1931年秋开始,他又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的职务,直到1936年暑假还

① 李四光:《地质力学方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页。

领着北大地质系四年级毕业生上庐山实习。在1926—1929年期间，李四光还在湖北家乡筹建了一座现代化高等学府武汉大学[①]。他是这所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委员长。

三十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长江中下游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从1931年开始，他几上庐山、黄山、九华山和天目山，最后决定对庐山进行系统而详细的研究。1937年终于完成了《冰期之庐山》的初稿，明确地指出庐山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区，是"困惑难解和耸人听闻学说的诞生场所"[②]。尽管多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仍有人在。《冰期之庐山》1947年正式出版后，许多从事第四纪冰川地质工作者，都认为它是一部第四纪冰川学的经典性著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奠定了基础。

1934—1936年，李四光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和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这份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公开出版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说："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③] 在该书英文版222页，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发育的特点时，李四光明确提出在华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储藏。反映了他从研究构造的角度寻找隐伏资源的独到见解。

---

① 李进才等：《李四光与武汉大学》，载《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地质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② 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原文见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第20页。

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页。

书中还用了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实际材料，反映了李四光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和执着精神。这次讲学结束后，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从东到西作了一次地质考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所人员，内迁广西桂林。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广西当局聘请为广西建设委员会的研究员，曾为广西建设发表过一些重要意见。

李四光在桂林还会见了早年同盟会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实现两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丰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为广西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办了一件实事。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填绘了广西地质图。四十年代初，他还长途跋涉两度调查南岭地质，考察过鄂西、川东、湘西、桂北、闽西、赣南等地的地质构造情况和冰川遗迹，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以及《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①] 等。

1944年，日寇内侵，直逼桂林，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由于长途奔波，环境困扰，李四光的健康转坏，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坝。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联合邀请李四光到重庆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专题学术讲演，这是李四光二十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

---

① 景才瑞等编:《李四光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499页。

一次总结，也是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第一部专著，后经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又挑起内战烽火，李四光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担忧不已。1946年夏，他从四川回到了上海，并转杭州养病数月。1947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推选他为中国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许淑彬一同由杭赴沪转港，乘船赴英，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上他宣读了《新华夏海之起源》一文。会后，他和夫人商定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居住一段时间。在这里，李四光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共产党必胜。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李四光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恨不得立即起程归国。正在这时，得一位友人通知，说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奉命要阻拦他回国。李四光当即和夫人商定，星夜只身离英，摆脱监视；夫人随后赶到巴塞尔与他会合，然后赴意大利并从热那亚港登轮启程回国。1950年4月初，李四光夫妇经香港抵广州，回到了祖国大陆。5月来到了北京。

李四光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临时住下后，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住处来看望他，两人谈了将近3个小时。周恩来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帮助党和政府团结全国广大的科学家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的工作。还有一项急待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期待他去做，那就是把旧中

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急待开展的工矿资源勘察服务。李四光深知完成这三项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他承担了下来。

关于团结科学家的工作，李四光一直是很热心的。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一部分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满于当时政府对科学界的迫害，在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重庆成立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推举竺可桢为理事长，李四光为监事长，涂长望为总干事。科协的发展很快，在国内大城市和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先后成立了分会，并于1946年7月，与法、英、美、捷等国的一些科学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世界科协)。北京解放后，1949年5月，在中共统战部的推动下，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社(1915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社(1927年成立)、东北科学研究会(1948年东北解放后成立)共同发起建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会议。经过酝酿，由吴玉章主持，举行了筹委会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讨论推选出科学界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17人，李四光是其中之一。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闭幕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李四光为副院长之一。李四光这时还在国外，未能赶上参加上述会议。

李四光回到北京，出席了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并作了一次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不久他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毛主席接见代表时，还对他在政协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8月17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举行，李四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新中

国的科学研究》的报告[1]。这次会上还通过筹委会建议成立的以各门学科学会为会员的“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以科技工作者个人为会员的“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大会推选李四光为科联主席，侯德榜等为副主席；推选梁希为科普主席，茅以升等为副主席。1958年因形势要求，两会合并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李四光当选为主席。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并在几位副主席和各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科协对促进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学会进行跨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和国际交流，对新学科学会的建立，对人民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科协曾经是世界科协发起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被推为世界科协的副主席之一。在五六十年代，李四光与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J. Curie)等常有书信往来，共同对反对原子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声援被迫害的科学家等活动，表示了相互的支持。1956年，世界科协成立10周年，4月1日至3日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局会议和协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世界科协副主席之一)等及理事十余人到会。李四光在会上发言，强调要使科学服务于崇高的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1964年8月21—31日，由中国邀请有亚、非、拉、澳44个国家367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前夕，李四光以中国科协主席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招待会，数百位

---

① 李四光：《新中国的科学研究》，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5期，第289—291页。

中国科学家和各国科学家欢聚一堂。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致词,称这次讨论会是各国科学家胜利会师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到会的全体科学家。

由于李四光本人的科学造诣和他在国内外科学活动中的声誉,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并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李四光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工、农业建设中需要多学科综合技术解决的问题,常组织各个有关专业的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李四光很早就关注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归国到职后,即关注钱三强的工作安排。积极支持近代物理所的建立,多次由钱三强陪同到所视察并与科学家座谈,并和当时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多次讨论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安排问题。

1950 年 9 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统一部署全国地质调查研究与勘探工作。1952 年 9 月,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任副部长。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一开始就采取了大转变、大发展的方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长春等地质院校,开始大规模培训新生力量。中国地质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形势。1953 年夏末,李四光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正值朱德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也在此休养。李四光到朱德住所向朱德作了放射性探测演示,随后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1954 年,地质部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

查，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内成立第二办公室，专管铀矿地质工作。不久，二办扩大成为地质部三局(以后改属二机部、三机部和核工业部)。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地质工作的进展，再次演示了铀矿石标本的探测反应。当与会领导听到了探测器“嘎嘎”的声响，大家都很高兴。毛主席当场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①] 由此，我国拉开了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原子能研究，推广同位素应用的建议。经科学院党组与二机部党组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简称核委)，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为副主任委员。钱三强负责核委的经常工作。

此时的李四光作为地质学家，急国家之所急，一手抓铀矿地质，一手抓天然油气地质。以往他多侧重基础性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实的科学知识与经验，为适应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又积极开拓应用地质领域的工作。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当时参加报告会的有苏联石油访问团和在华工作的石油专家。他用地质力学理论，详细地论证了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可能含油的远景地区，着重指出从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以后他又指出新华夏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复印本第61页，地质矿产部编印。

构造体系最东边的一条沉降带,黄海、东海乃至南海地区的海域含油远景,并不亚于陆地。李四光全局性、战略性的预测,在后来的区域普查和开发勘探中,基本上一步一步得到了证实。李四光在寻找祖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因地球科学对发现大庆油田的突出贡献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也因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成研究所,李四光亲自兼任所长。当时,李四光还担任着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年,李四光还被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推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第二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又授予他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威望。

1959年,李四光开始撰写《地质力学概论》,1962年内部发行。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李四光和他的学生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是地质力学文库中的经典性著作,它标志着地质力学的完善与成熟。地质力学研究所用这部书做教材,一连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向100多名地质研究骨干,介绍了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并使地质力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普及和验证。

1960年,李四光在北京西山地质力学研究所召开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并带领与会人员察看了北京西山地区新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会上成立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中心联络组,李四光任组长,指导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建成后,连续发生诱发性地震,李四光十分关心,他组织力量着手研究测试地应力的活动规律。

1966年邢台发生强震之后,李四光对地震预测研究更加感到紧迫,他亲自到现场,亲自作地应力测试试验。他认为作为地壳能量集中释放的地震是有脉络可寻的,是有前兆出现的,只要深入工作,是可以预报的。他为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进行深入的试验研究。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做过一些工作,但大多是跟在地震的后面跑。李四光认为没有提前10年、15年在战略性地区开展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是犯了一个错误。

李四光认为,要预测地震,就要划分危险区,建立地震预测试验站,研究地震应力作用的过程。要进行地应力测量就应该仔细研究构造应力场。了解了应力场的特点,才好追索构造运动的起源。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应注重岩石性质问题,岩石的机械性质和化学性质,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把这两种因素,即矛盾的双方,同时加以考虑和分析,才能对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频度和强度作出科学的判断。李四光认为这是对地震预报的一条有效的探索途径。1971年4月,在他病危期间还曾问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说:"如果还能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解决是有希望的。"① 可惜,4月29日他就溘然长逝了。李四光的去世,对于我国地震预报工作是难以弥补的一个损失。

李四光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年中,还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编写了一本《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这本书

---

① 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页。

可以说是他一生攻研地球科学思想路线的总结与表达。他把天、地、生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再把有关数、理、化的部分知识要点,精炼出来熔于一炉,表达了李四光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长期科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整体论思想及其方法论,是十分可贵的。1972 年,这本书正式出版,全书 15 万多字,附有 60 多幅照片和插图。书的最后一部分"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在这里,李四光再次强调了构造体系的观点,提出解决大陆构造问题应该立足于确实可靠的构造现象,即构造体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是李四光在地质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李四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还特别关心地下热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逝世前一年,他不顾身患危症,一定要到天津视察地下热水的开发与利用的情况。打开地下热能宝库,减轻煤炭资源的消耗,是他多年在能源利用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他逝世前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

李四光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毕生研究地质力学,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铀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方面开拓了广阔的新的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对古生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以及模拟实验、地应力测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出色的成就。李四光的学术成就和科学业绩,他的科学著作、科学思想和创造性的科学方法,都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1958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总理曾说:"李四光是

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①] 在 1971 年 5 月 2 日李四光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号召大家："要继承李四光的事业，学习和发展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学说，要把李四光生前的遗著整理出来，公开发表，广泛流传。"[②]

① 转引自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2 页。

② 《第四纪研究》第 3 期，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9 页。

第四十八章　华　罗　庚

华罗庚，1910年生于江苏金坛。父亲华瑞栋，人称华老祥，原是江苏丹阳访仙桥人，后来搬迁到金坛定居。华老祥13岁时开始做学徒，学做生意，后来自己筹资开了一个小店，赚得钱后，又开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店，最后则开了一家大店。有了钱之后，华老祥逐渐放松了对生意的经营。一场大火，把大店烧个精光，中店也倒闭了，只剩下一个小店。

华老祥在40岁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华罗庚。华罗庚在金坛念小学的时候，金坛还没有初级中学。金坛初中创办那年，华罗庚小学毕业，他幸运地进了这个初中。1925年，他以全班第二名初中毕业。

由于家境贫寒，华老祥无力让华罗庚继续升高中。经过努力，华罗庚考取了由黄炎培等主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华老祥除需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外，家里还住有几个侄儿与侄女，一直帮助他们到结婚成家为止，因此家境愈益困窘。仅仅为了家里拿不出50元的学费，华罗庚不得不放弃还差一学期就毕业的机会，弃学回金坛帮助其父经营"乾生泰"小店。

这时华罗庚已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时有一个留法学物理的青年叫王维克，回到金坛，执教于金坛初中。他欣赏华

罗庚的数学才能，并借书给华罗庚看，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50页的微积分。华罗庚边站柜台，边用零散的时间学习数学。家里人都说他在看“天书”。为了怕他看书影响做生意，华老祥多次要撕掉他的“天书”。

1927年，华罗庚与吴筱元女士结婚。次年生女名华顺，以后他们又有了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与华光和两个女儿华苏与华密。

1929年，金坛发生了流行瘟疫（大概是伤寒），华罗庚染病卧床6个月，曾发高烧昏迷不醒，6个月未翻身，病虽痊愈，但左腿留下残疾，走路时要左腿先划一个大圆圈，右腿跨一小步。有人嘻称他按“圆与直线”行走。

华罗庚病愈后，家境更贫寒。幸得王维克帮忙，让他在金坛初中补习班教书。刚教了一个月，王维克校长就被人告了一状，说他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继任校长韩大受，委任华罗庚为会计，总算没有让他失业。

1926年，上海《学艺》杂志（10卷10期）上载有一篇苏家驹的文章《代数的五次方程式的解法》。一般五次以上代数方程的根是不能用系数的四则运算及根式来表示的，这已由N.H.阿贝尔(Abel)于1826年证明。苏家驹当时是知道这件事的。由于他自以为得到了一个可解的“证明”，又未发现错误而发表该文。华罗庚当时也已知道阿贝尔定理，他找到了苏家驹文章的错误。他于1930年在上海《科学》（15卷2期）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指出苏文中有一个12阶的行列式计算错了。这是华罗庚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讨论J.C.F.施图姆(Sturm)定理的，刊于1929年《科

学》14 卷上。

华罗庚的论文引起当时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他认为华罗庚有天才,有培养前途。使熊庆来纳闷的是从未听说过数学界中有一个华罗庚。后来,熊庆来从系里一个教员金坛人唐培经那里打听到华罗庚的情况。经熊庆来推荐,华罗庚于1931 年来清华大学任算学系助理,管理图书、公文,也兼办杂事。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如鱼得水,拼命学习数学。至 1933 年,华罗庚的水平与能力已为大家所认识。系里欲聘任他为助教,但又碰到同样的资格问题。为华罗庚的问题,理学院开会讨论,不少教授如郑桐荪、杨武之、叶企荪等,认为清华大学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应该因资格问题而限制人才使用。由此他被破格提升为助教,授微积分课。1934 年他又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乙种研究员,1935 年,他被提升为教员。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期间,除对高等数学基础知识全面认真学习外,特别致力于数论的学习,例如 D. 希尔伯特(Hilbert)的《数论报告》(Bericht über die Theorie der algebraischen Zahlkörper, 1897)与 E. 兰道(Landau)的《数论教程》(共三卷)(Vorlesungen über Zahlentheorie, Band Ⅰ, Ⅱ, Ⅲ, 1927)等名著,他都已融会贯通。那时他致力于华林(Waring)问题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他的工作曾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的指点与帮助。

1936 年左右,法国著名数学家 J. 阿达马(Hadamard)与美国著名数学家 N. 维纳(Wiener)来清华大学系统讲学。华罗庚的好学和勤奋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二人,他们非常器重华罗庚。华罗庚从他们的讲学中深受教益。阿达玛向华罗庚指出,И. M. 维

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对华林问题的研究非常出色,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方向,从此华罗庚进入了研究堆垒数论的主流。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华罗庚的工作受到维诺格拉多夫的影响。华罗庚从维纳那里学到大量傅里叶(Fourier)分析的知识与技能,这与他以后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时,算学系有陈省身、许宝騄、柯召、吴大任等,物理系有王竹溪、赵九章等。华罗庚时常跟他们论学问难,互相切磋。

1936年,维纳将华罗庚推荐给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G.H. 哈代(Hardy),盛赞华罗庚是中国的S.A. 拉马努金(Ramanujan)。华罗庚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1200美元的乙种补助,以一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哈代与J.E. 李特尔伍德(Littlewood)都很赞赏华罗庚,保证两年可以给华罗庚博士学位,但他却表示:"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学位。"

华罗庚在剑桥大学时,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如H. 海尔布伦(Heilbronn)、H. 达文波特(Davenport)、T. 埃斯特曼(Estermann),R.A. 兰金(Rankin)与E.Ch. 蒂奇马什(Titchmarsh)等人,他们互相切磋,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帮助。

在英国,华罗庚致力于解析数论,特别是圆法与三角和估计的研究。他的工作水平有了实质的提高。例如关于完整三角和的估计、华林问题与E. 普罗黑(Prouhet)问题(或普罗黑-塔利(Tarry)问题)等的重要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他当时的论文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经典文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罗庚于1938年毅然回到云南省昆明市。鉴于他的学术水平与才华，不少大学争聘他。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杨武之破格提拔华罗庚为正教授，于是他在位于昆明市的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共同招生，各校自聘教授，三校研究生自由选课与参加讨论班)执教。这时他虽然仍继续其数论研究，并完成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但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已从数论转移，而致力于群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围绕这些学科，华罗庚与其他数学家一起倡导并主持了各种讨论班。参加过他的讨论班而以后闻名的数学家中有段学复、闵嗣鹤、樊𰋀、徐贤修，受过他的影响及听过他的课的青年还有蓝仲雄、王湘浩、孙本旺、彭慧云、田方增、徐利治、钟开莱与严志达等人。

1946年2至5月，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到苏联进行了3个月的访问。

由于美国原子弹的震撼，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欲建立国防科技，乃经由曾昭抡邀华罗庚与吴大猷去重庆商谈。他们向陈诚、俞大维陈述我国科学落后，应由培养人才入手。陈诚、俞大维采纳此议。由军政部资助两年费用，华罗庚、曾昭抡、吴大猷率优秀青年孙本旺(数学)、朱光亚、李政道(物理)、唐敖庆、王瑞駪(化学)一行于1946年7月初由上海乘船赴美。

在美国期间，华罗庚首先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数论课。那时在普林斯顿有徐贤修、王湘浩、闵嗣鹤(数学)、张文裕、吴健雄、袁家骝(物理)、梁守槼(化学)、尤桐(考古)等人。1946年底，华罗庚在美国治疗腿疾。

他的腿治愈后，基本上可以正常行走。1948年春，华罗庚应伊利诺伊大学之聘，任正教授直至1950年2月回国为止。华罗庚在美期间，在数论、代数与复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率全家于1950年2月乘船，途经香港于3月16日回到北京。他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并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华罗庚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早在1946年，华罗庚就指出："我国将来数学研究所的工作，似乎不应当只偏重于纯粹数学或纯粹数学的一部分而已。"建所之初，按上述蓝图，研究所广泛网罗人才，工作进展神速。数学所先设有数论（华罗庚、越民义、王元、许孔时、吴方、魏道政）与微分方程（吴新谋、秦元勋、王光寅、丁夏畦、邱佩璋）两组，相继成立了代数组（华罗庚、万哲先），函数论组（华罗庚、陆启铿、龚昇），拓扑组（吴文俊、张素诚、孙以丰），泛函分析组（关肇直、田方增、冯康），数理逻辑组（胡世华、唐稚松、陆钟万），概率统计组（王寿仁、张里千），理论物理组（张宗燧、戴元本），力学组（庄逢甘、林鸿荪、罗时钧、沈元、李敏华、胡海昌），计算机设计组（闵乃大、吴几康、夏培肃）。熊庆来于1957年回国，函数论室加设单复变函数论，杨乐、张广厚是熊庆来晚年的研究生。华罗庚在见到厦门大学青年陈景润关于塔利问题的一篇文章后，认为他有培养前途而将他调来数学所工作。华罗庚领导了"数论导引"与"哥德巴赫(Goldbach)猜想"两个讨论班。他还领导了多复变函数论与代数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曾建议关肇直、田方增研究赋范环论，建议冯康研究广义函数论。数学所还向全国

开放，来所工作过的有李国平、李修睦、梁之舜、张远达、钟同德、林坚冰、严士健等。得益于在数学所期间的工作而成为学部委员者近20人。这个阶段，华罗庚写成《数论导引》(1957)、《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1959)、《指数和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1963)与《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1963)4本专著。华罗庚的主要研究工作为定出4类典型域上的完整正交系。这项工作荣获1956年颁发的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0年，毛泽东主席会见华罗庚时，曾希望他培养出一些好学生来。建所后，华罗庚十分注意培养学生，他在撰写专著的过程中，总是组织讨论班，对他所写的材料加以讲述、讨论与修改，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做研究，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华罗庚还注意数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介绍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从1956年开始，华罗庚即在中国倡导高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为此他为中学生写过5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总之，从1950至1957年，华罗庚的一切工作都得到政府与数学家的广泛支持，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华罗庚高瞻远瞩，始终坚持对苏联与西方先进数学的学习。这期间，他还不断致力于争取华裔数学家回国工作。

1957年，华罗庚与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童第周就科技问题在《光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章，提了几个正确意见。这一具有良好愿望的文章，竟被说成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与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华罗庚、千家驹与童第周虽然得到保护而免遭划为右派，但仍受到多次“批判”。1958年，《人民日报》登载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文章，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华罗庚又作为数学研究所的重点批判对象，

他与一些正直的数学家被剥夺了发言权。

1962年,华罗庚以极大的勇气来整顿数学研究所。他倡议在数学所的研究实习员中进行一次基础课考试,成绩优秀者提升,成绩太差者调出数学所工作。经过这次整顿,数学所又逐渐走上正轨。华罗庚还在数学所开辟了一个"练拳园地",出题目给大家做,以提高对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但好景不长,从1964年开始,形势又在向"左"转了。华罗庚的一系列正确做法,被说成是所谓"考、提、调"三板斧,是砍向"革命群众"的三板斧,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他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所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华罗庚于195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华罗庚在科技大学期间写成专著《高等数学引论》。

从1958年开始,华罗庚致力于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特别是在多重定积分的近似计算中的应用研究(与王元合作)及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至1965年,华罗庚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在工业上的普及应用方面。他选择适合中国工业实际水平的"优选法"与"统筹法"(简称"双法")加以推广应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与陈德泉、计雷等人一起,足迹遍布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厂矿工交企业,给工人讲课,既普及了数学知识,又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影响颇为深远。

1966年,爆发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华罗庚的家被查抄过3次,手稿散失殆尽,不少工作无法再继续进行。他被贴了不少充满了造谣污蔑之词的大字报,还遭到几次批判。这一情况至1967年即告终止,他可以安静地呆在家里,甚至可以出去普及"双法"。较之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华罗庚可算是

幸运的。1975年,华罗庚得了心肌梗塞,经治疗虽幸免于死,但却种下了致命的病根。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1979年开始的数年间,华罗庚在朋友与学生的协助下,完成专著《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1978),《从单位圆谈起》(1977),《优选学》(1981)与《华罗庚论文选集》(Hua Loo Keng, Selected papers. 1983)。他还以学者身份,3次出国讲学。1978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0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分成数学所、应用数学所与系统科学所。华罗庚除继续担任数学所所长外,还被任命为应用数学所所长,直至1983年底为止。1979年,法国南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以后香港中文大学(1983)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984)也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他还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1982),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3)与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85)。这些年来,华罗庚仍积极工作,他想多做些事,将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但终究年迈体弱,力不从心了。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演讲,由于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

除数学家生涯外,华罗庚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从1951至1983年,华罗庚均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又曾任第二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曾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7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罗庚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卓越成就,简述如下:

1. 指数和估计及堆垒素数论。

命 q 为整数 >1，$f(x)=a_kx^k+\cdots+a_1x$ 为整系数多项式满足 $(a_k,\cdots,a_1,q)=1$（即互素）。记

$$S(q,f)=\sum_{x=1}^{q}e(f(x)/q),\qquad e(x)=e^{2\pi ix}$$

华罗庚在 1940 年证明了：对于任何 $\varepsilon>0$ 皆有

$$|S(q,f)|\leqslant c(k,\varepsilon)q^{1-\frac{1}{k}+\varepsilon}$$

其中 $c(k,\varepsilon)$ 为仅依赖于 k 与 ε 的常数。这一结果是臻于至善的。它是 C. F. 高斯(Gauss)和与高斯定理的推广：

$$|S(q,x^2)|\leqslant 2\sqrt{q}.$$

关于指数和的积分平均，华罗庚证明了：对于任意 $\varepsilon>0$，当 $1\leqslant j\leqslant k$ 时有

$$\int_0^1\left|\sum_{x=1}^{N}e(af(x))\right|^{2^j}da\leqslant c(k,\varepsilon)N^{2^j-j+\varepsilon}.$$

由这两条重要定理及维诺格拉多夫关于 H. 外尔(Weyl)和的估计及他关于素变数三角和的估计，华罗庚研究了方程

$$N=f_1(x_1)+\cdots+f_i(x_i)$$

的可解性问题，此处 $f_i(x)(1\leqslant i\leqslant s)$ 为 s 个 k 次首项系数为正的整值多项式，N 为给定正整数。特别当 $f_i(x)=x^k$ 时，就得到著名的华林问题。若在方程中限制 x_i 取素数，$f_i(x)=x$ 及 $s=2,3$，即得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华林问题，首先是希尔伯特于 1900 年证明了，存在 $c(k)$，当 $s\geqslant c(k)$ 时，(3)有解。当 N

充分大时,最小的 s 记为 $G(k)$ 以后,哈代与利特尔伍德用他们的“圆法”对 $G(k)$ 作了定量估计。维诺格拉多夫则大大地改进了 $G(k)$ 的估计,他还证明了“三素数定理”,即充分大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华罗庚将华林问题的重要结果基本上推广到上述方程的情况,而且限制变数为素数,自然包括“三素数定理”作为特例。他的成果总结在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之中。这本书已成为经典著作。

解析数论最上乘的工作之一是有一个纯分析的不等式(这称为方法),并附有这一不等式的重要应用。华罗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在华罗庚领导的堆垒素数论中心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上,王元、潘承洞与陈景润相继对筛法、大筛法应用及哥德巴赫猜想的结果作出改进。陈景润于 1966 年证明了:每一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之积之和。

2. 体论。

若一个环 k,其每一元素关于乘法都有逆元素,但对乘法来说是非交换的,则 k 称为体。命 σ 是体 k 到它自身的一个一一映射。如果 σ 满足

$$(a+b)^{\sigma}=a^{\sigma}+b^{\sigma},\ (aba)^{\sigma}=a^{\sigma}b^{\sigma}a^{\sigma},\ 1^{\sigma}=1,$$

则称 σ 为半自同构。熟知的半自同构的例子为自同构:$(ab)^{\sigma}=a^{\sigma}b^{\sigma}$,与反自同构:$(ab)^{\sigma}=b^{\sigma}a^{\sigma}$。问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半自同构?华罗庚于 1949 年证明了:每一个半自同构或为自同构或为反自同构。

同年,华罗庚还给下面结果一个初等证明:体的每一个真正

规子体均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H. 嘉当(Cartan)-R.D. 布劳尔(Brauer)-华氏定理)。

P.T. 贝特曼(Bateman)用莎翁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句“没有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教堂门那么宽,像茂丘西奥的伤口一样致命呀!”来赞扬华罗庚的一些结果。

1950 年,华罗庚还证明了体的乘法群的一个定理:体的乘法群不是亚阿贝尔群。

3. 矩阵几何、自守函数、典型群论与多变数函数论。

华罗庚将这几个学科放在一起研究。他在这几方面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将一个变数推广到多个变数往往无从下手,以矩阵为变元则为特殊的多变数问题。这时代数工具可能使用,一行一列的矩阵就是单变数,又可以借用单变数时的结果做背景,所以华罗庚研究的方法均重用矩阵运算,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开拓性工作。

1935 年,E. 嘉当(Cartan)证明了,在解析映射下,只有 6 类不可约、齐性、有界对称域,其中两类是例外域,维数分别是 16 与 27,其余 4 类称为典型域。典型域可以看作普通复平面上的单位圆在高维空间的类似。其重要性有如单位圆之于复平面,其应用与影响又超过多复变函数论。

华罗庚给出了 4 类典型域的运动群的矩阵表示,算出 S. 伯格曼(Bergman)核,重新证明了 3 种类型的双曲空间的黎曼(Riemann)曲率都是非正的,从而推知其几何相当正规。这就导致华罗庚开拓了“矩阵几何学”这一领域。在矩阵几何中,空间的点是某类矩阵,其背景是典型域。华罗庚的目的在于在这些矩阵空间中推广复平面的几何基本定理——K.G.C 冯·施陶特

(von Staudt)定理:每一个将复平面映射到自身的保持调和分隔不变的拓扑变换必为直射变换或反直射变换。例如对复数域上的对称矩阵空间,华罗庚证明了:一个连续的将对称矩阵映射为对称矩阵并保持算术距离不变的映射必为辛变换或反辛变换。

但怎样用尽量简单的几何不变量来刻划运动群呢?1951年,华罗庚发现"粘切"就够了,所谓矩阵 M 与 N 粘切,即 M-N 的秩为 1。华罗庚还研究了基域是体的矩阵几何学。

1953 年,华罗庚用群表示论方法具体得出 4 类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这相当于在复平面上找到了完整正交系 $e(n\theta)(n=0, \pm 1, \cdots)$。借助于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华罗庚得出 4 类典型域的柯西(Cauchy)核、赛格(Szegö)核与泊松(Poisson)核。

辛群在华罗庚的自守函数论与矩阵几何的研究中都很重要。很自然地,他会研究辛群的自同构问题。1946 年,华罗庚发表了他确定辛群自同构的文章。这是他研究典型群的开端。以后的一系列工作,形成了他研究典型群论的独特方法,即先解决尽可能低维的问题,再用数学归纳法推广到高维。华罗庚处理典型群自同构问题的方法很初等,即着重矩阵运算。

华罗庚在这方面的工作由万哲先、陆启铿与龚昇继续着,得到了发展与应用。

4. 应用数学。

从 1959 年开始,华罗庚与王元合写了一系列论文,研究了在近似分析中,如何用基于数论思想的可计算与决定性方法来尽可能取代统计实验的蒙特卡罗(Monte Carlo)方法的问题。他们的方法的要点为用一组独立单位或线性递推公式来构造一个

代数数域的整底的联立有理逼近,从而定出高维单位立方体的一致分布点列并得出其偏差估计。一致分布点列可以代替蒙特卡罗方法中的随机数,故又称为伪随机数。例如,设$\{Fn\}$表示L. 斐波那契(Fibonacci)数列,即由递推公式

$$F_0=0,\ F_1=1,\ F_{n+1}=F_n+F_{n-1}(n\geqslant 1)$$

定义的整数列。假定$f(x,\ y)$的导数$\frac{\partial^4 f(x,\ y)}{\partial x^2\partial y^2}$及其低维导数均囿于$c$,且每个变数均有周期1,则得

$$\left|\int_0^1\int_0^1 f(x,\ y)dxdy-\frac{1}{F_n}\sum_{k=1}^{F_n}f\left(\frac{k}{F_n},\frac{F_{n-1}k}{F_n}\right)\right|\leqslant\frac{c\log F_n}{F_n^2}$$

这是臻于至善的估计。

华罗庚还对“统筹法”,即CPM与$PERT$与“优选法”,亦即J. 基弗(Kiefer)的“黄金分割法”与“斐波那契法”作了简化,并在中国工业部门作了广泛的普及与使用。

华罗庚的主要论著有《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高等数学引论》、《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优选学》、《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Hua Loo—Keng, Selected Papers》(Springer—Verlag,1983)。

华罗庚一生都是在磨难中挣扎。他常说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难。首先是在他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稿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

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四十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与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话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轻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五十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向,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而某些部门也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采取了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这导致了学风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上。1978 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实际上也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学术界不良学风的批评,以及他对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看法。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讲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华罗庚必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斧必到班门”。早在五十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手无悔大丈夫”。1981 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庚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

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 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庚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时，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尽量多做工作。”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华罗庚从小就爱国爱民，胸怀大志。抗战刚开始，出于民族大义，他即放弃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中国昆明。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后方贪官奸商横行，十分气愤，毅然写

道:“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狐虎满街走,鹰鹳扑地飞。”当他得知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后,心中交织着强烈的爱和恨,他写道:“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毅然放弃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携全家回到北京。在归国途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1950年2月),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华罗庚在1951年又写道:“从前帝国主义者不但在经济上剥削我们,政治上奴役我们,使我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时,又从文化上——透过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医院和所谓慈善机关——来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实际上,我们祖国伟大人民在人类史上,有过无比的睿智和成就。”“请读者用客观的态度,公正的立场,自己判断,自己分析,看看我们是否是如帝国主义所说的‘劣等民族’”。

这些话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华罗庚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为了振兴中华而毅然回归祖国。

1957年,华罗庚遭到错误批判。当时,中国数学界大搞“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华罗庚目睹中国数学界遭到的破坏与损失,痛心疾首。1963年,他借写《高等数学引论》的序言为题,加以发挥地写道:“它既是急就章,又是拖沓篇,1958年匆匆上马。”“错误百出,疵谬迭见。”“紧紧松松,赶赶拖拖,因而详略不一,前后不贯,轻重失调,呼应不周等毛病在所难免的了。”

1964年，他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向前走了3里路，发现错了，不要紧，后退3里，便到原来的出发点了；但时间却不能退回到原来出发的时间，而是花了双倍时间，时乎时乎不再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眼见着国家遭难，人民受害，他更是百感交集，悲愤万分。1969年，他的恩师熊庆来遭迫害致死，他都不能去悼念。1978年，熊庆来得到平反后，华罗庚写道：

"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
尸体已入焚化间，谁是？翻遍盖面布，
方得见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

在"四人帮"横行时，华罗庚虽受到保护，但他被剥夺了发言权，而且实际上被禁止与朋友学生往来。他的"双法"普及工作，亦常遭到横加干预。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据说华罗庚有一个小本子，经常偷着写诗骂"四人帮"，不肯示人，可惜未能留存下来，现仅得一首如下：

"并州战役胜利日，白骨妖魔心如炽。
'我要分裂停生产'，尔辈竟敢搞团结。"

1976年，"四人帮"殄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华罗庚心情舒畅，他写了一系列述怀诗句，展望未来，跃跃欲试。列举一首如下：

"春风吹绿了大地，原野上万马奔驰，
与其伏枥而空怀千里，何如奋勉而追骐骥？"

华罗庚终于倒在了学术报告的讲台上，为祖国、为数学，工作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四十九章　鲁　迅

鲁迅，姓周，原名樟寿，字豫才；1898 年到南京求学时改名树人；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

1881 年 9 月 25 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当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已处在衰落中，但仍可称之为小康之家。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及家长和塾师的严格培养，鲁迅在少年时期便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

在此期间，家中发生的两大变故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3 年秋，当他 12 岁的时候，正在做着京官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全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鲁迅随母亲到亲戚家避难，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同族的长辈也看不起他们，甚至加以欺凌。翌年冬，父亲周伯宜又患了重病。作为长子的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入当铺和药店。虽然开方的都是当地的名医，虽然诊金很高，但父亲的病却日重一日，终于在 1896 年秋天亡故了。

世人前恭后倨的态度深深刺伤了他那颗自尊而敏感的心灵。“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时心灵的余痛，可以得知他当时

已深切体验到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虚伪和冷酷。而父亲的因医治无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当时思想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看到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少年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绝望，除了也看到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之外，更多地来自他当时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他有着独特的少年经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而中国旧文化的陈腐窳败也已充分显露。于是，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少年鲁迅不愿走科举应试的所谓"正路"，也不愿学作幕友或商人，决心不顾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1898 年 5 月，他带上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川资，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学洋务"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学堂的管理和教学感到失望，翌年 2 月又考入也设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一直学习到 1902 年初。在南京将近 4 年的时间里，鲁迅接触到他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通过阅读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对西方正在盛行的作为生物学和历史观的进化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02 年初，鲁迅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官费保送日本留学。他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其他基础课程。他一面学习，一面热情地探求着救国之路。他的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志愿在他 1903 年写给同学兼好友许寿裳的一首诗《自题小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

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积极展开活动。鲁迅赞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并经常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他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启超提出的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精神状态的新民说则给予高度重视。他开始认真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他讨论这样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1903 年，鲁迅翻译并加以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发表于《浙江潮》杂志。这篇小说歌颂了斯巴达勇士抵抗侵略、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洋溢着激昂的爱国热情。同时或稍后，鲁迅还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写了介绍科学知识的论文《说钼》和《中国地质略论》。这些译作和文章显示了他对科学的重视。

1904 年 4 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 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救国思想密切相关的。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后来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与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加以比较，他更加感到中国医学的落后。同时他还从翻译的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因此他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学习到 1906 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决心弃医从文。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献身于文艺事业。

1906年6月，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家庭包办的这件婚事，鲁迅很不满意。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绍兴只住了几天就回到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07年春，他与许寿裳等人计划创办文学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败。1907年底到1908年底，他在刘师培等人主编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等论文，标志着他的独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兴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变国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新的国民应当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强暴，又要有博爱之心；既要务实，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又要有开阔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驱。

1909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这里面所收的多是东欧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要求民族独立或抨击反动统治。鲁迅选译这类文学作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域外小说集》销售

情况很不理想,半年内只售出数十册。

从1906至1909年鲁迅在东京从事的文学活动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处在政治革命的热潮中,大部分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变革对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但鲁迅这一时期的努力却是他后来文学活动的必要准备。

1909年8月,鲁迅因家庭经济上的需要而回国谋职,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0年7月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监学(教务主任)。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和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不久,任绍兴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作品通过一个市镇的一次由谣传引起的混乱,简练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养成的生存方式。小说虽用文言写成,但其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已完全具备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性质。

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随部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等职,主管文化及社会文化设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国旧文化的顽固性。鲁迅一时找不到攻击旧文化的机会和战友,直到1917年,他还常常感到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为了排遣苦闷,他便在公余时间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阅读佛经。但他并未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怀疑自己的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时期他虽然很少发表文章,然而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

体察和思考。

中国民主革命的连遭挫折，使越来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开展一场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必要性。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发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等人又发动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早就立志于中国文化改革的鲁迅终于找到了战友和大显身手的机遇，开始了他创作的丰收期。

1918年初，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五四时期，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等多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地震撼了当时进步知识青年的心，同时也最早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除小说创作外，当时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相当数量的"随感录"。这些文章或者系统地驳斥男子本位、长者本位的封建道德，或者针对保守派的种种谬论作脱手一掷的迎击，都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五四高潮过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但他这次没有再放下战斗的笔。1922年初，当穿着西装革履却从事复古活动的"学衡派"趁新文化立足未稳而发起进攻时，鲁迅立即写了《估〈学衡〉》等杂文，抨击了这股复古思想。从1918年到这时他所写的各类杂文收在杂文集《热风》和《坟》里。

1923年,鲁迅将他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该书在1930年第13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不周山》一篇)。《呐喊》以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启蒙主义为宗旨,以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冷酷性、陈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弱点,同时也赞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泯的儿童和淳朴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还艺术地再现了革命先驱在当时的艰难处境。《狂人日记》通过一个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义者的独特视点,揭发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实,并通过这一可怕事实与家族制度和礼教之间内在联系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孔乙己》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们的毒害。孔乙己虽已穷困潦倒,但仍不肯脱掉那身标志读书人资格却已"又脏又破"的长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顾客们却因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而将他作为取乐的材料。封建等级观念使人变得滑稽,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药》写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医治痨病的药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众与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性格小说。作者着力刻划了阿Q这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压迫、被蹂躏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兽道伦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适应封建吃人社会现实。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其思想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对"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阿Q从实际感受出发也常常觉得"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但他终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观念上否定过封

建制度和文化。阿Q没有理性自我，却有着本能自我。既然不能从理性观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着本能需求去适应那个吃人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底层人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社会现实。他适应现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精神胜利法，即当他在生活中处于困境或遭受失败时，就靠自欺来自慰。因为他常处逆境，这成了他主要的适应方式。另一种是一旦有机会就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去，如革命到来时他便跃跃欲试。但爬上去的可能本来就非常小，阿Q也终于作为替罪羊而被那个社会吃掉了。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文学典型，既生动具体，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鲁迅是怀着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心情来描写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该服膺的兽道文化，怒其适应无法适应的吃人现实，他哀其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处境，哀其终于被吃掉的悲剧命运。鲁迅将阿Q的精神弱点撕破给人看，又将他的尊严和权利践踏给人看，将他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极为感人的悲喜剧交融的审美特征。《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副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学界的注意。大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已经被译为世界各主要语种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声誉。阿Q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在《呐喊》中，《一件小事》、《故乡》、《风波》、《社戏》等作品也都有较大影响。

1924年底，鲁迅参与了《语丝》周刊的创办，并参加了语丝社。1925年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和未名社。这些社团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进步学生反对实行家长式教

育的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正在这所学校兼课的鲁迅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及其后台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运用杂文痛斥杨荫榆迫害学生的行径，批驳其后台章士钊的复古主义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貌似公允实则向反动当局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本性。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难者，对杀人凶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强烈谴责。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在这一系列斗争中，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很快由战友成为恋人。

1926年，鲁迅将他在1924年和1925年这两年中所写的11篇小说编成他的第二个小说集《彷徨》出版。《彷徨》的创作精神与《呐喊》是一致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基本相同。与《呐喊》相比，作者这时已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也更为圆熟，但总的说来，其中作品的影响力要稍逊于《呐喊》中的作品。《祝福》通过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写，有力控诉了封建夫权观念的吃人本质。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后，本想按着封建伦理的要求从一而终，不再嫁人，但由于她这时不仅仍然属于她死去的丈夫，而且还属于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强迫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以便换钱给他的小叔子娶亲。不幸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从此也就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人。有人告诉她，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死后在阴间就会被锯为两半分属两个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惧而死在年终"祝福"的鞭炮声中。在封建夫权社会中，妇女从来不属于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这种夫权制度和观念害死的。

《伤逝》写的是一对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剧。子君不顾家庭的阻拦，怀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定信念与涓生结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为思想追求的顶点，婚后便不思进取，只想依赖着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趋庸俗。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时，他们自主婚姻的行为也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机关辞退，谋生又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只能以离异告终，随之，子君就抑郁而死了。小说借助涓生的忏悔向读者提出两点忠告：第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艺术地显示了作者对于婚恋问题切实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都是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揭示出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初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最终却都败在旧势力手下。作者对他们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对旧势力的鞭笞。

《彷徨》与《呐喊》一样，不仅思想先进而深刻，艺术上也非常精湛和富于创新。它是继《呐喊》之后，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的又一块基石。

1924 年 9 月至 1926 年 4 月，鲁迅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 23 首散文诗。1927 年作者将它们结集出版，并增写了一篇《题辞》，这就是著名的《野草》。《野草》的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其中不少篇什是对于黑暗现实和浇薄的世态人情的揭露和讽刺，但更多的是作者思想矛盾和人格理想的艺术显现。《野草》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讽喻，有拟人，也有写实，但运用最多的是象征，还有不少作品运用象征与梦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野草》里

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独特新颖的构思,每一个构思又都有着深远的含义,令读者惊异而又回味无穷。《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奠基之作。

自1920年秋至1926年夏,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1924年7、8月间,还曾应邀到陕西西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这期间,他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开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先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为了避开迫害,也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在这里他开设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所用讲义1938年以《汉文学史纲要》之名收入《鲁迅全集》。

1926年2至11月间,鲁迅在《莽原》半月刊上以《旧事重提》为总题,连续发表了10篇回忆性散文。1927年将它们编定成书时又增写了《小引》和《后记》,并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10篇散文里,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记叙了自幼年时期直至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经历片断。它们不仅为我们了解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革命的面貌。在这些散文中浸透着作者深切的人生感受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认识:《〈二十四孝图〉》、《五猖会》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仅谴责了封建孝道教育的荒唐,而且也展示了传统教育方式的死板;《父亲的病》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医学的落后,一方面也鞭挞了封建礼教的悖谬;《藤野先生》对藤野先生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表示了感佩,《范爱农》则揄扬了范爱农

对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朝花夕拾》以其记叙的生动和思想的深刻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1927年1月，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教务主任。在这里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较多的接触，对当时中国政治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思想正孕育着新的重大变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反革命的大杀戮。鲁迅一向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坚决拥护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因此当革命的叛变者举起屠刀时，他必然将极大的憎恨投向屠杀者，而对被屠杀者给予深切同情。四一五事变的当天，他向中山大学当局提出营救被捕学生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不久，他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残酷的斗争使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进入了思想和写作的新的时期。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与许广平一起定居在这里，一直战斗到1936年病逝。到上海不久，鲁迅就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28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于他们错误地将攻击的矛头也指向鲁迅，从而引起了与鲁迅的论争。鲁迅联系中国

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对创造社一些成员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左”倾幼稚病进行了批评。这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与创造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翻译并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9年，他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论著。通过学习，他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一个历史唯物论者。鲁迅是带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带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带着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人道主义者的思想遗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他的思想较之当时其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就显得更成熟、更丰厚。1927至1929年所写文章收入杂文集《而已集》和《三闲集》。

1929年9月，儿子海婴在上海出生。

1930年2月，鲁迅发起并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并参与了领导工作。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分析了斗争形势并指明了“左联”工作的方向。“左联”成立前后，鲁迅与其他左翼作家一起，对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撰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批判梁实秋宣扬的抽象人性论，阐明文学的阶级性原理，并指明了梁实秋为资本家效劳的阶级本性。他撰写《“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反动阶级本质和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提倡的文学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宠犬文学”。1931年2月，“左联”成员、共产党员

柔石、殷夫等被国民党杀害。鲁迅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分别在国内和国外发表，控诉国民党，悼念死难者。两年后，又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再一次控诉反动派并纪念亡友。1930 年和 1931 年所写杂文收入《二心集》。

1932 年和 1933 年，鲁迅在文学战线上与“第三种人”和“论语派”进行了斗争。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深刻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反对林语堂、周作人提倡闲适小品，认为那只是文坛上的小摆设，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933 年 1 月，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同蔡元培、宋庆龄等一起，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拘捕无辜，进行种种营救活动。2 月，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华访问，鲁迅写杂文多篇，介绍和赞扬萧伯纳，批驳反动舆论。这一年，鲁迅还写了许多抨击时政的杂文。1932 和 1933 年所写的杂文收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1933 年 4 月，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出版。

1934 年，蒋介石为了从文化上巩固其反动统治，鼓吹以封建教条为准则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在各级学校推行尊孔复古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也鼓吹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王道乐土”，“恢复孔子之教”。鲁迅写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儒术》等杂文，揭露他们鼓吹王道实行霸道的真实面目。“左联”成立后，曾进行长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这时写了

《论“旧形式的采用”》等文,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新旧形式之间的关系。接着,学术界又展开了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门外文谈》和《汉字和拉丁化》等文是鲁迅关于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这一年鲁迅杂文的产量很大,编成《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两本杂文集。

1935 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鲁迅密切关注政治形势的发展动向。当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 10 月到达陕北时,鲁迅致电中共中央,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他热情培育左翼青年作家,为叶紫、萧军、萧红的作品写序,并将他们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出版。当有人试图用“文人相轻”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说法来混淆文化界的是非时,鲁迅写了八节《“题未定”草》和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这一年的杂文结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这一年里,鲁迅还写了 4 篇历史小说《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与 1934 年写的《非攻》和 1927 年以前写的《补天》(原名《不周山》)、《奔月》、《铸剑》一起结集为《故事新编》,于 1936 年出版。这部历史小说集的创作历时 13 年之久,前后写法有很大差异。但总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另外,其中不少作品还有意糅进一些明显的现代生活细节,以引起读者的古今联想和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故事新编》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特点也颇有影响的历史小说集。

1935 年底,鲁迅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但他不愿离开战斗岗位移地疗养。1936 年,他虽在病中,依然勤奋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当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中国文艺界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需建立时，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并正确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澄清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某些不正确的解释，批评了左翼文坛内部的某些不良作风。《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这一年文章的结集。

鲁迅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于 1936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逝世。



第五十章　沈雁冰(茅盾)

沈雁冰,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7 月 4 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父亲沈永锡曾考中秀才,思想倾向维新派,爱好自然科学,曾自学高等代数与微积分。母亲陈爱珠是当地一代名医的独生女,知书识礼,善于治家,有深厚的旧文学修养。幼时的沈雁冰受到开明的家庭教育和旧文学的熏陶。

沈雁冰曾在湖州中学和嘉兴中学就读。这两所中学的校长和多位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学校的革命空气十分活跃。中学毕业后,沈雁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准备将来进文法商科。但预科期满,经济日窘,便没有继续求学,伴随着他的职业和社会活动,他走上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道路。

1916 年,沈雁冰进入当时的"知识之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开始"叩文学的门"时,是以翻译家、理论家、文艺革新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研究外国文学,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借来火种,开通航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沈雁冰对外国文学进行穷本溯源的探讨,自希腊神话、史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的名家巨著、思潮流派、社团事件,如他自己所说是"横贯十九世

纪，直到'世纪末'"。他是站在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点上来俯瞰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

五四时期，流行着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沈雁冰认为，新文学应当是反映社会人生的，因此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是介绍文学艺术，还应介绍外国的先进思想，用以抗议社会的腐败，激励民心，起到"足救时弊"的作用。他说："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他的创作自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腐败抗议。"①

沈雁冰认为，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为了改变国人的文学观念，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他说："我们真正主要的事还是介绍西洋文艺思潮进来，把国人的小说观念矫正一下"②，这是指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一直没有正统地位。关于诗歌，他则说："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感发本国诗的革新"。总之，"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方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③。

1921年，在新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是《小说月报》的革新。这两件大事都和沈雁冰有密切的关系。

1921年初，被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诞生了。沈雁冰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

---

①② 《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③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

统照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揭起“为人生的艺术、建立写实主义文学”的旗帜,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以沈雁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且要改进社会和人生,负起“激励人心”、“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在创作方法上,“注意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这些提法比《新青年》派的文学主张更前进了一步。在“为人生”的大纛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人生进行苦苦的思索,追求着人生的真谛,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小说月报》原是创刊于宣统年间的刊物,十余年来一直被鸳鸯蝴蝶派把持。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接办《小说月报》后,对《小说月报》实行了全面的革新,打开了鸳鸯蝴蝶派这个顽固堡垒的缺口。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革新《小说月报》的意义不仅在于我国从此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学期刊,更重要的是有了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园地。

《小说月报》除发表新人新作外,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叫“海外文坛消息”,它“介绍西洋之新说,以为观摩之助”,“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动向”[2]。这个专栏的开辟,意义深远。它将海外文坛最新动态和大量文学信息介绍进来,犹如一股春风吹进原来闭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大大开阔了中国文坛和中国青年

① 《文学研究宣言》。

②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

的眼界,缩短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有助于中国新文学向世界文学靠拢,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沈雁冰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根据1981年茅盾生前自己选定的译文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篇目,短篇小说方面共翻译过23个国家40个作家的作品;剧本方面曾翻译过10个国家12个作家的作品;杂记、书简、回忆录方面曾翻译过8个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名作家如易卜生、显克微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也有黎巴嫩等小国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

沈雁冰写过许多介绍外国文学概况和文学史、文学流派等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介绍爱尔兰文学、比利时文坛、荷兰诗坛、意大利文坛、澳洲现代诗人、瑞士文坛、近代法国文学、新犹太文学、塞尔维亚情歌、现代捷克文学、未来派文学现状、骑士风的中世纪文学、苏联的文艺阵线、日本的普罗作家联盟、国际反法西斯文学、欧美主要文学杂志、德国流亡作家杂志等等。他的《小说研究ABC》、《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研究外国文学的专著,内容范围之广、覆盖面之宽,为同时代作家、翻译家所少有。

沈雁冰撰写过百部以上外国作家评传和作品评介。1919年,他在《近代戏剧家传》中向读者介绍了34个欧美戏剧家的传略及作品;1920年,他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介绍俄、英、德、法的19个写实派、自然派作家;他写过传略的作家近60人;直到三十年代他在《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两书里系统地介绍了从荷马史诗起到十九世纪西方的39部文学名著。这方面的工作量之大,内容之丰厚,工作之浩繁,在中外

文化交流史上是应当记下一笔的。

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9年间，不仅从事大量的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建树、文艺社团的组建和文艺刊物的革新，同时也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1920年7月，由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发起成立共产党小组，沈雁冰于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小组。次年冬天，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以后，沈雁冰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做掩护，担任了共产党中央的联络员，一方面从事党务工作，一方面编辑《小说月报》，开展了对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的两次论战，发表了不少著名的论文。他的政治生涯虽和他的文学活动紧密联系着，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①。

茅盾经历了从五卅前后到大革命时期一段极其动荡的生活。1924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他与恽代英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左派上海市党部。1925年，茅盾作为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领导了商务的罢工斗争。1926年元旦，茅盾前往广州去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中山舰事件”爆发后不久，他由穗回沪，待革命军攻下武汉，茅盾又到武昌，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则操在共产党手中。报社工作及来自各方面的新闻消息为茅盾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茅盾受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通缉。他在十分愤懑的心情下，从汉口到牯岭，从牯岭回到上海，

① 《从牯岭到东京》。

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① 这就是茅盾开始写作处女作《蚀》时的心情。

《蚀》是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反映了五四以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小资产阶级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他们在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以及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其中,《动摇》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曾受到高尔基的赞许。写的是 1927 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作家取材于湖北某县的政治形势和当时一些未能披露的新闻材料,反映了大革命后期“武汉政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李克为代表的共产党的路线,一条是以方罗兰为代表的汪精卫派的路线。

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茅盾在《蚀》中已经显露了组织概括多方面的社会题材、塑造多种人物形象的巨大才能。《蚀》对于揭露旧制度、旧势力的黑暗,揭示小资产阶级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激发人们对黑暗现实的痛恨等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但是,《蚀》的基调是消沉的,同一时期完成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如此,这和大革命失败后作家的苦闷心情有关。从此,茅盾脱离了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创作。

1929 年 4 月,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捕通缉,也为了让自己

---

① 《从牯岭到东京》。

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茅盾东渡日本，写下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目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①，这就是《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她信仰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正当五四的热潮燃遍全中国时，十八岁的梅行素却由父亲作主嫁给苏货铺的少掌柜、自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将要成为一个偷卖日货的苏货铺的女主人。为了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她勇敢地冲破了家庭的牢笼，走上了寻求新的人生的斗争之路。但是，诡谲多变的现实，颠沛的生活，黑暗与光明交织成她的生命之丝，她恨姑表兄柳遇春，却爱着姨表兄韦玉。韦玉是个软弱的人，他不但不能帮助梅增添斗争的勇气，反而劝她妥协。社会黑暗、排挤诽谤，使梅变得只相信自己，成了得过且过我行我素的“现在叛徒”。正当她凭个人的力量在社会上冲来冲去的时候，她遇到了革命者梁刚夫。梁刚夫帮助她逐渐接近了革命、认识了革命、最后参加了革命。她已经完全不同于《蚀》中的静女士、章秋柳等人，后者自始至终沉缅在追求、幻灭之中，而梅则是虹一样的人物，作家说，“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②，是一个对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在她身上寄托了作家对革命前途的希望和信念。

在日本时期，作家写下许多优美的散文。《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散文既有怅惘、苦闷的情绪，也有对暴风雨和阳光的期待，和小说《虹》一样，是过渡性

---

① 《〈虹〉跋》。

② 《我走过的道路》。

的作品,是作家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

1928年到1929年间,中国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场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茅盾为另一方的论战,文学史上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茅盾积极参与了这一场论战,在论战中,他提出并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描写对象、服务对象问题,这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里一部分人错误地把鲁迅、茅盾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在指责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的同时,把茅盾说成是“不长进的所谓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么,文学作品究竟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呢?描写小资产阶级是否违背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要求呢?描写对象与服务对象的问题便成为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指出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文学的重要课题。创造社和太阳社从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资产阶级,把他们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动者”,把他们从革命军中或同盟军中开除出去,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显然是错误的。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学描写穷苦大众是对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

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是这次论争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如果按照“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去演绎和图解生活,势必产生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只有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才能正确反映生活。茅盾认为,文艺的创造者必须与实际生活建立“极密切的关系”,掌握文艺的特殊规律,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之产生不能不根据三个条件:正确的观念,充实的生活

和纯熟的技术,然而最最主要的还是充实的生活。"① 茅盾的这些论文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盟主,"左联"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领导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伟大的篇章。

茅盾于是年 4 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在创作上,力图开辟新的途径,先是写了《豹子头林冲》、《三人行》两个中篇。他努力克服早期创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社会进行缜密的严肃的观察,终于在 1931 至 1932 年间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巨著《子夜》。

《子夜》涉及的故事情节仅仅是 1930 年 5 至 7 月两个月的社会现实。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子夜。小说展现了在这黑暗的年代里极其复杂尖锐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等等,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广阔而真实的时代画卷,不仅概括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都市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预见了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子夜》的问世,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伟大收获,也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夜》是三十年代都市文学的成功之作。但茅盾的注意力不仅投向都市,也十分关注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下的农村。《春

① 《关于创作》。

蚕》、《秋收》、《残冬》组成的"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多角关系》等中长篇共同构成"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广阔的横断面。

茅盾在三十年代，仍继续他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就已颇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工作，并且逐渐形成自身很有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茅盾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历史内容、时代内容，而且要具有相应的思想深度。历史涵量与思想深度的结合成为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又一特色。从五四落潮以后，茅盾就在思考着如何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心的跳动"，如何反映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以后的人们的心理状况。茅盾敏锐地看到，有些作家随着五四的落潮而落伍了、停滞了，这便是文学史上的"庐隐的停滞"的论断。这一论断是茅盾提出的，不仅道出了对女作家庐隐的万般惋惜，而且总结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创作现象。

茅盾的一生不仅以一个热情的作家身份参与了新文学的进程，而且以一个冷峻的批评家的身份推动了新文学的进程。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尤其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在他的全部文论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左联"时期，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达到了极为圆熟深刻的境地。他是新文学的文艺批评的开创者。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战爆发后，41 岁的茅盾带着一颗苍凉而沉重的心，由上海赴长沙，转武汉，后去广州编辑《文艺阵地》，后赴香港为《立报》编副刊《言林》。此后曾应杜重远之约去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重返内地时路经延安，为鲁艺讲学。当他从延安回重庆不久，皖南事变发生，他又离渝第二次赴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在香港，茅盾是敌伪眼中较大的目标之一，随时都有身陷囹圄的危险。为了从香港抢救出进步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共产党命令东江游击队配合港九地下党组织护送茅盾、邹韬奋、何香凝、叶以群等人离开香港。1942年1月，茅盾等人辗转抵达桂林。

漫长的八年抗战，流亡动乱的生活，茅盾始终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以文学作武器，无情地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揭穿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热情歌颂人民的抗战斗争。他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长篇小说，剧本《清明前后》，短篇小说《委屈》，散文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等。其中，《腐蚀》、《清明前后》、《白杨礼赞》等是本时期的代表作。

日记体小说《腐蚀》写于1941年孟夏。在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上，以日记的主人女特务赵惠明从失足、懊悔到弃暗投明走上自新之路的挣扎过程为线索，尖锐地暴露了蒋介石特务组织的凶残阴险，控诉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对青年的摧残与戕害。

如果说，《腐蚀》是一纸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血泪控诉，抗战胜利前夕写的剧本《清明前后》则是一份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罪行录。它以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为题材，展示了国民党战时首都的“无耻、卑劣与罪恶”。评论界一致认为，这个剧本是一部有着尖锐而又丰富的现实意义的力作。

作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与人民的斗争休戚相关的作家，一方面，他那冷隽而锐利的现实主义笔锋，直接揭露敌人的罪恶与腐朽；另一方面，热情而洒脱地歌颂人民的斗争，《白杨礼赞》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作家借西北高原上傲然耸立

的白杨树的形象，歌颂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人民，赞美他们“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伟岸、正直、朴质、严肃”，“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的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作家用高亢的音调宣称：“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1945年抗战胜利，茅盾整50岁。重庆的文艺界为茅盾庆祝50寿辰和文艺创作25周年纪念，聚集在大后方的作家、学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800余人到会祝贺。

1946年，茅盾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作友好访问。在苏联，广泛接触了文艺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了中苏文化和中苏人民的友谊。茅盾是第一位被邀请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茅盾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重要报告。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准备迎接新中国。茅盾在会上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两个文艺界影响最大的刊物《译文》杂志、《人民文学》杂志第一任主编，同时主持全国文联和作协的工作。

茅盾主持过第二、三次全国文代会、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首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纪念会、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会、全国文教“群英会”及国内外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均发表有重要讲话，指

导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与此同时，他把自己大部分精力用于发现并培养青年作家，如谷峪、王愿坚、茹志鹃、康濯、蒙族的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白族的晓雪都是在他的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茅盾不仅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他积极参加有关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1 年，茅盾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他曾多次出席在莫斯科、柏林、维也纳、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等地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塔什干、开罗等地召开的国际作家会议，曾在北京主持了世界文化名人阿维森纳、雨果、达·芬奇、屈原、哥白尼、契珂夫、席勒、密茨凯维支、孟德斯鸠、安徒生、海涅、迦梨陀娑、陀斯妥也夫斯基、泰戈尔等作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画家、天文学家的纪念活动。茅盾在晚年还接待过许多外国来访者。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行政事务繁忙，但茅盾仍未间断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鼓吹集》、《鼓吹续集》、《历史和历史剧》、《夜读偶记》等文论集相继问世。这些文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有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阐释，有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总结，有对生活、思想、写作技巧的论述，有对民族形式的探讨，有关于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研究，有文艺欣赏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等，是茅盾在新时期的学术新贡献。此外，还有许多散文、杂文、诗词发表。

1981 年 3 月 27 日，茅盾与世长辞。在驰骋文坛 60 多年的岁月里，茅盾为我们留下 1200 万字的著作，《茅盾全集》40 卷于

1997年出齐。

茅盾逝世后，根据他生前遗愿，捐赠25万元稿费作为茅盾文学奖，以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



第五十一章　徐　悲　鸿

徐悲鸿，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7月19日，诞生于太湖之西江苏宜兴屺亭桥镇。其父徐达章为当地著名画家，绘画一宗造物，独喜描写生活中之所见，于山水、花鸟、人物均有造诣，又善诗文篆刻。徐悲鸿6岁起随父读书，7岁习书法，9岁读完《四书》及《诗》、《书》、《礼》、《易》。读至《左传》，终以对绘画的酷爱使父亲深受感动，得以在每日课毕让其临摹《点石斋画谱》中的人物、界画。徐悲鸿从题材丰富、场面宏大的插图中学到了扎实的技法，10岁时，已帮助父亲在画上敷色，并在新年佳节时，为邻居书写对联，并以即景赋诗的才能闻名乡里。在初习画时，他便表现出非凡的形象记忆能力，一次父亲外出归来，问有何客来访，他即将来客形象默画于拇指之上，令人一目了然。

徐悲鸿是家中长子，下有2弟3妹。他13岁时，家乡遭水灾，生活难以维持。父亲携他赴邻近各县乡镇，开始流浪江湖的生涯，为人画中堂、写对联、刻图章，特别是画肖像和祖先像。这对造型的要求很高，在艰苦的境遇之中，徐悲鸿养成了手不释笔的习惯，打下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绘画风格的基础。常年谋食江湖，使他目睹和体验了下层社会人民的困苦，激发了他的正义感，他自刻了“江南贫侠”的印章，在画上署名“神州少年”。这时，

他最大的乐趣是收集强盗牌香烟所附的动物画片，引发了他对动物画的巨大兴趣。

4 年的流浪生活使徐达章染上重病，父子返回故乡。徐悲鸿从此挑起家庭重担。他同时担任了宜兴女子师范学校、彭城中学和始齐学校的图画教员。三校相隔很远，他常需半夜起身，步行数十里到各校授课。他后来喜爱描绘的清冷含情的“月色”，应是对这段艰苦生活的回忆。

父亲去世，徐悲鸿于 1915 年赴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但没能如愿。他以“水尽山穷，仍能自拔，方不为懦”的意志与命运抗争。他的作品《马》得到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的赞赏，他们认为“古之韩干，未能过也”，决定在他们主持的上海审美馆出版发行。徐悲鸿从此开始卖画、教画，并考入震旦大学。1916 年 3 月，哈同花园创立的圣明智大学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以巨幅水彩画中选，被该校聘去讲学、作画，结识了同为该校教授的康有为、陈三立等。康视徐悲鸿为艺苑奇才，请他为自己、亡妻、家人画像，并尽出自己收藏的书画碑版，供其观览研习。通过对哈同花园书画精品的学习和同康有为等鸿儒大家的切磋，徐悲鸿对中国绘画的演变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寻找革新之路。在康有为的指导下，他还遍临名碑，书艺精进。

1917 年，得到圣明智大学的酬金，徐悲鸿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他饱览了日本的美术藏品，觉得日本画家渐脱积习，会心造物，所作博丽繁郁，花鸟画尤为发展；但华而薄，实而少韵，太求夺目，而无蕴藉朴茂之风。于是，进一步地明确了自己改革中国画的主张。他于年底回国。

1918 年 3 月，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参与创建了画

法研究会，并任该会导师。他制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和方法，教授人物画和水彩、素描。在创建大会上，他着重介绍了西洋画的流派与技法特点。在教学中，他强调师法造化和融会中西。他带领学生到崇效寺作牡丹写生，到西山碧云寺等地画山水，去故宫文华殿、苏俄驻华使馆观看中外绘画展览。作为最富革新精神的画家，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在北京大学校刊、美学杂志上撰文，以振聋发聩之声宣讲中国画改革之必要，指出中国画颓败已极，原因在于"守旧"，在于陈陈相因而丧失其学术地位。他特别针对当时人物画的没落，指出"写人不准，少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而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一皱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尖，跳舞强藏美人足，此尚不改正不求进，尚成何学?"他明确提出改革的道路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摈弃抄袭古人之恶习，凭实写达惟妙惟肖之境"。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梅兰芳演出天女散花》、《国民》杂志封面画、《西山古松柏》、《晴岚翠嶂》、《三马图》等。《三马图》虽取传统题材，并用中国画工具写就，但手法全新，画树干皴法纯为独创，巨松伸展枝叶，荫下三马体态各异，造型结合明暗，扬中外绘画之长，弃中外绘画之短，吞吐融浑，自成一家。《西山古松柏》凭借写生使树枝的扭转穿插奇兀而自然，远树以大笔点出，巧妙地运用透视与渲染，加强空间感与质量感。

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的推荐之下，徐悲鸿获得赴法国学习的机会。5月经伦敦抵巴黎。先每日赴各大博物馆，深入研究西方艺术之长，然后入朱里安画院(Academie Julien)习素描

两月，便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入弗拉孟画室。他首次作油画便得到弗拉孟的赞赏，在多次竞试中，他都名列前茅。但他并不满足于在美院的学习，把博物馆中各派大师的作品作为老师，如饥似渴地比较各派的异同和优点，从对委拉斯贵支、约尔丹斯、普吕洞、德拉克洛瓦、莫罗、拉斐尔、伦勃朗、哈尔斯等人名作的临摹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还经名雕家唐泼特介绍，结识了并不在美术学院任教的名画家达仰·布弗莱。达仰以描绘布列塔尼地区农民、渔民生活而驰名欧美。徐悲鸿从1920年起，每周持作品去他的画室求教，并参加在该处举行的每周画家聚会，受益良深，从与贝奈尔、莫尼埃、阿米克等法国名画家的切磋中领会西方绘画的精髓，探索发展中国绘画之所需。

徐悲鸿在欧洲学习期间所作素描、速写达数千幅，大部分是在蒙巴纳斯各自由画室中留下的。他经常每日工作10小时，以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去掌握西方绘画技巧。1921年4月法国全国美展开幕，他从早到晚仔细观摹，当走出会场时，才发现天降大雪，而他整日未曾进食，又无御寒的大衣，顿时腹痛如绞，为此留下肠痉挛症的病根，并经常受到折磨，但他常强迫自己忍痛作画，在现存的一幅素描上有他这样的题字："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可支也。"徐悲鸿在这些习作中，成功地融入东方艺术的美感，精致而雅逸，尽微而致广，风格俊秀，独树一帜。这些素描一般不画背景，而突出线的灵动。线条在表现体积、空间、质感、量感的同时，以粗细、方圆、徐疾、刚柔、藏露的节奏变化，传达独特的形式美感。徐悲鸿还喜用灰色画纸，利用底色而省去一个颜色层次，使画更为凝练。他经常有意削弱明暗对比，以大块略去阴影的手法收言简意赅之效，从而突出物象精神，把壮年

男子的强健、女性的柔润细腻、老人的瘦缩、孩童的稚嫩天真,刻画得真实动人。

徐悲鸿觉得在法国所学仍然有限,1912 年又赴德国,问学于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并在柏林动物园对猛兽作了大量速写,创作了《狮吼》、《奴隶与狮》等素描杰作。他将狮的喜怒哀乐、威严和易刻画得淋漓尽致,传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1923 年,徐悲鸿从德国回到巴黎,以油画《老妇》第一次入选法国国家美展。为了把从古代大师画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画上,他进一步精研素描,在油绘人体时认真作分部研究,务求体会精微。他对每幅重要习作都进行默写,然后对照原画修改,精益求精。1924 年,他已将油画技巧掌握得精通练达,“作画无一致之体,力求简约”,造型设色均游刃有余。“既成,遂得大和,有从容遐逸之乐”。他的油画杰作《箫声》、《远闻》、《抚猫人像》、《马夫和马》、《怅望》、《琴课》均运用丰富的造型手段,宣达不同旨趣。将古典主义的精卓、浪漫主义的激情、写实主义的朴茂熔于一炉。1925 年,徐悲鸿赴新加坡,为陈嘉庚及其所办的厦门大学作画,并在上海展出历年所作,引起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康有为当时写道:“徐悲鸿 10 年前为我及文慎公……写像,惟妙惟肖。其于画,盖天才也。后游日本,又学画于法国德国,深诣 7 年。今归所作示我,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其画固中国所未见,其画派亦中国所未有。”1926 年,徐悲鸿赴布鲁塞尔临画,他很爱鲁本斯的作品,认为他是古今最大色彩画家之一。他在临摹弗兰德斯名家约尔丹斯之作时尤下功夫,每日开馆即入,闭馆方出,中间连一口水都不喝,培养自己吃苦的耐力,以求“立至德,造大奇,为人类申诉”。1927 年,他又游学于意大利、瑞士,赴威

尼斯观提香的《圣母升天图》，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名雕和西斯廷礼拜堂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前流连良久，并赴庞贝古城，领略古代艺术的气氛。在1927年法国国家美展上，徐悲鸿送交的9幅作品全部入选，作品以精湛的技巧和独特的东方韵味获巨大成功，得到很高赞誉。

1927年，徐悲鸿回到久别的祖国，首先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同创建南国艺术学院，推动现实主义艺术运动。徐悲鸿担任美术系主任。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该校旨在"养成能与此时代同呼吸共痛痒的青年，以为新时代的先驱"。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也聘请他为艺术系教授，他提出不能辞去南国的工作，于是半月在南国，半月在中大授课。他从欧洲购回了大量艺术教育所需的石膏模型，包括艺用解剖学的人物、动物模具，亲自撰写美术史教材和艺院建设计划，着手建立系统、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1929年，他就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又以"一口反万众"的坚定态度聘齐白石为教授，并筹建建筑、雕塑学系，极力促进中国美术教学的改革。

徐悲鸿在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投入了紧张的创作活动。他的第一幅巨作是1928至1930年绘制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它取材《史记》，选取了田横与500壮士诀别的时刻，表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画上以大片云朵压向地面，运用蓝天、碧海、白马、红袍造成的强烈对比，加强画面的紧张气氛。画中人物形象的多样和生动开辟了中国画坛的新纪元。画家巧妙地使用了以一当十的构图法，在造成强烈的悲剧高潮的同时达到了画面的奇特平衡，表现出宏伟的中国气派。在二十年代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画创作，也是第一幅油画历

史画杰作,在处理巨大场面和复杂人物关系上得心应手,代表着中国油画的杰出成就。在1928年暑假,他还到福州为福建教育厅绘制了大幅油画《蔡公时被难图》,歌颂面对日军屠刀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

1930年,他创作了巨幅中国画《九方皋》。这幅苦心经营、数次易稿的画作取材于《列子》。画上被伯乐推荐给秦穆公的九方皋正在全神贯注地相马,千里马为遇到知己而欢快地扬蹄嘶鸣。画家通过抛弃外表,直抵本质的相马高手阐明了自己取精用宏的艺术观,抒发了自己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强烈感慨。他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用凡马衬托出良骥。那些无知浅薄而又看不起身为农夫的九方皋的旁观者正好反衬出具有远见卓识而不露声色的智者。画面墨色的安排、线条的运用、虚实的处理均臻于尽善尽美。神情刻划的深入使中国画别开生面。

1931年,徐悲鸿完成了巨幅油画《徯我后》。画面以受到大旱煎熬的百姓期盼甘霖的场面反映着人民反对压迫者,期望光明、解放的心声。土地龟裂,树木枯死,人物瘦骨伶仃,把油画的感染力发挥到极致,令人不觉产生悲天悯人之情。它和《田横五百士》一起,奠定了中国油画的基石,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对中国和西方的艺术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之后,徐悲鸿提出了中国艺术复兴的主张。他把中国艺术教育在新时期的审美原则总结概括为《新七法》,作为完成一个健全画家的定则。它们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在此基础上,他还将艺术教育思想概括为"崇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形成从画品到

画法的完整的艺术理论。徐悲鸿强调崇德性，指出画家的责任是“穷造化之奇，探人生究竟”。要求画家无比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艺术，“不慕时尚，不甘小就，不舍己以循人”，作到人品画品一致。崇文学旨在把我国传统绘画的精华，其中包括“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要求和寄情、托兴手法发扬光大，使绘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致广大，尽精微”不仅是指艺术造型的手法和效果，更是指艺术的精神，那种“水墨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的宏大中国气派。这一宏伟气魄是尽精微的前提，而“尽精微”的功力则来自于艰苦磨练和认识对象的科学态度。“极高明、道中庸”，鲜明地体现出徐悲鸿对中国艺术境界的把握和它与西方艺术的区别。它不因高明而走极端，而是找到通向至善尽美的最佳结合点，在处理线与面、颜色与素描、虚与实、繁与简、写实与写意、形与神的关系上自始至终处于最佳位势，把握美之所在，使司空见惯的事物经高明之手，出人意表地获得更高层次上的大和。这种恰到好处的把握分寸，乃是素养、学识的积累，是画家诸方面才智的总汇聚。徐悲鸿的这一艺术思想和它在艺术教育中的实施，使得中国绘画扭转了因循守旧、僵化衰微的形势，并稳步地向前发展。在中国艺术步入现代的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艺术成就，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从 1933 到 1934 年，徐悲鸿携带中国古今名家画作和自己的代表作，赴欧宣传中国文化。中国绘画首先在巴黎引起震动，法国文豪保罗·瓦洛里为在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举行的这一画展撰写了序言，3000 人参加了开幕式，应观众要求，展览延至 45 天，目录再版 3 次。法国政府购藏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并在外国美

术馆设专室陈列。法国报刊称徐悲鸿为大师，认为他的古柏可与巴比松画派主将卢梭的橡树相媲美。随后，徐悲鸿又赴布鲁塞尔美术馆、柏林美术家协会展览馆、法兰克福国家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获巨大成功。他在米兰王宫和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列宁格勒埃米塔热(冬宫)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展也受到极热烈欢迎。意大利报刊称该展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自马可·波罗以后最重要的事件。埃米塔热美术馆至今仍陈列着徐悲鸿当年与该馆交换的作品。展后，欧洲成立了四处中国绘画的专门展室，介绍、报道中国画展的报纸累计达数亿份。

徐悲鸿从1935年到1938年夏，多次前往广西，帮助筹建美术馆、美术学院和组织第一届省美术展览。并且主持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讲习班，以切实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秀甲天下的阳朔使他激情澎湃，他刻了《阳朔天民》的印章，放舟于漓江之上，创作了驰名中外的泼墨山水画《漓江春雨》。该画纯以墨块写物造型，把水墨画的洇墨、渗透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使鬼斧神工的山丘、错落有致的房舍树木，在濛濛烟雨之中若隐若现。画面几无线条，更无皴擦的痕迹，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美感沁人肺腑，那空灵的山光，荡漾的水影与洒脱飘逸、韵味无穷的用笔，使该作堪称中国山水画之大奇。

抗战开始，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国破家亡的感慨凝于笔端，使他的艺术更加升华。在1938年除夕，他为一位拾破烂的贫穷女子画的肖像《巴之贫妇》，以异常简洁生动的手法抒写满腔的同情。其时，画家居住在磐溪，每日过嘉陵江去中大授课，目睹重庆人民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艰辛，感慨万分，又创作了《巴人汲水》。画面让俯身汲水者处于大角度的短缩透视之中，与

转身上坡的挑水者形成用力方向的强烈对比，并以超长竖幅的新颖构图巧妙地解决了人与环境关系的棘手难题，使它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杰作。在抗日战争中，徐悲鸿的画笔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紧密相连，笔下的形象饱含象征意义，抒发着爱国的情操。他反复创作以狮为题材的寄兴画。《新生命活跃起来》表现睡狮的觉醒，它在穿山越涧，勇往直前；《负伤之狮》双目喷射着复仇的火焰；《狮与蛇》以雄狮侧目鄙视挑衅者来抒发对于侵略者的痛恨；《群狮》则取会师东京之谐音，表现出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对最终胜利的信念和预言。在岩石之巅高啼的雄鸡，勇敢、忠诚，奔向胜利和光明的骏马也都是托兴的最好对象，画家借它们一吐积郁，寄托渴望，把中国文人画借梅兰竹菊以自况的传统大大地提升、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并造就了中国动物画的高峰。《风雨鸡鸣》、《壮烈之回忆》以及作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时的《奔马》都是该时期驰名遐迩的传世之作。

1939 至 1942 年，徐悲鸿几次奔赴南洋，以画笔为民族救亡服务。他在吉隆坡、新加坡、槟城、怡保等地举行了 6 次徐悲鸿画展，将卖画的全部收入捐献给国家，以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和阵亡将士的遗孤。他在新加坡的画展由以陈嘉庚为首的救赈总会主办，售出画作达四、五百幅，在 60 万人口的新加坡就有 3 万多人参观了画展，成为以文化支援抗战的空前盛事。在新加坡，他还创作了以著名街头剧为名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

1939 年 11 月，徐悲鸿应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大学讲学，并在加尔各答和圣地尼克坦举行画展。泰戈尔主持画展开幕并亲笔撰写了画展序言。他写道："中国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在富有韵律的线条和颜色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

消失的远古形象,同时又无损于他自己经验中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让我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美的盛筵。"

在印度,徐悲鸿作了大量的素描、速写,仅画泰戈尔的就有10多幅。他根据自己对诗人的了解完成了中国人物画杰作《泰戈尔》。画中诗人正在凝神构思,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远方理想中的世界,雪白的须发在微微飘拂,执笔的手仿佛随着思想在缓慢地移动,形象极为生动传神。静谧幽深的环境配合着诗人深邃的思想,林中的小鸟好像都停止了歌唱,怕打扰了美好诗歌。在画展结束之后,徐悲鸿前往喜马拉雅山,绘制他构思已久的中国画巨作《愚公移山》。这幅画运用了大量处于剧烈运动之中的真人大小的裸体,造成画面空前的气魄与伟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徐悲鸿以画笔为坚强不屈的同胞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伟大形象。他为这幅画作了100多幅画稿和习作,最后使用了中国画的形式,用淋漓的水墨抒写中国历代画家最感棘手的人体,从而在中国画技法和意境上开辟了新的时代。

在印度,徐悲鸿经常骑马远行,从而细审马的性格神情,笔下马的形象也同时在集中、概括、提炼、升华,形成"徐悲鸿的马"的典型。画家准确地勾出马的骨骼、肌肉的关键部位,用重墨突出刻划头部、四肢、肩、胸、足等传神之处,造型精卓、用笔洗练,体积感、空间感、质量感都意到笔随地显现于富有韵律的墨块之间。徐悲鸿一反中国历代画马的线描工细手法,以大写意的笔法塑造出瘦身、长腿、尖耳、阔鼻、鬃毛飞舞、骨带铜声的英俊形象,同时,也以诗意隽永,寄托高深,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浪漫主义

画家之笔。这些马即是画家的心驰神往，它们或踯躅于旷野山巅，或奔驰于荒原大漠，不受羁绊，憧憬光明。“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天涯何处寻芳草”、“铲尽崎岖大路平”的独特意境赋予了它们永恒的魅力，成为中国艺术的一种象征。

1942年底，徐悲鸿经云南回到重庆，一边继续任教中央大学，一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中国美术学院。1943年夏，徐悲鸿率该院筹备处到青城山写生，居天师洞道观。他以屈原《九歌》为题，创作了两幅气氛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物画。一幅是在幽深山谷之中备感孤独的山鬼，另一幅是在短兵相接的厮杀中为国捐躯的战士，不论是《山鬼》还是《国殇》，画家的悲愤之情都溢于画外。《李印象像》原为《国殇》一画作准备的写生画稿，其流畅有力的线条在造型上起到了明暗渲染的作用，把线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堪称中国白描技法的代表。

在物质条件极艰苦的情况下，徐悲鸿仍然坚持着油画创作。他的手法较之在法国时更加雄浑劲健。《月夜》、《喜马拉雅山之晨》、《银杏树》、《庭院——鸡足山庙宇》、《廖静文像》以类似镶嵌的手法把颜色一块块地摆上画面，产生金石铿锵的效果。在展开色彩魅力的同时，他的油画传达出东方飘逸的形式美和有别于西法的审美韵味。《喜马拉雅山之树》取中国山水画的构图，对树木轮廓的勾勒，枝干的处理，都有中国画皴法之美。《桂林山水》纯以画力写就，运用类似中国石青、石绿的颜色，造成中国山水画的逸雅氛围，戛戛独造，奇美动人。

1946年，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他聘请了许多有能力，有影响的艺术家到校任教，在美术教学中强调以素描为基础。对于学国画的学生，他要求学习画10种动物，10种树

木,10种花卉翎毛,以及界画。在同保守势力进行的关于国画论战中,他向各报记者发表题为《新中国画建立之步骤》的书面谈话,提倡"直接师法造化"。

他还担任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名誉会长,组织该会与北平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的联合画展,展示了反映现实、锐意革新的画风。

1949年4月,徐悲鸿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各国代表欢迎新中国代表团的热烈场面使他心潮澎湃。他创作了人物众多的水墨画《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该年,他还参加了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工作。新中国的成立令他兴奋无比,他以"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的奔马图庆祝新时代的到来。同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在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不曾使他停下画笔,他为众多的工农兵模范人物和著名学者作了栩栩如生的肖像。此时,他的素描凝练之极,运用被称为"黑石头"的四方炭精随手勾出五官轮廓,以粗重的线条略施明暗,在关键部位用手指稍稍擦上几下,便令人物呼之欲出。《马寅初》、《荀富荣》、《李长林》、《戎冠秀》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1951年,徐悲鸿从报上看到鲁南苏北疏导沭河,开凿200公里长的沂河,动员民工近百万的消息,决定去体验生活。他尽管患有高血压症,仍坚持在工地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在劳动现场画速写,收集素材,画了《吕芳彬像》、《任继东像》、《总工程师张瑨》等精采的肖像,并且为工地油印刊物画封面,同普通劳动者亲密无间。回到北京,就在整理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巨幅油画《当

代新愚公》的构图时，不幸突患脑溢血，致使半身瘫痪。

1953 年，徐悲鸿渐能起床行动，便到中央美院为毕业班学生和中央美院及其华东分院的教师进修组上课、改画。9 月 23 日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他担任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当晚突发脑溢血，于 9 月 26 日逝世，安葬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12 月，徐悲鸿的遗作展览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亲临参观，他指着徐悲鸿书写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他赞扬徐悲鸿的作品融会了古今中外的技法，认为他的油画和素描也具有民族风格，是他自己生活年代的一位艺术大师。

徐悲鸿从在欧洲留学时起，便想为中国筹建一座美术博物馆，多方奔走，未有结果。于是求诸于己，“欲精意成画百十幅”，并以自己的全部收入购藏古今佳作。在这一收藏中，有他推测为吴道子手笔，视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有以宣达紧张情绪代表中国宋代人物画高峰的《朱云折槛图》。画家以节衣缩食搜集的这 1000 多件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他自己的 1000 多件国画、油画、素描作品，以及 1 万多件中外美术书籍、碑拓、图片，在他逝世的当日，由家属全部献给了国家。徐悲鸿的故居，北京东受禄街 16 号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1983 年，在新街口北大街 53 号建成了徐悲鸿纪念馆新馆。该馆常年对国内外开放，并在欧洲、亚洲、美洲举办了《徐悲鸿艺术》的回顾展，将这位“中国近代绘画之父”的艺术全貌和创造精神展示于人，引起人们对他深深的怀念。

第五十二章 齐 白 石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星斗塘杏子坞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是家中长孙，而祖孙三代只有一亩水田，祖父、父亲都为人打零工以维持全家生计。他出生时，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是纯芝，又作阿芝；祖父为他取号渭清和兰亭。由于是家中长子，后又以木工为业，故他成为画家后题画时也用齐大，木居士、老木一等名号；还由于居住堂室之名为《寄萍堂》、《借山吟馆》，故又号寄园、寄萍、萍翁、老萍、寄幻仙奴、借山翁。他的正式姓名倒是26岁拜湘潭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文学画时，由老师为他取的，名齐璜、号濒生。"白石山人"则是为他日后在画上题款所起的别号，源于距他家一里之遥的白石铺驿站，而人们在称呼他时却总把"山人"二字省去，久而久之，他也就以齐白石自称了。白石从4岁到7岁随祖父识字，8岁时到作乡村蒙馆先生的外祖父处读书，以《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为启蒙教材，尤其学了《千家诗》，打下了做诗的功底。事实上，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便因家贫而中断了。然而在这一年描红习字的过程中，他的绘画天赋被引发出来。他的第一幅绘画是以薄竹纸蒙在镇鬼降魔的雷公像上所作的临摹。随后，他便把描红本子上的纸撕下

来勾画星斗塘每日可见的一个钓鱼老头，达到了尽现其身形面貌的程度。从此，凡是他看见过的东西，如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蟹蛙蝶雀，都被他收入笔下，画在包过东西的纸上或旧账簿上，从中感受到莫大的兴趣。辍学之后，他每日上山劳作，放牛时，便把书本带在身边，在拾粪、砍柴之后，取来温习。15 岁时，齐白石开始学习木匠手艺，先做粗木活，16 岁时又拜一位擅用平刀法雕刻人物的木匠为师，学习雕花手艺，19 岁出师。齐白石善于从自然中发现美，在雕花时亦富有创造精神。他在"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老式题材中加入了牡丹、芍药、梅、兰、竹、菊、葡萄、石榴、桃、李等花果和从绣像艺术中借鉴的人物，又在老师的平刀法基础上进行研究改进，运用了圆刀法，因此，他所做的精致嫁床、花轿、香案令人赞叹，誉满乡里。

20 岁时，齐白石在一个顾客家中做雕花活儿时，偶然见到一部残缺不全的《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这使他初次比较全面地接触到中国绘画的传统程式技法。他将书借来，每日晚上收工回家之后，便以松油柴火为灯，将薄竹纸蒙于书上，一幅幅精心勾影临描，整整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画谱全部复制一遍。齐白石将它们订成 16 本，作为自己学画的教材。经过一番刻苦的研习，齐白石的造型能力显著提高，雕刻时，比例关系趋向匀称。在雕花之余，他反复地临摹这套画谱，而且加以融会贯通。看了戏台上唱戏的打扮，他便尝试绘画古装人物。平日，他还特别注意相貌异常者，在画神像之时，便将他们放入画中。当时湘潭的民间画师萧芗陔、文少可以画像闻名，齐白石便托人介绍，与他们相识。他们把自己的得意技法都表演给齐白石看，并且详加指点。经过了这样认真的观摹学习，齐白石在画像上便也初入了

门径。

这时,齐白石画得到湘潭名士胡沁园的赏识,他让齐白石在自己的家中住下,鼓励他走以画谋生的道路。胡沁园擅长隶书,并会画工笔花鸟草虫,于是,齐白石便拜胡沁园和胡家的馆师陈少蕃为师,随他们读书学画。他从《唐诗三百首》读起,又学习了《孟子》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感到能够读书真是人生的最大乐趣。胡沁园不仅教授齐白石工笔画,而且把自己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都拿出来让他仔细观摹,同时,还介绍人教齐白石画山水,使他在艺术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十九世纪末摄影尚不普遍,乡村对画像的需求很大,有钱人在生前和死后都要"描容",作为纪念。齐白石从民间画师处学到的技法,结合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手法,给人画像,大受欢迎。从此,他告别了斧凿,开始了民间画师的生涯。

齐白石除了画肖像之外,山水、花鸟、草虫也画得很多,只要是顾客需要的内容,他都尽力去画,力求完美。生活境遇使齐白石养成了勤学苦练的习惯,也使他磨练出对任何题材都不感棘手的本领。有些顾客喜欢较为工细的风格,特别是要求美人图画得细腻精到,齐白石便以精细的手法画了许多古代女英雄,如"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她们既有柔美体态,又有飒爽英姿,画得栩栩动人,以致使作者得到了"齐美人"的绰号。当时也有一些势利眼看不起齐白石的木匠出身,向他订画,却不让他题款。对此,齐白石并不计较。此时他对于诗书画印则愈加下力。他的书法学湖南名家何绍基,诗则直抒胸臆,清丽自然。齐白石还将过往颇密的诗友聚集于五龙山大杰寺,成立了龙山诗社,人称龙山七子。该社又和许多诗友一起,加入了罗网山的罗山诗社。齐

白石热心地为诗友手绘题诗花笺，以淡色的花鸟虫鱼衬托上面的诗句，诗画结合，别致雅逸，更极受诗友们的推重，成为诗社的中坚。

对于与诗画密切相关的篆刻，齐白石亦发愤学习，刻了磨，磨了再刻，使住室周围尽是泥浆。由于所见只有丁龙泓、黄小松的刻印拓片，故从两家入手学习细密刀法。随着眼界的逐渐拓展，学问的不断深入，齐白石的画风从民间绘画向着文人画慢慢地靠近。

1899年，齐白石以诗文画为见面礼，到湘潭城中拜著名诗人王湘绮为师，从而同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一起，成为湖南有名的“王门三匠”。

1900年，齐白石的卖画收入已足以满足家用。他从星斗塘搬出，租下了距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梅公祠的房屋，号“借山吟馆”，以示租借山景以助诗兴之意。齐白石并自盖了一间书房，在里面读书吟作，苦下功夫。由于周围均是梅花，故号“百梅书屋”。齐白石在自述中说：“虽诗境扩，益知作诗之难。多行路还须多读书。故造借山吟馆于南岳山下，熟读唐宋诗，不能一刻离手，如渴不能离饮，饥不能离食。”

40岁的齐白石，已在湘潭遐迩闻名，但作为乡间画师，他的足迹还只限于湘潭附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他接到赴陕为官的朋友夏午诒寄的旅费和聘金，决意前往教夏的夫人学画。这个决定成为齐白石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1902年10月他动身北上，到1909年10月，在7年之中，他五出五归，走了半个中国。眼界的开阔，学养的丰富，使他从画匠变成了画家。

在首次离家的路上，齐白石每见到奇妙景色，便用笔记录下

来。在路经浩渺洞庭时,他画了《洞庭看日图》,在临近古都西安时,又作了《灞桥风雪图》,都是捕捉特殊气氛的精采之作。过年之后,夏午诒入京,齐白石又与之同行,经黄河、华山、嵩山。齐白石体会到吞吐大荒的雄伟气势,作了《华山图》、《嵩山图》。到北京后,夏午诒想要推荐他为慈禧作画,又提议为他捐个县丞,均被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离京后,乘海轮到上海,再转江轮至武汉,于 6 月到家。

1904 年,他随老师王湘绮赴南昌、九江,游庐山,以诗唱答,多次到滕王阁,领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境。

1905 年,他赴广西,观赏秀甲天下的桂林美景,令人目不暇接的奇峰峻岭使他感慨不已,自谓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翌年 8 月,他由桂林赴广东,到钦州兵备道郭葆生处找到随军南下的弟弟、儿子,并留下教画,还时常为郭代笔作画。郭藏有八大山人、徐渭、金农等名家真迹,齐白石皆细心临摹,获益良深。在与郭订了续约之后,他返回故乡,在余霞峰下茶恩寺茹家冲,买了一所房屋,翻盖一新,取名"寄萍堂",书房名"八砚楼",屋内放置着旅行途中购得的八方佳砚。

1907 年,齐白石再赴钦州教画,游肇庆、端溪,并到越南一侧,在芒市见蕉林胜景,作《绿天过客图》。在钦州,他看到荔枝树果实累累,极其入画,从此将它作为自己最喜爱的题材之一。

1908 年,齐白石再赴广州,以卖画刻印谋生。他帮助革命党人,曾在画件内夹带秘密文件。新年以后他再至钦州,过完夏天,又去广州、香港、上海,游苏州、南京。在经过江西小姑山时,他在轮船上第三次作《小姑山图》。10 月,返回湘潭。

在与各地名士的交往切磋之中，齐白石更加感到必须从根本上再下功夫，因此，回到家乡后，每日读古文诗词，并与旧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经常为一字一句而反复推敲。在北京时，齐白石得到李筠庵的指导，书法由爨龙颜入手，走魏碑一路，变得雄朴稳重，刻印则因得见赵广谦的印谱，而由细密变得峻奇。他在画风上的变化尤其剧烈，由工笔茂密而转向了自由奔放的大写意。更重要的是齐白石通过对真山实水的悉心观察和刻划，得出了“山外楼台天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的结论，决心“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在五出五归之中，他三次路经小孤山，有意识地从三个不同角度去审视和记忆其特点，把握住从侧面、正面、背面看时的不同感受，“不用人间偷窃法”。

在借山吟馆，齐白石把游历南北名山大川所得图稿整理重画，于画面的布局构图上反复经营。《滕王阁》使我们看到画家精益求精的苦心。齐白石首先去掉传统山水画的重峦叠嶂和因此而施的层层皴染，以大块落墨直抵佳境。画的底部以粗细均匀之线画出楼阁，中景以淡墨扫出沙滩，加上几株秋树，画的上部则被一座高峰遮掩，只留一小角天空，以示远山无限。画上无一多余之笔，甚至连水的波纹都不画，以空白体现山水一色。尽管已经如此概括，齐白石再画时仍然要求自己更加简赅。这次他取横幅构图，将那一小角天空也索性去掉，使画的顶部是一片远山之底，用几块石头体现出山的质感，中间沙丘上的树用几个墨点来代替，近景的一片楼阁也只剩下一个阁尖，画上十分之九为空白，更显得水面广阔无垠。画家用笔潇洒自如，简洁生动，看去似不经意，实则独具匠心。“雨后云山图”、“米氏山水图”的手法又恰恰与此相反，为了表现雨后的特殊氛围，画家把天空全部用墨

染黑,造成乌云压顶之势,就连土地、河水也都着墨,似被云影笼罩,全画上只有几间小屋的墙上有些许空白,淋漓的笔墨使人感到大雨刚过,空气中尚有水气在流动。"米点山水"虽是汲取米芾的以点造型的技巧,却能加以发展,运用不规则的墨块代替"米点",造成山峦起伏,雨雾迷濛的奇境,把水墨洇化的形式美感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全纸的着墨、大块留白,都表现出画家一扫陈法,勇于创造的精神。

情景交融是齐白石山水画的主要特色。而画家笔下故乡老屋的景致尤为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在屋旁树下,以竹竿当马,夹在腿间的儿童在追逐玩耍,老迈的耕牛卧在阴凉处休息,大鸡带着小鸡在园中啄食,翠柳摇曳,微风和煦。有时,画中没有人物,却在河塘之中游来几只渔鹰或嬉戏的鸭群,更是平添几分恬静宜人的情趣。《携杖图》是这类题材的代表,画中那位携子过桥的老人无疑是画家的自写。幼儿一手持书,一手提着酒篓,正扭头招呼一只不仅不被惊飞,反而尾随而来的鸥鸟。画家让画面上下的松树夹着中间清波涟漪的河水,正是"如斯好景君休去,更有松声学水声"。

7 年的游历,经整理成为 52 幅精品,齐白石将它们编在一起,名为《借山图卷》。又应朋友之邀,费时 3 月,数易其稿,完成了《石门二十四景》。这 76 幅画的意境较前有了巨大扩展,在创作方法上,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强烈的感受和自创的技巧取代了对四王陈法的重复。对于自己所刻的印章,他也经三次整理,编成一本印谱《白石草衣全石刻画》。这样,在 50 岁前,齐白石对自己的艺术作了一次全面总结,他已从自学入门的民间画匠成长为一位具有全面修养和晚清风格,富于创造精神的文人

画家了。

1917年，被兵乱、土匪扰得无法安生的齐白石决定离开湘潭，到北京定居，在琉璃厂南纸铺挂牌，以卖画为生。到京后，他先居法源寺、龙泉寺、石镫庵、观音寺等庙宇，1920年后方得安定。对齐白石刻印十分赞赏但从未谋面的陈师曾此时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拜访了齐白石，在看了画之后，建议他进行绘画的变法。与这位优秀的文人画家的交往切磋，使齐白石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古代文人画的精华和陈陈相因而造成的死板僵化，促使他毅然决定，在近60岁的年纪实行"衰年变法"。他宣布"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并且顶住冷落和压力，以"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气概开始了这一革新。

这次，齐白石是从花卉入手的，以他最熟悉的梅花为突破口，改工笔画梅为写意，进而寻求将浓郁的墨色结合于鲜红的花朵，达到既艳丽又沉着的效果。他使用大红、深红画牡丹、牵牛花、荷花，以浓墨的叶片和焦墨的蔓茎予以烘托，一反中国花卉以往的淡雅、清秀，色呈现出空前的热烈，墨则尽现其层次的丰富，从而在中国花卉的表现上独辟蹊径，闯出了一条"红花墨叶"的新路。这种新型美是民间艺术中色彩美的升华，与文人画的梅兰竹菊表现的孤寂清冷截然相反，它是生机勃发、自由奔放的情感宣泄。这种朴素美的语言一旦形成，便立刻自然而然地扩展到画家其他的非花卉题材上，散发着郁烈的乡土气息，如用大白盘盛的红樱桃，装满藤篮的红荔枝，与莱蔬形成鲜明对比的红辣椒，带着墨叶的红柿子，熟到极点的红寿桃，爬在黄葫芦上的红瓢虫。画家的笔因此伸向了生活的更广泛的领域：被蒸熟了的红蟹，切开下酒的鸭蛋黄，象征大吉利的红桔子，在缸中游动的红

金鱼，油灯燃起的红火苗，甚至逢年过节用的红灯笼、红鞭炮……红与墨便这样，带着民间百姓的吉利喜庆，融会着画家炽热的感情，把中国绘画独特手段的魅力发展到极致。

在使用水墨画的语言来表现新题材时，齐白石在笔墨的运用上超凡入圣，他以浅墨画水中的虾、蟹、青蛙，亦独标新格，自成一派。他的用笔准确而凝练，能够在一笔之中将质量感、体积感、空间感尽数写出，以一当十。他画的青蛙只寥寥数笔，四肢均一笔出之，而形体圆润，有可以触及的逼真感。他画虾一节一笔，虾皮坚硬而透明，使人仿佛看到在清澈的水中运动的躯体。在画蟹时，他极尽用笔急缓、干枯之能事，把不同质感的盖、钳、足画得栩栩如生。

越是生活中熟悉的物品，在齐白石的笔下就越是奇美动人。芋头、南瓜、香菇、白菜都是他最爱画的题材。正由于文人画不敢画或不屑画，无古法可循，也无任何古时的参照，他便画得格外自然。他以横卧的大笔在纸上滚动，画出随风倾斜的芋叶；用干笔淡墨顺纹路勾出菜帮，再以极富变化的酣墨使帮边长上菜叶；以焦墨线勾出菌株，再用浓墨洇出菌盖。运用从笔头到笔根的墨色变化，一笔接一笔地画出南瓜上一块块鼓起的部分，在笔触相交之处自然现出瓜上的硬棱。院角的草堆，捕鱼的网，耕地的犁，墙边吊的丝瓜，桌上放的扇子、剪刀，甚至于向盘中剩菜爬去的昆虫，张网捕捉苍蝇的蜘蛛，都经神奇之手而给人以独特美感，可谓点石成金，展示了中国画可以驰骋的广阔天地，令这一艺术别开生面。

墨线、墨点、墨块是齐白石的主要造型手段，它们组成的节奏韵律便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源泉。算盘方正的形状，平行的算

珠，是任何其他画家绝不会画的，但齐白石不然，他利用浓墨点出算珠，使这些墨点巧妙地形成各种组合，然后，在算盘周围的空间里以记事文字和署名形成墨块，与墨点互相呼应，一下便使画面丰富起来。《柴筢》是齐白石脍炙人口的杰作。画家用焦墨像写字一样地画出硬直的把和呈放射形向前、顶尖向回弯曲的头。走笔时产生的自然飞白鬼斧神工一般表现出筢子的质感，用笔缓涩一些的细线条正是那捆头的麻绳。

齐白石从来不作单纯的笔墨游戏，而是满怀感情地进行创作，七齿柴筢是他小时花七文钱买的劳动工具，也是他与小朋友们做"打柴叉"、"骑竹马"游戏时的玩具，画家对这种不花钱而能玩上大半天的物品充满眷爱，在画它时回味着为一捆柴的输赢而欢呼雀跃的童年，真挚之情溢于画外。

经过变法的齐白石艺术走向了它的高峰。它是诗书画印的统一体，渗透着综合的美感。齐白石刻的印是"我行我道，我有我法，不为摹、作、削三字虚掷精神"。它蕴精美于朴实之中，大刀阔斧，直来直往，劲健雄浑。雕花多年的过人手劲，使旁人需来去纵横的回刀，变成只需横直各一刀，而且不用先描字影，直接刻去，一刀下去，决不回刀。齐白石的画与诗相互配合，密不可分。他画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手摇白纸扇的不倒翁，生动幽默，上面题诗曰："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忽然将汝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借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对腐败官场进行辛辣嘲讽，令人叫绝。《酒醉网干图》也是最具诗情画意之作。画上三分之二是水，三笔赭色出河岸，两笔花青现远山，画家用几笔干墨擦出两座茅屋，勾出停泊岸边的两只小船和架在几株垂杨柳旁的渔网。左上角的一抹红色交待出日暮的时刻。画上一句

游行自在的诗令人回味无穷："酒醉网干，洗足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画上虽没有人，但我们却好像看到了这位打鱼为生，自得其乐而又愤世嫉俗的劳动者。齐白石在这幅画上使用了"本人"的印章，它与晚霞的颜色遥相呼应，同时把画家的出身、情操，乃至喜怒哀乐放入画中，发人奇想，引人遐思。

齐白石的作品经常给观众这种联想美，《蛙声十里出山泉》只使用了最简单的笔墨，在大块浓墨之中留出一缕空白，表现乱石间的一道溪流。几个逗号一般的墨点扭动着，顺流而下的几只蝌蚪活灵活现。画上没有一根线条，只有黑白灰的对比，然而它却使人联想到震耳欲聋的蛙鸣，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墨块在发出声音，而幼小的开始正在预示着蓬勃发展的未来。在另一幅只有三个逗号，几条水纹的画上，作者写了七个大字，让观众和他一起从这几个蝌蚪生出无穷联想："画君不忘学书时"。

通过数十年的创作实践，齐白石总结出了绘画艺术的真谛：展示于人的形象应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家应自然落笔，表达心中追求的形象，它与自然中原来的物象是不似的，因为它经过了从感受到感动、捕捉本质到概括集中，夸张和理想化的过程，然而在具体绘画时又要"在不求似中得似"。他告诉我们既要避免工匠式的描绘，又不要去无中生有地自欺欺人。"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种辩证地、恰到好处地把握具象与抽象，写实与写意的关系，对于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齐白石非凡的艺术成就得到徐悲鸿的极大关注，1929年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多次亲往聘请老画家担任该院教授。他的坚持感动了饱经世态炎凉的齐白石。"三顾茅庐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从此，他每周到学校去为学生上课、示范，给

予传统中国画教学以巨大冲击。但是,同时他也因此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被视为"野狐禅"。齐白石的一首诗形容了当时的孤立局面:"少小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1931 年,在徐悲鸿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齐白石的画集,徐悲鸿在序言中称赞他"具备万物,指挥若定,及其既变,妙造自然"。1933 年,齐白石的杰作《荷花》由徐悲鸿携至欧洲,于是在法国、意大利、苏联等地各大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上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他的作品被法国、德国、苏联的大博物馆收藏,获得极高赞誉。

七七事变之后,齐白石在北平深居简出,在大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声明。在日伪的不断纠缠骚扰之下,1943 年,他又在门上贴了"停止卖画"四个大字,并拒绝去日伪把持的艺专上课。看到汉奸的横行霸道,他便以画老鼠、螃蟹来予以讽刺,题上"看汝横行到几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心情。

抗战胜利后,齐白石重新担任了国立北平艺专的教授,并到南京、上海举行画展,受到热烈欢迎,200 多张画全部售出。琉璃厂的南纸铺重新挂上他卖画的润格。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共进晚餐,并对他的健康和创作非常关心,使他深受感动。经过多年战乱,常常担惊受怕的老画家对安定和平的生活极为珍视。他清理了多年积存的宣纸,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在家里养了鸽子,细心观察它们的体态、动作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捕捉它们既温和又机敏的形象,创作了许多以和平为主题的花鸟画。他笔

下的和平鸽非常美，长翅长尾，宽肩健羽，红爪灰身，老大的眼圈和秀气的喙也都是鲜红的。这些气宇轩昂、勃勃向上的鸽子往往立于一个插满荷花的大瓷瓶前，这是老人利用了中国文化借助谐音寄情托兴的手法，巧妙地以“荷、瓶”隐喻和平，为自己的绘画注入了新的生气。1952 年，为了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齐白石在“丈二匹”的巨幅宣纸上用彩墨创作了《百花与和平鸽》，已年近 90 岁的老人，用整整三天时间，完成的这一巨作，充分展示了他那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旺盛的生命力。同和平鸽一起出现在他笔下的新题材还有《万年青》，那苍翠的大叶簇拥着挺直向上、欣欣向荣的红花，它是画家用自己最美好的艺术语言，从心底发出的“祖国万岁”的欢呼。

1953 年 1 月，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庆祝会和宴会，为齐白石祝贺生日，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0 月，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并担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他在这一年之中，所作的大小画达 600 余幅。

1954 年，在东北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举办了《齐白石画展》和《齐白石绘画展览会》。湖南省人民选举他为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齐白石的艺术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1955 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称号；1956 年，前苏联举行了庆祝他寿辰的集会。世界和平理事会更授予他 1955 年度国际和平奖。

1957 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齐白石担任该院的名誉院长。春夏之交，老画家开始患病，9 月病情加剧，16 日下午逝世。9 月

22 日举行了有周恩来总理参加的公祭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齐白石遗作展览会》，以 580 余幅画作，300 多件手稿、印石、诗笺展示了这位艺术大师丰富多采、创作等身的一生。1963 年，齐白石在诞辰 100 周年之际当选为世界文化名人。在总结自己一生时齐白石曾说："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费了我毕生的精力。"

第五十三章　梅　兰　芳

梅兰芳，名澜，字畹华（或作浣华），一字鹤鸣，小字群儿，江苏泰州人，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祖父巧玲（1842—1882），是清同治、光绪间京剧旦角演员，曾掌四喜班，能戏甚多，也精于昆曲，并有戏班管理的才能。伯父雨田（1869—1912），京剧琴师，精于京胡、笛子，且"六场通透"（京剧场面上任何乐器都能演奏），为谭鑫培操琴伴奏多年，二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并与鼓师李五（李奎龄）并称"三绝"。父竹芬（1874—1897），亦工京剧、昆曲旦角，举凡梅巧玲演的戏他都能演好，可惜英年早逝。

梅兰芳9岁开始学戏，在姐丈朱小芬家由蒙师吴菱仙教授，学会了正工青衣戏30多出。11岁第一次登台，串演昆曲《鹊桥密誓》中的织女。14岁搭班"喜连成"科班演出，与周信芳、林树森、贯大元、雷喜福等合作演戏。同时仍在朱家学戏，向吴菱仙学青衣外，又向其姑丈旦角秦稚芬和其伯母的弟弟丑角胡二庚学花旦戏和刀马旦戏。

他幼时练功，凡是青衣、花旦、刀马旦各种基本功全练，练就了坚实的、深厚的功底，使得他以后演戏能得心应手。

1910年他17岁时，因"倒仓"（青春期变声）而脱离喜连成，

嗓音恢复后又先后搭入鸣盛和科班、双庆班演戏。其时又向他伯父梅雨田学戏，并先后拜王瑶卿、路三宝、陈德霖等为师，学了很多京剧、昆曲剧目。再随武生茹莱卿、武花脸钱金福等练武功和学一些武戏，包括武小生戏。还曾向乔蕙兰、李寿山、谢昆泉、陈嘉梁、赵子敬等学昆曲。后来到上海，又曾与丁兰荪、俞振飞、许伯遒研究过昆曲的身段和唱法。他学昆曲，前后不下七八十出，一来因为当时昆曲已渐式微，他有意加以提倡；二来他为了学习、吸收昆曲载歌载舞的表演特点以丰富京剧艺术。他学昆曲，一面向老师学唱和表演，一面请精于词曲的老朋友讲解唱词，务求字句完全理解，并据以深入体会人物性格，再结合身段研究分析，使演出质量逐步提高。他在练工、学戏的同时，还养鸽子以锻炼眼睛和臂力，养花以培养将各种颜色适当搭配的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他的表演、舞蹈和服装设计等舞台艺术水平的提高。

他从 1915 年开始向王梦白学画，其后结识了画家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徐悲鸿及上海的吴昌硕、汤定之等，切磋中国画艺术。又与收藏家朱翼庵订交，学习鉴赏文物。他非常重视欣赏古画、古文物、古代雕塑等，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从他年轻时起，在他的周围就有一大批文人、墨客和受到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帮助他，有的帮他编写剧本，有的为他搞宣传，有的给他做文墨工作，有的对他的舞台艺术设计和演出提出意见。对他的舞台艺术的逐渐提高起到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

过去，京剧旦角一行，青衣、花旦、刀马旦之间的界限很严格，不许兼演。但是梅巧玲、竹芬父子曾打破界限，青衣、花旦戏都演，而且在演花旦戏的时候，不踩跻，被人讥为“大脚花旦”。尤

其是王瑶卿开始突破藩篱,融花旦活泼、灵巧的身段于青衣和刀马旦的表演中,使原来抱着肚子唱的青衣和偏重武功的刀马旦的演技都有了发展变化。可惜王瑶卿正当壮年时"塌中"(中年嗓败)了,幸有梅兰芳请教他并按着他的路子来完成了他的未竟之功。

1913 年,20 岁的梅兰芳随王凤卿到上海演出,主要是在前场演出,但他不仅为王凤卿配演生旦的"对儿戏",而且还演出了压台的大轴戏,第一次演出了刀马旦戏《穆柯寨》。接着,他又向王凤卿学会了接在后面的《枪挑穆天王》,由王凤卿为他配演,他所塑造的顶盔贯甲的年轻女英雄穆桂英,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在上海演出间隙,梅兰芳还到各剧场去看戏,从别人的戏,特别是夏月润弟兄和潘月樵经营的新舞台和他们演出的一些反映时事的新戏及欧阳予倩等演的文明戏里受到影响。回北京后,他在翊文社班主田际云(想九霄)的鼓励下,试排了一出时事新戏《孽海波澜》。不久他又一次随王凤卿到上海演出,更在剧目、化妆和舞台艺术上接受了不少新东西,对演戏的社会意义提高了认识。1915 年 4 月至次年 9 月间,他排演了各种新戏,同时集中学习了一批昆曲。他排演的新戏有:穿老戏服装的《牢狱鸳鸯》,穿时装的《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着古装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这些新戏的排演,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开了新风,也是他的艺术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

这一时期,他所演出的时装戏,都是取材于现实,旨在警世砭俗,但因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艺术处理上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因而没能流传下来。而他所致力创制的古装戏,一开始就在头饰、化妆、服装、音乐、表演、舞蹈、灯光、布景等

各个方面大胆试验，取得成功。并在其后 10 多年间陆续排演的《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霸王别姬》、《西施》、《洛神》、《廉锦枫》、《太真外传》、《俊袭人》等戏中，在旦角的头饰、化妆、服装等方面进行革新，取得良好效果，影响着整个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以至其他剧种也往往学用。

其后的几年中，梅兰芳继续排演新戏，而且与前辈演员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合作演出，从同台演出和观摩中，他又学到了不少艺术创造方面的学问，使他的演技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发展成“梅派”。

1919 年和 1924 年，梅兰芳应邀两次到日本访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有《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御碑亭》、《贵妃醉酒》、《虹霓关》、《游龙戏凤》、《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洛神》、《红线盗盒》等，都是与日本歌舞伎同台演出。两次赴日，他结交了不少日本文艺界的朋友，并与歌舞伎演员交流演艺，完成了他的预期目的：一方面把中国戏曲介绍到国外；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观摩、吸收外国艺术来丰富中国的戏曲艺术。

二十年代中期，梅兰芳应实业家张謇之邀多次到江苏南通，结识了南方京剧旦角演员欧阳予倩，后来人们并称他们为“南欧北梅”。在二十年代末期，当时的舆论界根据广大观众的评定，把成就较大、排演新戏较多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并称为“四大名旦”。

1930 年，梅兰芳率团到美国去访问演出。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演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刺虎》、《汾河湾》、《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等。在美国

他结识了电影演员卓别林等。美国波摩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还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这一时期,梅兰芳京剧艺术造诣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一个戏曲演员必须要把"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很好地融会起来,熟练地运用到舞台上,与内心的体验成为一致,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内外结合,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够在创造人物的时候随心所欲、指挥如意,达到和谐顺适的境地。他把练会这一本领,列为演员所必须的另一项"基本功",并把这些体会写进他的著作。

梅兰芳十分重视培养京剧艺术接班人的工作。1931 年 5 月,梅兰芳与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学会,展开对京剧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就建立了附设在学会内的国剧传习所,招收了六七十个学生,聘请了王瑶卿、尚和玉等教师授艺,他自己也担任教戏课程。1 年以后他迁居上海,还寄钱来使传习所又维持了 1 年多。他还一直关心"富连成"科班。1936 年他回北平演出时,收了"富连成"科里的学生李世芳、毛世来、张世孝、刘元彤为弟子,并亲自教导他们。其后,为了支持在西安成立的夏声剧校,他建议把剧校调进上海,自己担任了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北京艺培学校筹办时,担任了董事长。他先后为这两所学校奔走呼号,演出筹款。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并不断南侵。梅兰芳乃于 1932 年举家南迁上海。1933 年,为了鼓动抗战,他排演了《抗金兵》,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

1935 年 2 月,梅兰芳去苏联演出。因他表示不愿从陆路经过日寇占领下的伪满洲国到苏联,乃由苏联派来专轮接"梅兰芳

剧团”从上海走水路到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共演出 14 场，演出剧目有：《打渔杀家》、《汾河湾》、《贵妃醉酒》、《刺虎》、《宇宙锋》、《虹霓关》等。在苏联，会见了文艺界、戏剧界的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和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等，相互交流了有关戏剧艺术的意见。在苏联访问结束后，梅兰芳与余上沅继续到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各国参观访问。在英国，他结识了戏剧家萧伯纳和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

1936 年，梅兰芳在上海又排演了激励人们抗敌情绪的新戏《生死恨》，并带到南京、北平、天津、济南、长沙、武汉等地演出。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梅兰芳感到上海也不是可以安居的地方，翌年初即率团去香港演出，并定居香港避难。1941 年 12 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梅兰芳当即蓄起胡须，谢绝舞台。以后日本军方常来骚扰，他又返回上海隐居。南京汪伪政权的汉奸头子褚民谊和日寇几次来逼他演出，均遭到拒绝。不演戏，没有经济收入，他宁可卖房、卖古玩、卖画以维持生活，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他虽迫不得已告别舞台，但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他时常请人吹笛子练唱；自已拉二胡琢磨唱腔；练拳、打球，锻炼身体，以保持自己的体型。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收新艳秋、言慧珠、李玉茹、顾正秋、梁小鸾及汉剧演员陈伯华等为弟子，教授剧艺。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梅兰芳当即高兴地剃须登台，与俞振飞和仙霓社的昆曲演员合作演出昆曲，庆祝胜利。此后又重组“梅剧团”到各地演出京剧。但不久，蒋介石政府又悍然发动内

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他拒绝赴日本为美国的麦克阿瑟元帅和在南京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演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夏衍与戏剧家熊佛西一起动员梅兰芳留在上海,梅兰芳慨然允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兰芳连演了三天戏,热情慰问解放军。第一场演出结束,陈毅市长亲自到后台向他致谢。随后,他还出席了陈毅市长召开的"知名人士"座谈会。

6月下旬,梅兰芳随南方代表团第二团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2日,文代会开幕,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发言中,他强调了戏曲改革问题。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9月初,他与京剧演员周信芳、程砚秋和越剧演员袁雪芬代表全国戏曲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会上发了言,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不久,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安排,迁回北京定居,担任了京剧研究院院长。

1950年7月,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邀请梅兰芳为委员。1950年11月,文化部举行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议主席沈雁冰,副主席周扬、田汉、梅兰芳主持了会议,各地区、各省、各剧种的戏曲演员和戏曲工作者2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部举行的宴会上与所有的代表一一握手并讲话。梅兰芳参加完会议后曾激动地说:"自我演戏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戏曲工作受到如此重视,这不止我一个人,在座的都十分感动。"

在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梅兰芳演出了修改过的《贵妃醉酒》，赢得好评。文化部为表彰他多年的成就，授予他荣誉奖。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不仅出席了历次文代会、剧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而且出席了历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1951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院长；1959年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梅兰芳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坚持演出，他不仅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大城市进行公演，还到汉口、长沙、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南京、扬州、无锡、合肥、济南、蚌埠、南昌和他的家乡泰州等地巡回演出。同时还到各地的工厂、矿山、农村中去演出。1953年，由贺龙任总团长、梅兰芳任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去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演出，回国后又在东北为归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其后他又到广东、福建前线去作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出。这期间，他作了他从未有过的广场演出。他之所以这样深入到军队、工厂、农村演出，是因为他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结果，懂得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他说："解放以后我的舞台生活起了显著的变化，几年来，我遵循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的道路，在艺术实践上作了一些努力，这不仅使我的观众比从前广阔得多，观众的成分起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使我的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

1952年，梅兰芳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同时到苏联参观，并

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联欢晚会演出。1956年,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为副团长兼艺术指导、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演出,团员有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等,在日本各地共演出了50天,受到广大的日本观众的欢迎,对促进中日人民的友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9月,梅兰芳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群英会。翌年,他又以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团员身份随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1960年2月,他又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10周年,第四次到苏联访问。195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的十几年中,梅兰芳的思想认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的艺术水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在回顾自己那些年在各地的演出时说:"在这些演出活动中,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我接受了他们给我的永不能忘的启发和帮助,使我在表演方法上,特别是在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刻画和分析上,提高了一步,加强了我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

梅兰芳对艺术精益求精,愈到晚年愈加执着,在他演出的众多的剧目中,经过他反复筛选,保留下来的一二十出戏都成了千锤百炼的精品。如《贵妃醉酒》、《宇宙锋》、《奇双会》、《游园惊梦》、《金山寺·断桥》、《穆柯寨·穆天王》、《凤还巢》、《霸王别姬》、《洛神》等。他的保留剧目大多是在解放以后进行加工整理的。如《宇宙锋》,这出戏梅兰芳前后演了50年,是他功夫下得最深的一出。他喜欢演这出戏,并且不断听取观众的反映来进行研究改进。他曾演出全本,又曾删去后半,并改动其中人物性格不统一之处,以突出剧中赵艳容的斗争性。到了晚年,他只演其中

最精彩的《修本》、《金殿》两折，经过反复加工，丰富了表演，将赵女对其邪恶阴险却又贪图富贵的父亲的斗争和对荒淫无道的皇帝的斗争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以丰富的表演技巧，表现了她的坚贞不屈，她的机智和勇敢，她的哀怨和痛苦。在《修本》一折中，他逐字逐句分析人物的每一阶段不同的思想感情，把唱腔与表演紧密结合，特别是表现了她为了斗争不得已而装疯时的复杂的感情变化；在《金殿》一折里，他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加强了念白的节奏、气势，并在表演中吸收了男子的动作。大幅度的表演动作，不仅凸显了特殊的环境——高大广阔的金殿，而且把斗争的难度充分体现出来，从而加大了斗争的力度。从这出戏的修改加工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将表演的艺术性与剧本的思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古老的历史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优秀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在京剧舞台上的一切艺术处理都是坚持以美为原则的。即便是戏里表现醉和疯，也必须顾到姿态的美。戏里的每一个身段，都必须做到美观，无论是正身、侧身或是背过身去，同样要注意到使观众看着美观。梅兰芳对艺术追求的锲而不舍，力争他演的每一出戏都能达到完美的地步。

他所创造的美的艺术，为人们所肯定，所赞颂。1955 年 4 月，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举办了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 50 年纪念活动。大会向梅、周二位颁发了文化部授予的荣誉奖状，称赞梅兰芳“是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在戏曲艺术上有卓越的贡献”。中国剧协副主席欧阳予倩在会上作了以《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为题的报告，对梅兰芳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绍。报告中指出梅兰芳成功的秘诀“主要在

于他真正热爱艺术，力求进步，把经过长期的、高度的劳动而获得的艺术成就为人民服务”。指出梅兰芳继承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发展，进行了美的创造；继承了中国艺人的道德传统和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在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进一步靠近了人民；他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以谦逊的态度听取批评，以经常保持与观众的交流。欧阳予倩对梅兰芳的戏德人品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些高尚的品德是值得每一个演员学习的。梅兰芳在会上致了答词，他说：“综合我五十年的艺术实践，我能够告诉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1959年，在新中国建立1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梅兰芳新排演了献礼剧目《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由陆静岩、袁韵宜根据豫剧马金凤演出本改编，郑亦秋导演。献礼演出有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杨秋玲、夏永泉等参加，梅兰芳饰剧中主角穆桂英。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个年已半百的爱国女英雄，他精心设计，在唱腔上，换调创腔；在表演上，不仅把青衣、刀马旦两个行当的表演有机地融会在这个女英雄身上，而且吸收了老生、武生的动作，非常恰当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垂老请缨的英雄形象的创造。

梅兰芳还与他多年合作的老搭档姜妙香、萧长华等一起把他拿手的《宇宙锋》、《断桥》、《洛神》、《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五剧拍成了彩色舞台艺术纪录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

其后又拍摄了彩色戏曲艺术片《游园惊梦》。

梅兰芳把他的舞台生活经历和演出经验、心得写成《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二、三集(一二集由许姬传记录整理,三集由许姬传、朱家溍记录整理)。还出版了《梅兰芳文集》、《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东游记》、《我的电影生活》等书。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68岁。8月10日在首都剧场举行了梅兰芳追悼大会。其灵柩葬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

梅兰芳的艺术博大精深,影响着一代代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以至影响了全国各地方剧种旦角艺术的发展。他的弟子不下百人,其中程砚秋在学他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流派"程派"。魏莲芳成为专教"梅派"剧目的优秀教师。李世芳、张君秋、陆素娟、杨荣环、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杜近芳、关肃霜、沈小梅、顾正秋、杨秋玲、李玉芙等均能传其艺。



第五十四章　周　信　芳

周信芳，原名士楚。原籍浙江慈溪（今宁波市慈城镇），1895年1月1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市）。父慰堂，艺名金琴仙，工京剧旦角。母许桂仙，亦为京剧演员，工青衣。当时社会上视戏曲行当为贱业，曾是官宦之家的周氏家族因此将周慰堂逐出族门，慰堂夫妇于是流浪江湖。周信芳自小随父母流徙各地。6岁在杭州开始学戏，初拜文武老生陈长兴为师，继拜老生王玉芳、邵寄舟为师，这为他日后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年，他便以“小童串”名义登台演《黄金台》中的田法章。小孟七到杭州演《铁莲花》时，就邀他演娃娃生定生，并用“七龄童”艺名。周信芳从此专应各班中所需的娃娃生。当时，以演红生（关羽戏）及徽调衰派老生著称的三麻子（王鸿寿）和以演孙悟空著称的赛活猴（郑长泰）都曾对之有所指点。周信芳不断努力练功，同时从与前辈名家合作演出和观摩他们演戏中悉心体会其中一招一式的细腻之处，学习他们塑造人物的方法。

1906年他12岁时，随父送其师陈长兴到上海。后陈去天津，他则落户上海。三麻子带他去汉口演出，他先演娃娃生，后演老生戏、武生戏，并兼演梆子戏。回上海后，先后加入玉仙茶园、

春仙班，并到南京、苏州、镇江、芜湖等地演出。曾用艺名“万年青”、“时运奎”、“七灵童”，与孙菊仙、林颦卿、李春利同台，受到他们的点拨，并拜“李派”武生的创始人李春来为师学武生戏。其时他还向几位老师学艺，刘双全教他武老生戏，潘连奎教他以念白为主的戏，张和福教他做功戏。在到处搭班的过程中，他曾与花脸刘永春同班，刘永春善于根据人物处理唱念表演，对他影响很大。

他13岁改用“麒麟童”艺名。当时他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搭班演出。秋，曾到烟台、大连、天津各地演戏，一方面为补助家用，另一方面，则为了增长见识，充实自己。

翌年，周信芳进北京。那是“喜连成”科班因为营业不好，邀班外演员搭班演出，听说周信芳能演老生戏、武生戏，还能演老旦和丑角，便专程从天津邀来北京。同时邀来的还有梅兰芳、林树森、贯大元等。周信芳与梅兰芳合演过《战蒲关》、《九更天》等。有周信芳、梅兰芳等人加盟，“喜连成”果然红火起来。周信芳在北京还搭过“得胜奎”科班演出。当时他已是以演做工老生戏为主。一年后，他再到天津与吕月樵、何月山、苏廷奎、金月梅等同班演出。然后再北上，到海参崴、双城子一带演出。这次离沪北行，周信芳不仅观赏到前辈名家谭鑫培、汪桂芬等人的演艺，长了见识，而且参加了金月梅等革新家演的新戏，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

1912年，周信芳回到上海。在新新舞台，他先后与四盏灯（周咏棠）、李琴仙、苗胜春、李吉瑞、孙菊仙、赵君玉、冯子和、老票友江梦花及谭鑫培等同台演出，并专诚向谭鑫培学了《御碑亭》、《桑园寄子》、《打棍出箱》、《打侄上坟》等戏，学习了如何用

眼神、手势、身段、道具等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方法。他此时又参加了冯子和排演的新戏的演出，受到新思想的熏陶。

当时，他受到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当时京剧界的先行者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刘艺舟以及王钟声等人的革命行动和演出进步的新戏给他以直接影响，他自己说："我也被这种热潮卷进去了。"于是在 1912 年与一盏灯(张云青)、林颦卿、赵君玉等演出了《民国花》、《新三国》，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1913 年又与赵君玉等合演《宋教仁遇害》(当时被迫停演，后又与三麻子、吴彩霞等重演)，揭露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卑劣行径。这种以戏曲为武器，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做法，从这时开始，贯穿了周信芳的一生。

1915 年，周信芳 21 岁时，加入丹桂第一台，一直演到 1923 年，并兼任后台经理。这 8 年，是周信芳的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 8 年，他当时已是个成熟的青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戏、演戏，见识很多，实践很多，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戏剧演出上进入了新的阶段，有意识地对戏剧艺术进行革新、创造，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一时期，周信芳的合作者先后有三麻子、冯子和、汪笑侬、欧阳予倩等，他们都是京剧的革新家，是他们参加创建了南派(海派)京剧。周信芳与他们合作演出，一起编剧，一起演戏，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自己也成为一个南派京剧的革新家。

三麻子，周信芳说他"京徽诸剧，文武皆能。红生尤为著名"。说他演戏经常在改，"不改革变化，是不能贡献出他的长处"。说与他同隶丹桂第一台时，"朝夕亲炙，觉其艺术，实有过人之处"。冯子和，周信芳说"他是唱旦的革新家，他演戏不拘形式；戏剧上

故意的做作，被他大胆地革除了不少，完全趋于真实、自然”。周信芳演戏追求真实、自然、生活化，就是从冯子和那里学来的。汪笑侬，周信芳说“他的艺术渊博浩瀚，集各派之大成”，说他的唱“饶有感情”，他的“做工表情以细致逼真、结合剧情著称，实际就是着重刻划人物、演谁像谁的意思”。而且他善于写戏，“通过戏剧来抒发他的爱国热情”。欧阳予倩，既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又曾演过文明新戏，编演京剧更是声名卓著。周信芳说，“他给我国的旧剧带来了新思想、新剧目以及新的表现手法”。这样一些革新家，给周信芳的影响极大。

这 8 年中，据统计，周信芳首演的剧目共 255 出，其中新编剧目 122 出，参加别人的新剧目 87 出。新戏中有不少是连台本戏，有的用了布景，也有的用了机关布景，舞台上出现很多新的事物。他所演的新戏，有不少是他自己编写的。当时他已经“知道世事潮流，合乎观众心理”。其中也包括为了适应上海那一座被称作“十里洋场”的城市的群众欣赏要求的连台本戏。1915 年，他曾与冯子和等演出《中外共和》（即《南北和》），呼吁统一，反对军阀分裂；又演了《王莽篡位》、《疯僧扫秦》；还与欧阳予倩合演了《昏皇鉴》，都是讽刺袁世凯称帝的新戏。1919 年，配合五四运动，他与任天知、王灵珠等合演了《学拳打金刚》。他还与汪笑侬合演了汪笑侬编写的一些“愤世嫉俗”、配合时事的戏，如《党人碑》、《哭祖庙》、《两朝领袖》、《不忍心》等新戏。在那几年中，他向三麻子学了《徐策跑城》、《扫松下书》、《斩经堂》等从徽剧移植来的剧目和关公戏（红生戏），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后来这些剧目成了他的拿手戏。他还向黄（月山）派武生马德成学了戴白髯的武老生戏，使他在这一方面形成自己的特长。为了演出的

需要，他又常扮演一些年轻的角色，文的，武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因此，他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磨练改进，终于创建了一个新的行当——大嗓小生，它既不同于传统小生的大小嗓结合的唱念，又不同于老生的表演，这竟成了他的特有的创造。他除了演老生、小生之外，还演武生、花脸、小丑、老旦，其中既有古装戏，也有时装戏，大大锻炼了他的艺术才能。

为了革新舞台艺术，在表演、服饰、化妆、布景等各方面，丹桂第一台的演职员们都做着各自的实验，逐渐形成了以后台经理周信芳为中心的革新小组。他们互相探讨，各自摸索，反复研究，取得了经验。例如为了演好时装戏，他们试着在没有水袖的时候发展手的表演；不戴髯口改为粘胡子；关羽用五绺髯，不再用原来的三绺等等。他们这些革新的尝试，强调要根据表现剧中人物的需要，试成功了就采用，不成功再改回来，这就突破了一些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框框。周信芳在汪笑侬、三麻子等演出的《张松献地图》剧中扮演刘备，为了既不失其身份，又不至于把剧中主角、身为客卿的张松压下去，他创造了内穿铠甲、外罩官衣的扮像，铠甲因而变化了原形，改成较为轻便、紧凑、抱身的样式，后来逐渐发展、推广，终于成了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改良靠"。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周信芳很重视读书。当他在"喜连成"搭班演戏时，教师萧长华就见他在没事的时候，"总是以书为伴，手不释卷"；后来他在丹桂第一台，又受到汪笑侬、冯子和、欧阳予倩等有文化的人的影响，更是经常带着书下后台，有一点时间都拿出书来读。同时，他还经常对同班的演员讲学文化的重要性，并要他们让孩子多读书，特别强调要演好戏必须要多读书。

1923年2月，周信芳离开了丹桂第一台，北上烟台、天津、大连、北京，与盖叫天、林颦卿合演，演出了他的独家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他还在“二七”大罢工时，排演了《陈胜吴广》，以揭露统治者的残暴。然后又经济南、青岛，回到上海。1925年重进丹桂第一台，演出了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他在这出戏里，扮演过刘邦、韩信、张良、项羽、范增等角色。剧中的《九战章邯》、《鸿门宴》、《韩信》、《博浪锥》、《圯桥进履》等后来都作为单折戏演出了。其后，周信芳一度又离开了丹桂第一台。

1927年，周信芳三进丹桂第一台，在演出连台本戏《飞龙传》、《天雨花》之后，又转入老天蟾舞台，排演连台本戏《华丽缘》。发展到后来，《飞龙传》中的《北汉王》、《天雨花》中的《左维明巧断无头案》、《华丽缘》中的《小春亭》等都成为折子戏的保留剧目。

同年，周信芳加入了田汉主持的进步话剧团体南国社，在欧阳予倩自编自演的《潘金莲》中扮演武松。他与田汉的交往是在4年前开始的，那年他慕名去访田汉，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1930年，反动当局查封了南国社，搜捕田汉，是周信芳设法掩护田汉逃出了魔爪。

周信芳的青年时代，三进丹桂第一台，正是他提高思想，广收博采，积累经验，阔步前进的时期。在他演出的戏中，有不少从内容到舞台艺术都成为当时革新戏曲的典型。在戏曲改革的摸索研究中，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终至创建了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世称“麒派”。

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演了3年多，主要是演连台本戏，如《华丽缘》、《龙凤帕》、《封神榜》。他在《封神榜》一剧中，扮演了姜

子牙、比干、梅伯、闻太师、黄滚、殷郊、伯邑考、土行孙等,不同角色,各有创造,而其中的《鹿台恨》、《炮烙柱》、《反五关》等折子戏,也都成了"麒派"的保留剧目。

从1929年起,周信芳担任了上海伶界联合会的宣传部长、会长,并主持编辑《梨园公报》。此前,周信芳曾在《梨园公报》上发表过评论谭鑫培和为伶人伸张正义等文章,田汉、欧阳予倩也都发表过讨论戏剧运动的文章,周信芳接手后,《梨园公报》更成为探讨京剧改革的园地。

1931年日寇侵华,在九一八事变后40天,周信芳就开始演出了新编的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的头本,以洪承畴降清的故事,鞭挞"不抵抗主义者"和投敌的汉奸。接着又演出了二本,以崇祯殉国来写亡国之痛。三本写爱国才子冒辟疆与爱姬董小宛遭敌人、汉奸所害而生离死别的故事。然后他又把这三本戏改成各自独立的三出戏:《洪承畴》、《明末遗恨》、《董小宛》,并带着这几个剧目和过去与高庆奎合排的《卧薪尝胆》等剧,到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南京、苏州及伪满洲国各地演出。1935至1936年,重回上海,并到杭州、宁波等地演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周信芳正在天津演出,当即停演南下,回到上海,参加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主持的戏剧界讨论抗日救亡运动问题的座谈会,并共同组建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周信芳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上海文艺界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于伶。其后,他为慰问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伤兵,为抗战募捐演出,组织成立"上海京剧界抗敌救亡演出队",还率剧团到胶州公园为坚守在四行仓库孤军奋战的八百壮士慰问演出。

上海沦陷,田汉、欧阳予倩等先后去大后方,周信芳仍坚持

在上海演出。他重组移风社,社内有近200人,以卡尔登戏院为阵地,演出配合抗战的剧目,并藉以维持一部分京剧艺人的生活。从1937年10月,周信芳在这里坚持了4年。他先排演了《亡蜀恨》,这是反映蜀汉时期,主上昏庸,自毁良才,最后投降敌人,导致孤忠殉国的令人痛心的历史故事。排这个戏,意在激励国人要上下一心守土抗战。他又排演了《洞庭湖》,讲岳家军团结军民同御外侮的故事。他又排演了新戏《香妃恨》,这是讲清乾隆帝平回部,掳回香妃,欲纳为妃,香妃不允,因思念故国而伺机报仇,最后为太后赐死的故事。周信芳藉剧中香妃不甘屈服的抗争,来唤起中华民族对侵略者的反抗。他又排演了《徽钦二帝》,周信芳饰演宋徽宗,把一个亡国之君的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剧中还刻画了儿皇帝张邦昌的丑恶嘴脸和爱国恋君的妓女李师师的以死抗贼。当该剧上演时,敌特寄来子弹加以威胁,但周信芳毫不畏惧,仍坚持演了三个星期。后来,周信芳又排演了《文天祥》一剧,演出后,立刻又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禁演。他于是便把《文天祥》与《史可法》作为新戏预告,贴在演出的舞台两侧,让两位民族英雄的名字醒目地映现在观众眼前,以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

他还参加为救济难民义演的话剧《雷雨》演出,饰演周朴园。当上海日伪特务机关要他去演堂会戏时,他断然拒绝。

在敌伪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派姜椿芳与周信芳保持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田汉等回到上海,马上与周信芳取得联系,对他在敌伪统治时期的爱国行动予以充分肯定。田汉有诗称赞梅兰芳、周信芳等:“留须谢客称梅大(按:指梅兰芳抗战八年中蓄须明志的斗争行动),洗黛归农美玉霜(按:指程

砚秋不与日伪合作到北平郊区青龙桥去种田)；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到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会见了上海文化界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周信芳和越剧演员袁雪芬也参加了会见。10月21日，周恩来宴请了周信芳和白杨、黄佐临等。

敌伪统治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上海京剧界的一些进步青年组成了"艺友座谈会"，经常在一起研究京剧改革问题，周信芳对之十分支持。这个会一度被迫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周信芳参加并担任了主持人。这个组织后来改名为"伶界联合会艺友联谊会"，但因与文化界其他七团体联合致电慰问在晋京请愿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的人民代表而被当局查禁。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参加了不少政治斗争，他参与了反内战、争自由宣言，反对演员登记，反对裁撤上海市立戏剧学校，要求豁免娱乐捐和所得税等的签名活动，因而受到了当局的传讯。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裹胁周信芳到台湾，中共地下组织闻讯，让熊佛西与吕君樵及时通知他进行防范。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他就到广播电台广播，表达了他对上海解放的喜悦心情。6月4日，他出席了上海市长陈毅举行的文化界座谈会。7月2到19日，周信芳与梅兰芳、吕君樵、袁雪芬等作为南方代表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周信芳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8月间，周信芳又与梅兰芳一起出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9月间，周信芳又与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

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周信芳当选为政协委员。10 月 1 日，他参加了建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1950 年初，成立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京剧分会，周信芳任主任委员。紧接着，又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周信芳任戏曲改进处处长。7 月，中央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周信芳任委员。8 月，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举办了上海市第二届戏曲研究班，周信芳任班主任。同年 11 月，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周信芳代表华东地区出席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谈了自己对戏曲改革的看法。

1951 年 2 月 4 日，上海市文化局举行了庆祝周信芳演剧五十周年暨戏曲界敬老大会，有 19 个剧种的老艺人 205 人参加。他在会上激动地说："五十多年来，我第一次以最大的兴奋和骄傲，做一个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

周信芳在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兼华东戏曲实验学校校长等众多职务的同时，还坚持演出，并且不断地排新戏，有《秦香莲》、《信陵君》、《闯王进京》等。

1951 年 4 月首演《信陵君》，周信芳在剧中扮演信陵君，当时全国正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这出戏叙述了暴秦侵略邻国，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阐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后，他又代表上海京剧界表示要义演捐献一架"京剧号"飞机，他带头参加义演，率领华东戏曲研究

院演了三天《四进士》,他与梅兰芳、盖叫天演了《龙凤呈祥》,与盖叫天合演了《莲花湖》,与杨宝森合演了《搜孤救孤》等剧目。1953 年 7 月,周信芳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担任副总团长,随团长贺龙入朝鲜,同行的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他们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在阵地上、坑道里、山洞里,到处演出,不畏辛苦,慰问演出达 3 月之久。

1952 年 10 月 6 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周信芳在开幕式上讲话,并演出了《徐策跑城》。文化部为了表彰他多年来对京剧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他荣誉奖(同时获奖者有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这次会演中有 23 个剧种的近百个剧目演出,周信芳观后认为很多地方剧种表现生活更生动、更自由,细腻逼真、感情充沛,认为这是程式化比较严重的京剧艺术应该努力学习的。在这之后,周把自己经常演出的传统老戏和自己的独家剧目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比如在他多年演出的《琵琶记·描容上路》剧中,他不仅充分发挥了他擅长饰演各种老汉的本领,并参考了地方戏的演出,重新塑造了助人为乐的老人张广才,"让这位父执辈的叮咛嘱咐倾吐出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声"。又如《乌龙院》"杀惜"原是以情杀为主要矛盾,解放后,周信芳感到有问题,便停演了几年,但他一直在考虑如何修改,1953 年对剧本进行了几次大修改。修改后的剧本突出了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情节,特别是改写了"刘唐下书"一节,点明他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并以这封信为导火索,将"杀惜"的矛盾集中在因这封信引出政治上的是非上来。这是改得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在同一时间,由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吕仲、陈西汀、严朴、何慢等人协助,整理了《四

进士》、《清风亭》、《鸿门宴》、《打严嵩》、《追韩信》、《徐策跑城》、《赵五娘》、《凤凰山、独木关》、《投军别窑》及《文天祥》等剧本，编成了《周信芳演出剧本集》。随后又将《打渔杀家》、《审头刺汤》、《金殿求计、单刀赴会》、《义责王魁》四个剧本编成《周信芳演出剧本新编》。并将其中《四进士》、《清风亭》、《乌龙院》、《追韩信》、《徐策跑城》、《打渔杀家》、《义责王魁》各剧的剧本及其演出时的唱念、表演、服装、道具等加以研究和总结，由卫明、吕仲记录整理，编成《周信芳舞台艺术》。其后又把这本书的内容与周信芳解放前后所写文章共约五十篇编成了《周信芳文集》。这几本书，从剧本到表演，较全面地反映了“麒派”艺术的特点。

“麒派”艺术被许多评论家认为具有朴实明快，健康生动，苍劲壮美，气象浑雄，富有生活气息，充满进步的、革命的激情，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谨慎的继承传统，又经过大胆的革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理想、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的艺术特点，因而被人们称为是南派（“海派”）京剧的代表。

1955 年 3 月，在他 60 岁那年，华东大行政区撤销，华东京剧团与上海京剧团合并成上海京剧院，周信芳任院长。4 月，为了表彰周信芳与梅兰芳的艺术成就和他们对京剧事业的贡献，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在北京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会上中国剧协主席田汉以《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为题发表了讲话。周信芳致了答词，题为《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培养与领导》。

1956 年 10 月，周信芳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到苏联访问演出。京剧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 9 个城市演出了 53 场，历时 64 天，上演了 26 个剧目。

周信芳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剧种剧目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十五贯》是周信芳向浙江省昆剧团学习的新排剧目，是周恩来总理建议他们学演的。这出戏昆剧团演出时，因改编成功，受到群众欢迎，曾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周信芳演出时，更突出了为民请命的况钟，成功地塑造了京剧舞台上的一个新的清官形象。其后，他又排演了《义责王魁》。这是以评弹艺人刘天韵、蒋月泉说唱的《义责》移植编成的，故事是全本《焚香记》中的一段。改编时，先发动大家来讨论研究，执笔者吕仲又三易其稿，最后周信芳自己又加以删芟充实，自编唱词。这出戏写家人王中仗义面责其主人王魁贪图富贵，忘恩负义，中了状元便休弃原配妻子敫桂英的故事。这出戏由周信芳亲自导演，并饰剧中老仆王中。周信芳向来擅长演老生，在饰演王中时，特地采用了武生的表演来塑造这一人物的刚直、战斗的性格，使这一形象更为丰满。

1959 至 1961 年，周信芳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 1959 年 5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件是 1961 年 12 月，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田汉在纪念会上讲了《向周信芳同志的战斗精神学习》，介绍了他 60 年的活动历程。周信芳在答词中把自己从艺 60 年分成了 5 个 12 年，总结为探新、求新、创新、革新、更新五个时期。他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演出了《打渔杀家》、《乌龙院》、《四进士》，还演了新戏《义责王魁》和《海瑞上疏》。这一出《海瑞上疏》是周信芳为庆祝国庆 10 周年而编排的，由许思言执笔写成初稿，周信芳自己参加修改，自己导演并自任主演。剧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国家兴盛、政治清明，不畏权贵，不顾个人生死，上疏谏诤的刚正不阿、

敢于直言的清官海瑞的形象。

1961年,《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影片(其中包括《徐策跑城》和《乌龙院》两剧)拍摄完成,这是继前几年拍摄的《宋士杰》之后的又一部麒派艺术影片。其后,年近70的周信芳又编演了新戏《澶渊之盟》。这出戏写的是宋辽间的一场战争,刻画了一个忠心为国、举足轻重的重臣寇准。剧本由陈西汀编写,周信芳仍是亲自修改,自任导演,并主演寇准。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决定请周信芳为顾问。他在会上提出京剧演现代剧要从生活出发,向传统借鉴。在闭幕式上,康生点了田汉、阳翰笙、孟超的名,说他们的作品是向党进攻。翌年,1965年10月,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海瑞罢官》是吴晗编剧,马连良主演的),文中点到了《海瑞上疏》。紧接着张春桥到上海京剧院,当众指出周信芳搞的《海瑞上疏》是反党的大毒草。1966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说《海瑞上疏》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5月1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0天之后,5月2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更进一步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这篇文章中公开点了周信芳和支持这出戏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名字。

紧接着,周信芳的家被抄,人被押上高架线路修理车在全市游街示众,批斗会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开个不停。1968年11月,周信芳被捕入狱,到第二年才获释回家。1974年,"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将周信芳开除党籍、定为反革命分

子的处理决定,因周信芳不予接受,后才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5年3月8日,周信芳被迫害致死。终年80岁。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8月16日,上海市各界人士700余人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周信芳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第五十五章　数　学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在1919—1949年的三十年间，尽管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国数学仍然获得了重大的进步。如果说二十年代中国各地纷纷举办大学数学系，已能够培养自己的数学专业的学士，那么到了三十年代，中国一些大学的数学系已达到培养数学硕士的水平。而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地的数学研究水平，已能够培养数学博士。数学事业主要是智力竞赛，较少依赖投资和添加设备。因而，中国数学界通过自身的努力，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努力创造国内外有利数学发展的条件，使中国数学较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数学教育

辛亥革命后的1910年代，中小学的数学教育已渐趋成熟。到了二十年代，实行和美国一样的六、三、三学制。数学教科书除国内名家编写的以外，多采用美国和英国的教科书，如温德华(Wentworth)的初等几何、初等代数，范(Fine)氏大代数，郝奈(Hall and Knight)二氏的高中代数等。这一时期中小教育的代

表人物有傅种孙(1898—1962),他于1920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后接任系主任。由于长期在师范学校工作,对初等数学亦有深入研究。他多次主持中学理科教员暑期讲习班,对中学数学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经过中学数学教师的不懈努力,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中小学数学教学水平已相当高,"与欧美日本并驾齐驱,并不逊色"[①]。

1920和193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学纷纷成立数学系,并聘请一些留学国外的著名数学家前来主持。姜立夫于1919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创立数学系。1921年,熊庆来、何鲁先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兴办数学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昭安(1892—1978)到武昌大学(后为武汉大学)任数学系系主任。1926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的魏嗣銮(1895—1992)应邀到成都大学(后为四川大学)任教授、数理系主任。陈建功(1893—1971)和苏步青(1902—)分别于1929年和1931年获得日本东北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并先后来到浙江大学主持数学系。此外,胡明复、胡敦复在上海创办大同大学数学系。也是哥廷根大学博士的朱公谨(1902—1963)在光华大学任数学教授。冯祖荀一直在著名的北京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1930年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江泽涵(1893—1994)的到来,使北大的数学阵容大为增强。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大学中,数学系的力量以清华大学为最强。1926年,熊庆来、郑桐荪创建清华大学数学系,孙光远(1900—1979)和杨武之(1896—1973)于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

① 魏庚仁:《魏庚仁数学教育文集》,河南教育出版社版,第164页。

获博士学位之后，都来清华任教授。此外，年轻的教员有周鸿经(1902—1957)和唐培经(1903—1990)。陈省身(1911—　)于193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因师从孙光远来到清华，成为中国第一名数学硕士研究生。华罗庚(1910—1985)自学成材，为清华数学系同仁所赏识，由系主任熊庆来邀请来校任助理员。加上极有才能的许宝騄(1910—1970)和柯召(1910—　)成为清华的学生。这一阵容，可称群星璀璨，在三十年代初，极一时之盛。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3个数学系也合为1个，由江泽涵、杨武之、姜立夫担任系的领导工作。当时著名的年轻教授有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等。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相当匮乏，但数学科研和教学水平却非常之高。他们的科研成绩已跻身于国际前列，加上学生学习十分努力，所培养的学生实际上已达博士学位的水平。陈建功、苏步青在浙江大学(撤退到贵州湄潭)，也在数学上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此外，撤退到兰州的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继续培养数学教师。何鲁领导的重庆大学数学系，魏嗣銮所在的四川大学数学系，熊庆来为校长的云南大学，也都在战争年代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数学教育更注重于在工农群众中的普及，并提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比较正规的中小学里，基本上仍使用国统区的数学教材。而在农民识字扫盲班、农村冬学班、战士学习班等的教学中，也多少有数学的内容，包括度量衡换算、买卖记账、土地丈量等实际数学问题，以满足革命进程中的实际需要。

1940年夏，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设立了自然科学院，院

长徐特立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习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数学。自然科学院内设有大学本科,分物理、化学、生物3个系。当时的物理系设有微积分、微分方程等数学课程,负责数学课程的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孙鸿儒,物理系系主任阎沛霖也教数学,所用课本大都使用英文原版。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的中外数学交流

中国现代数学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初能懂得微积分的人仍然屈指可数,与西方的差距在200年以上。因此,派遣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和进修,是发展中国现代数学的必要举措。经过中国知识界的不断努力,列强所获得大笔超额支付的庚子赔款,终于有了部分的退回。这笔中国人自己的钱,能用于培养自己的留学生,对科学发展是很有价值的。自1908年美国部分退回庚子赔款以来,中国已连续派遣三批留学生到美国,并建立清华学校为留学预备学校。清华学校1926年起改为清华大学,清华的数学系因经费充裕,渐渐成为国内数学中心。1924年以后,美国退回全部庚款,建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继续资助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其中包括陈省身到汉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去巴黎访问,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数论,江泽涵到美国哈佛大学以拓扑学研究获博士学位。从1930年代起,英国也退回了一些庚款作为中国学生的留学费用。吴大任、许宝騄、柯召、李华宗、林家翘、段学复等,都是用英庚款在英国(或转至美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的。樊墀则是以法国退回的庚款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其他渠道到国外去的数学留学生也有很多。据统计,

1949 年以前，在国外以数学工作获博士学位的有 85 人。这些到国外留学的年轻数学家，日后都成为中国数学的中坚，有一些则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声誉。

与此同时，许多外国数学家也陆续来华访问。最早来中国是曾任法国国务总理的潘勒韦(P. Painleve 1863—1933)和他的秘书波莱尔(E. Borel，1871—1956)，他们都是国际著名数学家，1920 年来中国考察教育时，曾在北京、上海作报告。

1921 年，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B. Russel，1868--1970)来华访问，他曾作过有关"几何基础"的报告，但主要的影响在哲学方面。

进入 1930 年代，来访的数学家逐渐增多。先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布拉希开(W. Blaschke，1885—1962)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教授微分几何和积分几何，对中国几何发展影响较大，陈省身，吴大任等青年学生也参加听讲。由布拉希开介绍，汉堡大学年轻的斯披涅儿(E. Spernier，1905—1980)教授也来华讲授拓扑学和几何学。1934 年 4 月，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伯克霍夫(G. D. Birkhoff，1884—1944)在清华大学讲学。1934 年秋，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奥斯古德(W. F Osgood，1864—1943)来北京大学访问，讲解力学，并开设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等课程。

清华大学也邀请国外数学家来访。1936 年，法国著名数学家阿达玛(J. Hadamard，1865—1963)到清华大学访问三个月，他讲授的偏微分方程课，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开出来。清华 25 周年校庆时，阿达玛教授曾作"关于数学任务的几点感想"的报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纳(N. Wiener, 1894—1964)教授的来访,是中外科学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1935到1936年的一年中,维纳主要在电机系上课,并和李郁荣博士一起合作研究。同时他每周在数学系讲授富里埃级数、富里埃积分、勒贝格积分等课程。在清华期间,维纳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作为控制论学科的奠基人,维纳写道:“我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件事:同布什(W. Bush)所拟订的计算机计划密切接触,以及和李郁荣博士在电网络设计上的合作。这两件事后来都证明是重要的”①。

第三节 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数学研究成就

经过1920年代的准备,中国现代数学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不少人到国外留学或进修,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逐渐达到了世界上某些数学学科的研究前沿。一批数学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数学界的重视。

最先达到国际水平的数学研究成果,应是陈建功在日本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收敛富里埃级数的函数类》②。文中证明了,一个函数的富里埃级数是绝对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它是杨(Young)氏函数。这一结果,恰和当代著名英国数学家哈代(Hardy)和李特伍德(Littlewood)同时得到,因而值得重视。

陈建功,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他从1912年起,三次到日

---

① 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62版。

② 陈建功:On the Class of Functions with Absolutly Convergent Fourier Series. Proc. Imp. Acaol. Tokyo. 4(1928)517—520。

本留学，最后于1929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用日文撰写的著作《三角级数论》，一直是日本的标准著作。1930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是我国调和分析、逼近论研究的一位先驱。

苏步青和陈建功一样，也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1931)。当时他已在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上发表了41篇论文。回国后，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并由陈建功推荐担任数学系主任多年。苏步青是我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和陈建功所领导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成为我国南方的数学研究中心。

在1930年前后，中国数学家已有许多创造性的论文在国外发表，其中包括孙光远的微分几何研究、杨武之的数论论文、江泽涵在拓扑学方面的工作、熊庆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半纯函数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已开始登上国际舞台。

更年轻的一批数学家，则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华罗庚是一位传奇式的数学家，他生于江苏金坛县，15岁就在父亲开的杂货铺里做伙计，受初中数学老师王唯克的影响，开始自学数学。1930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诸位教授的注意。系主任熊庆来出面邀请华罗庚来清华任图书管理员，旁听系里的所有数学课。开始时，他在杨武之指导下研究数论中的华林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引起世人注目。1936年，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解析数论方法，并以高度的证明技巧解决了一系列的难题。1937

年回国之后,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继续研究,写成名著《堆垒素数论》,以后又在代数学、域论、矩阵几何、多复变量理论等多方位地开拓,成为驰名世界的数学家。

陈省身生于浙江嘉兴,长于天津。1926年入南开大学数学系随姜立夫学习几何。1930年来到清华,成为孙光远的硕士研究生,研究微分几何。1934年去汉堡大学留学,两年后获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在大几何学家嘉当(E. Cartan)处访问研究,得益极大。此时,他发表的论文已引起美国著名数学家维布仑(Veblen)等的注意。1937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授。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维布仑主持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陈省身赴美研究。在那里,陈省身完成了高维"高斯—邦内"(Gauss-Bonnet)公式的证明。这一划时代的工作,使他成为大范围微分几何的奠基人。1948年后去美国。

许宝騄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1930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36年留学英国,先后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1940年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他以十分精湛的数学方法,证明了数理统计学的一些基本定理,澄清了英国费歇尔(R. Fisher)学派一些模糊不清的论述,被誉为"数理统计学严密性的一个典范"。

其他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数学家还有曾炯之(1898—1940)和周炜良(1911—1995)。

曾炯之是江西新建人,1928年到德国哥廷根大学随著名女数学家诺特(E. Noether)研究抽象代数,1935年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他在函数代数域、可除代数和代数封闭域上有出色工作。1940年病逝于抗战时的西昌。周炜良则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van der Waerden)研

究代数几何学。在这门艰深的学科中，他以周坐标、周形式、周环等诸多工作而闻名于世。1937 年回国后曾任教于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校。1946 年后去美国。

在三四十年代有较好工作的数学家还有：李国平(1910—1995)，主要工作为亚纯函数论研究。李华宗(1910—1949)，在微分几何、李群、群表示、算子理论上都有建树。柯召在代数数论方面有优异成就。

1941 至 1946 年间，国民党政府曾颁发六届国家学术奖励金，获一等奖的有：华罗庚(数论)、苏步青(微分几何)、陈建功(三角级数)、王福春(三角级数)；二等奖的有：许宝騄(统计)、周鸿经(三角级数)、钟开莱(概率论)、李华宗(矩阵论)；三等奖的有：王福春(三角级数)、卢庆骏(三角级数)、熊全治(微分几何)、张素诚(微分几何)、吴祖基(微分几何)、蔡金涛(代数)、胡世华(逻辑)。

进入四十年代，一些更年轻的数学家作出新贡献：分析学方面有程民德(1917—　)研究逼近论，代数学方面有段学复(1914—　)的李群李代数的研究，王湘浩(1915—1993)的代数数论研究，几何学方面有严志达(1917—　)的李群与积分几何的工作等。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后到国外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有林家翘(1916—　)，1933 年入清华大学，后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和天体力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樊畿(1914—　)，1932 年入北京大学，以后留学法国，并到美国任大学教授，在泛函分析、数理经济学、运筹学等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王浩(1921—1993)，1939 年考入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后到哲学系做逻辑方面的研究生，后来到美国，在数

理逻辑、人工智能等方面有杰出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它的奠基人是李俨和钱宝琮，他们用现代数学方法研究祖国传统数学，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李俨(1892—1963)，福建闽侯人。他是一位铁路工程师，业余从事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1915年和1916年先后发表的《中国数学史余录》和《中国数学史源流考略》是这方面最早的文献。他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古算著作，撰写的100余篇论文编为《中算史论丛》共五集。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研究员。钱宝琮(1892—1974)是浙江嘉兴人，在英国留学时学习土木建筑。1912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数学教授。他对中国传统数学的研究十分全面，治学严谨，尤以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工作最为周详精到，令人折服。

第四节　中国数学会和中研院数学研究所

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和一批地方上的高等师范学校。这些高等学校里先后有一些数学和物理的学会出现，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1914)、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1916)、北京大学的数理学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化研究会(1919)、清华数学会(1928)等。这些都是各校自己的组织，没有联合成整体。1929年，冯祖荀等在北京成立中国数理学会，主要由北京附近各校的一部分数学家组成，每年召开年会，宣读论文。1932年，中国数理学会委派熊庆来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中国数学家和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

早期接触。1934 年秋，时任交通大学数学教授的顾澄写信给各地数学家，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数学团体。

1935 年，何鲁、熊庆来分别从重庆、北京来上海，又到杭州，与胡敦复、顾澄、范会国、陈建功、苏步青等商讨成立中国数学会事宜。1935 年 7 月 25 至 27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 33 人。大会议决，由胡敦复、顾澄、冯祖荀、周达、秦汾、郑之蕃(桐荪)、黄际遇、王仁辅等 9 人为董事会董事，胡敦复为董事长。另有熊庆来、朱公谨、范会国等 11 人组成理事会，钱宝琮等 21 人为评议会评议。中国数学会的会址设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美权算学图书室(今上海陕西南路)①。

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还议决出版两种数学杂志：一为《中国数学会会刊》，专登创造性的数学论文，由苏步青任总编辑，华罗庚为助理编辑；另一种为《数学杂志》，为普及性的数学刊物，由顾澄任总编辑。

1936 年 8 月，《中国数学会学报》第一卷在上海出版，1937 年 2 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1940 年出版第二卷第二期。这是我国最早的发表创造性数学论文的杂志，论文多用外文发表，许多论文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至今被人引用。在这两卷中发表论文的有苏步青、华罗庚、胡坤升、陈建功、方德植、曾炯之、申又枨、庄圻泰、江泽涵、许宝騄、吴大任、柯召、李华宗、周绍濂、熊全治、陈省身、周鸿经、周炜良以及阿达玛、维纳等。

---

① 1928 年，周达(美权)将自己收藏的数学书刊 546 种、2350 册捐赠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为纪念胡明复于 1931 年建立明复图书馆，内设美权算学图书室。

《数学杂志》于 1936 年 8 月创刊，第一卷共 4 期，由顾澄主编。第二卷未及出版，抗日战争爆发，顾澄倒向汪伪政权，董事会主席胡敦复联络部分董事和理事，撤销了顾澄的总编辑职务。第二卷第一期于 1939 年出版，以后遂停刊。各期刊物刊载有数理逻辑、数学史、数论、函数论、行列式、排列组合、圆锥曲线等学科中问题的进展介绍和初等证明的文章。

中国数学会于 1936 年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年会，组织论文报告，讨论会务。1937 年之后，各大学相继内迁。1940 年分别在重庆、昆明、上海等 7 处举行第三次年会。由于顾澄倒向汪伪政权，群情激愤，在大后方的会员，遂于 1940 年第三次年会之际，成立新中国数学会，推举姜立夫为会长，陈省身为文书，华罗庚为会计。会址在昆明。1942 年在贵州湄潭举行过年会，1944 年在昆明举行数学等八团体联合年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中国数学会和原中国数学会留在沦陷区的会员都没有进行过活动。1948 年 10 月，在南京召开各团体联合年会，新中国数学会会长姜立夫，原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会长胡敦复到会，陈省身请两位会长讨论恢复中国数学会的事，结果是去掉“新”字，仍用中国数学会原名。此时的国民党统治已风雨飘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数学会再也没有举行过活动。

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的成立，是 1940 年代中国数学界的一项要事。1928 年 4 月，中央研究院成立时，未设数学研究所。1930 年代，中国数学研究实力激增，设立数学研究所势在必行。1941 年 3 月，经中央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1941—1943 年间，研究所聘请 6 位

兼职研究员，即苏步青、陈建功、陈省身、华罗庚、江泽涵和姜立夫。1944 年又曾聘许宝騄、李华宗为兼职研究员。

抗战胜利之后，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建立分院，数学研究筹备处设在上海。1946 年，姜立夫赴美考察，筹备处主任由陈省身代理。陈省身觉得第一要务是培养新人，遂要求各大学推荐优秀学生来所任助理研究员。吴文俊等十余人先后到来，陈省身亲自给他们上代数拓扑学课程，打算以此为起点，向代数、几何、分析等现代化研究方向前进。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划，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1948 年初，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并由上海迁往南京。数学研究所曾聘请陈建功来所工作一年，另聘苏步青、华罗庚、樊畿、许宝騄、周炜良、段学复等为兼职研究员。迁往南京以后，曾聘李华宗为专任研究员，王宪钟、胡世桢为专任副研究员。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数学方面有姜立夫、陈省身、苏步青、华罗庚、许宝騄 5 人当选。

香港开埠 100 余年来，数学鲜有发展，香港大学数学系只设一名教授，多由英国人充任。1948 年黄用諏(1913—　)到校任教，他以英庚款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微分几何学家。

台湾在日据时期，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以农学为主，仅有一名日本人在教数学。1945 年光复时，陈建功、苏步青等曾去接收，将其改名为台湾大学。不久，陈建功、苏步青即返回浙江大学。沈璇(1899—1983)、施拱星(1918—　)、许振荣(1918—　)等留日学者在台湾大学执教数学。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数学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十六章　天　文　学

1919—1949年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时期。在这一时期，老一辈天文工作者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为开创和振兴中国的近代天文事业作了艰苦的努力。他们创办中国天文学会，建立近代天文研究机构和天文教育机构，开展一系列力所能及的近代天文工作，同时创办刊物，编译图书，举办学术演讲，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使中国近代天文事业从无到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为日后中国天文事业的兴旺发达打下了基础。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仪器设备遭受破坏，机构有的内迁，有的瘫痪，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些工作还未得到恢复。

第一节　天文研究机构概观

1. 原有的国立天文研究机构——中央观象台[①]。

在本世纪一十年代末，国立天文研究机构仅有1912年接管

① 本节主要参考：(1) 高鲁：《中央观象台之过去与未来》，中央观象台，1917年。(2) 陈遵妫：《中央观象台》，《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第十编第三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清钦天监后成立的中央观象台1个。该台初期设置历数、气象两科，1921年增设天文科和磁力科，是按当时欧洲一些观象台的组织模式建立的。中国早期其他天文研究机构也大多与中央观象台类似，天文气象不分家，还兼磁力、地震等其他学科。中央观象台成立后，台长高鲁曾努力试图把它办成一个具有近代规模的研究机构。气象科科长蒋丙然(1883—1966)在该台开拓了中国近代气象事业①。但在天文方面却因缺乏起码的经费，最终未能购置一架较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其天文仪器，除明清遗留下来的一批古仪外，只添置了等高仪、六分仪、计时钟和小型望远镜等，无法用来开展近代天文观测。天文科的业务主要是用六分仪和等高仪观测太阳和恒星，以校正计时钟的误差，工作开展不多。中央观象台的天文工作主要是编算历书。历数科从民国元年至十六年，每年编算一部历书。高鲁与历数科科长常福元对编历工作作了三项改革。其一是改用国际上通用的公历。其二是改革历书推算方法。除民国元年和二年的历书仍沿用旧法推算外，自《民国三年历书》起改用各国通行的西方最新之法，即采用纽康的太阳运动表和汉森的月球运动表进行推算，但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没有实现独立的直接推算，而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天文年历按说明书换算而成。其三是将清代历书中附载的迷信内容完全剔除，改以刊载天文常识图说，题材围绕历法常识这一中心选取。此外，还编算出版了民国四年至八年的5册《观象岁书》，模仿外国天文年历，把行星历表也包

---

① 王秀芹：《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先驱——蒋丙然》，《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第1期，第41页，1990年。

括在内,但从民国九年起因财政困难而停止出版。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通过换算而成。从1928年起,编历工作改由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负责,中央观象台建立的一套编算方法也为天文研究所所继承。应该说,中央观象台就其设备和工作的总体而言,还算不上是一个近代天文研究机构。

但中央观象台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发源地。正是由于以高鲁为首的中央观象台全体职员的积极倡议,1922年在中央观象台内成立了中国天文学会。而在此之前的学会筹备阶段,他们于1915年以中国天文学会的名义在台内刊行《观象丛报》,发表了不少天文学专业文章、科普佳作以及天文学史论文,以扩大天文学的社会影响。该刊寄赠单位遍布五大洲,曾相继收到近百种交换而来的刊物。

1923年起,中央观象台因北洋政府经济拮据而日益萧条。1928年北洋政府灭亡后,该台天文部分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接管,在原台址成立了国立天文陈列馆,陈列古代天文仪器、天体模型、天文照片和星图等等,并出售各种天文书刊。

2. 民办南通军山天文台[①]。

位于江苏南通的军山天文台建于1916年,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处于萌芽阶段时出现的一座民办天文台。它是由民族实业家张謇(1853—1926)为发展当地的农业、水利和航运事业而创办的。业务包括天文、气象两部分。业务人员仅4名,台务由刘

---

① 本节主要参考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1页,1984年。

渭清主持。刘毕业于张謇所办的通州师范测绘科，为建军山台曾到法国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学习近代实用天文和气象的观测研究方法。军山台配置的天文仪器有双筒望远镜、经纬仪、天体仪、无线电受信机等，均是委托徐家汇天文台向英、法、德等国订购，并由徐台代为检验，其设备和开展的天文工作均比中央观象台先进。军山台在业务上也与徐台有联系，开展的天文工作包括守时报时；以经纬仪测定地方经纬度和子午线；日月食的推算预报；行星的位置与运动的预报；极光与黄道光的观测；潮汐的测量、研究和预报。此外，还用经纬仪对太阳黑子作过零星的观测，并对黑子的成因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等作过探讨。曾举办测候训练班，教以实用天文和气象的观测方法，搞过许多天文科普宣传。但该台自 1926 年 8 月张謇病逝后因经费无着而每况日下，于 1938 年日军侵占时毁于战火。

3. 青岛观象台的接收和扩充①。

青岛观象台建于 1898 年，初为德国所建，其业务以气象为主，兼作天文、地磁、地震工作。1914 年为日本占领，1924 年归还中国。当时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命气象科科长蒋丙然率员前往接收。接收后由蒋丙然任青岛台台长。在台内设立“天文磁力”和“气象地震”两科，分别由高平子(1888—1970)和蒋丙然任科长。随即开展有关观测，同时大兴土木，建房修路，添置仪器，进

---

① 本节主要参考：(1) 蒋丙然在中国天文学会第 14 届年会所作青岛市观象台工作报告，《宇宙》第 8 卷第 5—6 期，第 85 页，1937 年。(2) 邵元疆、孙寿胜：《青岛观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国科技史料》第 5 卷第 4 期，第 90 页，1984 年。(3) 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1985 年版，第 16—26 页。

一步扩大科研领域。1928 年又增设海洋科。当时青岛台成为中国自己拥有的业务最广泛的多学科综合台。

该台的天文仪器原有 4 厘米子午仪、3.4 厘米经纬仪和 16 厘米盖氏赤道仪。中国接管后,陆续增添了 32 厘米标准天图式赤道仪、8 厘米超人差子午仪、恒星坐标量度仪、等高仪、无线电发报机和电时钟等多种设备。其中天图式赤道仪平行双镜筒,可分别用于照相和目视观测,是 1949 年以前我国掌握的最大的折射望远镜。

青岛台在天体测量方面成绩卓著。开展了测时授时工作,并以无线电、电音授时取代日人的午炮授时以提高授时准确性。曾于 1926 年和 1933 年两次应邀参加国际经度联测①,开创中国参加国际经度联测之先河,并取得国际一流之观测结果,得到国际经度委员会主席的赞扬。1931 年小行星“爱神星”大冲时,该台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李珩(1898—1989)曾负责主持参加该星的国际联测,以确定太阳的视差。此外,青岛台自 1925 年起还开展了中国为时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太阳黑子的系统观测和研究工作,用盖氏赤道仪投影描绘太阳黑子和光斑。还曾积极开展日月食观测、天象预报和编历工作。该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所开展的天文工作可谓我国近代天文观测研究之先导。该台出版有《观象月刊》、《天文半年刊》、《青岛日历》等书刊,其观测报告和学术汇刊与 30 多个国家的 50 多个科研机构进行交换。

---

① 李晓昉:《青岛市观象台参加国际经度测量成绩报告》,《宇宙》,第 6 卷第 4 期,第 61 页,1935 年。

1938年初，青岛台再度被日本占领，中国职员全部撤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归中国。1946年后逐渐恢复测时授时以及太阳黑子的观测工作。

4. 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及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设立天文研究所。所长高鲁是原中央观象台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先驱者。他早就有在中国建造一座可与欧美各大天文台并驾齐驱的现代天文台的愿望①。由于他的积极呼吁和据理力争，天文研究所获准在南京紫金山建立国立第一天文台。但没等该台正式开建，1928年12月高鲁受命出任驻法公使。经高鲁推荐，中央研究院改聘留美归国天文学家、厦门大学教授余青松（1897—1978）为天文研究所所长②。余青松是二十年代国际负有盛名的天体物理学家，而且通晓土木工程，因而对天文台的设计和建筑均是内行，他于1929年夏到南京上任，随即担负起建台重任。紫金山天文台的兴建历时5年，于1934年9月落成。

紫台是在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的历史条件下，由余青松亲自规划、设计，并亲自主持兴建的③。他考虑了现代天文研究的

---

① 蒋丙然：《纪念高曙青先生》，《宇宙》第18卷第7—12期，第129页，1948年。

② 张志明：《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先行者——高鲁》，《天文之星》，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③ 张志明：《胜地几经兴废事　钟山何处是龙蟠——记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者、第一任台长余青松》，《天文之星》，第20页。

四个重要方面，即恒星物理、太阳物理、变星研究和方位天文，为此分别设置了四个观测室：大赤道仪室、小赤道仪室、变星仪室和子午仪室，并为每个室配制了观测所需的当时国际最先进的仪器。大赤道仪室配制的600毫米反射望远镜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望远镜，德国蔡司厂最新产品。其附有双石英棱镜摄谱仪，可拍摄恒星紫外光谱，进行分光光度观测。小赤道仪室上层设置德制200毫米折射望远镜和150毫米天体照相仪，附有太阳放大投影器、日珥观测器和物端棱镜等；下层安装美制海尔太阳分光仪，是专为参加国际太阳分光联测而订购。变星仪室装置美制100毫米罗氏变星仪，是专为参加国际造父变星联测而订购。子午仪室配制瑞士制130毫米超人差自动子午环，可观测天体过子午圈的精确时刻，地下室为恒温钟房。除此之外，还订购了用以测量恒星光谱波长、光谱分光光度、变星亮度等的一些必需的附属仪器。又建立了图书室，内藏中外图书6000余册，每年订购中外杂志30余种，并与世界各天文台及研究机构多有交换[①]。因而紫金山天文台无论就其设备、图书还是规模而论，都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它是我国第一座具有国际先进的天体物理观测设备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天文台，作为该台的创建者，余青松当之无愧地是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但紫台建成后刚有起色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天文研究所携带部分仪器和图书于1938年4月辗转迁至云南昆明。因发

① 余青松：《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宇宙》第6卷第1期，第1页，1935年。

现昆明空气清澄、地势高朗，晴夜又多，宜于天文观测，于是又在昆明凤凰山建立一座天文台。该台也是余青松亲率职员登山勘测，并亲自设计和绘制的建筑图样，于 1939 年 7 月落成。根据搬迁时带来的仪器，建有太阳分光仪室、变星仪室和图书室等。天文研究所随即在该台恢复了中断两年多的天文观测。

1940 年底，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长改聘留美天文学家、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张钰哲(1902—1986)为天文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天文研究所于 1946 年秋返回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全力以赴修复抗战期间被损坏的仪器设备，但天文工作未及恢复又面临解放战争。凤凰山天文台则改为由天文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共有的分支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天文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天文研究所是民国时期负有盛名的天文研究机构。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揭开了我国天体物理研究的首页。该所在紫台和凤凰山台主要开展了两项国际联测项目：太阳的分光观测和造父变星的照相观测。其中太阳的分光观测是用海尔太阳分光仪以氢的 Hα 单色光观测日珥、谱斑、日面爆发等太阳色球层的各种现象，是中国天体物理学领域的一项开创性工作。1942 年 5 月至 1948 年 6 月还在凤凰山台开展过经常性的太阳黑子目视投影观测[①]。此外，天文研究所是中国科学界组织的几次日食观测的主要筹备和参加单位。开展过授时编历和经纬度测量，出版

① 参见李鑑澄：《太阳黑子的观测》，《宇宙》第 14 卷第 10—12 期，第 260 页，1944 年。王鸿升、简恩泽：《昆明凤凰山天文台 1948 年太阳黑子观测报告》，《宇宙》第 19 卷第 1—12 期，第 19 页，1949 年。

过天文年历、航海历、航空历等，对月球、行星、彗星和新星等进行过观测。

5. 全国陆地测量总局天文观测所。

辛亥革命以后，天文大地测量工作多由陆地测量部门担任。1932 年春，全国陆地测量总局在南京大石桥总局内建立了天文观测所，除开展天文大地测量业务外，还供中央陆地测量学校三角科学生实习之用。该所工作由测局三角科科长曹谟主持。置有 50—80 毫米超人差子午仪、时辰摆、时辰仪、记时器、长短波自动记录收报机、45°或 60°等高仪等设备。建所之初，首先测量南京之精确经纬度，将其作为全国测量之原点，以后陆续派员到苏、皖、赣各省测量一、二等天文点之经纬度及方位角。一等天文点的经纬度测量分别用恒星中天法和太尔各特法。二等天文点则用多星等高法。自 1932 至 1937 年，作一、二等天文点测量共 94 点，遍布 13 个省区。曾参加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测量结果颇佳，与青岛观象台同属第一类①。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该所随测局内迁，在贵州平坝县建立一简易观测所，继续进行野外测量。1938 年为抗战所需，赴云、贵、川、湘、桂等省测定一、二等天文点共 34 点。为 1941 年 9 月 21 日日全食观测测定全食带内经纬度 14 点②。抗战胜利后，该所回到南京，因原所址被炸，所内测绘人员借用紫金山天文台子午仪室进行工作。其中部分人员后来成为发展新中国测绘事业的骨干。

---

① 中国天文学会第 14 届年会上该所工作概况报告，《宇宙》第 8 卷第 5—6 期，第 83 页，1937 年。

② 中国天文学会第 15 届年会上陆地测量总局天文工作报告，《宇宙》第 10 卷第 9—10 期，第 139 页，1940 年。

6. 法国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1]。

除上述国人所办的天文研究机构外，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座法国教会创办的近代天文台——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建于1872年。虽然当初建台是为扩大法国对华侵略政策服务的，但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它则是法国科学院在中国从事区域性观测和研究的分支。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为该台的极盛时期，开展了天文、授时、气象、地磁、地震、重力和大气物理等观测和研究工作，是当时东亚地区工作最有影响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和天文、气象中心。

徐家汇台在1926年和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被选为国际经度测量的三个基点之一。1939年起参加国际时间局，为时间的标准台。其天文工作在佘山分台，拥有40厘米赤道式双筒折射望远镜、太阳偏振镜、黑子照相仪、彗星照相仪等设备。开展了对太阳黑子和日珥的研究，银河星团的照相研究，彗星和新星的研究，木星对小行星普遍摄动的研究，对1122对赫歇尔双星的重测。参加了爱神星的国际联测，并编制了包括赤道带±0°50′范围内14000颗星的《佘山星表》。出版的天文刊物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历》等。

该台自1937年起日趋衰落，因战争影响，经费拮据，台内人员散失，大部分工作陷于停顿。但佘山分台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所有观测和研究资料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徐家汇天文台是今日上海天文台的前身，1949年以前虽为法国主办，但先后

---

[1] 本节参考：阎林山、马宗良：《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和发展(1872—1950)》，《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2期，第65页，1984年；朱楞：《徐家汇天文台史料(1872—1962)》，《中国科技史文集》第4集，第198页，1986年。

在内工作的华人约有70名之多，而且当时中央观象台、青岛观象台、南通军山天文台都曾派员去学习①,因而它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近代天文教育工作的进展

这一时期的天文教育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山大学天文系和齐鲁大学天算系。此外,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等校的物理系和中央陆地测量学校等也开设有天文课程和开展一些天文工作。

1926年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在数学系内添设天文课程，将数学系扩充为数学天文系,聘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张云(1896—1958)为天文学教授。张云曾获法国里昂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到中大后开拓和发展了该校的天文教育和科研事业。1929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山大学天文台并任该台台长。台内建有赤道仪室、子午仪室、时计室和放映室,置有德制15厘米赤道仪(附有11厘米天图摄影仪)、德制6厘米超人差子午仪、法制20厘米反射望远镜和15厘米折射望远镜等仪器,而且所藏天文图

---

① 青岛观象台天文磁力科科长高平子曾于1912年到徐家汇天文台佘山分台,在台长蔡尚质指导下学习近代天文学。参见马星垣、高平子:《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军山天文台主任刘渭清曾到徐家汇天文台,在法国传教士马德赉指导下学习近代天文、气象知识。详见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2页,1984年。

表、图书也很丰富①。系内天文课程的设置也逐渐完备。从1932年起，数天系学生三年级后分为数学、天文两专业。1939年时为天文专业学生设置了普通天文学、球面天文学、实用天文及天文实测、光学、近代物理、天体物理和天体力学等必修课程，以及数学物理、理论力学、宇宙论和地球物理等选修课程②。当时中山大学数天系是国内设备最完备、天文课程设置最齐全的天文教育机构。中山大学天文台除供学生实习外，还参加了1933年的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③ 以及中国科学界组织的几次日食观测。开展了太阳黑子的投影观测和变星的目视观测等，承担了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的工作，于1930年2月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

1936年夏，天文台随校址迁移至广州市郊石碑重新建台。1938年广州沦陷后又随校西迁，于1941年迁至粤北乐昌县坪石镇，直至抗战结束后于1945年10月迁回广州。1947年数天系天文专业被划分出来单独成立天文系。据统计，从1933至1949年，天文专业毕业生共44名。其中毕业后从事天文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④。

齐鲁大学成立于1917年，是美国长老会于1864年所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与其他一些学校合并而成。美国传教士在该校

---

① 《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第1卷第1期，第4页，1930年。

② 张云：《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成立十周年概况》，《宇宙》第10卷第9—10期，第131页，1940年。

③ 邹仪新：《中山大学天文台参加万国经度测量报告》，《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第5卷第2期，第39页，1934年。

④ 戴文赛、赵却民、易照华：《天文教育》，《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天文学，1949—1959》，第63页，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编审。

天算系内建有天文台,装置有一架 25 厘米反射望远镜和一架 10 厘米折射望远镜。前者后因微动控制装置不灵而专供学生实习;后者用于太阳黑子观测,间作变星观测①。系内天文、算学不分组。建系之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毕业于登州文会馆,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著有《实用天文学》、《绘图日食新算法》等多种天文以及其他数理等方面的著作②。1932 年王锡恩去世后,系主任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菲利普斯(E. L. Phillips)兼任,并聘该系毕业生程廷芳(1911—1968)做观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齐鲁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天算系停课,天文仪器未装箱搬迁,程廷芳曾到天文台观测太阳黑子和星云。1945 年 8 月,天算系复课,改称天文数学系,招生 10 余人。

1952 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天文系与齐鲁大学天文数学系合并为南京大学天文系。

第三节　中国天文学会③

为促进我国天文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央观象台的天文工作者早在一十年代中期就倡议创立"中国天文学会"。经多年筹备,条件成熟,乃于 1922 年 10 月 30 日,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内召

① 菲利普斯在中国天文学会第 14 届年会上所作齐鲁大学天算系工作报告,《宇宙》第 8 卷第 5—6 期,第 82 页,1937 年。

②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第 1999 页。

③ 本节主要参考《宇宙》第 1—14 卷,中国天文学会,1930—1949 年;吴美霞:《中国天文学会简述》,《中国科技史料》第 10 卷第 3 期,第 66 页,1989 年。

开了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评议会，高鲁任会长。

学会成立后，每隔年余举行一次年会。在会上进行学术交流，由各主要天文机构负责人作工作总结，请有关专家介绍一年来天文学的进步，并在会上选举产生下一届评议会。1944 年起，评议会改称理事会。著名天文学家高鲁、余青松、张钰哲、陈遵妫和科学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李书华等人曾任各届会长或理事长。

学会以“求专门天文学之进步及通俗天文学之普及”为宗旨做了不少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创办天文刊物。除学会筹备阶段刊行的《观象丛报》外，1924 年起出版年刊《中国天文学会会报》，共出 9 期，主要刊载会员论文和重要译著。1930 年 7 月起出版《宇宙》月刊，该刊以刊载通俗天文著述为主，兼载宇宙消息、国内外天文界动态和中国天文学会消息等等。

(2) 编译天文图书。1930 年 4 月学会成立了编辑委员会，除负责编辑《宇宙》月刊外，还编写天文学丛书和天文学辞典。如陈遵妫编写的《星体图说》、《宇宙壮观》，张钰哲的《天文学论丛》、《宇宙丛谈》，戴文赛的《恒星光谱》和《星空巡礼》等等。

(3) 编订天文名词。学会于 1930 年 12 月成立天文名词编译委员会，1933 年审定天文学名词 1400 条，均有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对照，交国立编译馆出版。

(4) 举办科普与学术演讲。除在每届年会上进行学术交流外，在早期会所设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内时，还每月举办一次学术演讲会，1932 年冬会所移至南京后改为不定期举行。1933 年曾在南京举行“徐文定公(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1923 年曾

与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相对论讲座"。1942年12月25日在昆明和永安两地与中国数学学会联合举办了"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会"。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开展天文和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此外,会员陈遵妫、张钰哲、高平子、戴文赛、周培源等人曾到电台、机关、学校等处作天文普及演讲。

(5) 组织天文观测。1929年12月学会成立了变星观测委员会,张云任主任,指导和组织各地会员进行变星观测,并将观测结果统一整理发表。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进行交流总结,编辑出版《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报告》,每两月一期,刊登于《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中国天文学会还于1934年联合有关机关团体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组织日食观测。

(6) 颁发奖金奖励天文学著作。学会曾接受热心者捐助的奖金,如隐名奖金、"霁云楼老人"奖等,用以奖励优秀天文著作的作者。

(7) 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曾派会员张云列席1925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IAU(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二届大会;派会员余青松、赵进义(1902—1972)列席1928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IAU第三届大会。1935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IAU第五届大会上,中国天文学会正式加入IAU,成为我国最早参加国际科学团体的学会。列席会议的会员高平子、潘璞将紫金山天文台图册带到会议举办的展览会上展览,以扩大中国天文界在国际上的影响。1936年9月,中国天文学会与天文研究所共同组织了中国天文委员会,为主持参加IAU各项活动的专门机构。

中国天文学会创办之时正值旧中国忧患交侵之时,学会得自于政府的资助极少,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缴纳的会费、热心者

的捐助以及一些单位的资助。抗日战争时期处境更为艰难，但学会在会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成立了分会继续开展活动。先后于 1940、1941、1942 年成立了昆明分会、福建永安分会和贵阳分会。抗战时期《宇宙》杂志也未停刊，只是曾因经费不足而由月刊改为半年刊。

中国天文学会将国内专业天文工作者、天文爱好者以及热心于天文事业的人都团结了起来，共同致力于天文学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作用。会员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1922 年学会刚成立时有会员 47 名，1947 年发展到 688 名。

第四节　日食观测

日食，尤其是日全食是重要的天文观测项目之一，历来受到天文界，乃至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界曾于 1934 年 11 月 19 日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气象三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清华大学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 10 个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组成，专门负责筹备和组织日食观测[1]。

1949 年前，中国科学界共组织了以下三次日食观测：

1. 1936 年 6 月 19 日日全食观测。

---

[1]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消息，《宇宙》第 5 卷第 7 期，第 114 页，1935 年；第 8 卷第 2 期，第 42 页，1937 年。

此次日食全食带经过中苏边境和日本,我国曾派出两个观测队出国观测,一队由余青松率领赴日本北海道观测;一队由张钰哲率领到苏联伯力观测。北海道队一行6人,所用仪器主要是紫金山天文台的能通过紫外光的150毫米天体照相仪,拍摄了日冕的白光照片和紫外光照片,以及日食影片,测定了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并吸取了美、英、日等国观测队日食观测的经验[①]。伯力观测队一行2人,因日食时正逢天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此外还在国内进行日偏食观测。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两研究所分别进行了太阳分光观测和偏食时高空电离层电离强度的测定,青岛观象台开展了地磁观测,研究日食与地磁、天电之关系等等。

2. 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观测。

这是我国本土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全食观测。全食带从新疆入境,经过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对此次观测极为重视,特地向国外订购观测仪器,事先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参考1936年日食观测提供的资料,原计划组织几十个观测队开展13项观测研究工作[②],但后因日本侵华,全食带经过的省区已大多沦陷,在国外定制的仪器也无法运到,原定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各国天文学家也因中国战乱而纷纷取消原定来华观测的计划。我国最终根据当时条件组织了两个观测队,即西北观测队和东南观测队。

---

① 余青松、陈遵妫:《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全食北海道队观测报告》,天文研究所,1936年。

②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消息,《宇宙》第8卷第2期,第42页,1937年。

西北队由天文研究所、金陵大学理学院、中国天文学会和中央大学派员组成，队长张钰哲。观测地点在甘肃临洮。观测仪器由各单位拼凑而成。观测取得极大成功，内容包括：拍摄日冕照片、拍摄日冕光谱和色球的闪光光谱；测定日冕的亮度；实测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和拍摄日食电影等，并进行日食时的气象观测。日食期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将日食观测实况作现场广播，美英两国的国家广播公司也将观测实况向世界作同步转播，扩大了中国天文界在世界的影响①。

东南队分天文、地磁两组，分别由中山大学天文台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负责。观测地点在福建崇安。因日食时正逢天阴，天文组一无所获。地磁组测得日全食期间地磁的各项主要参数如地磁水平分力、垂直分力和磁偏角等的最大变幅。

此次日全食观测结束后，张钰哲在美国《大众天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一文，向全世界报道了我国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开展的这次日全食观测所取得的科学成就②。

3. 1948年5月9日日环食观测。

此次日环食出现在广东、江西、浙江和江苏四省。美国陆军派了观测队来我国浙江余杭县观测。天文研究所也与中央大学物理系、国防部测量局联合组队到该地观测，但由于天阴只测得日食期间太阳亮度的变化。此外，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等单位也分别进行了观测。

---

① 张钰哲：《宇宙丛谈》，正中书局1945年6月版，第120—153页。

② Y. C. Chang, Solar eclipse observed in China under the shadow of Japanese bombers, Popular Astronomy, V50, P198, (1942).

第五节 天文研究工作概况

在1949年前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时期，老一辈天文工作者尽管为开创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尽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能开展的观测和研究项目十分有限，因而做的工作真正属于研究性质的不多。然而另一方面，当时我国有些天文学家在国外留学或访问期间曾参与一些处于当时天文学发展前沿的观测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甚至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世界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我国天文工作者在国内所做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各天文机构配合自身的观测所开展的研究。如青岛观象台徐汇平发表的论文《近十二年来青岛观象台所见之奇特黑子》，对观测到的太阳黑子的各种现象作了详尽的讨论[①]。该台和军山台都曾结合观测讨论黑子变化对地球上气候及地磁或地震的影响等等。中山大学天文台曾围绕变星观测发表多篇有关变星测光的论文。1941年日全食观测前后，我国天文工作者曾发表关于日食计算法，日食计算图验法、日冕的亮度与形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二是利用古今中外观测资料开展的研究。例如，张钰哲通过对1937年出版的《Boss星表》中万余颗恒星自行的统计研究确

---

① 徐汇平:《近十二年来青岛观象台所见之奇特黑子》,《宇宙》第8卷第7—8期,第101页,1938年。

定太阳在空间运动的方向，于 1944 年发表了《太阳在空中之运动》一文。与此类似的还有 1937 年李珩的论文《以造父变星之空间速度研究银河系之自转》[1]，李珩和黄家器的论文《B 型星之统计研究》[2]，以及陈遵妫参阅彗星观测资料，尤其是哈雷彗星史料，借以考察彗星轨道及周期的演变后写成的著作《彗星论》等等。

三是天文学史研究。这一时期有不少天文学家和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其中最突出的是高平子和朱文鑫(1883—1939)。1922 年高平子提出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四条原则：(1)以科学方法整理历法系统；(2)以科学方法疏解并证明古法原理；(3)以科学公式推算古法疏密程度；(4)以科学需要应用古测天象。它们对我国天文史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遵循这些原则，高平子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和天文观测方法，发表有"中国诸历岁实朔实考"(1924 年)、《史日长编》(1932 年)、《圭表测景论》(1939 年)等论文著作，朱文鑫的重要著作有《〈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1927 年)、《天文考古录》(1933 年)、《历代日食考》(1934 年)和《历法通志》(1934 年)等[3]。此外，高鲁的《星象统笺》(1933 年)、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和地点》(1944 年)、董作宾的《殷历谱》(1945 年)也均为天文史研究的力作。

这一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在国外所作的天文研究中最有成就的是紫金山和凤凰山两山天文台的创建者余青松。他在二十年

---

① 见《宇宙》第 8 卷第 5—6 期，第 87 页，1937 年。

② 见《宇宙》第 8 卷第 5—6 期，第 89 页，1937 年。

③ 马星垣：《高平子》，席泽宗：《朱文鑫》，分别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2、247 页。

代中期在美国利克天文台率先开展了恒星连续光谱的研究，对91颗恒星的连续光谱进行分光光度测量，得出恒星光谱的能量分布曲线，阐明了恒星紫外光谱中巴尔末跃变的性质，证明恒星辐射类似黑体辐射，并通过恒星能量分布曲线与普朗克黑体辐射理论曲线的拟合，求得不同光谱型恒星的有效温度，从而最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恒星光谱哈佛分类的物理意义①。他在恒星连续光谱研究中所作的这些奠基性工作被认为是恒星能量分布工作的重要里程碑②。

张钰哲、张云和李珩等人也是颇有成就的天文学家。张钰哲于1928年11月22日在美国叶凯士天文台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小行星1125号，将其命名为"中华"，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946年访美期间又在麦克唐纳天文台发现一颗新的食双星BD－6°2376。并对一些食双星作了卓有成效的分光观测和研究③。张云于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先是协助张钰哲发现了那颗新的食双星，接着在当年12月又发现一颗北冕座R型新变星，被命名为鹿豹座XX星④。李珩于1948—194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著名天文学家史瓦西(M. Schwarzshild)合作，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发表《化学组成不均匀的红巨星模型》一文，被认为是恒星内部结构和演化研究领域中一项颇有成

① Ching-Sung Yu, On the Contineleous Hydrogen Absorption in Spectra of Class A Stars, Lick Observatory Bulletin, v. 12, No. 375, p.104(1926).

② Lutz D. Schmadel, Dictionary of Minor Planet Names, p. 495, Springer-Verleg(1992).

③ 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四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④ 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就的工作①。此外程茂兰(1905—1978)和戴文赛于三四十年代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对恒星或其他天体做过一些颇有价值的光谱研究或分光光度研究工作。

① Li Hen and M. Schwarzschild, Red-giant models with chemical in homogeneities, M. N. V. 109, p. 631, (1949).

第五十七章　气　象　学

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世界气象观测网的主要特点是高空气象观测的兴起。能迅速测得气压、气温、湿度测值的无线电探空仪在三十年代逐渐投入业务使用，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中已据此每日绘制高空天气图。随后雷达测风、测雨技术也开始推广。二十年代对中纬度主要天气系统（气旋）模式的研究取得突破。高空天气图出现后，四十年代发现大气长波和高空急流，大气运动的理论研究为天气预报提供了新的基础。已有50多年历史的国际气象组织自三十年代起逐渐改变为政府间的组织，以适应日益增大的海运、农业、水利，特别是远程民间航空方面的服务要求。而我国在这一期间气象工作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仍在谋求改善地面气象观测网。在抗日战争中观测网受到严重摧残，但科学研究开始勉力进行，取得一些成绩。

第一节　气象观测网建设和技术进步

1.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并推动台站网建设。

1928年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由中央研究院筹设气象研究所，1929年1月成立，竺可桢博士任所长。

竺可桢(1890—1974),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人之一。浙江上虞人。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28—1946),浙江大学校长(1936—1949),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1974),中国气象学会会长、理事长(1930),对中国天气学、气候学、气候变化、地理学、自然资源考察等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1929年,研究所在南京北极阁钦天山观象台故址新建气象台开始地面气象观测,并在几年内配全新气象和地震仪器。先后开展全国最早的气球测风、日射、微尘和大气电观测。1932年开始地面观测。积极进行高空气象观测,1929至1930年,多次施放气球高空气象自记仪器进行气象观测,但未能回收。1936年3月16日首次回收自记仪器,取得我国最早一批高空气压、温度、湿度记录,弥足珍贵。1935至1936年,研究所在南京、昆明和杭州由航空学校的飞机携带专用自记气象仪器进行高空气象观测,高度达4000米。

竺可桢对外国侵我主权,长期在我国设气象台站十分愤慨。他深知台站网是气象研究和服务的基础,早在1921年,就著文呼吁我国应多设气象台,并多次著文宣传气象对国民经济和国防的重要。1928年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但未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研究所并无统筹台站网建设的职责,但竺可桢克服种种困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1929至1937年间的台站建设:调查各省已有测候所情况;编印观测规程、规范和整套技术指导书刊;代购国内外仪器;办观测员训练班;三次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讨论统一技术规定;促进、协助各省部

门建设台站。

研究所还自筹经费,在1930至1942年间设立了30个直属测候所,并且着重于两部一直空白的地区。除北平和上海外,其中还有为参加国际极年科学活动而设的峨嵋山、泰山、拉萨测候所;在西北、西南空白区设立的有:酒泉、西宁、同心城、中宁、都兰、安西测候所;与民航部合作而设的有:包头、郑州、宁夏、贵阳测候所;受水利部门资助而设立的有武汉、西安、南郑、榆林、华山、商县、松潘、灌县、广元、大理、保山、昌都、北碚、缙云山测候所等。1942年将尚存的17个测候所交给新成立的中央气象局。

1930年,研究所开始绘制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从此改变了上海法国教会徐家汇观象台把持我国天气预报的局面。研究所还曾致力扩充国内气象电报,设立电台抄收东亚、东南亚各国气象电报并广播国内气象电报和预报、警报,并与交通部商榷由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和五处海岸电台广播台风消息和警报。至1936年,天气图上国内气象电报已达90余处。

气象资料的收集、整编工作是气候研究的基础。研究所定期出版了1928至1937年1月的《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载有全国台站的逐日气象统计(徐家汇观象台月刊只有月值)。整编出版各地历年温度、降水量资料。

1936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后,先后由吕炯(1936年10月—1943年3月)和赵九章(1944年5月—1946年)任代理所长,1946年赵九章任所长。

1937年日军入侵,研究所于11月迁重庆北碚。

2. 国民党政府中央气象局。

1941年10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成立中央气象局,隶属行

政院，后改属教育部（1945 年 7 月），又改属交通部（1947 年 2 月）。局长为黄厦千博士，原中央大学教授。1943 年 4 月由吕炯接替。气象局于 1942 年接办气象研究所的直属气象站，1941—1944 年新设 20 个站。抗战胜利，气象局迁到南京后，发展很小。1947 年 6 月，接办原属国防部气象总站（上海）和 40 个站。1947 年有直属站 103 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防部第二厅、国民党空军和中国航空公司都发展有无线电通信的气象测报网和天气预报工作。

1943—1945 年，只有两部 18 个测候所，每日加密向重庆发气象电报，且无国外气象电报，实际已不能进行天气预报。1946 年迁南京后，仍由电报局收集测候所的气象电报和空军各地的气象电报广播，1947 年下半年增由上海民航电台转来 35 个站电报，天气预报条件有所改善。所属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气象台和定海测候所也进行天气预报。

1946 年接收上海原法租界外滩信号台，改设上海气象台。原国防部第二厅上海气象总站并入上海气象台。上海气象台有本地天气预报、海区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由海岸电台广播）、港埠天气信号，向各轮船公司发预报和天气图。在龙华机场设有气象组独立绘图和发布航站、航路预报，配合民航航路管制和机场业务。

1949 年 2 月中央气象局迁广州，旋即迁台湾。

3. 省级测候所。

由于局势开始相对稳定，加上气象研究所的推动和协助，三十年代有 12 个省在省政府或建设、农林、水利厅下设了省级气象部门并布设少数测候所；四十年代又增加两个省。但 1937 年起，凡日军入侵所至完全停办。在后方的四川、贵州、福建测站有

所增加。在抗日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几年中恢复不多。

陈一得(1886—1958),云南盐津人,师范理科毕业,研究气象、天文、地震。1927年7月在昆明自设一得测候所,是这时唯一的个人所设的测候所。至1936年6月,省教育厅在昆明太华山设省立气象测候所,委陈一得为所长。

4. 海关气象观测网。

54个海关测候所是最大的观测网。三十年代又新设3个,在这57个站中,仍只有一个岛屿、7个沿海港埠、7个内地所向徐家汇(1931年起向气象研究所)发气象电报。日军侵入后,除重庆测候所外,其余都在1937—1944年期间先后停止工作。

5. 青岛观象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2年底,北洋政府收回胶州湾租界。1924年收回青岛测候所,蒋丙然出任所长,不久改称观象台,有气象、天文、地磁观测。1928年开拓海洋学观测研究工作。1932年得到许多部门的资助,建成青岛水族馆。1938年1月,青岛观象台再度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观象台恢复工作。

6. 民用航空气象工作。

中国航空公司在1930至1943年间气象工作由其通信部门兼办。1937年前有21个航站报告天气。七七事变后航线减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航运增多,开辟了昆明、重庆至印度的航线,设专职气象员,承担物资航运保障,气象台站有10处。抗战胜利后,国内航线增至20多条,国外航线增至8条,业务量大增。上海龙华机场增设机场气象台站18处。

7. 高空气象观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欧美国家布设气球携带无线电

气象仪器的高空气象观测站。战后进入高空气象观测的新时期。高空气象观测网的建立和日高空气象图的绘制使天气学、气候学研究和天气预报业务获得很大的进步。

中国在这个时期，先后有 26 个地点用经纬仪跟踪小气球移动的高空风观测。但入云后便无观测，因此这对机场业务有用而对天气预报帮助有限。1944—1947 年间，驻华美军曾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在我国设 10 个无线电探空和测风站，供中美空军混合团指挥作战之用。所取得的记录成为我国天气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8. 高等教育与学会。

气象学高等教育自 1930 年开始，中央大学（南京）设地理学系气象组，1933 年清华大学地学系设气象组，1938 年浙江大学史地系设气象组。1944 年中央大学成立气象系。1946 年清华大学成立气象系。

中国气象学会 1924 年 10 月成立于青岛，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十多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宗旨是“谋气象学术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发展”。首届会长为蒋丙然，高恩洪、张謇、高鲁为名誉会长。1929 年起，会务中心转移到南京。至 1948 年时，已举行年会 15 次。1930 年起，会长为竺可桢。学术刊物有：《会刊》（1925—1932），《气象杂志》月刊（1935 年 7 月—1937 年 7 月），《气象学报》（1941—1944）。

第二节　外国人所设的气象台站

1. 徐家汇观象台。

1920年,徐家汇观象台除继续原有业务外,开始注意航空需要,由云的移动推算高空风,1931年1月开始气球测风观测。1907—1944年,在我国首先进行高空臭氧观测。日军侵入后,工作缩小,但观测工作未停止。1950年12月,徐家汇观象台由军委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接管。徐家汇观象台地面气象观测连续78年,是我国境内最长最完整的。

2. 外国人在内蒙新疆的考察。

1926年冬,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受德国委托,与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5月出发。气象考察由德国气象学家赫德(W. Haude)主持。9月28日,考察团到额济纳河,沿途进行地面观测和测风气球观测。1927年5至7月在百灵庙附近的呼加图沟,9月在额济纳河畔的忽图尔(1928年冬止)设站定点观测。1931年5月,赫德为勘察中德航空路线,再度来华,带来风筝高空气象探测设备,在义肯公(1931年5—9月)和现内蒙海流图和额济纳旗附近的巴音托来(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进行了地面气象观测和123次风筝探测。后来设备由气象研究所购得,自1932年9月至1933年5月,在北京清华大学探测46次。

3. 日本在中国设立的观象台和测候所。

日本侵占东北后,于1933年设伪满中央观象台于长春,恢复中东铁路7个测候所,并陆续新建27个测候所及简易测候所百余处,地区延扩至热河和绥远。工作人员大部分为日本人。大连和旅顺测候所直属日军部。

七七事变后,华北各气象台站首先停顿。1940年北平成立伪华北国立观象台。1939年日军在华北设了18个测候所,1940

至1944年又增设12处，包括山东、河南和江苏少数地方。南方在抗日战争期间，测站都停办。只汪伪水利部门于南京、杭州、怀广、蚌埠在1940至1943年曾有气象观测。

1932至1937年间，日本在台湾增设测候所5处，简易测候所23处。1938—1945年增设测候所4处。大部分测候所一直维持到1945年。战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

第三节　延安的气象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早在1939年即在延安马家湾创办了最早的农业科学试验农场——光华农场，发展农牧业，增加供应。并设有气象组，进行地面气象观测。

抗日战争中，驻我国的美国空军迫切需要我敌后根据地的气象情报，1944年7月美军观察员被派到延安，并在延安建起气象台。气象台于1944年9月开始多种观测：地面气象、气球测风、高空无线电探空，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气象服务十分繁忙，曾为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和很多次其他领导的飞行作出贡献。1946年4月观测组离去。1945年9月八路军总部成立第一个气象台——延安气象台，张乃召(1912—1979)为领导人。气象台人员11人，有邹竟蒙、曾宪波等。

为支持美军对日军的轰炸机飞行，1945至1946年，设立了清丰和太行军区观测站。1945至1946年，为保证美军飞机来往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设定边、米脂、庆阳观测站。

1947年3月14日气象台撤离延安后，组成军委三局气象

队,先后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王家沟、河北平山县王家沟进行观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许多同志投入接收台站工作,后来成为新中国许多气象部门的领导人。

为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 1946 年 3 月在通化成立航空学校,成立气象台,进行地面、高空风观测和气象预报。1948 年 10 月在牡丹江航校办气象训练班。1949 年 6 月组建了沈阳、齐齐哈尔、牡丹江、长春、公主岭机场气象台,10 月起进行天气预报。12 月在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牡丹江成立航校,都建立了气象台。7 月建立西安等 15 个机场气象台。不久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南京、杭州气象台。

第四节　科学研究成就

这一时期我国开始进行气象科学研究,并取得很多成果。科研工作主要是在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最后的 10 年中,由于国内气象资料的积累、科研队伍的扩大和战时开始取得的高空气象资料,进一步获得一批重要成果。下面列出主要成果的内容,括号内为主要研究人。

(1) 气候资料的整编和主要气候要素的分布图(竺可桢、张宝坤、吕炯、涂长望)。

(2) 气候成因研究:地面、高空基本气流及其季月变化(竺可桢、陶诗言、高由禧、刘匡南);气团性质和分类(赵九章、涂长望、张丙辰);季风的形成和活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竺可桢、涂长望、黄仕松)。

（3）中国气候区划（竺可桢、涂长望、卢鋈、张宝堃）。

（4）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变迁（竺可桢、郑子政）。

（5）天气学研究：气旋路径分类（蒋丙然，沈孝煌）；气旋与锋（么振声、卢鋈、涂长望、张丙辰）；寒潮活动（李宪之、卢鋈）；台风（竺可桢、李宪之）。

（6）中国天气与大气环流和大气振动的关系（涂长望）。

（7）大气环流理论（赵九章、叶笃正、朱岗昆）。

这30年中，在气象研究所的努力推动和协助下，一些省份农业、水利部门开始重视气象科学研究，地面气象观测网的建设有了进展，到1937年达到一定规模，但在日军入侵时，东部除福建外，台站多随之消失。但西南和西北有所增加。下表列出1937年和1945年存在的各级测候所数目统计。由于资料不足，表中没有包括军事和民航部门的台站。4级所属每天只观测1—2次，观测项目少的简易所，大多不能维持长久，作用有限。

1937年和1945年各级测候所统计

	1937年					1945年				
台站等级	1	2	3	4	总计	1	2	3	4	总计
本国设	12	100	189	336	637	13	94	167	117	391
外国设	4	19	14	37	74	3	11	10	1	25
总　计	16	119	203	373	711	12	105	177	118	416

这30年中，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建成一个分布全国的、稳定的、有基本观测、通讯和质量控制的气象观测网，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天气预报工作。受气象观测网不完备和落后的限制，这时期取得的科研成果，对中国这样一个广大而地形复杂的

国家的气候和气候区域只能说有了个轮廓的了解,对气候与农业的关系缺乏研究,对天气学的众多方面也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①

① 本章涉及的有些年月和机构等,因记忆和资料所限,可能不够准确,尚待进一步考订。

第五十八章　物　理　学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1919 年的五四运动又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然而，在中国实现科学和民主的任务还很艰巨，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始终严重制约着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奠基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也是近代物理学在我国生根发芽和成长壮大的时期。

第一节　物 理 学 教 育

1. 大学物理学系的设立。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物理学系（或数理系、理化系），如：金陵大学（1912）、北京大学（1918）、大同大学（1919）、南开大学（1919）、东南大学（1921）、北平师范大学（1922）、厦门大学（1923）、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燕京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交通大学（1930），等等。到三十年代中期，我国设有物理系（或数理系、理化系）的大学已超过 30 所。随着在国内和国外物理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出国深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

位的毕业研究生的陆续归国，大学的师资力量得到加强，物理学高等教育已在我国具有一定的规模。

大学物理学教学在二三十年代有了明显的改进。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以实验科学为主要发展方向，这在当时国内实验科学尚不发达的状况下，是比较新颖和独特的。1930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三十年代初该校物理系开设的理论和实验课程共37门，其中必修课16门，选修课21门，有的课程还反映了当时物理学的最新发展。该系建有普通物理、热学、光学、电学和近代物理五个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厂，设备先进，仪器一流。图书方面，物理学各科的重要书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文集以及1900年以后的各种重要期刊，均多齐备。系里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报告研究成果、评介新成就与新发展，学术风气浓厚。其他各大学对科系的建设也都颇为重视。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各大学的物理系都力图给学生以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广泛教育。

2. 留学人员及其归国后的教学等工作。

早年赴国外留学深造的人员，大多学成之后立即归国，献身于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但由于受到国内种种条件的限制，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困难很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培养物理学专业人才。因此，他们既是物理学家，更是物理学教育的专家。

这一时期，许多大学里都有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些老前辈执掌教学，如：颜任光、丁燮林、李书华、王守竞、饶毓泰先后主持北京大学物理系；叶企孙、吴有训主持清华大学物理系；谢玉铭主持燕京大学物理系；胡刚复主持东南大学物理系；等等。各校均

聘请知名教授任教，如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五位教授，真可谓人才济济。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著名学者，在各校建立实验室，开设反映最新成就的课程，进行理论与实验并重的物理学教学。他们的出色工作，使这些大学的物理系享有盛名。

物理学教学所必需的实验仪器，在我国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方面，留学人员亦作出了很大贡献。1925年，颜任光和丁佐成创办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该公司有实验室，修理和制造各种实验仪器。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1929年，中国科学社在上海设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也进行仪器制造，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逐渐有所发展。此外，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也有制造。

3. 教材、译著与专著。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家们根据自己在多年教学工作中的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其中供中学物理学教学用的有：丁燮林和王书庄的《初中物理实验》(1930)、《高中物理实验》(1930)；倪尚达的《高中物理学》(1933)；戴运轨的《开明物理教本》(1931)、《高中物理学实验教程》(1933)、《正中高中物理》(1938)、《初中物理》(1949)；方嗣欆的《物理实验》(1932)、《初中物理学》(1934)；严济慈的《高中物理学》(1948)、《初中物理学》(1949)；等等。这些教材在三四十年代相当流行，很受欢迎，有的曾多次再版。它们对于提高中学物理学教学的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物理学家们从二十年代起，就编写供大学物理学教学

用的中文教科书，从而改变了在我国大学里曾经一度使用英文教科书的局面。比较有影响的，如：李书华的《北京大学物理实验讲义》(1924)；叶企孙和郑衍芬的《初等物理实验》(1929)；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1933)、《普通物理实验》(1935)；戴运轨的《大学普通物理学》(1941)；严济慈的《普通物理学》(1947)，等等。

为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学术水平，我国学者翻译了许多物理学书籍，包括学术专著、通俗读物、教科书等。据统计，1911 至 1936 年的 25 年间，我国译刊科学书籍 495 种，其中物理学书籍 52 种，占 10.5%。[1] 在这些物理学书籍之中，有相当数量的书，其著者是著名物理学家，如牛顿、法拉第、迈克尔逊、普朗克、密立根、爱因斯坦、布拉格，以及罗素、石原纯等。而在译者之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我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或翻译家，如何育杰、夏元瑮、文元模、周昌寿、张贻惠、杨肇燫、郑贞文、张钰哲、任鸿隽、郑太朴等。这些译著，不仅包括许多颇负盛名的教材，而且还有不少学术专著，如《相对论浅释》(1922)、《最近物理学概观》(1922)、《物质与量子》(1936)，等等，其原著就很有名，译书也很有影响。抗日战争期间，物理学家们在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翻译世界著名科学著作，为日后国家复兴和科学进步作准备。如：严济慈和李晓舫合译的《理论力学纲要》(1938)；王普译的《原子物理学入门》(1945)、《核子物理学入门》(1946)；陆学善译的《力学概论》(1949)、《柔体力学》(1949)；许

---

① 参阅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张菊生先生七十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实际上，按周昌寿所列的书目，其中物理学书籍近 60 种，约占 12%。

国保译的《热学与声学》(1950)；杨肇燫译的《电学理论》和《电学原理》(1951年再版)等等。

我国物理学家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也撰写了不少专著。如：谢玉铭和C. H. Corbett(郭察理)的《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英文本，1924；中译本，1928)、《物理学实验》(英文本，1924)；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英文本，1939)；萨本栋的《并矢电路分析》(英文本，1939)、《交流电机基础》(英文本，1946)、《交流电路》(1948)、《交流电机》(1949)；黄昆和玻恩(M. Born)的《晶格动力学》(1954)；等等。这些专著颇负声誉，在国内甚至国外都有相当的影响，被用作教本或被视为经典之作。

4. 人材培养。

我国物理学教育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前半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培养了许多物理学的专业人才。然而总的说来，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缺乏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迫内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大量散失，师生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重庆；浙江大学迁到贵州湄潭。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坚持教学和开展学术活动，在此期间培养出的学生中后来多人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黄昆、朱光亚等等。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老一辈的物理学家献身教育与研究事业，为国家培养年轻人才。像胡刚复曾先后在11所高等院校筹建物理系或理学院或在其中任教。清华、燕京和北京三所大学

的物理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学有师承,后继有人,保证了中国物理学事业的不断发展。

第二节 物理学研究

1. 物理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研究,绝大部分是在国外进行和完成的。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是因为国内缺乏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研究经费,而且也是由于国内缺少实验研究所必需的仪器设备,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信息。我国国内的物理学研究,从二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开展起来。

然而,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奋发努力,在纯粹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中,许多成为我国物理学某领域或某分支学科的开创性或奠基性的工作,有些还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

下面仅列举若干人物与事项,以简要说明之。二十年代初,叶企孙用 X 射线法精确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值,曾一度为国际物理学界所采用,他也是我国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研究的物理学家;饶毓泰研究原子和分子光谱得到重要成果;严济慈在光谱学等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吴有训从实验上全面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并开创了我国国内的 X 射线研究;王守竞把新诞生的量子力学成功地应用于原子分子的研究,其成果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施汝为在我国国内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的研究;萨本栋在研究交流电机和电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赵忠尧在 1930 年最早观察到

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没；张文裕发现 μ 介子和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吴大猷在原子和分子物理以及光谱学等领域的研究成绩卓著；谢玉铭三十年代关于氢原子光谱的研究，事实上发现了在四十年代后期才得到肯定的“兰姆移位”；王竹溪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方面有出色的成就；王淦昌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周培源深入研究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以及流体力学湍流理论；钱三强和何泽慧关于核裂变的研究，尤其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为国际物理学界所公认；陆学善、余瑞璜、钱临照等分别在应用 X 射线多晶粉末法研究晶体结构和合金相图、X 射线晶体分析 Fourier 新综合法研究、金属晶体的范性形变和晶体缺陷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出色成绩；葛庭燧在金属物理方面有许多为国际公认的首创性研究；汪德昭、马大猷分别在超声和声纳的研究、房间声学简正波理论研究方面有独创性的成果；王大珩研制光学玻璃和光学仪器贡献很大；钱伟长创立了以三维弹性理论和张量分析法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的内禀理论；钱学森、郭永怀等在高超声速流，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流动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彭桓武在理论物理研究方面贡献卓著；黄昆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特别是晶格动力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等等。

大体上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抗战之前，较多从事实验研究，尤其是在光谱学方面；抗战期间，则大部分从事理论研究，其次是应用光学研究；抗战之后，也较多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总之，物理学研究比较偏重于理论研究。

2. 专业研究机构的情况。

我国专业性质的物理学研究机构在二十年代后期逐渐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

1928年6月,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之前,3月在上海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该所下设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组。7月,三个组独立为三个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遂告成立,由丁燮林任所长。研究所先后建立起南京紫金山地磁台,物性、X射线、光谱、无线电、标准检验、磁学等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场。研究所除开展各项研究外,还制造理化仪器,供全国中学和大学及研究机关之用。仅中学仪器一项,至少制成两千六七百套,为促进我国物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物理所内迁,始迁昆明,继迁桂林,再迁至重庆北碚。抗战胜利后,物理所于1946年复迁至上海。同年丁燮林辞职,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兼任所长。1946年冬议迁南京九华山麓,并将地磁部分并归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47年秋,吴有训受聘任所长。同年冬,在南京建成实验大楼,图书仪器遂次第运宁,至1948年3月全部迁竣。新建的实验大楼有图书室、原子核学实验室、金属学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光谱学实验室、恒温室、以及金工场等。与此同时,二十年间,物理所的研究队伍也有很大发展。1928年仅有专任研究员4人,助理员4人;1948年已有专任研究员7人,兼任研究员2人,专任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2人,助理员5人。

1929年9月,我国另一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该院初期设理化等各部,理化部长由副院长李书

华兼任。同年11月物理学研究所成立，属理化部，李书华兼主任。1930年，严济慈被聘为物理学所主任。1932年，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创办镭学研究所，亦属理化部，又聘严济慈兼镭学所主任。1935年，该院取消理化等各部，直接设研究所，并改主任为所长。严济慈为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并兼镭学研究所所长。同年，镭学所迁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物理学所内迁昆明。抗战胜利后，物理学所迁回北平。1948年，镭学所改组，分为结晶学研究室（上海）和原子学研究所（北平），前者由陆学善主持，后者由钱三强任所长。物理学研究所设有研究室、实验室、图书室、金工场、光学工场等机构。研究工作主要有光谱学、水晶构造、压电现象、照相片之感光性、地球物理等几个方面。抗战期间，该所主要进行应用光学和应用地球物理方面的工作。为适应战时需要，曾制造最高放大倍数为1400倍的显微镜500余架，供教学、医疗和工业所需；磨制测量仪器（如经纬仪、水准仪等）的光学玻璃部件300余套，供道路和水利测量所需；制造水晶片振荡器1000余具，供后方无线电台及盟军无线电收发报机用；另外，还在云南及贵州进行物理探矿10余处。镭学研究所设有放射学、X光、光谱学等研究室及化学实验室，主要进行放射性元素研究和X光研究。抗战期间，该所力图利用固有设备从事理论与实用问题之探讨，研究范围属于放射学、结晶学和光学方面；另外曾制紫外光灯十数具，以应军令部及当地医院之需求。1934年，物理学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共有专任研究员2人，兼任研究员3人，助理员9人。1948年，物理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7人，镭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4人。

继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建立研究所之后，1932年5

月,军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成立,其中物理部分设金属、弹道、光学、材料、电学共五个试验室。研究问题包括:特种合金钢的物理性质及其金属组织,钢的热处理与其物理性质及金属组织的关系,各种棱镜的制造,军用通信设备,光感器,无线电遥控器,等等。此外,在昆明和贵阳的兵工署所属工厂,由龚祖同主持设计研制多种军用光学仪器,供抗日前线将士使用。

3. 大学研究机构的情况。

二十年代末,国家批准有条件的大学设立研究部,在教学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清华大学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第二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此后,物理系着重发展研究部。在短期内建立起了X射线、无线电、光学、磁学等研究室。用于研究的设备和仪器有:X射线设备、γ射线设备、大型电磁铁、石英摄谱仪、示波器、无线电发射与接收设备等。除清华大学外,陆续设立物理学研究部的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设有研究院,继续开展科研工作。1939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无线电、金属、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等五个特种研究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叶企孙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为金属研究所所长,任之恭为无线电研究所所长,庄前鼎为航空研究所所长,这三个研究所的工作都与物理学关系密切。

4. 研究刊物及论文情况。

我国最早的物理学论文很可能就是李复儿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P. Lenard的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研究》

(1907)。至二十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全部都是他们在国外进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大约1930年左右,我国学者在国内进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开始见诸于国外刊物。吴有训的论文《单原子气体所散射之X射线》,就是他在清华大学进行的工作,于1930年发表在英国的《自然》(Nature)周刊上,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将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最早的论文之一。

据统计,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发表的研究论文和科学报告总数将近1000篇。它们几乎全部都以外文(英文、法文、德文)发表。大量论文散见于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各种学报或学术刊物,一部分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上,还有一些刊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丛刊》(以上《集刊》和《丛刊》于抗战爆发即停刊)、《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甲种)》(该报告至1950年共出版五卷28期),以及各大学的学报。

第三节　中国物理学会

1. 成立经过及组织机构。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是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近代科学事业尚处于初创阶段。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杨铨、任鸿隽等9人于1914年倡议发行《科学》月刊,1915年又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宗旨为

"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经过多年努力,该社发展为全国性的科学学会,对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之中,部分是物理学方面的,如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来华访问,在《科学》月刊上介绍物理学领域的新进展,等等。然而,到三十年代初,在我国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已有许多物理学工作者,建立一个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的需要日渐迫切。

推动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成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际联盟于 1931 年派出四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专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Paul Langevin, 1872—1946)。朗之万来华后,受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他则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建议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以谋求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及国际交流。经朗之万的促进,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备组织迅速成立,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32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北平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

按照大会通过的学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李书华当选为首届会长。至 1949 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历届理事长(或会长)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在 1932 年成立时,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1933 年又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增设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这几个组织中除最后一

个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学报委员会和名词审查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

2. 历届年会情况。

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举行年会以及各专门组织进行工作而得以开展的。自1932至1949年，中国物理学会共召开了16次年会。

1932年8月召开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到会七八十人。北京地区19名会员参加，提交论文10篇。1933年3月会员发展到88人。同年8月，第二次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收到论文33篇。1934年8月，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到会50人，提交论文40篇。1935年9月，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到会30余人，提交论文42篇。至此次年会，会员人数197人。1936年8月，第五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举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召开，共收到论文48篇。此时，会员已达200余人。这次年会盛况空前，是抗战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大集会。

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和学术机构仓促内迁，各方面条件异常困难，然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并未中止。1939至1944年间共召开年会6次。1939年9月第七次年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到会50余人，收到论文26篇。1940年9月第八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

由于战时交通极为不便，自1942年开始，年会分散在各处举行。1942年第十次年会、1943年第十一次年会、1944年第十二次年会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昆明区、重庆区、四川区（成都）、西北区（城固）、贵州区（湄潭）、桂林区六个区分别举

行的。1942年正值牛顿诞生300周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还分别在重庆、贵阳、昆明以及福建的长汀和永安等地举行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也于1943年1月举行了纪念会。

在抗战期间，1938年举行的第六次年会和1941年举行的第九次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1946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年会，其情况待查。

1947年10月第十四次年会，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沪杭区)和北平协和大礼堂(此为与化学、动物、植物等六个学会联合年会)分别举行。1948年10月第十五次年会，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武汉举行，均为与其他多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据统计，至1948年5月底，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为541人。1949年11月，第十六次年会(上海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参加者200余人。此时，全国会员共有600余人。

3. 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于1933年创刊。学报以外文(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论文，附以中文提要。到1937年5月，出版了三卷共6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停刊两年多。1939至1945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共出版了5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纸质虽然低劣，论文却依旧保持该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学报编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以外文发表研究论文的《中国物理学报》至1950年底出版了七卷共18期。

当然，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则见诸于欧美的学

术刊物。

4. 审定物理学名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于1918年设科学名词审查会。1920年该审查会议决增加物理组，由中国科学社主稿，编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后来教育部将此“审查本”加以订正，成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1931年分发国内物理学家讨论，征求意见。“审查本”和“增订本”未颁行实施。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有编译委员会，萨本栋受其委托编译整理物理学名词。他根据“审查本”和“增订本”等编成《物理学名词汇》，于1932年印行。同年夏，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也着手审定统一名词。

在中国物理学会1932年的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和编译馆曾派人员列席，并提请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厘订物理学名词事宜。但这次会议未能论及此事。1933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统一名词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根据该讨论会议决的意见，中国物理学会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对各方历年编译的草案，详加整理，逐字复查。编译馆则根据议决意见，对所编初稿重加增修，并提交1933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审查。在这次年会上，推举出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人为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杨肇燫为主任委员。这年夏天，名词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将各种稿本和各方意见，通体整理。最后，该委员会将审定结果交国立编译馆，略加整理后呈报教育部，1934年1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为《物理学名词》。至此，自二十年代初开始，虽经十余年间

的多次修订但未能最终完成的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期间,杨肇燫、周昌寿、陆学善等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审订物理学名词的许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的命名法提出建议,1935 年,《东方杂志》曾出专号刊载有关讨论。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议为当时国内科学界所采纳。

5. 学会的国际活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即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自 1932 年成立大会后不久,至 1948 年止,先后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外国物理学家有:朗之万、法布里(C. Fabry)、拉曼(C. V. Raman)、密立根(R. A. Millikan)、康普顿(K. T. Compton)、康普顿(A. H. Compton)、布莱克特(P. M. S. Blackett)、布拉格(W. L. Bragg)、狄拉克(P. A. M. Dirac)、卡巴纳斯(J. Cabannes)、约里奥-居里(F. Joliot-Curie)。

1934 年,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并于同年秋派王守竞前往伦敦出席该联合会大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促成了 1934 年朗缪尔(I. Langmuir),1935 年狄拉克,1937 年玻尔(N. Bohr)的相继来华访问。他们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物理学界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物理学会于 1946 年 1 月 15 日在昆明发表了关于原子能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以保证监

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组织视察团，调查各国有关原子能应用的真相；设立联合国原子能实验室，共同研究重要问题，并与各国研究机构联系。意见书反映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的正义呼声。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过几代物理学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物理学教育与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十九章 化　　学

第一节 化学教育的发展

1922年11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这样，从洋务运动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学制才制定的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终于初具规模，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1. 中等教育。

“壬戌学制”公布后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自然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讲授。同时高中课程总纲规定高级中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类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科，分为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等。第一类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中至少必选一科；第二组注重理科，在以上学科中必选两科。同时高二开设化学课。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正式的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把物理与化学分开了，而且无论初中与高中，都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由

于课程过于繁杂,1932 年又公布了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学年上课,化学改在第三学年上课。

这时化学教育被视为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培养、陶冶、训练学生的兴趣、能力、思想的一种手段。1936 年教育部修正颁布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规定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为:(1)使学生获得化学的基本知识,对化学有明确概念;(2)使学生了解化学与衣食住行以及国防的关系;(3)引起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养成随时随地注意自然现象的良好习惯;(4)养成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思考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学化学教育大有改观,尽管实际情况与规定仍有出入,但不设化学课程的现象是完全杜绝了。而且在课程标准里,对教材内容也作了明确规定,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 1932 年颁布中学会考办法,随后又规定各校招考新生的科目,均以化学为考试科目之一,考试范围则以化学课程为根据。因此,课程标准的推行对于提高和统一中国各校化学教学程度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中学生的化学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内容和标准趋于规范化的同时,化学师资力量也有了很大改进。高中的化学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有的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学位的。初中化学教师有少数是专修科毕业或大学肄业,学历程度不如高中整齐。不论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化学教师,在大学时绝大多数都是专攻化学专业,或是选修过化学系的课程,少数则是学习物理或生物的。然而,尽管这些化学教师具有较好的化学专业基础,但却有半数以上的在大学时没有读过任何教育学课程,即使有少数学习过一二门普通教育学的,也因其内容广泛,而对专门的化学教育帮助不大。

因此，为了弥补化学教师们在教学方法和技巧上的不足，从1932年起某些地区陆续开办了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其中都有化学组，其内容为(1)普通化学的讲授与实验，(2)化学教授法讲演和有关化学教学问题如化学设备、教材、教法、课本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因国内战局，这种讲习会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1934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大纲，并指定由公私立大学和各省教育厅举办，这样，暑期讲习会遍及各地。此后每年各地都有举办这类讲习会的，大大提高了化学教师的水平。

在化学设备方面，教育部除规定中等学校设备经费的比例外，又于1934年颁发中等化学设备标准，规定了初中和高中学生实验用仪器药品的普通标准和最低标准，并且拟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仪器药品单，促进了各地中等学校积极扩充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平等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000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仍然较差，有70%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简陋，平均每校只有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一般都能符合规定。一些省市甚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

到了1940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0多种，实验教材近20种，初中课本10余种，实验教材约10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经验的化学教师，因而教材质量提高很快。

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1940年公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小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小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知识中介绍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名称、性能，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8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合并为"理化"，在第2和第3学年每周上课3小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办法，高二化学一律每周上课5小时①。

2. 高等教育。

1919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1921)、厦门大学(1921)、东南大学(1922)、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四川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山东大学(1930)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

① 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332页。

科大学仍是少数,1928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198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1937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全超过。1939年国立院校参加统一招生的22个单位,其中14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6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6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这样,仅有3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新生5371人,化学专业的有396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1920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国内的化学教授不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1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6位教授即张子高(1886—1976)、高崇熙(1901—1952)、萨本铁(1900—1987)、黄子卿(1900—1982)、李运华、张大煜(1905—1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1937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1581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人,化工专业40人,生物化学专业3人,农业化学1人,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

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超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1898—1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1940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起点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1929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发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1917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

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1911—1991)、张青莲(1908—)、马祖圣(1911—)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标准，程度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安排合理，能够发挥学校的优良风格，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1936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构造、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已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进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领先地位的了。

1931年，教育部开始整理课程。1938年公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1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需要又作了修订，如1944年规定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10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构造、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战胜利后又于1948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已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1938年规定文学院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1940年规定，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

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纷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挤。然而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仍然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联合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造就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 1940 年开始招生，1943 年与延安大学合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 3 年。在自然科学院的 4 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师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等课程。化学系的师生们一面学一面做，如参加部分打盐、烧木炭、提炼薄荷油、熬火硝等

生产劳动,华寿俊还发明了利用陕北特有的野生马兰草来造纸的工艺。边区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与为解决边区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的。

第二节　学术机构与出版物

1. 学术机构的设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1907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发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1876—1962)、曹惠群、陈传瑚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0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2人。1907年和1908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首先进行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方案。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1908年),不久即告终止①。192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1924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究会",还有留德学生也发起了类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

①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94—298页。

当时国内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发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获得成功，相继消失。

1932 年 8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标准等问题。有 45 位化学家认为随着国内化学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1888—1966)、陈裕光(1893—1989)3 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 4 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创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为宗旨”，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①。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专门的研究机关也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究机关、地方性研究机关、私立研究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性质各异，研究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创办、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间所引起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

---

① 《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国立编译馆 1932 年版。

究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中央工业试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分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品检验外,还致力于工业分析的改良标准化以及其他工业研究。而成立于1931年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是由金叔初捐款建设的,为纪念其父而命名为"沁园"。它对中国的燃料(尤其是煤)做了大量的显微镜分析和物理化学分析(其中又包括实用分析、低温蒸馏、溶剂试验、焦性试验、含硫质种类研究和石油分析等),为解决中国的燃料问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至于各省政府设立的机构,有山东工业实验所、湖南工业实验所、广东工业实验所、河北省立工业实验所和广西化学实验所等,除广西化学实验所外均隶属于各省的建设厅。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本省的矿物及其他原料、产品等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开发利用。另外,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也设有工业实验所。

私立的化学研究机构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上海的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川省军政当局及各界人士发起的组织。与实力雄厚的国立或省立机构相比,这些单位虽然规模较小,经费来源单一,甚至时有拮据,但它们却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又以黄海社的工作最为出色。私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曾有过的一个讲求科学、发展科学以富国强民的热潮。

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与化学有关的主要研究机构有北平协

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药研究所。此外还有天津的华北化学试验室、上海化验室、上海远东化验室和工部局卫生化验室等。另外还有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其规模较为宏大，所中有化学及生物学两科，研究内容多属于化学，比如中药的提取和研究等。这类机构经费较为充足，研究工作各有成绩，对中国的化学界影响很大。

各个公私立的大学是中国化学研究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各高等学校中，人才集中，资金较为充足，既能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从事应用研究。1933 年到 1936 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发表的 203 篇论文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的 57 篇，占总数的 28%，由此可见高校研究工作之一斑。

2. 出版物的涌现。

专门刊登化学研究论文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在中国创办较晚，但化学论文的发表却是在二十世纪初。1915 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始发行，便时常有化学论文发表，但大部分属于概论，研究论文很少。以后数量虽逐渐有所增加，在《科学》中却仍只占少数，如在第 14 卷《科学》中，化学论文有 19 篇，共 322 页，只占总页数的 15.4%。创刊于 1923 年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1930 年改称《化学工业》)，是专门登载化学论文的刊物，然而质量又不太高。因此在 1927 年以前，国内的化学论文大多是送到国外刊物上去发表，而且从事化学研究的人以此为荣。1927 年开始发行的《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生理学会创办)，为国内研究论文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但是，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份杂志所载的化学论文，仅仅局限于生物化学方面，因此有必要创办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化学刊物。

中国化学会从建会开始，就把办刊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32年8月，在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决定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该刊于1933年创办，由曾昭抡任总编辑，主要是发表全国化学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论文。从创刊至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发表。这份刊物不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1933年召开的中国化学会首届年会上，为"求化学在国内之普及"，决定创办中文刊物《化学》，协助中国化学会传播化学知识、推广化学应用、提倡化学研究，以宣传报道化学的进展、化学教学法、国内化工概况、化学科研论文摘要、化学出版介绍与会务记载等内容，由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从创刊至解放前为止，共出刊11卷27期，其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一度停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自1卷1期起，就辟有"中国化学撮要"一栏，由曾昭抡主编(1卷3期起，由曾昭抡与张克忠共同主编，曾代表中国化学会主编化学部分，张代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编化工部分)，将国内各刊物所发表的与化学有关的一切论文、国人在国内完成研究而在国外发表的化学论文、以及由西人撰写但与中国化学有特殊关系的著作等，以摘要形式登出，积累与报道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国内化学文献的线索，填补了国外化学文摘杂志报道中国化学文献上的部分空白。这是中国查找近代国内化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

《化学通讯》为中国化学会的又一刊物。1936年，理事会为了及时报道会务活动，加强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决定由总干事吴承洛创办《化学通讯》。1937年理事会

改推袁翰青任编辑与经理，1941 年该职由高济宇（1902—　）担任。《通讯》初为半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到 1949 年出完第 14 卷后停刊。

除了中国化学会的三个刊物和前述的《化学工业》外，由学会创办的刊物还有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于 1934 年开始出版，中西文稿件并收，多属与化学工程和化学工业有关的研究论文以及材料分析等，选稿较为严格。另外，一些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也时常登载一些化学方面的概论或论文，如中华学艺社的《学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化学刊物及与化学有关的刊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学会刊物、学校刊物、研究机关刊物、工厂刊物。在学校刊物中，像《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1933 年创刊）、《山东大学化学系试验室报告》（1931 年创刊）等都是专载研究论文，而且质量颇高，在化学刊物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清华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1931 年创刊）、北京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1929 年创刊）、中央大学的《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录》（1930 年创刊）、金陵大学的《科学教育》（1934 年创刊）也经常发表一些研究性的化学论文，为化学界所重视，其中尤以清华和北大的两种刊物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国际声望。这些学校刊物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的化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

在研究机关的出版物中，《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1931 年开始发行，为不定期刊，1935 年改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专门刊登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也于 1934 年 1 月起发行类似的不定期

刊《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丛刊》,但最初所发论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成,并且很多文章又重复登载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创刊)上。除此之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燃料研究专报》、各省商品检验局及工业试验所的不定期刊,也多发表一些化学、化工方面的调查或研究论文。而私立研究机关中,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丛刊》(不定期)。1930年创刊的《海王》,属于由化学工厂发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黄海三机关联合设置、由海王社创办的,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化工论文。这种种刊物,虽有专门与非专门之分,并且质量不一、规模各异,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国化学研究勃起的产物,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窦维廉(William Henry Adolph, 1890—1952)就开始把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写成英文摘要,送给美国化学会所办的《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登载。1935年,由于国内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窦维廉一人难以承担,便邀请曾昭抡参加这项工作,由美国化学文摘聘请为摘要员。尽管在20多年里在该文摘上登载的中国化学家的论文摘要屈指可数,而且偏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国化学文摘为世界上堪称完善的化学文摘刊物,因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从1927至1941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

部①,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这是与当时中国热衷于发展化学工业以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而程度高深的研究专著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站住脚跟。

第三节　二十世纪上半叶名词术语的厘订

化学译名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化学史上占有一个比较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自江南制造局翻译化学书籍以后,化学译名便成为各家译书者共同注目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成为中国早期化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自十九世纪以来,化学发展迅猛,更是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新名词,而且科学愈是精深,其名词也就愈加复杂。中国的化学较西方起步晚,势必要以翻译西书作为基础,因而命名系统的创立便应时而生。在1912年以前,就已有了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草》、李景镐的《有机化学命名例》等,但都未能得以普及。1915年,教育部公布《无机化学名词》,仍是不甚详细,而且没有涉及到有机名词。到1918年,由博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及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的"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扩展成了"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并且除了医、药两组外又加入了化学组,开始审查化学名词,从元素到无机化合物,到术语,到理化仪器,到有机化学普通名词,最后到有机化学系

① 谭勤余:"中国化学史与出版物",《学林》第8辑,1941年6月。

统名词。1921年全部名词审查完毕，由教育部公布，至此化学名词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这期间花了五年的时间。

但是，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制定的化学名词，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推行，反对力量主要是来自当时在国内出版界居首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就一直在采用郑贞文(1891—1969)制定的无机和有机名词系统，而且鉴于该馆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化学译名，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馆。郑贞文的名词系统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方案有很大分歧，这样，关于化学名词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1932年以后。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设立大学院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以代替以前的教育部。1928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成立，"聘请专员，广搜近年出版书籍，调查著作界采用化学术名之标准，分列统计，以察众意之所趋。未及决定，而大学院改组，译名工作遂由教育部编审处继续进行"①。1932年5月，国立编译馆成立，在这之前，译名问题虽然没有确定方案，但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了基础。

国立编译馆成立，便开始着手整理化学名词，聘请郑贞文主持此项工作，参考各方意见，编成具体方案。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陈可忠的建议，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在译名方面，由郑贞文拟定的草案，在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并交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条重要的化学命名原则，并对元素译名进行了表决。同时请求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订有机化学

① 《化学命名原则》，国立编译馆1933年版。

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和仪器名词。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聘请郑贞文等7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的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的意见，终于完成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于11月由教育部公布命令，次年6月出版，成为国立编译馆最早出版的科学名词专著。

《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学书籍几乎全都采用了这项原则。至此，十多年来一直迁延未决的化合物译名问题，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除《化学命名原则》外，在国立编译馆编辑制定的化学名词中，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名词、化学术语、化学物质名称等。这些工作在三十年代都得到很好完成，成为化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化学命名原则》为数种化学物质的西名中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可行的、统一的标准。它列出了92种天然元素，在标出其拉丁名、英文名以及符号的同时，列出了中文译名和读音，采取“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的命名方式。清末徐寿和傅兰雅曾给64种元素命名，而在《原则》中，这64个元素名称里有44个被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另外有10种采用了新的读音以使其与拉丁原文相符合；8种元素的中译名称改变，其中包括氢气、氮气、氧气和氟，新名称能很好地反映出“气”的性质；还有两种元素铍和铌因拉丁名的变化而被重新命名。

对于无机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徐寿创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一价化合物或氧化物如NaCl，称为“x-化-y”，

即氯化钠;多价化合物如 $FeCl_3$、$FeCl_2$、NO、N_2O 以及 H_2O_2 等,则根据相应的英文名形式命名,即带有后缀"-ic"的命名为"x-化-y",如氯化铁、氧化氮,带有"-ous"的称为"x-化-亚-y",如氯化亚铁、氧化亚氮,而带有前缀"per-"的称为"过-x-化-y",如过氧化氢。盐类也同样如此,Na_3PO_4 称为磷酸钠,$FeSO_4$ 则称为硫酸亚铁。采取这一方式,《化学命名原则》为所有无机化学的命名指出了一条通用法则。

然而,《化学命名原则》的最大贡献则在于有机化学名词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就已经采用了系统的有机化学命名法。因而这时的中国化学家,面临着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汉语有机化合物命名体系的艰巨任务。1908 年虞和钦提出了根据有机化合物结构而不是组成元素或外文名称来命名的方法,这就为 1932 年的化学讨论会上最终制定命名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是由几种元素组成的,其基本元素为碳、氢、氧等。在不同的化合物中,每种元素的数目可以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各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排列方式。因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必须要能够反映这种独特的分子结构特征。对于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选择了碳氢来对其进行区分,碳键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称为"烷",意思是"完满",不饱和双键的碳氢化合物,则称为"烯",意思是"较少"或"不定",而对于不饱和三键的化合物,则称为"炔",意思是"缺乏"。

对于芳香族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命名。每种化合物都以一个带有"草"头的字来表示,并用最接近于英文名称的读音来命名,例如"苯"、"萘"等,都是采用了汉语中的谐声方法。

每种有机化合物的名称都必须是比较准确而且易于区别的，为此中国的化学家们作出了许多艰苦然而巧妙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例如，对于开链化合物，首先必须描述出它的长度，也就是最长链中碳的个数。《原则》中以“天干”来表示10个以内的碳原子数(超过10则采用通用的计数法)，放在化合物类型的前边，例如1个碳原子的烷称为“甲烷”，两个碳原子的“烯”称为“乙烯”，3个碳原子的炔称为“丙炔”，11个碳原子的烷则称为“十一烷”，以此类推。另一方面，环状烃是通过前缀“环”字来加以区别，例如“环戊烷”。而当主链区分了以后，其支链的类型、位置等也必须在名称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的化学家在支链中加以“基”字的方法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x-基-代-y”，例如“甲烷基代丙烷”、“乙烷基代苯”等。

以上只是《化学命名原则》中大量命名体系中的很少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中国化学家以西方已有的命名体系为模式，创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研究状况并能较好与西方相呼应的较为完善的化学命名体系，为中国尽快、尽好地引进西方新知识，发展自己的化学研究事业扫清了障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第四节　分支学科的建立[①]

化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的化学研究，

① 本节请参阅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卷》“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第9篇“基础学科的建立(下)”化学部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开始于二十年代。这时期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对中国化学史的考据,例如王琎对于制钱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古代使用金属的研究等等;另一是对物料的分析以及工业化学研究(即利用国外已有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工业上的特殊问题),这类工作在当时为数甚少;再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协和医学院对于生物化学的研究。协和医学院因经费充足,人才集中,所以开始研究工作较别处早,自 1921 年成立起,便开始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发表。到了 1925 年左右,由于陈克恢(1898—1988)关于麻黄素的药性研究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协和的生化研究也随之达到高潮,并带动了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

不过,尽管由于协和的特殊条件使得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但化学其他领域在中国的开展,仍是始于二十年代末期。北洋政府时期,战事连绵,教育经费严重拖欠,科学工作者无以为生,刚刚在中国略有萌芽的化学研究基础未立,更是毫无发展可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以提倡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为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针,因而全国各处的公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设备上都有明显的改进;而国立研究院的设立,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中国的化学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奠定基础并迅速发展的。

这时化学研究的中心,除了由西人主持的协和医学院外,还有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它们各自都有一支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工作成绩卓著。同时,这种区域布局也使初期的化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得较为平

衡。但不久以后，广州方面因陈可忠因病离职而受影响，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而使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就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中心，再加上北平研究院化学所、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的共同努力，使平津地区的研究力量愈加强大。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中央大学重新开始有论文发表，才又恢复了南北两方的研究工作并驾齐驱的局面。

1. 生物化学。

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始于二十年代，主要是在蛋白质化学、脂肪化学、食物化学、营养学、激素、维生素、免疫生化、消化与代谢等领域。除了协和医学院这个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以外，其他的研究机构还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南京卫生署、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截至1949年，在国内外的各种生物化学及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中国生化工作者的论文400余篇，其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不乏其数。

吴宪（1893—1959）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20年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和氨基酸代谢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提出的"血液系统分析法"，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为现代临床化学奠定了基础，因而被誉为血液分析的权威。另外，他通过对蛋白质变性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指出蛋白质的变性是因为蛋白质分子从折叠而变为舒展。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的学说，从而给"变性作用"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同时他还观察到天

然的和变性的卵蛋白和牛球蛋白的分子量约为34000的倍数或亚倍数，这些结果与今天对蛋白质分子量所研究得到的亚单位结果是相符合的，这就证明早在60年前吴宪就已首先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吴宪大量的研究工作中，有一项特别引起国人的注意，那就是从1927年起，他用大白鼠传种数十代，研究了纯素食和荤素杂食的营养价值及其对生产、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对寿命的影响等，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一般人民的身材矮小，其原因是由于所吃的基本上是素食，其中蛋白质的生物价值较低，钙和脂溶性维生素的成分较少。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为了维持人民的健康，1938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制订了《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标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食物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编著了中国第一部《食物成分表》。他编著的《营养概论》(1929年)内容丰富，既是一本简要的参考资料，又是一本通俗读物。此外，三十年代初，性激素研究在国外起步不久，吴宪十分关注这个新的领域，并且做了一些试探性工作，为中国激素生物化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至1949年，吴宪发表学术论文近150篇，除了《营养概论》外，还著有《物理生物化学原理》(英文版，1934年)。他的论文绝大部分是用英文发表，深受国际学术界的推崇，是国际上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之一，是中国生物化学、营养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创始人。

对维生素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引起了中国化学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维生素C在食物中的分布研究得最多，而其他几种维生素，有的因为设备不适，有的因为测量复杂，因而发表的论文较少。清华大学的萨本铁专授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自1934年以后，他在继续从事有机分析工作的同时，又率领学生，

开始从事维生素C和氨基酸(旧称胺酸)的研究。他对中国各种食物中维生素C的含量作了大量调查(这是他最受国内同行称道的一部分工作),从而发现,好些国产食物中都含有很多维生素C,如果要想得到这种维生素,大可不必一定要吃美国桔子,有些价格远为低廉的中国桔子也是一样的好。同时萨本铁指出维生素C与糖类有同样的来源,可能由乙醛酸与1-异赤丝藻糖缩合而成,也可由乙醛醇与1-异赤丝藻糖缩合、再经过氧化而成,还可由环已六醇分子重排为1-古洛糖或1-半乳糖、再经过氧化而成。根据这一假说,萨本铁提出了合成维C的理论路线及实验方法,以弥补欧洲学者的研究中原料昂贵、毒性大、合成周期长等缺点。然而,由于国内实验设备简陋和材料的缺乏,萨本铁没能完成维C的实验合成。这个人工合成维生素的首例由一位英国人完成并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营养学是以生物、生理、农业为基础而应用于医学、药学、卫生学的一门学科,中国在这方面的初期工作,多是关于人民生理状况的调查。以后范围逐渐扩大,有膳食研究、国产食物的分析、矿物质营养素的研究等。其中,植物性食物受到人们更大的关注,而对于动物性食物则兴趣甚少。这一时期致力于营养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协和医学院(膳食营养、蛋白质、酵素等)、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35年添设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特别注意本国普通食物的调查和分析、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的研究、食物烹饪法及保存法的研究和改良)、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中国北部食物营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食物分析及调查、米麦营养及植物油中植物蛋白质的研究)、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中国食物的分析及营养、碳水物的代谢、维生素C及矿物质),还有

上海医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南开大学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探求如何能在国民经济可能的范围内对中国的食物进行改良，以使多数国民的健康水平较高，从而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食物化学方面，以前中国有许多迷信，民间素有食物相克之说，认为有些东西合在一起吃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这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忌讳，老百姓深信不疑。生物化学家郑集选择了14对被认为是典型的相克食物，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先用动物作试验，然后亲身尝试这些向来忌讳的混合食物，结果根本没有中毒现象，以科学家的勇气和科学的证据否决了流传千年的食物相克之说。虽然这项工作对于生物化学理论或实验技术本身的发展贡献不大，但它却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体现出中国的科学家们将科学应用于实际而不是空谈科学的良好风尚。

生物化学与药理学相接壤的药物化学，尤其是中草药化学，也是自二十至三十年代发达起来的一个领域，研究成果颇令世人注目。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是用草药治病，但自清朝海禁大开以后，西药大量涌入，以其药效高的特点逐渐取代了国产药材。然而，西方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却对中药产生兴趣，他们用化学方法提炼出其中的有效成分，从而证明了某些中药的作用强于许多西药，而中药之所以有时药效不强，是由于未经提炼致使有效成分不高。协和医学院成立后，这项研究最初由药物化学家黎德(Read)教授传来中国。1924—1925年，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素用于治疗。这种药曾由西人用狗作过试验，陈克恢首次用人作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发表以后，顿时名闻世

界，陈克恢被美国里耳利(Lillie)制药公司以重金聘去，专为该公司进行研究。同时这项研究的成功在国内也引起很大反响，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国产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化学结构进行研究。协和医学院在这方面是研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

实际上，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国内运用可以利用的有限手段，首先对中草药进行系统研究工作的，还是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十余年、后任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所长的赵承嘏(1855—1966)，他是最早对中药里所含生物碱进行分离的化学家。他在1926年发表的关于麻黄素研究的论文，是中国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草药的最早的论文。他研究了延胡索、贝母、三七等30多种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得到了许多新生物碱结晶，其中有些被发现具有较强的生理或药理作用。例如从延胡索中分离出的延胡索素乙、延胡索素子和延胡索素丑都有和球冠素相似的作用，延胡索素乙在临床上可作为镇痛、镇静剂使用。在赵承嘏之前，提取植物有效成分一般均用乙醇浸泡，这样所得的粗提物成分复杂，不易进一步分得结晶单体。他根据生物碱的性质，采取碱磨苯浸的方法，使粗提物成分趋于简单，减少了进一步分离单体的困难。他用自己创造的一套方法，往往从一种植物中分出多种结晶，单是从延胡索中就分得了13种生物碱结晶；并且能从他人已详细研究过的中草药里分离出新的成分。到1949年为止，他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论文50余篇。对中草药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化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自1935年以后，中国化学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中药的分离和精制，而且从事其结构式的研究以及合成。在这方面，黄鸣龙(1898—1979)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化学家研究生物碱的构造的先例。他通过结构研究，证明赵

承嘏由延胡索分出的13种生物碱有3种与前人研究相同。从此,中国化学家对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

除了中草药等天然药物之外,中国化学家对于药物合成的贡献也很多,例如维生素、性激素、磺胺类药物与青霉素等的研究工作,都有中国化学家参与其中。1942年汪猷(1910—　)进入上海丙康药厂担任厂长和研究室主任,致力于针剂制造和磺胺类药物的合成。1944年他偶然得知国外发现了一种特效的、从霉菌中培养出来的抗生素,于是他开始学习微生物学、发酵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他终于分离得到了一种新的抗生素——桔霉素,论文于1947年在美国《科学》上发表后,美国一家通讯社从旧金山发出电讯,报道中国的化学家制成了一种青霉素菌族抗生素的消息。1947年9月他应聘参加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工作,此后继续研究桔霉素,带领几位青年助手,使双氢桔霉素的化学及其抗生素作用的机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2. 有机化学。

除了生物化学以外,二十至三十年代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就是有机化学领域。中国化学家研究有机化学的人最多,成就和贡献较大,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复杂的天然化合物及其类似物的合成,因而在有机机理以及立体化学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

1933年,在德国哥丁根大学工作的庄长恭(1894—1962)氧化分解麦角甾得到了原-别-胆基酸,证明当麦角甾(或甾醇)受到氧化分解时,链的破裂是在第24个碳原子上发生的。这是中

国有机化学的先驱性工作，对于当时的多环化合物化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萨本铁是中国化学家中著作最多的一位，他最初的工作偏向于制备各种酯、测定它们的物理常数如沸点、比重、折光率等，然后再制出这些酯的苯腙和缩氨基脲。后来，他又开始进行各类有机化合物的鉴定工作，用各种试剂制成各类化合物中代表物的衍生物来进行鉴定，例如用肼衍生物对氯苯肼来鉴定醛和酮，用三硝基苯间二酚(收敛酸)来鉴定萘、蒽等。他每年都要用这种方法鉴定出数十种化合物，成绩斐然，因而在这方面成为国际上的权威，得到了西方化学家的推崇。

嘧啶化合物是较早在中国得到研究、并且成就颇丰的一个领域。纪育沣(1899—1982)在1920年代就随同国际嘧啶化学权威约翰逊(T. B. Johnson)作研究，回国后继续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扩展工作。不论是在雷斯德医学研究所，还是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北平研究院药物所，他的主要精力都是在这一领域，40余篇研究论文中属于嘧啶类研究的占二分之一多，它们大都以β-醛酸酯或β-酮酸和尿素或硫脲作用，以制得嘧啶的羟基衍生物尿嘧啶，从而制备氨基衍生物胞嘧啶，或者制成硫氰基衍生物而研究其重排反应。他的论文中有许多都记述嘧啶的硫氰酸衍生物加热重排成异硫氰酸的反应，还提到嘧啶环中的酶硝酯重排现象。1920年代以前，嘧啶化学的研究在中国没有任何基础，纪余沣虽然也同中国大多数化学家一样，研究途径与方法大都遵循国外，但他所采用的新的合成方法和步骤，使中国尚处于草创时期的嘧啶化学的研究水平并不逊色于国外。

1937年，袁翰青由于对联苯化合物立体化学的研究作出成

就，荣获了荷兰皇家学院颁发的范霍夫纪念补助金，这是为纪念物理化学家范霍夫而设立、专门奖助各国青年化学家的。袁翰青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了联苯的立体化学研究，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与合作者首次拆解了理论上可以拆解、但尚无试验证明的2,2',4,4'-四溴联苯酸，得出两种旋光异构体；还首次制得了N-苯磺酰-8-硝基-甘氨基酸并进行了消旋速度的测定。三十年代末，他提出根据缔合因素的不同来测定α-、β-或顺、反两种几何异构体的新方法，这是由于缔合因素与氢键有关，β-式分子式内部能形成氢键，而α-式则不能，因而β-式的缔合因素小于α-式。缔合因素可用冰点降低法来测出，由此就可鉴别顺、反或α-、β-二种构型。这种方法适用于某些含有给电子原子的圬或腙类化合物。袁翰青用这种方法检查了若干个已知有几何异构体存在的化合物，结果很好，从而证明他的氢键理论是正确的。袁翰青的工作，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40—1943年，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的黄鸣龙，利用从药房买来的驱蛔虫植物药山道年，进行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立体化学研究。这样，在战时简陋的条件下，他发现了变质山道年的四个立体异构体可以在酸碱作用下成圈地转变，这在立体化学上是个前所未有的发现，因而引起了当时国际上许多著名有机化学家的重视，有机化学大师武德沃德(R. B. Woodward，1917—1979)等人还参与了有关的研究。这项在昆明的防空洞里通过分析、推理而得到的发现，为以后国内外学者解决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绝对构成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和结构测定上，当需要将醛类或酮类

的羰基还原为次甲基时，常常要用到开息纳-武尔夫(Kishner-Wolff)还原法，但是此法要用封管和金属钠，以及难以制备、价格昂贵的无水水合肼，而且在应用此法时如果有极少量的水分存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副反应。虽然国外有人进行过改良，但效果不显著。1946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黄鸣龙对此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经他改良，反应过程中先蒸去水分，然后回流加热，这样就可以用普通的 85%水合肼代替无水水合肼，用氢氧化钠代替金属钠，从而使还原程序简化，产量大幅度提高，得率可达 95%。黄鸣龙还对这种方法的范围作了许多研究，可以用来合成女性激素雌酚，还可用于甾体化合物中还原酮基得到 80%的正常还原产物，对某些含内酰胺基的酮类化合物也能正常地还原。黄鸣龙改良的开息纳-武尔夫还原法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写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简称为黄鸣龙还原法。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化学研究初创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有机化学工作者以他们丰富的研究成果，紧紧追赶着世界化学前进的步伐，有的对西方化学家的工作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有的提出了最新的学说和实验方法，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在研究如何把化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清华大学的高崇熙，以北方特产大麻子油为原料，先后制得了辛醇、酉二醇、庚醇、辛胩、丙二酸庚酯、癸酸乙酯、溴庚烷、十一烯酸、壬二酸等等，这种利用中国资源、大量制备纯净有机化合物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中国的有机化学研究，是一个不小的贡献。1934 年，他还同金开英、曾昭抡等人一道，在北平设立了“中国化学材料实验室”，专门制备各种特殊有机药品及分析药品，供各大学和研究机关使用。抗

日战争开始,后方化学试剂极度缺乏,高崇熙又从精制三酸为起点,研制化学试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战争导致进口试剂来源中断所造成的损失。

要追溯近代化学在中国创立的历史,就必须提到一个在化学诸多领域成绩卓著的人——曾昭抡。1926年,他在美国以《有选择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继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用低级醇制备卤代烷、以肟类在醇溶液中还原来制备胺类、在不同条件下制备谷氨酸、它们与胺类和铵盐的作用以及d-谷氨酸的转化作用、有机金属化合物的性质、酮的一元肟水解成酮、合成甘油酯等等。他与合作者共同合成的对-亚硝基苯酚,后来被载入了有机化学词典,为国际化学界所采用。另外,他还和孙承谔等人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制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若求某化合物的沸点,只须将各原子半径代入即可算出,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溶点的公式。在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的研究及改良方面,曾昭抡也作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经他改良的Mulliken熔点测定仪曾在中国各大学普遍采用。曾昭抡及其合作者的工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一部分水平,有的为世界化学界所重视。更重要的是,他处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的精神和行动,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无机化学。

自然科学在中国建立的初期,各门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则更为突出。对于整个化学领域来说,无机化学的发展就属于比较迟缓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

数量上，都远远比不上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就没有无机化学，中国的化学工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为中国的无机化学事业播下了种子，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贝采里乌斯(Jons Jacob Berzelius，1779—1848)于 1818 年由两元素直接合成了 Se_2Cl_2。后来他的方法经六次改进，都认为产物遇水分解，不得与水接触。1925 年高崇熙试验了 8 种新方法，证明 Se_2Cl_2 可在含 70%的水的体系中制备出来，产率为 90%。这一结果，得到了无机化学界的称赞。不久后，高崇熙用同样方法制得了 Se_2Br_2，并测出了它的沸点、熔点、密度和折射率等物理性质。此后，他及其合作者又陆续精制出 Cu、Zn、Mn、Co、Ni 的硒酸盐和苯胺络合物，还用浸液折射计法测定了硒酸铜从 0 到 40℃的溶解度。这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对硒及其化合物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2 年，戴安邦(1901—　)发表了"氧化铝水溶胶的本质"的博士论文，以配位化学的观点阐明了氧化铝水溶胶的组成、性质、结构和生成机制。这是中国较早从事胶体化学与络合物化学研究的成果。自此，他对硅、铝、钨、钼、钍、铬、铁等元素的多核配合物化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了戴安邦的工作以外，络合物化学的研究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进展，例如硼酸溶液中加入多羟基化合物后$[H^+]$或 pH 值计算公式的提出、五氨一水合钴及四氨二水合钴的硫酸盐的组成随硫酸浓度而改变的研究等等。这类研究虽属凤毛麟角，但在化学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已是实属不易了。

在西方，对重水的研究肇端于三十年代初期，1931 年发现

重氢,1935年重水投产。而在这时,中国尚无重水的生产,自然更谈不上研究了。1935年,在德国学习的张青莲完成了重水的密度-温度状态图,1936年又提出了地球上重水和重氧水的分布理论,这是中国学者在国外作出的又一项重要成果。1937年张青莲回国任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鉴于当时国内不能生产重水,因而带回了少量重水,以便继续进行研究,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四十年代,张青莲与其合作者进行了两次重水热膨胀的精密测量,所得结果与国外研究非常接近。这是中国重水研究中颇为出色的一部分工作。他还研究了重水的Laindler反应,证明这种反应在重水中的速度比普通水中更快;对 D_2H_2 与HI的反应速度的研究结果也是如此。1949年,张青莲等人以铂为阴极,在室温时电解含有氢氧化钠的重水稀溶液,求得了氕氘的分离因素,从而证明了Eyring-Glasstone-Laindler超电位理论(即氕和氘在阴极上的超电位不同)。这些工作构成了草创时期的中国同位素化学研究。

1949年以前,在无机化学方面,纯粹无机化学范围内的研究寥寥无几,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无机化学应用方面,也就是无机工业原料和方法的研究,其中有对四川自贡的盐、山东博山的陶土、浙江富阳的矾等物产的分析与开发,以及侯德榜对酸和碱的研究,等等。

无机化学应用方面的工作除了前述的以外,还有潘履洁关于电解电镀的研究和抗战期间对活性炭制造的研究,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潘履洁对铜、黄铜、镍、银、锌等金属的电镀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寻找铜电镀液中Cu、游离氰基以及 Na_2CO_3 的最佳摩尔数比、绘制

可省去计算麻烦的控制和调节镍电镀液 pH 值的图表等。潘履洁的工作,代表了中国三十年代电解电镀研究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化学工作者深感国防化学的重要,不少人开始关注于军用物资的制造。在一二九的淞沪之战中,日本人使用了烟幕,因而上海方面的化学家对活性炭作了一些研究,临时赶制了防毒面具送往前线。这场战争刺激了对活性炭制法的研究,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实验室扩展到了工业生产。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实业部中央工业实验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都先后开始了这项研究。其中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首先用化学活化法获得了成功。北京大学的研究结果认为活化时用二氧化碳代替蒸汽可提高产量而无损于质量。然而,对活性炭的研究始终未能工业化,五六年后更是销声匿迹了,因而政府所办的防毒面具厂仍不得不购买德国制造的活性炭。抗战期间,中国化学家在用土法研制军用化学物质如火药火器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4. 物理化学。

从 1877 年德文的《物理化学杂志》创刊时起,几十年来,在化学各科中物理化学的发展是最为迅速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人们羡慕的是西方工业的发达,因而更加崇尚科学的应用,而往往忽视了纯粹的理论学科,这就使物理化学这门需要非常精密的实验仪器和同时具备深厚的数学、物理学功底的研究者的学科,在中国难以得到长足的进步。据统计,1931—1940 年的 10 年间,美国《化学文摘》所摘录、以及《中国化学会会志》和《中国物理学报》所发表的中国学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是前 10 年

的5倍多，而其中在国外完成的论文则约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物理化学是近代化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起步虽然较迟，发展较缓，但还是有一些工作出类拔萃，为世界化学界所关注，同时也为化学在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9年，傅鹰(1902—1979)在美国发表了《硅胶自溶液中吸附问题》的博士论文。著名的屈劳倍规则认为，吸附量随溶质(同系物)碳氢链(CH_2数目)的增大而有规律地增加，然而在傅鹰的论文中，他却以二氧化硅水解制得的纯净硅胶自四氯化碳溶液中吸附低级脂肪酸的同系物，证明吸附量的顺序为甲酸＞乙酸＞丙酸＞丁酸，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屈劳倍规则可以是完全颠倒的。在当时这是一个罕见的结果。此外，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提出硅胶能强烈吸附碱，吸附的顺序为$LiOH > NaOH > KOH > NH_4OH$；但只能吸附少量有机酸(10种)，不能吸附无机酸(4种)。同时，他还测定了这14种有机酸和无机酸的水解吸附。这篇论文对影响溶液吸附的各种因素(包括溶质、溶剂和吸附剂表面三者的性质)所作的有指导意义的分析，已成为吸附理论的组成部分，有不少学者多次引用这一论文的结果，并认为其结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另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傅鹰在仔细考察润湿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化学方法，这在当时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与著名的B. E. T. 气体吸附法相比，这项工作要早八年，而且不必假设吸附分子的面积，在许多胶体化学的经典著作中都对这一方法作了介绍。这些工作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作为物理化学内容之一的电化学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极少

引人注意、发展迟缓的分支学科。各大学的课程表中列入了电化学的，不论是选修还是必修，都是寥寥无几，自然就谈不上专门的实验课了。然而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学者也有较为出色的工作。早在191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刘树杞（1890—1935）就完成了很有价值的《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的博士论文。用这种方法，能将有机物销毁而将铬酸和硫酸回收，在回收有用物质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因而在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应用后颇受厂家欢迎，并申请了美国专利。直到四十年代，刘树杞这一博士论文的结果，还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被引用。他是中国最早研究镀铬的人。1929年，刘树杞再度赴美后很快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铝合金》的著名论文。铍铝合金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抗腐蚀等许多优良特性，随着航空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的飞速发展，它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新型材料，但很多年来，化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制造问题很难解决。因此，刘树杞的成功研究，成为当时化学界公认的卓越发明，并在美国商部注册，欧美的学术刊物和报纸争相报道。刘树杞深深地了解中国富藏各种金属，他选择制造铍铝合金及电解取钨、取铝等项目，就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以解决国际民生的大问题，他亲自筹划和安装的中央大学熔盐电化学实验室、主持建设的北京大学电化实验及科研室，都是中国最早进行专题实验和科学研究的场所。

1934年，黄子卿（1900—1982）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致力于三相点的测定工作。水的三相点是热力学研究中的重要数据，而当时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精确数据。黄子卿精心设计了实验装置，运用简单的仪器，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测

试,终于测得了当时最精确的水的三相点,即0.00981℃,为热力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数据,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其后美国国家标准局组织人力重复验证这一数据,所得结果与黄子卿的测定值一致。从此,黄子卿测定的三相点被公认为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数据。三相点是温标研究中必须的几个标准点之一,没有准确的三相点数据,会使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受到影响。因此,三相点的精确测定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热学计量工作,而且对热力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都具有意义。黄子卿由于三相点的精确测定,被选入1948年美国所编的世界名人录。直到195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温标会议,还再次确定黄子卿测定的数据,并以此为标准确定绝对零度为-273.15K。四十年代以后,黄子卿又专注于溶液理论的研究工作,1947年。他在"间-硝基苯甲酸在水中的溶解度盐效应"一文中,对电解质溶液中离子-溶剂、离子-离子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此后他一直对这个课题不间断地做研究工作,他的论文逐渐受到国内外溶液理论工作者的重视。1964年,一位德国学者就在其博士论文中引用黄子卿的盐效应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在黄子卿测定三相点的同一年,还有一位中国学者也在物理化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孙承谔与美国化学家合作,发表了有关活化能计算结果的论文。1976年,在美国化学会百周年纪念时发表的"物理化学一百年"专文中,还将此列为百年成就之一,称之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并用现代精确实验证实"。在当时,孙承谔是国内最年轻的一位化学家,在美国留学时先是从事偶极距的测定,后来又致力于量子化学的计算,回

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仍然从事这两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深受化学界前辈的器重。

早在1928年赴美留学期间，李方训(1902—1962)注意到Grignard试剂在乙醚溶液中的电输现象有着出乎意料的结果。Grignard反应作为有机金属化学方面的一个重要反应，当时虽已应用，但对其机理还未阐明。李方训从这个异常现象出发，开创了Grignard试剂非水溶液中一系列性质的研究，并首先在世界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对了解Grignard试剂在非水溶液中的作用机理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他系统地对溶液中离子的性质这个物理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连续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观体积、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磁化率等几十篇论文，为国际化学界所公认，被许多中外专著所引用，从而取得了优异成果。1947年，他代表中国化学会出席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议并提交了论文，还出席了英国化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会后他应邀到英国和美国讲学，讲学期间，为了表彰他在溶液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美国西北大学于1948年特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予象征已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自从1931年玻尔(Niels Bohr，1885—1962)应用量子理论解释原子光谱以后，光谱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从原子光谱扩展到双原子分子光谱，进而到复杂的多原子分子光谱，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分子光谱学。二十世纪的前一二十年里，中国几乎没有人从事分子光谱学的研究，进入1930年代后，研究之风骤起，而且是在紧紧追随着世界的研究趋势，甚至

于出现了在所发表的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中以分子光谱的为最多的局面。当然这其中物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居多,但作为中国分子光谱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的吴学周(1902—1983),他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1933年,吴学周由德国归来,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先后带领柳大纲、朱振钧、武迟、张滂、朱晋锠等人,开展了分子光谱学的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德国《物理化学杂志》、英国《化学杂志》等刊物上共发表了16篇学术论文。在吴学周的数十篇分子光谱论文中,有20多篇影响较大。通过这些工作,他发现了一些新的光谱带系,解决了多原子分子的一些重要结构和化学反应机理等问题,在1930年代,分子光谱理论和实验技术尚处于创建初期,这些开拓性工作,对发展量子学说的物质结构理论,创建物理化学的分子结构学科,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在某些方面至今还为人们所引用。

5. 分析化学。

在化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分析化学的发展最为迟缓,最初它被看作仅仅是一种工具学科而不受学者们的重视。而在中国,这种偏见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它导致了近代中国萌芽时期分析化学研究工作的数量稀少,质量也较其他学科逊色。

王琎是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开创者,1923年他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时,首先对分析方法的准确度进行了研究,这在中国化学界是属于开创性的。他用半克重的古钱样品进行定量实验,而后又将纯的铜片、锡块、锌粉、铅粉按普通古钱的比例配成混合物进行化验。用这种方法分析古钱,能得出较为准

确的结果。1927年,王琎采用化学分析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钱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的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

要回顾中国分析化学初创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要提到韩组康(1894—1968)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少数几位未留过学中的一个,但他不仅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他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发表的铬矾中氧化铬的碘量法测定(1929)、一种化学调味品谷氨酸钠(1929)、用联苯胺测定醋酸铅中的醋酸(1931)、氢氧化钠溶液中碳酸盐含量的容量测定法(1932)、Warder碳酸盐测量法的改良(1934)、用乙酰化作用测定在香精油中的乙醇(1940)等十几篇论文,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有的被再版,有的被许多著名学者收入教科书、手册或专著中,是世界名著中最早引用的中国分析化学家的工作。他还设计了不少分析用仪器,如氢氧化钠、氯化亚钛等不能与空气接触的标准溶液用的滴定仪器、蒸发液体或驱逐气体用的玻璃棒,以及容积小于50毫升的标定溶液时用的吸管。值得一提的是,从1924年起,他用自己的工资积蓄,逐渐买了一套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上海北四川路1065号家中装置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分析化学实验室(包括当时较先进的比色计和酸度计等)。他的许多论文就是在这个家庭实验室中完成的。1934年他因病没钱治疗,才把实验室卖掉。在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时有很多科学家自己建立实验室,而在中国,韩组康是唯一在自己家中设实验室的化学家。

对于定性分析的研究,中国化学家的贡献是很大的。早在100多年前,阳离子分析就已经有了系统的分组,比较完善了,但阴离子的分析系统却始终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赵廷炳做了很多工作。他将26种普通阴离子,根据其钙盐、钡盐、镍盐及银盐的溶解度不同,分为了六组。使用这一系统分析阴离子,便可像阳离子一样有条不紊,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当然赵廷炳的这一方法并没有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但我们今天所采用的阴离子分析系统,就是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屡加改进而形成的。

在稀有元素的分析方面,1934年高崇熙和张青莲提出应该把铼元素加进去,使铼离子在碲组中沉淀析出,然后用双锥正交晶体 RbReO±4 显微法加以鉴定。早在1925年,德国化学家就发现了铼,但在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中,却一直没有把铼列入,因此,高崇熙等人的工作,是对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的一大补充和完善。另外,他还研究了以对甲基水杨醛肟作为铜的鉴定剂,创造了一种新的鉴定方法。

1939年在德国亨尼希米德(Hoenigschmid)实验室学习的梁树权(1912—　),发表了博士论文《铁原子量的修订》。他是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测定铁原子量的,先制备极纯的铁(光谱纯)和溴,然后合成溴化亚铁,以比浊法和重量法测定 $FeBr_2$: Ag : AgBr 的比例,从而求得铁的原子量应为55.850。这一结果与质谱仪所测值相吻合,于是在1940年正式为国际原子量委员会所采用,并且沿用多年。

综上所述,由于协和医学院的努力,生物化学与生理化学在

中国发轫较早、发展较为迅速，同时成绩也较为显著。除此之外，有机化学在1920年代也是颇为发达的一个化学研究领域。至于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尽管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都不如前二者，但它们在中国都同样是从无到有，一齐构成了中国的完整的化学学科体系。

第六十章　地　　学

第一节　留学生与近代地学思想的传入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地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地学研究基本上被淘汰，西方先进的地学理论则被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进步。在当时地学界影响较大的《地学杂志》于 1921 年开始刷新内容，计划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理论以及地理学名著。大量的西方地学代表作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亨丁顿的《人生地理学原理》、弗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辛普尔的《地理环境之影响》、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马东的《自然地理学专论》、哈第的《世界植物地理》等等[1]。而这一时期对近代地学理论传播贡献最大的，应属中国第一代地学人才，其中多数为归国的留学生。

这一时期留学生学成回国，促进了西方地学理论的全面介绍。留学生回国后，深感中国地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于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翻译国外地学名著，另一方面发表论著、论文介

---

[1] 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1 页。

绍西方地学研究概况和新的思想。此外留学生回国后，多数从事地学教育，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地学人才。更有一些留学生推动了中国与国际地学研究的合作。

章鸿钊于1911年从日本学成回国，他在《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调查地质咨文》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丁文江1911年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与章鸿钊等人合作创办了地质调查所。他还积极倡导并参加野外考察，并培养出象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等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翁文灏于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回国。早期执教于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曾参与了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以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创办工作。他也是最早介绍大陆漂移学说的中国学者之一。李四光曾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并于1920年学成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为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作出了贡献。还有王宠佑、朱家骅、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孙云铸等人，他们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对近代地质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近代地理学主要理论均被介绍到中国。如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各种政治地理学说、人文地理学说、工业区位论以及自然地理方面的柯本的气候分类学说和台维斯的地貌侵蚀循环说等，多数都是通过留学生传入中国的。竺可桢于1918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从二十年代开始先后发表《地理教学法之商榷》(《科学》，1922)、《何谓地理学》(《史学与地学》，1926)、《地学通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等论文、论著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学科的性质、

内容和方法。三十年代,竺可桢等人编译的《新地学》一书出版,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概况。此外他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创建了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了新一代的地理学人才。又于三十年代与翁文灏、胡焕庸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地理学会。黄国璋1928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人才。他还发表了《纽约美国地理学会概况》、《爪哇农业地理见闻撮要》、《我国国防与地理》[①] 等介绍近代地理学知识。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许多留学生,如林超、王成组、涂长望、任美锷、李旭旦、徐近之等在传播近代地理学思想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节　地学团体、机构与地学刊物

在近代地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倡议成立地学团体以推动近代地学在中国的发展。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杂志》。民间学术团体和刊物无疑加强了近代地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地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设置地学研究机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地质科,1913年改为地质调查所。政府的重视从人力和物力上保证了野外考察和地学研究工作的进行。

①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

二十年代以后，地学团体与机构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一步促进了近代地学的繁荣。1922 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1952 年改名为《地质学报》)，1936 年创刊了《地质论评》；1924 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成立，并于第 2 年创刊了《会刊》(1935 年改为《气象杂志》，1941 年改为《气象学报》)；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气象研究所；1931 年，中华地学会在上海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季刊》；1934 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创刊《地理学报》；1934 年禹贡学会成立，创刊《禹贡》半月刊；1936 年地理教学研究会和边疆研究会成立；1940 年在重庆建立了中国地理研究所。此外与地学关系密切的学会还有：1929 年成立的古生物学会、1933 年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1945 年成立的中国土壤学会、1947 年成立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等等。这些团体和机构多以传播近代地学理论、推动中国地学研究的深入为目标。他们出版地学刊物，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地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地质学会会章中规定学会的宗旨是“促成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之进步”。学会不但出版地质刊物，而且基本上每年召开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论文。学会不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还有它自己的会徽和会歌。《中国地质学会志》主要刊载会员的调查报告及会议上宣读的专门论文，《地质论评》涉及范围广泛，包括论文、报告、书评、新闻等与地质学相关的内容。从 1925 至 1945 年，学会还先后设立了葛氏奖章、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学生奖学金和许德佑先生、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等 5 种奖章和奖金，主要用于鼓励对地质学、

古生物学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①。中国地质学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气象学会的宗旨是谋求气象学术的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学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学会还提倡收集气象谚语(农谚)、协助其他单位筹办测候所、代办并检定观测仪器等,学会还曾一度设立了气象科学奖金,以促进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

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出版了《地学季刊》。在《地学季刊》的发刊辞中明确指出"惟自来言地学者,多偏重记载……而于人地相应之故,置之不论。于是所谓地学,遂无异于地名辞典"。虽然《地学季刊》只出了 2 卷 8 期,但因为其宗旨是为了研究地学"如何改造之途径",为了"发展地学",因此《地学季刊》在翻译、介绍国外地学研究概况、新的地学理论,以及发表中国学者对地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最新地学研究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水平均站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地理学会也是一个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在《地理学报》创刊号"本会发起旨趣书"中提出"欲与气象、地质学会鼎足而三"。学会的宗旨是"收集地理资料,传播地理知识,从考察、讲习、讨论、出版诸方法以达到此目的"。

除了以上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外,当时还有许多专门从事地图和地学著作的出版机构,如东方舆地学社、世界舆地学社、大陆舆地社、亚光舆地学社、亚新地学社等。这些出版机构在中国

---

①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2 页。

近代地学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像亚新(舆)地学社不但出版地图和地学著作，还组织出版《地理集刊》，组织编撰《亚新舆地丛书》。社长邹新垓在丛书序言中指出：出版丛书是为了“地学理论之阐明，新知之介绍，名著之翻译，调查报告之发表”，可见这些机构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

第三节　近代高等地学教育

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地学高等教育发展时期，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批地学系科，从而使中国的地学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各大学地学系在传播近代地学思想和培养中国近代地学研究人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3—1916 年，地质研究所培养了 20 多名地质人才，“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时”①。1915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文史地部，1921 年改为东南大学，设立地学系，系内设有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1928 年改为中央大学，1929 年设立地理系，1930 年设立地质系。1917 年北京大学开办地质学系。1921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史地部为史地系，1923 年该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28 年史地系改名为地理系。1924 年广东大学设有地学系。1925 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大学，1929 年设立地理系，1932 年改为地学系。此外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也先后设立地学系，培养了不少地理学人才。

---

① 王仰之：《我国早期的地质教育》，《中国科技史料》1982 年 1 期。

地学系不但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创立了地学团体、出版地学刊物。如上海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创立了大夏史地学会,出版了《史地丛刊》(1934);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二年级学生成立地学研究会,1920年改组为史地研究会,创刊《史地学报》;1932年以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为主,成立人地学会,1928年创刊的《地理杂志》(后改名为《方志月刊》),编辑出版《人地学丛书》。

由于地学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近代地学教育的文章、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地学教材。如胡焕庸的《改进大学地理教育刍议》、张其昀的《地理教育之目标》和《地理学与大学教育》、白眉初编《最新民国地志总论上・地文之部》、竺可桢编《地学通论》、王华隆编《自然地理》等。这些文章和教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资料上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解放前,绝大多数地学人才是靠高等地学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在地学教育及地学研究中,均作出了贡献,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地学发展的开拓者,并为新中国建立后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成就

(一) 地学理论

1. 定义。

由于许多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使地理学者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产生了地理学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问题。这促使地理学家们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范围。这种探讨促进了中国地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姚存吾在《地理学之解释》(《地学杂志》,1922,1)一文中指出:(1)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竺可桢也曾专门著文阐述《何谓地理学》①。他在文中引用了美国学者台维斯(Davis)的观点:"地学者,乃研究地之一种科学,尤其是研究地与人间关系之一种科学。"周立三在《地理学的对象及其任务》② 中则提出地理学的对象是地球表面之景观,地理学的任务是地域个性之认识。并总结说:"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李长傅著文《地理学本质论》,列举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对于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③。任美锷也认为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李春芬也在《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④ 一文中指出:"地理学是地域辨异的科学,它的对象是地域","它研究地表现象或要素共生共存的相互联系并从中研究地域差异"。当时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认识到了地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了地理学

① 《史学与地学》1926 年第 1 期。

② 此篇文章写于 1929 年,发表于《地理》,1942 年第 2 期。

③ 《地学杂志》1935 年第 1 期。

④ 《地理学报》1948 年第 1 期。

应“以自然科学为立足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①,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这也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关键所在。对地理学定义的探讨影响着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当时地理学的研究向着通论和专论两个方面发展。

2. 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深感传统“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正是这种研究方法阻碍了中国地学的进步,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学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

张其昀提出研究地理学的 4 条新途径:(1)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上 4 点也是中国传统地理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当时对于地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四是强调地图在地理学研究中

① 张沦波:《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地学季刊》(1)3。

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针对中国传统地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

本世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无疑促使地学在本世纪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理论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区域研究

近代区域研究于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得以迅速的发展，是与当时对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的。"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最终目的"，这种观点似乎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区域研究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综合性研究特色而成为地学的主要内容。"区域"是近代地学传入中国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学术语之一。

1. 区域划分原则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区划有两大特点。首先，区域划分的方法、侧重点不同，数目上也相距很大，对于区域划分的方法也未形成共识。据冯绳武 1946 年的统计(《地学集刊》)，当时主要有：1926 年张其昀分为 23 个区；1934 年葛利石(George B. Cressey)分为 15 个区；李长傅分为 26 个区；洪思齐分为 25 个区；王益厓分为 23 个区；1935 年张其昀又细分为 60 个区；1936 年斯坦普(L. D. Stamp)分为 17 个区；1939 年李四光分为 19 个区。其次，对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探讨开始较晚，主要集中于本世纪四十年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近代地理学起步较晚，缺乏大型地学综合研究机构有关，因为对区域划分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它需要以地学各分支学科的考察研究成果为基

础。这一点当时的学者也有认识,1934年洪思齐在《划分中国地理区域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了区域划分研究的四点困难:"(1)精密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天然植物,及人口分布之研究尚未普遍于全国各地,综合的地理研究殊难着手。(2)地理的要素既不止一端,难免顾此失彼。(3)地理区域之范围必须大小适宜,盖太大则失于笼统空泛,太小则失于零碎混乱。(4)地理区域之界线非尽清晰有定"①。

在确定区域划分的原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面对众多的地理要素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也是众说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应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等量齐观","以自然环境中之气候及地形为经,以人生活动方式之差异(如农、林、工、矿等要点)为纬,提纲携要而分之"。也有些学者侧重于自然因素。更有学者认为在综合考虑各自然要素的同时,强调交通是区域划分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建议以大都会作为提纲挈领之一法。当时学者对于区域划分原则的认识差异较大。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区域划分过程中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各地理要素,同时又认识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具体的划分过程中只有侧重某些重要的地理要素进行区域划分。例如洪思齐首先根据气候和水利分为两大区,再考虑其他地理要素划分亚区;而冯绳武则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分为5区,进而再划分亚区。每位学者在区域划分中侧重点都不尽相同。随着区域地理学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专题性的区划研究,例如气候区划、农业区划、工业区划、植物区划以及地质区划等等。

---

①《地理学报》1934年2期。

2. 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区研究。

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区域研究应该为区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俾地尽其利，人竭其力，则本区自可日渐繁荣”。要想使“俾地尽其利”就必须进行地理区域综合研究，以便“发现地域个性”，充分地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在区域研究过程中，地学工作者注意到，区域范围的选择不宜过大，“若范围太大，每以精力、时间、财力所限，不能详加探讨，便失掉了专题的用意”。因此在区域选择上，“最好是一个岛屿、山谷、冲积扇、三角洲、一丘一埠等，因为这一类的研究，宜于精细”。因此当时多以专区性研究成果为主。许多论著，像《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曲靖盆地》、《河西走廊》、《江都西山丘陵区之地理概述》、《渤海地域之研究》、《川东平行岭谷区之自然与人生》、《四川东南山地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专区地理研究论著。

（三）地质学

1923 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卷上发表了《有助于䗴类专门鉴定的图解法及其应用于华北䗴类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古生物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同年，葛利普应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地质调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古生物专业人才。到 1929 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地层古生物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了确认[①]。1924 年孙云铸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古生物

①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3—203 页。

学专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促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发展。

二十年代后,对矿物和岩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当时对陨石、宝石、玉石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1922年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上发表了《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一文,提出了他的玉石命名方案。这一时期对于碳酸盐类矿物、黄铁矿、锰铁矿等矿产资源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岩石学方面,以火成岩的研究最系统。1934年叶良辅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号上发表《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一文,对当时火成岩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对花岗岩的岩石化学、岩体构造和基性、超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6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第3—4期上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阐述了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世界地质学界的注意。1945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阐述了地槽——地台说,并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四)自然与人文地理学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通论地理学有了新的进步,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自然规律、人地关系的探讨,而且强调地理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尤以气候学、地貌学和土壤地理学成果最多,但在水文学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地图学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进展,无论从理论水平上还是绘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专题地图也很丰富,

出现了地质图、地形图、水道图、边疆图、交通图、旅游图、历史地图等。地貌学中以地形学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质学家担任的，因此他们重点阐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对地形发育的影响，而对于地形发展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地形与现代外力过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研究①。此外对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区域地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气候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发展也很快，对中国气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气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气旋、气团、季风、温度、雨量均有论文发表。土壤地理学中对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类、土壤肥力、土壤侵蚀等也有较好的论文发表。海洋学中对海岸动态、水温、海水运行等也有研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不但论文数量多，而且研究也较深入。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从论文和著作数量上明显超过自然地理学，而且又以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最突出。不但理论研究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丰硕，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农业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垦荒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关系等的研究。工业地理对工业布局、工业区位也有研究。此外对矿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边疆地理、文化地理、国防地理、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等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① 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1959 年铅印年，第 163 页。

(五) 地学考察

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地学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地学研究的深入,指出"试看古今中外,凡是对地理学有造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学工作者们疾呼:"我国不提倡新地理则已,欲提倡新地理,当由实地考查入手。"他们不但意识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制定了直接观察、口头访问、表格调查、采集标本和摄绘影图等5种地理考察方法,编定了地理考察纲要。考察内容相当详细,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动物等,人文景观包括土地利用、农业、矿藏、工业、商业、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会状况、教育、历史背景等内容,每一需要调查的要素下还有1至2级的亚类。地理考察的内容已相当全面,分类也较合理。

中国近代地学考察中,以地质学考察开始较早。早在本世纪初,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生们就从事地质考察,1920年《北京西山地质图》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地质考察的结晶。1929年,丁文江率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10余名人员赴西南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绘制了地形地质图,并于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主要由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们进行的。如1930年中山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调查团对云南中部的考察,1934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对西双版纳的考察和两淮考察队对苏北两淮地区的区域考察,1942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与地质系、生物系联合组织了100多人的川西科学考察团等等,当时主要大学的地理学系都组织了地

学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考察实习，所以多数没有写出考察报告。此外，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组织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学工作者参加。如张印堂参加了为修建滇缅公路、铁路而组织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并写成《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较大规模的地理学考察是在地理学研究机构成立后的四十年代进行的。1942—1944年地理研究所曾两次组织专门地理考察队，考察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参加者有林超、黄国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写出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地学考察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地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近代地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足不出户"的传统地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十一章　生　物　学

第一节　生物学教育的进步

1919年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了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救国。在这股强大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在生物科学方面，不断引进了新的东西，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普及工作，使这门科学得到较快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批大学出现了生物系。首先是1923年以后，前编提到的数所高等师范均改为师范大学，然后又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如武昌高等师范进一步改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合并，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沈阳高师则并入东北大学。广东高师与其他专门学校合并，后来又进一步扩充成为中山大学。成都高师与其他学校合并，最终成为四川大学。原设的博物部也都改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农业大学也设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了农业生物系。此外，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也设立有生物系。1926年以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数量大增，大学的师资迅速充实，设立生物系

的大学不断增加。如清华、燕京、北平中法、中国、复旦、沪江、同济、南开、金陵、齐鲁、厦门、福建协和、岭南、河南、湖南等15所大学在此期间都设立了生物系。1927年后，新设立生物系的大学又有浙江、山东、辅仁、云南等10所。到1930年，我国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生物系。教师一百数十名，在校学生数百人。

1928年，政府规定了“戊辰学制”。第二年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把小学的“理科”改为“自然”，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自然科”，大体包括相同的学习内容。高中设生物课。从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是考虑到与高等教育有机衔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纪初开始，上海等地都编发过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学用书相对少一些。1923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邹秉文、胡先骕和钱崇澍等编的《高等植物学》、和薛德焴编写的《近世动物学》，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主要动植物学教材。当时的教材还有李积新编、胡先骕校的《遗传学》、陈桢编的《普通生物学》。后来还有蔡翘著的《生理学》、《人类生理学》和实验指导，朱洗和张作人合著的《动物学》、张珽著的《生态学》等。参考书除前面说到的《植物学大辞典》外，还有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钟心煊的《中国乔灌木目录》、刘汝强的《华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统植物学》、杜亚泉等编的《动物学大辞典》、贾祖璋、贾祖珊编的《中国植物图鉴》等。一般大学经常采用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这可能是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初期需要经历的一种现象，在当时也有有利于与西方大学接轨，便于学生在外进一步深造，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引进的一面。

第二节　生物学研究的进展

前编曾提到钟观光在我国十余省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但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献。1919 至 1920 年,胡先骕在浙江和江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1922 年 8 月,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第一届植物部主任。生物所初创时,缺少经费,房屋、设备均由东南大学提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研究人员全部由大学的教师兼职,在秉、胡等带头人以身作则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积极献身祖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从 1922 年到 1937 年,研究所的人员由四五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他们不仅开展生物形态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对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动物调查偏重昆虫;植物调查则着重对江苏、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区的考察和标本收集。抗日战争前,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郑万钧、裴鉴、孙雄才和吴中伦都参与了调查采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标本资料。该所从 1925 年开始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汇报》,至 1942 年刊出 12 卷 3 期后停刊,先后发表了研究论文数百篇。还出版了《中国森林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马鞭草科》等书籍。

1920 年,植物学家陈焕镛自美国学成归来,1924 年在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了十个月的植物标本。1927 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创设了农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长。这个农林植物所着重对

华南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战前参与该所调查采集工作的有蒋英、左景烈、侯宽照、辛树帜和汪振儒等。1930年，他们开始刊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1940年出至第4卷后停刊。农林植物所至1934年，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1935年，陈焕镛又在广西创设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长，两个研究所合作采集广西和贵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经济植物。在陈焕镛的出色领导和组织下，农林植物所的植物标本增加到15万号，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余人。陈焕镛从1922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起，陆续刊出多种重要的植物学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年于南京筹设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正式成立，分动、植物两组，钱天鹤任主任①。1934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裴鉴任植物部主任。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动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抗战前，秦仁昌、蒋英、裴鉴、耿以礼、邓叔群和杨衡晋都曾参加调查采集工作。并出版英文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刊》(Sinensia)，后中文名称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刊》，到1941年刊出12卷后停刊。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到重庆北碚。1941年，动植物所扩大组织，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分别由王家楫和罗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充至生理、生态，以及藻类和菌类等方面。抗战胜利

---

①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第2期。

后,两所都迁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是由尚志学会拿出范静生生前捐款中的15万银元作为基金,范静生后人捐赠其故宅作为所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经费形成的一个研究机构。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长。静生所开始比较注重北方动植物调查。这个所刚成立时有职员9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师胡先骕,动物部技师寿振黄、刘崇乐,植物部助理唐进,绘图员冯澄如,庶务周汉藩,文牍张东寅。

1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12人,有动物标本近28000件,植物标本18000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1930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出版。1931年,我国木材解剖学的开创者唐耀到该所任研究员。从1932年起,秉志辞去所长职务,改由胡先骕任所长。为了适应动植物标本日益增多的具体情况,所内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分别由张春霖和秦仁昌任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主任。同年我国的第一家木材实验室在该所成立。与此同时,静生所还派出了以蔡希陶为首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赴滇考察、采集,1935年王启无接替蔡希陶继续采集。另外,1932年还与四川西部科学院合作,组织西南考察队到四川进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员。1934年,静生所与中国科学社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到海南考察收集。该所还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尔等地作生物收集。1934年,静生所还和江西农业院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植物园。由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其标本室主任一职改由李

良庆担任。到抗战初期静生所的动物标本达到37万余号，植物标本43万多号，职员最多时为47人。1938年，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职员全是静生所的人，如汪发缵、蔡希陶等。《静生生物所调查汇报》作为静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1941年共刊出动物学十卷，植物学十一卷，从1943至1948年又刊出新集(n. ser)三期。共刊出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69篇，其中动物学方面133篇，植物学方面136篇[①]。此外，静生所还出版了《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国山东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书籍。

静生生物所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蕨类专家秦仁昌1940年在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把占蕨类植物90%以上的原水龙骨科分为33个科249个属，以一个崭新的自然系统代替传统的分类方法。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植物学界赢得了荣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48年，胡先骕和郑万钧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联名发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该文发表了我国湖北磨刀溪首次发现水杉这种活化石。此事震惊了世界植物界，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1929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年改为生理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经利彬代理生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和陆鼎恒分别担任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

---

① 吴家睿:《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

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规模都比较小,到1935年,每个所的职员都不足10人。但科研人员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和中国内地的野心十分明显,为保存科技实力,1936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图书仪器、标本和研究人员都迁到陕西武功,与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动物研究所为了走在日本研究机构的前面,也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动物采集团。"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研究院各单位开始内迁。1938年,生理所和动物所迁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1944年迁到昆明,另组一植物所,原来的西北植物调查所仍坚持工作。动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生理所、动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后迁回北平。迁回后的人事有所变动,生理所由朱洗任所长,动物所由张玺任所长,植物所的所长仍为刘慎谔。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由王振华代理所长。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如经利彬、张玺等对于脊椎动物脑之比重及水分之含量的研究;经利彬等对于茵陈、黄连、柴胡、秦艽利胆作用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中国北方食物与血中磷钙质含量关系的研究等等。朱洗主事后,着重进行细胞生理、生殖生理和发育生理的研究。动物研究所主要对我国各类动物进行调查分类,研究范围包括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等。抗战前主要对海洋动物作调查研究。如张玺对胶州湾软体动物的研究,陆鼎衡对同一地区节肢动物的研究,及张玺和陆鼎衡等对山东胶州湾等地文昌鱼的研究,沈嘉瑞等对甲壳类的研究等等。该所的一些成员对我国北方的鸟类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迁到云南后,

对当地的畜养动物和滇池的鱼类等作了一些研究。迁回北平后，朱弘复作了一些昆虫分类研究。他们编有《烟台鱼类志》等书籍。收藏动物标本12000余号。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所和动物所一样，成立于1929年。设有高等植物研究室、低等植物研究室和药物研究室3个室，还设有植物园和标本室。该所研究方向也主要在植物的调查分类。每年都派人外出考察采集。除刘慎谔外，林镕、钟观光、孔宪武、汪发缵、郝景盛等参加了调查采集。抗战前，以华北和西北地区为主，亦稍及东北和东南。抗战期间，该所人员对西南云、贵、川三省和福建的植物采得很多。共得各类植物标本计15万号左右[①]。以华北和秦岭地区的植物为多，而采自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标本尤为珍贵。除分类学研究外，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钟观光还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我国的本草植物。1931年创刊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出到第6卷第1期，发表了不少文章，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刊，1949年解放后又刊出一期。并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册等。

1930年，在四川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1932年成立植物部，俞德浚和曲钟湘先后任主任。西部科学院主要是为开发四川自然资源和为民生实业公司服务成立的。但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标本。

除上述研究机构外，当时各大学也做了大量的生物学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的吴韫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顺卿，协和医学院

---

① 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

的刘汝强，金陵大学的陈嵘、戴芳澜、俞大绂，东吴大学的李惠林，岭南大学的陈秀英等，厦门大学的钟心煊，华西大学的胡秀英在植物分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中山大学的罗宗洛，武汉大学的汤佩松，西南联大的殷宏章等在植物生理和生态学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中央大学的张景钺、严楚江等在植物形态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动物学方面，东吴大学的胡经甫在昆虫学方面作了我国解放前最出色的工作。他花了 12 年，走访了世界许多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编写的《中国昆虫名录》，全书 6 卷，4286 页，包括我国当时有报道的昆虫 392 个科，4968 属，计 20069 种，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昆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东南大学的邹钟琳、吴福桢，浙大的蔡邦华等等。此外，震旦大学的朱元鼎等在鱼类学方面也有出色的工作，他著的《中国鱼类索引》，列有国产鱼类 1497 种，是当时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必备的参考文献①。

在生理学方面，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冯德培、吴宪等在胃液分泌机制，循环生理、肌肉神经，以及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化学和营养学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就。而上海医学院的蔡翘、东南大学的孙宗彭在内分泌、循环生理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②。在遗传学方面，南通大学的冯肇传以玉米为研究材料，做了一些遗传育种研究，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陈桢用现代遗传学理论，对我国观赏动物金鱼培育形成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受

① 参见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1944 年。

② 参见王志均等:《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到学术界的瞩目。燕京大学的李汝淇，厦门大学的陈子英也都做了一些实验性的研究工作。

第三节 学术团体

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科学团体是上面提到的科学社，但这不是专门的生物学学术团体。1924年，留学法国学生物的周太玄、刘慎谔、汪德耀、张玺、林镕、刘厚等40余人在里昂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1928年移到国内。并出版有关的生物学期刊。

1926年，生理学家林可胜和生化学家吴宪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并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1927年出版了创刊号。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生理学期刊，在1949年解放前夕发行到第17卷第2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该学会对会员资格限制很严格，有论文才允许参加。后来有会员百余人。

1928年，由张巨伯、吴福桢、柳支英、程金藩、李凤荪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六足学会"(初亦称中国昆虫学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后因经费拮据，4年后即停止活动。1944年，张巨伯、邹树文、吴福桢、邹钟琳、刘崇乐、陈世骧等30余人在重庆又发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

1933年，胡先骕、钱崇澍、陈嵘、李继侗、张景钺、裴鉴、秦仁昌、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张珽等在四川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①，当时即有会员百余人。第二年，学会会刊《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1935年增出《中国植物学汇报》。

① 汪振儒等:《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1934年,秉志、薛德焴、胡经甫、王家楫、朱洗、任国荣、伍献文、蔡堡、陈心陶、陈桢等在庐山发起成立了动物学会。当时有会员300多人,并出版《中国动物学报》。

上述生物科学团体的建立,对加强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协作研究、切磋学术,促进生物学各分支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在近代发展科学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爱国仁人志士一样,充满高昂的创业精神,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进而使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屈不挠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为我国后来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六十二章　医　药　学

这一时期医药学的特点是西洋医学在我国的成长壮大，以及固有的传统医学受到歧视、排斥的过程。出于自身生存的要求，两个医疗体系之间的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

第一节　西医的发展和壮大

西洋医学是一种应用性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西方人可以用它来治病，中国人同样也可以用它来治病。因此，随着西医影响的扩大，它在我国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迅速壮大起来。

1. 医学教育的发展。

已如前述，西方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吸引一些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医学，学成后回国，开展业务。但这种形式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西方教会开始在我国创办一些医学校，较大规模地培养西医师。早在上一阶段的末期，美、英、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已经在广州、上海、苏州、北京、四川等一些城市建立医校，其中如1870年嘉约翰就把广州的博济医局改成博济医学校，是为最

早的教会医学校。其他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北平的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医科大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总之,这一时期由各国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估计有近20所左右,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院校由政府承办,成为国立医学院。到1949年以前,由这些西医学院校培养出一大批西医,成为我国这一时期西医的主要骨干。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国立的西医药院校,如早期的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校、新军军医学堂;民国时期较著名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药科专科学校等。

总之,这一时期西医药院校林立,大约由教会创办的约20所,而由政府设立的前后不下30所。通过这些学校,培养出大批西医药人才。

2. 继续创办医院。

通过早期创办的教会医院,西医逐步扩大了影响。已如前述,到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教会医院业已分布到全国,甚至在较偏远的小城市,也有教会医院的创立。如《中华年鉴》所载,到1936年统计的数字,在全国20个省建立的教会医院已达426所,床位数多达27553张。

以上这些教会医院在初创办时,一般由教会管理和维持经费。随后,逐渐过渡到由教会和中国人共管,甚或单独由中国人来管理。

3. 卫生机构、团体和出版书刊。

清末,在政府中首设卫生司。民国时期,于1928年改设卫生

部，总管全国医药卫生行政事务，直接隶属于内政部。此后，卫生部曾改为卫生署，时而由行政院管辖，时而由内政部主管，时而恢复卫生部建制，时而又改为卫生署。卫生部（署）之下或设司，或设科，主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并有直接管辖的一些卫生或医药科研机构，如中央卫生实验所、中央医院、各地防疫处、助产学校、护士学校等。在中央卫生机构之下，各省设卫生局，管理地方医药卫生事务。至于卫生机构的行政领导，几乎全部由西医充任。

在医学团体方面，以中华医学会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著。1914 年，由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医生发起组织中华医学会，次年，在北京开始出版《中华医学杂志》。它们是我国创办较早，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和期刊。几乎于同年，还组织了中国护士学会。中华医学会还组织专科学术活动，如最早的医史研究会，就经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开辟医史专栏、专刊，大大促进了我国医学学术的交流和繁荣。

在这段时期，成立的学术团体和创办的医学刊物，有相当一部分代表不同学派、不同教会的利益。仅以期刊来说，到 1949 年的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出版过的大小期刊至少有 100 种以上。这些学术刊物对于促进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医学专著在前一时期的由传教医生们编译为主，转而成为输入和出版西医主要医著为主。这些西医著作大多为西方医学院校之各科课本，直接引入，其间影响较大的重要医著如内科、外科以及临床前期的基础课本，也有译为中文问世的。此外，也出现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西医专著，但为数较少。

第二节 中医兴废之争

中医兴废的问题，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此以前，西方医学已经陆续传入我国，西医作为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一种医学体系，与中医在学术上是无法调和的。作为一种应用科学的西医，同样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因为科学并无国界。但由于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而掌握医疗技术的医生也是社会的一员，因而社会的因素不能不影响医学本身，从而中西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社会的印记。

1. 废除中医的提出和提案。

废除中医的言论，起自近代。

最早提出废止中医的，起自清代一位经学根底很深的学者俞樾。俞氏字荫甫，浙江湖州人。他的经学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俞楼杂纂》，即列有"废医论"专章。该章从医巫的关系，中医的脉理、药理等方面，提出医道可废的论点。如果说，近代废止中医的言论是由于一些受西洋医学乃至哲学等思想的影响，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所致的结果，则俞樾的废医论当不在其列。因为俞氏的生活年代里，西医尚未大量涌入，只是零零散散的活动，且俞氏之废医言论中，无一句涉及对西医的评价。如果要寻找其思想根源，恐怕只能是他本人对中医的无知和偏见。

真正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医，并积极主张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余云岫。余氏名岩(1879—1954)，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亲眼目睹日本政府以政令消灭"汉医"，通

过明治维新而走上富国强民道路的现实，因而认定在我国也唯有走科学救国，消灭中医才是出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及其经典著作进行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限制乃至消灭中医发展的具体措施，先后发表许多文章和专著，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些文章后来先后收集汇编成《医学革命论》，共 3 集。

余氏消灭中医的根据，大致是以下这几点，这充分表达在他所著的《灵素商兑》中：

认为中医的理论不能成立，“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一节可以为信”[①]，主张必须把中医的所有理论“一切打破”，而不能半信半疑。

否定中医具有疗效。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能治愈病症，或者是“幸中偶合”，“贪天之功”；或者由于“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或者为“精神上之慰藉”，或者为“传语之过量也”[②]。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甚至也反对当时颇为盛行的中西医汇通的思想。他认为，中医是“以太古以来经验所得之治疗法为基础，附会之以谬误之解剖，空想之哲学……而必欲勉强牵合，则有格格不入之势。虽同冶一炉，犹然冰炭水火，貌合神离……亦惟以欺俗世盗虚声而已耳”[③]。

积极主张废弃中医的另一个代表是汪企张，他和余云岫是同学。他同意余氏的主张，称中医为玄医，积极主张消灭中医，用西医来代替中医。

---

① 《医学革命论集·灵素商兑·引说第一》。
② 《医学革命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③ 《医学革命论·研究国产药物协议》。

主张废弃中医的一派人，不仅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还提出十分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表现在以余云岫为首的这些人于1929年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个提案提出了消灭中医的方法(节录)①：

(1) 处置现有旧医，其方法包括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旧医研究会等纯属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旧医在1929年已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以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为15年；

(2) 禁止旧医宣传。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之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个提案后来由于中医界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当时的教育部却明令所有的中医学校一律改成“中医传习所”，不予立案，也即政府不承认其具有合法的学历②。

2. 三一七国医节。

余云岫的提案在当时是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经该会修改成一份“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加以实施。

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中医界广大中医及人民群

① 《医界春秋》，1929年34期。

② 《上海医报》，1929年4月。

众的反对，全国共有40多个中医药团体联合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共有262人参加，代表着全国15个省的132个团体。大会经3天会议，最后提出的提案多达100多件，其大致内容包括①：

(1) 发表宣言，否认废止旧医提案。

(2) 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一永久性医药机构。

(3) 组织请愿团晋京，向全国代表大会及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旧医的提案。

(4) 国医学校应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准予立案，在各省设立国医药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及药物陈列馆。

(5) 加强宣传中国医药学。

(6) 确定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

会后，组成一个代表团晋京请愿，要求取消该废止旧医提案。当时的政府，包括行政院、监察院及卫生部均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的意图。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仍坚持其一贯歧视中医的政策，如教育部及卫生部均有训令禁止中医办学校、医院；并明令把学校改为传习所，医院改称医室或医馆，禁止中医利用西药及西法；且由卫生部下令修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会章。这些举措终于又激怒了中医药界，而在同年12月再度开会反对政府之阻碍中医药发展之政令。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月复函，称已"命令撤销"上述各项政令，以平民愤。

1930年，一些中医代表向政府建议成立"中央国医馆"，作为发展中医学术的机构。为了缓和中医药界的反抗情绪，国民党

① 据《医界春秋》，1927年第34期。

中央于五月同意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设分馆。次年,该馆正式成立,至1933年,制定了该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后来,又提出《国医条例》,其目的在审查国医资格、"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①]。这个提案曾遭到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之反对。几经周折,后来终于在1936年1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并予以公布。公布时是以国民政府之明令,由其主席及立法院院长签署,以《中医条例》的名义发布的。自此,中医学校才得到合法的地位。

虽然如此,中医在1949年以前的地位仍然不如西医,仍受到歧视,中医的正常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第三节 传统中医在限制中的缓慢发展

尽管这一阶段政府对传统医学实行歧视乃至消灭的政策,但由于中医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业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需要它。民间大量的中医仍然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医的研究和发展。

1. 文献学的整理研究。

继承前一阶段对文献学研究的余绪,本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绩。如对古代医典不仅有整理、注疏和诠释,也不乏发挥原意之作。如《内经》方面,私人发挥作品不少,如《秦氏内经学》、《时氏内经学》,还有的从哲学高度论评《内经》,如杨则民有《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的论文,即属此类。对《难经》,既有考证,如张

① 《国医公报》1933年1卷8期。

骥的《难经丛考》等，也有一些发挥，如黄竹斋的《难经会通》等。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有不少新的发挥，如曹颖甫之《伤寒发微》，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提出的是有一些医家用西医的观点，对这两部临床经典作了现代的阐述，如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今释》，就是其中的代表。也还有对两书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发挥的，如黄竹斋的《伤寒杂病论会通》即是。

医案医话一类著作，也有不少。著名的医案整理有秦伯未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徐衡之等的《元明清名医类案》、《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等；个人的医案更多，如陈莲舫、曹颖甫、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有医案著作出版。医话则有裘吉生之《医话集腋》、丁福保之《医话丛存》、许勉斋之《勉斋医话》等多种。

医史学方面著作，是一个丰收的时期。陈邦贤之《中国医学史》，是为国内第一部医学通史。还有李涛《医学史纲》，为中西兼备之医史著作。这方面的教材、讲义也出版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王吉民、伍连德首次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包括古代及现代教会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在国外颇有影响。

其他如专科史、疾病史的著作也有一些。

2. 临床医学及药物学的发展。

在临床医学方面，以内科而言，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却有一批较有名的临床医家，如陆仲安、施今墨、丁甘仁等，都是京沪有名的医生，治好病人无数，其中多有疑难病症。

在外科方面，张山雷于疡科颇有成就，其心得均见于其著作《疡科纲要》、《疡科治案心诠》。其他还有一些关于淋浊及性病的著作。

这一阶段在针灸科方面也颇有成就。著名的针灸家有承淡

安、朱琏等人。承氏不仅针术高明,著作甚丰,且热心于社会事业。他的著作有《中国针灸治疗学》等多种,并创办《针灸杂志》。他还创办针灸研究社,广泛培养针灸人才,他并且善于用现代医理解释针灸,影响很大。朱琏原为西医,早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学习针灸,遂专心研究针灸学。著有《新针灸学》,以科学观点阐释针灸术,此书后来译成俄文及朝文,有一定国际影响。

中药学除陆续有一些整理旧本草的传统著作外,还出现了一些观点较新的著作,如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对药物不同品种及真伪,进行辨别。温敬修的《实验药物学》、丁甘仁的《药性辑要》、丁福保的《中药浅说》,都已经掺入一些近代药物学的知识。在方剂学方面,除传统中医方剂著作外,丁福保的《中西医方汇通》将中西两种不同的药方加以归类,也颇具特点。

3. 中西医汇通的发展。

中西医汇通学派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医学派别,也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这个学派继续有所发展,其学术思想的特点和主张可以从下面几个代表人物的介绍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他的学术主张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去了解。他认为西医所讲的医理多数已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只不过古代医籍语多含混,有待于后人去阐发。他的学术主张不外乎两点,即衷中参西和求实效而重实验。他认为东西文化要互相容纳,使道器合而为一,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这特别体现在他的遣方用药方面,

常是中西药并用于一方，而以中医方剂为主。他亟力主张中西医者应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认为互相谩骂之风乃医界之大耻。他对医疗效果总是抱客观态度，甚至连《内经》所言，如未经征验，也不敢轻信。这种客观的态度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

恽铁樵(1878—1935)，江苏武进人。他前半生从事教育及编译工作。直到43岁以后才开始习医，行医仅14年即故去，但在这短短的10多年中，他举办三期中医函授学校，撰著医书20多种，其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他对中西医两个体系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西医之基础各不相同，理论亦不同，各有其所长，主张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吸收西医之长，并与之化合，以产生新的中医。但他又主张，要汇通两个体系，首先要发展中医，不应满足中医已有的成就。他十分讲求临证的实效，通过采用中西两者之长以求得治疗之实际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主张尽量利用近代科学之知识，才能达到目的。他是反对废止中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的。

陆渊雷(1894—195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开始时是攻读经学，对天文历算、诸子百家，亦颇精通。后改学医，为恽铁樵之学生。他反对消灭中医，但认为中医必须科学化，才能求得生存；认为中医疗病有效，确是事实，"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①，故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阐释这些实效。而他所指的科学，实乃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各个学科之基础。他还主张，这个中医科学化之任务，有赖于中医工作者本身。而要研究中医，则必须

① 《生理补证·绪言》。

从中医之证候入手，并针对这个证候，研究药方，以求提高治病之效验。

中西医汇通的人物还有不少，主张各有特点，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卫生工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它视为革命运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早在红军时期，革命队伍中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先后多次颁布卫生条例，对一些烈性传染病，也十分注意预防和治疗，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红军及驻地群众的健康。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卫生工作是对一些传染病的预防，提倡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预防第一"放在卫生工作的首位。当时，已经建立相当健全的卫生行政组织，总管卫生工作。例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政厅下面就设有卫生处，辖有中西医药研究会。另外，除了几个行政科室之外，还辖有国际和平医院、医药专门学校等医疗及教育机构。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医疗条件甚为困难，政府除多方设法获得药品及设备外，提倡用中医方法，就地采药供医疗用；更重视简便易行的针灸疗法，并且培养出一些骨干，为以后各个时期推广这些疗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军阵战伤的医护工作占医疗卫生工作的相当大部分。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为我国的抗日

救亡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组成援华医疗队，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其中闻名遐迩的有加拿大的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柯棣华、爱德华，还有马海德、米勒、傅莱等等，都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此外，边区政府十分强调中西医合作，曾提出“中医科学化”、“中西医互相学习”的口号，这些都是1949年建国以后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先声。

革命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医药卫生干部的培养，如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先后办了一些医学校，包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学校，各大区还办有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此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

所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和工作，都为1949年建国以后在全国开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仿效的榜样。



第六十三章　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

从中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是本历史阶段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科学形势比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先在清朝末年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初期业已渐次回国。他们中有不少从事科学技术教育或工程技术工作。这些回国的留学生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科学血液。随着民国时期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本土也培养出了不少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一时期派出去的和回国的留学生也逐年增多。这些人才的涌现，不但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有了生力军，而且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科学意识，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氛围。中国近代科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许多科技社团的建立，特别是许多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使中国从此有了现代科学。日军侵华对中国科学事业有很大的破坏，许多科研机构内迁，仪器设备甚至人员受到很大损失，科学研究失去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和机会。虽然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大西南和边区开展过许多战时的科技活动，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受到很大影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为中国科学事业展

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 科技社团

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按其建立的数量、规模和开展活动的情况，可以分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的两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科技社团的繁荣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除了军阀混战以外，大规模的战争较少，社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即使南北军事对抗期间，学术界的活动还是较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之间的学术活动差可正常开展，这给各种科技社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学会的创建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阻碍。这个时期建立的科技社团，全国性的比较多，有影响的也比较多，而且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科技社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有不少的专门学会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由留学生在国外创立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国工程学会等，若干年后再迁回祖国。下面仅介绍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以观中国科技社团的梗概。

1. 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夏创立于美国[1]。发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向祖国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而创办《科学》月刊的。为此，他们邀集

[1] 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管理《科学》的机构——"科学社"，办刊的经费分股筹集。这样，《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他们是：胡名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9人。到1914年底，入社的人数达35人，而且印刷费和文稿也准备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发行。这样，《科学》月刊便于1915年元月在神州大陆问世了。1915年4月改公司性质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并于1915年10月由全体会员表决通过定社名为"中国科学社"。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刊行《科学》杂志，而是"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①]。同时选出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5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秉志(会记)、胡明复、周仁。又选出杨铨、过探先、金邦正分别任编辑部长、营业部长和推广部长。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1918年把社所迁回祖国，先在上海，第二年迁南京，1928年后又迁到上海。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征集更多的资金，1922年决定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专司执行业务，另选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是：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汪兆铭、胡敦复9人。新的理事会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11人。参加董事会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济问题外，很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的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的一班人。

---

① 《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1916年，第2卷第1期。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作了规定：(1)刊行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译著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设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事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物诸标本，供陈列研究之用；(7)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问题。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最早的杂志之一，而且内容广博宏富，是同时期和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同类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展的情况，而且也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发表研究论文提供园地，甚至还是发现科学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华罗庚在 19 岁和 20 岁两年都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其第二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 1930 年《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当他后来知道华罗庚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正在江苏省某县的中学当会计时，十分惊异，便邀华到清华大学工作，为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创造了条件。中国科学社十分重视对《科学》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也努力使《科学》不中断，自 1915 至 1950 年的 36 年时间里，一共刊行了 32 卷，蔚为大观。除了《科学》月刊外，中国科学社还于 1933 年 8 月创刊《科学画报》，又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从"等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此馆的书籍半为社员捐助或寄存，半为该馆选购；杂志则多数是订购的，少数是由各国

学术机关团体赠送或交换而得的。到1929年,中西书籍杂志已达37000册,其中有以重金购买的,弥足珍贵;有不少杂志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刊的,该馆也设法把它补齐或尽量补订。第三,创设研究所。最初他们计划创建三个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设备等原因,只于1922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1913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开初因研究所经费困难,因而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火外,各研究员均以大学教授课余的时间从事研究,皆不计薪。这个研究所注意野外调查,采集动植物标本,凡闽、浙、川、粤、藏、鲁等地的动物、植物、土产、水产等等,均派员前去采集,并建立了丰富的标本陈列馆(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举办科学演讲,参与国内科学教育活动,编订科学名词,举办展览,以及设立科学仪器公司等。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科学社的队伍发展很快,第二年(1915)为77人,五年后(1919)为435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30年后(1944)就达2354人,至1949年更发展到3776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2. 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工程学会合并而成的①。而中华工程师学会又是由以下

---

① 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刊),1948年;钟少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3卷第六期。

三个同于1912年创立的学会合并而成的：詹天佑在广州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立的中华工学会、徐文炯在上海创立的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共推詹天佑为会长，颜、徐为副会长。该会以规定营造制度、发展工程事业、力阐工程学术为宗旨，并订出五项活动：出版以输学术、集会以通情意、试验以资实际、调查以广见闻、藏书以备参考。1916年迁总会事务所于北平。此会在1931年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詹天佑、沈琪、颜德庆、邝孙谋；历任副会长为颜德庆、徐文炯、吴健、陈榥、陈西林、邝孙谋、华南圭、俞人凤、赵世煊、劳之常、王宠佑、孙多钰、严智怡、贝寿同，名誉会长为张謇、叶恭绰、权量。1917年，留美青年学生陈体诚等人发起创建中国工程学会于纽约，以联络各项工程人才、协助提倡中国工程事业、研究工程学之应用为宗旨。陈体诚为会长，张贻志为副会长。1921年中国工程学会迁回祖国，设总会于上海。中国工程学会在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陈体诚、吴承洛、周明衡、徐佩璜、李垕身、胡庶华；历任副会长为张贻志、吴承洛、刘锡祺、凌鸿勋、薛次莘、周琦、徐恩曾、徐佩璜；历任董事为侯德榜、李铿、孙洪芬、程孝刚、任鸿隽、凌鸿勋、张贻志、黄家齐、陈体诚、茅以升、薛次莘、薛桂轮、吴承洛、徐佩璜、徐恩曾、罗英、薛绍清、李熙谋、恽震、李垕身、陈立夫、周琦、胡博渊、周明衡、张可治、顾振。由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之宗旨与事业相同，会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接近，便于1931年8月，在南京举行两会的联合年会，正式合并，易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为宗旨，仍以1912年为创立之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历

任会长为韦以黻、颜德庆、萨福均、徐佩璜、曾养甫、陈立夫、凌鸿勋、翁文灏、茅以升;历任副会长为胡庶华、支秉渊、黄伯樵、恽震、沈怡、茅以升、胡博渊、杜镇远、侯家源、李熙谋、顾毓琇、徐恩曾、萨福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主要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刊物方面,两会在合并前各有会报;中国工程学会还于1925年创办《工程》杂志。两会合并后,《工程》杂志继续刊行。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内外各种工程建设,刊登学术论文,以及工程调查、评论或建议。(2)中国工程师学会设有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以开展工作,主要的有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所委员会、建筑总会会所委员会等。(3)召开年会,联络全国工程技术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了联络全国各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还设立了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化工五个专门委员会,并多次与全国各专门学会联合召开年会。抗日战争时期,该会决定登记战时人才,分组研究战时工作,传习战时工程知识,拟订国防与民生计划,分平时与战时,建议政府实施,及由该会自办调查研究;学会会员还参加工矿企业指导生产国防军需器材,或迁徙厂务。(4)实行工程学术奖励,建立奖励金制度:其一,对有特殊贡献者,赠予荣誉金牌。第一次于1935年,得金牌的是侯德榜,以他对于我国制碱工程的贡献,及其所著《制碱》一书,被认为是西文中制碱工业最有价值之著作。第二次于1936年,得金牌的是凌鸿勋,为其建筑陇海及粤汉两铁路巨艰段工程的成功。第三次于1941年,得金牌的是茅以升,以其建筑中国第一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其二,对于学习优秀的青年学生,则给予奖学金。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各项活动,吸引中国工程界的人士踊跃参加。因此,它既有为数众多的普通会员,又有数目可观的团体会

员。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两会合并时的1931年，已有会员2169人；至抗日战争爆发时的1937年，会员人数达2994人，团体会员17个；到了1949年，会员人数增至16717人，团体会员达到129个。无疑，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社团。

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等的建立，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对科技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技事业的重视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在组织方面，迥异于晚清那些稍纵即逝的学会，因而也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后中国建立科技社团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科技社团有：中华医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等。

（二）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国科技社团的缓慢发展时期

抗战开始以后，许多北方的和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西北，条件较差，科学活动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新社团也建立不多。然而，在解放区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科学技术活动呈现出一番蓬勃发展的景象。国共的联合抗日，使边区的活动范围增大了，抗战和大生产运动的迫切需要，也使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如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1940年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二年，这个研究会下

属的农学、生物学、地质、机电、化学、医学、数理、炼铁、土木、航空等10个学会也相继成立。同样，在晋察冀边区也于1942年成立了自然科学界协会，随即又成立了农学、医学、电学3个下属学会①。当然，这些学会的规模都较小，活动的内容也较简单。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技社团处于艰难的发展时期，各方面活动受到很大的局限。抗战胜利以后，在最初的两三年里，科技工作者怀着胜利的喜悦和报效祖国的抱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也建立了几个学会。其后由于内战爆发，科技社团的活动有所限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技社团才又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1948年间的中国科技社团①

序号	名　　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发起人
1	中华工程师学会	1912	广州	詹天佑
2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	民国初年		
3	医史研究会	1914	上海	陈邦贤
4	中国科学社	1914	纽约	胡明复等
5	中华医学会	1915	上海	颜福庆等
6	中外医学研究社	1915	暹京	许超然
7	中华学艺社(丙辰学社)	1916	东京	陈启修等
8	中华农学会	1917	南京	
9	中国工程学会	1917	纽约	陈体诚等
10	中华森林会	1917		
11	中华植棉改良社	1917	上海	
12	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	1917	上海	

① 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

续　表

序号	名　　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发起人
13	中华矿业同志会	1920	日本	
14	中美工程师协会	1921 前		
15	中国心理学会	1921	南京	
16	中国地质学会	1922	北京	章鸿钊等
17	中国天文学会	1922	北京	高鲁
18	中华化学工业会	1922		
19	上海市国医学会(上海中医学会)	1922	上海	
20	中国气象学会	1924	青岛	竺可桢等
21	新中国农学会	1924		
22	中国昆虫学会("六足"学会)	1924	南京	
23	蜀农学会	1924	南京	
24	大中华科学研究社	1925	上海	吴稚晖
25	中国生理学会	1926	北京	林可胜等
26	丙寅医学社	1926	北京	
27	中华自然科学社	1927	南京	沈其益等
28	中国建筑师学会	1927	上海	
29	中华林学会	1928	南京	
30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	1928	南京	
31	中华矿学社	1928	南京	
32	中国养鸡学社	1928		
33	中国化学工程学会	1929	美国	顾毓珍等
34	中华化学会	1929	美国	庄长恭等
35	中国古生物学会	1929	北平	杨钟健等
36	中华图书馆协会	1929	北平	
37	中国营造学社	1929	北平	朱启钤
38	中国园艺学会	1929		
39	上海市国医公会	1929?	上海	
40	中华民国医药会	1929		

续 表

序号	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发起人
41	中华国医学会	1929 前	上海	
42	天津药业研究会	1929 前	天津	
43	山西中医改进会	1929 前	太原	
44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1929	上海	
45	全国医师联合会	1929	上海	
46	中华海产生物学会	1929	厦门	
47	中国化学研究会	二十年代		中国旅日学者
48	中国数理学会	二十年代	北平	冯祖荀等
49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1930	上海	朱仙舫等
50	中国度量衡学会	1930		
51	中华卫生学会	1930	上海	
52	神州国医学会	1931 前	上海	
53	中国工程师学会	1931	南京	韦以黻等
54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1931	南京	李仪祉
55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	1931		
56	中华地学会	1931		葛绥成等
57	杭州植物病虫学会	1931	杭州	
58	中山大学昆虫学会	1931	广州	
59	历法研究会	1931		
60	中国微生物学会	1932 前		
61	中国麻风救济会	1932 前		
62	中国细菌学会	1932 前		
63	中国物理学会	1932	北平	叶企孙等
64	中国化学会	1932	南京	
65	化学工业建设协会	1932	天津	魏元光
66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	1932	南京	顾毓琇等
67	华北工业协会	1932	北平	戴乐仁
68	自然学会	1932	东京	
69	中国植物学会	1933	重庆	胡先骕等

续　表

序号	名　　　　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发起人
70	东南医学会	1933	上海	
71	中国防痨协会	1933	上海	吴铁成
72	国药科学改造会	1933		
73	中国农学社	1933	武昌	唐贻荪等
74	中国农业协会	1933	天津	魏悌斯
75	中国考古会	1933	上海	叶恭绰
76	民众医药社	1933	上海	
77	中国医事改进社	1933	南京	
78	世界动力学会中国分会	1933	南京?	
79	中华化学社	1933	广州	
80	中国技术合作社	1933	上海	沈钧儒等
81	上海市建筑学会	1933?	上海	
82	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	1934	上海	李熙谋等
83	中国动物学会	1934	上海	秉志等
84	世界科学社	1934	北平	蔡元培等
85	昆虫趣味会	1934	南通	
86	禹贡学会	1934	北平	顾颉刚等
87	金石学会	1934	北平	容庚等
88	中国工厂检查协会	1934	上海	
89	中华护肺健康协会	1934	上海	
90	中西医药研究社	1934	上海	宋大仁等
91	中国地理学会	1934	南京	翁文灏等
92	中国数学会	1935	上海	胡敦复等
93	科学建设促进社	1935?	上海?	蔡元培等
94	中国博物馆协会	1935	北平	马衡等
95	中国自动机工程学会	1935	上海	张登义等
96	华北农产改进社	1935	北平	
97	中华矿业促进社	1935	太原	阎锡珍
98	中国兽医学会	1935	上海	蔡无忌等

续 表

序号	名 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发起人
99	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	1936 前	上海	
100	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1936	杭州	庄前鼎
101	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1936	杭州	李书田等
102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1936	南京	
103	中国造纸协会	1936		
104	中国军事交通学会	1936		
105	中国古泉学会	1936	上海	丁福保等
106	中国土壤肥料学会	1936	镇江	
107	中国心理学会	1937	南京	汪敬熙等
108	中华医史学会	1937	上海	
109	中国测量协会	1937		
110	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1938		
111	清华昆虫会	1938	昆明	
112	边区国防科学社	1938	延安	高士其等
113	科学生活社	1939		
114	中国数学会	1940	昆明	姜立夫
115	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	1940	重庆	周建南
116	国医研究会	1940	延安	
117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	1940	延安	吴玉章等
118	边区农学会	1941	延安	
119	边区生物学会	1941	延安	
120	边区地质学会	1941	延安	
121	边区机电学会	1941	延安	聂春荣等
122	边区化学会	1941	延安	董立文等
123	边区医学会	1941	延安	
124	边区数理学会	1941	延安	
125	边区炼铁学会	1941	延安	
126	边区土木学会	1941	延安	
127	边区航空学会	1941	延安	

续　表

序号	名　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发起人
128	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	1941	延安	
129	中国稻作学会	1941?		
130	中国工程学会	1942	南京	杨寿楣
131	邵武昆虫学会	1942	邵武	
132	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	1942		
133	晋察冀边区农学会	1942		
134	晋察冀边区电学会	1942		
135	晋察冀边区医学会	1942		
136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943	重庆	
137	中华昆虫学会	1944	重庆	张巨伯
138	延安中西医学研究会	1944	延安	
139	中国营养学会	1945 前		
140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5	重庆	涂长望等
141	中国土壤学会	1945	南京	陈华癸等
142	中国硅酸盐学会	1945		
143	科学与生活社	1946	重庆	
144	中国科学促进会(中国科学服务社)	1946	南京	杭立武等
145	中国技术协会	1946	上海	宋名适
146	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	1946		郭沫若等
147	山东自然科学社	1946	临沂	
148	东北科学技术学会	1946	长春	
149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1947	南京	陈宗器等
150	中国解剖学会	1947		卢于道等
151	中国科学期刊协会	1947	上海	
152	中国制革工程学会	1947	重庆	
153	中国牙科医学研究会	1947	广州	

续　表

序号	名　　　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发起人
154	中国市政研究会	1948	南京	
155	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	1948	哈尔滨	
156	上海市自来水学会	1949 前		

注:此表系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　科 研 机 构

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中,科研机构起着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对于这一点,民国初期的科学界就已有明确的认识。1918 年,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任鸿隽在论述科研机构的重要性时指出:“夫发明有待于研究,而研究又有待于历久之积力,然则研究将由何术以继续不辍耶? 曰,是有组织之法在。”[①] 这里所说的“组织之法”就是指建立研究机构。他列举了西方科学发达国家创建研究所以便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许多成功的经验,说明我国尽快建设科研机构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愈益重视,中国的科研机构已逐一建立起来。但民国时期的科研机构不同于民众性的科技社团,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建立的,表现出较大的政府行为。国家建立的科研机构,其规模都比较大,而民间建立的科研机构都较小,人员、设备都不能与之相比。前面所介绍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就是属于民间组织的。下面再对几个主要的科研机构作一概

① 任鸿隽:《发明与研究》,《科学》1918 年第 4 卷第 1 期。

括的介绍。

中央研究院

1. 筹备及成立[①]。设立中央研究院的最初设想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1924 年冬，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去北京“共商大计”。他在离粤北上之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并拟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立革命建设基础。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去世，筹建中央学术院的计划无由实现。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决定由李石曾、蔡元培、张人杰三人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法，并命蔡、李、张等人为筹备委员。1928 年 4 月 23 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6 月 9 日蔡元培在上海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者有：蔡元培、徐渊摩、丁燮林、陶孟和、竺可桢、李四光、杨端六、王季同、杨铨、高鲁、周览、宋梧生、周仁共 13 人。从此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以后就定这一天为院庆日。11 月 9 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其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蔡元培于 1940 年逝世后，由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选出三位院长候选人：翁文灏、朱家骅、胡适，后由国民政府遴选朱家骅为代理院长。1928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于南京设总办事处。总办事处是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管理机关，设总干事一人，干事 3 至 5 人，受院长直接指导，执行全院行政事宜。总干事和干事均由院长聘任。总干事都是聘请学

---

①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1988 年第 9 卷第 2 期。

术上较有成就、威望较高而且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担任。历任总干事为:杨铨(1928—1933)、丁燮林(1933—1934)、丁文江(1934—1936)、丁燮林(1936,代理)、朱家骅(1936—1938)、任鸿隽(1938—1940)、傅斯年(1940—1941)、叶企孙(1941—1943)、李书华(1943—1945)、萨本栋(1945—1948)、钱临照(1948—1949,代理)。

2. 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机关是各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立了理化实业研究所(1928 年 3 月,上海)、地质研究所(1928 年 1 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 年 3 月,上海,后迁南京,1945 年改名为社会研究所)、观象台(1927 年 10 月,南京)四个研究机构。1928 年 2 月观象台于南京分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7 月,理化实业研究所于上海分成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1945 年改名为工学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又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 年 10 月,广州,后迁北平)、心理研究所(1929 年 4 月,北平,后迁上海,1945 年改名为心理学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 年 1 月,南京,主任为钱天鹤)。自然历史博物馆于 1934 年 7 月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所长为王家楫),该所又于抗战时期的 1944 年 5 月分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在抗战时期还成立了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4 年 12 月,重庆,主任为林可胜,由冯德培代理)。1947 年成立数学研究所(上海)。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历任所长是:地质研究所为李四光(1928—1949);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杨端六(1928—1929)、蔡元培(1929—1932,院长兼任)、杨铨(1932—1933,总干事兼代)、傅斯年(1933—1934,兼代)、陶孟和(1934—1949);天文研

究所为高鲁(1927—1929)、余青松(1929—1940)、张钰哲(1941—1949);气象研究所为竺可桢(1927—1946)、吕炯(1936—1944,代理)、赵九章(1944—1946,代理;1947—1949);物理研究所为丁燮林(1928—1946)、萨本栋(1946—1948,总干事兼代)、吴有训(1947—1949,未到职);化学研究所为王琎(1928—1934)、庄长恭(1934—1938)、任鸿隽(1938—1941,总干事兼任)、吴学周(1942—1949);工学研究所为周仁(1928—1949);动物研究所为王家楫(1944—1949);植物研究所为罗宗洛(1944—1949);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傅斯年(1928—1949);心理研究所为唐钺(1929—1933)、汪敬熙(1933—1949);数学研究所为姜立夫(1947—1949)。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抗战期间内迁,经湖南辗转四川李庄、重庆和桂林、昆明等地,所址屡有变更。

3. 学术评议制度。学术评议机关是评议会,它是全国最高的学术评议机关。其职能是决定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方针,接受政府委托从事学术研究,选举院长候选人三人呈请政府遴选,联络国内研究机关讨论一切急需研究的问题,促进国内国际的学术合作与互助,受考试院委托审查考试人员之著作或发明事项等等。中央研究院院长、总干事、各直属研究所所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评议员”。由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全国性的,因此除从本院评选外,还须从全国各大学和其他学术单位中评选“聘任评议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评议会议长。第一届评议会产生于1935年,第二届产生于1943年。第一、二届评议员名单见下表。第三届评议会产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产生之后的1948年9月。从第三届开始,其聘任评议员是由中央研究院院

中央研究院第1、2届评议会评议员名单①：

届别	职务	姓名
第一届评议会	议长	蔡元培
	秘书	丁文江　翁文灏
	当然评议员	蔡元培　丁燮林　庄长恭　周　仁　李四光　余青松　竺可桢　傅斯年　汪敬熙　陶孟和　王家楫　任鸿隽
	聘任评议员	李书华　姜立夫　叶企孙　吴　宪　侯德榜　赵承嘏　李　协　凌鸿勋　唐炳源　秉　志　林可胜　胡经甫　谢家声　胡先骕　陈焕镛　丁文江　翁文灏　朱家骅　张　云　张其昀　郭任远　王世杰　何　廉　周鲠生　胡　适　陈　垣　陈寅恪　赵元任　李　济　吴定良　茅以升　叶良辅
第二届评议会	议长	朱家骅
	秘书	翁文灏
	当然评议员	朱家骅　叶企孙　萨本栋　丁燮林　吴学周　周　仁　李四光　张钰哲　竺可桢　傅斯年　汪敬熙　陶孟和　王家楫　罗宗洛　赵九章
	聘任评议员	姜立夫　吴有训　李书华　侯德榜　曾昭抡　庄长恭　凌鸿勋　茅以升　王宠佑　秉　志　林可胜　陈　桢　戴芳澜　胡先骕　翁文灏　朱家骅　谢家荣　张　云　吕　炯　唐　钺　王世杰　何　廉　周鲠生　胡　适　陈　垣　赵元任　李　济　吴定良　陈寅恪　钱崇澍

士选出。第三届聘任评议员共32名。他们是:陈省身、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庄长恭、翁文灏、竺可桢、茅以升、凌鸿勋、秉志、伍献文、陈桢、胡先骕、钱崇澍、李宗恩、林可胜、冯德培、汤佩松、俞大绂、汤用彤、冯友兰、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梁思成、王宠惠、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达。

4. 院士制度。在1946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

①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卷第2期。

年会上，曾对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和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进行讨论，认为为了对内加强学术研究，对外促进国际合作，必须建立院士制度，即在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的人士中，选出若干人为院士，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构成主体。经过各大学及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各研究机关按照数理科、生物科、人文科的提名，推举出 400 余人；经 1947 年 10 月的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的选举，从中选出 150 名院士候选人；最后在 1948 年 3 月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上选举出 81 名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①

组别						
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等）	姜立夫	许宝騄	陈省身	华罗庚	苏步青	吴大猷
	吴有训	李书华	叶企孙	赵忠尧	严济慈	饶毓泰
	吴　宪	吴学周	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	李四光
	翁文灏	黄汲清	杨钟健	谢家荣	竺可桢	周　仁
	侯德榜	茅以升	凌鸿勋	萨本栋		
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学、农学等）	王家楫	伍献文	贝时璋	秉　志	陈　桢	童第周
	胡先骕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
	李宗恩	袁貽瑾	张孝骞	陈克恢	吴定良	汪敬熙
	林可胜	汤佩松	冯德培	蔡　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					
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　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征	陈　垣	陈寅恪	傅斯年
	顾颉刚	李方桂	赵元任	李　济	梁思永	郭沫若
	董作宾	梁思成	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马寅初	陈　达	陶孟和		

5. 奖励制度。中央研究院为了奖励科学研究，同时也为了纪念两位已故的总干事杨铨、丁文江和已故院长蔡元培，分别

①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5 年第 6 卷第 2 期。

于1937年和1948年设立杨铨、丁文江奖金和蔡元培奖学金。杨铨奖金是授予对人文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丁文江奖金是授予对自然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每种奖金定额2000元,隔年一次,受奖人以中国国籍年龄在35岁以下为限。第一届杨铨奖金为语言学家李方桂所得,第一届丁文江奖金为物理学家吴大猷所得。蔡元培奖学金设50名,分别授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的成绩特优学生。

北平研究院

1. 北平研究院[1]的建立。北平研究院是在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过程中,由李煜瀛提出设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议案而建立的。1929年8月6日由国民政府定名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其性质为一独立的学术机构;同月,教育部聘李煜瀛为院长;9月9日李就院长职,并于是日组织成立总办事处;北平研究院就此正式成立。同年11月,李煜瀛院长聘请李书华为副院长,襄理院务。

2. 北平研究院的组织结构。(1)前期组织:院-部-所(会)三级结构。在北平研究院成立初期,全院分为行政与学术十大部分。行政部分有总务部、出版部、海外部;学术部分有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国学部。理化部又设有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由李书华、李麟玉分别兼任所主任。生物部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年改为生理学研究所)、植

---

① 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

物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由经利彬、陆鼎恒、刘慎谔分别为三所主任。人地部设有地质学研究所（系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合作），由翁文灏为所主任。1930 年，严济慈第二次留法归来，即被聘为物理学研究所主任；不久，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设立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又聘严济慈兼任镭学研究所主任，赵承嘏为药物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最初还筹备了水利研究会（李仪祉为会员，李书华兼干事）、史学研究会（吴敬恒为会员，李宗侗为常务会员兼干事）、经济研究会、字体研究会（卓定谋、林宰平为常务会员），分属于理化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此外，在群治部成立自治试验村，在天算部设立测候所；1930 年又设立博物馆。但是，这一时期北平研究院由于人力、物力不济，所设研究机构都较简单，有的还只是一个空架子。(2) 中期组织：院-所（会）二级结构。1935 年 7 月起，北平研究院的组织作了调整，取消部级机构。在行政方面，取消原有的总务、出版、海外三部，直接设总办事处，受院长和副院长直接领导。总办事处下设文书、会计、庶务、出版四课。总办事处主任为李麟玉，秘书为崔敬伯。总办事处的职员除雇员外，均由院长聘任。在学术研究方面，取消原有的理化、天算、生物、人地、群治诸部，直接设立研究所和研究会。而且研究所、研究会直属院长领导，并改研究所主任为所长。当时共设 8 个研究所和 5 个研究会，即物理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镭学研究所（兼所长严济慈）、化学研究所（代所长刘为涛）、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动物学研究所（所长陆鼎恒）、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地质学研究所（兼所长翁文灏）、史学研究会（常务会员吴敬恒，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考古组主任徐

炳昶)、经济研究会(常务会员兼代金融组主任周作民,财政组主任崔敬伯)、字体研究会(常务会员卓定谋)、水利研究会(常务会员朱广才)、人地研究会(常务会员邵可侣)。其中史学研究会于1936年7月改为史学研究所,仍分历史、考古二组。博物馆仍旧。此外,北平研究院还设有气象台、测绘事务所等机构。其中气象台原为中央研究院北平气象台,于1935年划归北平研究院管理,该台系明清时期钦天监观象台。抗日战争爆发前一两年,北平研究院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工作,决定先将部分科研机构迁离北平。1935年史学研究所一部分迁往陕西,同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1936年植物学研究所亦将全部图书标本仪器及研究人员迁往陕西武功,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3)后期组织:院-所结构,撤销研究会。七七事变后,各研究所即进行内迁,总办事处与各研究所相继迁入昆明(地质学研究所迁至重庆北碚)。由于战时经费困难,经济研究会、水利研究会、字体研究会、人地研究会和气象台、博物馆、测绘所等机构都停办了。到1948年,只设物理学、镭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8个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调查所。

3. 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1948年北平研究院设立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院务会议主要职责是审议该院各项章程规则、工作计划、概算及其他重要事项,由院长、副院长、总干事、秘书及各研究所所长组成。学术会议则酝酿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春。当时北平研究院筹备改组各学会及研究会为该院学术会议,并计议推举学术专家为学术会议会员。学术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开会讨论学术问题及全院的重大问题。1946年3月,院长李煜

瀛由重庆赴昆明，召集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一次大会；1948年1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由委员13人组成，通过了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决议委托北平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推举学术会议会员，由院长聘任；以后的会员由学术会议自行选举。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名单①

组别	当然会员	会员
天算组		熊庆来　江泽涵　陈省身　赵进义　李　珩 张　云
理化组	李书华　严济慈 周发岐	吴有训　叶企孙　饶毓泰　马士修　庄长恭 吴　宪　曾昭抡　杨石先　黄子卿　吴学周 林世谨
生物组	李煜瀛　朱　洗 张　玺　刘慎谔	陈　桢　秉　志　胡先骕　戴芳澜　张景钺 周太玄　童第周　胡经甫
地学组		翁文灏　李四光　杨钟健　袁复礼　孙云铸 尹赞勋　裴文中　李士林　竺可桢　黄国璋 张印堂
农学组		刘大悲　戴松恩　冯泽芳　汤佩松　俞大绂
工学组		刘仙洲　魏寿昆　李书田　朱物华　侯德榜 张克忠　顾毓珍
医药组	赵承嘏	林可胜　陈克恢　汤飞凡　朱恒璧　戚寿南 李宗恩　朱广相
史学组	徐炳昶	陈　垣　陈寅恪　顾颉刚　姚从吾　张星烺 董作宾　汤用彤　李　俨

① 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

续 表

组 别	当然会员	会 员
文艺组		吴敬恒 张元济 胡 适 沈尹默 谢寿康 陆志韦 朱光潜 魏建功
社会科学组		王宠惠 顾孟余 陶孟和 何基鸿 杨端六 陈序经 崔敬伯 费孝通 吴克刚 罗喜闻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两个最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担负着规划全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北平研究院虽然是地方性的,但对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与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科研机构从成立起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做了相当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只有在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其他的科学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等)之后,才开始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和某些技术学科的研究和试验,获得了不少成果,才使中国有了自己的科学积累,也从而才使中国有了现代科学。因此可以说,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的开端。不仅如此,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还为中国后来的科研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基本上就是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合并、调整、扩建而成的。

地质调查所

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地质研究机构。1913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所长为丁文江；同时成立地质研究所，作为培养地质人才的学校，所长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于1913年秋开学，由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为主讲教师。经过三年的训练，至1916年7月，共有21人毕业，其中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等十余人被派到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在这批学生毕业后就停办了，章、翁二教师也转到地质调查所。从此地质调查所有了人员的保证。以后调查研究的人员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100多人。地质调查所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地质、古生物、矿物、岩石、矿床等等，都在调查之列①。

中国西部科学院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由四川企业家卢作孚于1930年创办的，是以立足四川、开发西部为宗旨的地方民办综合性科研机构②。卢作孚亲任院长。1932年张博和应卢作孚邀请，担任兼善中学的校长，并代理西部科学院院长兼总务处主任。在学术研究方面，最初设有四个研究所，即理化研究所、农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另有兼善中学、博物馆、图书馆三个附设机构。

① 参见王仰之：《旧中国的地质调查所》，《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4卷第3期。

② 参见赵晓宇、陈益升：《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12卷第2期；李乐元：《中国西部科学院》，《科学通讯》，1950年第1卷第4期；梁志全、罗平：《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8卷第2期。

1936年,博物馆、图书馆交给地方办,1937年生物、农林两个研究所停办,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1938年2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于重庆,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全部人员都参加合作。这样,从1938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究所单独进行研究工作,一直到1950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

民国时期的主要科研机构除了上述者以外,还有大学中的若干研究所,如交通大学研究所(1926—1949)、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1934—1949)、武汉大学理科研究所(1941—1947)等。这些大学的研究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在内迁昆明期间,建造了当时全国唯一供试验用的5尺口径的风洞①。

① 参见陈益升:《大学中的研究所》,载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579—580页。

后　记

我们的书至此已全部告竣，全书共12卷22册，也算是一部巨著了。我们能在二十余年时间里完成这项工程，首先要感谢：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各兄弟院校、研究单位的支持。

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

感谢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全体同志。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

白寿彝

1998.9.19 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通史．第12卷，中古时代．近代后编（1919-1949） 下册 22 修订本
作者=白寿彝主编
页数=1809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9
SS号=12508391
DX号=000007567259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567259&d=54FDF83B7B836D60B3962705 6AC2FBC5&fenlei=110301&sw=%D6%D0%B9%FA%CD%A8%CA%B7+%B5%DA12%BE%ED+%D6%D0%B9%C5%CA%B1%B4%FA